

目录

[譯者的話 2](#_Toc58922325)

[總編輯序 4](#_Toc58922326)

[第14卷序 5](#_Toc58922327)

[第一篇 模仿蘇聯模式，1949—1957年 6](#_Toc58922328)

[第一章 中國的再統一 6](#_Toc58922329)

[歷史地了解中國的幾個階段 6](#_Toc58922330)

[中國統一的成就 10](#_Toc58922331)

[現代化的作用 16](#_Toc58922332)

[地方控制的問題 24](#_Toc58922333)

[第二章 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 35](#_Toc58922334)

[總論 35](#_Toc58922335)

[鞏固和重建，1949—1952年 42](#_Toc58922336)

[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1953—1956年 55](#_Toc58922337)

[調整新的社會主義制度，1956—1957年 71](#_Toc58922338)

[第三章 恢復經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 87](#_Toc58922339)

[經濟背景 87](#_Toc58922340)

[戰后的恢復 90](#_Toc58922341)

[第一個五年計劃 93](#_Toc58922342)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編制 105](#_Toc58922343)

[第四章 新秩序的教育 111](#_Toc58922344)

[民國時期的遺產 111](#_Toc58922345)

[共產黨邊區的遺產 115](#_Toc58922346)

[學習蘇聯 117](#_Toc58922347)

[50年代透析 119](#_Toc58922348)

[第五章 黨與知識分子 130](#_Toc58922349)

[知識分子和政府之間的歷史關系 131](#_Toc58922350)

[黨和知識分子在1949年以前的沖突 132](#_Toc58922351)

[黨對知識分子的控制的確立，1949—1955年 139](#_Toc58922352)

[“百花運動” 143](#_Toc58922353)

[“反右運動” 149](#_Toc58922354)

[第六章 外交關系：從朝鮮戰爭到萬隆路線 153](#_Toc58922355)

[總的考察 153](#_Toc58922356)

[一邊倒：毛澤東和斯大林 155](#_Toc58922357)

[朝鮮戰爭 159](#_Toc58922358)

[萬隆方針 166](#_Toc58922359)

[第二篇 尋求中國道路，1958—1965年 174](#_Toc58922360)

[第七章 “大躍進”和延安領導的分裂 174](#_Toc58922361)

[綜述 174](#_Toc58922362)

[“大躍進”的根源 177](#_Toc58922363)

[廬山會議，1959年7月 183](#_Toc58922364)

[“大躍進”以后：劉鄧綱領 189](#_Toc58922365)

[林彪地位的提高 195](#_Toc58922366)

[整風 202](#_Toc58922367)

[第八章 重壓下的中國經濟，1958—1965年 211](#_Toc58922368)

[“大躍進”的經濟策略 212](#_Toc58922369)

[中國饑荒的范圍 217](#_Toc58922370)

[黨對饑荒危機的對策 220](#_Toc58922371)

[經濟恢復，1963—1965年 220](#_Toc58922372)

[第九章 教育的新方向 220](#_Toc58922373)

[教育“大躍進”：1958年 220](#_Toc58922374)

[余波：1959—1960年 220](#_Toc58922375)

[兩條腿走進60年代 220](#_Toc58922376)

[第十章 黨和知識分子：第二階段 220](#_Toc58922377)

[“大躍進”中給知識分子所做的努力抹黑 220](#_Toc58922378)

[在“大躍進”余波中對知識分子的放松 220](#_Toc58922379)

[對毛的思想上的階級斗爭的抵制 220](#_Toc58922380)

[激進的知識分子 220](#_Toc58922381)

[黨的整風，1964—1965年 220](#_Toc58922382)

[第十一章 中蘇分裂 220](#_Toc58922383)

[第一階段：1958年 220](#_Toc58922384)

[第二階段：1959—1960年 220](#_Toc58922385)

[第三階段：1961—1962年 220](#_Toc58922386)

[第四階段：1963—1964年 220](#_Toc58922387)

[后記 220](#_Toc58922388)

[參考文獻介紹 政治掛帥：略論1949年后的中國研究 220](#_Toc58922389)

[基本資料及其局限 220](#_Toc58922390)

[英文第二手文獻 220](#_Toc58922391)

[各章參考書介紹 220](#_Toc58922392)

[第一章 中國的再統一 220](#_Toc58922393)

[第二章 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 220](#_Toc58922394)

[第三、八章 經濟 220](#_Toc58922395)

[第四、九章 教育 220](#_Toc58922396)

[第五、十章 黨與知識分子 220](#_Toc58922397)

[第六章 對外關系：從朝鮮戰爭到萬隆路線 220](#_Toc58922398)

[第七章 “大躍進” 220](#_Toc58922399)

[第十一章 中蘇分裂 220](#_Toc58922400)

[會議與領導人 220](#_Toc58922401)

[參考書目 220](#_Toc58922402)

# 譯者的話

《劍橋中國史》是劍橋多種歷史叢書中的一種，各卷由研究中國歷史相應時期的學者編輯，卷內各章由各課題的專家撰寫，包括世界各國的中國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水平和動向，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定影響。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年》是《劍橋中國史》第14卷的中譯本。本書描述了1949—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努力解決中國當代問題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挫折。第一篇主要記錄了新政權將蘇聯發展模式運用于中國的嘗試；第二篇概括了其后中國領導人為更快更好地解決中國問題而尋求本國發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每一篇都分析了政治、經濟、教育、黨與知識分子、外交五個方面的關鍵問題及發展狀況。本卷撰寫人皆為研究這一時期的國外專家，他們向讀者展示了所有這些方面的相互關系，并揭示出這些相關因素如何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準備。

翻譯出版《劍橋中國史》是為了供我國學術界參考、借鑒。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具備“為錯”、“攻玉”條件的他山之石，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對我們有益的。就本卷而言，我們同意編者在序中所言：“我們的看法很可能是暫時的……由于試驗[筆者按：指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遠未結束，但又只有在它接近完成（今后一個世紀？）時，對最早的這幾個10年才有可能得出完整的看法。”我們認為這種態度是實事求是的。

本卷的翻譯仍本著忠實于原著的態度，作者的觀點、對材料的選擇和使用等請讀者自行鑒別。書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們盡力查對原文；少數引文沒有查到，從英文回譯，則將引號刪除，尚祈讀者見諒。

本卷譯校分工如下：

楊品泉 譯第1、2、3章

胡志宏 譯第4章

張書生 譯第5、6章

謝亮生 譯第7、8章，并負責全書校訂、統稿工作

馬曉光 譯第9章

思煒 與謝亮生合作翻譯第10章，翻譯、整理書目索引及附錄

黃沫 譯第11章、書目介紹、各章書目介紹

《劍橋中國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的中譯本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定名為《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下）；其第1卷、第3卷的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在印制中，分別定名為《劍橋中國秦漢史》、《劍橋中國隋唐史》；其第7卷《劍橋中國明代史》年內也可發稿。《劍橋中國晚清史》久已售罄，亦將于最近重印。其他各卷在國外出版后，我們也將盡快翻譯出版。

《劍橋中國史》以上各卷的翻譯出版，正值學術著作印數逐漸下降，終至出現“大滑坡”的幾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先后的領導同志張定、吳家珣、李凌、白蓮蓉、余順堯、鄭文林、吳元梁、任暉等始終貫徹建設學術出版社的方針，克服重重困難，給予大力支持；歷史編輯室和負責出版發行、圖書資料的同志也多方協助。馬曉光同志擔任《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年》的責任編輯，補苴罅漏，潤飾文字；更將書目索引所列各書加上順序號，在正文及腳注中的書名后用[]號一一標出相應的順序號，為讀者查對書目提供了方便。我們在此一并深表感謝。

我們水平有限，譯文錯誤及不妥之處懇請讀者指正。

謝亮生

1990年1月

# 總編輯序

在英語世界中，劍橋歷史叢書自20世紀起已為多卷本的歷史著作樹立了樣板，其特點是各章均由某個專題的專家執筆，而由各卷學術地位較高的編輯中的主導編輯總其成。由阿克頓爵士規劃的《劍橋近代史》共16卷，于1902—1912年期間問世。以后又陸續出版了《劍橋古代史》、《劍橋中世紀史》、《劍橋英國文學史》以及關于印度、波蘭和英帝國的劍橋史。原來的《近代史》現在已被12卷的《新劍橋近代史》代替，而《劍橋歐洲經濟史》的編寫也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編寫中的劍橋歷史叢書包括伊斯蘭教史、阿拉伯文學史、論述作為西方文明中心文獻的圣經及其對西方文明的影響的圣經史，此外還有伊朗史和中國史。

就中國史而言，西方的歷史學家面臨著一個特殊問題。中國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的文明史更為廣泛和復雜，只是比整個歐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圍稍小而已。中國的歷史記載浩如煙海，既詳盡又廣泛，中國歷史方面的學術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高度發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幾十年為止，西方的中國研究雖然有歐洲中國學家進行了重要的開創性勞動，但取得的進展幾乎沒有超過翻譯少數古代典籍和編寫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綱的程度。

近來，西方學者已經更加充分地在利用中國和日本的具有悠久傳統的歷史學術成果了，這就大大地增進了我們對過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細的認識，以及對傳統歷史學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這一代西方的中國史學者在繼續依靠歐洲、日本和中國正在迅速發展的中國學研究的扎實基礎的同時，還能利用近代西方歷史學術的新觀點、新技術以及社會科學近期的發展成果。而在對許多舊觀念提出疑問的情況下，近期的歷史事件又使新問題突出出來。在這些眾多方面的影響下，西方在中國學研究方面進行的革命性變革的勢頭正在不斷加強。

當1966年開始編寫《劍橋中國史》時，目的就是為西方的歷史學讀者提供一部有內容的基礎性的中國史著作，即按當時的知識狀況寫一部六卷本的著作。從那時起，公認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現、新方法的應用和學術向新領域的擴大，已經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史的研究。這一發展還反映在：《劍橋中國史》現在已經計劃出14卷，這還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時期，并且還必須舍棄諸如藝術史和文學史等題目、經濟學和工藝學的許多方面的內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寶貴材料。

近十年來我們對中國過去的了解所取得的驚人進展將會繼續和加快。進行這一巨大而復雜的課題的西方歷史學家所作的努力證明是得當的，因為他們所在各國的人民需要對中國有一個更廣更深的了解。中國的歷史屬于全世界，這不僅因它有此權利和必要，還因它是激發人們興趣的一門學科。

費正清

丹尼斯·特威切特

（楊品泉 譯）

# 第14卷序

中國的優秀分子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應付從帝國時代晚期繼承下來的國內問題，回答工業化的西方提出的歷史悠久的挑戰，這種努力在1949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央政府在這一年獲得了對中國大陸的完全控制，因而實現了很長時間以來所渴望的國家統一。此外，中央政府還首次承擔了國家的體制、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的現代化工作。下幾個10年的歷史將有世界上未曾見過的社會工程方面的規模最大的試驗。

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力量和意圖構成了這兩卷的總布局。與帝國和民國時期不同，在中國共產主義者的領導下，沒有一個生活的方面，也沒有一個國內的地區不受中央當局堅決使中國革命化這一努力的影響。研究中國社會的任何方面，如果不從中國共產黨努力改造中國社會這一背景出發，那簡直是毫無意義的。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從在北京的黨的政治局和政府的國務院的觀點著手考察中國。

這一卷分為兩個部分是由1958年黨的政策發生重要變化并影響社會一切方面這一情況所決定的。這一卷和下一卷之間的劃分映現了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這個分水嶺。

當然，毛澤東、他的同事和他的繼任者的思想、目標、策略、方針和活動并不等于中國的歷史。這兩卷的大部分注意的是評價它們對中國的影響。由于公布了大量新資料，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可進入大陸近年又比較容易，所以有可能把到目前為止的試驗的結果敘述得更加清楚。

不過，我們知道，我們的看法很可能是暫時的——這不完全是由于主要的資料仍然沒有公布（因為很可能有些材料永遠不會公布）；也不是由于我們評述的事件距今天太近（因為歷史學家的評價，無論時間距離上多么有利，總要不斷地予以修改）；而是由于試驗遠未結束，但又只有在它接近完成（今后一個世紀？）時，對最早的這幾個10年才有可能得出完整的看法。

本卷是《劍橋中國史》中涉及19世紀和20世紀的第5卷。從這一努力一開始，我們就意識到了我們得益于各方面為這個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我們的腳注就能說明這種情況……

麥克法夸爾

費正清

（謝亮生 譯）

# 第一篇 模仿蘇聯模式，1949—1957年

## 第一章 中國的再統一

## 歷史地了解中國的幾個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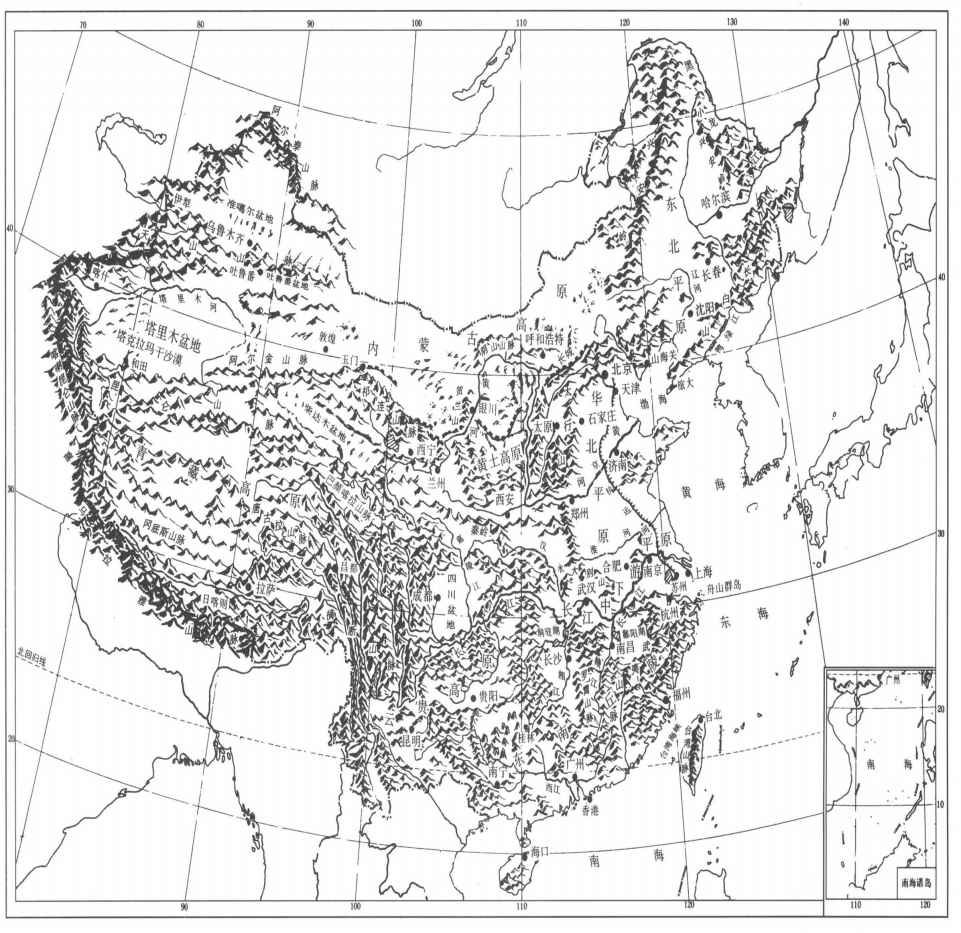
我們對現代偉大的中國革命的了解已經通過一系列很有特征的階段而有了發展。對這幾個階段的簡單的回顧，就是閱讀這卷論述人民共和國最初16年（1949—1965年）的《劍橋中國史》的最佳入門。對我們現在了解的階段之前的幾個階段的簡單考察，可能會給讀者提供一個關于本卷所表現的當前撰寫水平的有益的認識。[[1]](#_1_Wo_Yao_Gan_Xie_Ai_Lun__S_Hui)這幾個了解階段按其特征，可以稱為傳教士的、外交人員的、新聞媒介的和社會一科學的了解階段。

從16、17、18世紀的耶穌會士和天主教傳教士開始的傳教士的了解階段主要使我們認識以下幾個方面：古代中國的經典學說、漫長的歷代王朝以及我們稱之為中國的神話的內容——來自統治階級并用來教導中國民眾和西方民族（當他們逐漸對中國有所聞時）的官方道德教義和歷史。不用說，這個階段給人的印象是學者文人實行仁政，他們在高高在上的皇帝的統治下，恪盡職守來維持家族制度和傳統的中國社會秩序。[[2]](#_2_Guan_Yu_Ou_Zhou_Ren_Dui_Zhong)

外交人員的階段始于英國人從18世紀后期企圖與中國擴大貿易的各種活動。1793年馬嘎爾尼的出使和1816年阿美士德的使華最后導致了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這場戰爭使中國在不平等條約制度下開放而與外國接觸。在19世紀期間，賦予締約列強的國民以治外法權地位和容許他們在條約口岸進行商業活動的不平等條約制度繼續得到擴大和修訂。[[3]](#_3_W_W_Wei_Luo_Bi_De___Zai_Hua_D)到1917年，92個口岸被辟為商埠，已有幾代外國人住在中國并向本國報道了它的情況。

他們對之作出貢獻的那個了解階段總的說是一個趨于清醒的階段。耶穌會士報道的政府和仁愛社會的理想特征，這時直接地被生活在產業革命初級階段并相信西方進步文明以及基督教，甚至民主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各國人民所看到。對他們來說，中國似乎像一個陷入一團糟的古代王國。[[4]](#_4_Guan_Yu_Zui_Quan_Mian_Er_Qing)在外國試圖在中國建立勢力范圍和爆發義和團之亂的同時，西方的外交人員的了解階段在外國人試圖建立勢力范圍的1898年和爆發義和團之亂的1900年發展到了最高峰。在1900年，沒落的清朝一度希望把外國入侵者趕出國門，當此舉失敗時，1901年的和解引進了20世紀改革和革命的新時代。[[5]](#_5_Zhong_Guo_Zuo_Wei_Guo_Ji_Jing)

我稱之為西方觀察中國的新聞媒介階段是在19世紀90年代與有廣泛發行的報紙和外國記者的現代新聞事業同時出現的。例如，倫敦《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成了向西方世界報道中國政治領袖們的陰謀詭計的一個通訊員，直到最后其中幾人請他當他們的顧問時為止。[[6]](#_6_Guan_Yu_Mo_Li_Xun_De_Xin_Jian)新聞事業作為了解中國革命的主要方式，在整個20世紀已經有了持續和有成效的發展。電視能使西方對中國的革命家喻戶曉。



地圖1 中國地形圖

當然，以上這三個階段都是積累性的。西方的傳教士繼續翻譯經典，并就中國異教徒皈依基督教的良好前景向本教區的選民宣講。外交家們都繼續維護其不平等條約的特權（特別是治外法權），并在他們最后被趕走之前進一步鞏固外國人在華的地位。經過辛亥革命，然后是與中國共產黨結成第一次統一戰線時國民黨領導的20世紀20年代的革命，經過1931—1945年的日本侵華，然后是整個共產黨統治時期，在中國現場的報道，技術上不斷進步，規模上不斷擴大。

這些發展為中國的社會—科學了解時期準備了條件，隨著西方文明的社會科學的興起，這個時期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開始。這個廣泛的發展是通過許多機構的渠道進行的，并且經歷了自身的幾個小階段。一般地說，社會科學在中國首先應用于法律和政治學的領域，這些研究反映了在帝國主義競爭時代盛行的條約和貿易特權及中國所處的不平等地位。經濟學對中國的應用始于對中國貿易的研究（長期以來這項研究一直是英國人的專長），然后通過種種努力把這項應用擴大到中國的農村經濟方面。到這個時候，日本人的侵華也引起了他們對中國的資源、生產和市場的研究。[[7]](#_7_Guan_Yu_Fa_Lu__Chu_Le_Wei_Luo)20世紀20年代不但出現了紐約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而且出現了華北的群眾教育試驗和洛克菲勒基金建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總之，1912年舊王朝滅亡后，外國影響的浪潮通過商埠貿易、教會教育和在西方機構中對中國新知識分子的培養等渠道而席卷全中國。

社會—科學的了解方式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地區研究的發展而有了突破，這種研究力求以一體化的方式和按照各個學者的經驗把各種學科集中起來探索中國。語言、歷史、地理、經濟、政治、中國學、人類學及文學和各學科的分支學科，都開始培養訓練有素的專家。[[8]](#_8_Mei_Guo_Dui_Zhong_Guo_De_Di_Q)在美國，作為對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應，關心“共產黨威脅”的情緒達到了最高峰，中國革命者的馬克思一列寧主義促使西方大力進行分析的活動。

經過了幾代人以后，從整個階段中產生了現在的了解中國的典型方式，這種了解是既通過它的歷史，又通過它的現實，既通過它自己的傳統，又通過社會科學的方法。[[9]](#_9_Zai_Zhe_Lei_Zhu_Zuo_Zhong__Ji)本卷指出了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的出現，這些人可能充當這個學科或另一個與此題材關系特別密切的學科的專家，但同時又認識到所做的工作必須與其他研究方法聯系起來進行。現在出現的新型學者的資質是能自如地閱讀中文和講流利的漢語，在中國訪問和旅行，理論結合實際。

研究中國的能力的日益擴大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長期以來，把注意力集中在中文記錄方面的中國學術傳統已經深深地吸引開創性學者們的注意力和精力，以至它培養了一種“中國例外論”。先從寫作體系說起，中國的歷史表現了許多即使不是獨特的，但也是非凡的特征，如甲骨文、絲綢文化、早期的官僚行政活動、紳士階級，尤其是國家的源遠流長和它的不間斷的施政記錄。[[10]](#_10_Lai_De_Lie_Dui_Ci_You_Quan_M)對這類題目以及另外許多題目的闡述在講授中國歷史時仍必須占用許多時間。但是情況已發生了變化。

按照定義，社會科學涉及全世界范圍的原理和證據，因此，它本質上是比較性的。這樣，可以說中國的獨特性就減少了。在社會結構、家族制度、宗教崇拜、行政管理、對外貿易、排外思想、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和技術轉讓等題目方面，對中國的研究已把“中國例外論”降低為一系列研究課題中的一個。當然，這樣就產生了新的洞察力和更廣闊的眼界。

可是，傷腦筋的問題出現了。在多大程度上，知識面寬廣的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在中國根據他們的分類找到了他們主要尋求的東西？不用說，這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困擾著所有的人類的觀察者和調研者，而不管他們打著什么學術旗號。我們不打算在這里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假定，如果以往幾代學者是受他們時代的文化約束的話，那么我們也受文化的約束，我們只能宣稱我們對這個事實更有認識。

中國的學者作為單一的世界學術共同體的成員，與我們一樣正在通過社會科學研究中國。因此，在這里追溯18世紀以來中國的先驅者了解中國歷史的幾個階段是可取的。換句話說，與西方人觀察中國、觀察它的歷史和情況相對應的中國人的看法，對我們描述現代革命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看法不甚了解，但是下面幾個階段還是可以辨認出來的：導致經世治國時期的王朝循環階段；導致改革運動的自強階段；導致黨派專政的共和革命時期；最后是導致“現代化”的近期的共產黨人階段。當然，這些階段互相滲透。

在中國人對現代史的了解中，王朝循環是在支撐中國的幾大理論之一的基礎上提出的，這個理論我們務必進一步作更為詳盡的探討。從18世紀晚期開始，中國的學者注意到了行政工作的困難越來越多和士氣下降、叛亂出現的情況。從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70年代的這些情況被歸根為王朝循環論這類傳統的問題。[[11]](#_11_Yi_Wei_Yan_Zhong_Di_Bei_Ren)因此，有人試圖在“經世”的總名稱下提出種種解救之道，經世是學者一官員用以處理行政問題的一種技能。解救之道包括：為了振興士大夫階級士氣而恢復的學術研究；為了滿足治理群眾的需要而設想的有獨創性的行政安排；簡政和廉政；以及其他使中華帝國的秩序不時得以恢復并在幾個世紀中一直發揮作用的眾所周知的方法。帝國的儒家思想部分地因為具有改革的能力，所以通過重新樹立其理想，它已經幸存下來。[[12]](#_12_Guan_Yu_Ru_Jia_De_Gai_Ge_Si)

經世術的目標之一是安撫19世紀30年代在中亞或是在廣州的桀驁不馴的外夷商人。當經世論學者發現歐洲人更為強大時，他們就開始研究歐洲人及其技術。這是近代中國人思想開放并面向外部世界的開始。[[13]](#_13_Yi_Ge_Ling_Xiu_Shi_Duo_Cai_D)

自強和洋務的階段產生于這樣一種認識：西方的武器有助于鎮壓中國的叛亂者；與入侵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締約解決問題，能取得他們對王朝的支持，以使它在反對叛亂中保存下來。這樣，對中國的政治家來說，條約制度首先表現為對外夷采用的“羈縻”策略，就像人們設法騎一匹駿馬或讓它拉東西那樣。這個概念產生于安撫中國的游牧入侵者和有時與他們合作的長期經驗。[[14]](#_14_Guan_Yu_Yu_Xia_Bu_Tui_De_Qia)因此，表現為火器、大炮和炮艦的西方優越的軍事技術是首先要借鑒的東西。

軍事工業當然涉及其他各種重工業，于是中國人不斷地深入進行“洋務”活動的嘗試。[[15]](#_15_Guan_Yu_Zao_Qi_Zong_De_Yang)根據外國的模式并在外國的幫助下，國家礦業、輪船航線，最后還有工廠都適應了中國的用途。與此同時，洋人被聘請進入中國政府，特別是進入帝國海關，作為制約其他洋人的手段。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懂得怎樣去當一名中國的次要官員而同時運用大于某些外國大使的權勢。[[16]](#_16_Si_Tan_Li__F_Lai_Te____He_De)19世紀晚期的帝國主義就這樣在許多領域內留下了共同政體、中國的合作和中一外合辦的事業。傳教士發現，良好的工作能夠幫助傳布福音，而且確實能補充其不足。商人們發現，外國領事和商人對商埠的管理必須取得中國人的合作和參與。[[17]](#_17_Fei_Wei_Kai____Wai_Guo_Zai_Z)

在這個階段，留心西方及其產品的一些學者認識到中國已經落在后面，所以必須作出巨大的變革，于是就推動改革。早期的改革者至少一度有皈依基督教的傾向。但中國人懷有的害怕和厭惡外國入侵者的情緒是如此普遍，以至辦報、建立工業和使軍事現代化的種種努力拖延了一代人的時間。[[18]](#_18_Bao_Luo__A_Ke_En____Wang_Tao)1894年日本閃電般地戰勝中國，這個打擊使整個一代人目瞪口呆，同時也使他們睜開了眼。康有為宣稱，中國必須改革，否則必將滅亡。19世紀90年代外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支持這一結論。[[19]](#_19_Zhan_Mu_Si__R_Pu_Xi____Zhong)1900年義和團起義失敗之后，甚至垂死的清朝也發起改革。于是在進入20世紀之際，首先在文人階級中出現了中國人思想上的大革命，他們能單獨領導這場革命。

以后的革命階段似乎證明了王朝循環的理論。清朝在1911年垮臺，隨之而來的是混亂和軍閥割據的時期。[[20]](#_20_Shi_Gu_Zhou_San____Shi_Lun_S)根據中國人的觀點，這個時期的一個主要成就是，1921年以后一個獨裁的政黨取代了王朝的家族。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而接受蘇聯模式（在清朝滅亡后將近十年開始）和1923年國民黨按照蘇聯的路線進行改革，這些事實具有幾個好處：這樣做創造了一個不斷前進和使自己長存的掌權者，但其方式是動員最熱誠的革命派充當有志于拯救中國的愛國者。以往歷代王朝家族試圖讓生育二三十個王子的后宮提供最能干的掌權者（皇帝），同時由向一切地方有才之士開放的科舉考試制度提供官僚。一黨專政則廢除了家族的血緣關系，向黨內進行競爭的有才之士開放掌權的政治局，并讓黨員監督各級政府。一黨專政于是造成了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黨之間持續不斷的斗爭。[[21]](#_21_Guan_Yu_Di_Yi_Ci_Tong_Yi_Zha)

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人掌權時，中國的愛國者已經用了兩代人的時間借鑒西方的行政模式和社會體制的理論。先是在剛進入20世紀之際借鑒英國的自由主義，然后是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仿效日本政治改革的范例。西方的政治理論在中國革命者的自覺的思想中顯得最為突出。1911年前后，在孫中山、宋教仁直至梁啟超等領導人的心目中，主要是在民族國家中成立英美（還有日本）式的議會民主。在20世紀20年代中，陳獨秀、李大釗及其他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從法國和俄國的反封建、反階級壓迫的革命中找到了先例。在此期間，不論是中國共產黨，或是孫中山及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同僚，都對作為反抗帝國主義手段的列寧主義一黨專政深感興趣。

這些外國的革命和建國的模式，有時只是膚淺地觸及中國的國情，有時對國情比較剴切。為了估計它們影響的程度和表現的形式，我們必須首先觀察中國關于政治，特別是關于國家權力性質的傳統思維的某些基本觀念。

## 中國統一的成就

我們討論問題最好的出發點是王朝循環的理論和實踐，這個主題在民間傳說和歷史寫作中是非常突出的。我們不妨從最簡單的形式開始，并把它看做是對各種事件的解釋，然后再去探究支撐它的種種假設。不用去查閱有關王朝興衰的大量文獻，我們就可以看到編史者引作王朝更替和重新統一時期的典型的歷史現象。[[22]](#_22_Xi_Fang_Zui_Zao_Yan_Jiu_Wang)我在這里試圖總結的現象是根據中國官方歷史學提出的概念。首先，在改朝換代之前出現由一些綜合起來的因素造成的長期的動亂，這些因素是：君主不道德的行為，這使他喪失了天命；其政權財政的崩潰，這部分地是由于奢侈揮霍，部分地是由于上層階級的土地非法逃稅，把稅賦負擔轉到農民身上，農民的拖欠使政府趨于貧困；日趨惡化的民眾福利，這尤其是由于人口對資源的壓力和國家無力維持公共工程，特別是防洪的堤壩和防饑荒的糧倉；低落的公眾士氣，這是由于貪污腐化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時也表明了官員和民眾與君主的離異；軍事上的虛弱，這明顯地表現在對入侵者（根據地在國外的造反者）和國內造反者的鎮壓方面。[[23]](#_23_Li_Cha_De__J_Shi_Mi_Si_Zhu)

這種破壞性的并發現象在回顧時通常有新王朝創建者的建設性成就與之對比：個人的成就——他是一個有魅力的領袖，能機智地誘使他的得力的同僚接受他的領導；戰略上的成就——他建立了一個有戰士和糧食供應的地區根據地，在那里，他的力量在向外擴張之前能夠得到很大的發展；意識形態方面的成就——造反的首領常常樹立一種許諾人民新生活的民間信仰；軍事上的成就——統一者以一種高于對方的必勝意志鼓舞他的軍隊，這樣，軍隊就能以他們模范的行為戰勝敵人，瓦解敵人的斗志和贏得人民的支持；外交方面的成就——他的政權與國內外的其他不滿分子結盟，秘密吸收變節的文人，收買或中立不重要的敵人；管理上的成就——他的班子中一批忠誠和能干的助手各負軍事、行政和意識形態之責，這樣在接管政權時就有了準備。[[24]](#_24_Guan_Yu_You_Mu_De_Huo_Ban_Yo)

最后，當新政體的興起和舊政體的衰落會合時，民意的突然和加速的轉移似乎改變了授權統治的天意。政府的種種鎮壓活動變得更加不顧一切和嚴厲，但是賴以進行鎮壓的忠誠基礎卻在不斷收縮。在這種情況下，關于改朝換代的民間傳說——作為國家合法的神話的天命論——就成了一個自行應驗的神話。就像股票市場投機商對市場繁榮和蕭條的預測那樣，民間關于中國政治的假設有助于它的實現。民意一旦轉變，行將滅亡的政體很快就喪失其統治力量。它的死亡通過武力來解決。[[25]](#_25_Guan_Yu_Zhong_Cheng_Tu_Ran_Z)

當然，這種王朝循環不僅僅在中國歷史中找到。當中央政權衰落以致讓外夷侵入和奪取統治權時，在邊境集結軍事和行政力量的外國入侵者也出現在世界大部分帝國的歷史上。在中國，“外夷”的入侵和統治自古以來屢見不鮮。他們的基礎是亞洲腹地氣候干燥這一地理事實，這種情況促進了畜牧業，進而形成了部落騎兵的驚人的打擊力量。在蒙古人的王朝（元朝，1279—1368年）和滿洲人的王朝（清朝，1644—1912年）成為中國歷史上兩大時代之前，游牧民族的侵襲變得越來越頻繁。的確，滿洲人儼然以帝位的化身自居，以至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者不能把君主立憲制作為與他們一起進入20世紀的過渡政府形式而加以接受。[[26]](#_26_Ha_Luo_De___Z_Xi_Fu_Lin_Zai)

對今天的歷史學家來說，更重要的是成為以王朝循環論方式解釋大事的基礎并被這種方式含蓄地表示的種種假設。一個重要的假設是整個中國版圖的統一，而這個政體是與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緊密相連的。把這個概念看成是西方關于民族一國家思想的一個中國式的翻版是毫無意義的。例如，19世紀意大利或德意志的統一是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現象，它是在廣袤的西方文明中建立一個民族政體。當19世紀90年代中國的愛國志士念念不忘彼得大帝、卡沃爾和加里波的，[[27]](#_27_Qia_Wo_Er__Camillo_Bensodi_C)或俾斯麥的建國例子時，這些例子也幫不了他們的忙。[[28]](#_28_Zao_Zai_1861Nian__Yu_Shi_Wei)

的確，他們在鴉片戰爭后的一個半世紀中致力于使中國免遭侵略的努力有意識地強調了以火力對火力和通過學習西方強大的秘密以保衛中國，從而了解和應用外國技術，最后了解和應用外國思想的必要性。于是西方的革命和立國的思想在從孫中山直至毛澤東的革命領袖的自覺思想——從20世紀初開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直至50年代的斯大林主義——中似乎占了支配的地位。此外，對西方思想的這種明顯的關心，使西方觀察家認為中國人更容易相信他們的話，并且假定中國的革命可以用封建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等西方名詞來了解。[[29]](#_29_20Shi_Ji_Chu_Qi_Yi_Dai_Ren_N)一撇開這類名詞甚至在西方是否仍具有實用意義這一有爭議的問題，我們只能肯定，中國人和我們都嚴重地欺騙了自己。當然，人們不能否認西方的思想和榜樣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可是，短期的思考將指出，1840年以來的革命性變化必然是膚淺地觸及語言、倫理價值、家族制度、社會準則、手工業技術、農業一商業經濟和帝國政體的制度化的結構，這些都是經過了三千多年有記載的、基本上自成體系的中國歷史的無數變遷而形成的。行為科學注意到：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當代的形式，是一個基本上獨立的進化過程的最終產品，它可以與希臘—羅馬的和猶太教—基督教的西方相比，但絕不是一樣的。

我們自我欺騙的程度是不難看出的。在今天，誰在一眼之下都不會支持這樣的論點：即蹂躪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實例不是使中國的改革家看到了現代民族主義的優點了嗎？這樣鼓動起來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已經是中國的20世紀政治中有巨大動力的情緒嗎？[[30]](#_30_Min_Zu_Yi_Guo_Jia_De_Min_Zu)眼下人民共和國難道不是突出地榮列世界大國之林的一個民族一國家嗎？這些論點都言之成理，無懈可擊。

但是一個反面的論點卻被忽視了：歐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來，一般地說不會多于中國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國更多的民族也是問題。在人數和多民族方面，歐洲人和中國人很可以相比，同樣是人數眾多，民族復雜。可是在他們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歐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約10億歐洲人分成約50個獨立的主權國，而10億多的中國人只生活在一個國家中。[[31]](#_31_Li_Ru_Jian___1982Nian_Ren_Ko)人們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別，就不能忽視。

以上對事實的簡單陳述間接地表明，我們的民族主義和民族一國家等字眼當用于中國時，只會使我們誤入歧途。要了解中國，不能僅僅靠移植西方的名詞。它是一個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從其內部進行演變性的了解。因此，當一個世紀以前現代報刊促進群眾民族主義的興起時，這種民族主義的基礎只能是強烈的本體意識和以前的文化優越感。我們應稱它為文化民族主義，以別于我們在其他地方通常見到的政治民族主義。

至于巨大的中國演變的情況，我們首先可以斷言，它是通過內向爆炸而發展的，而西方則是外向爆炸的產物。當歐洲人成為以航海為業的商人而在新大陸探險和定居時，中國人則靠在灌溉充分的華中和華南丘陵地發展諸如稻米種植等行業，而繼續將其人口更稠密地擠在一起。他們只是在近期，才主要乘坐外國人的船只向海外擴張。[[32]](#_32_Guan_Yu_Zai_Guo_Nei_Kuo_Zhan)

學者們面臨這個似是而非的論點已經有幾個世紀了，但很少人已經發現其內在的意義。最早企圖對此作出的解釋通常是地理方面的。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地理條件有利于中國的政治統一和歐洲的多樣化：古代中國的發展不是被與實力相當的海外敵人的對抗所促成，如希臘人之與波斯人的對抗，或羅馬人之與迦太基人的對抗。中國很少有機會去發展海上力量，去接受海上貿易及外國船只提供的刺激因素。結果，多國的歐洲人成為航海者，向海外擴張，一國的中國人則留在國內。

但這能完全解釋這種差異嗎？中國和歐洲作為政治實體，在開始時面積相當。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在面積和人數上差不多。不錯，歐洲的幾個半島和海域導致外向性。中國在地理上遠不是成為一體的。一條山脈蜿蜒于東南沿海，其他的山脈把沿海和西部高原之間的區域分割成塊。北、中、南的三大河系把國土中的水從中亞排向太平洋。但是，大部分不能通航的黃河并沒有把陜西和山西與海連接起來。像云南，特別像四川和山西那樣的邊緣地區，有四面環山的肥沃的中心地，這些中心對建立獨立的根據地最為理想。例如，長江三峽使東部地區極難進入四川。從北京到淮河的華北黃河平原的通行并不比從烏拉爾到漢堡的北歐平原的通行更加方便。總地來說，我認為我們必須肯定，中國的地形本身并不有利于中央政權的崛起；相反，它的由來已久的統一是人的制度戰勝地理條件的結果。[[33]](#_33_Qiao_Zhi__B_Ke_Lei_Xi_De___W)

遠沒有使國家四分五裂的中國的人口增長，似乎更要求國家具備進行即使是并不深入的中央集權的官僚控制的本領。清代在經世術這一總的名義下運用各種行政方法的記載證實了這一點。帝國的后期出現了大批人口向廣大地區擴散的現象，但他們仍具有通過政治統一爭取穩定秩序的傾向。這種一致性得到了諸如里甲、保甲、鄉約、抬高紳士地位和弘揚帝國崇拜等行政安排的保證。[[34]](#_34_Guan_Yu_Zhe_Xie_Zhi_Du__Jian)甚至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根深蒂固的制度支持國家和社會秩序的文化價值和主張：單一的、理論上無所不能的最高權威；在最高權威鼓勵下通過家族對人民進行的關于社會秩序的經典學說的教導；物色最有才能的人在國家官僚機器中擔任公職的考試制度；地方上受過訓導的社會精英作為官僚集團和民眾之間的聯系階層的職能——所有這些被像3/4世紀前的馬克斯·韋伯等前輩學者所注意到的晚期中華帝國政體的組成因素，在今天仍很明顯，仍舊需要通過對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探討對它們進行分析性的綜合。[[35]](#_35_Liang_Zhong_Jing_Dian_Zhu_Zu)

中華帝國通過一切土生土長的方式維持其中央的權力。方式之一是對大規模的經濟活動進行壟斷或頒發特許證。關于這個問題有大量的文獻記載。[[36]](#_36_Jian_Wei_Te_Fu___Dong_Fang_Z)結果是，在歐洲歷史上起多方面作用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卻找不到其嚴格的對應物。歐洲的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是通過擴大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而去爭取的東西。但是，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任何中央政府自然地要去做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成就與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成就——也就是重新統一——十分相似。[[37]](#_37_Sun_Zhong_Shan_Guan_Yu_Min_S)

就“民主”一詞而言，在用于中國的傳統現實時它也必須作類似的調整。如果我們認為民主的西方意義是人民在施政過程中或在使政府活動合法化時參與其事，那么我們發現舊中國在文人和民眾之間有職能的兩分現象。當有功名的文人獲準向當局上書言事或請命時，他們正在參政；當民眾通過暴力叛亂打破政體的管制并接受接替的政體時，那么從民眾的觀點看，人民已經使后者合法化了。舊中國民主的不同意義取決于文人統治階級和基本上是農民群眾之間的地位的不同。[[38]](#_38_Jian_Bai_Le_Ri___Zhong_Guo_D)這個差別尚未消除。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除了統一之外，中國的核心觀念是作為萬物自然秩序的杰出人物統治論和勞心者統治勞力者的思想。另一個核心觀念產生于如下的事實：政府的權威通常由它的道德威信維系，這種威信必須通過正當的禮儀活動、對正統信仰的宣傳和警惕地對異端思想進行的鎮壓才能保持下去。[[39]](#_39_Li_Cha_De__J_Shi_Mi_Si_De)這一切考慮導致最后一個核心觀念——統治精英的任務在道德意義上是家長式的，在實際執行時則是進行管理。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個普遍想法是認為國家統一的思想是自然秩序的一個部分。我們不妨探究一下產生這個思想的根源。

#### 統一理想的根源

關于中央政權的權力，據記載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世紀初期由河南商國的君主提出的。后繼的周朝（約公元前1122—前256年）諸王重復了這種權力，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統一中又大力提出。在西漢和東漢（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權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統一重申了統一的原則，其形式（除了像907—960年那樣的短暫的間歇外）一直延續到1912年，這時毛澤東尚在學校，蔣介石則已是軍人。[[40]](#_40_Guan_Yu__Pu_Tian_Zhi_Xia__M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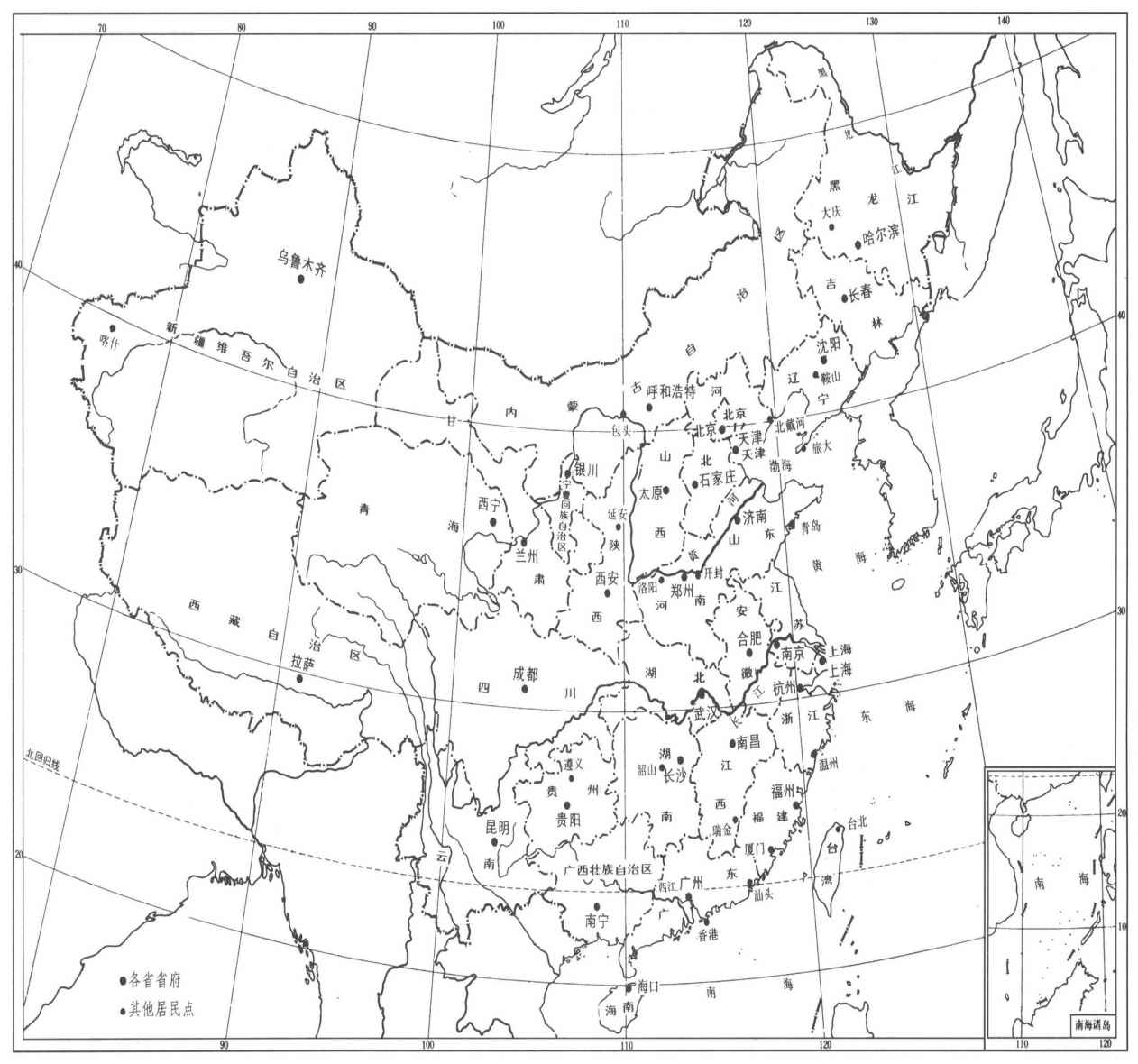
考古學家現在告訴我們，中國的政治作風是在農村形成的，統治者在其城池中的權威就是在農村被宇宙學的神話和禮儀認可的，這種神話和禮儀是農村社會對普遍存在無形的自然神靈，特別是對祖先神靈的信仰的一部分。在夏、商、周（約公元前2700—前256年）的初期，統治者是一個世系的首領，其權力來自其祖先的世代相傳和部分地在犧牲祭祀的幫助下與祖先通靈的巫術。的確，現在可以斷定，“王本人實際上就是為首的祭司”。自從最早的甲骨文記載他在禮儀上與其祖先通靈以來，文字從一開始就是權力的一種標志，用以加強統治者對權力的道義上的要求：“擁有占卜知識的人因此可能是已知的‘知識階級’最早成員。”這樣，宗教信仰、識字和政治權力從一開始就緊密地連在一起。[[41]](#_41_Zhang_Guang_Zhi____Yi_Shu)它們創造了一種長期持續下來的把政治秩序看得至高無上的文化傾向。文字書寫制度開始作為國家和文化的一個支柱并被維持下來。書寫不但是抄寫人員壟斷的知識，而且是政治結構的一部分。掌握書寫技術是統治階級的一個標志。

在青銅時代，分布于中國北部的數百個在氏族基礎上建立的城邦遠不如東地中海的面向海上的那些城邦關心貿易。它們的根基一直是農村生活，在這種生活中歷史神話和記載一致認為過去國家的統一是在夏、商、周王族的歷代統治者統治下完成的。具有這種特征的中國本質上是農業中國，是從事集約農業的中心地。主要為畜牧經濟的亞洲腹地各地區，如蒙古和西藏，的確具有戰略的意義，但是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看，對農業中國來說卻并不重要。

由于中國的許多地區在地形上有利于地方分立割據的形成，晚周于是出現了一百多個分立的國家。在對力量的檢驗中，河流、湖泊、平原和通道使一個國家能夠侵略另一個國家。多國外交盛行于貼切地稱之為晚周時代的戰國（公元前463—前221年）。在中國有文字的歷史的最初幾個世紀，地理有利于國與國之間通過公平或欺詐的方式進行沖突、談判、結盟或兼并。[[42]](#_42_Li_Cha_De__L_Wo_Ke____Gu_Dai)如果我們暫且假定長江是地中海，那么我們毫無疑問地可以設想，在中國會有一塊繼續成為歐洲戰國的完全相似的地區——在那里，例如，羅馬消滅了迦太基，稍后伊比利亞半島與英倫三島對抗。但是中國的版圖畢竟是有限的，限于中亞與太平洋之間，一個形成聯合體和大國吞并小國的漫長過程開始了，直至秦最后在公元前221年重新進行了大一統。在這個動亂和創造性的時代，孔子和其他哲學家作為恢復更早的想象中的社會秩序的政治導師而出現于歷史。[[43]](#_43__Bu_Tong_De_Zhe_Xue_Jia_Ben)孔子教導說，一個統治者通過其模范行為，可以使民眾默認他的將要成為天命的統治，因為“天視自我民視”。達到社會秩序穩定的目標需要中國的重新統一。

漢及以后的王朝用于教導君民的儒家經典是公元前221年重新統一以前的時代的產物，這一點十分重要。因此他們崇尚渴望和平的意愿，長期的戰爭使和平成為當時的儒家和其他導師思想中主要關心的事。經典著作由于表達了在一個混亂的時代對穩定秩序的強烈的渴望，因而把統一的理想傳到后世的千秋萬代。總之，由于在公元前221年以前未能統一，統一就成了以后中國政治中的至善事物。為認可大部分政體而創造的種種神話無疑地保持了支持這些政體最初掌權的合理內容。就中國而言，公元前221年以前幾個世紀的混亂成了以后兩千年期間贊許關于統一秩序的理想的原因。

另一個制度的發展使統一的理想在中國比在歐洲更為可行。聲稱受天命而統治天下的中國皇帝們不比聲稱作為神的化身或通過神授的權力進行統治的歐洲國王們更不可一世。差別在于，統治著稠密人口的中國人不得不發明官僚政府。當羅馬帝國仍把公共職務委托給騎士階級和其他個人時，漢代諸帝開始訓練和考核文官，這些人有固定的任期，享受二十等俸祿，并受公文往來、規定的視察和獎懲的嚴格控制。紙和印刷書籍的很早發明，也使唐代有可能制定科舉考試制度，中舉的士子組成了有才之士都能加入的文官集團——這是古今最偉大的政治發明之一。[[44]](#_44_Guan_Yu_Zui_Zao_De_Zheng_Zhi)在這后面還有許多因素——中文書寫方式的深奧性、統治者對保存禮儀和編寫記錄的文人的特殊關懷、一個農業社會喜歡不受海上貿易和與外國人接觸的動蕩不定的干擾的那種正規和按部就班活動的傾向。結果，當公元589年隋的再統一結束了公元220年以后隨著東漢的衰亡而出現的三個半世紀的分裂時，中國避免了歐洲查理曼王朝之后分裂成地區國家林立的局面。[[45]](#_45__Cha_Li_Man_He_Sui_Zhao_De_K)唐代（618—906年）統治下的再統一的中國成了世界上最進步的地方，而中世紀歐洲則落到了后面。中國的統一理想被大力重申，從此以后再也沒有受到懷疑。唐、宋、元、明諸王朝的衰亡只會導致——而且總是導致——重新統一，1911年以后期待的也是這樣的結局。



地圖2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地圖

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中國的一個新的重大事實是現代形式的群眾民族主義的傳布，如前所述，這種民族主義基于古代的文化主義，并受到城市中心的現代報刊的培育。[[46]](#_46_Zhang_Hao____Liang_Qi_Chao_H)統一作為正統王朝的標志，其新形象擴大了100倍，而成為中華民族存在的象征，這個象征不但是一種文化，而且現在是一個國家，它通過國際交往逐漸代替了地方，而成為中國的社會精英認定效忠的中心對象。19世紀90年代威脅國家存亡的帝國主義在1900年反義和團的入侵北京中達到了最囂張的程度，它在政治生活中灌注了一種新的、壓倒一切的必須實現的思想：保存“中國”。[[47]](#_47_Jian_Rui_Ma_Li___Dao_Yan__Bi)不久，辛亥革命導致了舊中華帝國外緣領土的脫離。外蒙古和西藏到1913年都實行自治。一個統一的中國成了廣大民眾為之奮斗的理想。在連續的軍閥割據、革命、日本入侵和國共內戰的動亂的推動下，平民參與政治強有力地恢復了統一的理想。到1949年，當人民不惜任何代價取得和平時，只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才能維持中國的傳統。

在中國的易造成分裂的地形上建立中央政權，需要能夠重振官僚行政的領導。要完成這樣的領導就需要實行聯合政治，也就是在更為廣泛的基礎上擴大始于統一者原來黨派的個人關系網。隨著這個中央的黨派將其觸角伸向各處，在邊緣省份和區域積極活動的地方領袖就依附于它，當新的事業接近其目標時，其依附性就更加堅定。[[48]](#_48_Zhong_Guo_Dang_Pai_Huo_Dong)以前建立王朝的知識和經驗，提供了關于審勢和反應、要求和策略等方面的全部技能，以供新的進行統一的黨派去利用。但隨著它的控制的擴大，它很快達到了只有借助于官僚行政制度才能鞏固和維持的程度。綜上所述，過去建立王朝的歷史使中國人民容易具有期待和歡迎恢復中央權力的傾向。獨立的政治力量的繁殖孳生，雖然時有發生，卻不被歷史所認可。由于這時自決的單位是整個社會，這就為20世紀現代群眾民族主義的迅速成長提供了沃土。

為了簡單地說明這種情況，我們可以斷言至少有兩大特征使中國與眾不同：首先是帝王全面統治的中國傳統的力量；其次是大量有政治惰性的農村人口——不論是它與城市人口及社會統治分子的相對比重（占80%），或是它的絕對數字（1900年前后為3.25億，1940年前后為4億）。沒有其他國家在全力向現代工業化沖擊之前，具有人數通常為它兩三倍的如此眾多和稠密的農村人口。[[49]](#_49_Dao_16Shi_Ji__Xu_Duo_Gu_Ji_Z)

因此，從1949年開始，中國共產黨肩負著一個巨大的任務：作為一個政體，其正統性像其以前的政體那樣，依靠的是去履行它那統治全中國的權力。不用擔心人口正在迅速地翻番，并且到1980年總人口達到了10億。不用擔心相當新的臺灣省（自1885年起才成為行省）在100英里的海外掌握在其對手手中，并得到敵對的海軍的保護。歷史的先例是非照辦不可的。既然“中國已經站起來了”，它就必須再次成為中央政權統治下的一個政治單位。清帝國的崩潰畢竟只有37年。（清朝于1644年在北京掌權以后，過了39年才接管臺灣。）在1949年，重新統一不管是否可行，自然首先列入了議事日程。

對中共來說幸運的是，近代交通運輸、火力和警察網絡等方面的發展，已給人民共和國新政府提供了各種控制中國形勢和暫時控制社會的手段。這些物質設施作為控制的手段是極其重要的，同樣也是必要的，它們已與一種新的世界觀，確切地說與幾種對立的世界觀同時增長。可是大多數愛國者一致認為，中國像其他大的民族一國家那樣，應該是一個民族一國家。這個目標要求，中國繼承下來的文化要激烈地加以修正，并且要朝著把許多外國的因素和中國的淵源綜合起來的新方向重新形成。雖然我們在這一章中只是觀察中國歷史中有限的政治內容，但是我們不可避免地要探究隱藏在現代化一詞下面的更廣的含義。[[50]](#_50_Ji_Er_Bo_Te__Luo_Zi_Man_Bian)

## 現代化的作用

“現代化”一詞經常掛在我們嘴邊，但是像“生活”、“時代”甚或“文化”那樣，此詞的定義十分模糊。對它難下具體的定義這一事實似乎并沒有減少民眾對它的使用。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采用“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軍事方面的現代化）作為一個全國綱領，這就需要我們設法著重闡明這個多變的名詞的定義。

先從中國以外說起，19世紀初期產業革命的發展顯然超出了工業的范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技術在國家的成長壯大和國際關系方面的應用稱之為“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現代化”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它含蓄地表示克服傳統，通過技術以新方式代替舊方式。人們一度感到所有的工業化社會都緊緊地處于現代技術發展的控制之下，以至全世界的情況出現了一種匯合現象，雖然文化的殘余會顯示出不同民族之間表面上的差別。[[51]](#_51_W_W_Luo_Si_Tuo_Zai_Qi___Jing)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下的事實正變得越來越明顯：不同文化的民族在它們各自的文化價值和繼承的制度這些根深蒂固的結構的影響下，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對待現代化和利用現代的技術。當然，這些價值和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它們的變化同與現代化有聯系的物質發明和進展相比，則顯得更為緩慢。

在近幾年，不論給現代化作出什么定義，它只能作為現代史中各種力量的一部分而被接受，這個情況已經變得十分明顯。這是因為，對不同國家進行比較的現代化研究不得不集中在這些國家在現代所共有的最明顯的變化方面。這些變化顯然是一些可以計量的變化，因為數字是最容易比較的。結果是，人口增長、城市化、道路、鐵路運輸、工廠產量和國民生產總值是現代化中經濟和物質方面的部分內容。[[52]](#_52_Jian_Xi_Li_Er__Bu_Lai_Ke___R)當學者們的考察從經濟發展轉向政治發展時，他們再也不能如此容易地發揮計量和比較的作用了。報紙的讀者人數、選舉中的投票情況、對民族國家的獻身精神、對科學技術的接受狀況及個人主義的興起，這些都是變得越來越難以計量的研究題目。學者們面臨更為緩慢和更難以衡量的社會變化的幾個方面。在這里，有一個現象變得很明顯，即文化的結構像地理中的地形那樣，具有很長的持久性，而且的確具有惰性，這樣就顯露出了一個基礎，在此基礎之上的現代化的跡象是膚淺的。宗教信仰、法律和道德以及家族制度和各種理想行為的主題是各種文化深層的不可動搖的核心思想的組成部分。這些個人與國家、與家庭關系的核心觀念只能是比較緩慢地起變化。

在中國的現代化中，我們因此遇到了一個新和舊的結合體。裝有滾珠軸承和汽車輪胎的騾拉大車是更有效率的車輛。外來的事物不得不加以變通以適應本地的用途。在更抽象的方面，“平等”和“參與”的概念在應用于中國時，容易產生不同的意義。物質現代化因素和各種文化傾向因素之間的不同變化速度于是使研究中國革命的學者有了用武之地。學者們或是用西方的觀點，或是用中國的觀點把中國的革命加以理論化，但它們都不能正確地對中國的革命詳加闡述。

根據對中國人在面臨中國適應外部世界這一現代問題時的經驗的簡單描述，我們可以作出某些假設性的結論。首先，中國的統治階級能夠在很短的時期內放棄傳統的儒家信條而接受外國的信條，作為體現他們愛國目的的新用語。自1900年以來，中國改革者和革命者的著作已經越來越多地使用西方的思想和題材。[[53]](#_53_Jian_Si_Qia_Er_Pi_Nuo___Yu_Z)這些愛國者的自覺思維放眼于世界，尋求一切可能有助于中國的思想。但是當成文形式的中國傳統作為現代中國的指南而大部分受到懷疑時，實際上中國的價值體系、個人相對于政府的地位、農村父系家庭制度的支配地位和中國生活的成百個特征卻表現了明顯的延續性。人們用各不相同的歌詞唱同一個老調子。人們自覺思維領域中的變化大于日常行為的變化。

總之，在中國的革命中我們面臨著一個問題，在解決問題時，使用延續性之對中斷性、內在性之對外生性這樣的習慣范疇對我們并無幫助。乍一看，外來的和新生的事物似乎的確與土生土長的和傳統的事物相對立。但是通過對晚期帝國的更周密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新事物產生于本地傳統內部，如舊的紳士地主—文人—官員階級進入商界和參加地方行政管理，同時又可發現外國勢力支持古老的傳統，當炮艦、電訊和火器被用來鎮壓農民造反者時就是如此。由此造成的困惑可以用中國人把內、外兩種概念應用于近代史這一現象作為例子。自遠古以來，內外這兩種概念當然一直是喜歡對事物進行分類的中國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在19世紀，“外”方便地包括外國的事物，如鴉片貿易、帝國主義和戰爭、條約制度、洋務運動、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和現代化。[[54]](#_54_11902Nian_Zhang_Shou_Yong_De)但是，讀者將會注意到，這些現象顯示了一種傾向，即從一種鮮明的“外”的地位最后轉而變成地道的“內”。鴉片貿易的確是傳到中國的，但中國本地種植的鴉片使它對英國一印度進口鴉片的需求減少了。“內”和“外”證明是流動的沙。西方技術及后來的西方思想被轉成中國的用法。最后，毛澤東在把馬克思主義應用于中國時，不得不以窮苦的農民為其革命的基礎，而不是像共產主義規定的那樣以無產者為基礎。

只有接受一個關于現代化的混雜的理論，這個問題才能解決。世界顯然正在某些方面遭受現代技術的沖擊，可是世界又在另一些方面依然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之間四分五裂。我認為，我們不得不采取結構論的立場，即中國社會建立在這樣的古老結構的基礎之上，其社會秩序和政治價值觀根深蒂固，迅速的變化也難以很快地改變它們。艾森施塔特和另一些人所說的“核心觀念”，其變化比物質技術和國際現代新潮的標志的變化更為緩慢。[[55]](#_55_S_N_Ai_Sen_Shi_Ta_Te_Jiao_Sh)

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者們談到了核心和上層建筑之間的不同變化速度，但談論的重點卻正好相反：即物質的生產方式最終決定非物質的法律、宗教、政治和社會方面的階級結構和價值準則。重點的不同不應掩蓋如下的事實：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傾向于闡明同樣類別的事情。他們對革命過程的了解并非南轅北轍，以致互不理解或不得互相討論。[[56]](#_56_Bu_Lan_Te_Li__Wo_Ma_Ke_Fen_X)

我們最好通過單獨提出中國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的一個典型特征的種種變化，來闡明在混雜的現代化條件下的革命進程，這個特征是個人對集體、對家庭和國家的依附性。雖然個人主義的興起絕不能完全解釋革命的進程，但它可以方便地作為革命進程的例子。

對個人從舊社會解放出來的連續敘述從婦女的解放開始也許是恰當的。婦女的被貶低的地位充分地體現在纏足的習俗上，這個陋習使她們從兒童時代起就減弱了行動能力，并使她們在干體力活時更不方便，可是纏足在漢族農民中廣為實行，以至其發生率據一般的估計超過了80%。由于這個習俗始于京都的宮廷，它隨之而來的擴散被假定最先在統治階級中開始。因此它在19世紀農民中的流行證實了如下的想法：統治階級開風氣之先，農民則紛紛仿效。

始于19世紀80年代并在20世紀趨于激烈的反纏足運動部分地由傳教士形成，他們最先看到了問題的所在。西方的傳教士把關心個人靈魂的信仰帶到中國，并且促進了體現基督教價值的中國基督教社團的興起。在此期間，當中國的改革者正在設法阻止摧殘女孩的雙足時，西方的女權運動在這個世紀最初的幾十年正試圖為婦女取得法定的權利和選舉權。[[57]](#_57_Huo_Hua_De__S_Lie_Wei____Zho)婦女解放的另一個措施是改革婚姻習俗。到1917—1921年的新文化運動時期，這已成了青年反抗家庭包辦的一部分行動。婚姻中個人的自由選擇又是一件新事物。

一定程度上獨立的，甚至是非正統的政治思想最早已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期的知識階層中抬頭了。在高級官員的贊助下，特別是漢學的學者們組成了學術性的團體，并且提出了多少獨立于帝權的文人的意見。[[58]](#_58_Ben_Jie_Ming__Ai_Er_Man____C)這種純粹中國式的運動支持了較晚出現的不同于公職的職業。例如，在19世紀晚期，有一批來自香港的值得注意的華人成了擁有倫敦法學學位的律師。外科醫生在早期傳教士的醫院中受訓。新聞工作者在條約口岸出現。在1912—1949年中央政府有名無實的時期，外國榜樣的傳入和對現代生活的需要這兩者的結合培育了一批不在政府任職的作家、藝術家和其他職業人士的新型城市知識分子。正當革命者脫穎而出成為政治領袖，軍人接受教育作為他們受訓的部分內容的時候，中國舊的社會結構在許多方面遭到了破壞。總之，從士大夫統治階級中，涌現出許多類型的上層階級人士，其中的一些人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當在國外留學并帶著例如利用科學拯救中國的理想返回中國時，是懷著西方自由主義的理想的。[[59]](#_59_Jian_Ma_Li_Ya_Ni__Ba_Si_Di)

進一步的措施與新知識分子對解放農民的關心同時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年輕的革命知識分子開始斷斷續續地進入農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種行動作為動員成立一個新的中央政權的關鍵之一而組織了起來。出現現代交通工具這一主要事實，促進了接觸的增加。鐵路及后來的公共汽車交通，能使城市的知識分子進入農村的村社。電報和報刊及后來的無線電把農村納入了全國和國外新聞的網絡，就像國際貿易的發展已使農產品逐漸地和越來越嚴重地依靠絲、茶、棉花和其他農產品的國際價格那樣。甚至到軍閥的部隊中服役的征兵活動也打破了農村狹隘天地的束縛。簡而言之，20世紀的新世界為農民參與更廣闊的世界的活動提供了條件。[[60]](#_60_Lu_Xi_En__Bi_An_Ke____Zhong)

可是，如上所述，中國的個人以這種方式發展起來的新作用依然脫離不了非常尊重中國的文化價值及接受家教和中央權威的框架。社會的和政治上的責任竟然壓倒了西方關于個人權利的學說的吸引力。

#### 實踐中的糅合：舊主題的現代形式

為了給予過去以應有的地位（或是作為中國領導人的指導，或是作為他們的沉重的負擔），現在讓我們觀察一批選出的問題，即中國的統一者們在取得最高權力時即使不是普遍地，但也是經常地碰到的問題。人們當然可以從兩千年的歷史中選出一些例子，以闡明他們想象的幾乎所有的特征。但是，我們不妨著眼于中國共產黨也面臨的三個方面的問題，以說明主要過渡時期的特點：（1）統一者與其同僚的關系；（2）他的努力中的急于求成和過渡行為的程度；（3）他對軍事力量的控制。這三個特點結合的表現每個朝代各不相同。

上述第一個問題產生于無人能夠單槍匹馬地打下天下這一事實。每個統一者都作為黨派集團的領袖，即其中的佼佼者開始其生涯。可是他一旦取得天命，政治制度就要求他處于另一層地位上，突然高于世人并扮演超人的角色。如果新皇帝在開始時沒有使人折服的行動和明顯地高于其追隨者的表現，那么知道他底細的親密伙伴是很難接受的。[[61]](#_61_Ha_Luo_De__Qia_En____Huang_D)但是，出于黨派活動的性質，這些人承認這種等級的差別，并作為追隨者而不是作為地位較低的伙伴而投身于他。學者一顧問的這種忠誠的服從尤其是他所期望的，這些人使軍事領袖能夠成為法典制定者和成立文官政府。

統一者作為一個由支持者和助手組成的集團的領袖而掌權，這個事實決定了他在接管政權后與他們之間的關系。中國的編年史者明確指出，天子如無圣哲般的顧問和干練的行政長官的協助，都不能取得政權。秦始皇得益于更早的商鞅的法家改革；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為杰出的秦國官員，他向民眾推行一種嚴格的獎懲制以及連坐法，從而使民眾互相監視和告發。在秦于公元前221年征服了它的最后一個敵人以后，秦始皇的顧問李斯廢除原來的國和王，把中國分成36郡，郡以下再分縣，每個典型的縣都是有城墻的城鎮，其周圍則是農村。李斯還統一文字，反對私人治學，搞文字獄——在此過程中焚毀非法家思想的書籍，據認為還活埋了有不同意見的儒生。當好大喜功和妄自尊大的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時，李斯與一名主要的宦官一起策劃繼位之事，但這名宦官很快就把他清除掉了。[[62]](#_62_Guan_Yu_Li_Si__Jian_Xiao_Gon)

秦在它的暴行造成的普遍不滿情緒中滅亡之后，于公元前206年創建漢朝的平民劉邦在開始時改變了態度。為了滿足他的支持者，他放棄對帝國的集權，恢復周代的政治分封制。漢朝幾乎2/3的領土被分成王國，由開國皇帝的兄弟子侄和助手們統治。只是到了以后，這些王國才重新歸帝國治理。漢代的君主雖然繼續采用法家的措施，卻把它們與儒家的學說結合起來，從而成為稱之為帝國儒家思想的強有力的結合體。[[63]](#_63_Wang_Yu_Quan____Xi_Han_Zhong)

公元589年重新統一中國的隋朝領袖是一個名為楊堅的將軍，他與秦始皇一樣不能限制他對人民的無節制的要求。他的崛起得了以下幾個人的幫助：一是前朝的一名資深的將領高颎，此人在幾次關鍵性的戰斗中贏得勝利，并且指導隋朝政權的每個措施；二是以嚴厲和無情聞名的指揮官楊素，他立下了把后撤的士兵全部斬首的規矩；三是比較講人道的儒家思想家、行政長官蘇威。兩個皇帝（隋文帝，589—604年；隋煬帝，605—618年）令人不能忍受地急于求成，殘酷地驅趕其人民去完成他們的武功以及開挖運河和建立都城，以維持他們的中央政權。這些殘酷的苛索無度的行為引起了叛亂，并給后繼的唐代諸君在如何去嘗試做過多過快的事情方面，提供了一個不可忘記的足資教訓的實例。唐代（618—906年）之所以能維持得更久，是因為隋代已經重建了中央政府的結構，現在唐就更有節制了。[[64]](#_64_Rui_Wo_Shou____Sui_Dai_Shi)

公元906年唐朝滅亡后，宋朝的創建者趙匡胤提供了一個良好榜樣，他削弱軍人的力量以使中央集權的文官控制能在和平時期維持下去。趙曾任皇宮禁軍的指揮官。當他由此而成為皇帝（太祖，960—976年）后，他就讓他的將領們退休養老，并在開設文官考試、建立官僚政治和集中歲入的同時，以文官取代節度使，并把部隊集中在新的皇宮禁軍之中。[[65]](#_65_Guan_Yu_Zhao_Kuang_Yin_Zai_W)

分別建立異族統治的元朝（1279—1368年）和清朝（1644—1912年）的蒙古和滿洲少數民族當然要保持他們好戰的和排斥異族混雜的氣質。蒙古人經過了89年而垮臺，但滿洲人卻成功地統治了268年，這部分地是因為滿洲人的軍事力量是保持在嚴格的控制之下。滿洲人成功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他們吸收漢人合作的高人一等的能力。滿洲人在關外的根據地時已經做到了這一點，他們的行政經驗已經為他們統治中國準備了條件。

像每一個新政體一樣，滿洲人也面臨著如何處理舊體制的戰敗分子及吸收、訓練新官僚和確保新官僚集團忠誠的問題。1368年當蒙古人的統治在內戰中垮臺后，明朝的創建者恢復了蒙古人不能依靠的考試制度。當明朝經過276年滅亡后，1644年的滿洲征服者使明朝的紳士和官僚基本上各安其位，同時殘酷地摧毀了長江下游的拒不投降的人和通過考試繼續吸收漢族的文職行政官員。1667年后當康熙帝執政時，他是在受到最小破壞的中國社會和文化上面設置他的王朝的。[[66]](#_66_Wei_Fei_De____Zhong_Hua_Di_G)

毛澤東有點冒失地把自己比作秦始皇（也許是為了恫嚇一些文人學者），但他的事業更明顯地可與明朝的創建者朱元璋的事業相比，后者是平民，其早年生活貧困，當時他的家庭成員大部分死于饑饉和瘟疫。他在一個佛教寺院中略受教育，并與摩尼教（明教）和白蓮教的一些秘密教門有一定的聯系。當動亂蔓延時，朱在1352年投奔了一個地方領袖，娶了他的一個養女，并在1355年繼承了他的指揮權。次年，朱元璋奪取了南京，在那里建都；在以后10年中，他打敗了長江上、下游的敵對的軍閥。在他整個崛起的時期，他吸收一些干練的學者進入他的幕僚班子，1360年后他還建立了具有治安和審判權的殘酷無情的特務機構。

一旦執政，朱元璋就取締了所有的秘密教派。他甚至在公開的朝廷上按照禮儀鞭打高級官員，來恫嚇明代的全體官員。他的猜疑發展到了偏執狂的程度。1380年，他處決了他的丞相胡惟庸和所謂的同謀，據稱3萬人以上卷入胡案，在14年中被秘密警察搜出。1385年，一名戶部侍郎和其他數百人因貪污的罪名而被處決。1393年，曾在幾條戰線屢次戰敗蒙古人和其他叛亂者并因此受獎和封賞的沙場老將藍玉，與包括幾名高級將領在內的其他1.5萬余人因被控密謀篡位而被殺。歷史學家斷言，明帝利用此案“作為消滅軍方集體獨立性的最后痕跡的借口”。[[67]](#_67_Fu_Lu_Te___Fang_Zhao_Ying_He)

不用作進一步的詳細推論（這樣往往有損于主要的結論），我們不妨認為毛澤東是重新統一中國的人，其成就與公元前221年以后秦始皇的成就和公元589年隋朝創建者的成就同屬于特殊的一類。兩人都過分地急于改造中國，都推動其人民向前走得太遠太快，都耗盡了他們最初取得的支持，都把中國留給以后的統治者去收拾殘局。可是在毛澤東執政的27年期間，他把矛頭指向他的同志，并且為了防止“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弊病，幾乎毀了中共，這與明朝創建者37年的統治有某些驚人相似之處。

我們所稱的“革命”，通常當然是通過在若干事件中表現出來的明顯的間斷現象來認定的。1949年，毛澤東作出“一邊倒”并向蘇聯學習的決定，在當時似乎是與過去斷然決裂。然而前幾代中國的領袖已接受了英、法、日、美和其他方面的外國模式。但在1949年，毛澤東及其中共的同事作為勝利的革命者，意識到了他們的創造能力和一個新時代的新需要。他們重新締造歷史的根本問題是如何突破中國過去政治的衡量標準。但中國遠不是毛澤東號稱的可以在上面隨意譜寫新事物的“白紙”。相反，甚至毛澤東關于他的新政權的主張也具有一個新天子的特點。他可能行使的全部本領雖然很多，卻有其局限性，在當時情況下還有其或然性。例如，就拿必須有一人高居眾人之上這一事實來說，毛澤東之前的大部分前輩已經發現，使自己成為宗教崇拜的對象是很有用的。

必須從中國本地實際情況的角度來觀察現代新事物。盡管革命者心目中具有新的思想、名詞，甚至宇宙觀，中國人的生活仍繼續表現出不尋常的延續性和歷史意識。在自我形象方面，中國與歐洲和南、北美洲大不相同，因為它的地理基礎是非常固定的。在中國的經驗中，找不到與帝國從古代東方向現代西方、從舊世界向新世界的西漸過程相類似的現象。中國社會的中心沒有發生過與從雅典轉到羅馬，或從倫敦轉到華盛頓的現象相似的地理轉移。當毛澤東經過長征進入陜西時，過去產生周代征服者的黃土峽谷已經經歷了三千年的歲月。成為中國再統一根據的各種歷史先例可以追溯到過去，而且具有強烈的直接性，猶如在一次美國的總統競選運動中，我們仿佛看到愷撒、查理曼、約翰王和亨利八世在他們的時代，都曾跨越河流和平原，在紐約、弗吉尼亞、俄亥俄和伊利諾斯諸州的村鎮及城市中，通過競選總統爭取中央權力。在中國，它的過去以一種西方人很難想象的方式表現出來。

如果我們記住這些模式，現在再去探討中共1949年接管政權的情況，那么我們完全可以斷定，不但歷史支持這種接管，而且在20世紀出現的新因素也幫助接管。首先，從傳統的角度看，政治條件成熟了。自1911年以來，中國人民很少過安寧的日子，所以普遍渴望安定。在此期間，中共在1921年以后已成為一個一體化的政權。它已經歷了1923—1927年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的四年革命斗爭；經歷了1927—1937年的10年反對國民黨人的戰爭；經歷了1937—1945年抗日的第二次統一戰線的八年時期；經歷了1946—1949年反對國民黨人的4年內戰。這26年不間斷的斗爭以及江西和后來的華北統治經驗，已為中共奪取政權和行使權力做好了準備。[[68]](#_68_Jian_L_Fan__Si_Lai_Ke_Zhi_We)

其次，從現代的社會角度看，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成熟，更因中國普遍存在的文化主義、文化特性意識和以往的優越感而高漲起來。社會結構中的深刻變化已經削弱了擴大的父系家族世系對婦女和青年的控制。軍人、工商業者、教師、從事文藝工作的知識分子、出版商和新聞工作者，甚至革命者和黨派成員的新的職業的作用已得到了承認。

同時，從外國技術的角度看，新事物已經從工業生產和輪船、鐵路對蒸汽的使用發展到汽車、飛機中內燃機的使用。電話和無線電繼電報和電燈而問世。伴隨著鋪路、街道照明、排水和污水處理、公共教育、衛生管理等城市服務行業的建立，又出現了現代化的警察治安和司法制度，以及日報、雜志、通俗小說和電影業。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與提煉業、制造業、銀行和投資業務以及政府加強軍事力量和官僚行政管理的財政力量同時發展。這一切發展和變化都是人口增長和與外部世界交往日廣的結果。在20世紀40年代，中央權力衰落的種種政治征兆突出地在公開場合表現了出來，同時那種要求新的和更現代的生活秩序和政府的潛力卻在不斷地壯大，等待在一個新政權的領導下擰成一股力量。

可以認為，士兵和學生即將成為建設新政權的基石。20世紀已經出現了一種日益加強的尚武傾向。當清帝國因廢了天子而失去首領時，袁世凱因擁有受過訓練的北洋軍而成了中國的強人。在1912年，只有他能作出維持秩序和阻止外國——據推測是日本——侵略的諾言。1916年以后，軍閥割據甚至造成了更大的軍隊。只有在蘇聯的軍事援助和黃埔軍校造就了一支充當先鋒的國民黨軍隊以后，國民革命才完成了它從廣州至長江的北伐。在孫中山博士的三民（民族、民主和民生）主義的教導下，黃埔軍校的士官生和蘇聯的援助形成了蔣介石軍事力量的核心。1928年在南京政府名義下統一中國后，遣散軍隊的努力失敗了，從此，南京、滿洲、廣西和其他地區的武裝力量發展壯大，直到抗日戰爭最后使國民黨和中共兩個政權都軍事化時，這個局面才告結束。最后，中國的重新統一靠武裝力量來完成。在20世紀20年代的第一次統一戰線中中共失敗（因為它沒有自己的軍隊）后，它吸取了教訓。1949年，它的軍隊重新統一中國。[[69]](#_69_Jian_Kong_Fei_Li_Zai___Zhong)

培養現代學生則遠不是那么簡單。在帝國晚期時，繼承下來的中國這座大廈開始崩潰，而在上層最為明顯；在上層，科舉制度通常造就出以社會秩序和帝國儒家思想的主要原則進行自我教導的學者。采用西學和西方技術以加強中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必要性，使得傳統的考試在1905年結束。其后建立以日本制度為榜樣的學校制度的企圖，因清末和民國初期中央政府的虛弱而受阻。此外，到了那時，學習日本已開始讓位于直接向西歐和北美學習的潮流。除了1904年的受日本影響的教育改造外，在1911年以后又接受了歐洲的學術思想；1922年，中國的高等教育又按照美國的模式進行改造。同時，城市化使現代城市生活與仍是傳統農村方式的生活進一步分化。從國外回國的最高層的學者往往是與世隔絕的知識分子，他們所受的訓練是去教學生國外生活而不是中國的生活。他們通常缺乏適合中國農村生活需要的實地經驗、思想、教科書和方法。在民國最初20年間其結果是主要按照外國模式建立了高等教育，這樣就擴大了精選的、外國化的上層社會精英與基本上仍是文盲的農村群眾之間的鴻溝。[[70]](#_70_Wang_Yi_Ju_Zai_Qi___Zhong_Gu)

到國民黨政府開始于1928年在南京恢復中央政權時，現代的大學或是作為部分地受國外資助的教會學院，或是作為天津南開大學那樣的私立大學，或是作為像北大或清華（受美國歸還的庚子賠款的資助）那樣的國立大學（它們在華北享有特殊的聲望），已經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權。國民黨的垮臺部分地是由于它不能動員、鼓勵和利用中國知識分子的才能。[[71]](#_71_Sun_Ren_Yi_Du____Zhong_Guo_X)

當1949年中共繼承了培養一批政治上忠誠的新管理精英以擔任能夠治理中國群眾的官僚機器的干部的任務時，帝國晚期的舊社會精英，即以儒家經典自我教育的文人，早就與清帝國一起消失了。現代已經造就了一批具有不同的效忠對象和世界觀的知識分子——新聞工作者、作家、科學家、行政官員、軍人和政治家——去代替他們，這些從事不同職業的人不但在舊中國的學術和傳統中受到熏陶，而且也分別在日本、西歐、美國和俄國的學術和傳統中受到培養。皇帝們在培育和利用即使是帶有儒家色彩的文人時，已經面臨了種種問題。中國的新知識分子卻遠不是那樣容易控制和利用的。在整個20世紀，他們與政府的有矛盾感情的關系已經成為他們作為國家忠誠的公務員和作為不受約束的學者一專家這兩種作用之間的緊張狀態的主要癥結。民國時期中國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不但表現了中國人能夠趕上國外出現的現代潮流的才能，而且能夠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多元化的新社會中擔任各種職業。京津的教授們甚至當他們在戰時遷往昆明組成西南聯大時，仍繼續把自己看成是現代西方學術自由和中國政治道德的典范。[[72]](#_72_Yue_Han__Yi_Si_Lei_Er____Yi)

中共以遠為嚴格的紀律，在延安就提出了控制新知識分子的要求。但在1949年中共掌權以后，它就面臨了一個依然存在的兩難問題：需要知識分子教學、科學和文藝方面的才能，但他們不是黨的路線最可靠和忠誠的追隨者。從系統上說，他們不是帝國晚期自我灌輸的中舉士子的真正后繼者，中舉士子作為國家公務員的作用這時已由新的干部階級——中共機器的活動分子——去發揮。在黨的專政取代了王朝統治的同時，文人學者階級一分為二，成為專業知識分子集團和黨的干部集團，它們從此將在各個學者的自主和國家權力之間進行長期存在的斗爭。

這些考慮能使我們集中注意創新的能力，它使中國的領導人既能實現王朝重新統一的傳統標準，又能滿足大部分來自國外的社會革命和現代化的種種要求。這些創新至少早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漢學學派興起時就開始出現了，當時漢學對奉為神圣的經典著作進行了多方面的再考察，對已被接受的體現于宋學中的一致看法提出了懷疑。[[73]](#_73_Ai_Er_Man____Cong_Zhe_Xue_Da)隨著學院及學院中批判者和反偶像論者的成長，出現了社會精英的能動性，它在帝國晚期，特別在1850年太平軍叛亂開始之后，已使中國人的管理才能在地方行政中體現出來。

在議政方面，這個趨勢受到了香港及條約口岸的現代報刊的推動，并且隨之而來的是19世紀90年代愛國學會和1898年以后初期政黨的建立。20世紀第一個10年出現了立憲主義的興起及地方、省和全國議會的創立。雖然政黨在選舉中公開競選議員的活動在1912—1913年被禁止，但中華民國的自由代議政府的早期試驗卻給后代立下了先例。[[74]](#_74_Yue_Han__H_Fen_Che____Zhong)在軍閥割據時代盛行的自由主義教育（雖然被以后的掌權者所詆毀）表面上似乎也是外來的東西，卻依然與中國的過去有著強烈的共鳴。學術自主決不是完全從外國進口的，中國人吸取現代科學和學術的杰出才能具有古代的淵源。

我們已經注意到，在20世紀所有的新事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黨派專政取代了家族王朝的統治。但是，最早的這類掌權者——國民黨——依然被對立的派系弄得四分五裂，其災難性幾乎不亞于成吉思汗王室的蒙古征服者造成的后果。但是較年輕的中共直到1949年以后很久仍保持了明顯的領導凝聚力。總之，在早期發展官僚政府時曾經領先于世界的一種中國政治傳統證明在20世紀很有能力創造一種適合中國現代情況的控制制度。證明這種能力的事實是巨大的中國仍是一個單一的國家。

當然，這個結論可以結合以下的事實來看：中國的革命領導人選擇了一條建立新中國的最容易的道路，辦法是在繼承下來的最高權力的結構中，保持受過信仰熏陶的官僚集團和能使中國社會井井有條的普遍存在的正統觀念。但是事實證明，作為舊主題的現代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更適合于奪取和保持政權，而不是搞經濟現代化。于是進一步的創新隨之而來。

由于本卷以下幾章主要討論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及其政策，所以讓我們最后考察一下農村——新中央政權與中國廣大群眾進行接觸的地方——的實際情況。

## 地方控制的問題

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中國之大說明西方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政府的形式和盛衰方面，只能使我們部分地了解中國的政治生活，而一般地說，這種方法在研究小國時是必要和有收獲的。事實是，絕大部分的中國人民主要是在地方而不是在中央參政。城市無組織的群眾在都城發揮政治作用的例子為數很少。誠然，民眾是通過科舉制度使有才之士脫穎而出的源泉。但通過這條途徑（以及通過捐官和裙帶關系）而進入的士大夫世界卻是一個脫離民眾的世界，用自己的官場語言和官方渠道交談和聯系。無數體力勞動者和少數挑選出來的腦力勞動者這兩個階層繼續把社會一分為二。至于不在歷史范圍之內的現代革命，它必須使農村的群眾參加政治生活，這就使地方行政，即農村和集市的政治，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同時它又因相對地說一直被人忽視而越發重要了。

我們不妨先從中國長期持續的發展這個問題說起，這個現象的標志是，1750年的人口總數約為2億，在19世紀40年代為4億，在1950年接近5億，在1982年為10億。

如果我們首先考察舊的地方政府結構，我們就會發現這個結構的中心是縣（帝國最低一級官僚機器與地方實際接觸的所在地）。簡而言之，當中國的人口從漢代的6000萬增至20世紀初期的4億時，縣的數字卻沒有相應地增加。相反，它依然在1200到1385個之間，仿佛帝國結構有了大批基層行政機構就不能運轉。[[75]](#_75_Shi_Jian_Ya_Bian____Zhong_Hu)總之，結果是一般縣的人口從漢代約4萬人膨脹到晚清的25萬人左右。由于在縣令身上體現出來的帝國權力高居于地方之上，帝國必須使用幾種方法，以促進人民一定程度的“自我管制”（self-control，自治）——這個意義模糊的名詞現在通常譯為“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當然，實際上從人民主動地使他們自己秩序井然這一點說，有的人可以認為這是“自我管理”，而上級行政官員則可以把同樣的情況看成是自我管制。最明顯的法家方法是幾種集體負責制，它們是在以10戶為單位的等級結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用于征稅和征用勞力的制度稱里甲，用于戶口登記和互相監督的稱保甲。同時，用更具儒家思想的方式行事，家族應對其成員負法律責任；擁有功名的地方紳士則被授予社會和政治特權，以使他們能夠管理福利、公共工程、防務和維持秩序等方面的地方事務。

但是這些方法并沒有填補縣令和民眾之間日益擴大的裂縫。由于縣令的任期通常為三年，而且總是在自己故鄉之外任職（因為有減少裙帶關系而立的回避法的規定），他們一般地說在任職的地方既無親屬關系，又無個人的義務，他們可能非常容易變成專為前程而不是專為使命的人，而且往往貪得無厭。在這種短暫的外地主子的治理下，地方衙門的吏役也變成專為私利和貪婪的人。這樣，一個真正為民服務的縣令就成了一個值得大加歌頌的模范。中國自夸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郡縣制）為地方性的腐敗和麻木不仁所苦。

為了消除這些弊病，政治哲學家如清初的顧炎武就曾力主恢復清代以前封建制（“封建式”的權力分散）的某些方面。例如，顧炎武主張，縣令之職應該世襲，這樣皇帝在地方的代理人的利益與當地人民的利益就會一致。但是沒有人成功地在村一級建立一種新體制。[[76]](#_76_Jian_Kong_Fei_Li_De_Xia_Lie)

這樣，舊政體的某些殘存特征就會影響革命的中國的新政治。首先，對形式上的統一和中央占最高地位這兩者的持續需要，仍要求在強制和說服、中央統治和地方默認之間有一種經過精心調整的平衡。這種平衡已在當然只占歷史長河的一部分的帝國時代的兩千年中擬定出來。由于帝國的官僚機器因人口的增長而不斷地擴大，它就指定有功名和有地紳士的混合階級作為它的地方合作者。這種平衡可使官僚機器高居地方之上，這樣，地方就可由紳士一級的掌權者去管理，這些人有地方的基礎和權勢網絡，但不容易把他們的小規模的地方權力與官場行政等級中更高的地位結合起來。我認為，地方統治階級孤立和局限于當地的事實部分地是由于經常提到的那種缺乏連接地方和中央的中間制度結構。總之，晚期帝國政權的一種隱秘的力量是存在于地方—非正規—商業制度結構和中央—正規—政治制度結構之間的缺口。不存在可以成為治理一個縣的踏腳石的制度化的集市中心政治結構。由于在縣一級以下沒有正規的組織，帝國政府就阻止了興起的地方掌權者去控制一個縣或幾個縣。總之可以這樣說，縣一級以下政治制度化的“落后性”是一種防衛性的措施，它防止只顧地方利益的傾向的興起，并防止在望族領導下的控制地方和擴大潛力的地區基地的建立。[[77]](#_77_Mou_Fu_Li____Zheng_Zhi_Jie_G)

西方社會科學家談到的這些缺乏地方的政治制度化的事實，與中國人較少地依靠法而更多地依靠個人關系作為掌權手段的情況一起發展。[[78]](#_78_Tuo_Ma_Si__A_Mei_Ci_Ge_Zai_Q)個人之間關系的重要又意味著，那些堪稱官方正統道德典范的人、那些有庇護和被庇護關系網的人，以及那些有忠上思想——這些思想使官僚政治和依附于它的士大夫或紳士階級結合起來——的人的領導權增大了。歸根到底，由基于私人關系的派系而不是由基于較少人情味的法律建立的權力結構意味著，最高的掌權者必須體現出教義的絕對正確性和十全十美的行為（只是在遇到自然災害并作禮儀上的懺悔時，他自己才承認有行為失當之處）。這等于說，國家的統治者本人是國家權力的化身并理應獲得其政權的正統性。這樣就不可能讓一個西方式的忠誠的反對派存在，這個派別忠于國家政權，但可能反對掌權者的某些具體政策。

在中國的這種具體情況下，中共作為一個希望取得最高權力的少數派，被迫要么參加統一戰線而處于次要的地位，要么起來造反。1912—1913年成立代議制政黨政府的短暫的嘗試顯然失敗了。既然王朝統治已經過時，唯一可能代替的辦法只能是黨派專政。國民黨和中共都面臨一個問題：它們能否培養一批新的社會精英，以便在地方一級代替過時的紳士階級。

兩黨都從晚期帝國繼承了一種有利于紳士發揮能動性的傾向。到晚清時期，地方政府明顯的不足之處正越來越多地被地方名流的主動性所彌補，這些人都處于嚴格的官僚渠道之外。例如，在對付叛亂的太平軍時，地方上有功名的人得到皇帝的批準，從事動員民兵和建立軍隊的工作，這些部隊中的各級指揮官都覺得與其部屬有私人關系，因為這些部屬是他們親自征募的。在鎮壓了19世紀中葉的幾次叛亂后的重建工作中，一批批紳士管理者承擔了地方上救濟和整頓、灌溉和治水及恢復農業和教育等方面的任務。的確，在現代化的許多方面，晚清出現了地方名流領導的鼎盛時期。在本叢書的第13卷中有人爭辯說，中國社會到1900年已經開始擺脫由國家支配經濟、社會、智力和文化事務的大規模活動的老框框。到20世紀20年代，現代文學、高等教育、工商業、議政和黨派吸收成員的工作，都是在中央官僚控制之外進行的。[[79]](#_79_Guan_Yu_Shen_Shi_De_Neng_Don)

于是，民國時期的中國向觀察家們顯示出兩種面貌，而這些人看到的往往只是這一種或另一種。愛國的、具有多元論思想的西洋化人士認為，中國的少數社會精英似乎是在以分權和多元化為基礎的現代化的過程中大力進行工作。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條約商埠中外國和中國企業的活動以及醫藥、教育方面傳教士的和其他中外私人的活動，仍與南京政府的活動同時進行。當然，所有這一切發展都因地方軍閥的不可靠和胡作非為以及缺乏中央權力而受挫，于是民國對20世紀第二個10年和20年代的愛國觀察者顯示出的另一種面貌是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和開明的中央政府。

這種廣泛的要求促進了1925—1927年的國民革命，并且導致了1928—1937年的南京政府及其領袖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名義上的再統一。于是，一切公開活動需要官方監督或領導的主張重新得到了肯定。這方面有許多例子。1913年，民國的第一任受挫的總統、一名舊帝國的官員袁世凱已經重申了中央集權（郡縣）官僚政治的原則，于是取消了在立憲政府運動時期由紳士成立的幾百個小咨議機構。1928年以后，軍人蔣介石一旦權力在握，就全力實行軍人政治，即首先對付敵對的軍閥，然后對付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在他放棄了與中共組成的第一次統一戰線以后，蔣介石發現曾經幫助他北伐的群眾組織再無用處，于是讓它們消亡。在此期間，由于必須吸收軍閥時代的軍隊和官員，一度革命的國民黨就成了機會主義和趨炎附勢者的淵藪，蔣介石則設法把自己的權力建立在現代軍隊和效忠他個人的追隨者的基礎之上。

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國民黨人的統治時期主要是作為中央控制向下的延伸而受到注意，這種情況就大大地增加了政府的負擔，而沒有建立起能夠發揮主動性和激發支持的真正的地方自治機構。在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的整個現代改革時期中，民間的抱怨是，上層階級和政府的改革計劃主要給村民們進一步帶來了納稅的負擔，他們幾乎看不到愛國的城市居民十分贊美的道路、鐵路、學校、衛生所和農村工業產生的利益。[[80]](#_80___Jian_Qiao_Zhong_Guo_Shi)在戰爭時期的混亂中，國民黨的統治常常墮落成犬儒主義的剝削。[[81]](#_81_Ren_Min_Tong_Hen_Fu_Hua_De_G)

結果是，抗日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民眾主要是在中共地區被動員參與政治。可是在這些地區，中共出于保持其政治控制的需要，也阻止真正自主的自治政府扎下根來。共產黨的教義和實踐都不傾向于擺脫“官僚統治”即由官僚中心進行統治，而這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生活的特點。城市治理農村的自覺的傳統繼續是準則，即使農村民眾能牢記導致農民“解放”的階級斗爭的新教義，情況也依然如此。

但是，在延安的中共干部的思想中盛行著一種成為以往民眾運動特征的追求平等主義的熱情。在某些方面，他們是崇拜千年太平盛世的人——這些人理想主義地信仰一種烏托邦的幻景，并準備在實現它時共擔風險——的后繼者。新穎之處表現在，他們視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為站在歷史前列的國際運動的一部分。

這些知識分子對平民革命和關于解放的現代教義的新信仰自然地使他們關心他們完全依賴其支持的那些地方的平民。像中國歷史上過去的造反者那樣，他們因此培養出一種平均主義的關心平民的生活作風，當他們使掃盲、公共衛生、軍事訓練和糧食生產的措施制度化時，他們利用了現代技術。他們關于科學和社會進步的思想表現了人有能力進行變革的信仰。這種走到平民當中動員平民的重要才能轉而又為游擊戰提供了基礎。有的人認為，新文化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口號——“科學和民主”——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共領導下的華北似乎已在實現的過程中。

#### 日本和中共打敗國民黨

日本人入侵中國這一事實，對敵對的兩個政黨專政的命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從1931年起，入侵使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因建軍和建立軍事工業以防御敵人而肩擔重擔。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的入侵需要中國由一個軍人來領導。蔣介石成了掌權者，對社會革命的種種考慮就被撇到了一邊。日本人征服中國的企圖對中共的命運也是決定性的。共產黨人已被趕出江西并在長征中幸存下來；如果沒有日本人的入侵，他們在華北邊區貧困的根據地里可能會被餓死。總之，日本人提供了導致國民黨衰落和中共幸存、壯大和勝利的主要形勢。

相比之下，國民黨作為一個專政的黨，在重新統一和統治中國的競爭中落后了，主要原因是：它是一個較老的組織，與更早時期的世界觀和利益緊緊結合在一起。國民黨始于1912年或更早，而共產黨則始于1921年或以后。因此，國民黨的失敗常常反映出共產黨成功的原因。

國民黨是一個比較松散的組織，孫中山一代的最早的領導人在共和革命和民國初期混亂的派系政治中度過了20或30年以后，黨的專政的結構才在這樣的組織基礎上建立起來。因此，國民黨是一個具有幾乎不可能消除的內在派性的若干地方集團的結合體。在意識形態方面，它也是不能持久的，不過是把孫中山的具有模糊自由主義傾向的三民主義與一個列寧主義的黨的結構和灌輸教義的黨的軍隊結合起來。所以國民黨是一個各種成分不能凝聚在一起的混合體。不能真正地采取從蘇聯移植的模式。雖然黃埔軍校的士官生分配在黨的軍隊中工作，但他們發現自己與軍閥的雜牌軍混在一起，而且后者的人數超過自己。他們只受到作為意識形態的孫文主義的灌輸，所以不得不依靠古代的對指揮官效忠的原則。與此相應的是，國民黨在征募士兵和訓導方面的紀律也是遠遠不能滿足要求的。如上所述，廣州產生的早期國民黨因接納了全國各地的地方官員而人員充斥，這些人根本不能與黨的組織結成一體和接受它的紀律。一旦北伐成功，像群眾組織這一類有前途的機構就任其解體；愛國的青年受到敵視；甚至條約商埠中新生的資本家階級在南京政府的統治下也受到傷害，而不是取得機會。權力結構很快變成一個易受一切武裝派別盛衰影響的軍閥結盟的結構。[[82]](#_82_Pa_Ke_Si__M_Ke_Bu_Er____1927)

帝國主義也促使國民黨虛弱下去。在1943年才廢除的不平等條約制度通過阻止南京政府對突出的經濟中心上海的控制，以特別陰險的方式損害了它的主權。英國人控制的上海工部局提供了外國人引以為榮的現代的公用事業以及安定和秩序。但是上海工部局完全不能組織和管理上海擁擠不堪的華人居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同時，它也阻止軍閥或南京政府這樣做。結果是，以青幫為首的下層社會對上海的華人居民進行非正規的統治。在缺乏一個能夠實施有效政策的正式中國政府的情況下，上海的下層社會靠犯罪過日子，開頭是從四川及其鄰近各省沿長江而下非法供應走私的鴉片。這種交易有厚利可圖，它不但唆使中國人進行，而且有些外國當局，特別是位于舊中國縣城和工部局治理的公共租界之間的法租界也插了手。青幫像黑手黨那樣靠干一切壞事養肥自己，它為利潤而存在。它在1927年幫助蔣介石上臺，從此一直是國民黨政權的一個獨立的盟友。[[83]](#_83_Guan_Yu_Yi_Ge_Zao_Qi_De_Nei)

南京政府還因在將其資源用于軍事統一的企圖的同時又要肩負現代化的重擔而處于不利的地位。在30年代中期，像全國資源委員會管轄下的軍工企業和德國援助等有前途的開端都因抗日戰爭而中止。國民黨的命運被以下的事實所決定：它只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把它當做一個明顯的消滅目標而進攻它之前的幾年，才成為一個名義上統一的和民族主義的政府。

中共在1927年以后的失敗的廢墟上和在爭取生存的激烈的斗爭中得到再生，因此公開提倡人民尚武精神作為前進的唯一途徑，而國民黨卻缺乏能使它仿效中共榜樣的那種動力、思想和領導。它反對人民戰爭，反對階級斗爭和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農村動員，也不被全力為共同理想作自我犧牲的那種教義所鼓動。由于已經依靠對外貿易以取得中央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國民黨政權只會加強它對外國支援的依賴性，它希望英美打敗日本侵略者。美國的軍事援助隨著量的增加，使國民黨人越來越依靠它。這種情況削弱了他們的創新活力，并且在愛國者心目中喪失了聲譽。

同時，在中國北部的中共從經驗中學到了東西。它的干部十分年輕，足以在思想上和實踐中奉行新的方式。由于中共處境孤立和蘇聯援助的確只落到國民黨政府手中，延安的政權懂得修正蘇聯的教義以適應中國的情況。經過試驗和失誤，它學會了通過物質刺激、愛國情緒、平等合作、軍事控制和政治權術等手段去動員農村。

中共在解放區和邊區的創造性活動與以往叛亂運動的活動并無二致，但是它發生在新形勢下。被吸收為延安干部的年輕知識分子是出于自己選擇而脫離城市知識分子的，他們只有適應地方的需要才能生存下來。從一開始，中共領導就保持著文職干部對軍事的支配權，但在要求領導分子越過階級界線和到群眾中去親手勞動方面打破了舊習慣。因此，延安的民主在支持必不可少的黨一軍專政方面樹立了一種很實用的和直接與民眾接觸的社會平等主義作風。中共實際上是通過在村一級建立新秩序而生存下來。取消土地私有制及由國家管理勞動力這兩種做法可以追溯到唐初的“均田制”，這一制度的均分土地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有效地分配勞動力來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往的造反者也常常是平均主義者。太平軍曾經有過在地方上把每25戶組合成一個以兩司馬為首的單位作為“地方社會基石”的理想。但是太平軍不能實現其理想，并且一般地不得不以支配農村的地方權貴取而代之。與此相反，中共則通過土地改革消除了以土地為基業的地方名流，并且建立了黨的控制。[[84]](#_84_Guan_Yu_Tai_Ping_Jun__Jian_K)

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中國的一個巨大差別大概是，諸如無線電、其他交通與通訊以及警察火力等物質手段可以與蘇聯極權形式的意識形態約束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現在可以使中共的政權以過去從未有過的規模深入中國的社會。

[[1]](#_1)我要感謝艾倫·S.惠廷、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孔飛力和許華茨，他們對本文提出了有益的意見。

[[2]](#_2)關于歐洲人對中國的早期看法的概述，見雷蒙德·道森：《中國變色龍：分析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幾個概念》[197]（此數碼為本書末書目索引編號，下同）。關于早期中國，唐納德·F.拉奇的《歐洲形成時期的亞洲》[415]第1卷《發現的世紀》第9章第730—835頁中有大量的細節和圖示。

[[3]](#_3)W.W.威洛比的《在華的外國權利和利益》[793]（第2版，1927年）闡明了關于復雜的條約權利制度。

[[4]](#_4)關于最全面而清醒的看法，是衛三畏：《中國總論》[792]，這是報道中國各方面情況的著作中唯一最成功的一部。亨利·查爾斯·西爾：《中國和中國人：他們的宗教、性格、風俗和產品；源于鴉片貿易的災禍；略及我們與這個國家的宗教、思想、政治和商業的相互關系》[664]。R.蒙哥馬利·馬丁：《中國的政治、商業和社會》[519]。這些著作的杰出先驅者是德庇時的《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195]。

[[5]](#_5)中國作為國際競爭的目標所起的作用，威廉·L.蘭格的《1892—1902年的帝國主義外交》[420]有系統的闡述。關于中美關系，最全面的多語種研究是邁克爾·H.亨特的《1914年以前美國和中國特殊關系的形成》[346]。

[[6]](#_6)關于莫理循的信件，見羅惠民編：《莫理循通訊集》[476]，第1卷（1895—1912年）；第2卷（1913—1920年）。兩名英國權威評論家J.O.P.布蘭德和普特南·威爾（B.倫諾克斯·辛普森）出版了十幾部大部頭的受歡迎的著作。

[[7]](#_7)關于法律，除了威洛比的《在華的外國權利和利益》[793]，還有楊沃德的《滿洲的國際關系》[835]。關于對外經濟關系，見C.F.雷默的《中國的對外貿易》[605]和《中國的外國投資》[606]。關于農村經濟，見卜凱的《中國土地的利用》[67]。關于早期日本論述中國經濟的著作，見費正清、坂野和山本合著的《日本對現代中國的研究》[230]，第7部分。

[[8]](#_8)美國對中國的地區研究發展的概況，見約翰·M.H.林德貝克的《了解中國：給福特基金會的報告》[456]。

[[9]](#_9)在這類著作中，見施堅雅《亞洲研究和學科》[665]，載《亞洲研究通訊》，第29卷第4期（1984年4月），第7—8頁。費爾南德·布倫德爾：《對世界的透視》[62]（《15至18世紀的文明和資本主義》的第3卷）有以下一段話：“當今的時代接觸著形形色色的社會科學，難道歷史不是正在成為一種科學……它既準備提出問題，同樣也準備回答問題，既用來衡量現在，又用來衡量過去？”（見第619—620頁）。

[[10]](#_10)賴德烈對此有全面評述，見《中國人：經過3000年積累性發展和近期激烈變化的歷史和文化》[426]。

[[11]](#_11)一位嚴重地被人忽視但有非凡洞察力的學者密迪樂在其《中國人及其叛亂》[525]一書中對西方讀者陳述了關于中國國家的神話，內容包括成為王朝循環基礎的德政論、天命和造反的權利，這些都是他從中國老師那里學到的。關于有幫助的綜述，見魏斐德《中華帝國的衰落》[751]，第4章《王朝循環》，第55—70頁。

[[12]](#_12)關于儒家的改革思想，見狄百瑞《新儒學的開展》[198]；劉子健《中國歷史中的各種政治改革：簡單的分類》[467]，載保羅·A.科恩、施里奇合編《19世紀中國的改革》[182]，第9—13頁。關于經世術維持的控制制度的早期闡述，見蕭公權《農業中國》[315]。關于近期的綜述，見兩國文字的論叢，《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129]。關于經世術興起的情況，見朱迪思·懷特貝克《從“考證”到“經世”：龔自珍和19世紀早期中國文人信仰的改變》[779]，載以上論文集，第323—340頁；本杰明·埃爾曼：《從哲學到語言學：中華帝國晚期的思想和社會方面的變化》[223]。又見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763]，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9]，第13期（1984年6月），第27—38頁。

[[13]](#_13)一個領袖是多才多藝的今文經派學者魏源，《海國圖志》[776]，有幾種版本：1844年，50卷；1847年，60卷；1852年，100卷。關于魏源的經歷，見王家儉《魏源年譜》[762]，簡·凱特·倫納德：《魏源和中國重新發現海洋世界》[432]。第一部系統的地理著作是徐繼畬的《瀛環志略》[326]。見弗雷德·w.德雷克《中國繪制世界地圖，徐繼畬和他1848年的地理著作》[208]。關于”世紀30年代清朝在喀什喀爾和廣州的相似政策，見小約瑟夫·弗萊徹在《劍橋中國史》[73]第10卷第375—385頁的論述。

[[14]](#_14)關于與嚇不退的強大敵人妥協和利用他們的“羈縻”政策，見楊聯陞《關于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的歷史筆記》[828]，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229]，特別是第31—33頁。

[[15]](#_15)關于早期總的洋務運動的情況，見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化》[236]。關于軍事工業，見托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武器：1860一1895年中國軍械工業的現代化》[388]。關于從中外貿易產生的經濟機構和活動，見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商業革命：中西商業資本的興起》[290]。

[[16]](#_16)斯坦利·F.賴特：《赫德和中國海關》[813]；費正清、K.F.布魯納和E.M.馬西森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231]；費正清：《條約規定下的共同政體》，載《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229]。

[[17]](#_17)費維愷：《外國在中國的存在》[238]，載《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128—207頁；費維愷：《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1870—1911年》[237]，載《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一章，特別在第38—39頁（此系英文版頁碼——編者）引了汪敬虞的著作。

[[18]](#_18)保羅·A.科恩：《王韜和清末的改革：處于傳統和現代之間》[180]。

[[19]](#_19)詹姆斯·R.普西：《中國和達爾文》[591]。

[[20]](#_20)市古宙三：《試論紳士的作用》[349]，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812]。

[[21]](#_21)關于第一次統一戰線，見韋慕庭《中國的國民革命，1923—1928年》[791]。

[[22]](#_22)西方最早研究王朝循環的學者可能是楊聯陞，見他的《中國歷史中王朝結構的探索》[829]，載《中國制度史研究》[826]，第1—17頁（“歷代王朝的興衰恰如人之生死”，第17頁）。關于有幫助的分析，[參見此處](#_11_Yi_Wei_Yan_Zhong_Di_Bei_Ren)所引魏斐德之作。又見芮瑪麗《中國最后的保守主義：同治中興，1862—1874年》[811]第4章，《中興的思想》。

[[23]](#_23)理查德·J.史密斯著《清代的文化遺產》[670]第104—105頁談到了佛教的循環觀念的影響。伯頓·沃森指出了“中國歷史寫作中最持久的模式之一：新皇室的統治始于一個德才超群的人，王朝逐漸衰落，直到亡于一個完全無能或邪惡的君主之手”，載《偉大的中國史學家司馬遷的記載》[770]，第1章《司馬遷的世界》，第3—39頁，特別是第5頁。對歷代王朝大范圍的剖析，見賀凱《歷代政府介紹》，載《中華帝國職官辭典》[340]，第1—96頁。

[[24]](#_24)關于游牧的或半游牧的部落政體的參與，見O.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腹地邊境》[427]。記載建立王朝的著作，有：芮沃壽：《隋代史》[809]；霍華德·J.韋克斯勒：《唐朝的建立》[773]，載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73]，第3卷（英文版），第150—241頁小埃德蒙·H.沃西：《宋代的建立，950—1000年：軍事和政治制度的綜合變化》[808]（晉林斯頓大學1975年博士論文）；愛德華·L.德雷爾：《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209]；約翰·w.達迭斯：《儒家思想和專制制度：明代建立時的專業精英》；小約瑟夫·F.弗萊徹、格特魯德·羅思·李：《滿洲人的崛起》[246]，載《劍橋中國史》，第9卷；魏斐德：《大事業》[754]。關于清代的衰落，見蘇珊·曼瓊斯、孔飛力：《清王朝的衰落和叛亂的根源》，《劍橋中國史》[73]，第10卷，第三章。

[[25]](#_25)關于忠誠突然轉移的情況，見愛德華·J.M.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609]，第9章。

[[26]](#_26)哈羅德· Z.希夫林在《孫逸仙》[629]第293—299頁中指出了反滿思想與反帝思想同時興起的背景。

[[27]](#_27)卡沃爾（Camillo Bensodi Cavour，1810—1861年），意大利政治家，1852—1859年、1860—1861年任首相，幫助統一意大利；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年），意大利愛國者及將軍。——譯者注

[[28]](#_28)早在1861年，御史魏睦庭已經指出：“又聞俄羅斯向無水師，自彼得羅汗即位后，微服親往荷蘭，演習水師火器……現在歐羅巴一洲，以俄兵為最強。”鄧嗣禹等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708]，原文載《籌辦夷務始末》[141]，同治，2.36。

[[29]](#_29)20世紀初期一代人能夠掌握吸收的政治概念，在R.A.斯卡爾皮諾和于之喬合著的《現代中國及其革命進程》[626]中有詳盡的闡述。

[[30]](#_30)民族一國家的民族主義在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123]中被理想化了，見第1章《中華民族的成長和發展》。

[[31]](#_31)例如見《1982年人口年鑒》，第132頁：南、北美洲和歐洲的人口總數為10.96億，中國為9.95億。

[[32]](#_32)關于在國內擴張，見哈羅德·J.威恩斯《中國向熱帶的推進》[790]。關于通過外國航運向海外擴張，見羅伯特·L.艾里克《1847—1878年清朝的苦力貿易政策》[352]。

[[33]](#_33)喬治·B.克雷西的《五億人的國土》[191]根據在那里進行10萬英里的旅行描述了中國的地形。又見密迪樂（《中國人及其叛亂》[525]，第39頁）的評論：“盡管有地形的障礙，中國人是統一的——那就是心態，它在那里產生了同一性。”

[[34]](#_34)關于這些制度，見蕭公權《農業中國》[315]。

[[35]](#_35)兩種經典著作是馬克斯·韋伯的《中國的宗教》[772]和白樂日的《中國的文明和官僚政治》[16]。盧西恩·派伊和瑪麗·派伊在其《亞洲的力量和政治：權力在文化方面的表現》[596]出色地從事這項工作；特別見第7章，《中國：萬能的幻象》（第182—214頁）。

[[36]](#_36)見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對極權的比較研究》[798]。歐洲杰出的專家更近期和多方面的研究可參閱S.R.施拉姆編《中國國家權力的范圍》[635]。

[[37]](#_37)孫中山關于民生主義的十分模糊的思想使用的詞來自古典文獻，它有時等同于社會主義。例如，顧炎武（1613—1682年）在《郡縣論》的一篇文章中引了“民生”一詞。他說：“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于亂也。”這是顧炎武九篇《郡縣論》的《郡縣論一》。見唐敬杲編《顧炎武文》[696]，第2頁（我要為這段材料感謝約翰·施雷克）。

[[38]](#_38)見白樂日《中國的傳統和革命》，第150—170頁，載于《中國的文明和官僚政治》[16]。

[[39]](#_39)理查德·J.史密斯的《清代的文化遺產》[670]強調了對社會秩序的渴望。派伊的《亞洲的力量和政治》[596]則強調人民對單一的最高權威的依賴。

[[40]](#_40)關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一古代思想的悠久性，見許華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念》[644]，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229]。

[[41]](#_41)張光直：《藝術、神話和禮儀：古代中國通往政治權力的道路》[83]，第45、90頁。許華茨：《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特別是第1章《早期的文化傾向：問題與思考》。

[[42]](#_42)理查德·L.沃克：《古代中國的多國體制》[761]；雅克·熱爾內：《列國時代》，第2章，第51—61頁，載《中國文明史》[266]，此書系根據法文《中國世界》譯成。

[[43]](#_43)“不同的哲學家本人實際上在‘創造古代’……政治思想……從沒有成功地超越先秦時代所定的范圍。”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316]，牟復禮英譯，第1卷，第12頁。關于孔子仁政的學說，見第116—124頁。顧立雅：《中國經世術的起源》，第1卷《西周帝國》[190]，綜合了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史料，它斷言約公元前1122—前771年的周帝國具有生命力。

[[44]](#_44)關于最早的政治結構，見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51]。又見白樂日《中國的文明和官僚政治》[16]；關于考試制度，見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社會流動的幾個方面》[303]；要了解對中國官僚活動的成熟的研究，見托馬斯·A.梅茨格《清代官僚政治的內部組織：法律、規范和通訊諸方面》[527]。

[[45]](#_45)“查理曼和隋朝的開國者都求助于舊帝國的法典化法律的傳統。查理曼首先在舊德意志法的累加法規，然后在企圖恢復羅馬法典的活動中向這種傳統求助。隋朝能夠依賴早已消失的漢朝的許多后繼國家的法典……查理曼和隋文帝當權時，都碰到中央權力的嚴重分化：查理曼面臨一些爭權奪利者——世襲的宮廷大宰相、公爵、伯爵和主教——瘋狂地填補地方權力空白的活動，而隋文帝則面臨有長期牢固勢力的豪族，它們視世襲官職為其權利，視官方任命的職能為可以繼承的特權。兩人都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以逆轉權力的離心傾向，但隋文帝大力恢復古代漢帝國行政中的合理因素，而查理曼則主要采用宣誓效忠所維持的關系及賜贈土地和農奴的行動作為獲取忠誠的手段……8世紀歐洲沒有隋繼承的受過訓練的官員的那種財富。”芮沃壽：《隋代史》[809]，第9頁。

[[46]](#_46)張灝：《梁啟超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1890—1907年》[81]，第5—6頁。

[[47]](#_47)見芮瑪麗《導言：變化浪潮的高漲》，第1—6頁，載《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812]。《劍橋中國史》[73]第11卷繼續探討了這部開創性著作提出的主題。

[[48]](#_48)中國黨派活動的個例研究仍為數不多。見盧西恩·派伊《中國政治的動力》[594]和他的《黨派的動力和中國政治中的一致性：一種模式和幾種主張》，主要論述毛澤東以后的時代。作為個人力量組合的派系常常因清議而更加活躍。關于一個著名的事例，見賀凱《明末的東林黨》[341]，第132—162頁，載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227]。關于清議和清流黨，見勞埃德·E.伊斯門《皇帝和官員》[211]，第16—29頁和第9章。“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幫”提供了一個近期的例子。

[[49]](#_49)到16世紀，許多估計指出中國的人口已是歐洲本身的兩倍，見費維愷《中華帝國晚期的狀況和經濟》[239]，載《理論與社會》[710]，13（1984年），第297—326頁，特別是第300—301頁。

[[50]](#_50)吉爾伯特·羅茲曼編的重要論文集為《中國的現代化》[623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在發表各省現代化的一系列文章。

[[51]](#_51)W.W.羅斯托在其《經濟發展諸階段》[622]中提出的幾個階段在《共產黨中國的展望》[621]中被他和其他人應用于中國。記者格羅弗·克拉克在其《發展的順境》[172]中大致闡述了比較發展的情況。此書的基礎是他的《帝國主義的資產負債表：殖民地的事實和數字》[171]。

[[52]](#_52)見西里爾·布萊克《日本和俄國現代化的比較研究》[52]。

[[53]](#_53)見斯卡爾皮諾、于之喬《現代中國及其革命進程》[626]。

[[54]](#_54)11902年張壽鏞等編的行政類書《皇朝掌故匯編》[87]分成兩部分：內篇60卷和外篇40卷。一切新的，甚至在國內稍與對外關系或對外活動有聯系的事物都收于外篇。

[[55]](#_55)S.N.艾森施塔特教授的著作包括：《現代化：發展和多樣性》[220]；《現代化：抗議和變化》[221]；《社會的革命和改造：文明的比較研究》[222]。關于對他研究的評價，見托馬斯·A.梅茨格《艾森施塔特對中國的現代化和傳統之間的關系的分析》[528]，載《歷史學報》，第12期（1984年6月），第348—418頁。

[[56]](#_56)布蘭特利·沃馬克分析了馬克思主義陣營中毛澤東的思想與更早的社會主義的和蘇聯的思想的關系，見《1917—1935年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803]。又見斯圖爾特 · R.施拉姆的《毛澤東的政治思想》[631]和阿瑟·A.科恩的《毛澤東的共產主義》[177]。

[[57]](#_57)霍華德·S.列維：《中國人的纏足》[435]。

[[58]](#_58)本杰明·埃爾曼：《從哲學到語言學：中華帝國晚期的思想和社會方面的變化》[223]。

[[59]](#_59)見馬里亞尼·巴斯蒂《社會變化的潮流》[29]，載《劍橋中國史》[73]第11卷，第536—602頁。關于通過科學救中國，見郭穎頤《中國思想中的科學主義，1900—1950年》[410]。

[[60]](#_60)盧西恩·比安柯：《中國革命的起源》[48]。

[[61]](#_61)哈羅德·卡恩：《皇帝眼中的君主制》[380]。

[[62]](#_62)關于李斯，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316]（牟復禮英譯），第1卷《從開始到公元6世紀》，第434—446頁。

[[63]](#_63)王毓銓：《西漢中央政府概述》[769]，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93]，12（1949年），第134—187頁。

[[64]](#_64)芮沃壽：《隋代史》[809]。

[[65]](#_65)關于趙匡胤在文壓倒武的過程中的作用，見小埃德蒙·H.沃西《宋代的建立》[808]。又見賀凱《中華帝國的過去：中國歷史和文化概論》[339]，第267—271頁。關于宋代的軍事，見賀凱《中華帝國職官辭典》[340]，《導言》第45—48頁；魏特夫和馮家昇合著：《中國遼代社會史》[800]，第535頁及各處。

[[66]](#_66)魏斐德：《中華帝國晚期地方管理演變介紹》[755]，第1—25頁；魏斐德：《清征服江南時期的地方主義和忠君思想：江陰慘案》[756]，第43—85頁；杰里·登納林：《財政改革和地方管理：清征服后紳士與官僚的結盟》[199]，第86—120頁；以上均載于魏斐德、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752]；又見喬納森·D.斯賓士、小約翰·E.威爾斯編《從明到清：17世紀中國的征服、區域和延續性》[678]。

[[67]](#_67)傅路特、房兆楹合編的《明代人物傳記辭典》[274]中的鄧嗣禹之文，第381—392頁。愛德華·L.德雷爾和陳學霖在前引辭典之文，第788—791頁。約翰·W.達迭斯的《儒家思想和專制制度：明代建立時的專業精英》[194]詳盡地引了帶有偏執狂的改革活動，明太祖就是從儒家的角度用這些活動來為他殺害無數臣民的行為辯解的。但在另一方面，洪武帝也是一個事業的發展者：他派太學學生到全國各地推動地方的公共工程。到1395年，據報道完成了40987個水庫和池塘的工程，4162個有關河流和5048個有關河渠堤壩的項目，見楊聯陞《中華帝國公共工程的經濟情況》，載于他的《中國學概覽》[827]，第121—248頁，特別是199頁。

[[68]](#_68)見L.范·斯萊克之文，載《劍橋中國史》[73]，第13卷，第12章。

[[69]](#_69)見孔飛力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和社會結構》[400]中關于正統名流的軍事化情況。關于以后的發展，見劉廣京《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469]，載《劍橋中國史》[73]，第11卷，第4章，特別是第202—211頁，《太平軍戰爭以后時期的清朝軍隊》。錢端升最早分析了國民黨統治下的尚武精神，見他的《1912—1949年的中國政府和政治》[128]。

[[70]](#_70)汪一駒在其《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768]中雖然夸大了根絕本國習氣的情況，但這一主題仍是經常討論的關于歸國學生以及革命者經歷的一個題目。又見杰羅姆·格里德的《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國家》[279]；喬納森·斯賓士的《天安門》[677]。

[[71]](#_71)孫任以都：《中國學術團體的興起》[690]，《劍橋中國史》[73]，第13卷，第13章。

[[72]](#_72)約翰·伊斯雷爾：《一黨統治國家中的一所自治大學：聯大模式》[357]，提交1984年5月5日在哈佛大學舉行的新英格蘭中國學術研討會“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共產黨：新關系的探討”討論會的論文。又見默爾·戈德曼《中國知識分子：建議和異議》[271]，第3—9頁。

[[73]](#_73)埃爾曼：《從哲學到語言學》[223]。

[[74]](#_74)約翰·H.芬徹：《中國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全國政治中的自治運動》[242]；安德魯·內森：《中國的民主》[544]；瑪麗·蘭金等寫的《劍橋中國史》[73]，第13卷，第1章。

[[75]](#_75)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19頁。施堅雅指出：“始于唐朝的一個長期和延續性的趨勢是，官方對地方事務的干預的程度——不但在市場交易和商業方面，而且在社會調節（如解決爭端）和行政本身方面——不斷地降低，這種收縮是帝國版圖的日益擴大強制造成的。”同上書，第23頁。

[[76]](#_76)見孔飛力的下列文章：《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動員的問題》[401]，載魏斐德編《沖突與控制》[752]，第257—298頁；《晚清的政體觀》[404]，載《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647]，第4輯（1979—1980年），第1—18頁；孔飛力、蘇珊·瓊斯：《導言》[402]，載上引論文集，第3輯（1978—1979年），Ⅴ—ⅩⅨ；孔飛力：《民國時期的地方稅收和財政》[403]，同上，第100—136頁。保守的改革者馮桂芬在19世紀60年代繼續了顧炎武的理想。見劉廣京《清代的中興》[468]，《劍橋中國史》（英文版）[73]，第10卷，第487—488頁。

[[77]](#_77)牟復禮：《政治結構》[534]的第3章《地方力量》，收于羅茲曼編《中國的現代化》[623]，第78—97頁。關于正規的實地行政管理在組成時如何包括非正規的商業利益集團（到1893年）的情況，見施堅雅《城市和地方制度的等級》[666]，載他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668]，第275—351頁。一個辦法是把24個重點城市中的每一個分歸兩個縣治理。關于另一個例子，注意直隸省的狹長腿狀部分是怎樣伸展到河南和山東之間的商業區的，見該書第343—344頁。日本人關于統治階級的文人精英扎根于地方社會的看法，見喬舒亞·福格爾《日本中國學的新方向》[248]，此文是對谷川道雄編的《中國士大夫階級與地方社會之間關系的綜合研究》[697]的評論，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93]，44.1（1984年6月），第225—247頁。

[[78]](#_78)托馬斯·A.梅茨格在其《清代官僚政治的內部組織：法律、規范和通訊諸方面》[527]中分析了帝國政府內部復雜細致的行政法程序。關于人際之間的關系網，見詹姆斯·波拉切克《國內的鴉片戰爭》[584]；朱迪思·惠特貝克：《龔自珍（1792—1841年）的歷史觀》[780]，伯克利加州大學博士論文，1980年；埃爾曼：《從哲學到語言學》[223]。

[[79]](#_79)關于紳士的能動性，見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400]；瑪麗·蘭金為《劍橋中國史》[73]第13卷寫的第1章。

[[80]](#_80)《劍橋中國史》[73]，第13卷，第1章（蘭金寫）；第6章（比安柯寫）。

[[81]](#_81)人民痛恨腐化的國民黨掌權者的情況有詳細的報道，見格雷厄姆·佩克《兩種時代》[565]；西奧多·懷特、安娜莉·雅各比：《來自中國的雷聲》[783]。

[[82]](#_82)帕克斯·M.科布爾：《1927—1937年的上海資本家和國民黨政府》[176]；瑪麗-克萊爾·貝爾熱爾：《中國的資產階級，1911—1937年》[41]，《劍橋中國史》（英文版）[73]，第12卷，第722—825頁。

[[83]](#_83)關于一個早期的內幕陳述，見歐內斯特·O.豪澤《待售的城市上海》[294]。斯特林·西格雷夫只用外國的材料，寫了關于青幫勢力到處存在的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見他的《宋家王朝》[645]。

[[84]](#_84)關于太平軍，見孔飛力《劍橋中國史》[73]，第10卷，第278—279頁。

## 第二章 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

## 總論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建立時，國家的新領導面臨一些棘手的問題。社會和政體四分五裂，公共秩序和風氣已經敗壞，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遭受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的折磨，中國根本的經濟和軍事落后性給社會精英爭取國家富強的目標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可是到1957年，中共的領導人可以以相當滿意的心情回顧1949年以來的一段時期。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經過了幾十年的分裂后已經建立。中國的民族自尊心和國際威信由于在朝鮮與世界上最大的強國打得相持不下而大為提高；這個國家在工業化的道路上已經走了幾大步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經濟增長速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經有了即使是適度的，但也是顯著的提高；國家的社會制度已經比較順利地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得到改造。

此外，這一切成就是在黨內精英只發生有限的分歧的情況下取得的。這樣，毛澤東主席在1956年9月舉行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能夠令人信服地宣稱：“我們……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我們的黨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團結，更加鞏固了。”[[1]](#_1___Zai_Zhong_Guo_Gong_Chan_Dan)一年以后，當中共開始進行“大躍進”這一大膽的新發展戰略時，發生的事件和持久性的問題為大大地加劇精英沖突提供了條件；可是毛澤東仍重申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完成，[[2]](#_2___Zai_Mo_Si_Ke_Dui_Wo_Guo_Liu)與此同時他的主要的同事劉少奇也似乎合理地爭辯說，黨的團結依然是牢固的。[[3]](#_3_Jing_Guo_1957Nian_De_Ge_Zhong)當中國開始向不能肯定的方向發展時，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八年是一個有成就和團結的時期的官方評價仍完全是可信的。

用什么來解釋這些初創時期的成就呢？在很大程度上，1947—1957年整個時期保持的領導的團結是賴以取得其他成就的基礎。這種團結的程度是了不起的，因為不但已發生過成為蘇聯共產黨歷史特征的嚴酷的清洗和激烈的沖突，而且經歷了影響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中共黨內生活的派系分裂。只有一次重大的清洗，即1954—1955年對高崗和饒漱石的清洗，影響了最高層的精英；下面將會談到，即使這次沖突，對黨的凝聚力也只產生了比較有限的影響。甚至更重要的是，1945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當選的仍然在世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在1956年重新當選。此外，上層精英的穩定還反映在政體內較高層的等級基本上未被打亂這一事實上。雖然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等級和影響力的微妙變化，但是像鄧小平從1945年中央委員會比較低的第25位委員一躍而于1955年進入政治局，然后在1956年升任黨的總書記之職的青云直上的事例則確實很少。除了很少一些人在此期間實際上離開了中央委員會外，喪失權勢的主要人物一般地說在比較短的將功補過的時期后便恢復了相應的地位。

領導層的這種穩定狀態是一筆巨大的政治資產。由于黨的精英對維護明確限定的權力關系和黨的團結具有強烈的義務感，政策的分歧問題可以在正式的討論會內進行激烈的辯論，而不會給政權帶來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為私利而玩弄的個人花招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的確，過于赤裸裸的花招會起反作用），相對而言的無拘束的辯論能最大限度地增加達成全面而靈活的決議的可能性。一旦作出決議，對團結的義務以及列寧主義紀律的正式準則通常能保證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負責領導人中迅速地貫徹。總而言之，一個團結的領導集團形成的權威和信任的氣氛有助于加深普通官員和民眾的印象，從而提高他們實現黨綱或承認黨綱的熱情。

領導統一的根源是各種各樣的。在相當不利的形勢下取得的1949年的勝利顯然是一個關鍵因素。體現一場持久革命斗爭最高成就和爭取民族振興機會的這一勝利，大大地加強了曾經制定黨的卓有成效的戰略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在更普通的一級中，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社會精英廣為分享的政權的職位。1949年以前中共許多文職機關和軍事組織中的個人和集團，其革命資歷與諸如1927年標志紅軍建軍的南昌起義或1935年北京學生反日的“一二·九”運動等特定事件有聯系的領導人，以及領導層內各種各樣的個人關系網，都從職位和權勢的分配中得益。雖然最接近毛澤東的長征參加者總的說來容易在最高機構中占支配地位，但除了在毛澤東取得無可爭辯的突出地位之前反對過他的那些領導人外，沒有重要的革命集團受到歧視，而且即使那些反對過他的人也得到了某些象征性的職位和實權。因此，幾乎沒有具有危及團結的直接怨恨情緒的集團。

另外，1949年以后對馬克思主義的共同信仰和在雄心勃勃的工業化和社會改造方面的廣泛的一致性進一步促進了精英分子的凝聚力。雖然意識形態運動助長分裂和暗斗——中共將在以后若干年里碰到這些現象——的事實是眾所周知的，雖然對目標的廣泛一致不一定能防止在實現目標的手段和何者優先方面的激烈沖突，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和中期，當時的形勢有助于阻止這類事態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于這個時期黨的團結和政策成就正在相互加強的影響。團結有利于問題的有效解決；成功地解決問題進一步加強領導集團的團結。成功還有助于掩蓋或減少關于目標問題的潛在沖突。只要能取得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現代化的任何不愜意的副產品很難引起對現存政策的根本挑戰。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存在一個不但具體規定的目標，而且具體規定了完成方式的模式，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經驗。在遵循蘇聯模式方面，存在廣泛的一致性；這個模式有助于把政策辯論集中在漸進性地修改，而不是在根本的途徑方面，這樣就減少了任何沖突的風險。

1949—1957年的高度團結并不意味著領導層沒有裂縫，與以后時期相比，裂縫只是隱而不顯罷了。一個潛在的分裂根源是黨內精英之間革命經歷的多樣性。雖然被更大的斗爭團結起來，但參加不同革命事件和組織的人同時發展了他們自己個人的關系網絡和集團特性。在1965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這類組合變得極為重要：例如，那些在劉少奇領導下從事“白區”工作或地下工作的人，在動亂的1966—1967年時期一般遭到與其領袖相同的命運。但是從1949—1957年，1949年之前各不相同的經歷一般沒有破壞領導的更大的凝聚力。為了政治利益而利用這種差別的一個重大嘗試——高崗饒漱石事件——最后失敗了。

另一個從革命年代遺留下來的緊張關系的根源是處于頂端的中共精英之間不同的個性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摩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毛澤東和他的主要將領之一彭德懷之間的不和諧關系。據報道，這種關系導致彭德懷在1953年抱怨說：“主席不喜歡我，[也]不尊重我。”[[4]](#_4_Yin_Zi_Hong_Wei_Bing_Chu_Ban)這種個人沖突使彭德懷在1959年被免去國防部長之職（雖然這個見解尚可爭論），可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期，這種沖突基本上隱而不露，因為彭德懷的才能在關鍵的軍事崗位上，在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中都在被使用。

其他的裂縫是從早期形勢本身中產生的。新精英面臨的政策爭論的大議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不同的觀點，從而造成了主張不同觀點的人之間的沖突。一個再三產生沖突的原因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造的速度應該多快的問題。對任何一個特定的問題，有的人主張大力推進以達到所希望的目標，而其他人則提出警告，以防步伐過快引起破壞。可是相對地說，各種做法的分歧是有限的；此外，最高領導人的立場并不堅持這一種或那一種傾向，而是根據問題和形勢而轉移。結果，領導集團沒有像以后時期那樣發生分化，以后對政策的對立看法是遠為根本性的。

造成有限的、非分化性沖突的一個有關的根源是，到20世紀50年代中葉當新制度形成并日益變得官僚化時，領導個人與他們領導的機構和部門之間的利害關系越加一致了。例如，周恩來總理無疑對發展政府機器的作用和權力以與黨組織區別開來的措施感興趣，而劉少奇和鄧小平則更直接關心黨組織，同時，像彭德懷等軍事領袖對充分重視軍事資源又有一種自然的關心。但是，從1949—1957年，這種對立的官僚主義利害關系在追求更大的目標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調節，像“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和軍隊直接的組織上的沖突也得以避免。盡管出現了從各自領導的部門的角度去解決問題的傾向，領導者個人仍把黨的總路線和政治局集體的一致性置于優先地位。

總的來說，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包括政治局在內的中共精英中存在著重大的裂縫和緊張關系，但它們沒有嚴重地破壞一致性占主導地位的領導方式。結果，并不是沒有緊張的關系，但毛澤東及其同事把的確存在的緊張關系降到最低程度的意愿，造成了早期這幾年的不尋常的團結。但是，這種意愿與本章探討的形勢是分不開的。當這些形勢不再占優勢時，即當蘇聯模式不能再得到普遍的同意，當官方的政策造成了大災難而不是帶來一連串的成功時，潛在的裂縫變得明顯了，黨的團結被削弱，隨之又遭到了破壞。在整個這出戲中，毛澤東領導的特點是主要因素。現在我們轉過來探討毛澤東在維持1949—1957年的團結時的關鍵性作用。

#### 毛澤東的作用

在整個1949—1957年時期，毛澤東顯然是中共的不容挑戰的領袖。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黨內的突出地位已經是無可爭辯的了。毛澤東不但是主要的個人崇拜的對象，而且到1943年時，他的主要的同事們也不再對他的理論能力提出微小的懷疑，并且在1945年，“毛澤東思想”被列入中共的新黨章中。此外，盡管黨的章程強調集體領導，但毛澤東被授予在某些情況下單方面處理問題的正式權力。[[5]](#_5_Gen_Ju_Jin_Qi_Liao_Gai_Long_Z)毛澤東的權力扶搖直上的基礎是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以后黨的策略和政策的成就，而他制定的策略和政策比其他任何領導人都多；從1945—1949年這些策略和政策的決定性的成就進一步支持了他的最高權力。正像1949年的勝利加強了黨的總的團結那樣，這次勝利也鞏固了毛澤東的權威。由于這次勝利，毛澤東幾乎成了有魅力的理想領袖，其非凡的能力被公認為取得勝利的關鍵，也幾乎成了新朝代的理想創始人，在傳統文化中這個角色能贏得一切含義的服從。

毛澤東的權威又因1949—1957年時期他主動采取的幾次重大行動而進一步得到提高；在這些事件中他個人的判斷與其主要的同事的判斷及（或）更廣泛的精英意見有矛盾。在這幾年，毛主席顯然只在三次重大事件中采取了主動。第一次是在1950年10月，涉及對美軍在朝鮮北進的反應。在這一次，毛澤東似乎壓倒了他的絕大部分助手關于代價和危險的保留意見，取得了他們的默認，并命令中國軍隊介入戰爭。[[6]](#_6_Chu_Le__Wen_Hua_Da_Ge_Ming__D)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朝鮮的冒險行動的代價確實很高，但在安全和國際威信方面的收益被普遍地視為超過了這些代價，因此他的政治智慧又加強了他的聲譽。第二個事例將在下面作更詳細的探討，這就是在1955年中期毛主席的加快農業合作化步伐的倡議，盡管幾個月前官方作出了減慢發展速度的決定。到1956年末，由此而取得的集體化的基本成就遠遠超過了最樂觀的推測，這似乎又證明了毛澤東的洞察力。

最后一個主動行動是毛澤東在精英內部大量的保留意見面前，通過1956—1957年的“百花運動”（這也將在下面進行分析）大力推動知識分子對黨的批評，這一次不那么成功。但是由于他在1957年中期突然轉變立場，對他威信的損害減到了最低程度。

總的來說，盡管“百花運動”遭到挫折，建國初期更廣泛的成就及在朝鮮和集體化運動方面取得的具體的成功，都使毛澤東的地位在1957年末與以往一樣鞏固。毛主席的力量還在他顯然是1953年提出、中共八大加以發展、1958年初加以重申的把黨的領導分為兩“線”的行動中反映出來。在這些安排下，毛主席將退居“二線”，以便在擺脫日常工作的同時，能夠考慮理論和總的政策的問題。這些步驟表明，他不但對自己最高權威的安全有巨大信心，而且也非常信任他的主要的同事。

毛澤東的權威不容挑戰這一事實是整個精英結構穩定的關鍵。除了上述果斷的主動行動外，毛澤東在他的助手們未能取得一致意見時充當政策辯論的最后裁決者。在這些情況下，政策的辯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爭取毛的同意，而不是像在列寧和斯大林死后的蘇聯那樣用做追求最高權力的工具。由于領導層內所有集團都效忠于毛澤東，它們之間任何潛在的緊張狀態基本上都得到遏制。

雖然毛澤東的權威使領導的團結成為可能，但它決不能保證產生凝聚力。斯大林已經使人們充分地看到，一個最高領袖能如何在其下屬之間有意識地制造不團結，在以后的年代中，毛澤東的反復無常的行為將加劇精英間存在的緊張關系。但是在1949—1957年時期，毛澤東尋求加強精英之間的團結，其總的辦法是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和民主討論的官方準則，用得更廣的辦法是強調作為領導標準的能力和成就。與斯大林不同，毛澤東并沒有使他的同事進行鷸蚌之爭，也不要求他們與他本人有緊密的派系關系。取而代之的是，統治精英中名列前茅的成員是有才能的人，并且靠自己的經歷而成為中共黨史中的重要人物：劉少奇有包括在敵后的所謂白區中工作的很不一般的經歷；而第三號人物和主要的政府行政長官周恩來甚至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反對過毛澤東；紅軍領袖朱德和經濟專家陳云曾與毛澤東有緊密的聯系，但仍是有獨立威信的人；只有在20世紀50年代參加最核心的集團的鄧小平才可以認為是毛澤東由來已久的個人派系中的成員。隨著自己權力的穩固，毛澤東寧可利用這些領導人的許多才能，并把他們塑造成一個合作的班子。這樣，除了向毛澤東挑戰沒有好處外，擴大政策分歧以搞垮潛在對手的活動也很少會有所收獲，因為毛澤東贊成團結。

與這種維護團結的義務有緊密聯系的是毛澤東基本上遵守集體領導正式規定的意愿。雖然毛澤東在一些至關重要的事情上顯然保留了堅持自己看法的權利，而且集體領導并不意味著簡單的多數統治，[[7]](#_7_Dang_1962Nian_Mao_Ze_Dong_Yon)但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的總的做法是通過廣泛的討論來決定政策，在討論中所有有關官員的意見都予以重視，因為他們有助于作出集思廣益的決定。此外，又隨著幾次失誤，毛澤東寧可遵守尊重少數派權利的原則，這樣，領導內部有不同意見的人可以保持他們的觀點，甚至可以在以后重申這些觀點而不用擔心受到懲罰。由于鼓勵對重大問題的爭論，黨內精英一般地贊成比較公開的制定政策的過程，從而加強了領導團結的總的意識，所以這種相對的民主作風對毛澤東很有用。

毛澤東對有效的決策和黨的團結的貢獻由于在1949—1957年期間他主要的政治參與的性質而進一步增加了。在這幾年，毛澤東傾向于把他的干預主要限制在他最熟悉的領域——尤其是農業和革命——方面。毛主席在領導以農村為根據地的革命多年以后，顯然自認為是農民問題的專家，而且他在50年代繼續在農村度過了很長時間。毛澤東指的“革命”是全面擴大中共權力和推動社會主義改造進程的策略，這些關心同他在1949年以前時期的經驗頗為協調。

此外，毛澤東與周恩來一起，作為在抗日戰爭和內戰期間與國際上重要人物打過交道的合適人選，是對外政策的締造者。最后，作為1942年中共的基本文藝方針的制定者，毛澤東繼續對這個領域和高級知識分子的事務普遍具有雖然有時是帶有個人特性的，但卻是強烈的興趣。結果，除了文化領域的可能的例外外，在所有這些領域中，毛澤東具有使他的同事尊敬的資格；他在這些方面權威性的主張不能說是任意提出或是不了解情況的。同樣重要的事實是，毛主席在他不熟悉的領域中，一般把他的作用限制在綜合和裁定更專業的同事的各種意見方面。在這個時期最關鍵的政策范疇之一，即經濟建設方面，情況更是如此。這樣，由于他在自己承認是缺乏了解的事務中，并不貿然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他的威信和精英的團結都加強了。與后期相反，在整個1949—1957年時期毛澤東的獨立的政策影響相對地說是有限的；他對黨的團結的貢獻來自他積極發揮的最終裁決者的作用，同時把他個人的惹人注目的主動性保持到最低程度。

最后，以下的事實也維持著領導的團結：毛澤東這些年的思想和立場總的說是正統的和主流的。他的社會變化的觀念是十足的馬克思主義類型的，集中在所有制形式的改變方面；他以十足的斯大林主義的方式，把迅速工業化置于高度優先的地位。就大部分情形而言，他與他的同事對經濟和技術的發展都有高度的使命感，都敏銳地意識到黨的政策受到的種種客觀限制，都有在“左”的過頭行為和“右”的畏縮不前的航線之間掌穩船舵的決心。這樣，當爭論的確發生時，毛澤東的比較中間的立場有助于緩和沖突和取得一致意見，而不是使領導內的分歧向兩極分化。因此，毛澤東的思想立場有助于他實現全黨一致的政治。但是毛澤東的思想傾向和他的全黨一致的政治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存在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經驗。

#### 蘇聯模式

在1949—1957年時期，中共領導內部在采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這一問題上是普遍一致的。這個模式提供了國家組織的形式、面向城市的發展戰略、現代的軍事技術和各種各樣特定領域的政策和方法。前面已經談過，由于在走蘇聯道路的問題上的一致性，政策辯論從根本的問題轉到擴大成就方面。20世紀20年代，社會主義的最終形式和完成社會主義的手段這些問題上的根本分歧引起了蘇聯政治中的激烈爭論，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由于已經存在了一個現成的社會主義模式，中國的政策辯論涉及的基本上是差別不大和程度不同的事情。

有分歧的基本問題如下：確切地說，蘇聯模式的積極的和消極的特征是什么？中共應如何使這個模式適合中國的情況？走蘇聯道路的速度應該多快？雖然這類問題的確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但它們很難說是引起黨內分裂的那種問題。此外，在蘇聯出現的現成的、表面上成功的社會主義制度，總的說支撐著中國的精英和社會對官方政策的信心，因為可以說，人們對發展的進展和結果的大致輪廓已經知道了。

蘇聯模式的各種特征和使之適應中國情況的方法將在這一章和以下幾章中予以分析。這里說一個情況就夠了：中共領導人從來沒有采取照搬蘇聯經驗的立場。1949年以前毛澤東的革命綱領的精髓是面向中國實際的需要，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他也不準備放棄這個原則。此外，毛澤東的強烈的民族主義導致了20世紀40年代初期的一個不讓蘇聯對中共事務進行任何控制的明確宣言，這也阻止了不動腦筋的模仿。

盡管如此，改變模式的愿望在不同領域中和不同時期內有所不同。黨在自己有能力的領域（如在農村政策方面），普遍采用有中國特色的方法——雖然甚至在這些領域中，蘇聯的模式依然有一定影響。相反，在中共沒有經驗的領域，它的創造性就有限了。對這個事實，毛澤東說：“在全國解放初期，我們全沒有管理全國經濟的經驗，所以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只能照抄蘇聯的辦法。”[[8]](#_8___Guan_Yu__Zheng_Zhi_Jing_Ji)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的領袖有了信心，他們開始修改有關經濟和其他關鍵領域的蘇聯經驗。但是，只是在1958年的“大躍進”時，才出現了與蘇聯模式根本決裂的情況。

1949年以后，中國的領導集團為什么如此斷然地接受蘇聯的模式呢？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外交政策中決定“一邊倒”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如果在內戰時期美國外交不那么敵視中共，不管出現一種更平衡的國際姿態的可能性有多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仍會發現蘇聯是它可以取得軍事和經濟援助的唯一來源。仿效蘇聯的先例至少是取得這種援助必須付出的部分代價。但是，更加根本的是靠近蘇俄的長期意識形態傾向。這不但包括自己是反對國際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共同運動中的一部分的意識，而且還在基本的組織原則和實踐中反映出來。盡管有自己獨特的重點和毛澤東對獨立的堅持，但在根本意識上中共自最早時期起一直遵循蘇聯的模式，在當時，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和方法由共產國際的代表輸進了羽毛尚未豐滿的黨。

此外，在1949年以后不久的一段時期，即使毛澤東繼續堅持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的獨特性，也還存在蘇聯依然是基本意識形態問題的權威的這種認識。這也許從毛澤東夜訪蘇聯大使尤金寓所研究解決理論分歧一事中最生動地表現了出來；討論內容可能有助于1951年問世的毛主席的《選集》中教義的調整。[[9]](#_9_He_Lu_Xiao_Fu_Zai___He_Lu_Xia)由于最廣義地接受蘇聯意識形態的權威，俄國人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見解肯定是有分量的。

雖然國際因素和總的意識形態傾向無疑地使中共領導人接受蘇聯模式，但最重要的因素卻是他們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深切的使命感。領導中共取得1949年勝利的那些人不僅僅是農村的革命者；他們既是尋求社會主義未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大力實現一個“富強中國”夢想的搞現代化的人。他們深深地體會到自己對各種發展問題缺乏經驗。正如毛澤東在1949年中期宣稱的：“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10]](#_10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由于發展的愿望，以及蘇聯是在落后的經濟基礎上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有的唯一榜樣，決定走蘇聯的道路幾乎是勢在必行的。

以下的事實進一步推動了這個決定：作為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共領導人接受面向城市的發展戰略的過渡，把它看成是革命成功的自然結果。雖然中共領導人為他們的革命傳統而自豪，并且對城市的腐敗傾向表示關心，但是幾乎沒有跡象表明，毛澤東或其他人在最初看到了延安的革命經驗和蘇聯模式之間的任何根本矛盾。相反，占主導地位的情緒是稱心如意地向更高階段前進。毛澤東從來沒有視游擊戰本身為一個目的，而是把它看成因中共相對地弱小而強加給它的斗爭的一個必要階段；當大兵團進行大規模戰斗的時機來臨時，更進步的軍事作風就被熱情地大力推行。

與此類似的情況是，革命的整個農村階段是必要的，但始終被視為奪取城市的前奏。在革命勝利時，黨的領導人渴望進行建國的工作，對輸入的蘇聯策略可能與中共傳統發生矛盾幾乎沒有認識。甚至當這種認識在20世紀50年代有所發展時，他們還希望任何矛盾將是“非對抗性的”（毛澤東的用詞），因此可以用在蘇聯模式的總框架內部進行調整的辦法穩妥地處理。

最后，以下幾點關于蘇聯模式的概括的評論是合適的。第一，事實上不存在單一的蘇聯模式。雖然所仿效的制度和經濟方面的基本類型是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發展起來的斯大林體制的類型，但中共領導人對蘇聯歷史中的一系列時期和實踐卻大有選擇的余地。例如在農業合作化時期，中共在尋求指導方針時更多地著眼于斯大林在1927—1929年與布哈林辯論期間所詳細闡述的原則，而不是1929年以后斯大林式集體化的實踐。第二，即使大規模實行蘇聯方法的強烈愿望可能存在，但是缺乏必要的技術資源的情況能夠嚴重地限制蘇聯方法的采用。另一個要考慮到的問題是，在改變具體的蘇聯做法時，中共不一定拒絕蘇聯的建議。在1949—1957年的整個時期，蘇聯的領導和專家認為，他們的錯誤是中國人能夠和應該從中得益的教訓。特別是斯大林死后俄國人自己對這個獨裁者做法的批判，常常對中共關于改變現行方法的必要性的想法產生影響。

最后，必須著重指出以下的事實：除了對最高決策者的態度外，蘇聯的影響還起著廣泛的作用。雖然主要領袖人始終認識到（即使認識程度時大時小）有必要使蘇聯經驗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但一般官員和普通群眾卻被對蘇聯先進經驗的公開強調所壓服。尊蘇聯為“老大哥”的宣傳手法以及像“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類口號難以鼓勵批判性的仿效，結果在許多領域中出現了盲目照抄的情況。再從另一個意義說，蘇聯的正面形象容許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些人撿起俄國知識分子中某些較少正統性的傾向，雖然蘇聯和中國的官員們對此都有非難。總而言之，在整個1949—1957年時期，蘇聯的各種影響以多種復雜的方式在對中共的政策和中國社會起作用。在某種意義上，這個過程并非黨的領導人所能控制，更重要的倒是，它反映了他們有意識的選擇。當這些領導人——或其中的絕大部分人——在1957年以后認清了與蘇聯道路決裂的必要性時，他們完全有能力這樣做，雖然許多蘇聯影響不可避免地繼續存在。

## 鞏固和重建，1949—1952年

1949年，勝利來臨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傳統的首都北京在1月份通過談判投降而易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在4月很快占領上海，在5月占領華中的武漢三鎮。從此，解放軍幾乎沒有遇到持久的軍事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后不久，解放軍在10月攻占南方的商業中心廣州，最后在12月抵達西南城市成都。到年末，只有西藏和臺灣在北京新領導的控制之外。西藏的局勢將到1951年通過軍事行動和與地方當局談判雙管齊下而發生變化，而臺灣問題則在以后三十多年中一直是國家未竟之業中的一件大事。

1949年的軍事勝利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前40年中的重大問題之一——缺乏全國的統一。這個事實是中共領導人在緊緊地抓住仍未解決的問題時的巨大的本錢。恢復中國的偉大所必需的全國統一是所有愛國的中國人衷心渴望的目標。毛澤東在1949年9月表達了他們的情緒：“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11]](#_11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

雖然在有文化的精英眼中，全國統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新政權合法化了，這樣它就可以取得社會改造和現代化所必需的更深入的政治控制，但它勢必面臨自遠古以來就支配中國社會的地方主義。雖然中共在開闊黨在革命時期控制的華北農村的眼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大部分農業地區，農民的認識和利害關系局限于他們的農村及附近地區的事情。甚至在中國的城市，平民百姓的生活也通過小的社會集團而結合在一起，他們很少有在都市或全國搞發展的覺悟。

因此，一個一體化的全國政治制度就需要國家以以前政權從未嘗試過的方式向社會滲透，而這種滲透轉過來需要謹慎地發展組織才能和認真地進行群眾動員，以促使社會各階層擺脫它們的狹隘觀點。通過深入社會，中共能夠開發新的支持源泉。同時，它冒著與受到影響的集團不和的風險。新領導人還面臨從十幾年大規模戰爭更直接地遺留下來的問題中產生的任務——必須克服長期以來與中共斗爭的人的繼續反抗，必須振興受嚴重破壞的經濟，必須恢復井井有條的政府活動。這一切將使中共用盡其才能和智謀。但在同時，局勢又創造了渴望和平與秩序的厭戰民眾對它支持的巨大源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毛澤東及其同事談到，在三年內把中國的生產恢復到戰前水平和建立必要的政治控制和組織力量，然后才能認真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事實證明，這個規劃引人注目地接近完成。

這個恢復時期不可避免地要出現互相沖突的重大問題。一方面，初期需要恢復經濟和使人們在政治上接受新政權。有理由讓社會上的主要集團安心，對它們的利益作出具體的讓步。但是，這種安定人心的政策同建立牢固的組織控制作為計劃中的發展的前奏這一迫切需要嚴重地對立。雖然這個矛盾一直存在，而且是領導內部辯論的題目，但在1950年下半年，重點有了明顯的轉移。從那時起，即大致在中國人參加朝鮮戰爭的同時，中共的社會規劃加強了勢頭，群眾運動被發動起來，它的政權以比開始時遠為徹底的方式向社會滲透。但在執政的大約第一年中，鑒于形勢的不穩定和黨掌握的資源有限，主要力量還是放在安定人心方面。

#### 最初的問題和政策

1949年新領導人遇到的問題和他們為解決這問題而制定的政策，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有很大的差異。經濟和文化水平、農業形式、地方習俗、民族成分等方面的差別都需要適當地作出不同的反應。但是，決定性的差別是1949年之前中共在不同地區實際存在的程度有不同。雖然這方面的分門別類是很復雜的，但是在廣義上，分為三類地區可以體現出基本的差別。第一類是華北、東北的“老解放區”，以及西北和擁有全國人口約1/4的華東的部分地區的“老解放區”，中共到1947—1948年，或往往更早的時間，基本上在這些地方的農村建立了它的政權。革命在那里基本上取得了勝利；毛澤東在1950年說過：“有了[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12]](#_12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在這里，中共已經把組織往下建立到基層，吸收大量農民參加黨，基本上消滅了有組織的抵抗，并且在改造社會的規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從而從農村社會的較貧窮階層中取得大量的群眾支持。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在1947—1948年進行內戰的決定性戰斗時，中共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開展其傳統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到1949年，這些地區的主要任務是擴大政治控制和在黨以前沒有統治的小塊孤立地段開始土地改革，在別處復查土改成果和發展低級形式的合作社農業。到1950年中期，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被宣布完成，同年，這些地區約1/3的農戶已被組成互助組，這是在集體化道路上邁開的第一步。

與老解放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解放區”，它包括華東和華中的大部分、西北的絕大部分以及長江以南的廣闊土地。在新解放區，除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農村革命留下的分散的革命根據地（再加上城市中一些地下共產黨員）外，黨缺乏組織方面的資源或群眾支持。不像北方的持久革命斗爭，新區的勝利是靠大部分是外地人的軍隊從外面進行的軍事征服而取得的。與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相反，它的形式是首先奪取城市，然后把控制向外擴大到農村地區。

缺乏共產黨存在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甚至在基本軍事勝利以后反共集團仍然強大。最極端的形式是，國民黨的殘余部隊、秘密會社的勢力、少數民族和地方上組織的其他自衛集團繼續進行武裝抵抗。甚至在50年代中期，毛澤東還談到在新解放區的邊遠地帶有40萬以上的“土匪”尚未肅清，晚至1954年，特別是在西北，解放軍繼續對這些力量進行掃蕩戰。但是據報道，到1951年中期大部分地區已被掃蕩干凈。這類武裝抵抗顯然延長了建立控制的過程，但是其利益在于保持現狀的地方名流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卻更值得注重。為了抵消這種影響，徹底的土地改革是必要的，而土改必須從起跑線開始。

最后，在新區的城市中心，中共必須承擔老解放區城市面臨的一切任務——建立公共秩序，恢復生產，抑制通貨膨脹，控制失業現象；由于周圍農村的局勢不穩，它必須從更不安全的地位進行工作。雖然老解放區有利的農村形勢使得那里的城市能夠以比新區快得多的速度完成重建城市的目標，但是大約包括5000萬人口的城市中心可以被考慮為不同于新老解放區的另一種類型。

除了華北和東北的少數中小城市外，中共在1948年后期以前不掌握城市中心，在此同時，它對攻占的那些城市中心的控制常常是脆弱而短暫的。1949年以前絕大部分城市是反共力量的中心，中共在那里的存在只限于比較單薄的地下力量，而南方的地下力量更比北方的弱得多。這些力量在接管城市時只能起輔助作用，從解放區來的黨的干部往往看不起地下黨員，在他們眼中，地下黨員對勝利沒有作出什么貢獻。這種態度進一步在城市建立的新政權中反映出來，地下工作者在新政權中明顯地只得到次要地位。權力則落到了其經歷是在人民解放軍和農村地區的外地人手中。

當中共進入中國的大城市時，它有著巨大的本錢；但它又為嚴重的力所不及所苦。具有諷刺意義的是，1949年碰到的一些問題因最后勝利的迅速來臨而更加嚴重了，因為這個勝利大大地出乎黨的領導人的意料之外。在1946年內戰開始時，像周恩來等許多最高領導人預料斗爭要持續20年共產黨人才能取得最后勝利；甚至在1948年春當華北的戰役轉而對中共有利時，毛澤東預計要取得勝利還需要三年時間。[[13]](#_13___Niu_Yue_Shi_Bao_____1946Ni)共產黨控制區突然大擴展，使黨深感進行全國統治所需要的人員和技能不足。

一個解決辦法是在中共擴大它的地理控制時迅速吸收新黨員；從1948年到1950年底這段時期，中共黨員從約280萬人增至580萬人。在進行革命斗爭，然后對統治的要求成倍增長之時，這樣大量的納新是不可能嚴密控制的。鄧小平在黨代表大會上批評說：“在全國解放前后的兩年內，黨的組織的發展過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區，這種發展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劃的。”[[14]](#_14_Deng_Xiao_Ping____Guan_Yu_Xi)由于這種不加控制的增長和缺乏系統訓練的情況，絕大部分農民新黨員甚至往往缺乏起碼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知識或者最基本的文化。另一個問題是，最新的黨員是在最后勝利在望的情況下入的黨。結果，黨的領導人不能肯定，這類人的入黨是出于真正的信仰，還是出于機會主義。這樣，雖然在接管政權前后黨的迅速發展無疑是必要的，但這充其量只能是部分地解決缺乏人才和技能的問題。

人力、技能和經驗不足影響新解放區的鄉村，但城市最尖銳地感覺到這個問題。如上所述，當黨的領導接觸到現代部門時，他們敏銳地認識到自己缺乏經驗。就人員而言，中共掌握了72萬合格的人去充當政府的文職行政干部，而在國民黨時期，政府中有200萬以上的職位已有人擔任。[[15]](#_15_Zhong_Gong_De_Shu_Zi__Jian_A)雖然中共的不足和缺欠很明顯，但是必須強調共產黨從農村根據地帶來的技能和經驗還是豐富和合用的。雖然根據地遠不如城市復雜，但是對一億多人的管理顯然已經培育了一整套行政技能。

類似的情況還有，盡管有延安年代特有的平均主義精神氣質，中共已經在發展擁有擅長財政、商業、教育以及農業、軍事的干部的專門行業。此外，早在1945—1946年中共對城市的統治不管多么有限，已經在鞏固城市控制、與資產階級打交道和真正經營城市企業等方面提供了直接經驗。的確，當1949年一些大城市易手時，中共擁有足夠的受過經濟管理訓練的干部去接管支配現代部門的2700個大企業。此外，黨最早的城市經驗的激進的過頭行為有助于在1947—1948年發展一種更溫和的政策，這個政策成為在1949年充分闡明的綱領的基礎。

但是，黨擁有的最寶貴的財富是黨的領導人將熱烈歡迎城市革命階段的態度。毛澤東在1949年早期宣稱，“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16]](#_16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當時他不但表示愿意把城市事務放在優先地位，而且承認城市方式最為進步，是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道路。這個態度表現在許多方面，如1950年強調吸收工人入黨的決定，這一措施的效果是使中共更符合蘇聯的正統。領導的這種傾向所產生的最明顯的結果是，確保城市問題以城市自己的方式來處理，摒棄那種“鄉村城鎮化，城鎮鄉村化”的“華而不實”的觀念。[[17]](#_17_Gen_Ju_1949Nian_Zhong_Gong_D)以前中共在華北根據地成功的關鍵是堅定地把力量集中在農村的實際問題上，城市統治最初階段的成就幾乎同樣是由于全神貫注于與城市有關的任務。

盡管有這些本錢，技能和人員的短缺顯然使黨在1949年不能對城市進行全面的有效控制。在這些情況下，中共采取了兩個策略。一是限制黨對一些關鍵性領域的干預，而讓社會其他各界照常工作；一是進一步開發人才資源，以確保政府和公用事業能井井有條地運轉。占領當局最早的行動之一是號召原來的人員繼續留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只有少數與國民黨關系密切的人被拘留；大多數官員繼續做原來的工作，領取原薪。共產黨干部被派往各行政機關和關鍵的經濟企業進行政治控制和了解業務，但是實際的行政和管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國民黨時期的“留用人員”去做。

人員資源的第二個大來源是吸收來自學生和有文化的其他城市青年隊伍的“新干部”（不一定是新黨員）。這些知識青年具有隨軍進入城市的許多解放區“老干部”所缺乏的技能。雖然容納這些新增的人員是絕對必要的，但這樣也造成了倉促湊成的官員階級內部的緊張狀態。許多老干部自認為經過革命斗爭年代的考驗，看不起新干部和留用人員，認為他們不可靠。更有甚者，他們對年輕的知識分子由于有能力而擔任挑選的職務和對留用人員繼續領取薪水而他們只領取革命供給制時期的日用必需品的情況深為不滿。就新干部和留用人員而言，他們對老干部頤指氣使的態度憤憤不平，認為老干部根據其過去的政治貢獻享受了優惠的待遇。短期的措施是，黨的領導人通過敦促不同的集團放棄其不滿情緒和力爭建立和睦的關系以解決這些產生的問題。從1951年起，采取的長期措施包括：把缺乏必要的城市工作技能的老干部調回農村；逐步增加對新干部的政治和專業培訓，同時清除那些被判定為不可靠的人；在新吸收的干部變得可以使用時，罷免留用人員的官職。

雖然黨的人員資源擴大了，但黨在初期仍限制了自己的活動范圍。由于許多職能非新政府的現有能力所能承擔，各種各樣的私人集團被準許甚至被鼓勵去向公眾提供服務。例如，政府動員傳統的慈善界給窮人提供救濟，而在1950年私人團體和教會團體仍控制著近40%的中國高等教育機構。這種做法來自初期所作的決定，即不僅僅要限制，而且要收縮黨的活動范圍。盡管中共最高當局幾次告誡，不要把農村的階級斗爭方法搬到城市，但在1948年后期和1949年初期，許多進入新解放城市的干部仍死抱著動員受壓者的“左”的觀念不放，并且設法在廣泛的基礎上進行動員。他們將其有限的資源少量地、不相稱地投向整個居民區和小型企業。這種做法被劉少奇于1945年4—5月在天津倡導，后來為其他城市中心采用的措施改正了。劉少奇把政治組織作為中心，重新向現代的經濟部門、教育界和政府部門分配干部，而對傳統的部門則不加干涉。最后的結果是，由于中共控制真正重要的機構和力量，它左右未來事態發展的能力加強了。

劉少奇在天津的作為也使黨能夠在一些關鍵的經濟問題上作出讓步，毛澤東在不久前已把經濟問題列為城市工作的主要中心——恢復生產，特別是恢復工業生產。在這方面，新來干部的熱情又證明是一種障礙。由于黨以前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正式鼓勵工人提出種種要求和讓勞工繼續鬧事，這類干部支持工人反對資方，結果由于工業上的斗爭，許多工廠沒有開工。劉少奇爭辯說，這是阻止經濟恢復的“左”的傾向。他制定了一些提倡勞動紀律、資方有權限定工資和開除行為過分的人員以及“合理”地解決爭端的政策。對工人關于工資和勞動條件方面的利益決不是置之不理，但重點放在限制他們的要求并號召他們為了長期的利益而作短期的犧牲。

這些政策成功地恢復了生產。到1952年，全國的許多領域已經達到了戰前的最高產量。作為其結果，在緩和嚴重的城市失業問題方面進行了重大的突擊行動。此外，恢復工業生產，以及開辟內地的供應路線，這兩者使國民黨曾為此丟臉的嚴重的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這些進展，再加上諸如通過稅收、公債和強制儲蓄使貨幣脫離流通渠道，削減行政開支，通過國營貿易公司控制主要商品，以及嚴懲投機等方面的措施，成功地把國民黨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在1951年減低到可以控制的15%。

同時，中共能夠把恢復經濟與加強控制私營部門的能力結合起來。雖然資本家看到共產黨控制的工會是取得勞工讓步的有效的手段，但是工會與勞動法一起，也給中共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以實現其要求和適度地改善城市工人的境遇。此外，國有化大企業、國營貿易公司和銀行的經濟領導作用，通過貸款、簽訂統購產品和供應原料的合同、指定銷售代理人和官方規定價格等措施，提供了控制資本家企業的有力的外部因素。結果，經濟恢復的過程不但使中共取得廣大群眾的支持，而且進一步增加了黨的能力，決心在以后繼續發展。

#### 統一戰線和民主專政

中共在鞏固控制的過程中最初取得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它能最大限度地取得支持，并把恐懼降到最低限度。一些因素對黨起了有利的作用。如上所述，統一的事實導致了受教育精英的愛國主義支持和更廣大的公眾對和平得以恢復的寬慰心情。這還有傳統的一面，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新王朝而被廣泛接受，有權樹立自己的正統。另一個有利的情況是全民幾乎一致地否定國民黨，城市中產階級更是如此。甚至諸如有充分理由擔心共產黨最終目的的工業資產階級也歡迎共產黨人。人民的希望和接受至少在城市中不僅僅是形勢的產物，它反映了中共使各個主要集團和公眾安心的長期努力。前面已談過，文職公務員留在了他們的職位上，資本家在恢復他們的企業時得到了幫助。民眾作為一個整體，對占領軍的總的無可指責的行為有深刻的印象——這與國民黨軍隊在1945年回城時的表現形成鮮明的對照。

必須強調的是，這些措施及其他措施不是即興產物。相反，它們反映了毛澤東策略的鮮明特征之一——統一戰線。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勝利依靠的是以下的原則：通過制定比較有限的目標和把敵人的界線盡可能縮小的辦法來集合廣大的盟友。這時應用于解放后局勢的正是這種統一戰線的做法。

這個辦法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宣布的總綱和機構安排中反映了出來。一個關鍵因素是把新政權與過去聯系起來，借此大力尋求正統性的最廣泛的基礎。在理論上，在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前，臨時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機構承襲了國民黨1946年初期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它表面上是為了尋求避免內戰途徑而成立的多黨機構）的做法。與此相類似的是，統一戰線本身可以追溯到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

參加統一戰線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是所謂的民主黨派，這是中產階級和以知識分子為基礎的小團體，它們在國民黨和共產黨斗爭期間曾徒勞地試圖成為第三種力量。不但這些黨派的代表人數大大地超過了正式分配給中共的代表人數，而且更為意味深長的是，新政府24個部長中的11個是小黨派的代表或無黨派“民主人士”。雖然政權顯然由中共掌握，但這些職位不僅僅是形式。更廣義地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期，對有威望的非黨人士的意見是真心去征求的。

意義同樣深遠的是中共為未來設想的藍圖——共同綱領——的溫和及和解的性質。這個文件的特點是漸進主義。雖然文件中包括了長期目標，特別是經濟領域的目標，但重點放在當前的任務上。用周恩來的話來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18]](#_18___Zhou_En_Lai_Xuan_Ji_____Yi)毛澤東在1950年中期甚至更有力地強調黨綱的漸進性質，當時他宣稱：“有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19]](#_19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

除了漸進主義外，共同綱領采用了傳統的統一戰線策略，把敵人的范圍縮小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重新堅持中國的民族權利和把西方企業排擠出去的政策的確深得民心，不過這種愛國主義的呼吁多少因與蘇聯結盟的決定而受損。“官僚資本”——由與國民黨關系密切的人經營并被新的國家沒收的有限幾個大企業——也是眾矢之的，在私人資本家（“民族資產階級”）中更是如此，后者由于國民黨對關系良好的企業的偏祖而嚴重地受到損害。最后為封建勢力，它被限定為只占農村人口3%—5%的地主。不但不把富農列為敵人，而且維持“富農經濟”的需要成了中共農村政策的一個主要特征。如毛澤東在1950年初期所闡述的，這種方法更有助于“孤立地主，保護中農……穩定民族資產階級”，[[20]](#_20_Tong_Shang_Shu__Di_24__25Ye)民族資產階級與土地問題有緊密的關系。

統一戰線也被尊奉而抬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所建立的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不是正統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人民民主專政”，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一起在其中為統治階級。在采用這個概念時，中共擺脫了流行的蘇聯關于國家形式的正統觀念。雖然蘇聯的理論家們在1948年前也同意資產階級作為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但是這種立場在與鐵托決裂的同時完全改變了，俄國人這時拒絕承認中國人的主張。黨的領導人堅持其立場直到1953—1954年（這時中共的作者開始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是基本相似的），以此表明他們不但重視統一戰線，而且在情況許可時決心堅持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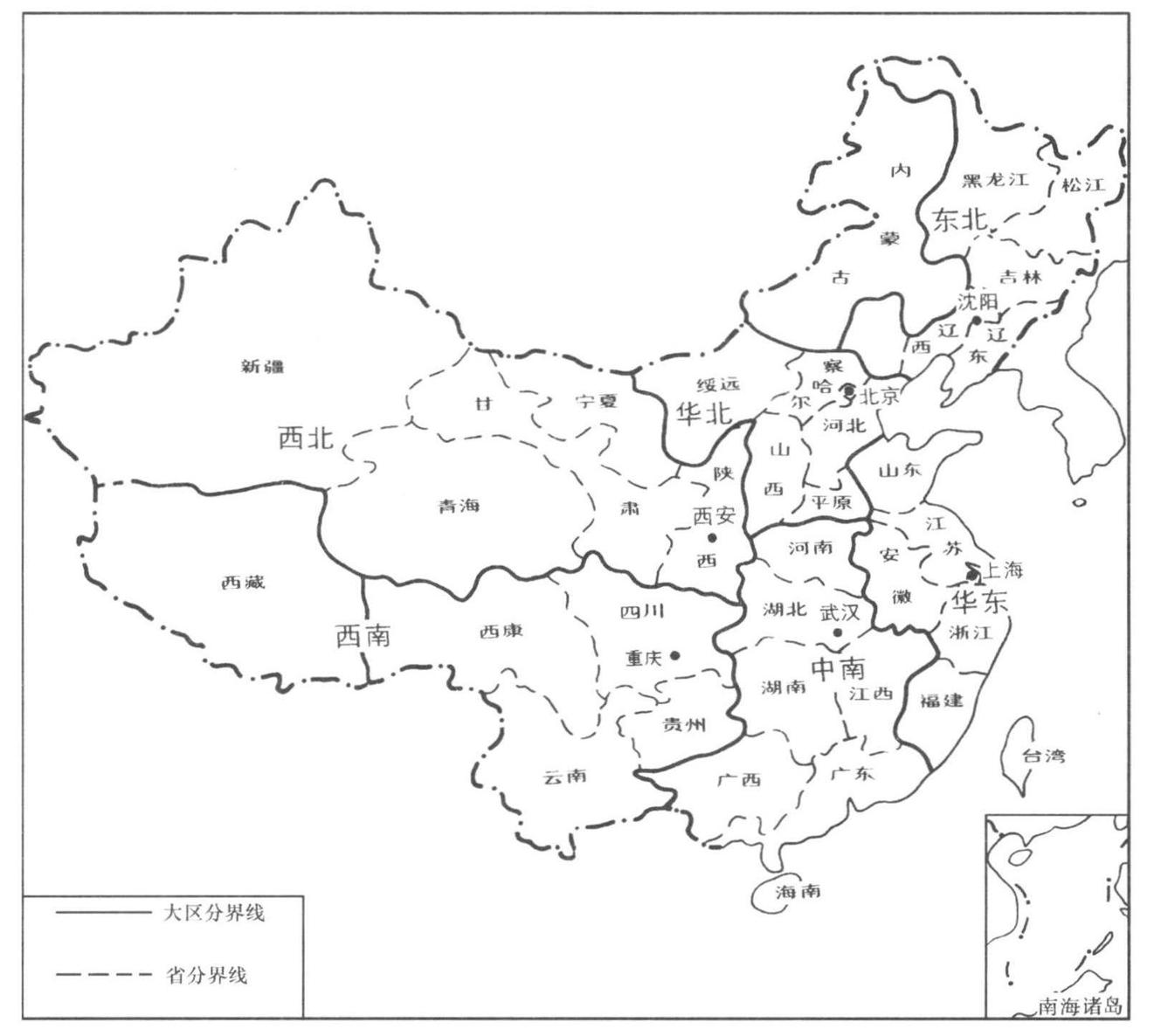
盡管采取這種維護獨立的態度，蘇聯的影響在總的理論方面以及在具體政策方面仍是巨大的。蘇聯理論教科書在中國廣泛地被人們學習，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被用作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漸進主義的參考。在更廣泛的政治觀念方面，國家形式當然與蘇聯國家形式完全一樣——專政歸根到底仍是共產黨專政。因為正如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所明確的那樣，組成國家的幾個階級不是平等階級的聯合。這個聯合由工人階級——也就是其先鋒隊共產黨——領導，其他階級要接受無產階級的教育。就資產階級——這是與蘇聯人爭論的一個原因——而言，這種教育的確可能是嚴厲的，因為它被描述為動搖的階級，有剝削的一面。在最初，統一戰線的觀點強調了資產階級和廣大民眾在建立新中國時的作用，但是民主專政總是能很快地重新規定“人民”中任何成分的政治地位。

#### 軍事的和大區的統治

1949年的形勢決定了共產黨的統治最初將是軍事的和分權性質的。由于新解放區落到了人民解放軍手中，消滅“土匪”反抗的任務依然存在，軍事管制委員會在最初是作為地方最高當局而設立的。但是，這些機構顯然是臨時性質的。根據共同綱領，軍事管制的期限嚴格地根據地方情況而決定，并且一旦可行，文官政府就取而代之。類似的情況是，地區間的巨大差別需要分散的管理，因為沒有一項統一的政策能適用于全國。但這從一開始也表現為過渡性的。根據這一職能，中國分成了六個大區（不包括內蒙古和西藏，它們要單獨治理）。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其中四個大區——中南、華東、西北和西南——由軍政委員會管理，而華北和東北則交給了人民政府，以表示軍事任務勝利完成。這些大區管制機構在名稱上變了幾次，一直存在到1954年，但是隨著情況許可，它們的權力逐漸轉移到了中央。黨的大區的局和軍區也是在同樣的地理基礎上存在的，但它們也在1954—1955年先后撤銷。

從軍事統治向文官統治的轉移進行得非常順利。雖然軍事管制委員會在開始時對黨政機構行使廣泛的權力，但其人員很快就被他們前往管制的單位所吸收。不到幾個月，委員會變成了一個協調和監督的機構，其辦公室大部分沒有辦事人員，因為行政職能日益被新政府直接承擔。到1951年，它的職能基本上減少到治安和衛戍事務方面，因為地方政府這時單獨發布命令了。在長期革命斗爭時期政工人員和軍事人物之間已經建立了密切關系的事實無疑能有力地解釋向文官統治轉移的順利性。但是文官當局和軍事當局的明確區分至少是同樣重要的，毛澤東在1938年明確地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21]](#_21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這個原則反映在大區的任命上；除中南外，每個大區的黨的第一書記這一關鍵職務都由政工人員擔任；中南則由人民解放軍最有戰功的將領之一和毛澤東的長期親信林彪任第一書記。此外，政、軍作用相對有限的區別要大大擴大。共同綱領號召包括組建空軍和海軍的軍事現代化；在蘇聯的大量援助下，朝鮮戰爭提供了認真進行現代化的動力。雖然許多解放軍指揮員擔任了文職工作，但大部分人在日益專業化的軍界找到了充分發展自己事業的機會。

在1949—1952年期間，大區行政機構的權力一直相當大。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說，這個情況并不明顯，因為它們被直接置于北京政務院的領導之下，沒有自己的自主權。但事實上由于缺乏經驗的政府機構剛剛立穩，只有初步的計劃和統計能力，大部分事情必須交給大區去做。此外，由于地區之間的情況和問題大不相同，中央的領導人對需要多么大的大區權力心中無數，于是容許相當程度的地方試驗。總的格局是，中央以相當全面的形式制定政策，而把貫徹政策的步伐和方式的問題交給大區。例如，在1950年中期，北京當局通過了土地改革法，但是顯然沒有設立任何中央的監督機構；貫徹的進程由在各大區政府中設立的土地改革委員會負責。



地圖3 行政大區，1949—1954年

（注：1952年末，察哈爾劃入內蒙古、山西和河北；平原劃入河南和山東。1954年撤銷大行政區時，松江并入黑龍江，遼東和遼西合并成遼寧.綏遠并入內蒙古，寧夏成為甘肅的一部分。1955年，西康劃入四川和西藏.熱河劃入內蒙古、遼寧和河北。1958年，寧夏重新出現，成為寧夏回族自治區。）

大區的權力還從以下的事實中反映出來：在最初，中共的幾個最有權力的人物領導了軍政委員會和人民政府。總觀最高的精英人物，約2/3的中央委員這些年在北京以外工作。變化的一個主要跡象是，隨著這個時期的過去，這些領導人逐漸調到中央。到1952年，大區最有勢力的人物已在北京擔任重要的工作，雖然他們一般仍然兼職，繼續行使其地方權力。此外，由于中央官僚部門職位的增加和大區間的情況更趨于一致，有些特定的權力轉到了北京。例如在1950年3月，政務院公布了統一全國財經工作的決定，但是在另外一些事例中，例如在1951年11月擴大大區任命權的決定中，繼續分散管理的需要也被承認。

當然，分散管理會給忽視中央指令精神以便增加某種地方利益的“地方主義”傾向以活動的余地。在1949—1952年，這方面最明顯的事例發生在南方的廣東省，涉及的是土地改革問題。地方干部在貫徹時，進行得比其他地方更為溫和和緩慢，這樣就引起上級的批評，主要人物最后被從外面派來的新領導所取代。但是關于這個事件，意味深長的是地方干部的主要對立者與其說是北京的中央當局，不如說是位于武漢的中南軍政委員會的領導人。在這幾年中，表明大區抵制中央權力的證據的確很少，雖然大區不可避免的“錯誤”要受到北京的批評。中央領導人承認確已出現的差別，認為在種種情況下，差別不但必要，而且是可取的。從根本上說，這意味著各種規劃首先在形勢更穩定、組織資源更豐富的華北和東北試行，只是在情況容許時才向南推廣。西北和西南在貫徹各種規劃時尤其落在后面，但不像廣東的那次事例，由于“土匪”的有力抵抗，北京接受這些大區的落后情況，認為這是合乎邏輯的。

大區特殊性的最突出的事例是東北。這與后來關于高崗已在那里建立一個獨立王國的歪曲的指控（下面將進行討論）沒有多少關系。相反，它反映了以下一個事實：由于種種原因，東北是最進步的大區，并且充當了全國其他大區的前導。第一，東北得益于日本人統治時期的工業化，所以具有最發達的經濟基礎。它在1949年提供了34%的中國工業產品，在1952年提供了52%。第二，由于東北是第一個完全解放的大區，它能夠更快地朝全面地執行政策的方向發展，到1950年，它開始能夠制定大區計劃。最后，靠近蘇聯和蘇聯擁有大區的鐵路和旅大港這兩個事實，使它容易得到蘇聯的援助和受到蘇聯的影響。例如，東北實行了蘇聯的經濟管理方法（雖然因缺乏技術人員而遇到了困難），這些方法一般得到中央領導的贊同，準備在全國推廣。

東北的示范作用——政策在全國范圍推行之前先在那里試驗和修訂——不限于先進的工業部門。在青年工作方面，東北全區，特別是哈爾濱，被樹為學習的榜樣，這個時期發動的群眾批判運動之一——集中反對城市腐敗現象的“三反”運動——最早在東北試驗性地開展。北京統一戰線的一個主要人物、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的一篇記述東北印象的文章概括了中央領導的態度。她寫道，中國有光明的未來，“我們的東北正走在前面”。[[22]](#_22___Ren_Min_Ri_Bao_____362__19)北京鼓勵東北的帶頭作用，同時把西北和西南看做落后地區，在那里執行迥然不同的政策是必要的，也是適宜的。

#### 土地改革

總的來說，新解放區極其重要的任務是土地改革。對這項工作中共帶來了在處理城市更為復雜的情況時常常缺乏的經驗和人員。到解放軍渡江時，黨畢竟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農村革命。在那個時候，黨的領導人曾經試行各種各樣的方式，并且改進了一整套動員農民的方法。可是在某種意義上，黨在廣大農村面臨的工作，甚至比在城市進行的工作更加困難。首先，甚至黨的最高領導也不完全清楚過去的經驗對新形勢的適用程度如何。毛澤東在1950年初期要人們注意已經起變化的形勢：“過去北方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戰爭空氣掩蓋了土改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給予社會的震動特別顯得重大。”[[23]](#_23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

更為重要的是此時已奪取了廣大的領土。即使中共在1949年能把它的450萬黨員全部派到這些地區，由此形成的干部力量仍不足以滲入廣為分散的農村人口之中。此外，黨員作為外地人來到新解放區的村莊，對當地情況了解甚少，抱著以完全不同的農業和所有制形式為基礎的想法，常常甚至不能講當地話。由于人員分散，他們又有外地人身份，到1952年秋中共在占90%的農村人口的地區完成土改的成就證明了它更早時期經驗的貼切性和黨的領導人的決心。

最初向農村的滲透以解放軍部隊的形式出現，它們從城市向農村集鎮，然后向村莊展開。這些部隊的工作除了“剿匪”外，一般地限于收繳當地民眾的武器，執行治安任務和組織村的民兵。緊跟解放軍前來村莊的是由干部組成的小組或略大的工作隊。只有一小部分——最多也許為10%——是有北方農村斗爭經驗的老干部。大部分人是學生和其他城市知識分子、與地主和富農有家族關系的農村知識青年、城市的失業人員，以及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如果有的話）。激進的青年以及有問題的階級背景常常可以作為這些政治工作者的特征。

他們的最早任務之一是在解放軍的幫助下征稅以支持新政權。這項工作必然造成干部和農民之間的摩擦，在接管后的第一年試圖征收糧食稅時有3000名以上的干部被殺，這個事實足以說明問題。但是，當新政策越來越明顯地把負擔從窮人轉到富人身上時，就產生了對新秩序的支持。在這個開始階段干部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組織農會，實行減租減息，進行反“霸”——換句話說，是舊名流中最暴虐的人——斗爭。在這些努力中，沒有一個沒有障礙。“惡霸”是一個武斷的稱呼；農民常常偷偷地把地租退給地主；到1950年秋季，只有20%的倉促組成的農會被判定是可靠的。的確，在土改的這幾個階段及以后，工作常常必須重復兩三次，才能取得成功。整個努力的局限性在土改結束時的調查中進一步暴露出來，調查表明，在有些地區只有40%的農民加入農會。

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進行再分配——這項主要工作做準備。在1950年6月，中央頒布了土地改革法以指導這項工作。新的法律和劉少奇就這個法律作的報告，反映了毛澤東關于當前情況不同于北方戰爭時期的土改和維持“富農經濟”的政策的觀點，它們為這個規劃明確地提出了合理的經濟內容。這樣，土地改革的主要作用是濟貧的觀點被否定，而“解放農村生產力”和“為工業化鋪平道路”的觀點受到重視。此外，土改法對這一點充滿信心，即可以用來在和平時期的條件下能夠不費力地戰勝地主的反抗，并且堅持政治秩序是貫徹此法的先決條件。

但是，新解放區農村土地改革準備工作遇到了困難，這已經使上述的分析要打些折扣。一個因素是，農民對中共的方案將進行到什么程度心中沒有底，特別是對再分配將會影響富農，甚至中農的土地這一點表示關心。根據中共的觀點，更為不祥的是普遍存在的地主壓迫農民的傳統力量和影響。普通農民干脆不敢反對那些長期支配當地的勢力，因為他們對共產黨的統治不可逆轉這一點幾乎沒有信心。一個特別困難的問題是傳統村莊的階級界線不清。對各種富裕農民階層和地主之間的區分，外地來的工作隊往往比當地農民更加清楚。還有，社會的緊張狀態由于在困難時候地主對農民的傳統義務，以及特別的家族紐帶、在本地居住和同為一個氏族而緩和了。所有這些聯系都能被地主利用（而且已被利用）去破壞農會，隱瞞土地及財產，并通過秘密會社及其他手段去保持原來的權力結構。

1950年夏末，當反映當前農村社會中的根深蒂固的力量的報告引起了負責的黨的領導人的注意時，政策開始被重新考慮。到11月和12月——在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后不久——明顯地出現了向更激進的路線的轉移。幾項官方聲明把朝鮮沖突引作這一轉移的根據，加劇的社會緊張狀態和國民黨重返大陸的謠言當然是一個因素。然而，改變的根本原因仍是比較溫和的方案已經遇到的種種巨大困難。

結果，逐步加強貫徹的新土地改革方案強調階級斗爭和動員群眾，甚至不惜冒某種社會動亂的風險，這與土地改革法的原則形成鮮明對比。當中南的主要官員鄧子恢（他很快將成為中共的最高農業專家）攻擊和平土改并且斷言政治必須放在經濟前面時，他實際上在批評六個月前的官方路線。指出以下事實很重要：即使這樣大的政策轉變，也幾乎沒有政治爭吵，因為劉少奇和其他闡述更早路線的人仍保持他們顯赫的地位。毫無疑問，這部分地是由于毛澤東自己也曾經主張較溫和的政策，而且這還反映了所有有關的人都愿意把改變方案當做根據新跡象做出的必要調整，而不是當做取得政治利益的爭端。

在新路線下，土地改革被發動起來了。重大的步驟是確定全體村民的階級成分，然后是沒收和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和生產性財產。在此過程中，縣一級土改委員會派出的工作隊起了領導作用，它們的主要職能之一是凈化農會，從中選出積極分子擔任地方領導職務。絕大部分新領導從貧農中吸收，雖然官方政策把1/3的農會領導職位保留給中農。在許多地區，中農由于有技能，能夠取得支配地位。此外，工作隊通過諸如“訴苦會”和公審，設法動員全村反對地主。這些方法使地主當眾丟臉，審判的結果是大規模地處決這個階級的成員，也許有100萬至200萬人。[[24]](#_24_Zai_Que_Fa_Guan_Fang_Tong_Ji)在“不要過早地糾偏”這一新指導方針下，被發動起來的群眾常常對地主不受約束地施加暴力和采取殘暴行為，這又造成了更多的死亡。雖然和平土改的報道在整個運動中繼續出現，但是繼續劃分階級界線和制造對抗的活動產生了越來越厲害的后果。

作為一項經濟改革方案，土地改革成功地把43%的中國耕地重新分配給約60%的農村人口。貧農大大地增加了他們的財產，但是實際上中農獲益最大，因為他們最初具有更有力的地位。土地改革對總的農業生產力的貢獻究竟有多大，這個問題仍可以爭論。總之，這個運動的主要成就是政治上的。舊的社會精英被剝奪了經濟財產，其中有的人被殺，作為一個階級，他們已受到羞辱。決定性的事實是，舊秩序已經證明毫無力量，農民現在可以滿懷信心地支持新制度。氏族、宗廟和秘密會社等舊的村組織已被新的組織代替，承擔了它們的教育、調解和經濟職能。從貧農和中農隊伍中產生了新的村干部精英，這些貧農和中農的眼界已被中共的有階級傾向的觀點擴展了。

在完成這次農業革命時，黨同時采用了強迫和說服的方法。經常宣傳舊制度的邪惡和新制度的優越當然是贏得農民對中共方案支持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對地主使用的武力是使全體農村人口相信誰有力量的關鍵。可是黨的政策給農村里較窮的人提供的實在的報酬卻與強迫同樣重要。實行更公平的稅制、減租，最后是分配土地（另外還給最積極的人分配領導職務），這些大大地有助于農民群眾相信黨的事業的正義性。由于在土改期間中共顯示了它既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又是較好生活的提供者的可信性，它大大地提高了將來在農民中的說服力。

#### 城市群眾運動

在土地改革激烈地改變中國農村生活的同時，一系列城市群眾運動給城市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運動中最重要的有：1951年2月發動并持續到1953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從1951年秋到1952年夏秋的反對腐化干部的“三反”運動、針對到那時為止受到尊重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五反”運動和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這些運動都進行得極為激烈，并引起了社會上的嚴重緊張和憂慮。如同在鄉村，官方的暴力也被大規模地使用，特別是在鎮反運動中，但“三反五反”運動使用暴力的程度則小得多。[[25]](#_25_Zai_Que_Fa_Jing_Que_De_Guan)此外，各種各樣的措施造成了強烈的心理壓力，其中包括強迫在小組中坦白和有數萬人參加的公審（并向幾百萬人廣播）。這不但形成一種不信任氣氛，破壞了已建立的個人關系，而且還導致大批人自殺——可能有幾十萬人。[[26]](#_26_Guan_Yu_Zi_Sha_Gui_Mo_De_Zhu)這些運動向社會廣大階層表明了黨的社會改造這一目的的全部內容。由于重點從安定人心轉到加強控制，許多到那時為止基本上擱置不管的集團也被卷進了直接斗爭的旋渦之中。到1952年底，對大部分中國城市居民來說，中共已經成為一股需要認真對待的力量。

這幾次運動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國人參加朝鮮戰爭以后發動的，它們的激烈程度無疑與朝鮮有關。黨的領導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這不但是由于美國進攻的危險性，而且是由于國民黨重返大陸的可能性。總之，國民黨的破壞活動是個現實，不滿分子被卷入朝鮮戰爭造成的潛在機會所鼓舞。社會總的緊張程度由于1950年秋末發動的指導所有集團去“抗美援朝”的運動而進一步加劇。從毛澤東對反革命分子的評論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鮮戰爭時領導態度的轉變。1950年9月后期，在決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澤東宣稱，不殺一個特務是必須堅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堅決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27]](#_27___Guan_Yu_Zhen_Fan_Gong_Zuo)

雖然朝鮮戰爭無疑促使態度改變，并使各種運動比沒有朝鮮戰爭時更為嚴厲，但在另一個意義上說，黨的領導人利用了朝鮮形勢去推動不管怎樣都要進行的工作。對付反革命分子的各種措施在朝鮮戰爭前已經擬就，“動搖的”資產階級和傾向西方的知識分子顯然已是思想改造的對象。的確，大部分重大的運動是在參加朝鮮戰爭后一年的1951年秋季開始的，但毛澤東后來指出，只有在土改完成以后，才能發動“三反”和“五反”運動，所以國內的考慮是首位的。[[28]](#_28___Zai_Zhong_Guo_Gong_Chan_Da)

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對象是間諜和積極對抗新政權的人。在打擊目標名單上名列前茅的是前國民黨黨員和與國民黨有聯系的組織，以及秘密會社的頭子。但是，“反革命”的定義極為廣泛，在進行運動時，被波及的看來不但有積極的反對者，而且還有可能成為替代的領袖的真正有名望的地方人物。在進行運動時，中共表現出一種避免蘇聯公安工作方法的有意識的努力。雖然運動在許多方面是以夜間逮捕為特征的傳統的警察活動，但毛澤東的指令強調了獨特的中國方式。首先，在挖反革命的過程中爭取群眾參加，并且認識到避免因過頭行為而引起輿論不滿的必要性；為此，非黨人士被邀請參加監督運動的委員會。甚至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堅持黨委的權力應高于一切公安工作。這與斯大林的做法完全相反，那里的秘密警察實際上是能使黨感到恐懼的獨立的等級組織，而毛澤東則強調高級黨組織要嚴格核查反革命事件。

在表面上，一般民眾覺得鎮反運動是嚇人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在有外來威脅的時候。但是1951—1952年三個互相有關的運動對到那時為止一直受到中共溫和對待，甚至優遇的集團來說，是一個當頭棒喝。“三反”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城市干部，特別是那些由于與資產階級打交道，已經有貪污行為的財經部門的干部。雖然這些人中包括一些比較高級的共產黨員（不過沒有中央委員或部長），但絕大部分或是留用人員，或是新干部，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信仰一直是可疑的。“五反”運動明確地指向不法資本家，特別是大資本家，他們涉嫌全面地進行經濟犯罪，并欺騙國家和公眾，但是運動的更大的目標是作為一個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思想改造主要針對被斷言是幫助“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離中共式馬列主義的思潮的影響。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正在遭到打擊的是到那時為止一直被容忍的一整套城市非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在鼓勵資產階級的官方政策中帶頭的許多干部已經認為資本家是社會中最進步和最能干的人。就資本家而言，他們則希望繼續營業和過富裕的生活。最后，主要的知識分子珍視獨立思考，抵制強加給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約束。

這三個運動的總的結果是使這些成分就范。這表現在幾個方面。對情節最嚴重的人的直接懲罰，再加上施加的強大心理壓力，破壞了有關集團的自信心。此外，這些壓力摧毀了現存的社會關系的格局；關系——即基于家族、同窗和同事紐帶的個人關系——再也不能保證提供反對國家要求的保護了。與此有關的是，黨成功地在其他人的眼里貶低了這些集團，這些人歷來對它們唯命是從。這樣，以前接受其雇主的家長作風的小企業工人，這時開始采取官方的階級斗爭態度了。

在組織上，由于建立新工會和清理常常被資本家的朋友和親戚管理的原來的工會，資產階級對他們企業的控制被削弱了。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事是吸收新精英在經濟企業和政府中任低級職務。由于留用人員和受腐蝕的新干部被清洗，他們的位置和因經濟發展而新設的其他職位被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或更早涌現出來的工人積極分子所擔任。在很大程度上，打擊留用人員之成為可能，是由于已有了一批在以前幾年受過行政工作訓練，這時被提拔到更負責的崗位上的工人，而且運動本身也產生了大批表面上忠于中共綱領的新干部。由于繼續需要現存集團的管理技能和知識技能，變化不像鄉村那樣引人注目，但是在這幾年，城市與農村一樣，出現了新精英分子。

最后，“三反”和“五反”運動具有重要的經濟效力。除了通過罰款和補稅取得大量投資和發展的資金，兩個運動還通過發放新貸款和訂立政府合同（資本家在財政緊迫的情況下發現這些是必不可少的），大大地加強了政府對私營企業的控制。此外，與這些加強了的外部控制同時出現的還有內部控制。關鍵的措施是，需要付巨額罰金的企業要把股票售給國家和進行公私合營，才能履行它們的義務；這個過程導致了派國家干部擔任有關企業的領導職務。許多大型和中型企業成立的黨支部，特別是在調查資本家“罪行”時搜集到的大量情報，再加上加強了的工會，這一切使當局大大地加深了對私營經濟領域內部經營情況的了解。結果，中共領導人已經具備真正進行計劃經濟發展的實力。

## 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1953—1956年

由于城鄉進行了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政治控制大大地加強，在此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3年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的新階段。在這一年，全國性的經濟規劃開始了。起初，由于中國原始的計劃和統計能力、朝鮮戰爭的需要、與蘇聯關于經濟援助的談判的明顯拖延，中國只可能制定年度計劃。但是在1953年中期隨著朝鮮戰爭和與蘇聯進行的援助談判的結束，更全面的計劃工作可以開始了。最后在1955年年中，從1953—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被批準。

社會主義改造——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從私營向國營和集體所有制的轉變——與有計劃的建設同時進行。對改造的新的強調發生在1953年年中制定“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和10月份公布總路線之時。這一總路線在幾個方面反映了與前一個時期的延續性。第一，它的特征是漸進主義；工業化和改造都要在大約15年的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還有，總路線仍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實行。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將繼續起主要作用。過渡的最早階段將是“國家資本主義”，私營成分在其中日益與國營成分發生聯系，但資本家仍將保持約1/4的企業利潤。但是，由于中共統戰政策的性質，改造的過程自然包括威脅資產階級的幾個方面，雖然威脅的形式不是大張旗鼓的。如同劉少奇在1954年9月所說：“那種認為我國已經沒有階級斗爭了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可以]用和平斗爭的方式來達到[限制資本主義剝削的]目的。”[[29]](#_29___Liu_Shao_Qi_Xuan_Ji__1945)

盡管有延續性，總路線仍意味著它是一項多少更加激進的政策，它反映了向社會主義而不是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概念。此外，1953年采用總路線時的政治形勢表明，在領導集團內部存在著幾年前就已產生的分歧，即究竟使社會主要集團安心的做法應強調到什么程度，控制和改造它們的做法又應強調到什么程度。雖然毛澤東看來沒有像以往在朝鮮戰爭、農業集體化和“百花運動”的決定中那樣發揮個人的主動性，但毛澤東這時在把重點更明確地轉到改造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在1953年夏的一次重要的財經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幾個問題，其中包括對富農的讓步和在發展社會主義農業時的猶豫不決。但是與高崗事件（下面討論）糾纏在一起的最尖銳的問題是新稅制，它在1952年12月被財政部長薄一波所采用，旨在減輕私人資本家的納稅負擔。毛澤東宣稱，它的基礎是“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30]](#_30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

對薄一波的抨擊可以用來警告其他有類似觀點的人，以使他們了解加快變化過程的必要。這個警告是有效的，沒有引起破壞，因為號召的政策轉變是比較溫和的，而且毛主席強調了既防止“右”又防止“左”的傾向的必要性。此外，對薄一波問題的處理是為了黨的利益而限制精英沖突的一個例子。在會上，毛澤東宣布薄一波的錯誤不是路線錯誤，并號召團結。雖然薄一波作為財政部長下了臺，但是過了一年多一點，他又被指定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重要的經濟職務。

到1953年，中共已經積聚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賴以開始的大量資源。從經濟上說，到1952年后期，70%—80%的重工業和40%的輕工業為國家所有。國營貿易機構和合作社的營業額占總營業額的50%以上，同時政府在其他部門所起的杠桿作用，由于合營企業和整頓過的工會的發展而增強了。從組織上說，除了從培訓工作和群眾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大批干部和積極分子外，由于始于1951年和在1954年初期結束的“整黨和建黨”運動，中共已加強了力量。這次改造和吸收黨員的運動清除了約10%的中共黨員（約58萬人），他們或是與敵對階級有聯系而受到腐蝕，或是對黨綱完全缺乏信仰或認識；同時，這次運動以比較慎重的態度吸收了約128萬名新黨員，從而到1953年年底黨員總數達到了650萬。

到1952年后期，中共在另一次有關組織方面的運動中已擴大了它的組織網絡，覆蓋了大部分城市居民和部分農民。除了1951—1952年的運動所起的作用外，黨通過逐街發展居民委員會，把它的控制擴大到城市的基層，這個過程最后在1954年成形。同時單位之間的連接進一步加強了中共在城市中的組織方面的控制。通過對大部分官方機構的工作人員提供工作、宿舍和社會交往的條件，以及通過建立正式的政治儀式，其中包括全體單位成員參加的諸如學習文件和在小組中互相批評等有指導的活動，單位就成了政治控制的強大的力量。

此外，最初在1949年作為全國性團體而組織的用來教育和動員主要民眾群體的“群眾組織”已經具備很大的規模。到1953年，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已經發展了900萬團員，工會會員達1200萬人，婦聯至少有760萬人正式登記參加。雖然這些及其他的群眾組織在其實際活動中常常是被動的，但它們仍然是提供與黨的政策保持接觸并具有某種民眾參政意識的引人注目的機構。毛澤東在1955年指出，這種“絕大多數……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的組織規模在幾千年中從未出現過。但是，他宣稱，結果是這種情況已經使人們常哀嘆的中國的那種“散沙狀態”變成了全國的統一。[[31]](#_31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

在集中這些資源發展經濟時，中共贏得了被改善生活條件和提高國家榮譽的諾言所吸引的人民的真心支持。在領導集團內部，他們一致同意計劃建設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法——它不但是意識形態上的選擇，而且比“混亂的”資本主義發展更有效率。強調計劃工作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它在經濟目標和社會改造之間創造了一個關鍵性的連接紐帶。規劃中的所有制形式的改變，不但剝奪了可疑的階級的財產，而且能使國家直接控制經濟資源，沒有經濟資源，計劃工作就不起作用。這樣，雖然對這個連接紐帶的確切的性質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但是在不但要現代部門社會主義化，而且要農業社會主義化這一點上是根本一致的，因為用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的話來說：“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業經濟和集體大農業經濟的基礎上。”[[32]](#_32___Guan_Yu_Fa_Zhan_Guo_Min_Ji)在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對中共領導來說，在經濟目標和政治目標之間顯然沒有根本的矛盾。

計劃精神的另一個結果是在生活的一切領域中推動了正規化。在總的制度方面，這個結果表現在1953—1954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及1954年召開大會時它通過的正式國家憲法上。從行政上說，正規化意味著集權化。1952年后半期設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和新的負責經濟的部，大區的各種權力隨之縮小，而另一些權力則直接收歸中央。后來在1954—1955年，大區的行政機構和相應的黨、軍機構被撤銷，理由是它們與計劃建設的需要不相適應。鑒于長期以來不斷地加強中央控制，這個解釋是有說服力的，雖然有跡象表明在時間選擇上可能受到高崗事件的影響。更廣義地說，正規化影響著使行政工作、組織機構、吸收干部、培訓和工資等方面法規化的大量活動。到1955年，新的體制表出現，以使以前各不相同的行政建制規范化；協調有關司局工作的辦公室被設立；新的記錄保存制度和會計制度被采用，以提供全面計劃的基礎；干部任用的程序完成了從專門培訓班和個人推薦向正式的學校制和正規鑒定的做法的過渡；以往現金工資和供給制不協調地混合實行的辦法讓位于不同類別國家工作人員的固定的和十分連貫的工資級別。一項有特別意義的發展是1955年采取的一系列軍事專業化的措施，包括采用肩章領章、軍階和工資等級，這些措施顯然大大地改變了解放軍的不正規的和平均主義的傳統。很明顯，新的計劃社會包含著與中共革命歷史不相符合的因素，但是沒有什么證據能證明，在那些滿懷希望的日子里，黨的領導人對這些不一致的現象表示特別的關注。

計劃經濟建設的開始還加深了蘇聯模式的影響；毛澤東在1953年初期說道：“我們要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33]](#_33___Ren_Min_Zheng_Xie_Di_Yi_Ji)從1949—1950年或更早開始，中國的部分情況是，模仿蘇聯模式，學習蘇聯理論，聘請蘇聯專家在關鍵的部、企業以及軍事、科學和教育機構擔任顧問，派中國學生和專家去俄國，翻譯出版大量的蘇聯教科書；但是即使是原始的中央計劃工作的出現，也大大地提高了這些現象的重要性。當然，決定性的因素是斯大林式的經濟戰略，它表現為高的再投資率，著重資本密集型的高技術項目，把農業作為發展工業的一個重要資金來源，優先向重工業投資。雖然關于計劃的細節和計劃內資源的分配問題繼續有爭論，但當第一個五年計劃在1955年遲遲地制定出來時，它原則上緊緊地仿效蘇聯的模式。蘇聯對成為計劃核心的現代大工廠提供的財政和技術援助也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蘇聯政府的模式和援助的重大影響沒有消除中國的獨立思考。有的部討論了由于倉促地采用蘇聯模式而引起的問題；在中國官員感到特別擅長的一些領域，他們因抵制蘇聯模式而為人所知。可是在與現代部門打交道的許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官員和專家中間，總的趨勢卻是另一種態度。毛澤東在后來抱怨說：“在許多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不管（蘇聯）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聽了都奉行。”[[34]](#_34___Zai_Cheng_Du_Hui_Yi_Shang)但是在1953—1955年的時期，最高層很少有改變這種狀況的跡象。

#### 高崗事件

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開始后不久，中共發生了1949—1957年時期唯一一次重大的清洗領導的事件。1954年初期，撤掉高崗和饒漱石在黨和國家內的重要職務，一年后隨之又把他們正式開除出黨，這不但標志著此事是這一時期最嚴重的上層沖突，而且是性質不同于其他精英摩擦事例的沖突。這些重要人物都屬于政權中最有權力的人：高崗是政治局委員、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首腦、東北黨、政、軍的最高官員；饒漱石是控制高級任命的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部長、計劃委員會委員、華東的最高黨政領導人。東北和華東的七名較低級官員也與他們一起被揭露，而“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把十幾名高級的中央和地方領導人與這個事件聯系起來，不過可信的程度不同。

長期以來，高饒事件一直是中共黨史中最模糊不清的篇章。當代材料的數量和內容都有限，而且這個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只受到較少的注意。在缺乏大量情報的情況下，許多分析家們提出了推測性的解釋，強調諸如可能產生的政策分歧、地方主義、所謂的高崗與蘇聯的關系和毛澤東的健康等因素。[[35]](#_35_Dui_Gao_Rao_Shi_Jian_Zui_Xia)雖然這些解釋多少是適當的，但都不充分。幸運的是，毛澤東死后新材料變得可以到手了，以至能對一度危及黨的來之不易的團結的政治權術作出更詳細和精確的了解。[[36]](#_36_Yi_Kao_Mao_Ze_Dong_Si_Hou_Ca)

高饒事件的實質是他們試圖把劉少奇和周恩來從中共的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拉下來。主要的目標是劉少奇，他作為公認的毛澤東的接班人，是高崗實現野心的主要障礙。雖然高、饒二人在正式的黨的會議上耍過花招，但他們基本上是在組織外面進行活動，并且與政權的最高級人物私下談判。當1955年官方宣布這個事件的結論時，他們的活動簡直可以稱之為“陰謀活動”和為加強個人權力而進行的“無原則”活動。

從1953年6月至12月與所進行的這些活動的直接有關的情況，既包括當時已在進行的集中化和正規化過程，又包括圍繞貫徹新的總路線的爭論。前一件需要考慮的事情涉及組織機構的變化，從而涉及在新機構任職的人員的變化，這是為了適應計劃經濟建設的需要。除了新的國家機構外，還正在醞釀召開八大，會上需要選舉新的黨領導。這種形勢所包含的權力再分配的可能性在年末增大了，當時希望減輕其職責的毛澤東提出了把領導分成兩線的問題，以便讓其他人分擔他的一些責任。第二件事，即涉及總路線的爭論，意味著政策討論是在隱藏分裂的政治氣氛中進行的。雖然政策的分歧事實上是比較小的，但對有野心的政治家來說，存在著試圖把分歧擴大為路線問題的機會。

如果這些形勢造成了沖突的可能性，那么高崗奪權的關鍵因素是他對毛澤東態度的估計。雖然據報道高崗不愿意離開他的地區權力根據地，[[37]](#_37_Ba_Chi_Da_Qu_Quan_Li_Shi_Gua)但他在1952年后期來到北京時，他既擔任了計劃委員會的領導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權力，又重溫了他與毛澤東的親密的私人關系。在延安時期，高崗與毛主席友好相處。毛澤東尊高崗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認為他是一個善于掌握基層實際情況的地方干部。兩人還很合得來。1949年以后，由于高崗在東北的成就，毛澤東對他的印象更為深刻，認為他是能夠加強中央委員會工作的一個干練的領導人。對高崗的這種贊賞態度與對劉少奇、周恩來工作的某種不滿——特別是他們在經濟建設和發展農業合作社方面所持的態度比毛澤東期望的更為謹慎——是一致的。毛澤東在1953年初期與高崗的幾次私下談話中表示了這種不滿。不管毛澤東的意圖是什么，高崗把這看成是一種信任他的信號和反對劉和周的機會。

助長高崗野心的另一個明顯的因素是蘇聯在斯大林死后接班的最初結果，年紀較輕的馬林科夫取得了領導大權，盡管資格更老的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也有此權力。通過對比，高崗從表面推斷，他可以取代代表中共領導人中稍老一代的劉和周。到了這時，高崗已得到饒漱石的支持，后者已相信，高崗上升的地位是他取代劉少奇而成為接班人的一個前奏。饒漱石不愿支持失敗的一方，盡管他自己與劉少奇在歷史上有聯系。事實上，歷史關系反而更使饒漱石接受高崗的奉承，因為在中央組織部中的饒漱石的副手安子文與劉少奇的關系比他與劉少奇的關系要親密得多。饒漱石顯然感到自己沒有完全控制他的新職務，這樣就助長了他在反劉少奇活動中與高崗同舟共濟的意愿。

雖然1955年和毛澤東死后的官方結論都聲稱高、饒陰謀活動沒有任何政策內容，但嚴格地說，情況并非如此。高、饒沒有提出自己的全面政策綱領，但他們確實利用了圍繞著新的總路線的爭論去攻擊其他人的政策。關鍵的事例是1953年7—8月在財經工作會議上對薄一波征稅政策的攻擊。高崗首先發難，把薄一波的政策比作布哈林的和平改造。毛澤東似乎對高崗的理論非常感興趣，也參加了批評。但毛澤東不愿把這件事推到高崗含蓄地提到的極端，所以在會議結束時下了結論：不存在路線錯誤，至關重要的是捍衛黨的團結。但是，還不清楚毛澤東在這個階段是否了解了高崗活動的全部含義。正像后來9、10月組織工作會議上饒漱石攻擊安子文的事件一樣，高崗攻擊薄一波的矛頭實際上是指向薄的后臺劉少奇。總之，毛澤東似乎滿足于號召團結，沒有直接批評高崗。

高崗還設法通過與蘇聯建立良好關系來支撐他的地位。作為東北的黨的領導人，高崗自然與蘇聯的人員有密切的工作關系，但這些關系卻朝陰暗的方向發展。他顯然與駐東北的蘇聯領事館工作人員和莫斯科因公派來的柯西金發展了特別密切的關系。在與這些人討論時，高崗把劉、周二人描述為與自己相反的反蘇人物。后來，他一旦在政治上被擊敗，對這些聯系的揭露被用來制造反對高崗的輿論。雖然他與蘇聯的關系被視為不正常，但不能認為這就是在為蘇聯工作。有的西方解釋認為高崗是斯大林在東北的代理人，但與此相反，高崗顯然試圖在他加強權力的斗爭出現風云突變的形勢時依靠蘇聯。由于這個時期與蘇聯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聯系，莫斯科一方的贊賞的態度能成為一個政治上的有利因素。但是由于中共領導人對維護民族獨立的強烈使命感（對它再也沒有人比毛澤東更為強烈了），這是一場勝負難卜的賭博。結果，高崗與蘇聯人建立的關系在他的陰謀活動或他的垮臺中沒有發揮重要作用，但它仍是總的策劃中的部分內容。

比批評劉、周及其盟友的表現或追求蘇聯支持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答應高級領導人在新的高崗政權內擔任顯赫的職務，煽動其革命經歷主要在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反對在敵后白區工作的專家（如劉少奇和周恩來），以大力爭取對他事業的支持。后一件需要考慮的事情在即將來臨的職位再分派的背景中似乎有巨大的影響力。安子文草擬了一份據說劉少奇不知道的新政治局的名單，這給高崗提供了機會，名單少給了軍事領導人的名額，給白區人物以不應有的突出地位。從軍事干部的觀點看，主要的偏頗是安子文的名單包括了他白區的同事薄一波，但沒有包括杰出的軍事領導人林彪。雖然這些人能夠同意劉少奇作為第二號人物的地位（因他對革命事業作出許多貢獻），但對不顧解放軍領導人的利益而給予彭真和薄一波突出地位的情況憤憤不平。

以這些問題為武器，高崗在夏天南下度假，以爭取更多的人支持其事業。他通過饒漱石已經取得了華東，還有他自己的東北，所以他預計在六大行政區中，除了彭真和薄一波控制的華北外，能把它們全部爭取過來。在進行時，高崗顯然聲稱他已得到毛澤東的同意，這個做法——再加上安子文的名單引起的不滿——收到了效果。中南的林彪和西北的彭德懷都同意高崗的改組黨和國家、重新分配領導職務的觀點。高崗在與另外兩個關鍵的領導人鄧小平和陳云打交道時就不那么成功。雖然西南的關鍵人物鄧小平顯然發現，高崗的請求非得進行“正式談判”不可，但他最后拒絕談判，根據是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38]](#_38___Deng_Xiao_Ping_Wen_Xuan)被提出在高崗返回北京就擔任黨的副主席的中央經濟主宰陳云看來甚至比鄧小平更不接受高崗的請求。

當陳云和鄧小平顯然分別行動，提請毛澤東注意高崗的行動時，轉折點出現了。不管毛主席在年初與高崗進行個人談話時的用意是什么，他這時對高崗的“地下活動”表示憤怒。在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事態的發展達到了高潮，在會上毛澤東提出他要去度假，根據當時的做法，在毛澤東缺席的情況下由劉少奇負責。在高崗的活動透露給毛澤東以前，他出于幾個原因，已在計劃度假：健康不佳，希望對新的國家憲法進行思考，因他的一個兒子死于朝鮮而心情不佳。但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他向高崗發難；高崗提出輪流領導，而不要把權力交給劉少奇，并表示自己希望當黨的副主席，或是總書記，或是總理。毛澤東于是做了在財經工作會議上沒有做的事——對高崗進行尖銳的批評。這次會議，再加上他實行他的度假計劃和委托劉少奇組織1954年2月的強調黨的團結這一主旨的全會，有力地粉碎了高崗和饒漱石的計劃。

在結束這個事件時，團結的確得到了重視。毛澤東顯然希望高崗能被挽救，以便在將來擔負重要的責任，但高崗在2月全會期間試圖自殺，最后在1954年8月得逞。林彪和彭德懷沒有因同謀關系而受到處分；出現的另一種情況是，他們斷言他們因相信高崗有毛澤東的支持而受騙，這樣的解釋就被認為是足夠了。[[39]](#_39_Dan_Shi_Jin_Zhang_Guan_Xi_An)此外，修復安子文名單對團結造成的損害的必要性已被認識，于是林彪同鄧小平一起在1955年被提升而進入政治局。

高饒事件既說明黨的團結的重要性，又說明了它的脆弱性，人們從中可以吸取幾個教訓。從政治上說，高崗不能指望與有巨大實力的劉、周二人較量。這兩個領導人不能隨便地被列為白區人物；他們的事跡與整個中共黨史中的重大經歷，包括根據地的武裝斗爭是分不開的。的確，劉少奇，特別是周恩來，與解放軍領導人的接觸，要比高崗廣泛得多，高崗在1935年以前的南方革命階段沒有發揮作用。可是高崗盡管有這一內在的弱點，仍設法贏得了中國六大行政區中四個區的支持。當軍人在新領導結構中的名額有可能減少時，黨的團結開始受到損害。另一方面，陳云和鄧小平維護黨的團結的使命感，對打亂高崗的計劃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些人珍惜黨紀，反對高饒進行的那種秘密派別活動；他們擔心，如果這些活動得逞，黨會受到損害。

但是這個事件的最大的教訓無疑是毛澤東的關鍵性作用。毛主席對高崗的私下談話，不管談話的用意是什么，都助長了高崗的野心，推動了他的活動。毛澤東支持高崗最初的行動的說法，足以使高崗所試探的人遲疑或使高崗從他們那里得到支持。最后，當毛澤東與高崗面對面地交鋒時，陰謀實際上毫無抵抗就失敗了。毛澤東從高崗饒漱石的事件中顯露出，他是維護領導穩定的必不可少的支柱。但這個事件的整個過程也表明了他對黨的團結構成威脅的潛力。

#### 憲法和組織形式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了國家憲法，以代替1949年所作的臨時安排。嚴格地說，這不是一部永久性的憲法；它的目的是滿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需要。但由于這個時期的長期性，人們預料它會延續很多年。憲法明確地維護與過去的延續性：“這個憲法以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基礎，又是共同綱領的發展。”[[40]](#_40_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除了共同綱領中的統一戰線立場外，憲法與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制定的機構安排在結構上有某些基本相似點。但那些安排相對地說是不夠的，所以憲法制定了遠為明確的國家結構。這些重大變化反映了1949年大局未定的形勢和進行計劃發展的新時期之間的差別。1949年許諾的、理論上是最高國家權力機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時正式建立了。

具有更大政治意義的是，在最初幾年出現的從軍事統治向文官統治的轉變也正規化了。例如，根據組織法，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形式的軍界原來與政務院平級，直接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領導。但這時，國防部成立，置于新的內閣國務院之下，與其他34個部和委員會平級。

雖然毛澤東在1954年中期宣稱憲法“是以自己的經驗為主，也參考了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的好的東西”，[[41]](#_41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但事實上這部憲法基本上遵循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的模式。基本結構包括從地方到全國的“選出來的”各級代表大會，它們在理論上任命各級政府行政機關。這些行政機關在法律上對任命它們的代表大會和上級行政機關都負責。此外，一個表面上獨立的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司法制度也建立了。

這一切，以及所列舉的類似的公民權利和義務，都可以在1936年的蘇聯憲法中找到。在確實存在的差別中，有的——如中國人不能保證蘇聯選舉制度中全民平等和直接的秘密投票——被歸因為條件比蘇聯落后這一事實，而且的確常常反映了更早的1924年蘇聯憲法的條款。但在少數幾個重大事例中，中國的領導人顯然因不合國情而沒有接受蘇聯的做法。例如，少數幾個國家機構和職務在蘇聯是沒有的。最重要的是設立一個顯然獨立的、十分顯著的國家主席（結果毛澤東擔任），而不是簡單地依靠代表大會制（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最高級官員履行國家元首的職能。在這一點上，中共領導正在采用帝國時期的做法，像在他們之前的國民黨，他們顯然也感到中國的傳統需要這樣一個職務。

新憲法有意識地擺脫蘇聯先例的另一個方面是拋棄少數民族地區可以分離的假設。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宣布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自治區是國家領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蘇聯，分離的“權利”可以追溯到革命以后的內戰時期，當時這是對付暫時控制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白軍和外國勢力的有效武器。此外，以后幾十年少數民族發展到蘇聯人口的一半的事實使撤銷這個“權利”既不適宜，也無必要。在中國，這個問題在本質上就沒有那么大的危險性，因為少數民族只占總人口的6%。但是這仍是一個關鍵性問題，因為少數民族地區占全國領土的60%，它包括最具戰略意義的邊境，蘊藏著大量礦藏和畜牧資源，又是共產黨之前的歷代政權全神貫注的重大目標。

在歷史上，漢族通過吸收妨礙他們的“夷狄”少數民族或把它們趕走，已經擴大了他們從華北平原向外發展的控制范圍。怎樣對付這些“夷狄”于是成了帝國政策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個政策最突出的一點是進行最低限度的控制；它的目的無非是不侵犯和取得向帝國朝廷效忠的含糊的保證，另一方面則盡可能少地干涉地方的生活方式。與此相反，受西方民族主義觀念影響的國民黨政權采用了不承認少數民族自治的更具有同化主義色彩的方法，但是這個政權的內在弱點迫使它妥協，或者制定疏遠少數民族而不是對他們強行控制的政策。

當中共執政時，它有避免國民黨這種無成效的做法的動機，但它的長期目標所需要的不僅是最低限度控制的帝國政策。如同其他事務那樣，中共領導人認為蘇聯的做法是適當的模式。雖然沒有搬用分離“權”（它的確早在1938年就被拋棄了，這很可能是對共產黨員在長征時遇到的少數民族的敵對態度和外國列強對獨立運動的鼓動的反應），但蘇聯關于“自治”地區的基本制度設想成了中國政策的基礎。從省到自治鄉一級的行政區劃被授予“自治”地位，它們常常使用傳統的少數民族名稱；本地語言和文化在這些自治地區得到發展；少數民族人士被安插擔任官方職務，不過實權依然留在通常是漢族的黨的干部手中。

雖然自治的原則一直是蘇聯模式的一個不變因素，但中共賦予的內容更多地反映了20世紀20年代的溫和的蘇聯道路，而不是1929年以后斯大林時期的同化主義的方式。例如，它把重點放在“民族化”方面，這個過程不但包括采用少數民族的形式，而且包括吸收少數民族干部，以當地的方式大力訓練漢族干部，真心實意地與“愛國的上層人士”——既有地方威望和專業才能，從而又能保證與民眾的和諧的關系的傳統的領導——合作。

這些政策與尋求逐步加深中共控制的另外一些政策是有聯系的，后一類政策包括：發展與漢族地區的交通運輸聯系；漢族向有些，但不是全部少數民族地區遷移；謹慎地努力改善經濟環境而又不破壞地方的習俗；發展新的行政機關以代替傳統的機構；進行強調少數民族是中國偉大祖國的組成部分的政治教育；在大部分民族區按照漢族地區的發展形式進行社會改革，但鑒于當地條件，進行得更為緩慢。總之，中共的政策是設法將少數民族逐步地納入中國的主流；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根本改造，但在速度和方式上注意到地方的習俗和避免不必要的破壞。

中共運用這些政策，十分成功地把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并且開始了社會改造的進程，但是在歷來對漢族抱有敵意和有“落后的”社會結構的地區，這類努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緊張形勢。盡管采取相對溫和的途徑，但在50年代初期，當漢族干部因機械地應用中國的做法而疏遠了地方民眾時，關于“漢族沙文主義”的報道出現了。在始于1956年并在1957年的“百花運動”中有所擴大的放松時期（見第五章），官方大力鼓勵批評黨的缺點的行動招來了對漢族干部的不當行為和更主要地對自治的種種限制的大量攻擊，甚至引起了分離主義的要求。少數民族疏遠的最極端的表現是1956年四川藏族地區反對引進改革的叛亂。一個后果是難民大量涌進西藏本土，這些人后來成為范圍較大的1959年西藏叛亂的一個重要因素（見第七章）。很明顯，甚至1949—1957年的各項精心調整的政策也沒有消除對中國控制的抵制；但是總的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少數民族地區已經取得了遠比以往歷朝政權更為牢固的立足點。

從少數民族問題可以看出，在執行中的實際組織形式比憲法的規定更有重要意義；在這里，與蘇聯的做法既有相似點，也有重大的差別。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黨和國家兩種等級系統平行的制度，而在憲法中沒有提到的黨則是權力的最終所在。在這方面，中國制度更多地模仿蘇聯的正式關系，而不是斯大林的實際做法。對斯大林來說，黨在理論上雖然處于最高地位，但不過是包括實際上獨立的秘密警察（他個人可以利用它來保證他的統治）在內的幾個等級系統之一。在忠于列寧主義的中國，黨的領導有更具體的現實內容。最終決策權操于中央的黨組織——特別是政治局和書記處——之手，同時在地方一級，黨委比人民政府權力更大。黨的控制又因雙重身份而有了保證：主要的黨的書記又身兼行政要職；這種做法與蘇聯有幾個更明顯的等級系統（甚至在斯大林死后）的情況不同。的確，當用于計劃建設的組織形式正在控制中國時，蘇聯的黨才正在斯大林死后的俄國逐漸地重新樹立它的統治。

但是在另一方面，機構關系基本上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蘇式的中央管制經濟需要一整套能加強國家結構的相對地位的中央集權的做法。雖然黨對政策的最終權力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大量與經濟管理有關的行政決定由國務院及其下屬機關作出。占支配地位的行政形式是垂直統治，即現代部門的單位直接置于中央各部的領導之下，這樣就繞過了地方的黨委。當毛澤東宣布“中央委員會抓只包括革命和農業的大權，其他的權力歸國務院”時，他敏銳地抓住了這種情況的要點。[[42]](#_42___Zai_Nan_Ning_Hui_Yi_Shang)在中央一級，日常工作的決定日益落到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蘇聯模式所需要的專家手中，中央的行政官員直接控制下屬各級的技術人員。這不但支撐了周恩來的地位，也支撐了像陳云、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等主要經濟官員的地位。

在現代部門的基層單位，即工業企業，這種情況常常使黨組織處于相當靠邊的地位。廠黨委會經過最初一段十分混亂和不一致的時期以后，到1953年的趨勢是把它們的職能限于教育和宣傳方面，而廠長則負責全面的經營管理。下面將要談到，這種情況到1956年有了變化，但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初期，廠黨委會常常不過是企業內另一個職能組織。總的說，黨依然高于一切，但是在1953—1957年期間，國家的權力常常超過了特定的黨組織的權力。

國家機器的另一個關鍵部分——法院、起訴人（檢察員）和警察的“政法工作制度”——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雖然它在幾個重要方面違反了斯大林的做法。如同蘇聯一樣，法院和檢察院不但在憲法上被宣布為獨立，而且到1954年它們采用了使它們享有很大程度職能自主權的蘇式行政做法。作為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全面地強調正規化和專業化的部分內容，這些機構，以及理論上屬于公安部的政府組成部分——警察，越來越多地處理個別案件，而不受地方的黨委會或政府委員會的干涉。當然，政法部門最終要服從中共的權威，這表現在基本政策由中央的黨組織制定，而且這些政策緊密地與官方路線的總的目標相配合。此外，地方黨委會對這個敏感的領域保持總的監督，這樣，當一些部門試圖樹立國家政策準許的自主權時，有時就引起了與這些黨委會的摩擦。

警察顯然是政法部門中最重要的。雖然有關公安機器的確實情報十分缺乏，但它從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起作為一個維持公共秩序和控制的工具，顯然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除了一般的警察職能和作為政治警察的不明確的角色外，公安力量管理一個巨大的懲罰系統，包括關押人犯無疑達數百萬的勞動營，并且為國家提供了可觀的經濟資源。[[43]](#_43_Sui_Ran_Guan_Yu_Zhong_Hua_Re)警察掌握這樣的資源，需要黨的牢固的控制。前面已經指出，毛澤東不像斯大林，他提出要確保警察不會作為能夠破壞黨和國家機器的完整的一個獨立的高壓機器而活動。在1955年的反對反革命的運動中，黨組織又像1951—1953年的行動那樣實施嚴格的監督。對警察的日常控制由公安部長羅瑞卿負責，他是黨的高級官員，但地位低于政治局委員。羅瑞卿直接向毛澤東和彭真報告，彭是與政法工作關系最深的政治局委員。[[44]](#_44_Wai_Guo_Guan_Cha_Jia_Ceng_Tu)雖然領導公安機關無疑會給個別人物提供有利于精英內部斗爭的有潛力的強大工具，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條件下，它是一種其用途受到嚴格限制的資本。

雖然黨和國家的等級系統顯然是最為重要的，但是各種群眾組織也起著一種重要的輔助作用。這些團體是按照列寧的“傳送帶”的概念成立的。雖然傳送帶發揮著向黨的領導當局反映它們成員觀點的作用，但是根據列寧和斯大林的做法，它們的主要職能是向它們所代表的群眾灌輸黨的各項政策。在新中國成立的初期，在最重要的群眾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中曾就這兩種作用的相對重要性進行過一場有重要意義的爭論，但是問題在1951年底得到解決，正統的蘇聯做法占了上風。

在這場爭論中，顯然以李立三為首的工會中的許多人爭辯說，不論在私營企業或是國營企業中，工會對資方或廠方已經變得太唯命是從了，結果就疏遠了工人。這些干部堅持，工會的基本任務是維護工人的利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一定程度的業務自主是必要的。1951年底，黨的領導人進行干涉，指責這些觀點是“經濟主義”和“否定黨對工會的領導”，1952年在改組最高層的工會干部時，李立三的工會領導地位被取代。雖然李立三個人的挫折是有限的（他保持了勞動部部長和中央委員的地位），而且也許與他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曾是毛澤東的主要反對者之一的事實有關，但是這個事件的最后結果是使工會組織牢牢地依附于黨的領導。這種標準的蘇聯做法也應用于其他群眾組織，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甚至變得更加明顯，當時所有團體實際上都把它們的活動集中在實現計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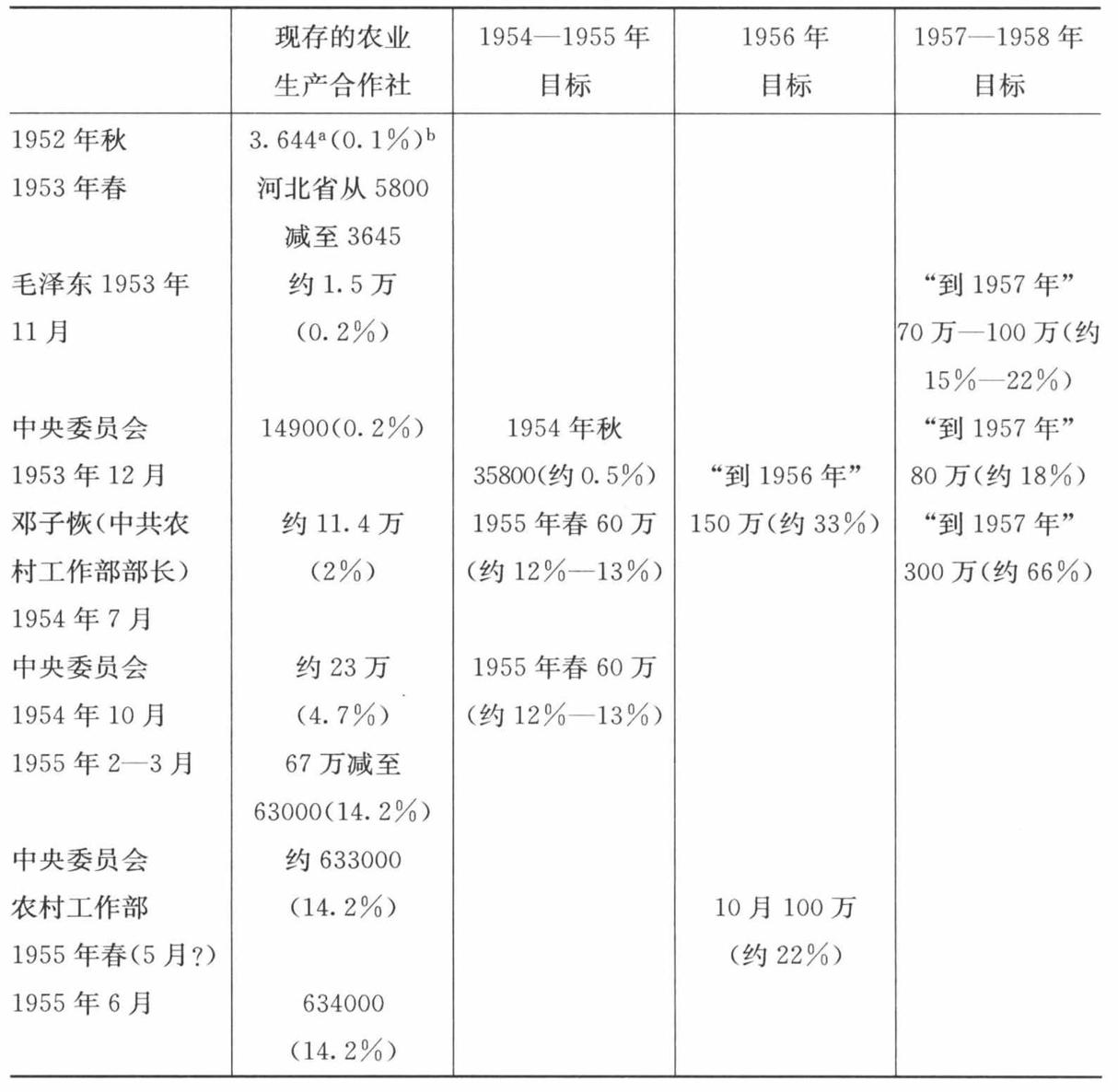
#### 農業合作化

1956年底農業合作化的勝利完成，從以下幾個方面說是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首先，它是把絕大部分中國人置于社會主義組織形式之下的社會和制度改造的一個巨大成就（這個任務從根本上說比現代部門的社會主義化更加困難），因此僅根據這個理由就需要對其成就進行詳盡的考察。其次，雖然二十多年前的蘇聯集體化在許多方面是合適的經驗，但是中共領導人發展了他們自己的途徑和方法，這樣造成的破壞過程就遠不如俄國發生的嚴重。此外，作為一項政策分歧，合作化是領導內部熱烈辯論的問題，雖然這些辯論并沒有從根本上損壞黨的團結。最后，這個分歧的解決是毛澤東在1955年中期呼吁加快農業合作化步伐的個人倡議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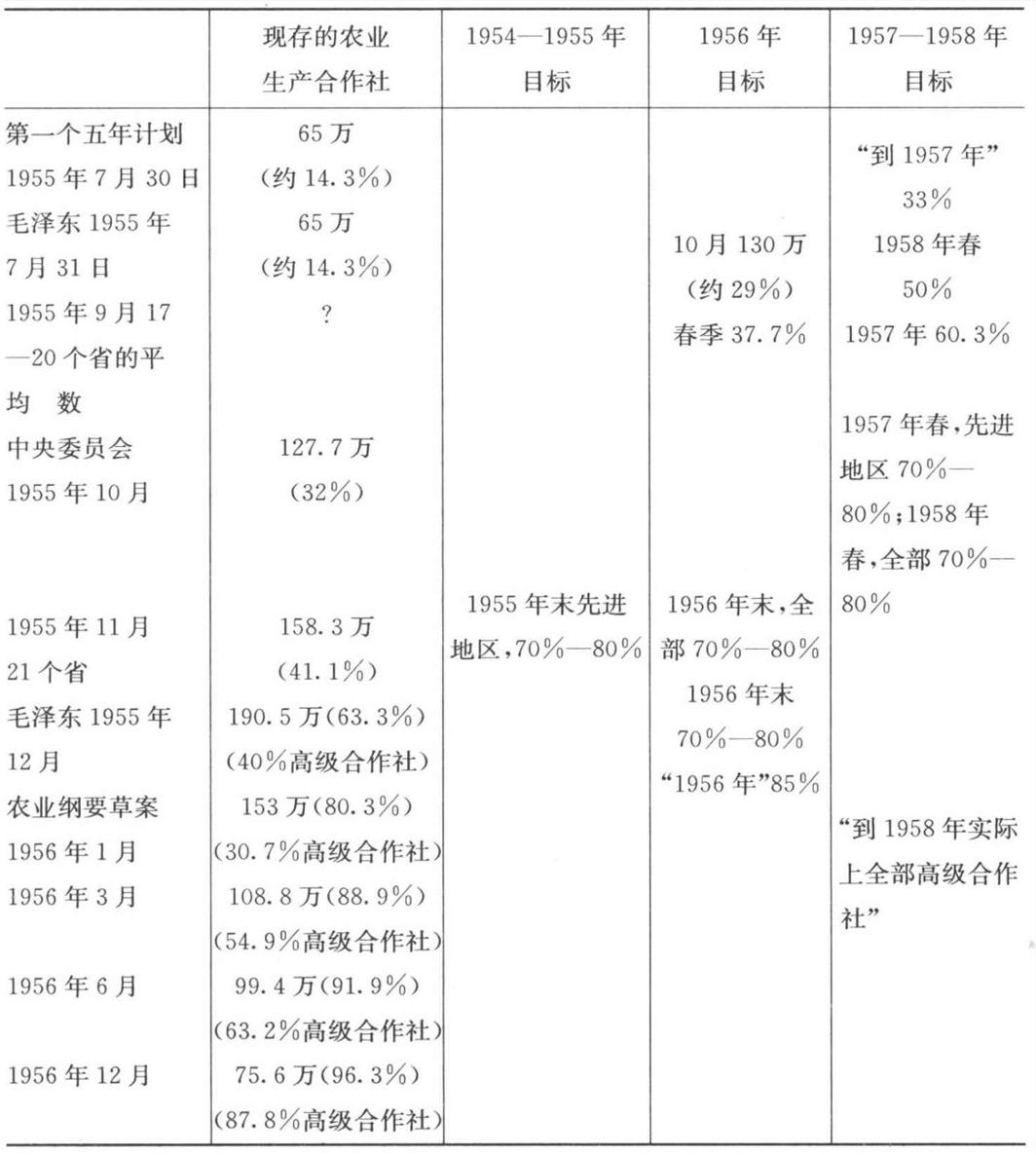
正如副總理陳毅所述，毛澤東的干預“解決了過去三年的爭論”。[[45]](#_45___Ren_Min_Ri_Bao_____362__19)最后，合作化完成之快，遠遠超過了以往的想象，雖然它的步伐也大大地超過了毛澤東的預計，而且有些方法常常違背了他的指導方針。總之，人們普遍把1956年后期農業部門幾乎全面社會主義化的成就既看成是黨的偉大成功，又看成是毛澤東個人為之辯護的結果（關于這個發展的更具體的經濟分析，見第三章）。

朝社會主義化的農業發展的行動甚至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華北根據地，隨著互助組——農民勞動力合伙經營的安排方式——的發展就已經開始了。1949年以后，互助活動在新老解放區發展起來，這樣到1952年底，全部農戶的40%左右都組成了互助組。同時，試驗性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被建立，但它們在1952—1953年才大量出現。從1952年直到1955年毛澤東進行干涉時為止，合作化的速度幾次加快和放慢。如表1所示，在1952—1953年及1954—1955年的兩個冬季，合作社的登記數激增，但各在下一個春季，增長率降低，并且有的合作社解散。這種格局顯然與正在進行的爭論有關，但它也反映了無組織和計劃混亂、干部生硬的工作方法、由于想急于實現計劃而造成脫離富裕農民等問題。對比之下，在毛澤東干預下，運動不但越來越快地向前大發展，而且在1956年的春季出現了把合作社改組成高級的或完全集體化的組織行動，以開始一個新的鞏固時期。

表1 農業合作社：發展和目標



續表



a.農業生產合作社數；1955年12月前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后分成高級和初級合作社，1956年農業生產合作社數下降，這是由于高級合作社規模更大之故。  
b.（%）指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  
材料來源：史敬棠等編：《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657]，第989—991頁；《共產黨中國的農業合作化》[1]，載《當代背景材料》[735]，第373頁；《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139—140頁；《1955—1959年的共產黨中國》[186]，第120頁。

中國的政策包括了對蘇聯經驗的幾大修正。首先，合作化被計劃成逐步的、一個階段接一個階段的過程，而不是蘇聯采取的突然的和混亂的形式。中共的政策設想了三步走的過程：第一步為互助組，勞動力入股，但農民個人保持土地和其他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然后是低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性財產這時由集體控制，但每個農民根據他拿出的土地、工具和牲畜的多少分紅；最后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或者是完全集體化的合作社），這時取消分紅，嚴格地按勞取酬。

另一個重要的差別是限制而不是消滅富農的政策。與俄國驅逐和殺害富農的做法不同，中國的富農看到他們的經濟地位被不同的方式所削弱，而且被用作政治動員的目標，直到這個運動的以后幾個階段，那時他們才獲準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樣，雖然富農仍是階級斗爭的對象，但他們所受的相對溫和的待遇限制了蘇聯運動中突出的混亂和對經濟資源的破壞。

對農村局勢也有改善的第三個特征是，中共避免斯大林一心一意地強調抽調剩余農產品去支持工業化的做法。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嚴重地依靠農業對工業的支持，但中共領導人認識到，中國農村可以抽調的剩余農產品遠遠少于俄國的農村。結果，在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官方的政策著眼于增加農業產量，這樣既滿足了國家工業發展計劃的需要，又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雖然現在還不清楚實現這個目標的一貫性如何，但黨對農民生活的關心有助于減少抵制和爭取支持。最后，一個更嚴格的經濟和技術上的修正是1954年中期出現的一個政策，它規定，鑒于中國的落后的工業基礎，集體化應先于農業機械化，而不是兩者同步發展。

但是脫離蘇聯模式的實質性變化并不意味著對蘇聯經驗的全面否定。相反，不但對各種各樣的蘇聯著作進行研究以支持官方對合作社的立場，而且按照1935年模范集體農莊法的規定而發展起來的蘇聯集體農莊是中共基本采用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具體形式。此外，從發展過程看，蘇聯經驗給中共內部爭論各方都提供了教訓和支持的根據。那些為反對迅速發展而爭辯的人引用了斯大林在過頭行為危及蘇聯計劃時提出的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的警告。但是其他的人，如毛澤東在1955年7月則爭辯說，蘇聯的經驗表明，迅速糾正錯誤和按照更樂觀的進度完成合作化是可能的。

在1955年頭七個月爭論的關鍵階段的某些方面——其中包括毛澤東的決定性作用和爭論的性質——是清楚的，但是真正的政治形勢就比較模糊了。[[46]](#_46_Zheng_Wen_De_Yi_Xia_Xu_Shu_Y)前面已經談到，在1955年初期，在合作化對經濟目標及社會和政治目標的可取性上意見無疑是一致的；7月公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再次強調了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對計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較后的時期，還就集體化先于機械化這一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雖然對社會主義化過程究竟應走在機械化前面多遠，還存在著分歧。此外，對中共面臨的問題存在共同的認識。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大家普遍認為小農生產的繼續存在會產生農村資本主義，從而危及社會主義的鞏固。在經濟方面，所有參加爭論的人都認為，農業發展不能與工業化的計劃發展速度同步，這會危及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因為農業生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工業發展的速度。

由于沒有什么跡象表明任何主要的決策者主張按比率削減工業目標，怎樣增加農業生產就成了主要的關注點。爭論的中心是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速度。在這幾個月中，主要由中央委員會農村工作部及其領導鄧子恢，會同政治局的主要經濟專家陳云提出了一條謹慎的道路。這條道路不但得到劉少奇，而且也得到毛澤東本人的支持。鄧子恢著重指出了伴隨1954年及1955年春農業生產合作社迅速發展而出現的計劃雄心過大、干部過頭的行為和更有生產力的農民的失望等現象。按照這個觀點，如果農民的敵意還沒有嚴重到損害農業生產，那么就要求謹慎地鞏固現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到1956年秋目標為100萬個合作社的未來的適度發展速度。在實行這項政策時，鄧子恢命令解散兩萬個新近成立但組織很差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那些主張進一步發展合作化這一政策的人反對這條道路，理由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表明具備增加生產的能力，能夠更容易地為國家取得剩余農產品，還將遏制由于私有農業仍占壓倒優勢而似乎正在發展的農村階級分化的傾向。

前面已經談到，毛澤東最初支持鄧子恢的政策。3月，毛澤東提出了“停止，收縮，發展”的口號，這反映出在新的發展之前進行鞏固的重要性。但在5月中，毛澤東轉到了對合作化的步伐不滿的立場上，隨之發生了與鄧子恢的激烈的爭論。當鄧子恢堅持農村工作部提出的到1956年10月農業生產合作社達到100萬個時，毛澤東對這條消極的道路提出警告，并且堅持130萬個的目標。[[47]](#_47_Mao_Ze_Dong_De_Mu_Biao_Shi_T)前后考證，似乎是毛澤東在5月下半月的倡議，而不是學者們通常引用的他的7月31日關于合作化問題的發言，[[48]](#_48_Bu_Jie_Zhu_Yu_Mao_Ze_Dong_Si)在導致政策變化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農業合作社的數字不但在6月和7月再次增加，而且中央在5月份還發動了新的反對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它的一個重大目的是讓整個社會中反對集體化的人保持沉默。此外，由于在毛澤東發言以前的日子里出現了說服、改變立場或觀測的情況，像農業部長廖魯言和鄧子恢以前的盟友陳云這樣一些領導官員都旗幟鮮明地為集體化辯護。

毛澤東的始于1955年5月并在他的7月發言中達到高潮的干涉作為政策的創新，不如作為一個決定性的政治行動具有重要意義。從政治上說，雖然在以后14個月把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數字翻一番，大大地增加了運動的強度，但是毛澤東的計劃并不過于激進。它號召為新的合作社做細致的準備工作，容許農民退社，或者甚至解散不令人滿意的合作社，并且警告在合作化時既不要冒進，也不要膽怯。此外，雖然毛澤東的目標大大地提高了在此以前農村工作部所定的目標，但增加率不如1954年初期到1955年初期達到的比率，而且增加的絕對數只是稍大一些。的確，毛澤東為1956—1957年定的目標比鄧子恢在1954年中所作的預測保守。

但是如果說毛澤東的規劃不是過于激進，那么它的政治沖擊卻是激進的。毛澤東指出發展是思想意識上唯一正確的路線，以此結束了前幾個月的徘徊不前的局面。他在7月的發言中首先批評說：.“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49]](#_49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并在整個這個時期，給繼續持保留意見的鄧子恢戴上了“右傾”的帽子。面對毛澤東對這個分歧問題所下的尖銳的政治定義，幾乎沒有官員再堅持己見；大力實現合作化的運動展開了。

毛澤東的勝利首先無疑是由于他無可爭辯的領袖地位，但其他幾個因素也有利于他。一是他的規劃的相當溫和的性質和規劃的論據。雖然7月發言的政治調子是極為決定性的，但對調查數據的整理和嚴密的推論也具有相當大的力量。另外有助于毛澤東的一個事實是，他的規劃至少是在千方百計地解決農業部門所面臨的嚴重的問題，而更為保守的方法幾乎沒有希望突破這些問題。在政治上，毛澤東不是一個人在說話，而是表達了相當大的一部分精英的意見，這個事實給予他的建議一個重要的幫助，就像那些即使反對迅速增加的人也同樣認為農業生產合作社出于經濟和社會的原因是可取的這一事實給予的幫助那樣。雖然在以后幾年有人提出反對對鄧子恢使用“右傾”的標簽，但在當時對精英內部持不同意見的人采取的傳統的溫和方式也有助于使隊伍緊跟毛澤東。鄧子恢只被要求作自我批評和暫時削減權力，但從未喪失職位。最后，運動加足馬力，毛主席目標的超額完成似乎使相反的觀點受到了懷疑。

的確，到1956年底幾乎全部建立完全集體化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之舉，更多的是由于黨組織對運動的熱情貫徹，而不是由于毛澤東的規劃。中國整個農村的干部對毛澤東的發言及肅反運動造成的壓力作出反應，最后得出了“寧左毋右”的結論。從7月的發言直到1955年底為止，中國經歷了一個循環，即毛澤東和黨中央定出目標，各省超額完成這些目標，中央往上調整它的目標，各省再次超額完成。甚至在那年年底，毛澤東預計將再用三至四年才能基本上完成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高級階段。但是在1956年，各地再次大大地超過他的目標。不管怎樣，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曾在1955年謹慎地提出的分階段發展的政策被放棄。全部農戶的1/4以上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而沒有先組成互助組，一個越過低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廣泛趨勢總的說已經出現了。雖然毛澤東繼續在1955—1956年秋冬對“左”的過頭行為提出了警告，但他主要是為這種迅速進展而歡欣鼓舞。這種危險的高速度將引起1956—1957年中嚴重的調整問題，但是根本的體制上的突破已經完成。

相對地說，中國合作化的完成，遠比蘇聯合作化順利，但是除了公開的叛亂外，幾乎俄國所發生的一切農民抵制形式——退社、減少生產性投資和活動的水平、屠殺牲畜、散布謠言——都在中國出現了，雖然程度較輕。

各種不同的因素解釋了這種較順利的過渡。有意識地朝著漸進主義和緩和社會緊張形勢的方向修正蘇聯的做法，這當然是很重要的。農村有紀律的黨組織也是關鍵的因素，蘇聯在合作化時這種組織力量要薄弱得多，甚或根本不存在。縣一級的堅強的黨委會有能力組織大批工作隊并指導村的根本變革。尤其重要的是中共在村內的存在。到1955年初，全部鄉的70%有黨支部，到年底則達到了90%。

這種農村精英的基礎是土改時期涌現的干部。除了這個基礎，還從以下兩種人中吸收新干部：合作化運動時期的積極分子，吸收的過程在1955年加強，并且日益集中吸收貧農；復員軍人，當解放軍在1954—1955年加強了現代化的措施時，就有可能使用這些人了。反復實行培訓計劃和向這支農村干部力量灌輸社會主義的原則也同樣重要。雖然在土改結束時存在干部尋求獨立耕作生活的明顯傾向，但這種傾向被不斷加強的努力——設法把一切官方任務與社會主義改造的觀念聯系起來——所遏制。決不能讓農村的領導結構像蘇聯在20年代所發生的那樣完全受小農生產的支配。

中國規劃取得相對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共精心制定的農村經濟政策不但給大多數農民帶來好處，而且也使全體農民除了合作外幾乎沒有其他的選擇。信用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以及糧食和其他主要商品的計劃購銷，都日益限制了富農的私有經濟機會，并把經濟資源優先納入合作部門的渠道，從而增加了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吸引力。

政策的制定明確地著眼于保護在1955年中期以前常常在農業生產合作中占支配地位的相對富裕并有生產能力的中農的利益。除此之外，基本的宣傳要求是強調提高生活水平，強調官方政策總的能力至少能避免生活水平的下降，盡管在1953—1954年的情況是由豐收到歉收，這就使農民有相當理由指望從農業生產合作社取得物質的成果。當1955年中期在豐收的背景下發動合作化“高潮”時，中共政權已在土改時期建立起來的經濟方面的可信性仍在為它起作用。

在土地改革及合作化初期，行政壓力、公式化的號召、強制和物質成果已經取得顯著成績，這幾方面的有力結合在“高潮”時期開始發揮作用。物質利益這時日益集中在貧農身上，以致使較為富裕的中農受到損失，這種情況與前一個階段明顯地不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取消土地分紅，意味著經濟資源在這兩個集團之間的直接轉移；由于較窮的人占絕大多數（估計占農民的60%—70%），一個要求變革的強大的利益集團形成了。公式化的號召仍然與繁榮的諾言緊緊聯系在一起，結果對窮人特別有吸引力，不過即使在這個集團內，那些猶豫不決的人也常常是被迫成群地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對生活較富裕的中農施加往往近似于強制的壓力，對包括某些富農在內的“反革命分子”使用了逮捕和群眾斗爭等形式進行徹底的強制。

在這一切活動中，干部仍然是響應這類壓力的動力。按照1955年晚期的吸收干部辦法而越來越多地從貧農中產生的村領導，同時也是各種教育活動的對象、帶有強制性的行政壓力的承受者和地方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轉變不但使干部像較貧困的農民那樣受益，而且減輕了他們的行政任務，因為他們再也不用計算制造不和的土地紅利了。這種轉變通過削弱中農還加強了貧農的政治支配地位。有著這個被高度激發起來的主要集團，有著大多數有理由指望取得物質收益的農民以及在嚴密的控制下處于不利地位但還沒有受到消滅威脅的集團，迅速的集體化證明是勢不可擋的。

#### 現代部門的改造和第一次躍進

到1955年秋，合作化取得重大進展的日益明顯的跡象容許毛澤東及其同事將他們的一部分注意力轉向對工商業的改造。“三反”和“五反”運動是在土地改革基本成功后才開展的。與此相似，隨著廣大的、難以控制的農村這時正在向社會主義迅速邁進，黨的領導人感到在現代部門中使用他們巨大的勢力的時機已經來臨。在此之前，關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速度的爭論與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速度的爭論相似。

有些人認為需要向前推進以利于中央的計劃工作，而另一些人則力主謹慎，理由是條件尚未成熟，過于匆忙的社會主義化將破壞生產和壓垮國家初步的計劃能力。但是在1955年秋，出現了全面的一致意見，即現代部門的社會主義化必須與合作化保持一致。雖然在1955年年中，社會主義化的工商業遠遠走在合作化的前面，但第一個五年計劃只號召到計劃終了時“較大部分”的私營工商業采用某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在這方面，它的目標是溫和的。

但從10月底到1月，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接見一些著名的資本家，表面上征求他們的意見，其實是為了加深他們對加快改造步伐的必要性的認識。在這些接見中，毛澤東如同他對農業合作社問題的態度一樣，警告不要過分冒進，甚至宣稱他比陳云更加謹慎，但是被邀請的工商業家仍舊抓住了這個本質性的啟示，很快保證支持加速的規劃。在這些保證的基礎上，訂出了到1957年底完全改造成公私合營企業的新目標。

以后發生的一切與超額完成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目標的情況相似，但其形式甚至更加令人吃驚。陳云組織了幾次省領導人的會議，以推動實現新的目標，但他很快被另一個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彭真的行動所超過。在12月，彭真訂出1956年底是北京完成目標的期限；在1月份的頭10天中改造完成。其他城市也不愿表現落后，到1月底，所有大城市中心的改造過程已經基本完成。很明顯，像這樣極為迅速的改造是膚淺的。它不是一種能使國家控制經營的精心準備工作中的一個規定的過程，而等于正式宣布所有制的改變而對人員或內部組織不作任何改變。為了避免破壞生產，國務院在2月初期下令，現存的經營活動在改造后的6個月內不變。接收存貨和經濟改組的實際工作是逐步進行的，并且深深地依靠私人資本家，他們的技能在干部依然嚴重短缺的現代部門中仍是需要的。

雖然從農業擴大到工商業的迅速的社會主義化是預料得到的，但是在毛澤東尋求經濟建設的“躍進”時，出現了一個不那么能夠預料的發展。在12月，毛澤東攻擊了廣泛的工作中的“右的保守思想”：“現在的問題……有農業的生產，工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面。在這些方面，都是存在著對于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的，都應當加以批判和克服。”[[50]](#_50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在1955年后期和1956年初期，毛澤東顯然看到了機會，可以像攻擊社會主義改造的落后狀態那樣攻擊經濟和文化的落后狀態。盡管毛澤東繼續提出防止“左的冒險主義”和“右的保守主義”的警告，但在他的7月講話到1955年底的這段時期內，毛澤東的思想出現了朝激進主義方向的微妙轉變。[[51]](#_51_Jian_Liao_Gai_Long_De___Li_S)這在他對一部論述合作化的著作的按語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他宣稱：“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如果“六萬萬窮棒子……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52]](#_52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

毛澤東在越來越多的問題面前，將很快從這種高度樂觀的立場后退，但在當時，在最高層的領導圈子內幾乎沒有值得注意的反對跡象。不管是因為對社會主義化的進展有真正的熱情，還是因為不愿意對一個意志堅決的黨主席進行挑戰，其他領導人都參加了大力推進中國第一次“躍進”的活動。

在1955年11月，毛澤東就具體政策，提出了若干旨在提高農業生產的長期措施，這些措施作為1956—1967年的12年農業發展綱要的草案而在1月份被擴充和批準。這個綱要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其中包括農業產量增加100%到140%，而毛澤東在前一個秋季曾對此表示過懷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規定農民勞動力和農村的財政資源應起主要的作用。但是綱要還特別強調科學和技術的投入以及物質刺激。在實現這個綱要時，與社會主義改造的情況相同的現象出現了——下級單位大大地提高綱要草案的目標，并且開始以盲目的、破壞性的方式來貫徹綱要的各項措施。與此相似的是，在毛澤東要求取得“多，快，好，省”這一結果的口號的推動下，各級官員都提高了工業和農業生產的指標，以便提前一年努力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不同的工業部把它們1956年的指標提高了25%或更多；周恩來提出糧食生產增加9%，作為這一年的最低目標；而有些鄉領導號召糧食增產40%。這也導致了經濟失調，因為行政制度再度證明自己對上面壓力的反應太敏感了。由“高潮”和“躍進”引起的這些失調和其他問題很快迫使領導層去注意它們，于是對它們的處理就成了隨之而來的調整時期的特征。

## 調整新的社會主義制度，1956—1957年

1956年初期出現的新方針建立在對中國基本情況的再估計之上。根據毛澤東1月份的說法，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引起了“政治形勢的根本變化”。[[53]](#_53___Zai_Zui_Gao_Guo_Wu_Hui_Yi)這種看法（在1957年下半年有了改變）反映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對生產關系——即所有制——的關心。由于生產手段這時主要由國營或集體單位所掌握，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勝利已經基本上決定。

許多有關的主張都來自這一分析。首先，雖然階級斗爭決沒有被消滅，但在新形勢下社會主義的敵人不再掌握重要的經濟手段，階級沖突將明顯地緩和，于是毛澤東在一年后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54]](#_54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其次，這種形勢要求黨的重點應基本上轉到經濟發展方面。毛澤東在1月份發動躍進時概括了這種新形勢：“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55]](#_55___Zai_Zui_Gao_Guo_Wu_Hui_Yi)但是這個新的重點不僅僅是經濟推動的產物；這一年的晚些時候，在躍進運動被放棄后，黨的八大確定經濟的落后是“主要矛盾”的中心。

第三個主張是，在新修改的統一戰線中可以把最廣泛的社會力量集結起來，以支持發展的努力。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口號下，領導集團不僅設法爭取社會中態度暖昧的社會成分的支持，而且鼓勵一切集團創造性地投入，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投入，這些人具有現代化所迫切需要的技能。最后，社會主義的勝利意味著一個不可避免地具有缺點和沖突——毛澤東稱之為“人民內部矛盾”——的新制度的建立。根據這個觀點，社會的緊張狀態主要表現為合法的利益差異，黨的任務是在完善社會主義新制度的同時，轉變為調停不同的經濟部門和社會集團的要求。

這些情況中的一個主要的創新是對待知識分子的新政策。在1955年，通過召開提出他們問題的座談會和獎勵最杰出的科學家，黨采取了爭取知識分子支持的步驟，但這些措施在反對反革命分子運動的背景下因打擊了諸如文學理論家胡風等人而受到了損害。但是在1956年，在更放松的政治氣氛中繼續采取接近知識分子的行動；政治氣氛的放松部分地是受到從1955年后期開始的蘇聯對待知識分子態度解凍的影響，但更主要的是受到社會主義改造后階級斗爭減弱的假設的影響。

1956年1月，周恩來在促進經濟躍進的背景下對新政策做了重要說明，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5月的講話中又采取了進一步的行動。周恩來主張增加工資，改善生活條件，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和資源，更快地提升和更容易地參加中國共產黨，而陸定一則解釋了毛澤東的新口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按照陸定一的說法，自由談論和獨立思考是避免學術上的停滯所必需的，對知識生活強加教條主義的束縛是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相對立的。

進一步的措施是大力維護在1949年被吸收進入統一戰線的小民主黨派的地位。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下，這些由知識分子、前國民黨官員和工商業者組成的黨派被敦促去批評政府的表現和發展自己的成員和組織。盡管氣氛更加寬松，但所有這些措施都因以下幾點而受到限制：重申黨的領導的原則，號召知識分子繼續進行思想改造，堅持對像胡風那樣的持不同政見的人的處理是完全正確的。結果，在整個1956年，大部分知識分子謹慎地響應，不過仍有足夠尖銳的批評致使許多干部采取了阻礙的態度，盡管最高領導大力推動這項新的計劃。

對待知識分子的新政策持續到了1957年中期，但經濟躍進與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步伐一起，到1956年春末造成了一系列需要作制度調整和政策糾偏的問題。到這時，中央的官員逐漸認識到了整個經濟中的種種失調和計劃混亂的現象，認識到了農民對實現農業綱要草案浪費力量和對新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僵化所流露的失望。從1956年4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957年夏，黨在一個稱之為“反冒進”的計劃中采取了各種措施——包括堅持現實的指標，強調計劃工作的協調性和產品的質量，在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框架內部擴大農民私人生產的范圍，重建有限度的農村自由市場，縮小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規模，嚴厲批評農業生產合作社干部強制性的工作方法——來對付這些問題。這個計劃的主要制定者是周恩來和陳云，而黨內領導經濟的官員的廣泛支持很快就形成了。

毛澤東則遠不是那樣熱心。雖然他無疑同意計劃的某些方面（特別是增加對農民的物質刺激），并在最初接受了遏制過頭行為的必要性，但到1956年中期，他顯然因收縮措施終止了生產躍進而感到苦惱。盡管如此，毛澤東并不想對新的計劃提出異議，而是在那些他自己認為是缺乏能力的領域同意他的同事的觀點。在采取這個行動時，毛澤東堅持了在1949—1957年時期他通常遵循的一致性的作風，但他仍懷有懷疑和遺憾的心情，這種情緒在發動“大躍進”時將起關鍵性的作用。

#### 修改蘇聯模式

當中共領導人為新形勢制定政策時，他們開始以一種更自覺的批判態度審查蘇聯模式。在此以前，毛澤東及其助手已經對蘇聯的榜樣做了重要的改變，并且發出了使蘇聯的經驗適合中國國情的一般號召，但他們并沒有在公開場合或在內部報告中細談蘇聯的缺點或中共的創新。的確，毛澤東晚至1956年1月仍公開表示中共不過是在蘇聯成就的基礎上進行發展，“我們現在講”的，并沒有什么新的觀點和理論”。[[56]](#_56___Zai_Zhong_Gong_Zhong_Yang)但是到那時，對蘇聯模式的系統檢查已在進行，這將很快地導致對蘇聯體制的缺陷進行鮮明而尖銳的批判。

這一切都將在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后中蘇關系趨于緊張的背景中發展起來，但這種緊張關系并非導致對模式的復查的根本原因。總之，在整個1956年和1957年的大部分時間里，著重點仍放在向蘇聯學習，但是以一種摒棄蘇聯實踐的落后面的有高度選擇性的方式去學習。

蘇聯是在遠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的工業基礎上起步的，可是只達到了似乎有點緩慢的發展速度，對這個事實的逐步加深的了解顯然為重新評價蘇聯模式創造了條件。這個活動包括政治局與34個中央經濟部門領導人的幾次討論，并導致毛澤東在1956年4月做了他的最重要的講話之一：《論十大關系》。如同毛澤東在后來所說的那樣，這次講話是根據前幾個月討論得出的總的結論，因此不僅僅代表毛澤東的個人觀點，它“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這條路線]原則和蘇聯相似，但有我們的一套內容”。[[57]](#_57___Zai_Cheng_Du_Hui_Yi_Shang)雖然在提蘇聯的缺點時涉及的范圍相當廣，但是在諸如農業等領域，中國的實踐一直有自己的特色。在毛澤東號召調整現行做法的一些領域，所提的變革也是溫和的，并且保留了蘇式的制度結構和經濟戰略。

中心的問題是以重工業為一方，以輕工業和農業為另一方這兩者之間的投資比重。毛澤東攻擊了蘇聯過于著重重工業的做法，但是又重申了對重工業對投放資金的要求是首位的，只要求“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58]](#_58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這一點在1956年6月的確做到了，當時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投資比例從8∶1略為減到7∶1；9月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出的建議稍為增加了農業投資，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相比，從7%增加到10%。

《論十大關系》的另一個主要關心的事項是經濟管理：“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59]](#_59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在這里，毛澤東也是謹慎的：他號召更多地與地方商量，在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要進一步調查問題。這里所設想的是一種擺脫垂直的部的控制而向“雙重領導”形式的轉移，在這種形式中權力由部和大區當局分享，但關于實行的方法，沒有明確說明。

國務院后來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討論怎樣限制過分的集中，而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出的各項建議把更多的建設項目劃給了地方當局。此外有人還提出了反對過分集中的其他辦法，這些辦法強調間接計劃（只作參考的標準）和市場機制的使用。在這個方面，陳云在1956年9月的八大上提出了一些建議，在以后的幾個月，對加強企業自主和在市場進行有選擇的采購的方法進行了試驗。但是在1957年1月，國務院決定計劃分配的基本形式將在這一年繼續實行，因為任何改變都需要解決復雜的行政問題，并且無疑還有許多經濟計劃工作者反對。與此相似的是，盡管在整個1957年經濟雜志上出現了關于分散方法的熱烈爭論，但在那一年秋季前沒有作出重大的決定。

在關于怎樣修改蘇式管理方法的整個辯論中，當時蘇聯的發展是一個促進因素，指出這一點很重要。蘇聯在1955年中期已經采取了自己的分散措施，蘇聯經濟學家關于必須克服中央計劃工作的各種僵硬弊病的觀點對中國的爭論的主要參與者有重要的影響。的確，甚至在中共遠不像經濟計劃工作那樣取法于蘇聯模式的領域，蘇聯的改革也起著有影響的作用。例如，黨領導人在最初采用了蘇聯的拖拉機站作為擴大農業機械化的方法。這些拖拉機站是訂立合同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服務的獨立實體，有許多不足之處，在工作時常常與合作社發生矛盾。1956年春當政治局委員康生代表中共參加東德黨代表大會時，對蘇聯和東歐拖拉機站的缺陷的批評，和蘇聯把拖拉機直接交由集體農莊管理的試驗已在進行。這個問題在那次大會上被廣泛地討論，康生回國后不久就立刻在中國進行調查。由此導致了11月的批判性的報告、1957年替代辦法的試驗和1958年終于把農業機械直接交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定，這一年，拖拉機站在蘇聯被撤銷。

修改蘇聯模式的另外幾個方面在1956年春季政治局討論中提出的另一個有分歧的問題——工廠管理制度——中表現了出來。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把最終決定權交給廠長的蘇聯的“一長制”在東北被廣泛地介紹推行。在1953年初期，這個制度向全國推薦，但沒有命令實行。1954年起，批評這個制度的氣氛日益加強，但也有人撰文為之辯護；在1954—1956年期間，在政治局作出決定之前，它作為企業管理的一種方式繼續被容許存在。在這個問題上一個起作用的因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缺乏足夠的有才干的人，以使一長管理能夠發揮作用。這個制度不但一直沒有在整個中國占優勢，而且甚至在東北也只是部分地推行。此外，黨的干部也存在嚴重的抵觸情緒，他們反對限制他們的權力，對這個制度使出身于可疑階級的廠長擁有大權深為不滿。

此外，這些干部有力地指責這個制度破壞了中共的黨進行控制和由集體作出決定的傳統，也就是說“只有集中，沒有民主”。這種論點，連同實行一長制時人才不足和前幾年被吸收進工業并受過工業訓練的黨的干部數量日增等現象，在領導決定實行新的制度以提高廠黨委會的權力使之高于廠長權力時，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向八大宣布這一決定時，負責工業的黨的官員李雪峰著重指出了黨的傳統的重要性。但是這個改變遠不是摒棄蘇聯的工業方法。的確，就在這個時期，蘇式的計件工資正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擴大實行。

在修改蘇聯模式時，使中共的傳統成為中心分歧問題的另一個領域是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到1956年，黨的領導人顯然感到政治傳統正在被蘇聯援助的現代化工作所腐蝕，于是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阻止這種傾向。這些措施包括：強化軍官的政治教育，加強解放軍內部的黨委會組織，攻擊過分專業化和過分重視軍階和軍銜的現象，增加解放軍參加生產的活動，削減高級軍官的工資，強調官兵之間的民主關系。用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的話來說，通過這些措施，黨的領導人要求保證，“現代化建設不能改變我們的軍隊是人民軍隊這個特點”。[[60]](#_60__Tan_Zheng_Tong_Zhi_Fa_Yan)但這決不意味著貶低軍事現代化。例如，譚政批評了拒絕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那些人的“游擊”作風；以非教條主義態度吸收蘇聯軍事經驗的必要性繼續被強調；現代化措施的勢頭持續不減；1957年底公布了五年內全部軍官專業化的規劃。1956—1957年調整的基本目標仍是現代化，但要在解放軍傳統的范圍內進行。這將在全體軍官中引起一定程度的緊張，但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并不認為這個努力中有內在的排斥性。

1956—1957年的其他政策轉變體現了對蘇聯模式的修改。特別在1957年，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放在中小型工業方面，這與蘇聯著重于資本密集型的大工廠不同。與此相似的是，在教育方面，成為蘇聯方式核心的那種培養精英的專科學院的發展也減緩下來了，并且又出現了重新重視社會興辦小型學校的情況（見第四章）。這樣，第二條低技術的腿正在取得日益突出的地位，但它只有在“大躍進”時“兩條腿走路”的口號下才成為中國發展戰略中的主要特征。這個規劃暫時顯然是從屬性的，并沒有對大規模的現代部門繼續占有的支配地位構成威脅。最后，對蘇聯模式的再審查體現了一種接受其他的外國思想源泉的新態度，新源泉不但包括共產黨的南斯拉夫，而且也包括西方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但是，事實上幾乎沒有這種折衷主義的借鑒，直到1957年后期，蘇式的結構和戰略基本上依然保持適當的位置。

#### 第八次黨代表大會

當1956年9月中共在11年的時期內第一次召開它的代表大會時，大會是以洋溢的自我慶賀和自我批評為其特征的。對1949年的勝利和對1955—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的確有充分的理由來慶賀。此外，黨在改造時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有1070萬黨員的龐大的組織，這時它已滲透到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許多方面。但是黨的領導人也認識到，它仍有許多任務有待完成，而且新制度中還存在許多缺點；所以這次黨代會的特征是對政權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坦率得驚人然而又極為自信的分析。

這次大會的政治決議所肯定的主要任務是繼續進行經濟發展的工作。為這個任務所定的方針路線詳細闡明了“反冒進”的主題思想，不過（也許考慮到毛澤東的情感）“右的保守主義”在官方所列應該避免的傾向中占有頭等重要的位置。周恩來宣布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反映了平衡、溫和和現實主義，但建議仍號召稍多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再投資比率。總的說，大會的綱領并不是一個后退的綱領，但重點肯定是放在穩步的發展上。

在許多方面，1956年的黨代表大會不像1945年的前一次代表大會那樣是毛澤東個人的勝利，1945年的那一次確定了他的黨的領導地位。在表面上，幾個事態發展降低了毛澤東的作用：關于他的思想是中共的指導思想的組成部分的提法從新黨章中被刪掉；大會大力強調集體領導。但是在1956年，出現了一些反對任何吹捧表現的因素，雖然毛澤東的地位基本上沒有受到挑戰。[[61]](#_61_Zhe_Ge_Fen_Xi__Can_Jian_Tai)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產生于國外的事件——赫魯曉夫在2月份的蘇共代表大會上譴責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在這些情況下，對中國領袖的任何過度頌揚是不適宜的，毛澤東后來聲稱，他完全同意從黨章中刪掉他的思想的決定。

第二個考慮的問題是需要有秩序地安排接班，這說明毛澤東既有自信，也信任他的助手。毛澤東后來的幾次陳述表明，他在八大上為他最后退居“二線”采取了幾個具體步驟，即不再為日常工作作決定，這樣他的同事就能取得足夠的威信，以保證他死后的順利過渡，從而避免成為斯大林死后蘇聯政治特征的斗爭。為毛澤東的最后引退設立黨的名譽主席的職位；通過委托劉少奇作政治報告（1945年毛澤東充當的角色）來支持劉少奇作為接班人的地位；建立政治局常委會和擴大的書記處的強有力的集體機構。這一切都不意味著毛澤東放棄實權。他在1958年初期說，當他為他退居“二線”提出新措施時，“在將來國家有緊急需要的時候……我還是可以出任這種國家領導職務的”。[[62]](#_62___Gong_Zuo_Fang_Fa_Liu_Shi_T)

與毛澤東的繼續統治有關的是領導穩定性的遠為廣泛的格局。這種穩定性不但反映在中央委員實際上全部重新當選這件事上，而且也反映在各級人事安排上。新的政治局常委會由組成原來的領導核心，即前書記處的五個人再加上青云直上的鄧小平組成。全部政治局的規模幾乎擴大了一倍，吸收了八大前的政治局委員，再加上原來不在政治局的解放軍的大部分元帥及除鄧子恢以外的全部副總理，鄧子恢顯然為他的合作化的觀點付出了代價。在最高集團內部，名次的排列有某些變動，但除了鄧小平的重要提升及張聞天（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的老對手）和康生降到候補的地位外，這些變動相對地說是次要的。

與此相似的是，全部中央委員的人數增加了一倍多，不但包括了原來全部正式委員，而且包括了除三人以外的全部候補委員，他們被集體提升。此外，新的中央委員會增加了一百多名新委員——大致1/3為正式委員，其余的為候補委員；可是這170人的組織的背景特點卻與1945年的中央委員會明顯地相似。

新的中央機構還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的組織格局。與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擴大同時出現的現象是，增選了政權的各個等級中的關鍵人物。結果，精英朝專業化發展的更廣泛的傾向被帶進了最高級的組織，從而使各大部門的觀點和利益都有人代表。特別重要的是，在政治局一級選進了負責經濟的三名主要官員：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財政部長李先念，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候補委員）；他們這時在極其重要的決策機構中與陳云一起工作。這些任命進一步證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制度的集權性，因為在北京任職的中央委員人數幾乎三倍于在各省任職的人數。最后，新的最高層精英的組成還反映了1949年以后朝文官統治這一方向的轉變和這個體制中黨的中心作用。在政治局中，專職的黨、政文職官員的人數以2與1之比超過了解放軍領導的人數，在中央委員會內則以將近3與1之比超過，中央委員會中專職的黨、政、軍領導人之比為6∶5∶4。

新中央委員會組織上的代表性是中國政治趨于高度官僚化的表現。長期以來，黨的領導人已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做法——官樣文章，機構激增，不直接了解實際情況而在辦公室作決定——持批判的態度；到50年代中期，他們日益意識到，他們建立的越來越專業化的行政機器對他們的選擇權的限制。盡管采取了重新建立控制的措施（包括把黨的干部調到關鍵的部任職，加強政府各部門黨委會的作用，批評過分專業化的傾向），各級領導人仍發現，他們的觀點日益受他們工作的機構的支配。甚至最高層的多面手決策人也不能自拔；毛澤東在1958年抱怨說：“政治局成了一個表決機器……你交來一份完整文件，就必須通過它。”[[63]](#_63___Zai_Nan_Ning_Hui_Yi_Shang)盡管毛澤東和其他人為之不安，但除了不另組成新的統治機構外，八大的議程以各種方式體現了官僚政治的全面興盛。

由于革命改造時期表面上已經度過和經濟發展已成為主要任務，大會聽取了各部門領導的發言，他們就如何完成更廣泛的目標陳述了各自部門的意見。與此相似的是，調整新社會主義體制的機構的需要產生了促進特定組織的利益的建議。在有些情況下，當一些決定不利于某個有關的機構時，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克制，但是即使這樣，仍有人為官僚利益陳述自己的意見。例如國防部長彭德懷就不能明確要求更多的資源，因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已經決定把國防開支從預算支出的32%削減到20%，但他仍強調了推行軍事現代化和加強防務的需要。

但是在政策未定的方面，要求本組織利益的呼聲常常是很強烈的。尤其地方黨領導人的發言更是如此，他們要求中央當局在資源和政策方針方面作出對他們有利的考慮。例如，山東的譚啟龍希望“中央的水利部門……在技術、投資等問題上給我們以支持”，還要求“中央有關部門在規定種植計劃時不要限制過死，使我們能夠根據……當地具體情況，進行合理的安排”。[[64]](#_64_Yin_Zi_Luo_De_Li_Ke__Mai_Ke)由于放松的政治氣氛和涉及工作的專業性，八大對表達大批官僚機構的觀點和利益來說，是一個合適的場合。

#### 整風和“百花運動”

對制度內部缺點的批評不但成了八大的標志，而且成了1956年春季以來大部分官方評論的特征，它預示著一個通過黨的整風運動來克服缺點的更系統的努力的來臨。在最初，這場運動仿效1942—1944年的延安大整風的形式，后者以近似說服的方式去反對黨內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的危險傾向，以使黨能夠更成功地與日本人和國民黨進行斗爭。此時此刻，隨著在社會主義時期新問題和新機會的出現，黨將以一種像“和風細雨”那樣的基調更低的方式進行整頓，以使它成為經濟建設中一支更有效的力量。

整頓工作的一個主要對象是“主觀主義”，這種落后的思想狀況表現為不了解變動的情況，以致使黨的干部武斷地把不適當的概念和方法應用于當前的問題。這時所批判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表現是教條主義地照抄外國（蘇聯）的經驗，所提出的糾正辦法是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總的理論水平，發展專門領域的知識，研究實際情況。

與“主觀主義”緊密相連的是“官僚主義”的罪過，它使官員脫離群眾和社會現實而成為一批享有特權的上層人物。這是特別危險的，因為黨員作為統治組織的組成部分，會去追求自己的好處而忽視人民的利益。為了防止這種弊病，需要各種形式的監督。

第三個受攻擊的主要弊病是“宗派主義”，這是一種黨員感到比非黨人士優越并在機關生活中歧視他們的傾向。對于有技術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百花運動”和互助監督政策就是為了克服這個弊病。

預示黨的整頓運動的具體步驟隨著1956年中期學習整風文件的計劃而開始，但是在八大會議上雖然經常攻擊三大弊病，整風仍不是優先討論的事項。國外的事件——波蘭的10月事件和未遂的匈牙利叛亂——迫使黨把整風放在更優先的地位。毛澤東后來聲稱，匈牙利和波蘭暴露的聽任問題惡化的危險使他相信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必要性，于是在1956年11月的中央委員會全會上，毛澤東宣布在“明年”進行一次溫和的整風運動。

但是，東歐的教訓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面，由于官僚主義的敗壞而出現的民眾動亂——這種情況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在1956年中國許多工廠的罷工中反映出來——有力地說明應該在事態失控之前處理這種偏差，因而加強了整風的重要意義。但另一方面，東歐這種局勢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控制已被腐蝕，中共在分析這些事件時把“修正主義”——對正統的黨統治的挑戰——引作主要的危險。持這種立場的人在關于黨的整頓方面力主謹慎，因此在1月份，黨宣布了在1958年而不是在1957年進行全面整風的決定。

毛澤東顯然用防止據認為在1956年下半年出現的“反社會主義浪潮”的警告來推動這種較謹慎的方式，但同樣明顯的是，他也不是要完全停止整頓活動，或者恢復對待知識分子的那些專橫的方法。但是在1956—1957年冬季，當決定性的更加束縛人的氣氛出現時，許多中上層官員和一般干部就是企圖這樣做的。

到2月份，毛澤東斷定，如果黨的整頓不致被完全侵蝕，就需要采取大膽的行動；于是他做了兩次重要的講話進行干預。在講話中，毛澤東恢復了1956年的基本上抱有信心的看法。勝利已經取得，主要的任務是注意制度中的缺陷。知識分子基本上是一支能對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忠誠的力量。國家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團結，缺點可以用非破壞性的方式予以克服。但是當毛澤東透露整風又定在1957年時，他又提出關于整風方法一些新的和令人不安的思想。不但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被定為批評的指導思想，而且知識分子被邀請在向黨提批評時擔任主要角色。這樣，“百花運動”就從鼓勵學術爭論的手段轉變為進行整風的一種方法。毛澤東設法使干部安心，表示知識分子的批評將是有幫助的，整風仍將按照“和風細雨”的方式進行。但是中共黨員直接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批評的前景，足以使全黨精英因憂慮而戰栗。

毛澤東的這種創新的方式遭到不少的反對，雖然對反對的確切情況依然不甚了了。[[65]](#_65_Yi_Xia_De_Fen_Xi_Ji_Dui_Xia)毛澤東在4月份自稱，90%的“黨內同志”對重新修改過的“百花運動”持否定態度，又補充說：“我沒有群眾基礎。”[[66]](#_66___Zai_Shang_Hai_Ju_Hang_Zhou)在日常負責管理知識分子的中下層干部中，的確出現了普遍的反對。這些官員的直接權力和特權搖搖欲墜，所以與更加超脫的最高領導的看法不同。由于擔心運動的過程會失去控制，這些干部不去鼓勵知識分子進行“鳴放”，而是不加區別地攻擊他們的批評意見。

在更上層，有充分理由認為，既負責宣傳“百花運動”、又組織許多進行“鳴放”的知識分子會議的黨的宣傳機器領導人對新政策不那么熱心。很明顯，中央委員會的報紙《人民日報》在響應毛澤東的倡議時落到了后面，結果受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這種明顯的抵制，可以用與下級干部的反對相類似的理由來解釋——作為平時負責管理知識分子的官員，他們很可能感到新方式的危險性超過了任何可能的好處。

政治局內部關于整風問題的沖突情況仍不清楚，盡管某些學者的分析認為毛澤東與他的同事有嚴重爭吵。[[67]](#_67_Ren_Wei_Zheng_Feng_Ji_Hou_La)當然，讓無產階級的黨聽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指責的這種創新的政策，可能引起黨的最高集團內部的爭論。有的材料聲稱，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和彭真反對毛澤東，但證據的總的內容卻無說服力。特別是彭真，他在公開的聲明中是“鳴放”的有力支持者，而劉少奇雖然在公開場合緘口不言，卻巡游各省，并在黨的內部會議上提出了與毛澤東一致的觀點。總之，即使在政治局內部表示了保留意見，它們并沒有使領導集團明顯地分化。毛澤東的權力及全體領導對在黨的會議內部可以自由討論但在黨外要有紀律地貫徹的義務這兩者結合，是抑制分裂的關鍵因素。其他的因素——對新形勢性質的廣泛一致；毛澤東沒有長期堅持推行可能形成反對派的那些激進的整風方法而是根據情況的變化而改變其立場的事實；最后，知識分子對毛澤東邀請的最初反應是有節制的，因此并沒有對黨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的事實——也起了作用。

知識分子最初不冷不熱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這是由于1951—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以來他們的思想意識已被重新塑造。盡管擔心放松之后壓力又會隨之而來，但他們最后仍對官方再三的推動和對1957年整個5月中那些大膽發言的人沒有受到大量涌現的反批評的懲罰這一事實作出了反應。從一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的批評基本上沒有危及黨的統治。大部分批評涉及與其作用和職能直接有關的問題和沖突。此外，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提出的批評與1956年以來官方媒介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教主義”的責難相似。甚至一些體制改革的建議，諸如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轉變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上院的想法，也反映了黨內最高領導人已經提出的想法。

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攻擊深深地令人不安。這與其說是由于某些意見（偏差可能是因某種原因而從制度內部產生的說法，甚至少數要求黨消亡的過激情緒）的結果，倒不如說是由于知識分子與黨的權威的日常對抗的抱怨情緒的升級和他們反映的不滿情緒的深度。從甚至上街陳訴其不平的學生行動中可以看出，情感的強度是很明顯的。通過集中攻擊黨的干部在其工作單位日常事務中的缺點，知識分子實際上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中是否有能力領導中國的問題。可是必須強調的是，這并不是對制度的否定。甚至幾名最直率的學生批評者仍支持公有制，歡呼毛澤東是“拯救中國的革命領袖”，并且向中共表示了即使是又恨又愛，卻是忠誠的態度：“我們需要黨的領導，但堅決反對黨單獨作出決定。”[[68]](#_68_Gen_Ju_Dan_Ni_Si__J_Du_Lin_D)“鳴放”的結果說明了對制度的主要綱要和中共建設新中國的綱領的繼續支持，但也表明有技能的集團對各種黨的統治的具體形式的嚴重不滿。到5月中，黨的領導對所發生的一切感到沮喪。在發展中已被委以重任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受到培養的學生的不滿程度使人深感苦惱。此外，黨的干部的士氣受到嚴重的打擊，因為他們被要求忍受批評的沖擊。

“百花運動”的試驗為什么失敗？說到底，失敗是由于對中國新形勢的某些根本性的錯誤認識。毛澤東假定知識分子本質上站在社會主義一邊，與制度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于是他斷定，他們甚至對像黨的整風那樣敏感的事情，也能作出積極的貢獻。這樣就沒有考慮到以下的事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以來，一直受到沉重的壓力；他們所設想的自己的利益常常受到嚴重的侵害；他們與黨的干部的關系特征是互不信任。當毛澤東把知識分子推到整風的前列時，他實際上要求他們執行一項不可能做到的任務：大膽地批評他們常常害怕和厭惡的黨的當權派，可是在批評時又要本著“和風細雨”的精神。

黨的干部也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上。實際上，他們正被要求重新確定黨的領導權力，要用過去從來沒有明確規定過的方式，去考慮非黨知識分子的觀點和才能。此外，他們本人也受到這些出身有問題和思想落后的人的批評，這種情況似乎是最不公平的。由于干部和知識分子之間潛在的緊張關系，任何加劇這些緊張關系的嘗試，不管是多么不自覺，必定會無法控制（進一步的討論見第五章）。

#### “反右運動”

雖然到1957年6月初期才發動直接的反擊，但在5月中，中共最高級領導人就作出決定，不受約束的“鳴放”正在不能容忍地削弱黨對知識分子的領導。毛澤東站在這個活動的前列，盡管他在此以前支持“百花運動”。毛澤東不但主動采取了開始轉變政策的關鍵性行動，而且整個1957年夏黨對“右派”（對非黨批評者的稱呼）的政策都受他的影響。此外，毛澤東對自己在一系列具體問題上180度大轉彎的態度毫不在乎。例如在4月，毛澤東為上海的《文匯報》刊登批評意見歡呼，而在7月份，他激烈地攻擊這份報紙為“右派”的喉舌。在2月份，他建議復查一批反革命案件，但在10月份，他因類似的建議而指責民主黨派的領導人羅隆基。

在這些和其他事情上如此毫無顧忌地大轉彎，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其最后的結果便是消除可能存在于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之間的任何分歧。隨著他對知識分子幻想的破滅，毛澤東堅決主張加強黨的控制來下臺階。

對批評者的反擊采取“反右運動”的形式。這次運動的調子是防御性的。它試圖反駁知識分子在春天提出的論點和恢復對主要進行“鳴放”的城市組織的控制。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由于知識分子對黨的高壓工作方法的批評，黨在進行“反右運動”的同時采取了組織措施，特別是把可靠的黨干部調到文教單位擔任領導，結果是與“百花運動”以前的情況相比，黨的控制大為增強。運動本身的主要對象是民主黨派的領導成員。這些人因在春天提出的溫和觀點，曾被學生批評者們尖銳地貶為“謹小慎微的老人”，可是這時他們被指責陰謀推翻政權。他們受到了報刊猛烈的攻擊，參加了大規模的斗爭會，并且被迫作出可憐的交代；可是到了1958年后期和1959年，大部分人在民主黨派中恢復原職，這表示對他們的最苛刻的指控沒有被認真看待。

然而，這些指控可以用作給運動定調子的有用象征，從7月中起，運動一般在知識分子的組織中物色“右派”。雖然非黨知識分子是主要對象，但那些在春季為其專業利益而不是為黨的利益直言的黨員知識分子也小規模地受到迫害。對中國知識分子總的沖擊是破壞性的：總共約有55萬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斗爭期間的心理壓力造成了大批自殺事件，并且大規模地對這些人進行勞動改造。在毛澤東死后，運動的嚴酷已被視為一個“擴大階級斗爭范圍”的大錯誤，也許全部“右派”的98%是被錯劃的[[69]](#_69_98_De_Gu_Ji_Ji_55Wan_You_Pai)（進一步的討論見第五章）。

運動的嚴厲性不應掩蓋以下的事實，即在1957年中，領導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沒有轉為完全否定。在大力避免完全疏遠知識分子時，黨為運動所定的指導方針是，只有一小批知識分子是右派，主張采用總的寬大的處理方法。這反映出一個沒有中斷的信念，即知識分子盡管思想落后，但在中國的現代化中仍起著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在7月攻擊知識分子不愿聽從黨，但仍指出爭取個別的“對我們有用的大知識分子”的必要性，以此表達了領導又恨又愛的情緒。[[70]](#_70___Zai_Shang_Hai_Shi_Ge_Jie_R)“百花運動”的失敗，表明不能在政治上依靠知識分子，但它不能解決關于他們在經濟和政治發展中的作用的爭論問題。當1957年夏季開展“反右運動”時，總的經濟政策在最初依然像1956年那樣采取了溫和的路線，這條道路需要專業的知識發揮重要作用。所以很可能一旦黨的控制得以重建，黨仍會采用對知識分子讓步（除了黨的整風中的領導作用以外）的政策。但是，“反右運動”的嚴酷性無疑損害了知識分子投身于黨的發展目標的熱情。此外，領導這時有理由懷疑把動搖的知識分子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的策略。

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通過政治的放松來緩和社會不滿起了相反的社會效果，經濟上產生了較大的分叉。農村的形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956年官方助長的對農業生產合作社弊病的批判氣氛，導致1956年冬至1957年大批農民退社的后來所稱的“小臺風”。“百花運動”導致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因為據報道，不滿的農民受到報刊和無線電報道的城市“鳴放”的鼓勵，向農村的干部結構提出了挑戰，并且日益從事諸如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職責分散給各個農戶、向國家要求更多的錢和糧食同時又少售余糧以及投機倒把等“自發的資本主義”活動。

特別令人不安的是，有些干部參與了“資本主義”行為，與農民一起策劃隱瞞或少報糧食產量。這種情況，再加上使糧食產量落后于人口增長率的另一次歉收，造成了嚴重的糧食供應危機。黨的領導人對此作出的反應是，在1957年夏作出了取締農村自由市場和發動一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這次運動在農民中普遍開展自稱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宣傳，逮捕了違法的前地主和富農，對從事不正當活動的農村黨員進行有限度的清洗，并且由于支持了集體部門，全面地恢復了干部對農民的權威。說服方法和強制方法的再次結合，再加上向新的農村精英利益集團的直接呼吁，在完成黨的目標時是成功的。

除了這類社會和政治問題，還有有關的經濟問題。農業部門不能令人滿意的表現，更因1956年和1957年連續兩年生產低于一般水平而突出起來。不但新的合作社結構未能促進生產，而且后來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內對物質刺激的強調也不成功。農業的落后狀態對工業的發展產生影響，周恩來在1957年6月宣布削減20%的基本建設。遵循《論十大關系》的邏輯推論，領導集團在1957年適度地增加了國家對農業的總投資，但此舉也不能保證取得突破。隨著蘇聯的經濟戰略受到懷疑，另一個可能取代的戰略是集中力量逐步提高農業產量，同時接受降低全面增長速度的事實。但是由于黨的領導人視高增長速度為關鍵的目標，這樣的選擇不可能是一個長期的戰略。

這樣，到1957年秋季，一系列的壓力——覺察到的蘇聯模式的缺陷、知識分子成問題的可靠性、政治松動產生的社會的破壞性后果以及停滯不前的經濟——正集中于改變發展戰略一點上。此外，已經對蘇聯模式作出的謹慎而非主要的調整——對農業的關鍵的經濟作用的更深的認識、管理朝分散方向的發展、對小規模工業項目和地方辦教育的進一步重視——提供了可以發展成為更宏偉的創新戰略的前景和規劃。最后，毛澤東及其幾個領導層的同事可以從1957年下半年回顧前兩年的事件，并作出有點含糊的，但仍然是有影響的結論。

從積極方面看，毛澤東判定，雖然他最初關于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的看法是不成熟的，因為只在所有制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整風和“反右運動”在政治和思想戰線上已取得了根本的勝利。因此，中國人民從沒有像現在那樣有準備地進行一場經濟和技術革命。從比較消極的方面看，毛澤東宣布“反冒進”政策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它不但挫傷了群眾的熱情，從而造成了經濟損失，而且還鼓勵“右派”發動他們的政治進攻。得出的結論是，1956年初期的躍進方法必須無保留地推行，以便維護工農的熱情。這些思想開始在1957年9—10月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會時期占了統治地位，到年底中國已在“大躍進”的道路上邁進了。

#### 結論

雖然黨的領導人在1957年后期面臨著大問題，但是194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的政績是非常成功的。盡管對中共的一些具體表現有不滿情緒，但是政權由于在穩定社會秩序、推動經濟發展、改善生活條件和恢復民族尊嚴方面的成績，已得到了廣泛的民眾支持。同時，它已完成了基本的社會和制度改造，以至到1956年，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如同本文的分析自始至終所強調的那樣，蘇聯的模式和領導的團結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將隨著“大躍進”而消失或削弱。特別是有了提供明確目標的模式，有了對官方的規劃產生強烈使命感的團結，對充分地利用在革命勝利中曾發揮主要作用的有紀律的黨的組織來說，條件是十分理想的。雖然幾乎不可能避免組織和政治上的缺點，但事實證明黨組織總的說能對重大的倡議和政策作出反應——有時作出反應還過分熱心。在1949—1957年時期，除了“百花運動”的短暫的試驗期外，中共的各項規劃加強了這個有紀律的組織的權威，從而提高了政權進行發展和改造的能力。

各項成就還由于中共領導人在取得服從時巧妙地把說服、強迫和具體的要求結合起來。經常用黨的觀點大力說服民眾的做法，使許多個人和集團相信共產黨政策的正確，并且甚至使更多的人對可以接受的行為方式有了認識。強制既被用來打破敵對集團的反抗，又使絕大多數人對黨是一支不能反抗的力量的事實有深刻印象。各種旨在改進主要社會集團——特別是貧農和正在成長的干部精英——物質利益的規劃，在明顯的私利的基礎上為中共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支持。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應用了在革命時期十分有用的戰略和方法。在華北農村根據地發展起來的動員群眾的技術證明也適用于1949年以后全國的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此外，盡管1956—1957年估計錯誤，在抗擊日本人和國民黨時行之有效的統一戰線策略總的說成功地縮小了積極反抗的范圍，中立了動搖分子，把在中共統治下的支持擴大到了最大限度。特別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現實主義和對資源的謹慎安排在1949—1957年期間基本上占了上風。雖然最初時期各項雄心勃勃的規劃常常使組織資源處于緊張狀態，但它們很少把自己過分擴大到使各級官員再也不能有效地指導社會和經濟變革的程度。當這種情況確在1956年初期出現時，它在幾個月內就得到了糾正。

最后，最初八年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中共追求的目標或使用的方法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見到的不相容性。社會目標和經濟目的被視為互相加強的因素。農業合作社是解決生產問題所采用的方法，在意識形態上也是可取的，而現代部門的社會主義化既消滅了資本主義，也有利于計劃經濟的發展。與此相似的是，制度化和群眾運動作為為社會主義目的服務的適當手段都被接受。各項運動對社會改造的重大努力來說是合適的，而強有力的制度也需要用來指導計劃發展和管理社會主義社會。甚至在承認有緊張狀態的領域，如在軍事現代化和解放軍傳統之間，也以矛盾可以在不損害任何重要目標的情況下得到解決為先決條件。在以后幾年，當毛澤東和其他黨的領導人日益了解經濟目的需要付出重大的社會代價，強有力的制度能夠危及某些價值觀念而同時維護另一些價值觀念，以及“社會主義”的內容尚未確定時，沖突的潛在力量發展了，國家形成時期的相對順利的進展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了。

[[1]](#_1_1)《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509]（1956年9月15日），載《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219]，第1卷，第7頁。

[[2]](#_2_1)《在莫斯科對我國留學生的講話》（1957年11月17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891.26；在談話中，毛宣稱，以1956年所有制的改變為代表的勝利不是決定性的，但“1957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3]](#_3_1)經過1957年的各種辯論以后，劉少奇在12月對來訪的印度共產黨人說：“我們的黨始終在捍衛它的團結，沒有分裂……沒有人自己另搞一套。”引自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495]，Ⅰ，第311頁。

[[4]](#_4_1)引自紅衛兵出版的《大批判》（廣州），1967年10月5日；《彭德懷事件，1959—1968年》[569]，第123頁，有英譯文。

[[5]](#_5_1)根據近期廖蓋隆作的黨內報告，1943年3月政治局決定指定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組成的書記處處理日常工作，但又授權毛澤東個人可以先于書記處對有關事務作出最后決定，見《歷史經驗和我們的發展道路》[447]（1980年10月25日），載《問題和研究》[358]，1981年11月，第92頁。

[[6]](#_6_1)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材料，關于朝鮮戰爭的這一說法又被1981年發表的彭德懷回憶的摘錄所證實。見《彭德懷自述》[570]，第257—258頁。

[[7]](#_7_1)當1962年毛澤東用以下的話詳細闡述民主集中制時，他承認了這點：“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重點是加上去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載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634]，第165頁。

[[8]](#_8_1)《關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1960—1962年？），載《毛澤東思想雜集》[508]，第2卷，第310頁。

[[9]](#_9_1)赫魯曉夫在《赫魯曉夫回憶錄》[389]第464—465頁中報道了毛訪問尤金之事；又見《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后的遺言》[390]，第242頁。

[[10]](#_10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4卷，第422頁；中文版（一卷本），第1485頁。

[[11]](#_11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17頁；中文版，第5卷，第5頁。

[[12]](#_12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33頁；中文版，第5卷，第21頁。

[[13]](#_13_1)《紐約時報》（1946年9月25日）報道了周恩來的看法。毛澤東的預計見《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4卷，第225頁。

[[14]](#_14_1)鄧小平：《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706]（1956年9月16日），載《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219]，第1卷，第215頁。

[[15]](#_15_1)中共的數字，見安子文《培養人民的勤務員》[8]，載《人民中國》（英文）[572]，1953年1月1日。國民黨的數字見高英茂根據1948年中華民國統計年鑒的數據作出的估計《1949—1965年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城市政府官僚機構和干部》[385]。

[[16]](#_16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4卷，第363頁；中文版（一卷本），第1428頁。

[[17]](#_17_1)根據1949年中共的宣傳小冊子，引自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574]，第379頁。

[[18]](#_18_1)《周恩來選集》（英文）[143]，第1卷，第406頁；中文版，第1卷，第368頁。

[[19]](#_19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30頁；中文版，第5卷，第19頁。

[[20]](#_20_1)同上書，第24—25頁；中文版，第5卷，第13頁。

[[21]](#_21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2卷，第224頁；中文版，一卷本，第535頁。

[[22]](#_22_1)《人民日報》[362]，1951年5月1日。

[[23]](#_23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24頁；中文版，第5卷，第13頁。

[[24]](#_24_1)在缺乏官方統計數字的情況下，不可能知道涉及的人數，但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反共的材料估計死亡人數有1400萬到1500萬，這顯然太高了。有人對材料做了審慎的檢查，謹慎地估計處決的人數為20萬至80萬，見本尼迪克特·斯塔維斯《中國的農業機械化政策》[685]，第25—30頁。有的報道根據對避難者的采訪，提出更大的數字，報道說：“政策規定，實際上在每個村至少選一個地主（通常選幾個）當眾處死。”鮑大可與艾茲拉·沃格爾：《共產黨中國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權》[28]，第228頁。

[[25]](#_25_1)在缺乏精確的官方統計數字的情況下，也不知道處決的人數，但城市主要的反對反革命的運動可能造成了50萬至80萬人的死亡（見斯塔維斯《中國的農業機械化政策》[685]，第29頁）。事情是模糊不清的，因為這些數字的依據是毛澤東在1957年提到的已被清除的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但是根據上下文，不可能知道提到的人是某個特定運動的對象，還是包括土改和其他運動受害者在內的范圍更廣的一類。

[[26]](#_26_1)關于自殺規模的主要材料是避難者的敘述。周鯨文：《十年風暴：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真相》[148]，第115、113頁；此書估計，在鎮壓反革命時期有50萬以上的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又有20萬人自殺。雖然這些數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據官方材料，自殺顯然是一個重要的現象。

[[27]](#_27_1)《關于鎮反工作和肅反工作的批語》（1950—1951年），載《毛澤東思想雜集》[508]，第1卷，第6頁。

[[28]](#_28_1)《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擴大的全體會議上的總結發言》（1955年9月），載《毛澤東思想雜集》[508]，第1卷，第16頁。

[[29]](#_29_1)《劉少奇選集，1945—1957年》（英文）[470]，第292—293頁；中文版，第2卷，第152頁。

[[30]](#_30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104頁；中文版，第5卷，第91頁。

[[31]](#_31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173—174頁；中文版，第5卷，第158—159頁。

[[32]](#_32_1)《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443]（1955年7月5—6日），載《1955—1959年的共產黨中國：政策文獻，附分析》[186]，第47頁。

[[33]](#_33_1)《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閉幕詞》（1953年2月7日），載K.范編《毛澤東和林彪：革命以后的著作》[234]，第102頁。

[[34]](#_34_1)《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收于施拉姆《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634]，第98頁。

[[35]](#_35_1)對高饒事件最詳盡的記述是弗雷德里克·泰韋斯的《中國的政治和清洗：1950—1965年的整風和黨的準則的衰敗》[702]，第5章；文中強調毛澤東日益惡化的健康是影響高崗的間接的關鍵因素。其他解釋包括：弗朗茲·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637]，第4章（強調政策分歧）；約翰·W.劉易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毛澤東以后的接班：緊張形勢的估計》[437]（強調地方主義）；中嵨嶺雄：《高崗事件和中蘇關系》[541]，載《評論》，1977年3月（強調與蘇聯的關系）。

[[36]](#_36_1)依靠毛澤東死后材料作出文中下面解釋的主要有：陳詩惠：《關于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問題》[111]；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168]，第397—400頁，第405—409頁；《鄧小平文選》[704]，第257—258頁；廖蓋隆：《歷史經驗》[447]，載《問題和研究》[358]，1981年10月，第79頁；與中國官員和學者的討論。

[[37]](#_37_1)把持大區權力是官方對高崗在東北成立“獨立王國”的指控的關鍵。據報道，高崗設法把東北的一切權力置于其親信之手，而不把實權交給第二書記林楓及其他官員。這并不意味著東北采取了一條獨立于中央的路線；事實上東北大力地貫徹中央的指令，所以它屢次因帶頭大力實行新政策而受到表揚。盡管迅速貫徹中央的政策，毛澤東后來還是把高崗非法利用大區行政制度的缺點引作最后撤銷各大區的一個理由。見《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293—294頁。關于對大區問題的進一步分析，見泰韋斯《政治和清洗》[702]，第184—191頁。

[[38]](#_38_1)《鄧小平文選》[704]，第257頁。

[[39]](#_39_1)但是緊張關系暗中繼續存在。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劉少奇有力地支持毛澤東反對彭德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劉少奇對彭德懷在高饒事件中的作用耿耿于懷。

[[40]](#_40_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88]（1954年9月20日），收于哈羅德·C.欣頓《1949—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獻概覽》[299]，第1卷，第99頁。

[[41]](#_41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143頁；中文版，第5卷，第127頁。

[[42]](#_42_1)《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11—12日），載《毛澤東思想雜集》[508]，第1卷，第84頁。

[[43]](#_43_1)雖然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制度的材料顯然很少，但在鮑大可的《1949—1955年的早期共產黨中國》[23]（第60—67頁）中可以看到有用的描述。在包若望（讓·帕斯夸爾尼）和魯道夫·切爾明斯基的《毛澤東的犯人》[18]中可以看到第一手的材料。兩個材料推測性地估計勞動營的人數有數百萬，包若望和切爾明斯基（在第10頁注）提出的一個大概的數字超過了1000萬。

[[44]](#_44_1)外國觀察家曾推測，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與公安工作關系很深的政治局委員康生在1949年以后繼續控制警察，但情況并非如此。在1945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后，康生被解除了公安工作的職責，后來在1949年告病假不出，據認為他是為饒漱石被授予華東局的最高職務而生氣。康生在高饒事件后復出，但力量集中于理論工作方面。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才又與高壓的統治工具發生關系。見仲侃《康生評傳》[160]，第83、96、106—112、114、191、284頁。

[[45]](#_45_1)《人民日報》[362]，1955年11月13日。

[[46]](#_46_1)正文的以下敘述與取自“文化大革命”材料的解釋略有不同，后者強調了以毛澤東為一方與以一批中央官員為另一方的分歧。例如見帕里斯·張《中國的權力和政策》[86]，第9—17頁。本文所作的分析，除了1954—1955年的文獻材料外，還取材于：《共產黨中國的農業合作化》[1]，載《當代背景材料》[735]，第373頁；肯尼思· R.沃克：《回顧集體化：1955年秋至1956年春的“社會主義高潮”》[760]，載《中國季刊》[133]，第26頁（1966年）；特別是毛澤東死后內部發行的文獻：《黨史研究》[695]，1981年2月28日，即鄧子恢：《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開幕詞》[709]（1955年4月21日）1981.1，第2—9頁；強遠淦、林邦光：《試論1955年黨內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124]。

[[47]](#_47_1)毛澤東的目標是他在7月31日關于合作化的發言中提出的，但顯然已在5月份與鄧子恢爭論過。見《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187頁；強遠淦、林邦光：《試論1955年黨內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124]，第13頁。

[[48]](#_48_1)不借助于毛澤東死后的材料的分析家們在寫毛主席5月份的活動時，常常著重談毛澤東7月份發言的突然性和決定性，因為它的目標顯然比毛澤東講話前發表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目標更加激進。例如見斯圖爾特·R.施拉姆《導言：從歷史角度看文化革命》[633]，載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中國的權力、參與和文化變化》[632]，第39頁。但是這種分析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的“到1957年”全部農戶的1/3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目標，未必比毛澤東提出的1958年春達到50%的目標保守，因為1957—1958年之間的冬季將肯定是一個有重大發展的時期。

[[49]](#_49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184頁；中文版，第5卷，第168頁。

[[50]](#_50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240頁；中文版，第5卷，第223—224頁。

[[51]](#_51_1)見廖蓋隆的《歷史經驗》[447]，他對毛澤東的“左”的思想根源一直追尋到1955年后期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

[[52]](#_52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244、250頁；中文版，第5卷，第227、233頁。

[[53]](#_53_1)《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載埃萊娜·卡雷勒·德昂科斯、斯圖爾特·R.施拉姆合編《馬克思主義和亞洲》[74]，第292頁。

[[54]](#_54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395頁；中文版，第5卷，第375頁。

[[55]](#_55_1)《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載《馬克思主義和亞洲》[74]，第292—293頁。

[[56]](#_56_1)《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517]（1956年1月20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507]（1969年），第33頁。

[[57]](#_57_1)《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511]（1958年3月），載施拉姆的《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634]，第101頁。

[[58]](#_58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286頁；中文版，第5卷，第269頁。

[[59]](#_59_1)《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292頁；中文版，第5卷，第275頁。

[[60]](#_60_1)“譚政同志發言”[693]（1956年9月18日），載《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219]，第2卷.第265頁。

[[61]](#_61_1)這個分析（參見泰韋斯《政治和清洗》[702]，第226—230頁）與大會上“毛澤東的光芒在消失”的解釋（例如，帕里斯·張《權力和政策》[86]，第29頁以下）以及強調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之間的沖突的解釋（例如，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Ⅰ[495]，第2部分）不同。

[[62]](#_62_1)《工作方法六十條》（1958年2月19日），載陳志讓編《毛澤東文集及書目》[110]，第75頁。

[[63]](#_63_1)《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11—12日），載《毛澤東思想雜集》[508]，第1卷，第80頁。

[[64]](#_64_1)引自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幾個方面》[497]，提交給哥倫比亞大學現代東亞（中國）討論會的論文，1969年2月19日，第10、13頁。

[[65]](#_65_1)以下的分析及對下一節“反右運動”的分析取材于泰韋斯的《政治和清洗》[702]，第6—7章。關于相反的解釋，見本頁注3所引的材料。

[[66]](#_66_1)《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4月），載《毛澤東思想雜集》[508]，第1卷，第67頁。

[[67]](#_67_1)認為整風及后來的“反右運動”是最高領導集團內部重大分歧的近因的主要分析有：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第3、4部分；理查德·所羅門：《毛澤東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674]，第17章。本卷第七章也采用這種解釋。

[[68]](#_68_1)根據丹尼斯·J.杜林的《共產黨中國：學生反對派的政見》[205]（第50、55頁）一書中的北京學生小冊子的譯文。

[[69]](#_69_1)98%的估計及55萬右派的數字，見廖蓋隆1980年的報告：《歷史經驗》[447]，載《問題和研究》[358]，1981年10月，第80—81頁。1981年官方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周報》[568]，27（1981年），第19頁）更謹慎地肯定了反擊“右派”的正確性，但認為打擊面過寬。

[[70]](#_70_1)《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518]，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507]，第121頁。

## 第三章 恢復經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

當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從國民黨手中奪取到中國的控制權時，經濟瀕于崩潰。與前現代經濟所特有的長期結構問題——如低人均收入、壽命短、低儲蓄和投資比率及占優勢的傳統生產方法——一起出現的，是伴隨著二十多年國內外戰爭的物質和人力資源的損失以及極度的通貨膨脹。但是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短期問題大部分得到解決，中國共產黨正在完成一個卓有成效地解決最持久的結構問題的五年發展規劃。儲蓄和投資比率急劇增長；由于實現了阻止傳染病和寄生蟲病蔓延的公共衛生計劃，人的壽命已開始延長；在工業中，現代技術正被大規模地采用。

本章探討20世紀世紀中期中國人面臨的發展問題的重要性，分析所采用的政策，并且估計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取得的成就。它還試圖闡明為什么相對地成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戰略幾乎立刻被放棄而代之以“大躍進”，關于“大躍進”這一空前的大失敗的規劃將是本卷第八章討論的題目。

## 經濟背景

在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前，中國的經濟基本上是現代以前的。在20世紀30年代，年人均國民收入在世界排名表上接近最底層，每人約58元人民幣或15美元（1933年價格）。產品分配給股本的增值份額只有約5%，比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儲蓄利率約低1/3。經濟的前現代特點被產品的結構和勞動力的分配所證實。幾乎有2/3的產品來自農業，工業產品不足1/5。此外，由于絕大部分工業產品由傳統的手工業方法生產，而且絕大部分服務行業也是傳統的，所以用現代手段生產的產品總量不到10%。與此相似的是，90%以上的勞動力依靠傳統技術。[[1]](#_1_Dui_20Shi_Ji_30Nian_Dai_Z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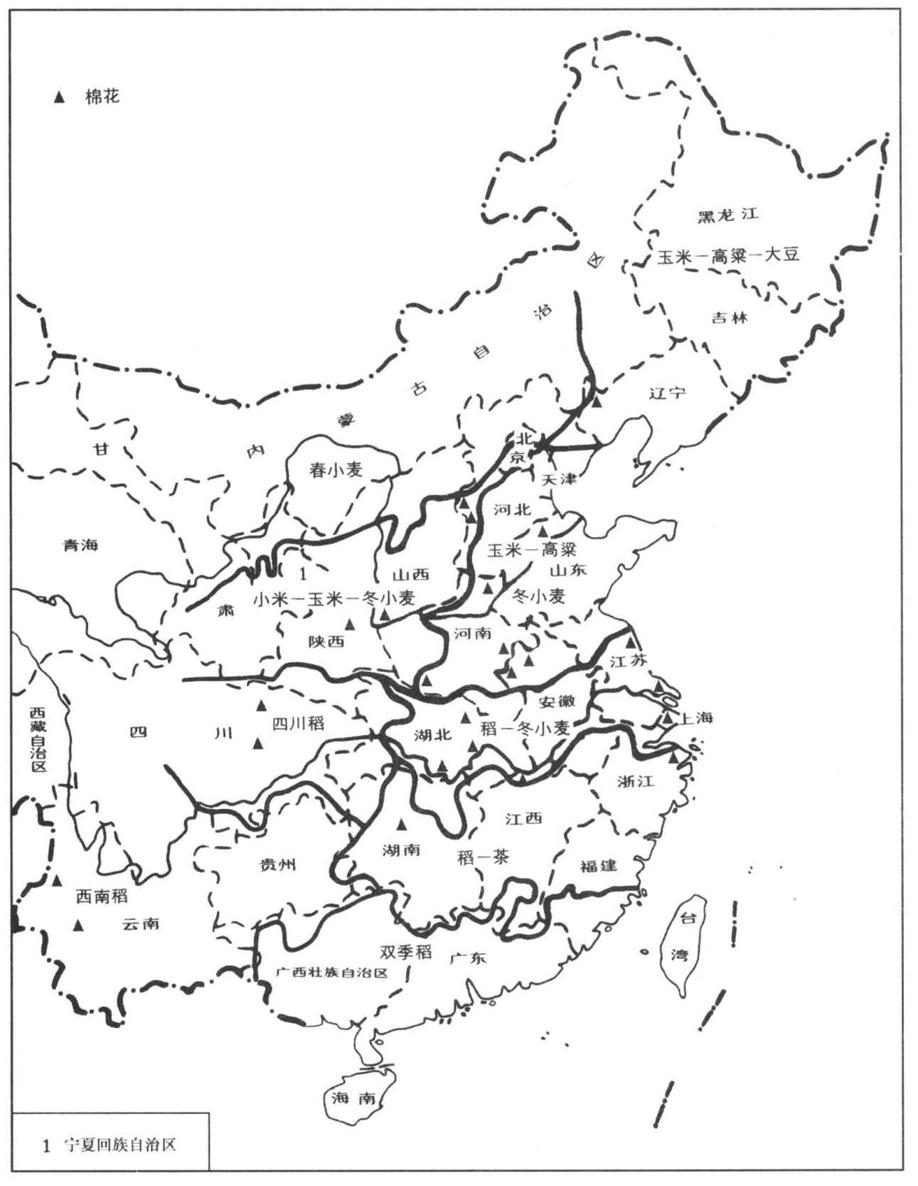
絕大部分人口直接依靠農業為生，但農業的增長受制于耕地不足和現代農業技術的缺乏。在幾個世紀中，人口的增長已經超過了耕地的增加。到20世紀30年代，人均耕地不到1/5公頃，遠遠少于獨立時期的印度，當時它的人均耕地約1/3公頃。對中國增長的人口的供養，不是通過耕種的機械技術的革新，而是通過改變作物類型的方法來完成的。由于采用諸如玉米、花生、白薯和煙草等新作物以及改良的棉花品種，單位耕地生產的平均產量和價值從16世紀起逐步上升。[[2]](#_2_Dui_Zhong_Guo_Chang_Qi_Nong_Y)

這個過程得到了具有相對優勢地帶的生產的日益專業化和上升的上市比重的推動。在運輸方便的區域，全部產品的3/5以上普遍地在農林以外銷售，在全中國，農產品的上市比率約為1/3，少于日本明治初期現代經濟增長開始時的比率，但遠遠高于與維持生計的農業有關的上市比率。這樣，到20世紀30年代，單位土地產量按照國際標準顯然是高的，可是每個勞動者的產量（因而其收入）是低的；而且盡管在短期內有上下的波動，這種情況在幾個世紀中沒有變化。而人口卻在增長。[[3]](#_3_E_L_Qiong_Si____Ou_Zhou_De_Qi)

可耕地不足以及20世紀30年代盛行的高價土地但低勞動生產率的結合，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束縛。經濟增長是可以持續下去的，但不是通過擴大可耕的新墾地（這個增長的來源在以往一切成功的現代經濟增長的事例中都被不同程度地利用過，甚至日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而是通過進一步提高已是中等高水平的單位面積產量來完成。這轉過來意味著必須對土地的基礎結構和化肥工業進行大量投資。

特別是在農業上，低收入、低儲蓄和低勞動生產率的長期結構問題又和非常嚴重的地區性的割裂混合在一起。雖然大部分估計材料沒有提供中日戰爭爆發前幾十年的人均國民收入持續增長的證據，但東北和中國本土的幾個商埠卻有重大的增長。[[4]](#_4_De_Huai_Te__H_Po_Jin_Si____20)東北的經濟增長從1860年起就開始了，當時清帝開放該地區供漢人定居。部分地在1895年以后一個鐵路網絡（主要是外國所有）的發展的推動下，還由于國際上對大豆的需要量的增加，農業發展迅速，但在20世紀20年代晚期以后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工業的迅速發展又取而代之。到30年代中期，東北的人均產量至少大于中國本土的50%。[[5]](#_5_Ya_Li_Shan_Da__Ai_Ke_Si_Tan)

工業發展不限于東北。主要生產紡織品、加工食品和卷煙的中外工廠，1895年以后在上海、天津、青島、漢口和其他沿海沿河的商埠城市中都有迅速的發展。在抗日戰爭爆發前30年的工業的增長率（包括東北，但不包括手工業）估計為每年7.5%到9.4%。[[6]](#_6_Yue_Han__K_Zhang____Gong_Chan)工業和運輸業股本的迅速增長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進口的機器設備，但是國內的生產物資，特別在工程部門，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已經供應了投資需要中的相當大的份額。[[7]](#_7_Tuo_Ma_Si__G_Luo_Si_Ji____Zho)



地圖4 農業：主要作物區

但是迅速的工業增長集中在某些區域，并沒有導致全國產量的持續增長。現代部門的規模太小，它與其他區域和其他經濟部門的聯系太弱，無力促進全面的增長。到30年代中期，東北只生產了全國產量的10%—15%，所以即使它發展迅速，也不能直接推動整個國家的經濟前進。此外，東北的大部分工業化是與日本緊密相關的。東北工業化所需的生產資料，幾乎全部從日本進口，而東北生產的大部分原料和半制成品則向日本出口。因此，東北的工業化在境內產生較少的后向聯系，如果對興起的日本軍國主義的聯系不那么緊密，這種后向聯系就會更多。此外，在1910—1929年，東北和中國本土之間盛行的農產品和制成品的區際貿易，在1931年日本人完全接管東北以后禁止與中國本土貿易時急劇減少。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東北增長最為迅速的時期，它成了一塊與中國本土沒有重要經濟聯系的飛地。

商埠工業化的擴散作用也是有限的。[[8]](#_8_Luo_Zi__Mo_Fei____Wai_Lai_Ren)現代經濟部門不過是傳統經濟上面的一層薄薄的覆蓋物，它的一部分也是飛地式的，其原料從國外進口，像棉織品等制成品則輸往國際市場。總之，中國的大部分幾乎未被現代經濟觸動。1949年以后經濟發展政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把1949年繼承的三種獨立的經濟一體化，它們是：有重工業基礎的東北；主要面向紡織業和輕工業的沿海商埠；幾乎未被現代工業觸動的廣大的內地。

抗日戰爭和內戰使這些長期的結構問題更加嚴重了。主要由于東北的迅速發展，工業產量和股本一直到40年代初期仍繼續擴大，但從此就下降了。戰爭的破壞是重大的，蘇聯又在1945年在東北搬走了一半以上的主要工業設備，這是盟國在雅爾塔會議上為了使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而付出的沒有講明的代價。[[9]](#_9_Ai_De_Wen__W_Bo_Li____Guan_Yu)1949年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達到30年代最高水平的15%—80%不等。農業生產由于更為分散，所以不像工業那樣令人沮喪。戰爭的主要代價是投資額大量下降，這反映在灌溉耕地的數量明顯地減少。戰時的破壞阻礙了對戰前建設的灌溉系統進行勞力特別集中的維修。此外，1938年在一次試圖阻止日軍推進的徒勞的行動中，國民黨政府有意使鄭州附近的黃河堤壩決口，結果破壞了三個省部分地區的農田和灌溉系統。到1949年，灌溉土地的面積實際上少于清代末年，只有1924—1929年平均灌溉面積的60%左右。戰前灌溉的水平直到50年代中期才重新達到。[[10]](#_10_Po_Jin_Si____1368__1968Nian)

共產黨政權繼承的最為沉重的包袱是極度的通貨膨脹。由于戰時的赤字財政，又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通過銷售公債或其他非發行通貨的手段來彌補，國民黨政府已經加劇了通貨膨脹。國民黨人不愿意或無力調整稅制，以支持抗日戰爭或對付共產黨人。早在1935年，物價就開始上漲，1938年以后上漲速度加快，隨著在工業化的沿海地區的控制權落到了日軍之手，而國民黨政府遷都到西南的四川省。當1940年軍費增加時，通過發行貨幣來資助政府開支的份額不斷增加。到1945年，80%以上的支出是通過發行貨幣來彌補的；根據當時的官方材料，這一年年底的物價水平是戰前水平的1632倍。抗日戰爭勝利后，對調整稅制沒有作出系統的努力；經過了一段短暫的喘息時期后，赤字增加了，1947年和1948年分別為支出的70%和 80%。1948年8月，在本國通貨就要崩潰之前，上海的批發價格指數達到1937年水平的660萬倍。[[11]](#_11_Guan_Yu_Tong_Huo_Peng_Zhang)

## 戰后的恢復

恢復時期新成立的政府的幾個重要目標是：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制止遺留的極度通貨膨脹；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即將實行的制度改革打好基礎。在初期，政權主要依靠稅收、物價和控制貸款等間接機制，而不是依靠官僚主義方式的資源直接分配。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對生產、購銷和財政的控制范圍擴大了，直接控制的方式日益取代了對市場杠桿的依賴。

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后，內戰繼續在南方和西南進行，政府的支出仍大大地超過收入，一如國民黨十多年統治的情況。入不敷出的巨大赤字繼續用擴大發行貨幣的辦法來解決，在新政權的最初幾個月，通貨膨脹基本上仍在繼續，勢頭不減。在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期間，物價上漲了一倍半以上。

但在新政權掌權后的六個月內，它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財政和擴大征稅基礎的措施，從而提供了打破極度通貨膨脹的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所采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一個是成立統一的財政制度，這樣，中央政府就剝奪了地方政府可以按照它們管理的稅收（如農業稅）花錢的權力。在1928年，國民黨政府主要因為無力對地方政府進行控制，已經正式把農業稅下放給各省的政府。[[12]](#_12_1941Nian__Zhong_Yang_Zheng_F)1950年，農業稅與貨物稅及各種名目的工商業稅一樣，被置于中央的統一分配之下，從而結束了征收糧食實物和其他稅收歸地方使用的稅制。國家銀行（稱人民銀行）發揮恢復物價穩定的關鍵作用。它被指定充當政府的國庫，這是政府賴以控制信用膨脹的工具。

行政效率的提高、征稅基礎的擴大和生產的增加，其積累性的結果是政府收入大為增加，從1950年的65億元，增加到1951年的133億元。雖然1951年和1952年當時收支相抵的赤字是巨大的，但是通過發行公債彌補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在1950年，赤字的40%以上就用這種方式彌補，這與國民黨時代相比有了急劇的增加，那時用公債來彌補赤字的部分很少超過5%。[[13]](#_13_Bao_Dao_De_Chi_Zi_Wei_2_89Yi)在某種程度上，銷售公債運動的成功看來是由于發行的公債不是用票面的貨幣單位而是用“折實單位”來計算。每張公債在兌現時與四種一定數量的主要商品（米、面粉、棉布和煤）等值。發行的銀行存單也用折實單位計算，以鼓勵私人儲蓄和減少通貨膨脹的壓力。

國民黨政府國庫的內在弱點與取代它的共產黨政權的資源動員能力的對比，再也沒有比兩個政權通過預算制定的分配全國產量的份額更能鮮明地表現出來。在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政府收入（包括中央、省和地方當局的）最多包括全部國內產品的5%—7%。[[14]](#_14_Tuo_Ma_Si__Luo_Si_Ji____Zhon)早在1952年，產量的征稅份額是24%，到1957年已升至30%，此數是戰前水平的幾倍，是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的平均份額的兩倍或以上。[[15]](#_15_Ni_Gu_La_Si__R_La_Di____Zhon)

到1950年3月，通貨膨脹的螺旋式上升被止住了。在與朝鮮戰爭爆發有關的政府開支增加的壓力下，1950年下半年又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壓力。但在1951年總的通貨膨脹依然能夠控制；盡管中國人在1950年秋參加戰爭以后負擔的軍費急劇增加，價格水平只上升了20%。

物價之得以重新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1950年建立的新財政制度規定下稅收繼續增加，同時削減了投資和其他非軍事支出。美國參加朝鮮戰爭后不久，在50年代總管經濟政策的陳云提出的政策，把發展放在第三位，位于與戰爭有關的規劃和保持物價穩定這兩項之后。這就是稱之為“抗美、穩定、建設”的方針。[[16]](#_16_Chen_Yun____Kang_Mei_Yuan_Zh)

在最初，恢復生產的規劃是建立在重建被戰爭破壞的鐵路、其他運輸路線和工廠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再搞新的建設大計劃。此外，在開始時國家所有的部門只限于從國民黨政府接收的企業。政府辦的工廠約生產工業產品的1/3，但是國家直接控制的批發和零售貿易的份額則要小得多。由于政府所有制受到限制和國家政策鼓勵公私行業共存，經濟就像30年代那樣依然是面向市場的。

1952年軍費壓力的減輕和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的簽訂，為更有活力的經濟發展規劃創造了條件。國家投資支出大量增加，國營工廠生產的工業產品的份額也增長了，這不是通過把私營企業直接國有化，而是通過用經濟誘導的辦法（如區別對待的稅收和信貸政策）把它們逐步并入國營部門去完成的。在1949—1952年期間，即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夕，私營部門生產的現代工業產品的份額從一半以上壓到不足1/5，私營的批發和零售份額也大為縮小。但是手工業部門絕大部分依然是私人的。

1949年以后，制度改革的漸進方法在農村地區也占上風。1946年內戰時期采用的用于所謂解放區的激進的土地改革綱領被修改，以緩和妨礙恢復農業生產的階級沖突。一個復雜的方案被采用，內容是把農民劃分為五個階級：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無地的）雇農。這種分類轉過來又成為土地再分配的基礎。到1952年土改結束，全部耕地的40%—50%的所有權易手。

土地改革決定性地改善了農民中最貧窮的成員的經濟地位，但最后的結果遠不是平均的。農村人口中最貧窮的20%的人的收入增長份額，在30年代到1952年期間幾乎翻了一番。由于同一時期人均農業收入不變，農村社會中最貧窮的成員的絕對收入也翻了一番。但是農村人口中最富裕的10%的人，大致相當于中國共產黨土改綱領分類中的地主和富農收入的變化，按照比率只是有限度地減少了將近10%。看來減少的幾乎全是地主階級的收入，這個階級包括極少數人，只占全部農戶的2.6%。根據一種判斷，留給原來的地主的土地與土改后貧農擁有的土地一樣多，而發家的中農和富農繼續擁有面積遠為廣大的土地，并且掙得的收入也遠遠高于平均數。[[17]](#_17_Cha_Er_Si__R_Luo_Er____Zhong)

雖然土地改革在鞏固農民群眾對黨的支持方面是關鍵性的，而且又是削弱舊的農村精英的有效手段，但是出于幾種原因，它沒有造成穩定的制度上的平衡。私有制和小農生產制度是1949年以前農業的最突出的特點，它們由于土地分給了數以百萬計的前佃農和無地的雇農而得到加強。這種情況在最初大大地減少了租賃土地和雇傭勞動力的比率。但是由于私人可以買賣土地，這些安排并不能排除更集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重新出現。盡管采取了累進的農業稅制，但幾乎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在有些地方，控制越來越多的土地的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富農階級重新出現了。這樣，幾乎在土改結束的同時，黨推動了自愿的合作化，這個行動最后形成了一種制度，即農戶的收入主要與他們的勞動掛鉤，土地和其他財產歸集體所有。

不但個人所有制在意識形態上受到懷疑，而且黨的領導從一開始對集體生產的偏愛又被其他兩個因素所加強。第一，人們似乎普遍認為，鞏固每戶平均不到一公頃的小地產的集體耕作，從農業生產規模上說是很經濟的。至少是參照過去，有人聲稱合作化提高了農民的收入。但是有利于這一假設的證據，不論對中國還是更廣泛地對亞洲來說，都是沒有力量的。中國人的主張的根據是對合作社的一個調查，但調查不是根據任意的抽樣，而是根據其他沒有具體說明的標準作出的。此外調查材料沒有區別相互關系和因果關系。對大部分（特別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較小的農場都取得更高的單位面積產量，而且生產也更有效率。

第二，通過組織合作社，國家向農村抽取資源的能力得到加強。下面將要討論，到1953年，提高國家把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納入非農業用途的能力的問題成了北京計劃工作者全神貫注的目標。

合作農業的早期形式稱互助組，它們是農民傳統合作形式的擴大，組內的農戶（典型的形式不超過10戶）在自愿互惠的基礎上交換勞動力和交換使用耕畜與農具。在一開始，這些組的形成是季節性的，但很快就成為長期的形式。土地、勞動力、農具和耕畜都長期地集中起來，但生產資料（包括土地）仍屬于個人。組內成員個人的收入份額包括以前擁有的財產的收益。到1952年末，全部農戶的40%加入了互助組。[[18]](#_18_Guo_Jia_Tong_Ji_Ju____Wei_Da)

## 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用傳統的標準來衡量，是非常成功的經濟發展規劃。中國共產黨以有限的資源和經驗，能夠維持始于恢復時期的經濟增長和完成在1949—1952年年底期間謹慎地開始的制度改革。這樣，中國這幾年的經驗與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年）的經驗形成了對比，后者的農業制度改革證明是一個災難。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經濟工作的特點是什么？增長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原來設想的連續進行幾個五年計劃的綱領會被一個遠為激進、最后失敗的稱之為“大躍進”的戰略所代替？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衡量，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成功。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8.9%（按不變價格計算），農業和工業產量的增長每年分別約為3.8%和18.7%。[[19]](#_19_Zhe_Liang_Ge_Bai_Fen_Bi_Gen)由于人口的年增長率為2.4%，人均生產增長6.5%，按此速度國民收入每11年將翻一番。中國在20世紀前半期的生產增長勉強趕上人口的增長（兩者每年各約為100），與此類型相比，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特征是明顯的加速度。[[20]](#_20_Po_Jin_Si____20Shi_Ji_Zhong)中國的經驗與大部分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是值得稱贊的，在20世紀50年代，那些國家的年人均增長率約為2.5%。[[21]](#_21_Fa_Zhan_Zhong_Xin_Jing_Ji_He)例如，另一個大陸型的農業經濟國家印度的最初經濟條件與中國相似，它在20世紀50年代的人均增長率遠不足2%。[[22]](#_22___Jiao_Bu_Fa_Da_Guo_Jia_De_G)

以國民經濟衡量發展的局限性，特別在低收入國家，是眾所周知的，但是中國發展綱領的成就還可以用其他衡量方式來證明。人的壽命是一個國家健康狀況唯一的最佳標志，它從1950年的36歲延長到1957年的57歲，比當時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壽命多15歲。[[23]](#_23___Zhong_Guo__She_Hui_Zhu_Yi)學齡兒童的入學比率同期從25%增至50%，進入大中學校的人數也大量增加。隨著國家幾乎完成了一億平方米的職工宿舍，城市居住條件改善了。私人消費支出以不變價格計算也大有增加。現代部門的名義工資增加了40%以上，而這些工人的生活費用只上升了10%。這樣，工資實際上增加了幾乎1/3。由于增加產量和適度地改善了農產品和制成品的交換，農民的收入增加了約1/5。

此外，中國的成績是在適度的外國財政援助下取得的。下面將要指出，雖然蘇聯提供的生產資料對建立工業中幾個重點部門是極為重要的，但大部分蘇聯的機器設備或是通過付現，或是通過相對的短期貸款，而不是通過單方面轉讓或長期的優惠貸款獲得。所以這些進口貨并沒有大幅度地減低限制當前消費增長的必要性。

最后，到1955—1956年，中共已經比公開宣布的日程提前完成了一系列消滅作為生產和就業重要源泉的私營部門的制度改革。1953年大約總產量的2/3來自個人擁有的農田、手工業企業和工廠，但到1957年，它們的產量被削減到不足3%。國家通過把國家的直接所有制擴大到包括全部現代工業的領域，通過把私人手工業改組成合作社以實施間接控制，鞏固了它對經濟的控制。在農業方面，到1956年底，95%以上的農戶已被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有效地消滅了土地、耕畜和農具等的私有制。[[24]](#_24_Guo_Jia_Tong_Ji_Ju____Wei_Da)與蘇聯的集體化相比，農業的產權制度的改革進行得非常順利。1932年，蘇聯的農業產量與私人耕作的最后一年即1928年相比，足足下降了1/5，而中國在1953—1957年期間，產值卻上升了1/5。[[25]](#_25_Bao_Luo__R_Ge_Lei_Ge_Li___Lu)

但是，最顯著的不同是在農民的投資動態方面。伴隨蘇聯的集體化是大量減少投資，耕畜的數量急劇下降，因為農民寧可屠宰它們為自己食用，而不愿把它們無償地交給新成立的集體農莊。與此相似的是，私人農業投資大幅度下降。對比之下，1955—1956年，中國存欄的耕畜只是適度地減少，存欄的豬減少了15%，因為一開始農民在獻出耕畜和其他農具時就得到補償。此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私人的和合作社的農業投資總數為170億元，平均每年投資總額為34億元，是國家農業預算投資的幾倍。[[26]](#_26_La_Di____Zhong_Guo_Xian_Dai)這類投資又被以下的認識所推動：投資的巨額收益將使那些愿意放棄立即消費的人獲益。

####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戰略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戰略以馬克思主義擴大再生產原則的信條為堅實的基礎，即確定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為增長的主要源泉。這個戰略在類似于蘇聯1928—1937年盛行的那種資源籌措和分配的類型中得到了反映。

首先，投資率突然從戰前約5%的水平猛增至遠遠超過20%的平均水平。當時產量被用于償還或擴大基金而不是增加當時消費的比率，幾乎是50年代印度所達到的兩倍，并且接近1928年開始的斯大林強制擬定的工業化綱要推行高潮時期盛行的水平。即使接近蘇聯的投資率，這也是了不起的，因為在中國，推遲增加消費一定更加困難，中國的國民收入的人均水平只有1928年蘇聯的1/4左右。

其次，類似蘇聯的第二個情況是把絕大部分投資資源投放到工業中，特別是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部門中。既然農業直接生產國民收入的一半以上，并且使用了全部勞動力的4/5以上，農業投資（不算農民自己的投資）是非常有節制的，不到總投資的8%。一半以上的投資投入工業，其中幾乎90%撥給諸如冶金、機器制造、電力、煤、石油和化工等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門。撥款用來擴大農機和化肥生產的小部分工業投資（3%），證明五年計劃中農業被排在靠后的地位。[[27]](#_27_La_Di____Zhong_Guo_Xian_Dai)

再次，在優先發展規模很大和資本密集的制造業方面，中國的工業化戰略與30年代蘇聯的戰略相似。工業化綱要的核心由156個蘇聯援助的項目組成，它們一共吸收了一半左右的工業總投資。這些工廠的特點是規模大，每名廠內工人所占的資本份額高。

資源籌措和分配的類型以及對很大規模的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工廠的優先照顧，幾乎必定會產生一種與蘇聯相似的集中的計劃體制。早在1949年，東北在東北行政區主席高崗領導下就開始了經濟計劃。出于幾個原因，1948年就控制在中共之下的東北，此時成了計劃工作的一個重要試驗場所。第一，從一開始，區內很大一部分工廠就由政府控制。中共從國民黨那里接管了這些工廠，而國民黨在此以前已經經俄國人之手從日本人那里收回了這些工廠。這樣，在開始國家計劃之前就不必再沒收這些大工廠或使之國有化。第二，絕大部分工廠是重工業，特別是黑色冶金業（新政府置于最優先地位的部類）方面的。

第三，鄰近蘇聯可能是一個有利的因素。自1945年以來，蘇聯人已經控制了中國的滿洲鐵路（即前日本的南滿鐵路），并且經營了與鐵路有關的工廠以及與蘇聯控制的海軍基地旅順港有關的一些企業。在毛澤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三個月，高崗在莫斯科簽訂了東北人民政府和蘇聯之間的貿易協定。蘇聯在這個地區的作用早在1949—1950年時期就加強了，當時蘇聯專家開始來到鞍山和本溪等主要鋼鐵企業；鞍山和本溪是共產黨中國之前的兩個最大的鋼鐵企業。[[28]](#_28_M_Jia_De_Na__Ke_La_Ke____Zho)

最初在東北使用的制訂計劃的技術很快在全國范圍內被采用。1952年10月和11月，國家統計局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分別在薛暮橋和高崗的主持下成立。[[29]](#_29_Li_Zhuo_Min____Gong_Chan_Dan)約在同時，一整套縱向組織的工業部成立，以控制各個專業生產區。這些部各管它生產范圍內的最重要的企業，而不管這些工廠位于何處。[[30]](#_30_Tang_Ni_Suo_En_De___Zhong_Gu)

中國人還采納了蘇聯人的與這一組織結構有關的許多資源調撥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編制物資平衡計劃的制度。這個制度規定，國家計劃委員會和中央政府的一些部編制最重要的工業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計劃。這樣，主要商品的分配直接歸中央的計劃人員掌握，而不通過市場機制。分配產品是為了達到計劃的目標。在1952—1956年期間，受這種調撥形式制約的商品數從28種增加到200種以上。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受物資平衡制約的這些商品生產的份額上升，所以到1956年，這些產品產量中通過市場分配的部分急劇下降。[[31]](#_31_La_Di____Zhong_Guo_De_Jing_J)這樣，影響工業品分配的相對價格的作用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 農業的發展和改造

多少令人驚奇的是，采用包括籌措大量資源以用于制造業的蘇式的全力工業化戰略和忽視農業的這些做法，似乎沒有在中共黨內引起爭論。沒有證據表明，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前曾經出現任何類似20世紀20年代蘇聯關于工業化問題的爭論；在爭論中，E.A.普列奧勃拉津斯基的“大力推動”工業化的綱領的理論與N.I.布哈林的工農業均衡發展的理論針鋒相對。[[32]](#_32_Si_Di_Fen__F_Ke_En____Bu_Ha)相反，普列奧勃拉津斯基關于在農業的強制積累基礎上迅速工業化的觀點卻在中共黨內得到廣泛的支持，這對當時世界上號稱有農業淵源的唯一的共產黨大執政黨來說，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件。但是在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確出現了關于主要資源分配問題的爭論，因為計劃賴以制定的重大前提證明是虛假的。

至少到1954年或1955年尚無人懷疑的一個主要假設是，農業不會嚴重地限制工業化。當1952年編制計劃時，農業的增長異常迅速。中國兩種最重要的作物——糧食和棉花——在1951—1952年期間年平均增長率為11.5%和37.3%。雖然有人認識到這種不尋常的迅速增長部分地是由于暫時的復蘇，不可能持續下去，但在1953年7月第一次公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糧食增產指標相對地說是高的，每年為5.3%。[[33]](#_33_Ken_Ni_Si__R_Wo_Ke____Hui_Gu)此外，有人還設想，取得這種速度，可以不通過增加投資，而主要通過更有效地利用勞動力、土地和其他的投入（首先是靠普及互助組的辦法）。合作化將進行得極為緩慢。中共中央委員會在1953年定的指標預計到1957年底只有20%的農戶參加合作社。[[34]](#_34_Tong_Shang_Shu__Di_9Ye)

計劃的農業生產增長速度超過了預計的對糧食和其他農產品需要的增長，后者取決于人口和人均收入增長的比率以及對農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結果，在進行編制工業發展計劃時沒有謹慎地研究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工業生產的增長速度被假定只受制于生產資料這一部類的能力。對日益擴大的工業勞動力需要的食品供應或紡織工業需要的纖維作物等農業原料的不容置疑的必要增長率則沒有認真考慮。

農業的增長在1953年和1954年明顯地減慢了，從而觸發了一場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性質的廣泛的辯論。在1953年，糧食只增產2.5%，遠遠低于計劃的9%的增長率；原棉產量下降了9%以上，而計劃的增長指標為16%。1954年，糧食產量稍有增加，增加了1.6%，而計劃的增長率為9%以上；原棉產量再次下降了9%以上，而計劃的增長率為17.8%。[[35]](#_35_Tong_Shang_Shu__Di_23Ye)

由于經濟以占絕對優勢的農業為特點，這些虧空對經濟發展的步伐和對第一個五年計劃（雖然已經過了兩年，但它仍在編制階段）來說，有著嚴重的影響。陳云直到1955年3月才把計劃提交黨的中央委員會，到7月李富春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次發言中公開宣布這一計劃，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就是如何去處理1953年和1954年農業方面沒有預料到的不盡如人意的問題。[[36]](#_36_Ken_Ni_Si__R_Wo_Ke____Hui_Gu)

下降的農業增長率迫使計劃人員去審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前提。在制定計劃的早期階段基本上被忽視的農業和工業的各種聯系成了這次復查的特別突出的一個部分，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農業的低度增長直接和間接地沖擊著工業生產。農業為制造輕工業產品提供了4/5以上的原料，而輕工業產品又足足占了工業生產的一半以上。農業還間接地影響工業增長的步伐。政府的歲入大部分來自巨額的間接稅，這項稅收包括在大部分制成的消費品零售價格中。高價格意味著生產輕工業品的工廠可以取得厚利；由于這些工廠為政府所有，所以這些利潤的絕大部分直接成為政府的預算收入。農業增長的減慢因此急劇地減少了政府收入的增長，轉過來又減少了可以撥給工業的投資。此外，農產品的出口是賺取支付進口貨的外匯的主要來源，這些進口貨絕大部分又是構成工業投資規劃核心的生產資料。在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農產品和加工的農產品（包括棉織品和絲織品）占中國全部出口貨的整整3/4，而90%以上的進口貨由機器設備和其他生產資料組成。[[37]](#_37_Guo_Jia_Tong_Ji_Ju____Zhong)

第二，農業發展的緩慢步伐導致了整個1953年食用糧的供應危機。這場危機有幾個征兆，但它可以主要地歸結為一個原因——國家對糧食交易的干預。在1950年和1951年，國家通過推動恢復民間農村集市，以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國家通過征收實物農業稅和向農村集市收購，來設法滿足自己的需要（如向城市市場增加糧食的供應量，控制價格，供應國營的食品加工廠，滿足出口需要）。由于1951年以后國家需要增加，而稅糧只是適度地增加，國家的收購日益成為一個重要的供應來源。因為收購價格不斷上漲，國家的收購變得越來越花錢。為了減少花費，國家設法限制私人交易活動，并建立可以用作控制市價上漲，甚至強迫它下跌的杠桿的壟斷地位。

但是這個策略失敗了。1953年，谷物和其他農產品的市價繼續上升，部分原因是農民不愿向國家銷售糧食。在有些地區，私商付給農民的價格高于國家40%，政府的收購計劃大部分沒有完成。

因為城市地區對食物的需求繼續增加，1953年大范圍的水災又使農村地區增加了谷物的需求，國家被迫銷售糧食，其數量超過了收進數。在1950年和1951年，國家的庫存是在6月（正值華中冬季作物收獲之前）跌到低水平，而1953年則不同，整個夏季國家的銷售量都超過了收購量。從7月到9月底，國家的儲存減少了130萬公噸，這個數量是驚人的，因為國家總儲存量只有870萬公噸，其中大部分要用做種子和日常周轉的庫存，這種需要不能減少。

此外，根據陳云的說法，在1954年6月新糧又上市之前所剩幾個月的前景依然是暗淡的。即使能夠完成收購計劃，估計的虧空仍有435萬公噸。但是陳云在1953年10月透露，由于整個9月收購不足，還因為東北嚴重的水災已經把那里估計的產量從2200萬公噸減到1805萬公噸，從而把收購指標從500萬公噸減至380萬公噸，收購計劃將不可能完成。[[38]](#_38_Chen_Yun____Shi_Xing_Liang_S)

最后，糧食危機明顯地表現在國家在國內地區之間調運糧食的能力明顯減弱這一方面。地區間的糧食調運對支持新政府自稱將比國民黨人更有效地對付自然災難的說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關鍵在東北，那里在平常年景是有余糧的區域，又具有通往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可靠而又相對便宜的鐵路運輸條件。因為東北是共產黨軍隊最早控制的區域（1948年林彪的第四野戰軍決定性地擊潰了國民黨軍隊），它早在1949年就能夠供應260萬公噸的糧食。[[39]](#_39_Ai_Lun__S_Hui_Ting____Zhong)這些供應糧被調運到其他地方供消費之用，其中大部分很可能用于軍隊，而當中共軍隊在1949年橫掃南方時，由于國民黨領導的部隊成批地投誠，軍隊的規模日益擴大。東北向中國其他地區的糧食出口在1951年因不利的天氣而減少，但在1952年開始恢復，并計劃在1953年達到210萬公噸。此數幾乎是中央當局可以用來作地區間調運以滿足京津等集中的城市人口需要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以致當地余糧不足的地區的農民需要的480萬公噸糧食的一半。[[40]](#_40_Chen_Yun_Zai_1951Nian_5Yue_D)但是東北產量和收購糧的減少使可以調到區外的余糧減到130萬公噸，這樣中央掌握的總供應糧就降到只有400萬公噸，此數只相當于年產量的2.4%左右。[[41]](#_41_Chen_Yun____Shi_Xing_Liang_S)

這樣，到1953年秋季，大危機隱約出現了。糧價在許多農村集市大幅度上漲；有的城市缺糧現象明顯——不僅在天氣不好的地區，而且在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國家的糧食庫存量很低，而且在減少；中央政府可以在地區間調運以滿足地方缺糧的供應糧少得驚人。

對付這場危機的一個辦法本來可以把農產品收購價至少提高到市價的水平，以刺激農民向政府增加銷售。但是由于以固定的價格向城市居民銷售糧食的義務，這種辦法會減少國營糧食分配系統的利潤，從而直接減少國家的收入。同時將會出現的現象是，提高收購價格不但會減少用于投資的資金的流動，并且必須把減少的投資總額進行有利于消費品部類的再分配，因為刺激性規劃的成功歸根到底取決于增加與農民收入的增長相稱的消費品供應。所以，不能把提高收購價格的措施設想為一項孤立的政策，它將減少投入生產資料部類的資源，從而降低以后幾年的投資比率。雖然有證據證明有人力爭縮小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工業化規模，但這條行動路線被否定：高速度的工業化仍被放在最優先的地位。

寄以希望的解決辦法是，1953年晚秋實行以固定價格強制收購糧食的制度和適當地加快合作化的步伐。1953年收購年（到1954年6月結束）的計劃收購水平增加了500萬公噸，總數達到2200萬公噸，而原來在8月份通過的市場收購指標為1700萬噸。為了完成這一較高的指標，國家限制了私人的糧食交易，禁止私營面粉廠主自行購銷糧食。相反，他們成了國家的收購代理商，代表國家的收購機構糧食部收購。城市和集鎮中的傳統糧食市場改成國家的糧食市場，主要是為了保證在提高的國家收購指標完成前沒有糧食交易。最后，中央政府加強了在地區間調運糧食的能力，辦法是維護它每年調整糧食流通的權力。[[42]](#_42_Ni_Gu_La_Si__R_La_Di___Ken_N)

在短期內，強迫交售制為進行強制擬定的工業化規劃提供了資源。收購量上升了500萬公噸，達到2200萬噸的指標，從而給國家提供了充分的糧食以滿足它的多種需要。在某種意義上，中共利用了以前在土改時期建立起來的友好關系來增加低價的收購，以便發動巨大的工業化運動。由于收購制度提供了把物資部分無償地轉出農業部門的手段，中央當局逐漸相信原來為工業定的計劃高增長率可以用較低的農業增長維持下去。這樣，在強制交售制的一年試驗以后，第一個五年計劃糧食生產的計劃增長率從5.3%降到4.6%，但工業生產的指標不減。[[43]](#_43_Wo_Ke____Hui_Gu_Ji_Ti_Hua)

可是前面已經指出，1954年的農業生產是很令人失望的；也不清楚國家通過強制交售制能否保證得到足夠的低價糧的供應。為了加強中共對農村的控制和確保不斷地向國家交糧，合作化的步伐于是逐漸加快。可是到1954—1955年之間的冬季，合作化規劃遭到農民的有力的抵制。為了達到組成農業生產合作社數字的指標，地方干部普遍違背了作為規劃基礎的自愿互利的原則。農民受到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待遇，甚至違背自己的意愿被迫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干部常常扣留不愿組織合作社的個體農民和互助組的貸款，并且給堅持者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在有些地區，出現了沒收養魚塘、果樹和牲畜等私人財產的情況。在一些地區，干部直接把個體農民組成農業生產合作社，繞過了互助組這一中間階段，出現的問題最為嚴重。在這些地區，幾乎沒有基礎去指望合作社農業取得成功，因為那里沒有制定按勞動和資本份額分配產品的章程。例如，在浙江省和華中，土改完成得晚，到1953年只建立了3300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但到1954年，合作社數增加到5.3萬個。[[44]](#_44_Qiang_Yuan_Gan___Lin_Bang_Gu)

最嚴重的困難之所以產生，不是由于農業生產合作社內部管理和組織的問題，而是由于國家在1954—1955年對糧食的過度收購。參照起來看，在1956年，周恩來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和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都間接指出問題出在所談到的超計劃收購350萬公噸糧食這件事上。[[45]](#_45_Zhou_En_Lai____Guan_Yu_Fa_Zh)雖然與糧食總產量相比，這個數字是很小的，但它主要是從已經組成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地區取得的。總之，從《人民日報》社論號召不惜一切代價增加收購中可以看出，在已經組成農業合作社的地區，地方干部在對政治壓力作出反應時從農民那里榨取更多糧食的能力最大。在這些地區的黨的干部，可以簡單地留下更多糧食上繳國家，而不必與個體農民生產者就他們被要求繳納糧食的數量進行商討。[[46]](#_46_Qiang_Yuan_Gan___Lin_Bang_Gu)

這樣，到1955年春，在鄉村出現了真正的供應危機，許多被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正在經受極度的缺糧。最嚴重的事例之一發生在浙江省溫州地區的平陽縣。中央財政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政法小組的聯合調查后來報道說，過量收購引起的嚴重缺糧已經造成“溫州的不穩定”。到3月，黨的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得到黨中央的同意后電告浙江省委，要求暫停實行合作化規劃和適當壓縮農業合作社的數字。最后，合作社壓縮了1.5萬個，剩下約4萬個。[[47]](#_47_Qiang_Yuan_Gan___Lin_Bang_Gu)

但是問題不限于浙江。在4月，最高的政府機構國務院通過了一個在全國實行的決議，要求暫停合作化。希望春耕季節開始之前恢復對生產者的鼓勵。4月底，以鄧子恢為首的農村工作部召開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向各省的黨的干部解釋收縮政策。鄧子恢顯然遵照幾個星期前劉少奇召開的一次批判性會議上提出的建議，要求不要搞全面的收縮，而是執行不同地區區別對待的方針。在中南和西南兩個大區，有的省的合作化步伐已經有節制，可以繼續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不過速度要適度。在1954—1955年原來已經匆忙建立合作社的地區，一切組建活動應該停止，直到1955年秋收完成以后。原來沒有適當基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要在浙江和河北，但也在山東、安徽和河南——應予解散。政策的精神可以歸結為三個字的口號——停、收、放（發展）。[[48]](#_48_Deng_Zi_Hui____Zai_Quan_Guo)

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觸發了一場引起黨內不和的斗爭。毛澤東終于認為，農村工作部正在破壞合作社的規劃。在他看來，退社的農民太多，預定的1955—1956年的合作化步伐太慢。在農村工作會議以后幾個星期，毛澤東在5月17日的一次有各省、市黨委書記參加的會議上設法把已在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討論過的政策重點轉移到第三個字，即放（發展）字上來。

可是在1955年的整個春季，鄧子恢的觀點得到廣泛的支持。最重要的是，甚至在毛澤東的5月17日會議之前，政治局批準了鄧子恢的計劃，即在來臨的冬季不去擴大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數字，而是去鞏固保留的65萬個合作社。在5月的最后10天，鄧子恢和毛澤東就1955—1956年的合作化的計劃速度進行了后來所說的“激烈的爭論”。[[49]](#_49_Qiang_Yuan_Gan___Lin_Bang_Gu)

由于政治局已經批準了這項政策和鄧子恢拒絕讓步，毛澤東暫時孤立，不得不另求加快合作化步伐的方法。毛澤東的方法是對鄧子恢和農村工作部的右傾思想發動攻擊。毛澤東在1955年7月31日對各省黨的領導人的著名講話中發動了這個運動，在發言中他堅決主張條件對合作化有利，黨的領導落在農民要求的后面，只有農業生產合作社能夠阻止農村階級陣線的進一步分化。[[50]](#_50_Mao_Ze_Dong____Guan_Yu_Nong)除了直接鼓勵各省的黨委書記加快合作化的步伐外，毛澤東還任命他的兩個最信任的助手陳伯達和陳正人為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開始為正式指責鄧子恢奠定基礎。

到秋季，當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會在10月份召開時，毛澤東扭轉了形勢。陳伯達做了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樂觀的報告。劉少奇為前一個冬季批準了有關合作化步伐的保守政策做了自我批評。鄧子恢顯然沒有悔改，處境孤立。他本人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全會決議譴責他為“右傾經驗主義者”。全會結束后不久，已在黨員中流傳的毛澤東的7月講話在《人民日報》發表。[[51]](#_51_Luo_De_Li_Ke__Mai_Ke_Fa_Kua)

全會為農業的全面改組奠定了基礎。毛澤東預示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自行實現了，因為地方的黨的干部覺察到，他們的忠誠和政治可靠性將根據合作化的速度來衡量。在秋季，不到全部農戶的15%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6年1月，即在全會后的三個月，已有80.3%的農戶參加。[[52]](#_52_Wo_Ke____Hui_Gu_Ji_Ti_Hua)運動在1956年達到了狂熱程度，當時實際上全部農業人口都被重新組織進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這一年年初，幾乎全部都是初級合作社，每個社平均30—50戶。到年末，88%的農民被組織進某種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但大部分是高級的，每個社平均200—300戶。[[53]](#_53_Guo_Jia_Tong_Ji_Ju____Wei_Da)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形式對黨的干部有雙倍的吸引力，因為他們在說服農民信奉更高階段的社會主義中顯示了他們自己的積極性，而且可以緩和把凈農業收入分成租金和工分份額時經常引起爭論的手續問題。投入大量土地、牲畜和農具的農民更愿意把凈產量的較高份額以租金形式分配，作為投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財產的報酬。幾乎全部依靠工分收入的貧農則愿意把較大的收入份額以工分的形式來分配。先進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通過取消一切租金支付來消除這種沖突。

雖然毛澤東似乎已取得徹底的勝利，但是1955—1956年的集體化運動對中國的農業問題甚至沒有提供部分的解決辦法。直接的后果是，隨著集體化出現的各項政策引起了農業嚴重的短期破壞。在最初，有人認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成使得制定農業的直接計劃成為可能，以代替20世紀50年代初期盛行的對間接的計劃（或價格計劃）的依靠。在實行價格計劃時，中央的計劃工作者在相對價格而不是在直接下達播種面積指標的命令的基礎上，已經在設法影響對土地、勞動力和經常性投入的分配。這樣，例如在1950年和1951年，當認為棉花按比例來說應該多于糧食時，棉花和糧食收購價格的比率已經做了變動，以鼓勵在播種面積、勞動力以及經常性投入（如肥料）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以棉花代替糧食。這一政策，再加上農村集市——收購指標完成后可以在那里出售糧食和其他農產品——鼓勵了具有地方和區域相對優勢的地帶實行專業化。當組成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有人曾試圖以直接計劃制代替這種間接計劃制；直接計劃制是以詳細規定的全國播種面積和產量指標為基礎，先就全國范圍訂出，然后按行政等級往下分配，從省、縣，最后到農業生產合作社。同時，隨著直接計劃制的采用，國家關閉了能促進種植有相對優勢的作物的幾萬個農村集市的大部分。

與集體化高潮有聯系的這些極端的政策很快就被糾正。農村集市在1956年夏又被開放；在秋季，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批準了重新依靠相對價格的控制方法，把它當做影響耕作制和發展不同作物的主要工具，以此含蓄地承認農業中的直接計劃制的缺點。

雖然短期的過頭行為被糾正了，但合作化對已提高了的農業的發展或生產力似乎沒有作出貢獻。1956年和1957年的增長速度依然遠遠低于五年計劃公布的經過修改的指標。蘇聯集體化中最嚴重的暴行是避免了，但這不單純是由于更靈活細致的行政工作或黨熟悉農村情況。相反，相對順利的改造卻使國家承擔了巨大的短期性代價，如果發展的政策不作重大改變，這個代價是不能繼續承擔下去的。

首先，為了使農民相信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單純是把更多的資源無償地流入國家之手的手段，國家的收購數量退回到1954—1955年收購的水平。其次，為了減少以前對強迫手段的依靠，黨保證在1955年秋季，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將增加收入。[[54]](#_54_Wei_Wei_En__Shu____Guo_Du_Zh)盡管以前也有這類聲明，但這未能通過提高生產力來予以保證，在短期內卻通過人民銀行向農業生產合作社發放大量貸款而部分地做到了。在幾年內，未償還的農業貸款數量每年增加一至二億元，但在1956年年底，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未償還貸款激增到20億元以上。[[55]](#_55_La_Di____Zhong_Guo_Xian_Dai)這樣就使得農業生產合作社能夠大大地增加社員的收入。發放的信貸每個社員合4元，當農民每年的現金收入只有約15元時，這個數額是很可觀的。[[56]](#_56_Tong_Shang_Shu__Di_243Ye)

第三，集體化在限制階級分化方面只取得部分的成就。土地改革已經把大量土地（農村最寶貴的財產）做了對農村社會最貧困的成員有利的再分配。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成據認為對收入的分配沒有什么影響，因為社員將得到他們投入的土地和其他資產（如耕畜）的租金。不會發生進一步的收入平均化，除非出現這種情況：某些合作社中分配過程的內部動力能夠使付作租金的收入份額少于合作化以前的租金收入份額。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成標志著在土改以后朝更平均的分配邁了重要的一步，這不但是因為它消除了以前給投入的土地和其他資產的報酬，而且因為勞動報酬是根據更多家庭的集體生產付給。

但是當1956年完成集體化時，有75萬以上的獨立的生產和結算單位，而這些單位重新分配收入和資源的機制普遍很弱。國家的支出和稅收政策是特別軟弱的再分配工具，因為國家的農業支出很少，并且幾乎全部用于很小一部分的國營農場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項目。此外，農業稅收絕大部分是間接的，不是為完成分配的目標而制訂的。這樣，雖然可以從集體化得到短期的分配收益，但它并沒有建立任何機制以防止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內部收入和財富差距的擴大。

盡管有這些困難，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農業總的說仍取得了中等良好的成績，這個部門畢竟在享受國家投放的資源時順序排在后面，況且農業內部生產的資源又大量無償地調出以支援工業的發展。按價值計算，產量每年上升4.5%，剛好超過公布的指標速度。糧食作物每年增加3.7%，棉花增加4.7%，都剛剛超過1955年計劃公布的最后指標。[[57]](#_57_Guo_Jia_Tong_Ji_Ju____Wei_Da)

可是在幾個方面，農業的增長一定使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失望。首先，如前所述，農業部門增長的指標在正式計劃公布之前已經幾次削減。1954年原來宣布的糧、棉增產指標分別為4.6%和7.7%，而在公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卻被年增長率3.3%和4.6%的指標所取代。[[58]](#_58_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所以雖然執行的結果達到了大部分指標，但遠遠低于原來的期望。此外，與原來的期望相反，農業集體化沒有導致更迅速的增長。1956和1957年的平均增長低于以往幾年。

第二，有幾項顯然沒有達到計劃的指標，如大豆產量增長的比率約為計劃的1/3；油料籽（油菜籽、芝麻、花生）和肉類的產量停滯不前。

第三，低增長率意味著大部分農產品的人均消費量的增長是中等水平以至于零。1952—1957年期間糧食人均消費量提高不到3%。[[59]](#_59_La_Di____Zhong_Guo_Xian_Dai)棉布的消費量年年波動，但1956—1957年的平均消費量比1952—1953年的平均數增加了不到10%。食用植物油的人均消費量下降甚多，同時豬肉、牛肉和羊肉的消費量沒有增長。[[60]](#_60_Mian_Bu___Zhi_Wu_You_He_Rou)對糧食、棉布和植物油，必須實行定量以分配這些有限的供應品。早在1953年，有些地區的市政當局已開始對糧食和植物油實行配給；1955年，全國的城市地區實行一種統一的票證配給制。1954年對城鄉居民發放配售棉布的票證，直到1983年，這個辦法才停止。農業生產的緩慢增長還意味著出口的成績不盡如人意。到1957年，花生、花生油和生豬的出口不到計劃開始前的1952年出口水平的50%。[[61]](#_61_Guo_Jia_Tong_Ji_Ju____Zhong)

最后，在許多方面都最為緊急的是，交售給國家的食用糧數量落后于通過國家分配渠道供應的糧食需求。一方面，實物糧食稅和以固定價格交售給國家的糧食兩者的數量在1954年達到了4500萬噸的最高峰，然后逐漸下降。前面已經討論過，在最初，這是有意地把收購量減到低于1954年水平的結果。但是在1956和1957年繼續下降，這部分地是因為國家發現，當農民在私營市場上獲得的糧價高于國家提出的價格時，就難以強迫農民交售。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收購量已降到3980萬噸，低于1954年水平的10%以上。[[62]](#_62_La_Di____Zhong_Guo_Xian_Dai)在同時期內，糧食產量已經增加了2300萬噸。實際上，交售給國家的糧食作物的份額大幅度下降了。

當國家掌握的糧食的絕對數字下降時，對糧食的需求正在不斷地增加。非農業人口（主要是長期城市居民，但也包括有資格享受配給糧和食用植物油的國家雇用的住在農村的居民）的數字從1952年的8300萬增加到1954年的9800萬，然后又增加到1957年的1.06億。[[63]](#_63_Zhong_Guo_Ren_Ba_Ta_Men_De_R)1955年夏在城市地區全面實行糧食定量的措施是企圖減少城市的人均消費量。但是定量的水平在1956年不得不增加，這部分地是對一次增加工資高達30%的大改革以后需求增加的反應。1956年出現的城市人口和工業勞動力的猛增，使供養非農業人口的可以利用的供應糧更加緊張了。[[64]](#_64_Wo_Ke____Zhong_Guo_Shi_Yong)國家必須用它所掌握的有限的糧食供應糧食加工業（主要是酒類生產）、飼料工業、從事畜牧和其他非糧食作物生產活動的農業人口的消費和出口等方面的需要。

總之，雖然農業產量的增長超過了人口的增長，但與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的期望相比，增長率是低的；隨著加快的集體化，并沒有出現更快的增長，甚至在1956年1月公布的12年農業綱要草案的推動下也是如此。此外，有些作物根本沒有增產，國家預見到糧食的需要量甚至超過了在強制交售制下它能從農村獲得的數量。1953年和1955年春的農村糧食危機，已經預示著以日益增長的城市需要為一方，以農村的需要為另一方的潛在的廣泛沖突。[[65]](#_65_Xiao_Dao_Li_Yi____Zhong_Guo)

#### 工業的增長

雖然農業落后于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所設想的指標，工業的發展卻大大地超過了計劃指標。工業生產作為一個整體上升了130%，大大超過了計劃規定的100%的增長。上述計劃增長的大部分是生產資料，它們超過了計劃水平的40%以上。鋼鐵、機械和化學制品是增加的產量中份額最大的部類。[[66]](#_66_Guo_Jia_Tong_Ji_Ju____Wei_Da)

雖然生產資料的產量翻了兩番以上，消費品的產量卻只增長了83%。繼承下來的最重要的工業，棉紗和棉布的產量增長不足1/3。[[67]](#_67_Guo_Jia_Tong_Ji_Ju____Wei_Da)輕工業生產發展的緩慢步伐反映了農產品的緩慢增長。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部消費品的4/5以上依靠農業提供的原料。棉紡和絲織業、磨面和白米等糧食加工業和制鞋業全部依靠農業部門提供的原棉、稻麥和皮革。在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由于缺乏原料，這些工業中的大部分都遠沒有發揮其生產能力。計劃為這些工業制訂的相對緩慢的增長反映了在分配國家的資源時農業處于靠后的地位，同時也反映了對生產資料，特別是鋼鐵和機器優先發展的保證。

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懸殊的發展速度反映在工業的結構改造方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前夕，生產資料只占全部制造業產品的1/3，到計劃末期，它的份額已經明顯地上升到了一半。[[68]](#_68_Tong_Shang_Shu__Di_90Ye)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工業發展還著手解決地區的不平衡問題。現有的工業中心，如東北和以前的條約商埠城市，在發展的前景方面有巨大的優勢，因為它們在社會基本資金和基礎事業方面享受大量優先的投資，另外還有許多高度熟練的工人、有經驗的工業管理人員和多種規模的經濟，等等。另一方面，這些地區與內地很少有經濟聯系，這樣，以向原來占優勢地區集中投資為基礎的策略就可能很少有外流的后果，從而導致地區間差別的迅速擴大。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部分時期，中央的領導深思熟慮地想把人力和投資資源從先進的地區重新分配到較貧困的地區。對這些地區的投資項目包括重要的基礎事業投資，特別是鐵路和公路；開采和提煉自然資源的工業，值得注意的有煤炭、有色金屬和石油工業；以及生產國內市場貨物的工業企業。[[69]](#_69_La_Di____Zhong_Guo_De_Qu_Yu)

內地的運輸和其他形式的基礎事業的發展，是地區發展政策中的一個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在1950年，中國的鐵路系統位于京廣鐵路以西的不到1/5，新疆、青海、寧夏和四川等內陸省份根本沒有鐵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總計鐵路線長度翻了一番以上，幾乎所有的新線都建于內地。到1957年，這些內陸省份都有鐵路通到中國其他地區。除寶成鐵路外，這些鐵路還包括連接內蒙古包頭與新疆的鐵路，四川省內的成渝鐵路，以及甘肅、內蒙古和貴州境內的主要鐵路。

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工程之得以進行，只是由于更先進地區的大量人力和資本資源的投入。20世紀50年代初期采用的統一財政制度使預算資源以社會主義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不多見的方式進行地區間的調撥成為可能。上海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它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夕生產了工業總產量的1/5，但是只得到全國投資的、2.5%。上海還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資源以支持其他地區的工業化。到1957年，超過25萬工人（其中2.8萬被明確地鑒定為技術人員，17萬為熟練工人）遷出上海，到外地有工程的地方長期定居。[[70]](#_70_La_Di____Zhong_Guo_De_Qu_Yu)

與中國的歷史經驗相比，和與其他地方在現代經濟增長的最初幾十年的發展——這種發展一般導致地區間日益不平衡的格局——相比，這些規劃的結果是值得注意的。總的說，人均產值的省際差別大為縮小，這是因為幾個最先進的地區——特別是上海和天津——的增長率明顯地低于平均水平，而有些較貧困的省區——特別是那些有工業項目的省區——的增長則大為加快，這明顯地表現在新疆、內蒙古、陜西、青海和甘肅幾個省區。雖然中國的地區的發展規劃明顯地包含著許多沉重的政治負擔，但它確實扭轉了歷史發展的格局。當然，僅僅一個五年計劃不能改善以前50年發展的結果，但是它創造了有利條件。

#### 蘇 聯援助的重要性和作用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生產資料部類的迅速發展和工業在地理上的再布局，都不可缺少地依靠從蘇聯取得的資本貨物。投資規劃的核心由156個項目組成，蘇聯人為這些項目提供了設計和技術援助、建設和安裝方面的建議以及機器設備。這些項目幾乎吸收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部工業投資的一半。[[71]](#_71_La_Di____Zhong_Guo_Jing_Ji_D)對投資貨物——不但包括成套設備項目，而且也包括為其他工程進口的機器設備——進口份額的考察也證實了中國人的依賴程度。就整個計劃而言，進口貨相當于總投資的30%。[[72]](#_72_Gen_Ju_Jin_Kou_De_Sheng_Chan)

幾乎所有蘇聯援助的工廠都屬于生產資料部類。它們包括7個鋼鐵廠、24座發電站和63個機器制造廠。在這些設施中，有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最大最重要的項目：新建兩個位于湖北武漢和內蒙古包頭的新煉鋼廠，改建東北的鞍山煉鋼廠；還有長春的汽車制造廠、洛陽和哈爾濱的拖拉機廠和軸承廠以及蘭州的煉油廠。

蘇聯援助的工廠的地域分布反映了兩個情況：堅決優先保證工業不在1949年以前建立起工業的沿海城市發展，而是面向華北、西北和華中的新工業中心；為未來西南的發展打好基礎。絕大部分蘇聯援助的工廠都建在離開沿海省份的城市，如湖北的武漢、內蒙古的包頭、吉林的長春和四川的成都。

蘇聯人提供的技術援助在重要性方面不亞于或者超過了與這些工廠有關的機器設備。在這10年里，約有一萬名俄國專家在中國工作，他們勘探和調查地質狀況，選擇廠址，提供技術數據，訓練中國技術人員。此外，蘇聯國內的工程設計院大力投入了可行性研究、工程設計以及準備藍圖和制作圖樣等工作。[[73]](#_73_Ke_La_Ke____Zhong_Guo_Gang_T)

就在這幾年，2.8萬名中國的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前往蘇聯受訓。156個蘇聯援助的工廠各有廠長、總工程師和大批工人在蘇聯的工廠接受專門訓練：長春汽車制造廠派500人前往莫斯科—利哈切夫汽車廠受訓；洛陽拖拉機廠的173名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在莫斯科的哈伊科夫拖拉機廠受訓。[[74]](#_74_Zheng_Zhu_Yuan____1949__1963)

蘇聯技術援助和資本貨物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估計也不為過。它轉讓設計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術轉讓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外，中國看來已接受了蘇聯國內最先進的技術，在有些情況下，轉讓的技術是世界上最佳的。在蘇聯援助的最重要的部門鋼鐵工業中，蘇聯人在20世紀50年代建造和操作著世界上最好的高爐。蘇聯人設計的武漢和包頭的中國鋼鐵工廠吸收了蘇聯的高爐和平爐以及大規模鐵礦石富集方面的最新技術。[[75]](#_75_Ke_La_Ke____Zhong_Guo_Gang_T)

此外，雖然西方對中國的貿易限制使中國人沒有其他可以代替的明顯供應來源，但也幾乎沒有證據證明蘇聯人利用中國人的依賴，將這種貿易變為交換條件來為自己謀取利益。西方的研究說明，與歐洲國家購買有些蘇聯貨物相比，中國人付的價格稍高，這似乎反映了較高的運輸費用，而不是價格上的不公平。不過中國方面反映了一種意見，認為盧布和人民幣之間的匯兌率估高了蘇聯通貨的價值，對中國人不利。[[76]](#_76_Ya_Li_Shan_Da__Ai_Ke_Si_Tan)可以確定的是，如果與這幾年蘇聯盤剝東歐國家的方式相比，中國所受的待遇看來也是較為優厚的。[[77]](#_77_Ai_Ke_Si_Tan____Gong_Chan_Da)

但是，中國人對他們與蘇聯的經濟關系的性質依然感到失望，因為他們必須償付他們接受的貨物和援助。雖然蘇聯援助的工廠對中國工業的結構和地域性改造都是主要的，但只有一小部分是通過信貸獲得的，而蘇聯人又從不以無償形式提供援助。毛澤東在1949年后期第一次出國前往莫斯科，在那里為蘇聯的援助進行了幾乎兩個月的談判。結果是得到了兩筆經濟發展貸款中的第一筆。但貸款金額只有3億美元，據說只是毛澤東謀求數額的一小部分。第二筆1.3億美元的貸款是在1954年秋尼古拉·布爾加寧和尼基塔·赫魯曉夫率代表團來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五周年時宣布的。[[78]](#_78_O_Ai_De_Meng__Ke_La_Bu____Zh)

與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投入工業的250億元人民幣相比，這兩筆貸款金額就相形見絀了。按照官方的匯兌率，貸款的價值只有工業總投資的4%。此外，貸款的期限是比較短的。1950年的貸款由1951—1955年每年分貸6000萬美元的貿易貸款組成，從1954年起，將在10年內每年增值歸還。根據早期的還款規定，到1957年中國的純信用地位是負數，這意味著中國在與蘇聯進行貿易結算時必須保持順差。[[79]](#_79_Guo_Jia_Tong_Ji_Ju____Zhong)

中國與蘇聯的經濟關系的其他方面一定同樣令人失望。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人和蘇聯人建立了一批合資公司——例如大連造船公司、開采有色和稀有金屬以及在新疆提煉石油的幾個公司、一條在華北和西北以及在兩國間運行的航空線。但是到1954年，中國人要求解散這些公司，雖然原定建立它們要經營30年。從一開始，中國人對蘇聯在東歐把類似的合資公司用做一種剝削手段相當敏感，到1954年毛澤東顯然感到，讓另一國在中國國內享有特權地位的做法不再適宜了。

對中蘇同盟來說幸運的是，斯大林死后的領導——眾所周知的有赫魯曉夫——同意了，所以問題沒有產生大的怨恨就得到解決。這些公司在1955年1月正式解散，但是蘇聯人堅持要收回他們投入的價值約4億美元的資本。蘇聯人答應中國人以10年為期償付這些轉讓的財產，實際上放了一筆貸款。

##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編制

圍繞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討論預示著中國發展戰略的一個可能的重大演變。這個演變部分地是對第一個五年計劃成敗的不可避免的反應，但它也反映了中央的計劃部門和一些主要的非黨經濟學家（如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日益增加的獨立和成熟的程度。對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堅持受到批判，同時政府作出系統的努力以制定一項更符合中國低發展水平——農業占壓倒一切的地位，人口眾多——的政策。（這個努力最后被毛澤東的“大躍進”所阻，本書第八章將予討論。）

有關第二個五年計劃性質的爭論的動力似乎產生于1955年晚冬和1956年初春的一系列不尋常的會議，當時中央34個部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就工業、農業、運輸、商業和財政情況，向毛澤東、薄一波和其他黨的高級官員遞呈了詳細的報告。[[80]](#_80_Bo_Yi_Bo____Chong_Jing_He_Hu)雖然中共一直規定了形成更詳細計劃的基礎的經濟優先項目，但連續的會議給計劃人員和經濟學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去詳細地確定在具體政策的選擇上的經濟代價和內在意義。這些會議的前因后果也是不尋常的。

1955年后期，毛澤東已經在親自尋求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的辦法。這個努力不限于前面討論過的加快農業集體化的行動，而且包括加快對私營手工業和商業產業向國有制的過渡，以及在“多，快，好，省”的運動口號下加快工業的增長速度。在不斷加強的政治壓力下，1955年11—12月國家計劃委員會最后確定的1956年年度經濟計劃所包含的原來的指標，在1956年1月的下半月提高了。[[81]](#_81_Mai_Ke_Fa_Kua_Er____Wen_Hua)雖然計劃部門提出的調查和總的看法的文字從沒有公開，但它們似乎構成了對編制計劃過程中過分的政治干預的全面否定。總之，這些報告著重指出了1956年正在進行的小躍進的政治選擇所包含的高昂的經濟代價。

在黨內會議開過后，毛澤東作了題為“論十大關系”的關于吸取教訓的總結報告。這個報告明確地談到，計劃人員為第二個五年計劃設想的戰略在幾個重要的方面脫離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這個報告直到20年后才正式發表。[[82]](#_82_Zui_Chu_Fa_Biao_Zai___Ren_Mi)毛澤東顯然沒有完全接受計劃人員的態度，所以壓下了自己的報告不讓發表，以此來減少計劃人員的獨立性。從表面看，毛澤東的努力似乎沒有成功。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工作最初至少似乎是在1956年2月至4月期間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委員收到的一些報告的基礎上進行的。到6月，前一個冬天發動的生產運動的勢頭不顧毛澤東的有力反對而被壓了下來。[[83]](#_83_Mai_Ke_Fa_Kua_Er____Wen_Hua)

但是毛澤東的挫折顯然只是暫時的。在1956年末，當馬寅初兩篇重要文章的第一篇在《人民日報》登載時，爭論重新出現了。[[84]](#_84_Ma_Yin_Chu____Lian_Xi_Zhong)馬寅初支持采用國家計劃委員會已經贊同的一個更加平衡的發展戰略。他的兩篇文章的主題思想是“綜合平衡和按比例發展”，這是根據對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的聯系和互相依賴的周到考察擬定計劃的慣用語。馬寅初對以下的情況提出了批評：過去忽視了農業，從而壓制了輕工業的增長；重視過大的資本密集型企業；農業中官僚計劃代替了價格機制。

第一個五年計劃所包含的戰略與計劃人員和馬寅初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出的戰略之間的差異，在給農業分配的資源中再明顯不過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在1957年4月駁回了“只顧重工業，不顧或少顧農業和輕工業”的原則，而贊成“通過農業、輕工業的發展”，來保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計劃。[[85]](#_85_Guo_Jia_Ji_Hua_Wei_Yuan_Hui)計劃委員會和馬寅初的文章，對農業通過提供糧食和提供輕工業原料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都比第一個五年計劃認識得更加充分。這樣，用于農業和輕工業的國家投資資源份額就要增加。同時，對以下的情況的認識也日益加深：由于可耕地短缺，農業的增長變得更加依靠收獲量，這轉過來又意味著對化學肥料和某些類型的農業機械的需求增加。這標志著一個不同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變化，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重視土地開墾，把發展化肥和農業機械置于次要地位。

在農業方面，文章認識到強制收購和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內部過分籌措投資資金會對農民的積極性產生有害的后果；還認識到應該限制把收入轉用于投資，以使個人消費多少能較快地提高。

國家計劃委員會還要求修改第一個五年計劃注重龐大的工業企業，要求減少把力量重點放在迅速發展較不發達地區的工業的做法。這個轉變反映了一種認識，即大規模的工廠和內地的發展意味著更長的建設時期和每個資本單位只能雇傭人數少得多的工人。對就業問題的日益關心反映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現代部門工業勞動力的緩慢增長和城市繼續出現的高失業率。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就業人數每年只增加260萬人，鑒于工業吸收了投資份額的絕大部分和它相對迅速的增長，就業的速度相對地說是慢的。[[86]](#_86_Yue_Han__Fei_Li_Pu__Ai_Mo_Se)雖然總的非農業的就業增加較為迅速，但根據證據，增加的比率遠遠低于城市工作年齡人口的增長。國民黨政府遺留的一個大問題，即城市失業，其人數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實際上增加了。非農業的男性失業者到計劃終了時據估計已達到1000萬至1600萬人。[[87]](#_87_Hou_Ji_Ming____Ren_Li___Jiu)可以取得更加精確數據的上海，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末期有67萬人失業，此數與就業人數相比，意味著失業率達到22%。[[88]](#_88_Ke_Li_Si_Tuo_Fu__Hao____1949)尤其是上海，它的“人力”資源被抽調去推動內地的工業化，更應有助于它失業率的降低。

對較小工廠的日益重視，與決定減少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對蘇聯進口的機器設備的嚴重依賴有關。被迫作出這個決定，可能是由于1954年以后蘇聯拒絕再給予大筆貸款。毛澤東在1957年后期為布爾什維克革命40周年的慶典訪問蘇聯時可能要求這些貸款。決議可能還反映了計劃人員的內部估計，他們認為出口大量農業品以取得足夠的現金來支付繼續大規模地進口的機器設備是難以維持下去的。但是圍繞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討論顯然設想，計劃需要的份額小得多的投資貨物仍將進口。

第二個五年計劃預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演變而成的對資源分配的高度集中控制將予放松。1956年的毛澤東的報告表示，需要減少中央的計劃和經濟行政方面的官僚機構，并給予地方以更大余地的決策權。許多省份對此紛紛響應，那里的地方領導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就已經抱怨過于僵硬的中央控制了。

雖然計劃人員似乎對第二個五年計劃抱有幻想，但它從未被充分地實現。1956年9月周恩來向中共的八大提出了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其中反映了上面討論的幾個原則。但是一年多以后，李富春向中華全國總工會作的關于計劃的報告只限于對幾個原則作類似的闡述和提出少數幾個生產指標，而不是陳述更詳細的指標。[[89]](#_89_Li_Fu_Chun____Guan_Yu_Wo_Guo)不能提出一個有內容的計劃，幾乎肯定地反映了發展戰略方面的繼續爭論——這場爭論在1958年春季發動“大躍進”時得到了最后的解決。

[[1]](#_1_2)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經濟最全面詳盡的研究有：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474]，及葉孔嘉后來的幾次修正，例如他的《1931—1936年的中國國民收入》[832]，載侯繼明、于宗先編《現代中國經濟史》[307]，第95—128頁。

[[2]](#_2_2)對中國長期農業增長的最優秀的研究著作為德懷特·H.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578]。

[[3]](#_3_2)E.L.瓊斯：《歐洲的奇跡》[375]，第202—222頁。

[[4]](#_4_2)德懷特·H.珀金斯：《20世紀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結構變化》[579]，載他編的《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的現代經濟》[580]，第122頁。

[[5]](#_5_2)亞歷山大·埃克斯坦、趙岡、約翰·張：《東北的經濟發展：一種邊境經濟的興起》[217]，載《經濟史雜志》[377]，34.1（1974年3月），第239—264頁。

[[6]](#_6_2)約翰·K.張：《共產黨統治前的中國工業發展》[82]，第71頁。

[[7]](#_7_2)托馬斯·G.羅斯基：《中國向工業化的過渡》[601]，第6—28頁。

[[8]](#_8_2)羅茲·墨菲：《外來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國的經驗》[536]。

[[9]](#_9_2)埃德溫·W.波利：《關于日本在東北的資產對美國總統的報告》[564]，第36—37頁。

[[10]](#_10_2)珀金斯：《1368—1968年的中國農業的發展》[578]，第64頁。

[[11]](#_11_2)關于通貨膨脹的詳盡的分析，見周舜莘《1937—1949年中國的通貨膨脹》[146]；張嘉璈《螺旋式上升的通貨膨脹：1939—1950年在中國的經歷》[84]；阿瑟·N.楊：《1937—1945年中國的戰時財政和通貨膨脹》[834]。

[[12]](#_12_2)1941年，中央政府名義上重新確立了中央對土地稅的控制，這主要是作為直接控制糧食的一個手段。但是從財政的觀點看，由于中央答應彌補地方政府減少的收入，這個變革的重要意義被抵消了。見張嘉璈《螺旋式上升的通貨膨脹》[84]，第140—141頁。

[[13]](#_13_2)報道的赤字為2.89億元，發行的公債總數為2.132億元。但是預算收入包括公債收入，所以根據當期收支相抵的赤字（除去公債銷售等彌補項目）為5.02億元。這樣，赤字的2/5稍多一些由公債銷售彌補。李卓敏：《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工業化的第一個五年的估計》[441]，第143、152頁。

[[14]](#_14_2)托馬斯·羅斯基：《中華民國經濟介紹》[602]，第26頁。

[[15]](#_15_2)尼古拉斯·R.拉迪：《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分配》[421]，第41、165頁。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474]，第66頁。

[[16]](#_16_2)陳云：《抗美援朝開始后財政工作的方針》，載《陳云文稿選編，1949—1956年》[113]，第98—107頁。

[[17]](#_17_2)查爾斯·R.羅爾：《中國農村收入的分配》[618]，第76頁。

[[18]](#_18_2)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英文）[681]，第35頁。

[[19]](#_19_2)這兩個百分比根據官方的增值數據作出，這些增值數據與20世紀50年代公布的總值材料略有不同。工業增長速度有上調的傾向，因為它是以注重發展更快的生產資料部類而忽視發展較慢的消費品部類的價格結構為基礎的。楊堅白、李學曾：《農輕重結構》[825]，載馬洪、孫尚清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488]，第106頁。

[[20]](#_20_2)珀金斯：《20世紀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結構變化》[579]，載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的現代經濟》[580]，第122頁。

[[21]](#_21_2)發展中心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較不發達國家的國民收入，1950—1966年》[559]，第22、26頁。

[[22]](#_22_2)《較不發達國家的國民收入，1950—1966年》[559]，第21、25頁。

[[23]](#_23_2)《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130]，第1卷.第98頁。

[[24]](#_24_2)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681]，第35頁。

[[25]](#_25_2)保羅·R.格雷戈里、羅伯特·C.斯圖爾特：《蘇聯的經濟結構和成績》[278]，第108頁。

[[26]](#_26_2)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138頁。

[[27]](#_27_2)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130頁。

[[28]](#_28_2)M.加德納·克拉克：《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和蘇聯的技術援助》[173]，第4、13頁。

[[29]](#_29_2)李卓敏：《共產黨中國的統計制度》[442]，第13頁；奧德麗·唐尼索恩：《中國的經濟制度》[202]，第458頁。

[[30]](#_30_2)唐尼索恩的《中國的經濟制度》[202]中有對經濟官僚機構演變的最詳盡的描述。

[[31]](#_31_2)拉迪：《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分配》[421]，第15、206頁。

[[32]](#_32_2)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183]。

[[33]](#_33_2)肯尼思·R.沃克：《回顧集體化：1955年秋至1956年春的“社會主義高潮”》[760]，第24頁。

[[34]](#_34_2)同上書，第9頁。

[[35]](#_35_2)同上書，第23頁。

[[36]](#_36_2)肯尼思·R.沃克：《回顧集體化：1955年秋至1956年春的“社會主義高潮”》[760]，第24頁。肯尼思·利伯塔爾：《1949—1975年黨中央和政府會議研究指南》[451]，第68頁；李富春：《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443]。

[[37]](#_37_2)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156]，第354頁。

[[38]](#_38_2)陳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載《陳云文稿選編（1949—1956年）》[113]，第189—203頁。

[[39]](#_39_2)艾倫·S.惠廷：《中國跨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的決定》[785]，第19頁。關于1951年產量和收購量的下降與1953年生產和收購的指標，見陳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載《陳云文稿選編（1949—1956年）》[113]，第190頁。

[[40]](#_40_2)陳云在1951年5月的講話中對沒有鐵路運輸把糧食從有大量余糧的四川省運出表示惋惜。《發展農業是頭等大事》，載《陳云文稿選編（1949—1956年）》[113]，第129頁。這種關心無疑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建設寶成鐵路的重大努力的基礎。這條路線在四川盆地與中國其他地區之間提供了最早的鐵路聯系，于1956年通車。

[[41]](#_41_2)陳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載《陳云文稿選編（1949—1956年）》[113]，第190—191頁。小島麗逸：《中國的糧食收購和供應》[396]，第66—68頁。

[[42]](#_42_2)尼古拉斯·R.拉迪、肯尼思·利伯塔爾：《陳云的發展中國的策略：一種非毛主義的可取辦法》[425]，ⅩⅨ。

[[43]](#_43_2)沃克：《回顧集體化》[760]，第24頁。

[[44]](#_44_2)強遠淦、林邦光：《試論1955年黨內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124]，載《黨史研究》[695]，1981年第1期，第11頁。

[[45]](#_45_2)周恩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144]。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載《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290—291頁；中文版，第5卷，第273頁。

[[46]](#_46_2)強遠淦、林邦光：《試論1955年黨內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124]，載《黨史研究》[695]，1981年第1期，第11頁。

[[47]](#_47_2)強遠淦、林邦光：《試論1955年黨內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124]，載《黨史研究》[695]，1981年第1期，第12頁。

[[48]](#_48_2)鄧子恢：《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開幕詞》[709]，同上書，第7頁。

[[49]](#_49_2)強遠淦、林邦光：《試論1955年黨內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124]，第13頁。

[[50]](#_50_2)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載《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184—207頁；中文版，第5卷，第168—191頁。

[[51]](#_51_2)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人民內部矛盾》，第18—19頁。

[[52]](#_52_2)沃克：《回顧集體化》[760]，第35頁。

[[53]](#_53_2)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681]，第35頁。

[[54]](#_54_2)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662]，第293頁。

[[55]](#_55_2)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141頁。

[[56]](#_56_2)同上書，第243頁。

[[57]](#_57_2)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681]，第118、119頁。產值的增加是以總產值衡量的。如以增值衡量，上升的比率只為3.8%。楊堅白、李學曾：《農輕重結構》[825]，第106頁。

[[58]](#_58_2)《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244]，第115頁。

[[59]](#_59_2)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150頁。

[[60]](#_60_2)棉布、植物油和肉類消費量的估計根據官方產量和人口資料作出，官方的產量資料已對出口占用的部分做了調整。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156]，第144、163、221、312頁。

[[61]](#_61_2)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156]，第368頁。

[[62]](#_62_2)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34頁。

[[63]](#_63_2)中國人把他們的人口按照城市—鄉村和農業—非農業的標準來劃分。前一種劃分主要根據居住的地點，不過定居地必須達到最低的面積以符合城市的標準，并且對住在城鎮郊區的農民的態度隨著1949年以來進行的每次人口調查而有所變化。農業—非農業的區別決定一個人是否有資格通過配給制享受國家出售的糧食，這種資格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變得特別重要，因為當時對糧價的津貼越來越多。同時，非農業人口不包括有些住在城市地區的人，明顯的如沒有資格長期居住在城市的合同工和臨時工；但包括有些住在農村地區的人，如從事運輸、商業和政府行政的國家職工。

[[64]](#_64_2)沃克：《中國食用糧食的收購和消費》[759]，第68頁。強遠淦、陳雪薇：《重評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125]，第35頁。

[[65]](#_65_2)小島麗逸：《中國的糧食收購和供應》[396]，第66—69頁。托馬斯·P.伯恩斯坦：《1955年春糧食供應危機時干部和農民在不穩定和被剝奪情況下的行為》[45]，載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27]，第365—399頁。沃克：《回顧集體化》[760]，第14—15、21、26—27頁。

[[66]](#_66_2)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681]，第88頁；《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244]，第47頁；托馬斯·G.羅斯基：《中國向工業化的過渡》[601]，第34頁。

[[67]](#_67_2)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681]，第88、99頁。

[[68]](#_68_2)同上書，第90頁。

[[69]](#_69_2)拉迪：《中國的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423]，載德恩伯格《從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的發展經驗》[200]，第176頁。

[[70]](#_70_2)拉迪：《中國的區域發展和收人分配》[423]，第176—177頁。

[[71]](#_71_1)拉迪：《中國經濟的增長和分配》[421]，第25頁。

[[72]](#_72_1)根據進口的生產資料和撥作“積累”（固定資產投資和增加的庫存物資）的國民收入份額的中國人的材料作出，都以中國的通貨計算。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156]，第21、354頁。這個份額稍高于根據1982年前掌握的零星材料作出的估計數，1982年中國發表了全部按時間順序排列并按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分別計算的進口貨。

[[73]](#_73_1)克拉克：《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173]，第30頁。

[[74]](#_74_1)鄭竹園：《1949—1963年共產黨中國的科學和工程人力》[121]，第200—201頁。

[[75]](#_75_1)克拉克：《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173]，第36、190—191頁。

[[76]](#_76_1)亞歷山大·埃克斯坦：《共產黨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與對美政策的關系》[214]，第170—172頁；伍修權：《50年代初期的中蘇關系》[817]，《北京周報》[568]，47（1983年），第20—21頁。

[[77]](#_77_1)埃克斯坦：《共產黨中國的經濟增長》[214]，第170頁；威廉·E.格里菲思：《中蘇的分裂》[281]，第233頁。

[[78]](#_78_1)O.埃德蒙·克拉布：《中國和俄國的重大比賽》[174]，第402—403頁。

[[79]](#_79_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156]，第30頁。根據不同的蘇聯材料作出的更早的西方估計顯示，中國的貿易結余在1956年出現。埃克斯坦：《共產黨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214]，第158頁。

[[80]](#_80_1)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的六十周年》[583]，載《紅旗》[345]，13（1981年），第64頁。

[[81]](#_81_1)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人民內部矛盾》，第30頁。甚至在1月后期提高指標之前，為1956年定出的一些特定農作物的產量指標至少在1955年11月和12月之間提高了一次，11月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報告宣布了初步的指標，12月則是計劃最后定下來的時期。強遠淦、陳雪薇：《重評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125]，第34頁。

[[82]](#_82_1)最初發表在《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6日。報告于兩年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第5卷。但是在“文化革命”中，西方學者已經得到了這個報告的文本。

[[83]](#_83_1)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第86—91、122—126頁。

[[84]](#_84_1)馬寅初：《聯系中國實際來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491]，《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8、29日。轉載于《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第2卷[490]，第121—144頁。《聯系中國實際來再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492]，《人民日報》，1957年5月11日、12日。轉載于《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第2卷，第145—169頁。

[[85]](#_85)國家計劃委員會：《初步研究的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若干問題》[680]，《計劃經濟》，4（1957年），第10—12頁。

[[86]](#_86)約翰·菲利普·埃墨森：《1949—1958年大陸中國的非農業就業》[224]，第129頁。

[[87]](#_87)侯繼明：《人力、就業和失業》[306]，載亞歷山大·埃克斯坦、沃爾特·蓋倫森，劉大中編《共產黨中國的經濟趨向》[218]，第369頁。

[[88]](#_88)克里斯托弗·豪：《1949—1957年中國城市的就業和經濟增長》[309]，第39頁。

[[89]](#_89)李富春：《關于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就和今后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方針的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12月8日。

## 第四章 新秩序的教育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教育由三種不同的傳統匯合到一起，這一不穩定的結合在30年以后才充分地協調起來。中國共產黨從民國時期繼承的傳統是受現代西方啟發的學說嫁接在古代儒家基礎上的混合體。第二種傳統來自中國共產黨人他們自己作為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農村邊區政府領導人的新近的經驗。第三種傳統在50年代才介紹到中國，當時新的共產黨政府在進行學習蘇聯的大膽嘗試。三種傳統每一種的影響仍可見于中國教育之中，它們的主旨通過它們所產生的多變的結合而牢牢地銘刻在現今公眾的心目中官方的論述中。

## 民國時期的遺產

表2以統計學概念表示1949年從國民黨政府繼承下來的教育系統，[[1]](#_1___Zhong_Guo__She_Hui_Zhu_Yi_J)表3則對同一年全體人口的教育水平作出估計。[[2]](#_2_Tong_Shang)這些全國性的統計掩蓋了存在于各個可以想象得到的方面的差別。最明顯的差別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是以下這些差別：城鄉之間、貧富之間、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最閉塞的內陸之間以及男女之間的差別。

表2 1949年的在校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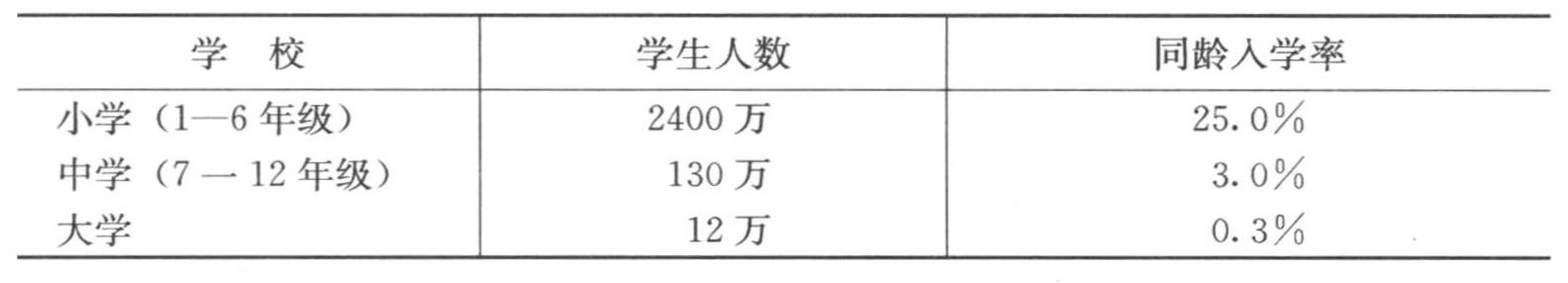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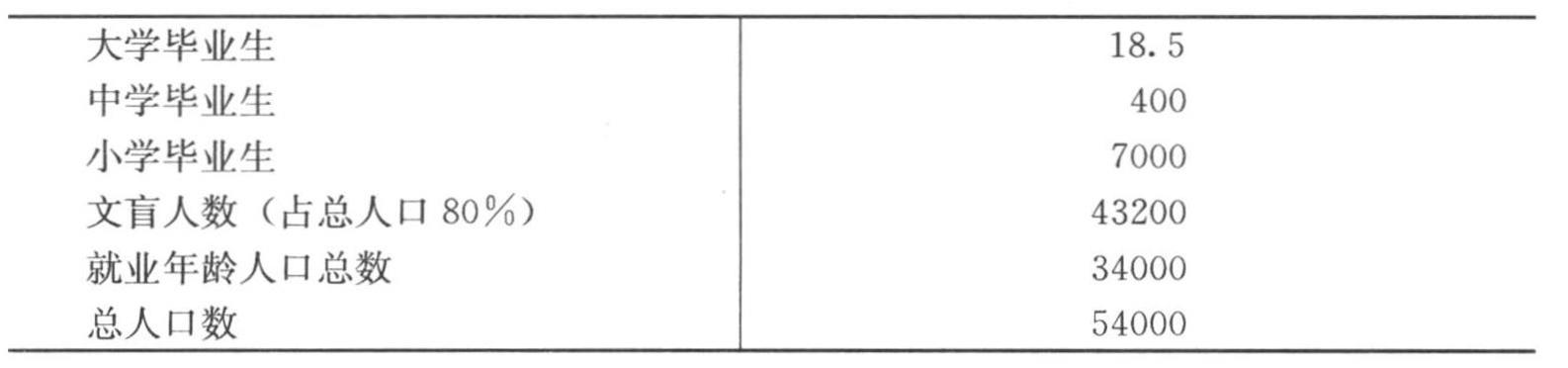


表3 1949年的畢業生 （單位：萬）



從基本的識字率看，男女之間的比率至少是模糊的。20世紀最初幾十年婦女占總人口的比率可能小于1982年人口統計中的48.5%，全國范圍內的婦女識字率估計為2%—10%。男性的識字率估計為占男性總數的30%—45%。這些識字率是根據以下的標準作出的，它包括那些只認識幾百個中國漢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為半文盲的人。[[3]](#_3_Guan_Yu_Xian_Zai_He_Guo_Qu_De)

單就農村地區而論，當時對識字狀況的估計大不一樣。最低數字是1939年共產黨主要根據地陜甘寧邊區閉塞地帶的比率，即1%。[[4]](#_4_Bi_De__Xi_Bo_Er_De____Qun_Zho)經常被引用的卜凱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對中國農村的調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計，但他的調查不是專門集中研究貧窮和落后的邊區。他的數據來自對22個省中308個縣進行的抽樣調查，說明在7歲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夠讀懂一封簡單信件的文化水平。被調查的8.7萬人中，據稱45.2%的男性和2.2%的女性曾上過幾年學。這批人當中，男人平均上過4年學，女人平均上過3年，這點時間足夠達到基本識字的水平，但時間一長就不一定能夠鞏固。另外，在已經入學的男性中，66%受的是傳統方式的教育。[[5]](#_5_Bu_Kai____Zhong_Guo_De_Tu_Di)

現代方式與傳統方式的學校教育之間的區別是重要的，因為這種區別與城鄉差別是一致的，并因而加強了這個差別。伊夫林·羅斯基在她對清代教育的新近研究中已經分析了傳統學校教育的規模和內容，以及它在城市化的社會精英已經看到學校教育的前途并把子弟送進現代學校很久以后，在農村地區仍然存留的原因。

傳統的小學遍布于農村而不限于城鎮，雖然在城鎮更為普遍。農村的男孩子有幾個渠道去接受基本的識字訓練，最常見的是私人教師和私塾。富裕家庭的孩子大多在自己家里受教育，或由識字的家庭成員，或由為此目的請來的教師任教。家庭教師的變異形式是農村學校的教師。相鄰地區或同村的境況差一些的家庭可以聯合起來為其子弟請一位教師。這種教育的開銷不大，主要限于孩子家長商定分擔的教師的工資總額。家長自己提供生活用品和學習設備，他們還可以把村內的廟宇或其他建筑的空房間當做教室，孩子們每天都可以聚在那里上學。學生們也可以到教師家里上學。

這樣的教師來自較大一批學業優秀的學生和有低級功名的人，其數量將近300萬；他們的存在是帝國科舉制度的重要副產品。[[6]](#_6_Bi_Ru__Gong_Qi_Shi_Ding____Zh)在參加科舉考試的人中，事實上只有一小部分獲得在帝國官僚政府中有資格當官所必需的高級功名。對那些有抱負的功名獲得者和家境中等的無業文人來說，知識分子對體力勞動和其他被認為有失身份的職業（如當書吏和賬房先生）的偏見，使他們除了教書外，很少有其他的謀生選擇。

文人們還任教于另外兩種能夠提供初等教育的機構。第一種是擴大家庭或氏族組織建立的學校。第二種的資金不是來自幾個單獨的家庭，而是來自共同的氏族的收入。在這類學校中，有的是專為家族中其雙親不如此就無力為子女提供教育的窮孩子建立的。

第二種類型是帝國后期遺留下來的公共初級學校，它們的目的也是為窮人家的孩子服務。有的學校設施完善并施行完全免費的教育。其他的則需要學生自備學習設備和生活用品。這類公共的義學雖然是根據帝國政府的指令設立的，但不一定接受政府的資助，因此不得不依靠地方贊助人的興趣和慷慨。贊助人除地方官員之外，還包括富裕的家庭、行會、商人和普通村民團體。用這種方式辦起來的學校得到的捐贈有土地、錢或建筑物。所有的捐贈物都被當作投資的資本并加以管理，通過租金和利息的收入來長期維持學校。

但是這類義學只能容納19世紀中葉7—14歲年齡組約4030萬男孩子的極小部分。羅斯基估計，在全部有材料可以利用的18個省中，除兩個省外，這個年齡組在義學學習的比率不到1%。在除外的兩個省云南和陜西，這個年齡組進義學學習的比率分別為3.3%和1%。氏族辦的學校多半也只能為全部學齡兒童的很小部分服務。因此19世紀接受初等教育的主要渠道是私人請的教師和私塾。[[7]](#_7_Luo_Si_Ji____Zhong_Guo_Qing_D)

不管初等教育是通過什么方式進行的，得到這種教育的兒童平均只上兩三年學，學習內容各地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初級小學的基本教學內容旨在教會兒童們讀、寫幾百個漢字和給他們灌輸儒家基本的價值觀。這些都是通過課本和教材來實現的，它們的基礎是少數準備科舉考試的人用于正規學習的經典著作。但是在這種對大部分接受這類教育的兒童來說既是開始又是終結的初級水平上，教育的目的是有限度的。最后的結果與其說是要求學生學到起作用的本領，不如說要他們學到謀生或生存下去的初步文化。通過小學教科書，學生學到了儒家關于道德、孝道、人際關系中正確行為的概念以及中國歷史的知識。課程中一般不包括諸如算術和科學等實用的學科。記賬和打算盤等都被當做專門技能，只教給經商的學徒。但是一般地說上學的學生大多能學到足夠的讀、寫技能，使他們可以借助通俗的圖文對照教科書在以后自學；還可以學到足夠的實用詞匯，使他們能夠書寫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簡短的信件。[[8]](#_8___Zhong_Guo_Qing_Dai_De_Jiao)

1905年取消科舉考試之事可能標志著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儒家學術的突然結束。但是當時提出創立西方倡導的現代課程的新式學制的詔令，要用幾十年才能實現。在過渡期間，當新一代教師本身在學習科學、數學、歷史、地理和技術訓練等新學科時，傳統的舊式學校還繼續存在。到了20世紀30年代，政府和私人創辦了從初小到大學的現代學校體系。[[9]](#_9_Jian_Xi_Ao_Duo__E_Xiao____Zho)但這個體系只能為全國學齡人口的一小部分服務，與此同時，舊式教師繼續為大批學生提供以儒家古籍為基礎的教育。因此卜凱發現，他調查的在農村上過學的男性中，66%的人接受的只是傳統的教育。

調查者發現，特別是農村人口，他們實際上偏愛舊學問，因為它更接近還沒改變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舊式教師比現代學校的教師年長，因而更受尊敬。新學科沒有用處，而傳統的課程更適應鄉村的需要，這種需要仍然被鄉村和家庭生活的人際關系所支配；舊式教育更不正規，因此更容易合于農活的要求；舊式教育的費用也比較低廉。[[10]](#_10_Luo_Si_Ji____Zhong_Guo_Qing)

這樣，民國時期教育的分化變得更加明顯：新的西方化的學術集中在全國性的、優秀分子的層次上和在城市中，而農村地區在更大程度上依然是傳統的價值和知識獨占的領域。國際聯盟主持的一份1932年的報告對中國教育體制脫節的性質持高度批判的態度，這種脫節現象在當時是非常明顯的。[[11]](#_11_Guo_Ji_Lian_Meng_Jiao_Yu_Zhu)報告說中國的學校是“以私人教育的形式和思想體系為模型的獨立的，而不是包括在與當前社會問題有關的公共教育的有組織的體系之內的組織”。作者首先譴責中國的家庭、家族和村學的教育傳統只與狹窄的私人利益相聯系。其次，他們譴責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把現代化等同于機械地照搬外國的教育制度，教學計劃、課本和教學方法都以西方的知識和榜樣為基礎。

在這方面特別令人吃驚的是美國模式的極度影響。美國模式主要通過美國的教會學校和從海外留學歸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熱情而被介紹到中國的中學和大學：“結果是提倡較高標準的、遠遠超過貧困國家的條件的學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卻被忽視了。學校內缺乏社會理想，是一種不直接與周圍的生活以及通常獲得國家新生的必要條件相聯系的抽象教育。這就使中國的人民群眾與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鴻溝，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國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學校受教育，對群眾的要求漠不關心。”[[12]](#_12___Zhong_Guo_Jiao_Yu_De_Gai_G)報告警告中國的教育工作者不要膚淺地模仿外國模式，建議他們借鑒“美國人成功地使歐洲文化適用于美國具體情況的開創精神”。

報告還批評了整個教育體系有意識地為上層社會服務的傾向。例如，公立的幼兒園常設在與富裕家庭比鄰而居之區。入學必經的考試有意選擇那些已證明智力與體力均屬上乘的兒童。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學的兒童。入學者的學費都是一樣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學的招生辦法也一樣，因此窮人家的孩子照樣被拒之門外。與此同時，學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學學生的家長在必要時本來是可以為孩子請家庭教師的。優先錄取富裕的、有勢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現在中學和大學中。公立的獎學金主要用于資助出國留學，而不是系統地根據需要獎給最需要者。報告為糾正教育制度中的這種現象，提出了各種建議，其中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兒園和公立小學免除入學考試和學費。[[13]](#_13_Tong_Shang_Shu__Di_65__67__9)

報告發現以在不到1/4世紀之內建立起來的五十多所院校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制度有許多可以批評之處。批評的要點為：地理分布的隨意性；集中在一個地區的院校的重復性，它們之間沒有任何合理分工，幾乎做著同樣的事情；與忽視科學和技術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學的學科過度膨脹”。在校的攻讀正式學位的學生有59%以上學習法律、政治或文科，6%學習教育學。學習自然科學的不到10%，學工程的為11.5%，只有3%學習農業。報告實際上沒有認識到披著現代外衣重新出現的古代傳統，于是遺憾地指出：“大多數中國大學生的抱負是在中央或地方當官，如果不能當官，就當一名教師。”[[14]](#_14___Zhong_Guo_Jiao_Yu_De_Gai_G)

按照中國教育部長提供的統計，1929—1930學年小學生人數為8839434人，或6—9歲年齡組4140萬兒童的21%。這個計算是參照新的國民黨政府當時正試圖普及的四年初小制度的材料作出的。國際聯盟的教育考察團報告的作者們估計在4.6億總人口之中，大約9%可以列入這個年齡組。上述小學生的數字包括村、鎮上只有一個小教室的學校的學生，這類學校大概占現有小學總數的一半，但是不清楚這個統計是否包括新式公立學校學生那樣，把私立小學或舊式學校的學生也包括在內。[[15]](#_15_Tong_Shang_Shu__Di_76__85Ye)

中國教育部長提供了兩種迥然不同的關于中學的統計數字，報告的作者們始終未能使它們一致。他們斷定，實際情況可能是在以下兩個數字之間，即307906名學生在2066所中學學習，或是783140名學生在13596所學校就讀。[[16]](#_16_Tong_Shang_Shu__Di_99__100Ye)

1931年9月，全國59所國立、省立和注冊的私立大學共有學生33874人，其中5170人不攻讀正式學位。另外有8635名學生在這些大專院校的短期班和預科學習。這個數字不包括28所高級技術學校的3500名學生。[[17]](#_17_Tong_Shang_Shu__Di_130__131)

## 共產黨邊區的遺產

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20年代末被趕出城市以后的發展政權的基地當然是較為傳統的社會環境。像其他關心這個問題的人一樣，毛澤東發現農民更喜歡舊式學校，即他們所說的“私塾”，而不喜歡現代學校。他們拒絕新式初小提供的教育，稱他們為“洋學堂”。他們認為新式初小不適合鄉村生活的需要。

1927年毛澤東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示了一些即將到來的事情，其中記載了縣教育局和發展中的農民運動之間的一種爭執。前者要求把教育經費用于建立現代的洋學堂，而后者想用這筆錢支持他們自己的夜學和“農民學校”。結果教育經費常被分成兩部分。[[18]](#_18_Mao_Ze_Dong____Mao_Ze_Dong_X)

但是爭執中表現的更大的沖突卻不那么容易解決。毋寧說，它提出了從當時到現在的整個中國教育史中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反復出現的根本性論題。這一論題的第一個重大發展發生在抗日戰爭后期的陜甘寧邊區。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邊區的教育體系經歷了旨在提高質量和使教學內容標準化的“正規化”時期。按照1942年發布的指令，這一點要在小學做到，辦法是減少學校的數量，撤掉最差的和加強較有成績的學校。最好的學校確定為“中心”學校，這是在以后年代將要發展的有爭議的重點學校制度的先驅。最好的教師和設備集中在中心學校，中心學校負責領導鄰近辦學條件較差的學校。

邊區的六所中學由邊區教育部直接領導，都遵守統一的標準和規則。中學的入學條件變得更加嚴格，有規定的年齡限制，入學考試必須通過筆試。教師必須限制課外活動，增加授課時間。[[19]](#_19_Xi_Bo_Er_De____Qun_Zhong_Jia)

在宣布實行新制度的指令正式頒布以后不到一年，就出現了對新制度的批評。批評的對象據說是由前東部沿海地區知識分子組成的教育局，這些人正在試圖把自己那一套受西方啟發的教育標準應用到邊區學校里。以后的批判宣稱他們的努力對共產黨領導的農村根據地的戰爭環境不適用。但是批評也全面地指出了教育發展的兩難處境：當時的目標是城市化的西方經驗所規定的發展，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地區卻絕大部分是非西方的農村社會。出現在1944年4月7日《解放日報》上的批評可以當做十幾年前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報告的解釋，并且是以后數十年里被許多中國鄰國的行政官員無數次反復重申的問題：

“舊教育制度（廢科舉與學校以后的教育制度）因為要學外國，留學就成為它的靈魂，國內的一切幾乎都是留學的預備性質，處處以外國為模型，所以它的基礎不是立在腳上，而是立在頭上的。留學制度在中國有過它的進步作用，我們不應一般地否定它，像那些偽善的愛國主義者那樣，他們是愈講復古就愈離不了外國的。但是我們一定要使教育的基礎生根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中間。最廣大人民群眾需要一種最廣大的群眾的教育，和一種為了群眾的干部的教育。我們目前的這兩種教育，與舊制度有一個本質上的區別，就是都不是預備性附屬性，都不是為了升學，都有其獨立的明確的實際生活實際工作上的目標。”

一個更加具體的問題是發展中的邊區教育制度的正規性質，即讓學生從小學升到中學，再沿著教育的階梯深造。可是小學畢業以后只有少數人能繼續學習，而大多數學生必須回家，以致使他們所受的新式現代教育無用武之地。他們不滿意，不愿意工作，“實際比從沒進過學校更壞”。[[20]](#_20___Jie_Fang_Ri_Bao_____126__1)

1944年采用的糾正辦法扭轉了邊區學校朝正規化發展的趨向。目標是創造更適合農村根據地的教育形式，因為邊區的生產技術“落后”、“勞動分工不發達”，甚至孩子們也得參加家務勞動和農業生產。民辦學校是解決以下問題的辦法：努力鼓勵更多的農民送子弟上小學，同時減少小學的數量以改進其質量。

民辦學校由村民自己提供財政來源，自己管理，它們與其說是一個創新，不如說是一個未中斷的傳統——私人辦的舊式村學——的修正形式。民辦學校可能從地方政府得到一些錢。但由學校為之服務的村落負責維持和供給學校，并照顧教師的需要，就像農村維持私塾那樣。還存在的私塾幾乎沒有困難地可以轉變為新式民辦學校。[[21]](#_21_Lin_Mai_Ke_Zai_Ta_De___Gong)由地方人士組成的教育委員會與地方官員一起管理學校，這樣就消除了對被取消的政府最低一級教育機構的需要。

校歷和假日取決于農時的要求，以便孩子們可以繼續像傳統的村學那樣在幫助父母的同時學習。學校的課程集中在農民更愿意接受的科目上：基本的識字訓練和算術，外加可能的實際知識。在地方村民希望學校繼續使用舊的儒家課本作為教育基礎的一些村莊引起了一些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官方的指導方針是指示地方官員勸說村里的教育委員會，使他們相信儒家的傳統教育不再有任何實際用處。[[22]](#_22_Tong_Shang)

事實上，對鄉村新式學校更恰當的描述是“民辦公助”。民辦離不開公助，有一個指令對民辦學校提出如下的警告，即民辦仍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不能放任自流。具體地說，公助意味著對行政、教學制度和教學方法實行領導，并負責教師的使用和培訓、教材的印刷及費用的補助等等。[[23]](#_23___Guan_Yu__Min_Ban_Gong_Zhu)

但是發展新式學校的口號是“反對舊式的僵化”和“反對教育的正規化”。目標是要為每個地方找到一個當地群眾都能接受的教學方法。民辦學校就是根據有意識地向家長和學生征求的意見而相應地以多種方式和形式建立起來的。根據統計，這項創新的結果使邊區正規小學的數量從1940年1341所的最高記錄減少到1946年的357所。同時，民辦學校增加到1038所。[[24]](#_24_Xi_Bo_Er_De____Qun_Zhong_Jia)

在中等學校，把邊區學校轉化為大學的預科院校的目標也被取消，因為它不能適應時間和地點的需要。新的標準化課程和入學手續被修訂，以便向學生提供定期的教育，使他們在以后能補充邊區政府、軍事部門以及生產單位對人員的需要。年齡的限制被取消，地方干部比近期的小學畢業生優先入學。

著眼于實際的需要而重新擬定了課程，即與戰爭和生產技術有更直接聯系的課程。標準化課程中的19門課減少為8門。但是新制度的特點是靈活性：

“各級學校的年限，隨環境的不同，都可以少則不滿一年，多則三年四年；舊六年制小學的高級兩年，則可斟酌情況并入初級干部學校，作為普通中學的預備班次，或作為獨立的訓練班……無論如何，在這樣的學校中，程度不齊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各級學校的嚴格銜接也是近于不可能的，但是這完全用不著憂慮。”[[25]](#_25___Jie_Fang_Ri_Bao_____126__1)

隨著邊區教育部降格為一個咨詢部門，中央和地方一級教育官僚機關的權力被繞過。從此教育政策在邊區政府主席的權力之下頒布。管理中學的職權從區下放到區以下的政府，以便大力加強學校和地方政府及工作單位之間的聯系，因為這些學校要訓練它們現有的和將來的干部。[[26]](#_26_Xi_Bo_Er_De____Qun_Zhong_Jia)

## 學習蘇聯

對1944年教育改革運動的目標有十分清楚的闡述：創造一個更適合戰時農村根據地生活和工作直接需要的制度。《解放日報》在評論改革措施時宣布：“因為現在而忘記將來是不正確的”，但是“因為將來而忘掉現在尤其錯誤”。但是評論承認現狀“不是我們的理想”。將來我們一定會碰到從這類學校轉入另一類學校或者需要教育正規化的問題，并且也一定會找到新的解決辦法。[[27]](#_27___Jie_Fang_Ri_Bao_____126__1)

在以后五年多一點的時間內，中共將發現自己不僅僅領導落后的邊區，而且將領導全國。必須設計適合遠為復雜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新的教育形式。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方面的信仰，再加上對這項任務的緊迫感和缺少準備，使黨的領導人干起他們最近剛批評過的別人干過的同樣的事。結果是以其前輩已顯示出的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的熱情去模仿另一個外國——盡管是兄弟般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做的理論根據是，既然西方（即英國和美國）最好的科學和技術已被俄國人吸收，因此“最快最好的道路”就是直接從蘇聯接受提取出來的精華。既然教育和工業是應用科學技術的主要社會機構，它們的組織和管理也要按蘇聯的模式來改造。[[28]](#_28_Guan_Yu_Cong_Su_Lian_De_Dao)

這條道路帶來的許多困難之一，當然是蘇聯教育本身由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全面批評“斯大林模式”，很快就處于轉化狀態。另外，斯大林的模式是為適應工業化的緊急需要而作出的謹慎的反應。為了達到這個目的，20世紀20年代在蘇聯教育中采用的革命性試驗被否定，排斥資產階級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章程被取消。盡管如此，新近取得勝利的中國革命者還是尋求采納更加謹慎的蘇聯模式，而沒有明顯地考慮到它所體現的對他們來說并不適合的東西。[[29]](#_29_Jian__Ying_Ge_Wa__Luo_Fu_Si)

學習蘇聯的努力在高等教育領域最明顯，而西方的影響在前幾十年曾統治著這個領域。國有化是第一位的。根據不同材料，中國高等院校這時的精確數目有所不同。但是按照教育部長馬敘倫的說法，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的高等院校（不包括新的干部學校）共有227所。其中138所為國立的，65所為私立的，其他24所則由外國教會組織創辦。這個體系的特點也是地理分布不平衡，學校集中在沿海城市。50年代中期，37%的高等學校位于華東地區，僅上海就占了25%。只有約15%設在主要為農村的老解放區。[[30]](#_30___Ren_Min_Ri_Bao_____1950Nia)

到了1952年末，大多數外國教職員和行政人員離開了中國，所有私人控制的學校被取消。這樣就為整個高等教育制度沿蘇聯路線調整鋪平了道路，這項工作在下一年基本上完成。目標是建立一個適合中國發展需要的更專業化的分工。最明顯的是取消了美國式的文科學院和美、英大學對學生特有的通才教育。換句話說，蘇聯的制度旨在造就數量更少的難以使用的文科畢業生，而培養更多的經過訓練就能直接參加經濟建設所需要的專業技術工作的畢業生。

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就這樣明顯地分為幾種院校，每種院校各有自己專業上的職能。這項工作是通過取消文科學院和把較大的大學中的文科和自然科學的系剖分開來組成新型的綜合性大學的核心而完成的。舊大學保留下來的系、學科和學院重新組成獨立的技術學院和（或）并入現有的同類學院。20所新的專科大學通過把舊大學分割的辦法而成立了。只有13所綜合性的文、理科大學保留下來，它們相當均勻地分布在全國各地，北京和上海只各有一所（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另外建立了26所各種專業（如煉鋼、采礦和地質）的工程學院。這個時期保留或重新組成的其他專業院校包括農林、醫藥、財經、教育、政法以及少數民族干部培訓等方面的院校。[[31]](#_31_Ceng_Zhao_Lun____Xin_Zhong_G)

由于高等院校的這種調整及伴隨而來的新的全國學生入學及工作分配計劃，專攻技術與工程等專業的學生從40年代后期占在校學生總數的20%上升到1952年的35%。到1953年，主修工程、科學、醫藥及農業的學生已達到當時21.2萬名學生總數的63%。師范院校的學生占另外18.8%。此后這些百分比基本保持不變。[[32]](#_32_Ceng_Zhao_Lun____Xin_Zhong_G)

蘇聯模式就這樣最終把通才型的中國知識分子改造成現代式的專家。在1931年，國聯教育考察團曾發現大多數大學生仍準備在政府部門中尋求自己的前途。1949年以后，職業的選擇首先由黨來安排，到1956年6月，1070萬名黨員中只有11.7%是知識分子。[[33]](#_33___Shi_Shi_Shou_Ce_____18_195)與此同時，大學生的前途被重新引導到新的蘇式高等教育制度為他們準備好的高度專業的領域。文人和公職的傳統聯系最終被切斷了。

院校內部的組織按照蘇聯的做法，通過把大學的系細分成若干專業而進一步專業化了。新的系傾向于比西方的系范圍更寬，而新的專業的面則常比西方大學生主修的專業窄。結果是，在校大學生學習的面小了，并較早地開始了專業化，其具體的目的在于職業訓練。

進一步仿效蘇聯做法的措施是為各個專業制定全國統一的教學計劃、教材和教科書。對規定教學計劃方法的一種較早的說明做了如下描述：每種教學計劃都包括專業所開設的課程，每種課程都有精心擬定的教學大綱，規定課程的具體目標，開列學年或學期學習的種種細目。大綱還詳細列出分配給每一細目的時間和每節課講授的確切教材。教科書根據大綱編寫。這樣，國家高等教育所有院校教學方法和內容的標準化和統一化就實現了。[[34]](#_34_Ceng_Zhao_Lun____Xin_Zhong_G)

中國的高等院校從1952年開始使用這些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當時宣布的目標是，最終都必須采用教育部制定的統一的教學計劃。1980年，大學的行政人員在會見來訪者時回憶說，50年代規定的教學計劃必須遵守，“它好像就是法律”。[[35]](#_35_Su_Shan_Nuo__Pei_Po____Zhong)對全國正規的小學和中學，也準備了類似的全國統一的課程和教學計劃。

1952年9月，在最高的行政層成立了一個獨立的高等教育部，這也是仿效蘇聯做法的一個措施。蘇式結構最基層的單位是“教學研究組”，它的職能之一就是確保每位教師照各專業的教學計劃授課。所有的教師都組織到自己教的那門課的教研組，每個專業組成一個或幾個組。每個教研小組通常由10至20個人組成，負責監督備課，培訓青年教師，交流經驗和信息，推廣新的教學方法，開展相互批評和作鑒定、領導研究工作和培養研究生。

與學習蘇聯的形式和結構相輔相成的，是使這些機構和形式發揮作用所必需的人員和知識。按照一種估計，50年代有多達3.8萬名中國人到蘇聯學習和受訓，其中包括科學家、技術人員、教師、學生和工人。當美國人和歐洲人撤離中國時，蘇聯專家、顧問和教師反方向地來到中國。在50年代，大約有1萬名蘇聯公民在中國擔任各種工作，其中將近600人在高等院校任教。此外，蘇聯的教育工作者幫助設立新課程和參加編寫新教材。[[36]](#_36_Luo_Fu_Si_Te____Zhong_Guo_De)

用于新設、原有課程的蘇聯教材和教學計劃都翻譯過來用做參考材料以及制定中國教材和教學計劃的藍圖，有時干脆照搬其中的內容。中國科學院組織翻譯，并吸收了2700名中國教育工作者參加這項工作。他們全力工作的領域表明正是依賴蘇聯知識最為嚴重的地方：58%的翻譯工作是翻譯工程和技術方面的著作，其中14%是農業著作；24%翻譯純科學著作，只有14%翻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著作。

一項研究表明，1954—1957年期間中國出版的全部書籍中，從俄文翻譯的書占38%—45%。從其他語種翻譯的占3%—6%。到1956年，從俄文譯為中文的教科書約有1400種，其中包括一些小學和中學用的教科書。很多20世紀50年代初期采用的中小學教科書都是根據蘇聯原文改寫的版本，特別是數學、物理和化學。各種水平的歷史、政治和經濟教科書的內容也自然要按新的社會主義和親蘇的傾向修訂。中學以上的外語教育從教英語改為教俄語。[[37]](#_37_R_F_Pu_Lai_Si____Xian_Dai_Zh)

蘇聯的教育學和教學方法也被廣泛地學習和仿效。這就為機械的模仿創造了肥沃的土壤，根據以前的教師和學生的回憶，有些嘗試更值得稱贊。蘇聯的五分制，相當于美國的A至F的五個等級，代替了以前使用的更精密的百分制。另一追隨蘇聯的做法是1955年宣布的設立高級學位制的計劃。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是兩所為培養副博士的計劃做準備的機構，一些學生在這期間在那里入學。

口試連同口試的擺設也是仿效蘇聯的。遠在昆明那樣的城市的大學生進行口試，坐在鋪有桌布的桌子旁邊，桌子上擺著鮮花——“因為蘇聯是這樣做的”。廣泛地組織起來的課外活動也是中國教育中的新事物。例如，課外活動之一是以蘇聯植物學家米丘林命名的米丘林小組。小學的班級組成這種小組，負責照看教室綠角里的植物。學生們被鼓勵去學習蘇聯英雄的精神，他們的生活與功績在50年代一代青年中的知名度就像中國60年代的雷鋒和其他模范人物一樣。

但是，不加批判地模仿帶來的危險，最明顯地表現在教育領域以外的一個事例中。追隨蘇聯在二次大戰后用來鼓勵人口增長的措施，中國在一段時間里的確把多生孩子的婦女褒獎為“英雄母親”。教育界內部這種模仿的后果大多還不是這么荒謬，但肯定同樣引人注目。這是因為蘇聯輸入的做法在很多方面與它在社會上層取代的受西方影響的制度和40年代在延安建立的鄉村模式完全相反。黨的領導人不久就發現西方化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容易轉而接受新制度。黨內也保留著維持延安經驗的使命感，這無疑是產生延安經驗的中國的“客觀”環境造成的。蘇聯模式還需要容納中國人口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年輕的中國共產主義制度還不準備這么做。

## 50年代透析

按照后來的一份報告，1949年12月舉行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就已期待著一種更平衡的做法。報告聲稱新中國的教育應該把老解放區的新教育經驗當做基礎，應該吸取舊教育中有益的經驗，應該利用蘇聯的經驗。[[38]](#_38_Jian___Shi_Qi_Nian_Jiao_Yu_Z)“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和其他人被譴責違背了毛澤東保持這種平衡的意向。他們被指控曾竭盡全力維護舊制度和移植蘇聯經驗。

事實上，三種潮流在50年代初期就已在互相糅合，但是對這個過程中必將發生的矛盾，則幾乎沒有預見，也沒有緩和它們的明顯企圖。總之，當時的迫切需要致使難以做到深思熟慮。但是把三種潮流糅合在一起的魯莽方式反而會妨礙它們發展成為有生命力的一體化制度。這種經驗事實上具有毛主義的某種激情，好像是他關于群眾運動的名言所贊同的，即在一個過程中發生的任何過頭行為都可以在以后得到糾正。[[39]](#_39_Guan_Yu_Zhe_Zhong_Zhi_Dao_Si)

#### 恢復與調整

到了恢復與調整時期（1949—1952年）的末期，緊張的狀態已經明顯出現，并且正在尋找糾正的辦法。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學術界內部的異議。高等院校的調整始于1950年，而教職員的抵制也在同時出現。前面已經指出，中國的高等院校集中在沿海城市，在1948—1949年內戰結束前仍然處于國民黨的控制之下。然而大多數教職員工1949年以后仍留在原來的崗位上。這樣做有很多理由，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對戰敗的國民黨政府不滿。但是，知識分子雖然無疑地同情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思想，他們當中卻很可能只有極少數是有信仰的共產黨員。中國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傳統，因此在40年代他們似乎更傾向于自由民主式的社會主義。可以肯定，他們之中只有極少數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或毛澤東的著作有稍多的知識。

基于對這一事實的認識，中國共產黨早就要求讓學生、教師和新解放區的其他知識分子學習政治教育課。這種做法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它概括了共產黨勝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并從此在全國各地實行。[[40]](#_40_Zhe_Jiu_Shi___Zhong_Guo_Ren)知識分子的政治訓練班經常研究的課程包括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基本思想和時事。教育的目的還在于灌輸對勞動價值的認識，打破對美國的幻想，清除對蘇聯的無知。[[41]](#_41_Ru_Lu_Ding_Yi____Xin_Zhong_G)

但是同情社會主義和基本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還不足以解決對高等教育現存結構和內容的贊同問題，也不足以克服學習蘇聯的勉強態度。抵制阻礙了調整的進行。這就導致作出1951年10月宣布的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并作為全國當前三項主要任務之一的決定。[[42]](#_42_Ceng_Zhao_Lun____San_Nian_La)政治教育從此逐步升級為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基礎的整風式的運動，并于1951—1952年擴展到全國的大學和中學教師當中。緊隨這一年初期在美國教會大學反對文化侵略的第一個回合而開展的這次思想改造運動，與當時針對干部和資本家的“三反”、“五反”運動結合起來，結果是在企業、政府部門以及中學和大學中全面打擊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和其他資產階級思想的有害表現。

這幾項運動在朝鮮戰爭時期與抗美援朝運動同時進行，它們形成了早期的整風文獻，西方據此提出了“洗腦”的概念：坦白書，如周培源的《批評我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反美宣言，如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子女對父母的批評：如陸女兒的批評：《譴責我的父親陸志韋！》。[[43]](#_43_Zhe_Xie_Sheng_Ming_Zai_Yu_Fu)

按照高教部副部長曾昭掄的說法，高等院校最后出現的是，抵制活動煙消云散，調整能更順利地進行。或者可以說，大學教師們接受了學習蘇聯的運動，還同時出現了集中進行技術訓練甚至學習俄語的新氣象。他們還根據調整的要求接受工作的調動。在有些情況下，從一所大學分出一個技術學院，只不過意味著行政上的劃分，也許只砌起一道墻以表示校園的劃分。在另一些情況下，一所大學的一個系可能與另一城市的一個系合辦。或者像上海的交通大學那樣，實際上是整個校園遷往西安。因此調整造成了大學的整個搬遷，而且又是搬到教職員們不愿去的地方，這些教職員工的生活在前10年已經受到嚴重損害。但不管怎樣，到1953—1954學年開始時，全國高等院校的調整已完成了3/4。[[44]](#_44_Ceng_Zhao_Lun____San_Nian_La)

試圖把受西方思想影響的中國高等教育制度按蘇聯模式進行改造的措施產生的緊張狀態，就這樣用思想改造運動緩和了。教育制度普及方面的緊張狀態則更難控制。剛解放時表達的愿望是，在10年以內讓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受到“高等教育”，并能與其他階級的知識分子站在一起為國家服務。[[45]](#_45_Lu_Ding_Yi____Xin_Zhong_Guo)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決定所有的高等院校在1950—1951學年對工人、農民降低入學標準。但事實上只有400名學生按這種規定入學。1952年初，當思想改造運動達到高潮時，1萬名干部開始參加6個月的預備課程，結業以后可以進入高校。[[46]](#_46_Ceng_Zhao_Lun____San_Nian_La)

為了達到同一個目標，1949年12月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指示為工人、農民成立學習時間縮短為三年的中學。這是正規學校、工廠和軍事單位專門為工農出身、有3—8年工作經驗的干部設立的中學。1950年入學的許多學生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他們現有的知識是通過自學學到的。但是據說他們完成新的速成中學3—4年的課程后就能進大學。[[47]](#_47_Xin_Hua_She_____Ying_Yu__Bei)教育部長馬敘倫宣稱在“新制度下”，“條條道路通向高等學校”。正規中學的畢業生不再是有資格入大學的唯一候選人。所有階級中參加過各種短期學校和業余學校的人們這時都可以進大學。[[48]](#_48_Xin_Hua_She_____Ying_Yu__Bei)

在小學一級，擴大學齡兒童教育的機構依然是民辦小學。這一時期民辦學校絕大部分由農村地區的人辦理，并且數量隨著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進行而增多。土地改革還增加了1949年以前老解放區經常開辦的冬學和各種成人短期班。這樣做的目的部分是政治性的，這表現在開設的班級據認為是用來對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和其他時事方面的宣傳教育。但是主要的目標是掃盲，一個冬季農民們一般能學到幾百個漢字。[[49]](#_49_Tong_Shang)據說1951—1952年的冬季，4200多萬農民參加了冬學，另外還有數百萬人進了為工人、農民開辦的其他各種業余學校。

的確，實現鄉村教育工作的熱情是如此之高，以至在解放后的第一年出現了一個把冬學和成年農民的學習組改成學齡兒童的正規民辦學校的運動。1950年宣布的目標是在每個村建一所民辦學校。據說這年秋季山西有1/3的冬學已被成功地改為正規學校。東北各省59662所冬學中的6000所和59300個學習組中的44400個也在正規和長期的基礎上建立了起來。[[50]](#_50_Xin_Hua_She_____Ying_Yu__Bei)

#### 第一個五年計劃

但是，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對教育突然做了新的評價。國家統計局在提到1949—1952年時報告說，教育工作出現了很多問題。所用的字眼和名詞在10年以后變得司空見慣，而且在10年以前邊區1942年的改革中也出現過這些字眼和名詞：缺乏計劃與遠見；與經濟發展協調得不夠；盲目冒進；掃盲和小學教育只重數量不重質量。[[51]](#_51_Xin_Hua_She_____Ying_Yu__Bei)郭沫若寫道，教育工作的領導同志沒有正確地把需要和可能結合起來，追求數量忽視質量，追求數字和速度，傾向于“只顧眼前，不顧將來”。他們不懂得文化建設應該在經濟建設之后，而不能在經濟建設之前。[[52]](#_52___Ren_Min_Ri_Bao_____1953Nia)

1953年1月舉行了有各大行政區文教委員會主任出席的會議，會上討論了上述錯誤并提出解決的辦法。會議宣布了一些指導制定教育工作計劃的新的方針，以協調教育發展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工作，即調整鞏固、發展重點、提高質量、穩步前進。主要任務是：（1）集中力量搞好高等和中等技術院校的調整和管理，為經濟建設培養必要的人才；（2）適當促進中學的發展，以保證高等院校學生的質量與數量；（3）克服初等教育中的混亂狀態并提高它的質量。[[53]](#_53_Tong_Shang_Shu__Di_34Ye__Zhe)

轉眼之間，不再是條條道路通往高等院校了。教育部副部長曾昭掄在同一個月寫道：“由于工農勞動人民在過去反動統治時期幾乎完全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因此在現階段吸收具有相當高中文化水平的工農干部直接進入高等學校，是受到一定限制的。”[[54]](#_54_Ceng_Zhao_Lun____San_Nian_La)

新的行動口號是“系統地、有計劃地”。1952年第一次舉行了全國統一的高等院校入學考試，同年秋季開始的學期廣泛使用了規定的蘇式教學計劃。其目標是讓全國各學校的教學方法和內容實現“統一規定”和“高度計劃性”。沒有預先在中學受過充分教育的學生難以跟上規定的教學計劃，根據其他的報道，對很多工農出身的調干生也同樣如此。

因此，沿著蘇聯路線建立起來的新制度在很多方面是1944年以來曾為共產黨解放區的需要服務的延安模式的對立面。這個模式是在“反對一致”和“反對正規化”的口號下搞出來的。它強調當前的需要超過將來，并有意識地攻擊按常規把中學當做大學的預備學校的做法。在這種情況下，“程度不齊”是不可避免的，“各級學校的嚴格銜接”也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完全不必擔心。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認真清除了農村已有的先例，但是曾副部長概括了這種企圖中包含的難以解決的矛盾：“首先由于在新學制中確定了勞動人民和工農干部的教育在各級學校系統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使各級和各類學校互相銜接與溝通，保持了整個教育系統的一貫性和統一性。”[[55]](#_55_Tong_Shang_Shu__Di_5Ye)

問題是一貫性和統一性并不那么容易實現。他們必須作出選擇，并在1953年開始重視質量和適當的銜接。當時小學的數量還不能容納全體學齡人口，即便如此小學畢業生仍然超過現有中學的容量。中學畢業生的數量則不能完全滿足高等學校的需要。但是這種不平衡“只能逐步解決并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

教育的新路線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半段保持不變。據國家統計局報道，小學入學學生的人數因此從1952年的5500萬下降到1954年的5120萬（見表4）。每村建一所民辦學校的目標被放棄，中等師范學校（培養小學教師）的人學人數被削減，一部分學校自動停辦。

表4 1949—1957年學校和學生的數量



注：由于常常不可能使不同來源的數字的差異一致起來，因此表內數字只能被當作近似的數字。比如，1956年小學的兩個數字據推測反映了為配合農村合作化而開辦鄉村學校的運動。這些數字也不同于《偉大的十年》中的數字。  
材料來源：1949年：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1956年9月15日，載鮑伊與費正清合編《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59]，第185頁。1950年：新華社——英語，北京，1950年9月27日，載新華社《每日新聞發布》[550]，香港，1950年9月29日。1951年：新華社，北京，1951年11月4日，譯文見《當代背景材料》[735]，140（1951年11月22日），第4、6頁。1952年：國家統計局：《1952年全國經濟、文化、教育的恢復和發展公報》，1953年9月28日，新華社，北京，1953年9月29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262（1953年10月1日），第8頁。1953年：大學與小學：《國家統計局關于1953年國家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新華社，北京，1954年9月13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292（1954年9月15日），第9頁；中學：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新華社，北京，1954年9月24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296（1954年9月28日），第13頁。1954年：大學 張健：《更多的人上大學》，載《人民中國》[572]，22（1954年11月16日），第23頁。國家統計局：《1954年國民經濟發展與完成國家計劃情況的公報》，1955年9月21日，載《人民中國》[572]，20（1955年10月16日）；補編8。1955年：《時事手冊》。23（1956年12月10日），譯文見《中國大陸雜志選粹》[736]，71（1956年），第27頁。1956年：a.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1956年9月15日，載鮑伊與費正清合編《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59]，第185頁。b.國家統計局：《1956年完成國家經濟計劃情況公報》，1957年8月1日，新華社——英語，北京，1957年8月1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474（1957年8月12日），第9頁。1957年：a.薄一波：《關于195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結果和1957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1957年7月1日，新華社，北京，1957年7月1日，譯文見《當代背景材料》[735]，465（1957年7月9日），第16頁。b.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59年4月18日，載鮑伊與費正清合編的《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59]，第516頁。

在大專院校一級，1954—1955學年的93785名新生當中，有80%直接來自高中，只有3700人畢業于工農干部的速成中學。[[56]](#_56_Xin_Hua_She_____Ying_Yu__Bei)第一所速成中學成立于1950年，此時已達87所，共有5.1萬名學生，這說明升學率不是很高。[[57]](#_57___Su_Cheng_Zhong_Xue_____Zai)

按照新路線沒有達到穩定平衡的事實在1955年變得很明顯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后半段期間，一種試圖綜合兩個世界的優點的混合制度開始在教育界發展。這個制度設法在精英層次上保持蘇聯模式，同時把中國共產黨以往的農村經驗用到公眾之中。

1955年7月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在他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確立了關于高校的原則。科學技術人員的短缺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但是他仍然呼吁在質量與數量的平衡方面要兼顧和謹慎。他警告道：“那種片面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的傾向，對于國家建設顯然是不利的。”學術水平還不夠高，特別是在學生數量增長過快的工程院校，更是如此。因此這些學校逐步取消了二至三年的專業課，并把基礎課從四年延長到五年。他還號召進一步提高大學生的質量。他們至少應該在“學業上能夠跟得上班”，他認為，“達不到這些最低限度的條件不能夠或者很難培養出有用的建設人才來的”。因此大學入學人數的增長趨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后半段終于得到扭轉。[[58]](#_58_Zhong_Yin_Yu_Luo_Bo_Te__Bao)

這個時期還頒布了評定高級學位的規劃，工科和其他幾種學科的學習課程從1955—1956學年開始延長到五年。在加強對學術專長的要求的同時，黨在1956年春天宣布了學術自由的新風氣。承認需要受過訓練的人才，也認識到中國要取得專業知識，不能只依靠蘇聯專家。[[59]](#_59_Ru_Zhou_En_Lai___Guan_Yu_Zhi)這種重新估計形勢的一個結果是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在這種新氣氛的背景下，郭沫若在號召開展自由的學術討論和結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的同時，詳細列舉了學術界對以下現象的種種不滿情緒：機械地照搬蘇聯的經驗；因片面強調解決技術問題而忽視研究和理論研究；忽視蘇聯以外的別國的知識。[[60]](#_60_Guo_Mo_Ruo_____Bai_Jia_Zheng)

但是1955—1956年也標志著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毛澤東在關于1955年末農業生產合作社組建速度的按語中寫道：“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61]](#_61_Mao_Ze_Dong_____Zhong_Guo_No)在高等學校，可能繼續保持了平衡和有節制的增長，但追求速度和數量之風又再次席卷全國。

1956年1月采納的新的12年農業發展綱要，宣布了農村在7—12年內小學全部實行義務教育的目標。村的民辦小學使這個目標的實現成為可能，負責辦校的“民”現在是村里新成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地方人士不得不因急需而充當教師。教育部就近年來師范學校招生人數減少而做了自我批評，現有的師范學校只能培養滿足普及小學教育新計劃需要的100萬教師中的一小部分。但小學的入學人數仍恢復了迅速上升的趨勢，從1954年的5120萬上升到1956年的5700萬至6300萬，數字的不同取決于所引用的材料。

按照新的12年農業發展綱要，必須在1956年以后的5—7年內完成掃除文盲的任務。毛澤東抱怨解放后的初期根除文盲的努力已被棄置一旁；于是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展開了新的掃盲運動。掃盲的標準確定為能讀、寫1500個漢字。計劃每年給業余學習班安排240小時的課程。這些學校作為更可行的教學方法取代了舊式的冬學，因為農民往往容易忘掉前一個冬天學習的內容。統一教材的效果比不上地方自編或為地方編的教材，因為后者包括與日常生活有關的漢字，如當地人的名字、地名以及牲畜、農具及各種工種的名稱。[[62]](#_62___1956__1967Nian_Quan_Guo_No)為了保持時代精神，綱要宣布，1954—1955學年全部在校生僅有5.1萬人的工農干部速成中學，計劃在1955—1956學年一年招收新生3.3萬人。[[63]](#_63___Su_Cheng_Zhong_Xue_____Zai)

但是群眾運動過程中產生的熱情仍不能掩蓋制度本身固有的緊張。周恩來1957年6月的《政府工作報告》詳細分析了這一點。這個報告維護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他的政府的工作。他承認在這個過程中批評者的壓力正在不斷增強。例如，他指出：“有人認為我們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全是粗制濫造”，“有人反對學習蘇聯經驗，甚至說我們建設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也是學習蘇聯的結果”。在談到教育時，他說：“過去，教育部門在實行教育改革的時候，也發生過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舊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對解放區革命教育的經驗沒有做出系統的總結，加以繼承，并且在學習蘇聯經驗的時候同我國實際情況結合不夠。這些缺點今后應該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為教育革命中有這些缺點，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績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認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圖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舊中國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錯誤的。”[[64]](#_64_Zhong_Yin_Yu_Bao_Yi_Yu_Fei_Z)

“有人”正在談這些或更多的問題，而且剛好是在1957年5月這一個集中批評的月份中談的。[[65]](#_65_Mai_Ke_Fa_Kua_Er_Bian____Bai)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黨員在內的教師和學生，管理人員和行政人員——在他們的批評中彈奏出與第一個五年計劃不和諧的調子。1949年以后的新秩序沒能贏得知識精英的擁戴，他們尤其憎恨教育制度中強加給他們的變化。

此外，教育制度在某種意義上仍保持1949年以前的那種兩分狀態。蘇聯模式在高校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這一級，它被認為取代了西方的影響。但是這個新模式也像從前的模式一樣，它的基礎是沒有文化的群眾，在可預見的將來，它也無力改變這種情況。按照高等教育部部長張奚若所說，1956年總人口的78%仍是文盲，只有52%的學齡兒童上了小學。[[66]](#_66_Xin_Hua_She_____Ying_Yu__Bei)

通過統一和標準化以提高質量的要求，只能在減少學生人數和降低受過訓練的教師與學生人數的比率時才能實現。因此，在嚴格地應用蘇聯模式的情況下，普及小學教育的目標甚至更要拖到將來，這是把自己的利益與工人、農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中共難以接受的選擇。讓每個村都有一所學校的唯一辦法是恢復延安宗旨，即不必為程度一致而過分操心，因為一致的程度只有國家支持的，并配備受過適當訓練的教師的學校制度才能達到。短期的解決辦法是傳統的村學，雖然它在新時期的形式是民辦學校，即 不是由國家開辦而是由農村合作社有組織地開辦的學校。

重新考慮延安經驗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學教育的結構變了。前面已經指出，雖然到1955年，大學明顯地已經不能繼續無限制地增加入學人數和保持所需要的質量，高等學校對學生人數的需求仍超過了中學畢業生的供應人數。在整個1956年，大部分高中畢業生仍能進大學，大多數初中畢業生——1954—1955年的除外——都能升入高中深造，或者據說是這樣。

但是，周恩來1957年宣布，這種形勢無論如何是“暫時的、不正常的”，不能繼續下去。從1957—1958學年開始，高等院校和高中招生的人數將少于應考的人數，以后還將繼續這樣做。換句話說，夠條件的投考生總數的增長速度將超過更高一級學校的招生人數。以后日益增多的年輕人將不得不縮短學習年限而參加生產勞動，這種命運已經在1954年和1955年的初級中學中引起了“緊張”。[[67]](#_67_Zai___Dang_Dai_Bei_Jing_Cai)

與此同時，人們可以感到小學教育迅速發展所產生的抱負因中學沒有相應增長而得不到實現。教育部長在1957年初期提醒大家：“小學、中學畢業生不能全部逐級升學的現象，不僅在今年，并且在今后很長時期內也將存在。”即便是小學、中學已經普及而每個人都已“成為知識分子”，他們以后仍要習慣于從事生產勞動的觀念。社會不能只有知識分子而沒有農民和工人。面對就業機會和中學名額都不充足的結構性問題，教育部長希望家長和地方組織幫助青年人，“如果一時找不到職業，就應當參加家庭勞動和在家自學”。至于教育內容問題，他建議各級學校加強職業訓練。[[68]](#_68_Xin_Hua_She_____Ying_Yu__Bei)

到1957年，政府必須正視另一個潛在的破壞性問題（教育發展的癥候）——即設計出中等教育的合理形式的必要性，中等教育對有些學生將是入大學的準備，但對絕大部分學生將是最后的和面向就業的學習。當誰的孩子能繼續學習，誰的孩子不能學習變得明顯時，這種區分的界線就更引起人們的爭議了。

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教育制度把三種遺產調整并合成一個和諧的整體的企圖顯然失敗了。取而代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蘇聯和西方影響在精英層次上的有爭議的混合體，對專業化的新的要求使質量問題變得越來越緊迫。這就使現有的知識精英能無限期地在將來存在下去，因為到1954年就已經清楚，如果要完成學術計劃和達到學術標準，黨最初提高工農的大學入學率的愿望和一些新穎的入學政策就難以實現。

所以1949年以后的新一代大學生也毫不奇怪地具有他們前輩的那種反當局的觀點和價值觀，這在1957年5月的大鳴大放中可以看出。當時，他們甚至批評有節制的入學政策不公平，這種政策優先照顧了五種考生（工人、農民、特定的軍隊人員、革命烈士子女、少數民族和海外華人），雖然只有他們的條件在其他方面可以一爭高低時才能照顧。在“反右運動”中，學生的批評遭到官方的斷然反駁，運動以統計數字說明，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不公平現象仍遠沒有消除。大多數大學生仍出身于資產階級和地主家庭。到1956年9月，高等學校在校學生當中只有34.29%是工農出身。在這些高校和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中，工農出身的比率分別是17.46%和5.92%。[[69]](#_69_Guo_Mo_Ruo____Bo_Chi_Yi_Ge_F)

與此同時，滿足廣大群眾即使是最基本的教育需要的唯一手段是一種根據與高等學校推行的原則迥然不同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制度。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數量日益增多的受部分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是推廣小學教育的運動造就的。因此，盡管有與這種情況相反的動聽的言辭，在20世紀初期隨著科舉考試的廢除和西方學說的傳入而擴大的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鴻溝，在共產黨統治的最初10年期間沒有什么變化。但是這種動聽的言辭依然存在，它被農民黨員占69%的執政黨廣為傳播，同時制度內部形成的壓力也依然存在。這樣，就為把兩種文化的有沖突的要求合成一個單一的一體化制度的更為激進的企圖創造了條件。

[[1]](#_1_3)《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附錄G，教育部分[130]，世界銀行文件（1981年6月1日），第1頁。本章第一部分論述1949年以前的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見《劍橋中國史》[73]，第13卷，第8章。

[[2]](#_2_3)同上。

[[3]](#_3_3)關于現在和過去的男女人口之比，見《人民日報》，1982年10月28日；《中國日報》，北京，1982年11月9日；卜凱：《中國的土地利用》[67]，第375—377頁。最系統地估計過去識字率的嘗試，見伊夫林·羅斯基的《中國清代的教育和民間識字狀況》[600]，第23頁及其他各處。

[[4]](#_4_3)彼得·西博爾德：《群眾教育中的延安革命》[650]，載《中國季刊》[133]，48（1971年10—11月），第642頁。

[[5]](#_5_3)卜凱：《中國的土地利用》[67]，第373—375頁。

[[6]](#_6_3)比如，宮崎市定：《中華帝國的文官考試》[531]，第3頁；錢穆：《中華帝國的傳統政府》[127]。

[[7]](#_7_3)羅斯基：《中國清代的教育和民間識字狀況》[600]，第95、183—193頁。

[[8]](#_8_3)《中國清代的教育和民間識字狀況》[600]，第44—53、125—139頁。

[[9]](#_9_3)見西奧多·E.蕭：《中國近代教育史》[317]。

[[10]](#_10_3)羅斯基：《中國清代的教育和民間識字狀況》[600]，第163—165頁。

[[11]](#_11_3)國際聯盟教育專家考察團：《中國教育的改革》[428]。該報告是應中國政府的要求而作，依據的材料是作者們1931年秋季在中國停留的三個月中搜集的。報告的幾個作者是歐洲人：前普魯士教育大臣、柏林大學的C.H.貝克爾教授；波蘭教育部初等教育主任福爾斯基；巴黎法蘭西學院的P.蘭格文教授；倫敦大學的R.H.托尼教授。

[[12]](#_12_3)《中國教育的改革》[428]，第21頁。

[[13]](#_13_3)同上書，第65—67、92—95頁。

[[14]](#_14_3)《中國教育的改革》[428]，第151頁。

[[15]](#_15_3)同上書，第76—85頁。

[[16]](#_16_3)同上書，第99—100頁。

[[17]](#_17_3)同上書，第130—131、141、151頁。

[[18]](#_18_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英文）[502]，第5卷，第53—54頁。

[[19]](#_19_3)西博爾德：《群眾教育中的延安革命》[650]，第650—652頁。

[[20]](#_20_3)《解放日報》[126]，1944年4月7日。譯文見林邁可《共產主義中國的教育問題》[459]，第56頁。

[[21]](#_21_3)林邁可在他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教育問題》[459]第38頁舉出一個例子。

[[22]](#_22_3)同上。

[[23]](#_23_3)《關于“民辦公助”小學的研究和試驗的指示》（1944年10月2日），見《現行法令匯編》（晉察冀邊區政府，1945年12月15日）。譯文見林邁可《共產主義中國的教育問題》[459]，第103—104頁。

[[24]](#_24_3)西博爾德：《群眾教育中的延安革命》[650]，第663頁。

[[25]](#_25_3)《解放日報》[126]，1944年5月27日；譯文見林邁可《共產主義中國的教育問題》[459]，第60—61頁。

[[26]](#_26_3)西博爾德：《群眾教育中的延安革命》[650]，第658頁；關于這些創新和它們的更大的背景，又見馬克·塞爾登的《中國革命的延安道路》[646]，第267—274頁及第6章。

[[27]](#_27_3)《解放日報》[126]，1944年4月7日；1944年5月27日。譯文見林邁可《共產主義中國的教育問題》[459]，第56—57、61頁。

[[28]](#_28_3)關于從蘇聯得到最好的西方經驗的早期中國人的主張，見蘇珊娜·佩珀的《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574]，第364—366、374—375頁；又見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1952年7月18日，載斯圖爾特·弗雷澤編《中國的共產主義教育》[254]，第184—185頁。

[[29]](#_29_3)簡·英格瓦·洛夫斯特：《中國的教育政策》[478]，第50—58頁；馬丁·金·懷特：《教育改革：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和20年代的俄國》[789]，載《比較教育評論》[187]，（1974年2月號），第112—128頁；關于第三世界國家運用蘇聯教育的總的情況，見艾琳·布盧門撒爾和查理斯·本森《蘇聯的教育改革：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54]，載《世界銀行職工論文》，288（1978年5月）。

[[30]](#_30_3)《人民日報》，1950年6月14日。譯文見胡實明（音）與伊萊·塞德曼編《展望新世界》[334]，第12頁。

[[31]](#_31_3)曾昭掄：《新中國的高等教育》[722]，載《人民中國》[572]，12（1953年6月16日），第7頁。

[[32]](#_32_3)曾昭掄：《新中國的高等教育》[722]，第8頁。《國家統計局公報》，新華社——英語，北京，1954年9月13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292（1954年），第9頁；約瑟夫·孔：《高等教育：選拔和入學的一些問題》[406]，載《中國季刊》[133]，8（1961年10—11月），第139—140頁。

[[33]](#_33_3)《時事手冊》，18（1956年9月25日），譯文見《當代背景材料》[735]，428（1956年11月19日），第2頁。

[[34]](#_34_3)曾昭掄：《新中國的高等教育》[722]，第8頁。

[[35]](#_35_3)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大學：社會主義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經驗——一份研究報告》[576]，載《現代中國》[532]（1982年4月）。

[[36]](#_36_3)洛夫斯特：《中國的教育政策》[478]，第62頁；陳錫恩：《1949年以來的中國教育：學術的和革命的模式》[105]，第35—40頁。又見《光明日報》，1958年11月7日，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1908（1958年12月5日），第1—2頁；張健：《學習蘇聯經驗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嗎？》，《人民教育》，8（1957年8月9日），譯文見《中國大陸雜志選粹》[736]，105（1957年），第8—15頁。

[[37]](#_37_3)R.F.普賴斯：《現代中國的教育》[588]，第102—106頁；洛夫斯特：《中國的教育政策》[478]，第62頁。趙重（音）、楊一帆（音）：《中國大陸的學生》[88]，第62—64頁。

[[38]](#_38_3)見《十七年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載《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收入彼得·西博爾德編《中國的革命教育》[649]，第7頁。（這次會議報告的原文尚待找出。）

[[39]](#_39_3)關于這種指導思想應用于土地改革運動中的過激行為和毛澤東容忍這些行為的情況，見佩珀的《中國的內戰》[574]，第246、250、255—256、258—260、269—275、325—327頁。

[[40]](#_40_3)這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第47條為“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適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譯文見林邁可《共產主義中國的教育問題》[459]，第194頁。

[[41]](#_41_3)如陸定一：《新中國的教育和文化》[485]，載《人民中國》[572]，8（1950年4月16日），轉載于弗雷澤編《中國的共產主義教育》[254]，第90—91頁。

[[42]](#_42_3)曾昭掄：《三年來高等教育的改進》，載《人民教育》（1953年1月），譯文載《當代背景材料》[735]，238（1953年3月25日），第2頁。

[[43]](#_43_3)這些聲明載于弗雷澤編《中國的共產主義教育》[254]，第104—110、136—158；更完整的選錄見《當代背景材料》[735]，第107、167、169、182、185、213頁；陳錫恩：《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104]，第30—79頁。

[[44]](#_44_3)曾昭掄：《三年來高等教育的改進》，第3頁。譯文載《當代背景材料》[735]，269（1953年），第30頁。

[[45]](#_45_3)陸定一：《新中國的教育和文化》[485]，第89頁。

[[46]](#_46_3)曾昭掄：《三年來高等教育的改進》，第6頁。

[[47]](#_47_3)新華社——英語，北京，1950年9月27日，載新華社《每日新聞發布》[550]，香港，1950年9月29日。

[[48]](#_48_3)新華社——英語，北京，1952年9月26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220（1952年），第11頁。

[[49]](#_49_3)同上。

[[50]](#_50_3)新華社——英語，北京，1950年9月27日，載新華社：《每日新聞發布》[550]，香港，1950年9月29日，第8—9頁。

[[51]](#_51_3)新華社——英語，北京，1953年9月27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262（1953年），第9頁。

[[52]](#_52_3)《人民日報》，1953年10月1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269（1953年），第33頁；郭沫若當時是政務院文化教育事務委員會主任。

[[53]](#_53_3)同上書，第34頁；這幾項任務在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得到重申。新華社——語，北京，1954年9月24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296（1954年），第13頁。

[[54]](#_54_3)曾昭掄：《三年來高等教育的改進》，第6頁。

[[55]](#_55_3)同上書，第5頁。

[[56]](#_56_3)新華社——英語，北京，1956年6月20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400（1956年），第24頁。張健：《更多的人上大學》[80]，《人民中國》[572]，22（1954年11月16日），第23—24頁；《教育部關于師范學校今后設置發展與調整工作的指示》，新華社，北京，1954年6月19日，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844（1954年7月9日），第33—34頁。

[[57]](#_57_3)《速成中學》，載《人民中國》[572]，8（1955年4月16日），第39頁；《國家統計局公報》，載《人民中國》[572]，20（1955年10月16日），補編8。

[[58]](#_58_3)重印于羅伯特·鮑伊與費正清合編的《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59]，第76頁。

[[59]](#_59_3)如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1956年1月14日，重印于鮑伊與費正清編《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59]，第128—144頁。

[[60]](#_60_3)郭沫若：《“百家爭鳴”萬歲》，載《人民中國》[572]，17（1956年9月1日），第7—9頁。

[[61]](#_61_3)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首次發表于《人民日報》，1956年1月12日，第1版。

[[62]](#_62_3)《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載鮑伊與費正清合編《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59]，第125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于掃除文盲的決定》，新華社，北京，1956年3月30日，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1266（1956年4月12日），第3—7頁。新華社——英語，北京，1956年6月20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400（1956年），第19、22、24頁。

[[63]](#_63_3)《速成中學》，載《人民中國》[572]，8（1955年4月16日），第39頁。

[[64]](#_64_3)重印于鮑伊與費正清編的《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59]，第310頁。

[[65]](#_65_3)麥克法夸爾編：《百花運動和中國的知識分子》[493]，散見各處。

[[66]](#_66_3)新華社——英語，北京，1956年6月20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400（1956年），第21頁。

[[67]](#_67_3)載《當代背景材料》[735]；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57年6月26日。重印于鮑伊與費正清編的《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59]，第311頁。1952—1959年每年高中畢業生與大學新生的人數，見約瑟夫·孔的《高等教育：選拔和入學的一些問題》[406]，第138頁。當時宣稱的所有初中畢業生都能升入高中的情況，掌握的統計數字不能證實，顯然這些數字的確表明1954—1955年的升學率下降了（伯恩斯坦：《上山下鄉：中國青年從城市走向農村》[43]，第48頁）。這種宣稱也許可理解為打算繼續學習的初中畢業生都能升入高中。

[[68]](#_68_3)新華社——英語，北京，1957年3月16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446（1957年4月8日），第1—8頁。

[[69]](#_69_3)郭沫若：《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載《人民日報》，1957年7月6日；譯文見《當代背景材料》[735]，467（1957年7月15日），第11頁。關于后來用來反擊1957年5月的批評者的“反右運動”，見《當代背景材料》[735]，470（1957年7月26日），475（1957年8月28日）；陳錫恩：《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104]，第171—201頁；麥克法夸爾編：《百花運動和中國的知識分子》[493]，第261—291頁。

## 第五章 黨與知識分子

1949年以后，中共對知識分子執行了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黨向他們灌輸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比以往儒家思想對傳統文人施加的影響更全面，更深入細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勵知識分子在專業上多生產一些東西。這種互相矛盾的態度使得政策發生搖擺：在鎮壓時期要知識分子服從思想改造運動；在比較松弛的時期又給他們以某些責任和優遇，希望在實現現代化中贏得他們的合作。

這種政策的轉變有時決定于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有時又決定于國際事件。政策的轉變也有自己的原動力。中共力求擴大意識形態的一致性，直到知識分子不愿生產成果為止；然后又放松一下，直到黨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脅時為止。在相對放松的間歇期，黨鼓勵——或者至少是準許——知識分子就西方思想展開學術上的辯論和討論。黨也允許——有時甚至是鼓勵——對官僚主義的批評，以便清除官僚制度的弊端。

## 知識分子和政府之間的歷史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分子是儒家傳統的繼承者，按照這個傳統，文人應該為國家服務，同時在政府偏離原則的時候能直言敢諫。在批評政府的錯誤行為上，西方知識分子更多地認為是他們的權利，中國知識分子則認為是他們的責任。中國知識分子把自己看成是道德裁判者。他們帶頭做應該做的事，而不是隨遇而安，因此可以不計個人的成敗得失，甚至坐牢和殺頭也在所不惜。他們沒有得到制度上的或法律上的認可，但是，他們有傳統的道德來大聲抗議暴政。文人們都起來爭辯、抗議和批評，以求改正錯誤和改革政治。在支撐國家政策和施加政治壓力方面，存在著使用書面文字的長期傳統。像他們的先輩那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忠于這個制度，但也總是有一小部分人反對那些使這個政權不能達到它的目的的官方弊端。可是，他們又不能跟先輩們完全一樣，因為當他們發現國家的領導強迫他們損害他們自己的原則時，他們又不能退回書齋，或隱居到山上去過體面的學者或藝術家的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必須參加到這個制度中來。

與傳統時代一樣，知識分子發表批評意見主要是通過官方的渠道。皇帝開“言路”意味著允許文人批評政策上的問題，毛澤東也是這樣：他在各個不同時期敦促知識分子對官方弊端提出疑問和批評，以便端正這個制度的作風。知識分子在黨控制的報紙、雜志上和創作活動中發表他們的意見。甚至在1957年春天和1978—1979年，當自發的、基層的抗議噴發而出的時候，這些抗議也是得到官方的準許的。當毛澤東壓制對他的政策的批評的時候，就像20世紀60年代初期那樣，知識分子采取了傳統的表示異議的形式，即古代統治者閉塞言路時文人們所用的那種形式。他們把他們的不同意見用間接的、比喻的方法偽裝起來，用之于歷史、文學、哲學、藝術和戲劇的討論之中。他們也使用中國最巧妙的表達不同的意見的體裁——雜文，即短小、精妙、諷刺性的小品文，表面上寫些不關痛癢的主題，但實際上是討論政治問題。這種政治手法，偉大的儒家思想家韓愈和歐陽修用過，近代的偉大作家魯迅也用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分子在偽裝他們的不同意見時甚至要承受更大的壓力，因為他們比他們的先輩受到更嚴密的控制。

各種不同集團的知識分子聯合起來致力于改革中國的社會，這不是近代中國才有的現象。在傳統的中國，每遇政治危機和經濟困難的時候，或者文人們組織起來討論那些他們認為政府舉措失宜的問題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以“清議”為事的集團。每當遇到這種情況，他們就要想辦法來恢復政府的元氣，使它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雖然有些文人變成了殉道者，但大多數人是在得到權勢人物的庇護才展開批評的。這種情況在派系沖突的時期最為常見，這時文人們往往被利用來做政治斗爭的工具。同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派系分裂時期，例如在60年代初期，與最上層領導成員結成聯盟的知識分子能夠得到表達他們的觀點的機會。像傳統的文人那樣，在表述他們庇護者的立場時，有些人也夾入了自己的觀點和價值準則，這些東西不僅不同于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也不同于他們的庇護者的觀點。

知識分子也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繼承人，這個運動后來想要創立一種新的西方化的文化，以此來解救中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苦難。雖然這個表述得很明確的救治之方是新的，但是，作為延續生存關鍵的復興文化的方法卻是傳統的。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的“五四”作家們，都把他們的作品當做與社會和政治弊端進行斗爭并形成政治覺悟的工具。他們自視為革命的精英，有塑造輿論和改造社會的使命。在那幾十年混亂的政治形勢中和在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之下，他們認為他們的行動是自由的和不受政治控制的。就連那些獻身于共產主義運動的知識分子也信奉“五四”的時代精神——即多元主義、公開辯論和知識分子自主。

他們雖然在文化知識上是獨立的，但他們也像“清議”派那樣被卷入了政治。盡管他們對國家失望，他們卻并非異化了的知識分子。他們并不因為無根基或厭世而置身于公共事務之外。相反地，他們盡力把自己同他們的社會和人民聯結在一起。因此，知識上獨來獨往而政治上有使命感的“五四”傳統，和“清議”派的先例一樣，給1949年以后的知識分子提供了榜樣。

## 黨和知識分子在1949年以前的沖突

#### 30年代中期的上海

中共即使在它掌權以前，也像儒家官僚政制那樣，把知識文化和創作方面的活動看成是完成它的政治目的的婢女。除此之外，它還模仿蘇聯的模式，期望知識分子在改造中國社會中助它一臂之力。和斯大林一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把作家和藝術家視之為按照黨的意旨來改造“人類靈魂”的人們。黨第一次動員知識分子來為它的事業服務的努力開始于30年代中期的上海，這項工作主要是在作家中間展開的。不論是在黨執政以前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事實上每一次政治氣候和多次主要政治運動的轉折點，都是以文學領域內的激烈辯論和爭辯為其標志的。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國的大多數著名作家都住在上海。他們都曾留學國外，或者與受過西方教育的學者一起學習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蔣介石統治之下因要求知識文化獨立的愿望受挫，又因他們的許多同仁被國民黨殺害而成為異己分子，所以都轉向中國共產黨和左翼組織。他們聚集在魯迅（1881—1936年）周圍，魯迅關于傳統社會的弊端、無能、不人道和黑暗以及中國需要革命性的變革的小說，為整整一代中國的作家樹立了榜樣。1930年3月，他創建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它事實上是黨的前沿組織，但是，由于它的激烈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并由于魯迅的支持，它團結了中國的大多數作家。盡管它有急進的傾向，但它的成員卻表現出很不相同的政治和藝術觀點。左聯建立了一個友誼、通信和聯誼的網絡，從而提供了一種文化社團的意識。盡管有國民黨的檢查，盡管他們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的文藝理論越來越多，他們仍然就政治問題和文學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辯論。

這個社團里面發生了許多論戰，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仍有反響的，卻是在魯迅和當時黨在上海的文化官員之間爆發的一場沖突；這些官員接受奉莫斯科之命的王明的指示，于1935年主張組織統一戰線。黨的主要文化官員周揚未征詢魯迅的意見于1935年貿然解散了左聯，而代之以另一個組織作家協會，其目的在于促進文化界的統一戰線。這個組織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歡迎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作家。加入該組織的唯一條件是反對日本。

雖然魯迅和他的追隨者勉強接受了統一戰線政策，但是他們擔心，如果非左派作家參加了這個協會，革命精神就會沖淡。于是他和他的合作者——作家胡風和馮雪峰——建立了自己的“中國文藝工作者”組織，并且采用了一個更加革命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但是，黨的文化官員們——周揚及其同道劇作家夏衍、田漢和陽翰笙，雖然表面上宣稱要站在更加自由的立場上，卻不能容忍另外一個組織和另外一個口號。在組織反擊的時候，他們慫恿魯迅的一個追隨者徐懋庸寫了一封信，暗示胡風及其追隨者們在做反對黨的工作。魯迅以公布徐懋庸的信作為答復，并附了一封憤怒的回信：他在信中為胡風辯護，同時指責周揚及其同伙只是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而給人們貼上“內奸”的標簽。魯迅的這一封信表明，那時他厭惡黨的官員們想要控制他本人及其朋友們的工作和活動的努力。[[1]](#_1___Lu_Xun_Quan_Ji_____482__Di)

周揚和魯迅之間在上海的沖突，預示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黨力圖控制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的反抗之間的沖突。雖然在這次事件中作家們采取了比黨更加革命的立場，但魯迅和他的追隨者不僅對馬克思主義和文學，也對黨的組織設法采取了一種獨立的、非教條主義的態度。他們不但力拒黨企圖把他們的工作納入政治緊身衣中去的努力，而且拒絕周揚等人僅僅因為是黨的官員而竊取知識界的領導權。盡管周揚翻譯過托爾斯泰和19世紀俄國文藝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但他并沒有發表很突出的或者有創造性價值的東西。可是，由于他的組織才干和不容置疑地服從黨的路線，他馬上位居別人之上，盡管別人比他更出名和更有才能。從此以后，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就把意識形態和組織的考慮放到了對于個人的和專業的問題的考慮之上。

#### 1942年的延安

在1937年的抗日戰爭爆發于上海周圍和沿海地區以后，許多知識分子和大批的學生奔向共產黨的總部延安，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把中國從紛亂中拯救出來。他們到達延安的時候，領導上所關心的是干部們正在喪失某些革命熱情，對追求和維護他們在官僚體制中的座次正在變得更加關心。這時領導上也在關心，那些習慣于大城市的非軍事生活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們的流入，也會在這個社會內部普遍地引起無紀律的行為。

黨既然同時受到國民黨和日本人的威脅，所以它在40年代之初就發起一場運動以塑造一個有紀律的干部和知識分子的核心，使之獻身于黨的正義事業。酷像傳統的儒家精神那樣，它相信，人們在變革社會以前必須端正他們的思想。這個端正思想的運動，即“整風”運動（即“整頓工作作風”運動的簡稱）就以改造思想的運動聞名于世了。這種開始于延安而周期性地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運動，其目的是想發展成人類行為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實驗。

延安所使用的方法只不過是開其端，它以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雖然后來運動中很具特色的粗暴、絕對化和深文周納等情況在1940年之初并不十分明顯，但它在將來所將采用的方法在那時已完全具備。它的第一個階段是在黨的組織內分成若干小組，使其成員先學習和討論指定的講話和文章。因為沒有沉默不語的自由，每個成員都必須就這些文件發表意見。接著便是小組每個成員作檢查的第二個階段。每個人原來的思想和態度要受到別人認真的和長時間的批評。無休無止的敘述一個人的失誤，不斷地給他以幫助教育以及越來越緊張的氣氛，產生了深刻的情緒危機，最終打垮了那個人的內在意志。這個人只有向黨的權威及其價值觀念繳械投降，才能從這些壓力下獲釋和贖“罪”。

此后是第三階段，這時個人要交一篇小組長認可的自我批評。按通常情況，最初的坦白交代不會被通過。需要做幾次自我批評，一次比一次更加摧殘個人的性格。光是背誦共產主義的教條或官方的路線是不夠的；個人還要舉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他過去的思想和行為一無是處，他向黨的意志投降是不折不扣的。黨不需要消極的默認，而是要個人積極地皈依它的信念。其結果是，當個人的交代被通過以后，他就從有罪的意識中獲得解放，并得到了新生。他認為他自己已是一個“新”人，至少暫時地是如此，準備熱情地執行黨的一切命令。[[2]](#_2_Luo_Bo_Te__Li_Fu_Dun____Si_Xi)

在最初，這種運動是要批評干部的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以及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它最初的主要靶子是毛澤東的老對手王明周圍的一批蘇聯留學生和干部。由于對官僚主義的批評得到黨的上層領導——特別是毛澤東——的鼓勵，一批從上海來的知識分子（有些人和魯迅關系密切），就利用這個機會指責延安日益滋長著的特權精英階層，并且像他們和魯迅在上海做過的那樣，揭露他們所說的社會黑暗面。和在上海文化人圈子中那樣，他們繼續展開相當自由的知識分子式的辯論，也組成一些團體。女作家丁玲所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成了傳播他們思想的工具。實際上，甚至在運動開始之前，丁玲就在1941年10月23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我們需要雜文》的文章，她在文內舉出魯迅為榜樣，要她的同道知識分子們加以學習。她堅持認為，魯迅的揭露社會黑暗面和他的寫“雜文”的方法仍是當前所需要的，因為“我們這時代還需要雜文，我們不要放下這一武 器”[[3]](#_3___Jie_Fang_Ri_Bao_____126__19)。

為了響應毛澤東關于開展批評的號召，《解放日報》從1942年3月至4月在它的文藝副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它們代表了延安知識界思想的上流。它們的作者有丁玲、王實味、蕭軍、羅烽和艾青——都是共產黨員。其中有幾個人，特別是蕭軍和羅烽，還是魯迅內圈中的人物。他們過去曾毫不顧忌地批評他們所不同意的人物和事勢，現在在延安也如法炮制，希望他們的批評可以引起改革。羅烽說了他們的目的：“我希望我們今后的‘文藝’變成一把使人戰栗，同時也使人喜悅的短劍。”[[4]](#_4_Luo_Feng____Huan_Shi_Za_Wen_D)

他們的雜文描寫了干部的冷漠、虛偽和官僚主義，其筆鋒的犀利和他們當初反對國民黨的官員時一模一樣。雖然他們的文章題材不同，但無不表現幻滅感，即發現革命根據地的生活與革命的理想不符。正像羅烽所說的那樣：“云霧不單盛產于重慶，這里也時常出現。”[[5]](#_5___Huan_Shi_Za_Wen_De_Shi_Dai)例如丁玲抱怨說，她所期待的和黨所宣揚的男女平等，事實上并不存在。[[6]](#_6_Ding_Ling____San_Ba_Jie_You_G)他們希望通過他們的批評來終止實際生活中對于共產主義理想的歪曲，使黨重新回到革命的目標上來。

他們雜文的另一主題，是不同意在一個黨所治理的社會中對作家的作用實行領導。像他們的導師魯迅那樣，他們認為，作家的職能不是在黨的路線的每一個轉折中像宣傳員一樣地照章行事，而是應該批評和抗議他們認為錯誤的東西。他們把知識分子的任務和黨的任務分開了。既然黨本身在關心物質的和身體的需要，那么，作家和其他知識分子就應該關心精神需要。艾青實際上用理學家的語言堅持認為，作家的職能是迫使他的同胞做自我檢查和自我批評。一個作家并不是“百靈鳥，也不是專門唱歌娛樂人的歌伎”。作家要觀察馬克思主義或黨沒有給予答案的問題。作家“還要在最孤獨的時候很深沉地發問：‘活著究竟為什么？’”[[7]](#_7_Ai_Qing____Le_Jie_Zuo_Jia__Zu)

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雜文的作者們都堅決主張，應該有創作自由和某種程度上的思想和行為方面的獨立性。由此看來，雖然這些作家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黨員，但他們也都浸透了西方的自由思想，認為它是創作和改革的前提條件。正如艾青所說的，投身到延安的政府方面，是“因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們的藝術創作的獨立精神。因為只有給藝術創作以自由獨立的精神，藝術才能對社會改革的事業起推進的作用”。[[8]](#_8_Tong_Shang)

1942年的雜文作者中，最大膽和最引起爭議的要數王實味了：他是1926年以來的黨員，是一位短篇小說作者、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筆頭和口頭翻譯家。他從1930—1935年在蘇聯學習，1936年來到延安，成為延安馬列學院的成員，后來又在它的中央研究院工作。1941年，他負責高級干部的理論教育工作。王實味在1942年初寫了兩篇文章，他在為作家要求獨立作用和批評延安的官僚主義方面，比他的同行們都走得更遠。這兩篇文章把文學界的批評意見同“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獨立態度聯系了起來。

1942年2月17日，王實味在當時延安最流行的文學刊物《谷雨》上發表文章，他像魯迅及其合作者在上海時所做的那樣爭辯說，藝術家是為革命提供精神激勵的。王實味是第一個在理論上說明必須把某些活動領域同政治分開的人。官員是“革命力量中的統一者、組織者、促進者和領袖；他的職責主要是改革社會制度”。藝術家則是“‘靈魂的工程師’；他的職責主要是改造人的靈魂（心靈、精神、思想、意識）”。[[9]](#_9_Di_Mo_Xi__Qi_Ke_Suo_Yi_Wang_S)因此，王實味給藝術家提出的任務實際上是黨認為只有在它自己的指引下才能完成的任務。藝術家“應該勇敢地、然而也要恰當地暴露所有污濁和黑暗；并把它們洗滌干凈……暴露和清洗的工作決不僅僅是一個消極的工作；因為黑暗逐漸褪下去，光明就會自然地增長”。[[10]](#_10_Di_Mo_Xi__Qi_Ke____Diao_Luo)王實味認識到，有些人以為，如果作家們“暴露了我們的缺點，那會給敵人以攻擊的口實。這是一種短視的觀點；我們的運動今天已如此壯大，它不怕暴露自己的缺點”。[[11]](#_11_Tong_Shang)

他的第二篇雜文是《野百合花》，分兩期在《解放日報》的3月13日和23日刊出，這是中國共產黨陣營內部迄今所寫最有爭議的作品，而且一直到今天中國還感到它的影響。他也像毛澤東那樣，對黨的官僚主義日益加大同群眾的距離感到關切。在回答那些認為延安沒有等級制存在的人們的說法時，他說，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雖然他說他自己不是一位平均主義者，但他說：“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12]](#_12_Ge_Lei_Ge_Er__Ben_Dun_Suo_Yi)當“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一兩餐稀粥”時，王實味抱怨說：“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13]](#_13_Tong_Shang)

一度反對不平等的造反者現在變成了他們自己不公正制度中的新官僚。他們曾經想摧毀腐敗和冷漠的罪惡，但他們今天正在遭受同樣罪惡的襲擊。南斯拉夫的米洛凡·德熱拉斯在15年之后曾說到黨本身會成長為一個新的階級，王實味不像德熱拉斯這樣，他認為這種發展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產物：“我們底陣營存在于舊的黑暗的舊社會，因此其中也是有暗。”[[14]](#_14_Wang_Shi_Wei____Ye_Bai_He_Hu)他是在向黨的領袖們提醒他們的理想，所以他認為他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點。他也是按照儒家批評領導的傳統行事，以期確保他們統治的勝利。

后來反對知識分子的歷次運動，其方式方法就是從黨對這些雜文作家的批評反應中發展出來的。它標志著開始對獨立的和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的鎮壓和黨對知識分子活動的控制的擴大。到了1942年春天，整風運動從似乎同時批評官僚主義和自由主義轉移到了幾乎完全批評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這些作家被挑出來作為戲劇化的特殊的思想典型，即黨認為對其當前政策是有害的思想典型。這些人的獨立性和批評態度在國民黨地區曾經是有用的，但現時他們生活在黨的統治之下，卻不再是合心意的了。這些作家被用做反面教材，以改造知識分子和干部的思想。這種挑選幾名官員或知識分子為榜樣，使整個社會都俯首聽命的辦法，蘇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在使用。

最粗暴的攻擊是對著王實味的——這不僅因為他的批評最深刻，而且因為他卷入了中央研究院的派系斗爭；他跟和毛澤東關系很密切的理論家們作對。其實，所有運動都有宗派成分，也有意識形態成分。王實味同蘇聯留學生集團結成同伙，反對派的成員則有毛澤東的私人秘書和捉刀人陳伯達、歷史學家范文瀾，以及理論家艾思奇。這次運動使他們有機會除掉了一個固執的和討厭的批評者。

王實味跟陳伯達原來就在許多思想意識問題上意見不一。其中一個是關于民族形式的問題；另一個是從上海遺留下來的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王實味站在魯迅和魯迅的親密助手胡風及馮雪峰一方，跟陳伯達、周揚等人展開過辯論。陳伯達及其一伙，聽從30年代初期黨的文化領袖——瞿秋白和后來的毛澤東——的指導，主張中國的作家應該摒棄西方的文學傳統，創造以傳統文學形式（如短篇故事、詩歌和短小的劇目）為基礎的他們自己的風格，因為它們在提高政治覺悟和鼓舞群眾方面可能有效得多。反之，魯迅一伙則譏笑傳統的文學形式為“封建的”，因而堅持中國文化的國際化是中國發展的前提條件。王實味和陳伯達在1940—1941年又重新展開了這個論戰。本質上，它是西方化的“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同更加民粹派的、更加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之間的一場沖突。

王實味的文章出現不久，他就成了一場意識形態的和宗派主義的運動的焦點。1942年4月，黨宣布將有三個月的思想意識斗爭。在此期間，黨機關內的一切工作實際上都陷于停頓，同志們都在小組內閱讀文件和互相展開批評。在這同時，1942年5月召開了大型文藝界集會，毛澤東在會上兩次發表了他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含蓄地批駁了雜文作家們的批評，為黨的文藝政策和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打下了基礎。他雖然未對這些作家點名，但他攻擊了他們意在獨立于黨的領導作用之外的想法，并且駁斥了他們所提關于藝術必須獨立于政治的要求。藝術家和藝術無論何時都應服從于黨所交派的任務。雖然他提出他的觀點作為獨創的教義，但他關于文藝的觀點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和瞿秋白強調的民族形式的結合。

這些觀點在20世紀30年代是左翼人士所爭論的幾個問題中的內容，這時變成了官方的教義。文藝應該是樂觀主義的和英雄主義的，要用群眾所懂得的風格寫出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文藝的功能將不是像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那樣暴露社會的黑暗面。雖然毛澤東事實上在此前非常推崇魯迅，說他是一位“空前的民族英雄”，[[15]](#_1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_Yi)但他的延安文藝講話卻批駁了魯迅所主張的東西。魯迅曾經倡導西方的文學體裁和思想，但毛澤東卻敦促作家們返回到自己傳統的民間風格中來。魯迅的作品暴露了社會的陰暗面，在其中群眾以及精英都因冷漠、落后和不公正而受到譏諷，毛澤東卻呼吁應該有為黨的目標服務的和歌頌群眾的文藝。作家不再能按照現實的實際情況或按照個人之所見來批評現實；他們應該按照現實可能的情況和黨與毛澤東所見到的情況來描敘現實。

毛澤東發表了第二篇講話之后不過四天，中央研究院就召開了一系列群眾集會。它們從1942年的5月一直開到同年6月11日，一千多名延安的思想理論家和知識分子參加了集會。有些人為王實味辯護；另一些人痛斥他。和陳伯達、范文瀾站在一起的艾思奇是主要的控訴者之一，他斥責王實味的“絕對的平均主義”，[[16]](#_16_Qi_Ke____Diao_Luo_De_Ye_Bai)反對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王實味被認定為托派，不僅因為他過去和陳獨秀等“托派”分子關系密切，也因為他曾經把斯大林的清洗叫做“暴行”。[[17]](#_17_Tong_Shang_Shu__Di_37Ye)最初，大多數人拒不接受把王實味叫做托洛茨基分子和反黨分子，但是，大會小會上接連不斷的壓力削弱了對他的支持。在壓力增大的情況下，王實味在《解放日報》的同事們也對他進行指責了。

在斗爭會的最后日子里，丁玲丑詆自己的工作，并攻擊王實味是一股壞勢力。艾青在6月24日的第二次自我批評中也斥責王實味。思想家胡喬木和歷史學家范文瀾都跟王實味開過長時間的會，有五位黨員經常訪問他，想要他寫一篇公開的檢討，但他不肯干。王實味被送往一個火柴盒廠工作，在那里，一名記者在1944年夏季看到過他，說他已經精神錯亂。[[18]](#_18_Qi_Ke____Diao_Luo_De_Ye_Bai)在紅軍從延安撤退時，他在1947年春天被處死了。

雖然毛澤東在1962年對王實味的被處死表示過惋惜，但處死王實味的決定是公安組織決定的，這個組織在1947年是由毛澤東的親密同事康生負責。王實味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同事們被送往農村勞動改造，他們的職務也被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批判過他們的人所取代：艾思奇接替丁玲編文藝副刊；周揚則給運動做了總結——這是他在未來運動中繼續承擔的任務。[[19]](#_19___Jie_Fang_Ri_Bao_____126__1)他概括了王實味的思想和政治“錯誤”、運動的消極面，也給運動的積極面定下了調子，即提倡寫正面的文學，主張培養以樂觀主義觀點描述黨領導下的農民生活的“農民”作家。

雖然1942年的整風運動尚未達到后來思想改造運動那樣的規模和劇烈程度，但它已有了后來歷次運動的諸因素。受到攻擊的個人的工作要按照文件來分析并受到詳細的批判，這就是運動的實質內容。受害者處于孤立無援之境。那些與受害者劃清界線的人受到比較寬大的處理，而那些在攻擊受害者中表現得最突出的人則官運亨通。群眾斗爭會頗似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那些裝門面的審判，把受害者的任何支持者以及任何其他有同樣思想的人都逐漸弄得啞口無言。

1942年的整風運動標志著開始大力壓迫“五四”運動中的多元論精神和知識分子的自治傾向，而代之以黨指導下的文化和受黨訓練的知識分子。這種努力沒有隨著1942年整風運動的結束而結束。陳云在1943年3月29日的一篇講話中堅持認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應該把自己看做是一名黨員，而不應該首先把自己看做是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們希望通過學習和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所有黨的文藝工作者要加強他們的黨性，去掉他們的壞習慣。”[[20]](#_20_Chen_Yun____Guan_Yu_Dang_De)不僅如此，知識分子還必須聽命于黨的官員，即使那些指導他們的官員的知識少于這些知識分子時也得如此。“在遵守紀律上，文藝工作者必須服從黨的支部及其上級，甚至在各該級的人們不是那樣能干時也得這樣。”[[21]](#_21_Chen_Yun____Guan_Yu_Dang_De)黨在延安的經驗曾被說成是給群眾參政和平等的價值觀打下了基礎，但是，雜文作者們對黨無視這種價值觀的批評和他們后來的受迫害的事實則與這種說法不相符合。相反地，雜文作者在延安所受到的對待，卻為后來堵住持不同政見者的嘴以及全面地確立黨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奠定了基礎。

#### 1948年反對蕭軍的運動

雖然中共同國民黨的斗爭已進入最后階段，它很少有時間過問它同知識分子的關系，但它在1948年忽然發動了一場運動，這使人想起了1942年黨曾經搞過的反對王實味及其同事的運動。非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服務是中國現代化所必需的，可是黨正在討好他們的同時，又企圖把知識分子組織和控制在自己的隊伍之中。在準備結束這場戰爭時，它要設法保證，黨的知識分子有足夠的訓練，能處理社會和政治的控制方面的問題。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黨在左翼知識分子的飛地——特別是在上海、香港和哈爾濱——中還整了一次風。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哈爾濱反對蕭軍的整風，蕭軍是寫滿洲抗日斗爭的著名小說《八月的鄉村》的作者。蕭軍是魯迅的學生和延安的一位雜文作者。他是黨不得不與之斗爭的最不聽話的知識分子之一。甚至在他寫1942年的雜文以前，他就寫了一些信給毛澤東，指出了在延安出現的應予改正的缺點。毛澤東回信表揚他是一位“極坦白豪爽的人”，并且承認他的批評值得重視。但是，毛澤東又勸告他：“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22]](#_22_Zhong_Yin_De_Bei_Jing_Bao_Zh)蕭軍拒絕這樣做。蕭軍是那個雜文集團中除王實味以外唯一未作自我批評的人；他拒不對王實味作批評。丁玲主持了1942年10月召開的一些會，專門批評蕭軍，但是，他仍然拒絕黨要他作自我檢查的要求。

蕭軍被下放勞動改造了幾年之后，于1946年返回他的故里滿洲，幫助黨加強對那個地區的控制。盡管他以前曾持有不同意見，但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本地作家，能夠在贏得人民對黨的支持方面派上用場。黨幫他辦了一個周刊——《文化報》。但是，蕭軍馬上變成了第一個批評延安的人，重新展開了對他所不同意的黨的做法的批評。除了重復“五四”運動的觀點，認為對社會變革來說，知識分子作為人民的思想和覺悟的喉舌與政治活動家應該同樣重要，蕭軍還強烈地提出了一些反對黨的當前政治方面的政策的意見。他指責黨只依靠蘇聯，把它當做主要的盟友。他表達了他的東北老鄉對俄國人的強烈不滿情緒，因為他們一再強占東北土地，搞經濟掠奪，同時繼續賴在中國土地上不走。他在幾期《文化報》上都譴責蘇聯帝國主義：“不管是哪個外國，我們都應當受到平等待遇和受到尊重。如果它是指俄國人，他們應該更加令人尊敬……無原則的友誼是不合理的。”[[23]](#_23_Liu_Zhi_Ming____Xiao_Jun_Si)

蕭軍也是反對20世紀40年代后期土地改革中出現的強暴行為的少數知識分子之一。他在這一點上又一次表達了當地部分人民的潛在的不滿情緒。雖然實際上存在著對土地改革的一致擁護，但在農村中處死地主和暴烈的階級斗爭，曾經引起了某些黨的干部和知識分子的擔憂。他在一份強烈的聲明中說：“土地一再被分割，財富一再被分配，糧食一再被搶走，致使人們變得一貧如洗……為什么共產黨人變得如此不仁慈和無心肝？”他還說：“甚至日本人和滿洲人的政策也不像黨所執行的這些政策那么暴虐。”[[24]](#_24_Yang_Yan_Nan____Zhong_Gong_D)

蕭軍對黨的與蘇聯結盟和土地改革的批評，超出學生和知識分子的范圍而在普通東北公民中引起了反響。他的那些文章在哈爾濱的文化人中間引起了他們對黨的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態的混亂和誤解。因此，隨著1948年1月正在進行的整風運動越來越猛烈，他就成了黨必須從自己的隊伍中清除出去的分裂的、無紀律的勢力的代表，以便控制住局勢。

除了他自己大喊大叫的非組織活動以外，宗派斗爭的原因也在選擇蕭軍作為替罪羊上起了作用。雖然整風運動發自中央委員會，但它的貫徹則由黨的滿洲宣傳官員來完成，其中主要的是劉芝明，他參加過1942年反對蕭軍及其同事的運動，又跟周揚很密切。另外，另一個黨的報紙《生活報》曾經與蕭軍的報紙激烈競爭，它的編輯們從1948年8月至10月接連發表了一系列反蕭軍的文章，并且參加了審查他的工作隊。

哈爾濱的整風方式和延安的整風方式差不多。小組討論和批評與自我批評跟學校、工廠及黨的機關里的大規模集會相結合。哈爾濱的宣傳機關把蕭軍描繪成過多地重視民族的目標和過少地注意階級斗爭的人。由于抗日戰爭已經結束，蕭軍的民族主義不再起積極的作用，而他對階級斗爭的不關心則有消極的影響。蕭軍對蘇聯的指責引起最大的注意，這或許是因為它反映了許多東北人的情緒，使黨感到難以排除。劉芝明爭辯說，蕭軍“不懂得蘇聯不像沙俄，它的目的在于幫助被壓迫民族；它決不會自己變成一個壓迫者”。[[25]](#_25_Liu_Zhi_Ming____Dui_Xiao_Jun)蕭軍懷疑蘇聯對中國的意圖，與此相反，劉芝明在1948—1949年的整風運動中要求和蘇聯無條件地結成聯盟。

對蕭軍施加了各種各樣的壓力，要他作自我批評，以使抱有同樣看法的其他人士不能開口。黨斷絕了對他的報紙的支持，使他不僅沒有維持生活之資，也使他沒有一個對他的指責進行辯駁的園地。這一次又是用他的老同事來反對他。丁玲又一次主持了一個批判他的大型集會。但是，盡管有這些壓力，蕭軍拒絕作一個可以接受的公開批評。他被判處到撫順煤礦做苦役。為了搞臭蕭軍，黨把他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當做政治上的反對意見來看待。延安的運動曾努力限定批評的界限，但反對蕭軍的運動比這走得遠，它把來自知識分子的批評看成了政治顛覆活動。它也超出了左翼知識分子和黨員的范圍，擴大到了人民和各團體中去。這些措施在后來的運動中變成了標準的做法。

## 黨對知識分子的控制的確立，1949—195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50年代大約有10萬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是專家、學者和有創作能力的藝術家，據周恩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有某種程度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26]](#_26___Ren_Min_Ri_Bao_____1956Nia)可是，在建國初期黨卻放松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以爭取贏得他們的忠順。在最初，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是歡迎共產黨的，因為他們討厭國民黨，又因為他們珍視共產黨有統一國家的能力，還因為共產黨有能力在國家經歷了幾十年的混亂之后保證了財政的穩定。

中共以蘇聯為借鑒，給知識分子支付工資，負責解決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每一個專業集團和每一門學科都被組織到黨所控制的協會中來。例如，創作藝術家加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在這個聯合會內部，每一門學科又有它自己的組織，例如中國作家協會或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在各省和各大城市都有分會。它的北京中央機關指派各省分會的負責人和當地文學刊物的編委會成員。其他學科和專業也都仿效這個模式。

由此可見，盡管在建國初期放松了對思想統治的要求，但黨還是迅速地加強了組織上的控制。它在統治的初年就比蘇聯人更迅速而精明地把學術和藝術都組織了起來。蘇聯人因為沒有經驗，在它統治的第一個10年中做得比較和緩。反之，當中國共產黨一掌權，它不僅有斯大林控制俄國知識分子的前例可援；它還有自己在延安和哈爾濱的經驗，又有周揚、陳伯達和胡喬木所領導的訓練有素的干部核心隊伍。他們都是中宣部這個負責正統意識形態最高機關的副部長；部長為陸定一。

黨對知識分子的和解政策為時甚短。1951年，它開始了一個運動，在從生物學研究到藝術創作的所有領域中，要他們摒棄大多數人曾經接受過的西方的理論和學術而轉向蘇聯的理論和學術。它的目的是要洗凈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再給知識分子灌輸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努力的一部分表現為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故事告訴人們，19世紀的一位教育家怎樣從一個乞丐最終變成了地主并且用他的錢創辦了一些學校。黨說武訓是一個消極的象征，因為他是想通過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過革命來改變中國。

與批判武訓運動相呼應的是對文學界發動的由丁玲領導的整風運動；丁玲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權威刊物《文藝報》的主編，她的威望和有力的地位在文學界足以與周揚并駕齊驅。1952年，她當上了一家杰出的小說刊物《人民文學》的主編，而她的親密朋友馮雪峰則接替她做了《文藝報》的編輯。她實際上掌握了中國兩個最有影響的刊物。由于她在批判她以前的同事中的突出作用，她過去的反抗看來被完全寬恕了。

然而丁玲的行為集中體現了建國初期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自相矛盾的特點。她的動機比較復雜，既有政治的機會主義，又有堅決執行黨的命令的真誠的熱情。與此同時，她又想堅持“五四”時期的獨立性和專業標準。在丁玲領導她的作家同仁們的整風運動的時候，她要他們從自己的情感中而不是從別人的強制中尋找創作靈感，她說：“我不反對我們現在的創作工作被組織起來，但是……一個作家不是一個孩子，不能離開母親；他應該獨立。”[[27]](#_27_Ding_Ling____Dao_Qun_Zhong_Z)

50年代初期的這些運動比從前反對王實味和蕭軍的運動要克制一些。它們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預防可能的顛覆活動，而不大在于消除任何公開表示的批評。黨也沒有來得及以從前推動運動的熱情來做意識形態的統一工作。雖然知識分子也屈從于要他們改變他們的西方自由主義立場的努力，但黨還是謹防措施粗暴，以免他們離心離德。除此之外，黨主要關心的是控制藝術和人文學科知識分子的思想，它允許自然科學家多一些回旋余地。因為他們的工作比較深奧難解和理論性多一些，黨的領導承認他們不太在行。它還不傾向于干涉自然科學工作，因為它認為科學技術對黨的經濟現代化運動更具有決定性意義。可是，盡管大多數科學家較晚才感到壓力，而且分量也要輕一些，但他們也必然受到黨的思想改造運動的影響。與此相似的是，在相對松弛的時期，他們也較早地感到松弛和受到更寬厚的待遇，但是，放松也是針對所有學科的，這和思想改造運動一樣。黨不能把自然科學家同其他知識分子集團隔開而另眼相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甘苦與共的，雖然甘苦的程度有所不同。

#### 思想控制相對放松和思想改造運動的再度興起，1953—1954年

1953年初宣布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雖然尚無細節，但它馬上碰到了它過于雄心勃勃的問題。由于黨的經濟計劃者的搖擺不定，它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也發生搖擺。互相沖突的指令發往在知識界工作的干部。他們被告知，在加強黨的組織控制的同時，允許他們可以在發揮知識分子個人才能使之積極參加現代化方面有較多的活動余地。黨給予知識分子少量的自由，希望他們能投桃報李，在工作中多出產品和更有創造性。既然中國正在學蘇聯的榜樣，這種松動可能是由于那時斯大林剛去世不久，蘇聯在學術和藝術方面也有所松動。

像黨在當年延安運動中的規勸口氣那樣，黨的指示一方面鼓勵知識分子批評干部，另一方面則要干部“虛心聽取他們的批評意見，向他們學習”。[[28]](#_28___Ren_Min_Ri_Bao____She_Lun)從前遮遮掩掩的幾種非正統思想，現在獲準可以公開亮相了。例如，有人要求，文學應該打破政治任務的題材和規定的形式的束縛。無獨有偶的是這事也發生在蘇聯文學界，那里的作家也在要求更加充分地表現現實，吸取更廣闊的題材，使用更斑斕多彩的風格。這時在中國和蘇聯也聽到還有人要求在一切學科領域中應用更專門的業務標準。

可是，在1954年下半年，黨的嚴密組織知識分子的措施，使原來籠絡他們的努力黯然失色。它原來又拉又打的互相矛盾的方針收效甚微。更為重要的是，到了1954年下半年，由于黨快要宣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細節，它必須動員全體人民，并保證不許任何事物干擾對經濟計劃的努力。這一次黨又使用思想改造運動來推進它的經濟計劃，并且再一次從文藝領域挑出它的替罪羊。

這次運動是逐漸開始的，相當文靜，它攻擊了受西方教育的學者俞平伯，他曾受胡適的影響，對于18世紀的偉大小說《紅樓夢》寫過重要的注釋性著作。他不像“五四”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而是一直超然于政治沖突之外。這次矛頭指向他的運動旨在動員非黨知識分子為黨的革命性經濟變革作準備。

俞平伯沒有聽黨1953年的命令：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解說這部中國古典著作，因為他在1954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對這部小說提出了他在20年代初期提出的同樣解釋。他認為這部小說不是批判封建制度的，而是作者曹雪芹的一部自傳。黨和俞平伯的沖突不僅是因為他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還因為他拒絕過黨的指示。當俞平伯把他1954年的文章的稿子送給胡喬木審查時，胡喬木提出了某些建議，并讓俞平伯重新改寫。俞平伯不僅沒有改寫，又自作主張地把它送往《新建設》發表，這表明有些雜志還沒有完全受中宣部所控制。雖然運動開始于發表在山東大學刊物上的李希凡和藍翎這兩名青年所寫的不起眼的文章，但當它1954年10月10日在《光明日報》，1954年10月23日又在《人民日報》轉載以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和社論便像雪崩似的多起來了。

雖然運動的一個目標是要利用《紅樓夢》向人們灌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點，但它的最大目標是要把學術上的政治觀點強加給中國知識分子。它標志著重點已開始從知識分子的工作和專業特性轉向政治的正統觀念和非專業化上來了。對俞平伯的批評所要顯示的是，兩名青年批判者所代表的黨訓練的學生們的思想戰斗精神，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其價值比俞平伯所代表的學術和學院的訓練成果要大。這次運動是要加倍努力地弄臭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的西方學術思想。像1951年的運動反對西方學術那樣，后一類學科首當其沖；在1954年中期，自然科學仍然相對地處于特殊地位。胡適的避免先入之見的方法成了運動在這方面的主要靶子。黨宣稱：在胡適看來：“科學研究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興趣，而不是為了祖國的和人民的需要。”[[29]](#_29_Lu_Kan_Ru____Hu_Shi_Fan_Dong)黨想通過對俞平伯和胡適的批判把這種重點顛倒過來。

與后來反對馮雪峰和其他黨的知識分子的運動相比，對俞平伯的著作和對胡適的批判還是有節制的。當馮雪峰于1952年出任《文藝報》編輯的時候，他的影響有明顯的增長。他的編輯工作和他的作品一樣，在相當正統的框框內又表現了某些歧異。在1953年和1954年之初的思想控制放松的時期，他指責中國當前的文學歪曲了現實，而且暗示黨對文化的控制對此是負有責任的。表面上看，黨對馮雪峰的苛酷的批判是因為他當初拒不刊載那兩個青年批評者對俞平伯的批評文章。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它是壓制“五四”精神和要使知識分子聽從黨的嚴格命令的又一次努力。

它也進一步揭示了宗派上的斗爭：周揚和他的同事們企圖把馮雪峰和他的同事們從文化機關的有權勢的位置上拉下來，而代之以他們自己的人。馮雪峰一伙被指控搞“獨立王國”，壓制自由辯論；馮雪峰不愿發表對俞平伯的批評文章一事就可以為證。黨現在所要求的公開批評，就是要用黨關于知識文化的觀點來取代迄今一直占統治地位的傾向西方的觀點。郭沫若作為作家—學者和毛澤東的親密朋友，委婉地說道：“要傾聽少數人的意見，同時也應當允許少數人堅持自己的主張。”[[30]](#_30___Wen_Yi_Bao_____778__22_195)馮雪峰被迫做了公開檢查，他的《文藝報》編輯職務被以周揚為靠山的人所控制的一個編輯部取而代之。丁玲已在1953年離開了她的《人民文學》編輯的職務，而由周揚最親密的追隨者之一邵荃麟接替了她的位置。到了1954年后期，周揚控制了黨的幾個主要刊物，把他的宿敵一個個拉下了馬和使之不能公開講話。

在反對馮雪峰的斗爭會的總結會上，郭沫若宣稱：不僅是文學，“特別是在歷史學、哲學、經濟學、建筑藝術、語言學、教育學乃至于自然科學的各部門，都應當來開展這一思想斗爭”。[[31]](#_31___Wen_Yi_Bao_____778__22_195)因此到了1954年底，黨開展的這個運動從受西方教育的學者關于古典文學的研究開始，通過左派知識分子而擴展到了整個知識界。

#### 1955年對胡風的批判運動

1954年中期開始的思想改造運動，到1955年反對魯迅的學生胡風的運動時達到了高潮。它超出了知識界，而是向全民進行灌輸式的教育，不僅在城市中心搞，也在全國范圍內搞。它像暴風驟雨，顯出的狂亂的激情為以前歷次運動中所罕見。

選擇胡風做靶子，根源在于胡風同黨的文化當局的沖突，特別是始于30年代中期的他同周揚一伙的沖突。這場沖突持續到40年代，當延安的整風運動在1943年波及重慶的左翼知識分子和干部時，胡風及其追隨者在上海被轟炸之后也已來到了重慶。和他的延安搭檔們一樣，他也認為，整風的目標之一是促進真正的辯論和批評黨的官員的教條主義。結果他創辦了《希望》雜志，以便攻擊黨的文化官員的教條主義。后來他受到了批判，他的刊物也受到壓制。

胡風同文化官員的低調沖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年仍在繼續。可是，在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這段比較松動的時期，胡風還進入了《人民文學》編委會，并且當上了中國作協的執行委員。他相信時機已有利于他開展批評，所以他給黨中央上書言事，[[32]](#_32___Hu_Feng_Dui_Wen_Yi_Wen_Ti)表示對文化生活中的荒謬事情感到沮喪；這使人想起了舊時文人給清朝皇帝上奏折。他的目標不是要推翻領導或現存制度，他只是要指出，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文化并沒有按照毛澤東和黨的原則辦事，因為他們的指示被少數文化官員肆意曲解了。像清代的文人那樣，他企圖證明國家的賢明領袖們已被肆無忌憚的官員們所蒙蔽。他批評這些官員，因為他們強迫作家只寫工農兵的生活；寫作之前要先學習馬列主義；只用民族形式寫作；只強調寫“光明事物”而降低寫落后和陰暗面的重要性，胡風認為這意味著寫虛假的東西。

胡風建議，作家們應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改造自己，而不用官員們來對他們進行改造。為了促進多樣化，他建議用編輯自己的刊物的作家的集體所出版的七八種刊物來代替幾種官方刊物。在這種致力于放松黨的控制的努力中，他企圖把“五四”時代對專業和文藝標準的關心和文化多元論的精神重新注入中國的文化。按照胡風的看法，他的報告只要求給予作家更大程度的自由，以期在現體制內發揮他們個人的才能。可是事實上，如果胡風關于藝術創作的獨立性質的看法付諸實施的話，那就會挖掉黨所強制推行的整個控制體系的墻腳。

但是，胡風要求更多的自治這一點本身不能解釋為什么要發動空前的熱情和全國范圍的運動來反對他。他被用做運動中的工具，以推行黨的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使之開花結果。陸定一宣布，有人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現將是風平浪靜，不經過嚴重的斗爭。應該把它看做是階級斗爭的過程。”[[33]](#_33___Ren_Min_Ri_Bao_____1955Nia)胡風成了這場運動矛頭所指的一個象征，目的在逐漸灌輸這種信念：個人的第一和唯一的義務是對國家的義務。

這次由中宣部——特別是胡風的宿敵周揚——掌管的運動是由毛澤東親自指揮的。胡風給他的追隨者所寫的信被查抄，變成了反對他的主要證據。毛澤東給公布出來的胡風寫的那些信件寫了按語。毛澤東在按語中譴責知識分子想插手政治。關于胡風集團他是這樣說的：“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鉆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里。”[[34]](#_34_Mao_Ze_Dong___An_Yu___Zai)雖然胡風集團只是一個文藝家的小圈子，但在1955年6月卻被指責為建立了根據地并吸收群眾來進行反革命活動。任何人的看法如果與當前的正統觀念有分歧，都要被貼上“反革命”的標簽，他不僅要被清洗出教育和文化組織，也要被清洗出工會、群眾組織和軍隊。

黨的強大的宣傳機器的觸角所及，甚至使最邊遠地區最微賤的農民也都知道胡風其人，以便保證任何可能的“胡風主義”——即獨立的思想和行為——都會被清除掉。連受寵的自然科學家最后也被這次運動所波及。但是，他們顯然跟不上步伐。正像一則廣播指出的那樣：“自然科學家對胡風事件抱著一種‘事不干己’的態度。這表明他們的革命的警惕性很低。”[[35]](#_35_Ying_Guo_Guang_Bo_Gong_Si)他們被指責為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也沾染了反革命細菌。

到了1955年夏天，反胡風運動的勢頭有增無已，難于控制，超過了政府原來設想的范圍。它從政府的一種有條理的手段發展成了恐怖統治，特別在知識分子中間是如此。一位觀察者形容它的壓力是如此之大，致使“自殺在文化機關中已屢見不鮮”。[[36]](#_36_Luo_Bo_Te__Ji_Lai_En____Liu)運動的效應是加劇了中國知識分子和黨早在延安整風時期就已開始的疏遠狀態。胡風及其追隨者的具體遭遇成了此后知識分子批評者大膽直言的下場的典型。他們的私人文件被查抄；他們同批判過他們的同行隔絕了起來；他們從工作崗位和協會中被清洗出去；他們的妻兒也受到譴責。胡風被投入監獄；他的學生路翎被送入精神病院；他的其他跟從者被下放勞動改造。胡風在監獄中繼續戰斗——他進行過絕食斗爭；要求舉行記者招待會；要求有法定辯護人參加的審判——直到他神經崩潰為止。他招致這種懲罰，不過是因為他曾要求給作家和知識分子一定程度的自治。

## “百花運動”

#### 第一階段：1956年

由于中共預見到1955年末即將完成農業的集體化和正在重新大力推進工業化，它越來越需要向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求助。1955年12月3日的《光明日報》寫道：“新的環境和新的形勢要求知識分子，特別是有學術地位和專門技術的高級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多的貢獻。”[[37]](#_37___Guang_Ming_Ri_Bao_____1955)可是，由于反胡風的運動過于猛烈，有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就是不聽這一套；不僅作家是這樣，就是一切領域中有思想的人都受到威脅，因而規避工作、發明和研究。面對著一個消極被動的知識界而又迫切需要他們的服務，黨在1956年給予了知識分子以一定程度的學術活動自由，以爭取他們在發展經濟中的合作。黨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有所松動，這也反映了經濟方面一般的松動政策，因為它準許在鄉村有自由市場，并對輕工業給予了更多的注意，但此前是偏重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的。

1956年1月14—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開了一次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建議實行某種改革，以激發他們的熱情。他們將被給予更多的權威；他們的觀點將受到尊重；他們的專業研究將受到重視。此外，他們應該得到更多的貨幣刺激，改善其工作環境，并享受更合理的提升制度。毛澤東在閉幕式上的講話中贊同周恩來的觀點，于是在下一階段就開始同知識分子進行對話。在1956年5月2日的講話中，他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著名口號，以此表示控制的松動。但是，由于他的講話并未公開發表，后來陸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的解說中給這個“雙百”運動定下了調子。他要求像周朝末年的“百家爭鳴”那樣，再有一個文化發展的黃金時代。陸定一對這個黃金時代的描述使人想起了“五四”時期。“如果沒有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沒有自由討論，那么，學術的發展就會停滯。反過來說，有了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有了自由討論，學術就能迅速發展。”[[38]](#_38_Nie_Hua_Ling___552__Di_1Juan)他給了知識分子在藝術、文學和科學上以批評、言論、堅持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據他說，這些領域的活動不能跟政治等同起來。政治舞臺上仍然不允許辯論，但可鼓勵文化領域中的辯論，使知識分子在選擇研究課題和方法論中有更多的活動余地。

一方面，“百花齊放”政策給予了知識分子一定程度的自由，以贏得他們的合作和提高他們的本領，另一方面，也允許他們批評官員，以改進官僚體制和提高它的效率。這又回到了毛澤東在延安關于改革官僚制度的態度，并反映了他對官僚特權的關注。它類似于斯大林去世后蘇聯的解凍，特別是赫魯曉夫1956年2月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做了譴責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之后對教條主義和鎮壓手段所進行的批評。盡管“百花”政策有這種種不同的方面，但對知識分子的放松和對官僚主義的批評是齊頭并進的，因為沒有給言論自由以某些活動余地，要展開批評是不可能的。

由于毛澤東、周恩來和陸定一的鼓勵，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們開始懷疑黨的干部是否有能力指導科學和技術。他們要求不懂業務的干部少加一些干預；少花一些時間于政治集會；少一些蘇聯的學術統治；多接觸一些西方的論著。各種學科開始了重要的辯論：在遺傳學上，辯論李森科主義；在歷史學上，辯論分期問題；在哲學上，辯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用問題。許多受過西方教育的經濟學家懷疑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他們說，古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能夠解釋100年以前發生的事，但不適合當前經濟發展的情況。[[39]](#_39_Chen_Zhen_Han___Xu_Yu_Nan)許多社會科學家則主張控制生育，以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因為后者認為，增加生產就能解決增加人口的問題。

可是，“五四”時期的作家們原來發表意見最直率，現在卻猶豫不前，這大約是害怕黨的政策一旦有變動就會被抓住，因為這種情況曾經使作家比別的知識分子受害更多。除了如艾青等幾個例外人物，特別是一些老資格的著名作家的沉默是很突出的。可是，當作家們真的開始在1956年中期鳴放的時候，他們所講的內容比其他任何知識分子集團都更加直接地針對黨的政治政策。其中最尖銳的是一些年輕的作家，他們在黨的領導下接受了大部分教育，同時受蘇聯知識界騷動的影響也很大。

蘇聯的影響激起了兩種相反的潮流。有些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從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批評蘇聯學術和蘇聯專家在中國居于統治地位，但也有些作家在學那些蘇聯的大膽的解凍作家的樣，直言不諱地批評官僚體制及其教條主義。他們并不直接援引當時像葉甫圖申科和沃茲涅先斯基等蘇聯激進作家的話，而是借用更主要流派的西蒙諾夫、愛倫堡和肖洛霍夫的言論。他們利用蘇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批評來指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著作與中國的現實頗不相似。另外，他們也和他們的延安前輩及蘇聯的同行一樣，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使他們能夠指出，黨已經背離了他們認為體現在他們意識形態之中的人道主義理想。

不論是在中國或是在蘇聯，批評都是在官方刊物上提出的。文藝刊物的編者們在批評官僚主義和揭露黨掩蓋的真正問題方面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在蘇聯，有《新世界》雜志的編輯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他前后發表了杜丁策夫的《不僅是為了面包》和索爾杰尼岑的《伊凡·杰尼索維奇生活中的一天》等作品，在中國也有與此相類似的人物。自延安時代以來即在周揚門下的秦兆陽（《人民文學》的編輯）和老左翼作家—黨員黃秋耘（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文藝刊物《文藝學習》的編輯），也在“百花”時期把他們的刊物改變成了主要的批評力量。和特瓦爾多夫斯基一樣，他們也是謹慎的黨員，并想法在制度的范圍內發表自己的意見。一件作品獲準發表的過程是不清楚的，其中有跟中宣部搞錯綜復雜的談判的程序。盡管如此，在這個相對地放松的時期，個別編輯顯然已被授予更多責任來辦報刊。這兩位編者又約稿，又改稿，又編輯，又出版作品；這些作品影響了“百花”運動的進程。

秦兆陽的《人民文學》發表了一系列以蘇聯原型為依據的故事，描述了一群理想主義的、有才干的青年人，他們懷著共產主義理想與冷漠無情的、無效率的、謹小慎微的官僚分子戰斗，以求促進社會的福利。秦兆陽的文學觀點具體見于他的一篇文章中，這就是《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在這篇文章中他堅決主張作家的獨立作用，而這是大有悖于毛澤東在延安講話中的觀點的。作家不能服務于政治路線的每一轉變，也不能做某些概念的工具。像魯迅和高爾基這些偉大的作家并不解說政策規定，也不機械地履行政治責任。“把一般人習以為常但并不注意也不理解的東西突現在一般人面前，這正是一個作者發揮其獨特的創造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每一個現實主義者所應該追求的一種本領。”[[40]](#_40_He_Zhi__Qin_Zhao_Yang_____Xi)秦兆陽呼吁中國作家向自己文學的過去尋找靈感，他說：“我們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少偉大的現實主義大師啊！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突破了若干陳規走出來的。讓我們學習他們的榜樣吧！”[[41]](#_41_Tong_Shang_Shu__Di_13Ye)

秦兆陽在《人民文學》上介紹了幾個現實主義大師。其中一人是劉賓雁：一位作家和記者，1925年生，1944年的黨員；他的故事特別仿效蘇聯的作家B.Б.奧維奇金——一位蘇聯的紀實性作家；劉曾代表《文藝報》采訪過此人，并曾與他相處過一段時間。他愛慕奧維奇金敢于正視沖突特別是由官僚主義橫行霸道所引起的沖突。他說：“奧維奇金在他的紀實性作品和短篇小說中攻擊官僚政制，是沒有憐憫心的。”[[42]](#_42___Wen_Yi_Bao_____778__1956Ni)因此，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目的：“矛盾，你不去看它，它照樣健在。既然一個矛盾已經出現，它本身就孕育著遲早被克服的可能。”[[43]](#_43_Liu_Bin_Yan____Dao_Shi_Wu_Qi)他的故事描述了官僚的錯誤和共產主義理想之間的沖突。

“百花”時期所寫的這種性質的第一篇故事，是《人民文學》1956年4月號發表的《在橋梁工地上》，還附有秦兆陽的一篇編者按語，它是這樣說的：“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的批評性和諷刺性的特寫已經很久了。”[[44]](#_44_Ku_Bin_He_Wa_Ge_Na____Xian_D)這個故事寫了兩個人的沖突：一方是羅隊長，他更關心自己“不犯錯誤”，而不愿意做正確的事；一方是曾工程師，他學有專長，又有熱情，想把工作翻一番和節約原料。劉賓雁在這個故事中贊揚了蘇聯人的改革意愿，以強烈地對比中國官員不愿意改革的情緒。在回答工人的批評時羅隊長說：“中國有中國的特點。比方說，在蘇聯，可以批評領導，中國就不行……要批評，得局里批準。”[[45]](#_45_Ku_Bin_He_Wa_Ge_Na____Xian_D)

劉賓雁的第二個故事題為《本報內部消息》，載于《人民文學》1956年6月號，并由秦兆陽做了校訂和部分的改寫。它形容現在的新聞就像舊時代的監察官的報道。正像清朝皇帝康熙說監察官就是他的“耳目”那樣，劉賓雁也把作家和記者描述為黨的領導的“耳目”。但是劉賓雁抱怨說，記者所寫的批評文章和投給報紙的申訴都變成了“內部消息”，因為它們批評得過火了，不宜公開刊登。故事的女主人公黃佳英是一位記者和共青團員，她調查和揭露了官僚們的冷淡和無能，想改進他們的工作，但她的努力以受挫告終。雖然她贏得了某些編委會成員的支持，但報紙繼續刊登的只是黨的官僚們所批準了的東西。

22歲的黨員作家王蒙在《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1956年9月號）中描寫了另一個理想主義者同僵化的官僚主義的沖突。秦兆陽也修訂了這個故事，突出了它的反官僚主義的傾向性，縮小了它原來的觀點，即領導上能夠克服官僚主義的說法。王蒙也受了蘇聯文學的影響。事實上，他的主人公林震使人想起伽琳娜·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它的目的就是想模仿它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婭——這位女主人公向官僚主義的惰性和拖拉作風作斗爭，想由此增加產量。

與娜斯塔西婭和劉賓雁的女主人公黃佳英一樣，林震也認為官員應該為實現黨的理想作出榜樣。但是，當他被派去檢查一個工廠發展新黨員的情況時，林震發現了傲慢、懶惰、無能的經理和想要增加生產反而受挫的工人。他試圖采取行動反對經理，動員工人和基層干部向《北京晚報》投書申訴。這位主人公和劉賓雁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種西方觀點，認為報紙是相當獨立的機構，它可以對領導上施加壓力，使之進行改革。可是，雖然中層干部受到懲處，高級干部的職位卻原封未動。和劉賓雁所寫的一些英雄及其蘇聯同行所寫的那些主人公一樣，王蒙的這位主人公也是有教養的、有理想的青年，他致力于實現他的理想和貫徹黨的政策，但是在實際中卻受挫折。這些故事向人們暗示，黨的官員已得到多么大的權力，甚至最有理想的和最勇敢的批評也不能動其毫毛。

這些年輕作家的故事得到了迅速而熱烈的反響。它們也引起了爭辯，特別是在黨的官僚階層內部引起議論；他們認為松動政策是對政治和思想統一的一種威脅。正像《人民日報》1956年10月9日的社論所說的那樣：“有些同志害怕爭論會引起黨內思想不一致。”[[46]](#_46___Bu_Yao_Hai_Pa_Fan_Dui_Yi_J)更重要的是，黨的干部認為，批評是對他們在統治制度中已經據有的地位的一種挑戰。像小說主人公黃佳英和林震那樣的知識分子要求按照他們的能力取得事務上的比較獨立的發言權，這就同黨的干部捍衛他們以政治信任為基礎的地位的決心發生沖突。1956年4月17日的《光明日報》評論說，“百花齊放”政策對知識分子的優遇使得干部們“害怕它這樣作會產生‘特殊階級’”。[[47]](#_47___Ji_Ji_Gai_Jin_Gao_Deng_Yua)

干部們對“百花齊放”政策的抵制，在1957年年初公開地表現了出來，人民解放軍宣傳部副部長陳其通和他的三個同事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反對文藝中“百花齊放”的文章。雖然壓力來自部隊，但批評竟然發表在黨的喉舌上，這個事實表明，它得到了某些頂層領導的支持。這篇文章似乎針對秦兆陽及其周圍的作家。陳其通等人說：“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逐漸少起來了，充滿著不滿和失望的諷刺文章多起來了！”[[48]](#_48_Chen_Qi_Tong_Deng____Wo_Men)

后來，在1957年年初的幾個月中，“百花”運動處于停頓狀態，因為以前完全針對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批評現在轉而針對自由主義和修正主義了。王蒙的故事變成了扭轉松動（先是在文學方面，后來是在一般知識界）的努力的焦點。在《文藝學習》上展開了對這個故事的辯論。

盡管《文藝學習》上的大多數文章都是譴責性的，它們認為這篇故事攻擊領導干部，但也有不少文章熱烈地幫王蒙說話，并且進而批評官僚主義，甚至批評黨的政策。它的編輯黃秋耘發表了幾點最大膽的批評。他在一篇登在《人民文學》上并經過秦兆陽校訂的文章《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中說，現時中國的現實大大不同于他所想象的共產主義社會，他說：“誰也不能否認，今天在我們的土地上，還有災害，還有饑饉，還有失業，還有傳染病在流行，還有官僚主義在肆虐，還有各種各樣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現象。”他號召他的同行作家們都來揭露這種理想與現實的不一致：“不應該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閉上眼睛，保持緘默。如果一個藝術家沒有膽量去揭露隱蔽的社會病癥，沒有膽量去積極地參與解決人民生活中關鍵性的問題，沒有膽量去抨擊一切畸形的、病態的和黑暗的東西，他還算得上是什么藝術家呢？”[[49]](#_49_Huang_Qiu_Yun____Bu_Yao_Zai)

1957年最初的幾個月中，黃秋耘發表了他認為夠得上作家稱號的人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22歲的黨員——短篇小說家劉紹棠。劉紹棠贊揚王蒙的小說，因為它“激勵了那些想要改造我們生活中那種衰退的、不良現象的人們，它刺疼了……那些對生活熟視無睹和善意地粉飾太平的人們”。[[50]](#_50_Liu_Shao_Tang_He_Cong_Wei_Xi)劉紹棠說，黨是不希望有人撒謊的。“那些想粉飾生活或者只想隔靴搔癢地批評生活的人……卻只能自欺欺人。”[[51]](#_51_Tong_Shang_Shu__Di_18Ye)暴露社會的病害，意在醫治它們。又像《文藝學習》的另一文章所說的那樣：“黨員和黨員干部的錯誤、缺點和弱點，作家是不應該回避的。不只是因為它存在，而且因為我們要克服它。”[[52]](#_52_Shao_Yan_Xiang____Qu_Bing_He)盡管有這種反對“百花”運動停頓的抗議，知識分子的聲音還是又一次沉寂了下來。黃秋耘形容當時的文藝界籠罩著一種“可怕的氣氛”。[[53]](#_53_Huang_Qiu_Yun____Ci_Zai_Na_L)

#### 第二階段：1957年4—6月

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混亂在1957年初馬上得到了澄清，因為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據他發表的理論，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的非對抗性矛盾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可以存在。這些矛盾可以用討論、批評、說服和教育等等“民主方法”使之公開化，并得到解決。毛澤東相信，思想灌輸已經使得知識分子達到了足夠的忠誠，所以黨應該信任他們，讓他們進行其目的在于改進黨而不是反對黨的批評。那些黨外人士，特別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民主”黨派，應該請他們來批評黨并提出不同意見，以防止官僚主義的僵化、麻木不仁和脫離群眾。這種種言論恰恰就是這些青年作家在“百花”運動中的第一個階段所曾經做過的事情，毛澤東現在顯然已經認可了他們的批評。

毛澤東在鼓勵討論政治問題方面甚至比當時蘇聯的領袖們走得更遠。他再次號召知識分子發表批評意見，一方面是對某些黨的官員想法限制“百花”運動的范圍作出反應，一方面是對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的群眾事件作出反應，因為毛澤東認為這些事件的起因是匈牙利和波蘭共產黨脫離了群眾和鎮壓了知識分子。毛澤東還做了一次叫知識分子放心的努力，他在1957年3月12日對宣傳部的講話中再一次號召“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54]](#_54_Luo_De_Li_Ke__Mai_Ke_Fa_Kua)黨的官僚階層仍然不樂意全身心地贊同這場廣泛開展的運動，其證據可見之于這樣一件事實：1957年2月和3月的兩次講話中的思想沒有馬上在黨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上發表。

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的反應緩慢就毫不奇怪了。中國民主同盟的一位領袖和交通部長章伯鈞說：“知識分子仍然在摸索著他們的道路，并且推測政策是真誠的呢還是一種姿態，它是目的呢還是一種手段。”[[55]](#_55___Xu_Duo_Zi_Ran_Ke_Xue_Jia_X)但是，當全國范圍的整頓黨的干部作風的運動在5月初從地方到最上級都在普遍展開的時候（見第二章），當自延安以來即作為毛澤東政策的熱誠的執行者周揚給予“百花”運動充分保證的時候，批評日益加強，日益普遍。非黨知識分子，包括章伯鈞和森林工業部部長羅隆基發泄了埋藏了六年的牢騷。對于黨的具體做法的批評馬上變成了對于黨本身的批評。有些人主張，不僅是干部的官僚主義方法，而且也是黨本身的特權地位造成了領導人和被領導者之間的矛盾。有人要求，應該允許民主黨派獨立于中國共產黨。

知識分子的報紙《光明日報》的主編儲安平派記者到各大城市去組織討論會，讓非黨知識分子發表意見。儲安平在《光明日報》上給這些討論會以充分的報道，使這張報紙成了要求政治自由和文化改革的強大力量。儲安平指責黨在“搞家天下”：[[56]](#_56___Bo_Fan_Chang_De__Dang_Tian)它成了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戰斗口號，因此他們譴責黨政不分，并宣稱黨和各“民主”黨派的聯合政府是冒牌貨。他們要求制度改革，以便決定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使其他黨派有發言權。有人援引西方的先例，也有人援引傳統的先例。羅隆基此前曾要求讓學者在政府中發揮作用，就像舊時代的文人那樣，他說：“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學者們是有一些領導藝術的知識的。”[[57]](#_57_Luo_Long_Ji____Geng_Jin_Mi_D)他曾經敦勸過國民黨讓知識分子參政，同樣，他現在呼吁黨也應該傾聽知識分子的意見。

許多在歷史和社會科學中工作的知識分子以及在自然科學中工作的知識分子，甚至懷疑毛澤東思想是否跟學術有任何關系。一位歷史學家在談到毛澤東時，說他“沒有這么多時間（決定我們的問題）……學術問題應該由學術界總結……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也應當如此”。[[58]](#_58___Gao_Ji_Zhi_Shi_Fen_Zi_Zuo)為王蒙辯護的劉紹棠認為，毛澤東的兩次《延安文藝講話》不再適應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了。他承認，在游擊戰爭時期有必要使文藝大眾化和政治化，但是，自那以后人民的生活起了劇烈的變化：“只根據政策條文創作的作品，由于缺乏高度的藝術魅力，已經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他堅持說，這些作品事實上是效果全無。“再沿用過去的領導方式和理論思想來督促和指導作家的創作，勢必只能起到‘促退’而不是‘促進’的作用了。”[[59]](#_59_Liu_Shao_Tang____Wo_Dui_Dang)

到了1957年5月中旬，知識分子在報刊和座談會上發表的批評言論被北京大學學生所采用。他們貼大字報批評官員和學術工作的政治化。他們的大字報貼在眾所周知的民主墻上，他們集會的地方稱為民主廣場。北京大學的學生走向其他校園，鼓動那里的學生。知識分子的報紙《光明日報》和上海的《文匯報》報道了這些事件，從而鼓勵了你追我趕的局面。大學生主辦的形形色色非官方的報刊和小冊子表明，“五四”時期所介紹的西方思想的影響尚未消失。雖然大多數人不過要求從黨對專業工作的干預下得到稍大一些的獨立性，但也有人要求實行能保障他們的言論和批評自由的法律制度。有幾個人走得很遠，他們譴責黨對權力的壟斷，要求解散黨。

學生活動分子把自己看成是“五四”運動傳統的繼承者。他們也受了蘇聯非斯大林化、南斯拉夫改革以及裴多菲（以19世紀匈牙利偉大詩人命名）俱樂部的影響——后者是匈牙利事件參與者中一個論戰性的青年俱樂部組織。除此之外，他們也相信自己是在執行毛澤東的命令，要同官僚主義做斗爭，以改進黨和社會主義。但是，起最直接影響的是“百花”運動第一階段中所發表的文章，特別是劉賓雁和王蒙所發表的故事。它們敦促人們對整個制度作批判性的思考，并且突出了有主見的青年對現狀懷疑和挑戰的模范作用。

最敢于發言的學生領袖之一是人民大學的林希翎，她把自己看成是劉賓雁的小說《本報內部消息》中的女主人公黃佳英——這是一個支持工人反對當局的女英雄人物。胡風是轟動一時的案件。林希翎和她的同伴們爭辯說，胡風并不像黨所聲稱的那樣試圖推翻政府，但是他已經預知“百花”運動的到來。清華大學的一張墻報號召學生為胡風事件伸張正義，就像法國自由主義者為德雷福斯案件戰斗那樣。林希翎及其同伴要求按照法律手續對胡風進行公開審訊，同時她在學生集會上宣稱，歷史將證明胡風是時代的英雄之一。因此，盡管黨堅持反對胡風的運動，他的榜樣還是激勵了一些青年學生。

“百花”運動表明，盡管進行了可以上溯到40年代初期的多年的思想灌輸，黨和非黨知識分子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人仍然沒有放棄他們在幾十年前所接受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甚至更為重要的是，在該政權下成長起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不管是通過蘇聯的渠道或者是通過他們前輩的著作，他們仍然繼續了“五四”時期的傳統。

## “反右運動”

“百花”運動的發展勢不可擋，大大出乎黨的預料之外。黨曾經提出和確定了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表達自己意見的框框，至少在最初時期是如此。但是，盡管黨限制了范圍和規定了批評的條件，它也不能充分控制所引起的反響。對官僚主義的批評超過了對個別官員的批評，而變成了對制度本身的批評。它釋放了比黨所預計的更多的被壓抑的不滿和牢騷。批評的不斷擴展、獨立小集團的組合以及特別是學生們反對中共當局的示威游行，使黨決定停止運動，因而在6月8日發起了對它的參加者的反擊，把這些人稱做“右派”。政策的這種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也由于連續的經濟困難所致，共產黨政權把這些困難主要歸因于知識分子批評的有害影響，他們的批評削弱了謀求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熱情。黨想把不滿情緒從對政府移向對知識分子。

在1957年年中，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加緊了它們的控制，但是唯獨中國的鐘擺擺動得最厲害，這表明領導上把“百花”運動中的抗議看得很嚴重。這種反應之所以更大一些，也可能是因為毛澤東原來以為知識分子受夠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看到對黨那么多的批評之后，他大失所望。“反右運動”標志著毛澤東放棄了把知識分子作為經濟發展關鍵因素的想法，他越來越關注作為下一代領袖的青年學生的革命覺悟還不夠高的情況。

由于“百花”運動的批評突破了黨所設置的限制，“反右運動”是仿照以前歷次思想改造運動的形式進行的，但是，它搞得遠為徹底，受到批判的人數也更多。橫掃的矛頭直指那些最敢說話的人。幾個重要的靶子，即某些小集團的代表人物，被挑出來作為教唆者。他們的批評被說成是政治顛覆活動，在他們最后坦白交代以前，受到了毫不留情的譴責。首先，黨指出民主黨派的領袖章伯鈞和羅隆基以及《光明日報》主編儲安平為所謂的反黨陰謀集團的領袖。和在從前的運動中一樣，他們的民主黨派同事們起來批判他們。盡管在反胡風的運動中有些知識分子能保持沉默，但在“反右運動”中，實際上所有知識分子都被迫參加了。有些人的參加是為了自救，或者是為了當官向上爬；有些人的參加則是因為別無選擇。民主黨派再一次回到了自己被動角色的本來面目。

除了像林希翎這樣一些學生活動分子以外，作家劉紹棠被挑出來作為最危險的青年右派分子。王蒙的處理則比較寬大一些，至少在書面上是如此。事實上，王蒙很少被提到，可能是因為毛澤東在2月27日的講話中曾嘲笑了對他的故事發動的攻擊。為了重新加緊一度在“百花”運動中放松了的對報刊的控制，《人民文學》的編輯秦兆陽和要求刊物獨立的《本報內部消息》的作者劉賓雁，成了主要的靶子。最初，這兩人堅持說，他們只是為了執行黨的政策。劉賓雁說他的批評者——文化界的領導人們——像“‘變色龍’，因為他們春天可以讓青年反官僚主義，秋天又可以說青年反官僚是偏激情緒”。[[60]](#_60_Zhong_Guo_Qing_Nian_Xin_Wen)

雖然大多數參加“百花”運動的最直率的發言人都受到了攻擊，但他們不是“反右運動”的主要焦點。老左翼作家，特別是丁玲和馮雪峰，再一次受到了最大的注意。他們被挑出來，極大可能是因為他們同周揚有宿怨。盡管在游行示威中和大字報上都批評了周揚，但他在反右斗爭中的表現，卻像一位名副其實的文化沙皇，并且終于清除了他的宿敵。除了宗派原因以外，也有證據表明丁玲仍然在年輕作家中擁有很大影響，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把她視為導師。周揚在“反右運動”中的主要發言人邵荃麟描述過丁玲的作用：“被丁玲和她的一伙影響的許多青年都被引入了錯誤的道路。他們拒絕黨的領導和監督，反對黨小組的權力。”[[61]](#_61_Shao_Quan_Lin____Dou_Zheng_B)所有在延安跟丁玲在一起的人——艾青、蕭軍、羅烽——都重新受到攻擊。他們在延安時代的雜文被重新印發，再一次遭到批判，特別是遭到據認為受到丁玲及其同伙哄騙的那些青年的批判。

周揚的另一個敵手馮雪峰在“百花”運動中很少說話，但也被指責要跟青年記者合辦一個雜志，以發表不同的意見。其實，他和幾位同事計劃在“百花”運動中辦一個獨立的雜志并不是奇怪的事，他和丁玲之所以成為攻擊的焦點乃是因為他們是著名的老黨員。他們被認為比非黨員的和年輕的知識分子具有更大的威脅性。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解釋說：“黨內有了右派分子，他們的黨齡越長，地位越高，對我們黨的危害就越大。”[[62]](#_62___Yan_Su_Di_Dui_Dai_Dang_Nei)他們可以利用他們的權威來曲解黨的命令，制造公眾輿論。丁玲及其伙伴之所以比“百花”運動中說過更多話的人更受注意，是因為他們的地位和威望可能轉移對黨的忠誠。

和在以往的運動中一樣，那些一再大聲地批判受害者的人能夠升官，有時就由他們填補了受害者的職位。由于一大批知識分子曾經鳴放并被清洗，“反右運動”給一些人的晉升提供了很多機會。這種升遷的一個典型而又奇特的例子就是后來成為“四人幫”成員的年輕的文藝批評家姚文元。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同周揚周圍的官僚階層結成聯盟，在1955年反胡風和在1957年春季贊成自由化的運動中，跟隨他們的路線鸚鵡學舌了一陣。他在反右斗爭中批判老左翼作家時嶄露頭角，其中有幾個人是他的父親姚蓬子（作家）30年代在上海的朋友。在50年代末期，他已在上海的官僚宣傳機器中當上了一名重要的官員。

到了1958年，在加緊控制知識分子方面，“反右運動”已經遠遠超出了反胡風運動波及的全部范圍。由于它與當時正在進行的“大躍進”結合在一起，于是表現出一種大張旗鼓的反知識分子的姿態。和以前歷次運動相比，這一次運動是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把政治信任優先地放在專業能力的考慮之上。與“百花”運動的優先次序正好相反，群眾和集體的智慧與創造力受到贊揚；知識分子和個人的知識與威信則被貶抑。一方面，農民和工人有能力完成偉大的事業，因為他們是用無產階級的態度對待一切問題的；而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注定要失敗，因為他們浸染了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價值觀。甚至自然科學家也被貶斥，因為他們“重業務，輕政治，追求個人名利和個人興趣”。[[63]](#_63___Ren_Min_Ri_Bao____She_Lun)作家被認為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的批判的觀點削弱了對黨的信任。周揚宣稱，從此以后，文學只能贊揚，不能批評。“我們不要陰暗的負擔，而是要文學給人以鼓舞。”[[64]](#_64_Zhai_Zi_Zhou_Yang_Zai_Zhong)

“反右運動”比從前的歷次運動清洗了更多的人。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分子失去職位，并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幾個知識分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那些被劃定了的人都要被同事們和家屬們譴責，并被迫作出自我批評。運動的主要斗爭靶子，例如丁玲，境遇最慘。他們被開除出黨；失去了他們專業協會會員的資格；被趕出了圖書館和大學的工作崗位。由于知識分子要進行勞動改造，黨的干部接替了他們的文化教育工作崗位，使黨比從前更加穩固地控制了知識界。雖然“百花”運動曾經想彌縫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裂隙，但“反右運動”卻更加擴大了這道鴻溝。

一般地說，人民看來是全身心地贊同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關于知識分子的自治和持不同政見的思想，在知識界以外是很少得到理解和支持的。指責知識分子不忠于黨和傷害了黨，這種說法打動了大多數人民，因為他們仍然投身于黨和毛澤東改造中國的事業。知識分子從整個人民中被孤立了起來，而國家因為有權力用就業問題、開展運動和勞動改造來進行恫嚇，所以能很輕易地壓制這些知識分子可能取得的任何支持。

[[1]](#_1_4)《魯迅全集》[482]，第6卷，第437—438頁。

[[2]](#_2_4)羅伯特·利夫頓：《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454]。這本書描述了黨用以改造知識分子的心理方法。

[[3]](#_3_4)《解放日報》[126]，1941年10月23日，第4版。

[[4]](#_4_4)羅烽：《還是雜文的時代》[475]，載《解放日報》[126]，1942年3月12日，第4版。

[[5]](#_5_4)《還是雜文的時代》。

[[6]](#_6_4)丁玲：《三八節有感》[716]，載《解放日報》[126]，1942年3月9日，第4版。

[[7]](#_7_4)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3]，載《解放日報》[126]，1942年3月11日，第4版。

[[8]](#_8_4)同上。

[[9]](#_9_4)蒂莫西·奇克所譯王實味未發表文章中的《政治家和藝術家》，載《凋落的野百合花》[99]，第61頁。

[[10]](#_10_4)蒂莫西·奇克：《凋落的野百合花》[99]，第65頁。

[[11]](#_11_4)同上。

[[12]](#_12_4)格雷戈爾·本頓所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載《延安的文學反對派》[38]，見《新左派評論》，92（1975年），第101頁。

[[13]](#_13_4)同上。

[[14]](#_14_4)王實味：《野百合花》[767]，載《解放日報》[126]，1942年3月13日，第4版。

[[15]](#_15_4)《毛澤東選集》（英文版）[502]，第2卷，第372頁。

[[16]](#_16_4)奇克：《凋落的野百合花》[99]，第36頁。

[[17]](#_17_4)同上書，第37頁。

[[18]](#_18_4)奇克：《凋落的野百合花》[99]，第47頁。

[[19]](#_19_4)《解放日報》[126]，1942年6月28日，第4版。

[[20]](#_20_4)陳云：《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中間兩種傾向的問題》，新華社，1982年5月22日，見《外國廣播新聞處》[250]，1982年5月24日，K8。

[[21]](#_21_4)陳云：《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中間兩種傾向的問題》，見《外國廣播新聞處》[250]，K10。

[[22]](#_22_4)重印的北京報紙所載毛澤東的書信，譯文載《外國廣播新聞處》[250]，1982年5月24日，K2。

[[23]](#_23_4)劉芝明：《蕭軍思想批判》[465]，第39頁。

[[24]](#_24_4)楊燕南：《中共對胡風的斗爭》[830]，第179頁。

[[25]](#_25_4)劉芝明：《對蕭軍和〈文化報>的錯誤的批判》[466]，載聶華苓《百花文學》[552]，第2卷，第303頁。

[[26]](#_26_4)《人民日報》，1956年1月30日，第1版。

[[27]](#_27_4)丁玲：《到群眾中去落戶》[715]，第102頁。

[[28]](#_28_4)《人民日報》社論，1954年3月25日。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77（1951年3月4—5日），第20頁。

[[29]](#_29_4)陸侃如：《胡適反動思想》[484]，載《文藝報》[778]，21（1954年），第4頁。

[[30]](#_30_4)《文藝報》[778]，22（1954年），第46頁。

[[31]](#_31_4)《文藝報》[778]，22（1954年），第46頁。

[[32]](#_32_4)《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333]，載《文藝報》[778]增刊，1955年1月。

[[33]](#_33_4)《人民日報》，1955年7月27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350（1955年8月26日），第14頁。

[[34]](#_34_4)毛澤東：“按語”，載《當代背景材料》[735]，897（1969年12月10日），第32頁。

[[35]](#_35_4)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摘要》[63]，5.472（1955年），第13頁。

[[36]](#_36_4)羅伯特·吉萊恩：《六億中國人》[283]，第176頁。

[[37]](#_37_4)《光明日報》，1955年12月3日，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1190（1955年12月16日），第5頁。

[[38]](#_38_4)聶華苓：[552]，第1卷，第20頁。周恩來1月14日的講話的譯文見《1955—1959年的共產黨中國》[186]，第128—144頁；毛澤東在1月20日的講話的譯文見《中國的法律與政府》[136]，11（4），第71—81頁。毛澤東關于“百花齊放”的講話迄未發表。

[[39]](#_39_4)陳振漢、徐毓楠、羅志如、谷春帆、巫寶三、寧嘉風：《我們對于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107]，《經濟研究》[140]，附件，5（1957年），第123—133頁。

[[40]](#_40_4)何直（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301]，載《人民文學》[365]，9（1956年），第2、8頁。

[[41]](#_41_4)同上書，第13頁。

[[42]](#_42_4)《文藝報》[778]，1956年4月，譯文見魯道夫·瓦格納《詐騙和偵察：社會主義政治文化中文學的職能觀念》[750]，載沃爾夫岡·庫賓和魯道夫·瓦格納編的《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學評論文集》[399]，第352頁。

[[43]](#_43_4)劉賓雁：《道是無情卻有情》，載《文藝學習》[777]，3（1957年），見聶華苓[552]，第2卷，第540頁。

[[44]](#_44_4)庫賓和瓦格納：《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學評論文集》[399]，第357頁。

[[45]](#_45_4)庫賓和瓦格納：《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學評論文集》[399]，第348頁。《人民文學》[365]，4（1956年）。

[[46]](#_46_4)《不要害怕反對意見》，《人民日報》社論，1956年10月9日，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1397（1956年10月25日），第5頁。

[[47]](#_47_4)《積極改進高等院校教師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光明日報》社論，1956年4月17日，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1279（1956年5月28日），第3—4頁。

[[48]](#_48_4)陳其通等：《我們對當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人民日報》，1957年1月7日，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1507（1957年4月9日），第18—19頁。

[[49]](#_49_4)黃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335]，載《人民文學》[365]，1956年第9期，第58頁。

[[50]](#_50_4)劉紹棠和從維熙：《寫真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生命核心》[471]，載《文藝學習》[777]，1957年第1期，第17頁。

[[51]](#_51_4)同上書，第18頁。

[[52]](#_52_4)邵燕祥：《去病和苦口》[654]，載《文藝學習》[777]，1957年第1期，第20頁。

[[53]](#_53_4)黃秋耘：《刺在哪里？》[336]，載《文藝學習》[777]，1957年第6期，第8頁。

[[54]](#_54_4)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第188頁。

[[55]](#_55_4)《許多自然科學家想到讓百花齊放的路線應該進一步貫徹》，新華社：《每日新聞發布》[550]，1957年4月21日，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1529（1957年5月14日），第12頁。

[[56]](#_56_4)《駁反常的“黨天下”思想》，《新建設》，1958年1月第1期，載《中國大陸雜志選粹》[736]，第123、3頁。

[[57]](#_57_4)羅隆基：《更緊密地結合非黨知識分子和黨的關系》，《人民日報》，1957年3月23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444（1957年4月3日），第17頁。

[[58]](#_58_4)《高級知識分子座談馬列主義理論學習》，載《學習》[328]，1957年第11期，第6頁。

[[59]](#_59_4)劉紹棠：《我對當前文藝問題的一些淺見》，載《文藝學習》[777]，1957年第5期，見聶華苓[552]，第二卷，第65頁。

[[60]](#_60_4)中國青年新聞：《劉賓雁是資產階級右派在黨內的代言人》，《人民日報》，1957年7月20日，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1583（1957年8月2日），第16頁。

[[61]](#_61_4)邵荃麟：《斗爭必須更深入》[653]，載《文藝報》[778]，25（1957年），第5頁。

[[62]](#_62_4)《嚴肅地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人民日報》，1957年9月11日，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1616（1957年9月24日），第3頁。

[[63]](#_63_4)《人民日報》社論，1958年3月23日。

[[64]](#_64_4)摘自周揚在中國作家協會上的講話；《文藝報》[778]，1957年9月29日，載聶華苓[552]，第1卷，第256頁。

## 第六章 外交關系：從朝鮮戰爭到萬隆路線

## 總的考察

1949年10月1日，曾經支持中國革命的廣泛的統一戰線變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政權的基礎。這個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處理緊迫的、被外國侵略和內戰弄得破碎不堪的中國經濟的重建工作。中國正向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上邁進。

這個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馬上得到了蘇聯以及它的東歐衛星國家和某些亞洲國家——包括印度在內——的承認。英國在1950年初也照此辦理。新中國成功地登上了世界舞臺。

中國最高的外交政策是發展它同其社會主義的蘇聯“老大哥”的友好關系。早在1949年12月，毛主席親自率代表團去莫斯科，以實現他在那年夏天提出的“一邊倒”的政策。1950年2月，中國和蘇聯簽訂了友好同盟和互助的條約以及許多經濟協定。中國開始了一項以蘇聯模式為藍本的經濟發展計劃，有蘇聯的幫助，并且在中蘇友好的旗幟下進行。

可是，中國人從蘇聯方面得到的不如他們希望的那么多。現在知道，他們同克里姆林宮領導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談判，斯大林對待他們很冷淡。在這一方面，一度成為神話的莫斯科和北京的磐石一般的團結的確必須重新加以考察。總而言之，當中國人以追隨蘇聯模式為基本國策的時候，他們同俄國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從一開始就存在了。

不僅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剛一成立，馬上就面對1950年6月朝鮮戰爭的爆發，認為不得不在10月份派遣“志愿軍”去朝鮮，以阻止美國所領導的聯合國部隊的前進。中國就這樣又回到了戰爭狀態，新政府發動了舉國一致的“抗美援朝”運動。被朝鮮戰爭火上加油的中美對抗成了后來亞洲冷戰的樣本。結果，中國和蘇聯的潛在摩擦反而被雙方壓了下去。

革命的中國宣布了一項劉少奇勾畫出來的政策，即用革命力量支持和鼓勵亞洲其他地方的武裝的民族解放斗爭，包括日本共產黨、南亞和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在內。這跟當時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全球戰略的步調是一致的。中國也積極參加了莫斯科所支持的世界和平運動和世界工會聯合會組織。但是，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很年輕而且全力貫注于朝鮮戰爭，中國共產黨人還不敢冒險在外交上采取重大的行動，其活動僅限于作出比較單純的革命外交姿態。

在朝鮮7月停戰之后的1953年后期，北京終于開始了全面的經濟發展計劃。依靠蘇聯援助并以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于1955年7月正式通過，但實際上在1953年即已著手進行。中國正在向工業化邁進。另外，1953年后期進行了“選舉”，選出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1954年9月它的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它的序言規定了目的在于對中國進行長期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

這個緩慢而穩步地發展經濟和進行社會改造的基本政策，也反映在北京的外交態度方面。的確，它在這個時期所強調的和平共處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特點，由此產生了一些不同形式的新方針。1954年6月，北京在中印聯合公報中同意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10月份，即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五周年之際，包括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在內的蘇聯領導人同意消除斯大林在中蘇關系上所留下的不平等狀態。中國同尼赫魯的印度和納賽爾的埃及一起，成了亞洲和非洲新興獨立國家的領袖。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是中國新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他開始在國際舞臺上大露頭角。

1954年7月簽訂的印度支那停戰協定和1955年4月亞非國家萬隆會議的勝利召開，都有周恩來參加，都大大得力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赫然標題下的中國外交活動，是兩次值得注意的發展。在這種國際關系緩和的氣氛下，美、中兩國的大使級正式會談于1955年8月在日內瓦開始。周恩來外長1956年6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會上關于外交政策的發言以合情合理著稱，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號召“和平”解放臺灣。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因此可以稱之為和平共處的萬隆路線。中國的威望和影響穩步提高，而且有一時候，中國似乎正以世界新興獨立國家的斗士的面目出現。盡管1955年采取了更“左”的國內政策，知識分子在反胡風運動中重新受到壓力，同時毛澤東本人又發動了急劇加快的農業集體化，但對外關系的姿態仍沒有任何大的變動。

隨著1956年之初農業集體化已經勝利在望，中國的國內情況更加放松，也形成了更適宜于繼續推行萬隆路線的背景。正在這個時候，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秘密報告中批評了斯大林。打破斯大林神話的結果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發生了叛亂，這件事給了中國領導人以很大的沖擊。他們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性文件，其中包括《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以及毛澤東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中國人在這些文件中講出了自己關于應該怎樣克服斯大林主義弊病的意見。

除此之外，非斯大林化運動在東歐（在波蘭以及在匈牙利）引起了麻煩，其結果是蘇聯的威望大大降低，而中國的威望卻相應地提高了。1957年1月，周恩來特別去了東歐一趟做和事佬，盡力支持蘇聯在那里的領導地位。

其后，中國的國內政策又發生了一次劇變。作為防止中國出現匈牙利之類緊張事件的計劃的一部分，毛澤東緊接他的關于矛盾問題的講話開始了黨的整頓工作作風的運動，并且號召知識分子提出批評，知識分子在1957年5—6月間照辦了。但是，反應之強烈和尖銳大大地出乎意外，所以黨在6月8日馬上予以還擊，開展了“反右運動”，旨在清除“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在政治進程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轉折點。由于“反右運動”在1957年后期迅速地展開，北京急劇地改變了原來溫和的國內外政策的方向。1957年11月，毛主席為了慶祝布爾什維克革命40周年的節日，第二次訪問蘇聯。在這個時候，他提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論點，因為蘇聯在8月份成功地試驗了洲際彈道導彈，在10月份又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他主張共產主義集團應該采取更有戰斗性的外交政策姿態，甚至不惜冒戰爭風險。毛澤東沒有能夠打動他的蘇聯同事們，但是，中國自己卻逐漸拋棄了和平共處的萬隆路線。1958年夏季臺灣海峽的危機和一年以后中印之間的邊境沖突，都是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新姿態的表現。

## 一邊倒：毛澤東和斯大林

就毛澤東同斯大林之間和中國共產黨同蘇聯共產黨之間的長期而微妙的關系而論，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45年12月，毛澤東就已指示他的同志們要建立東北的穩固的根據地。[[1]](#_1_Mao_Ze_Dong____Jian_Li_Gong_G)當然，他沒有選擇的自由；這是中國共產黨唯一能夠希望發展為主要新根據地的地方。但是可以想象得到，由于雅爾塔協定的結果他遭受了斯大林第一次真正的攻擊，毛澤東也許會想到，中國應該警惕蘇聯可能使東北脫離中國的行動，同時他正在決定要不要跟美國打交道。1949年3月5日當他預計在內戰中將戰勝國民黨人的時候，毛澤東暗示對美國要有個和解的政策。在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他談到了可以允許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文化機構在大城市中存在，至少在全國勝利以前應該是這樣。[[2]](#_2_Mao_Ze_Dong____Zai_Zhong_Guo)蘇聯在4月份后期開始贊揚中國共產黨人即將取得的勝利。但是在6月15日，毛澤東甚至更明確地對美國表現了和解的態度，他說，如果任何外國政府同蔣介石脫離關系并停止對他的援助，新的共產黨政權便準備同它建立外交關系。他還說：“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3]](#_3_Mao_Ze_Dong____Zai_Xin_Zheng)

這些話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各新政權的老生常談，但毛澤東的論調事實上是異常重要的。根據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事情已過去將近1/4世紀以后的1973年1月21日公布的一份報告，1949年5—6月間，中國共產黨曾通過原燕京大學的學生黃華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有所接觸。[[4]](#_4_Mei_Guo_Can_Yi_Yuan_Wai_Jiao)黃華（未來的外交部長）那時是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局長，他應毛澤東的要求去見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因對于中國有廣泛的知識和他隨和的性格而普遍受到中國人的尊敬，他跟黃華的私人師生關系被中國共產黨用來探討未來同美國談判的可能性，包括華盛頓的外交承認的談判在內。[[5]](#_5_Guan_Yu_Si_Tu___Huang_Hua_Zai)

但是，就在那一年的7月1日這一天，司徒大使在南京收到國務卿艾奇遜的一封電報，要他拒絕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談判，而《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著名論文，這篇文章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寫的。毛澤東在這篇講話中提出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標志著從他原來的暗示來了個急轉彎，排除了在中國實行鐵托主義的可能性。

毛澤東寫道：“‘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6]](#_6_Mao_Ze_Dong____Lun_Ren_Min_Mi)

如果如上所述，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中國政策和黨與黨的關系表示不滿，那么，為什么他又要讓最初通過黃華—司徒的渠道所開通的同美國的討論流產了呢？時機排除了他對艾奇遜的訓令作出反應的想法。更可能的是，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近在眼前，毛澤東一定感到，這個新國家在大量的經濟重建和發展中急需蘇聯的援助。可是，除了這個總的考慮之外，也可能有若干特殊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在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冷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要與美國進行和解，這是要冒風險的。從前的盟國互相激烈對抗，其結果一方面是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共產黨政變和在柏林搞封鎖，一方面美國又支持希臘政府反對共產黨暴亂和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蘇聯強而中國弱。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反應可能感到不安，特別是看到他過去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時更是如此。這種焦慮之情可能在中國人決定一邊倒向蘇聯的時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毛澤東很可能認為采取親蘇政策以鞏固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是可取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可能擔心他領導下的中國的領土完整。按照雅爾塔協定和1945年國民黨政府同蘇聯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政府恢復了過去沙皇政府在滿洲的權利——中蘇共同享有和使用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現在稱為中國長春鐵路）、大連的國際化和蘇聯使用旅順港作為海軍基地。如果中國共產黨觸怒了斯大林，中國的這個地區可能仍然要處在蘇聯的統治之下。這種擔心在1949年7月又得到證實：那時，斯大林顯然沒有就商于北京的領導，徑邀東北共產黨政府的主席高崗去莫斯科訪問，并同斯大林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7]](#_7_Guan_Yu_Gao_Gang_Shi_Jian_Gen)毛澤東對斯大林和高崗日益增長的親密關系感到不安，這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作出“一邊倒”的決定。據認為，他希望他公開向蘇聯表示忠誠會得到斯大林的善意回報。

除此之外，在這個初期階段，毛澤東也幾乎肯定地沒有擺脫傳統的觀點，即蘇聯及其共產黨代表了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基礎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和領導力量。無論如何，毛澤東對1949年8月5日華盛頓公布的《中國白皮書》的批判，加強了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強烈的反美親蘇路線。[[8]](#_8_Mao_Ze_Dong_Xie_De_Na_Wu_Pian)

對1949年的《人民日報》作一番檢查即可看出，那一年的上半年很少報道蘇聯。但在毛澤東7月1日的親蘇聲明發表以后，關于蘇聯的報道就大大增加了。很顯然，中國共產黨政策的重大轉變正是在這個聲明的前后發生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0月1日成立以后，隨著慶祝12月9日斯大林的70歲生日，《人民日報》對他的頌揚達到了高潮。這也不能看做是形式上的，因為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在這個月晚些時候親率代表團去了莫斯科。他可能希望他會受到斯大林的熱烈接待，因為現在中國共產黨已證明自己在中國革命中取得了勝利。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莫斯科車站一下車就發表了一篇演說，要人們注意這樣的事實：“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后，蘇維埃政府根據列寧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廢除了帝俄時代對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他還說，他非常希望斯大林大元帥有公正的外交政策。[[9]](#_9___Ren_Min_Ri_Bao_____1949Nian)這是毛澤東生平第一次到國外旅行。表面上，斯大林熱誠地歡迎了他，在他到達莫斯科的當天就安排了接見。但實際上毛澤東感到，這位蘇聯領袖比他接待國民黨的外交部長宋子文時還要冷淡，后者在四年半以前也曾來莫斯科談判過友好條約。[[10]](#_10_Guan_Yu_Zhe_Yi_Dian__Jian_Zh)

回顧起來，談判過程出現麻煩的一個跡象是毛澤東回答塔斯社記者問他在蘇聯將逗留多久時所說的話，他說：“我打算住幾個星期。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于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在這次接見塔斯社記者時，毛澤東第一次談到了正在進行的中蘇談判，他說：應當解決的問題有，“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貴我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以及其他問題。”[[11]](#_11___Mao_Zhu_Xi_Da_Ta_Si_She_Ji)毛澤東的這番話在當時本來應該受到更加仔細的注意，因為這樣就可窺測到莫斯科會談的內幕情況。

幾年以后，毛澤東回憶他的莫斯科談判時透露，斯大林“不愿意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才最后簽了”。[[12]](#_12_Mao_Ze_Dong____Zai_Ba_Jie_Sh)當代觀察家中廣泛流傳的意見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標志著中國和蘇聯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兄弟般的友誼，很明顯，這只說對了一部分。

按照當時中國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伍修權后來的說明，斯大林懷疑毛澤東是剛露頭的鐵托主義；而在毛澤東的伙伴中有象征國內統一戰線的非共產黨中國人的出現，激起了對中國會采取親西方政策的擔心。只是在毛澤東到達莫斯科后不久，才有關于友好條約的會談。這時，毛澤東認為得召喚周恩來總理、伍修權和其他官員來進行具體的談判工作。他們于1月20日到達。

俄國人起草了這個條約的草稿；雖然中國人沒有或不能改動任何原則，但他們做了大量的字斟句酌的工作。周恩來命令他的班子“一項一項地、一句一句地、一字一字地加以研究、推敲和修改”。據伍修權說，這位中國總理兼外長“要弄清楚，草稿中確實沒有任何疑點，以免給我們留下后患”。其中有一條原來寫成：“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國之侵襲，締約另一方即給予援助。”為了加強語氣，周恩來堅持在末尾加上這樣幾個字：“盡其全力”。[[13]](#_13_Guan_Yu_Wu_Xiu_Quan_De_Xu_Sh)

毛澤東親自參加了2月14日由周恩來和維辛斯基兩位外長簽字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字儀式，在這之后他才動身回國，于3月4日抵達北京。這位中國領導人愿意離開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達兩個半月以上之久，于此可見他認為他的使命非常重要。

這個條約基本上是一個軍事條約，目的在于顯示中國和蘇聯的磐石般的團結，以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第1條是這樣寫的：

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于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14]](#_14_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

這個條約被西方當做中國和蘇聯以日本及其庇護者美國為假想敵的證據。這個條約因此成了日本和西方盟國之間1951年簽訂舊金山和約以及不久以后簽訂美—日安全條約的理論上的借口。

莫斯科談判的一個結果是，中國成功地使蘇聯在它們之間的某些爭端上獲得了讓步，與國民黨政府同蘇聯1945年的條約相比，現在處境要好得多了。俄國人同意在1952年底以前無償地把中國長春鐵路移交給中國，在簽訂對日和約以后和最遲不超過1952年底從旅順口撤退蘇聯軍隊并將其設施無償地移交給中國（附文說，在戰爭時期設備由兩國共同使用），將蘇聯經濟機構在北京所獲得的財產無償地移交給中國。

另一方面，毛澤東和在他之前的蔣介石一樣，也不得不承認一度成為中國清王朝領土的“外”蒙古的獨立；還要設立中蘇聯合股份公司以開采新疆的石油和有色金屬。這些公司也效法俄國人強加給東歐的衛星國資源的開采那樣，使之大大有利于蘇聯的那些公司。斯大林的這個程式后來受到赫魯曉夫的嚴厲批評，他說：

順便說說，斯大林跟中國簽訂了一個在新疆聯合開發礦產資源的條約。這個條約是斯大林犯下的錯誤。我甚至可以說，這是對中國人民的冒犯。幾百年來，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都紛紛掠奪中國，而現在斯大林也參加進去了。這種開發掠奪是一件壞事，但不是沒有先例的；斯大林在波蘭、德國、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也都搞過同樣的“聯合”公司。后來我們把這些公司統統取消了。[[15]](#_15_Si_Te_Luo_Bei__Ta_Er_Bo_Te_B)

因此，1949—1950年的中蘇最高級會談可能只給了毛澤東部分的滿足。當他親自接觸到斯大林的態度后，人們可以想象他有什么感覺，因為他已經把他的對外政策建立在向蘇聯一邊倒的基礎上，同時也大力贊揚過斯大林。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已經向黨的干部們披露過，他不喜歡中蘇最高級會談。他在一個各省市黨委書記的會上告訴人們：“我們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見，我們要簽中蘇條約，他不簽；要中長路，他不給；但老虎口里的肉還是能拿出來的。”[[16]](#_16_Mao_Ze_Dong____Sheng_Shi_Wei)1958年3月，他在成都會議上說：

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于訂立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還有兩塊“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不準第三國的人住在那里，現在取消了。[[17]](#_17_Mao_Ze_Dong____Zai_Cheng_Du)

很顯然，毛澤東從莫斯科最高級會議回來時是很不高興的，而且他特別對在新疆成立聯合股份公司感到生氣。早在赫魯曉夫回憶錄被私帶出國以前很久，蘇聯領導人就切實地批評過這種斯大林體制，例如米高揚1956年2月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就是這樣講的。[[18]](#_18___Mi_Gao_Yang_De_Jiang_Hua)

另外，毛澤東雖然在莫斯科盡力地爭取蘇聯的援助，但答應給中國人的總數只是在五年內貸給3億美元的有息貸款。這甚至比一年以前波蘭得自蘇聯的4.5億美元貸款還要少。更糟糕的是，1950年2月28日宣布盧布貶值，這又進一步使貸款貶值了1/4，同時俄國人還要堅持不公正的盧布—人民幣比價，因而又損害了中國人的貿易利益。[[19]](#_19_Jian_Zhao_Gang_He_Ma_Feng_Hu)

中蘇條約簽訂一個月以后，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華盛頓評論了這一事件的意義。他從心底里惋惜北京最后采取的親蘇步驟；他也談到盧布貶值問題：“因此，中國人民會發現，蘇俄的貸款每年不過為4500萬美元。他們可以把這數字跟美國國會在1948年一年就投票決定給中國4億美元的贈款——而非貸款——作一比較。”[[20]](#_20___Su_Lian_He_Gong_Chan_Dang)正如艾奇遜預料的那樣，中國人確實認識到了這一點。

曾在國民黨政府時期主持過云南省政務而后來做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龍云，利用1957年“百花運動”鳴放的機會大膽地發言說：“蘇聯給我們的這筆貸款要在10年以內歸還。它是短期的，還要付利息。為了減輕我們的負擔，我建議把歸還期限延至20年到30年。這是我們為爭取社會主義所應該做的事。”[[21]](#_21___Long_Yun_Dai_Biao_De_Fa_Ya)那時龍云被迫做了自我批評，但是俄國人后來認為，他的情緒在中國領導人中是很普遍的。“在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中共領導人們對我們表示了不信任和懷疑。他們不屑去想一想蘇聯自己也有克服戰爭創傷的艱難任務，反而還抱怨他們從蘇聯只得到3億美元的貸款。”[[22]](#_22_O_B_Bo_Li_Suo_Fu_He_B_T_Ke_L)但是即使從名義上說，五年之間的3億美元貸款也只合每年6000萬美元，從大規模地贊揚中蘇友誼的宣傳來看，這只是區區一筆小款而已。由此可見，中蘇關系從一開始就不是甜美的。

## 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是一場有國際背景的內戰，它反映了現代朝鮮人民悲苦的歷史。一方面，它固化了這個國家的分裂狀態；另一方面，它支配了戰后亞洲的國際環境。由于這個緣故，它可以被看成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事件。[[23]](#_23_Guan_Yu_Zhao_Xian_Zhan_Zheng)

1950年1月當斯大林和毛澤東不偷快的談判在莫斯科進行的時候，華盛頓在《中國白皮書》的基礎上，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亞洲的重要政策觀點。杜魯門1月5日的聲明明確表示，美國無意保護臺灣島上中國國民黨人的殘余力量。國務卿艾奇遜1月12日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時指出：美國的亞洲防御弧形地帶是從阿留申群島起，通過日本和沖繩群島到菲律賓，因此不把朝鮮共和國和臺灣包括在重要的戰略地帶以內。

現在已經知道，這些方針是作為重新考慮美國亞洲政策工作的一部分而提出來的。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是考慮到了“三大損失”的：一為1949年8月喪失了核壟斷；一為1949年10月丟掉了中國；一為1950年2月中蘇條約簽訂后丟掉了中國的鐵托主義的前景。但是，1950年4月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件所提出的改變了的方針遠沒有準備付諸實施。至于朝鮮半島方面，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這些文件認為不需要由美國自己來進行軍事干涉。[[24]](#_24_Guo_Jia_An_Quan_Wei_Yuan_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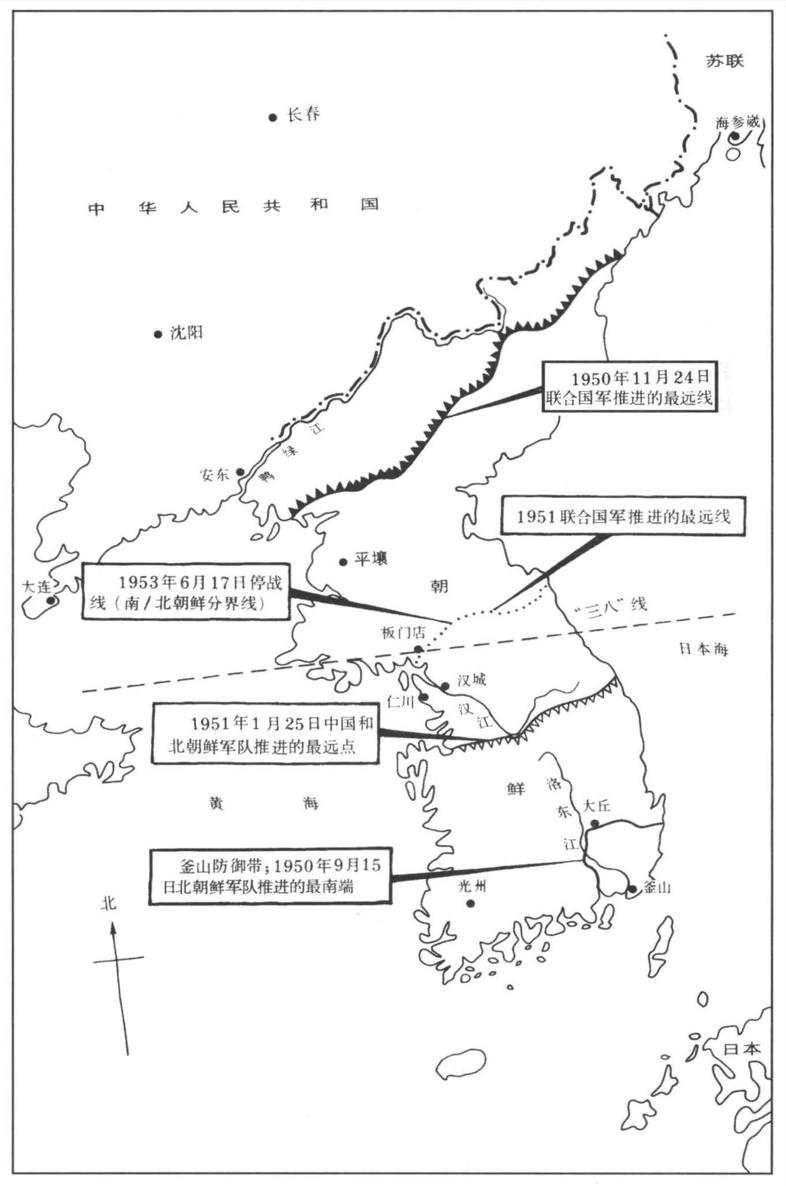
那么，華盛頓在朝鮮戰爭以前具體的對朝鮮政策和總的對亞洲政策的哲學基礎是什么呢？自從1949年夏季發表《中國白皮書》以來，美國就想鼓勵中國的“鐵托主義”，甚至正在考慮承認中國大陸上的新政權。結果是，華盛頓在執行它的亞洲政策中一般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觸怒北京。朝鮮戰爭的發生使一切都變了樣。

不管毛澤東和他的高級同事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預見到戰爭的準備和爆發時間問題，但是，1950年6月25日凌晨爆發沖突的時候，他們顯然沒有預見到這是他們要直接關心的問題。第一，應該注意的是，被認為是中國革命主要支柱之一的土地改革法在1950年6月30日公布，僅在朝鮮戰爭開始后的第五天。鑒于中國共產黨人為土地改革做了長期而積極的準備，而且他們又把這個問題看得極端重要，人們可以想象，他們會認為朝鮮半島的戰爭只是一個插曲，它會很快地被得勝的金日成結束。第二，1950年初，中國的領導者們正傾向于減縮軍費，以支持他們的經濟復興計劃。事實上，毛澤東在6月初就曾下令軍隊部分地復員。[[25]](#_25_Ai_Lun__S_Hui_Ting____Zhong)

這一證據使得西方的評論家們最終認為：毛澤東不可能有意讓他的國家卷入戰爭；[[26]](#_26_Shi_La_Mu____Mao_Ze_Dong)“沒有證據表明它是中國煽動起來的”；[[27]](#_27_Yue_Han__Ji_Ting_Si____Da_Gu)另外，也“沒有清楚的證據表明中國人參與了朝鮮戰爭的策劃和準備”。[[28]](#_28_Hui_Ting____Zhong_Guo_Kua_Gu)另一位學者卻認為，戰爭原定8月開始，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收復臺灣以后，但是，金日成搶先跑出了起跑線。[[29]](#_29_Luo_Bo_Te__Xi_Meng_Si____Jin)當然，這位北朝鮮領袖馬上暴露了他的極端好戰性。戰爭爆發的當日他就在廣播中宣布，他發動了一場決定性的“反攻”，以掃蕩敵人的武裝部隊。[[30]](#_30___Jin_Ri_Cheng_Zai_Zhao_Xian)《真理報》也不失時機地在6月26日替金日成的聲明講好話，它強調指出，是南朝鮮人發動了第一次攻擊，北朝鮮軍隊是受命還擊。

可是，北京直接關心的不是朝鮮半島的斗爭，而是杜魯門總統6月27日的決定：派美國第七艦隊插入臺灣海峽，作為美國對遠東爆發新沖突的部分反應。在中國報紙向讀者解釋為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介入朝鮮戰爭的同時，周恩來則斥責這是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31]](#_31_Xi_Meng_Si____Jin_Zhang_De_L)

在以后的幾個星期，中國的宣傳媒介繼續顯示出，對臺灣的關心大于對朝鮮的關心。當北朝鮮對閃電式勝利的希望破滅而局勢開始轉向有利于聯合國和南朝鮮部隊的時候，中國領導人似乎緩慢地，也很勉強地與金日成政權共命運了。8月20日，周恩來電告聯合國，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任何關于朝鮮問題的討論；幾天以后，中國的一家雜志第一次明確地把北朝鮮的安全同中國的安全聯系了起來。但是在聯合國，西方代表們否決了蘇聯和印度關于邀請中國外交官員的努力，同時，蘇聯想開始談判以擺脫日益不容樂觀的軍事形勢的努力也失敗了。



地圖5 朝鮮戰爭

9月15日聯合國開始了勝利的反擊，以兩棲部隊在北朝鮮戰線的后方仁川登陸，同時從半島東南端的釜山防線中突圍出來。當聯合國部隊向北推進的時候，斯大林悲觀地通知北京，金日成可能要在中國土地上成立流亡政府。但是，中國人幾乎從戰爭一開始就在集結軍隊，為介人戰爭做準備，所以他們警告聯合國，如果北朝鮮領土被侵占，他們不能坐視。決定性的時刻出現在10月1日中國國慶節那天，南朝鮮部隊跨越了“三八”線邊界。就在那一天，毛澤東發了一道秘密指令，內容是中國軍隊可能參戰，將使用“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名義，用這個辦法想把戰爭限制在朝鮮半島內。[[32]](#_32_Hui_Ting____Zhong_Guo_Kua_Gu)

三天以后，中國第二號將領彭德懷被緊急召喚進北京。他在北京發現他的最上層領導中的同事們已經在討論北朝鮮撤退的意義，從彭德懷的敘述來看，似乎是毛澤東否決了多數人反對參戰的主張，毛澤東所持的理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義務援助北朝鮮。[[33]](#_33___Peng_De_Huai_Zi_Shu_____57)毛澤東的觀點后來在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聯合宣言中發表了，這項宣言聲稱：

歷史的事實早已告訴我們，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關聯的。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止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關聯著，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救鄰即是自救，保衛祖國必須支援朝鮮人民。[[34]](#_34___Zhong_Guo_Ge_Min_Zhu_Dang)

彭德懷站在毛澤東一邊，對美國出現在東北（從朝鮮進犯）和出現在上海及華東（從臺灣進犯）的威脅表示關切。

這一章不是充分敘述朝鮮戰爭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國人民志愿軍的給人深刻印象的表現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一個應予重視的軍事強國，所以值得簡單地描述一下它是怎樣取得這個榮譽的。根據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官方戰史的說法，其情況是這樣的：

雖然中國紅軍是一支農民軍隊，如果用它自己的戰術和戰略的標準來看，它也是一支第一流的軍隊。它的軍力不足可能歸咎于缺乏某些武器和裝備，但它的半游擊戰術是以機動性為基礎的，因此它不能有重武器和交通運輸的負擔。身穿厚棉制服的中國苦力在做一件事情時能夠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士兵做得更好；他能夠用難以相信的秘密行動潛入到敵人陣地的周圍。只有有這種經驗的美國人才能體會到半夜被偷襲時的震恐心情，因為偷襲者像從地底下鉆出來的妖魔鬼怪那樣用手榴彈和沖鋒槍的子彈射擊我們。

記者們總喜歡談到“亞洲游牧群眾的人海戰術”。再沒有比這更不真實的了。實際上，中國人很少以團以上的單位進行出擊。甚至這些行動也通常縮小到似乎是無休止的排的滲透。中國紅軍之成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們人多，而是依靠詭計和突襲。

據他們的戰斗對手的觀察，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主要缺點是原始的后勤系統，它使戰斗中的彈藥很快供應不上；再就是原始的交通運輸系統，這使得戰術不夠靈活，常常引起災難性的后果：“一營人一旦投人攻擊，只要彈藥能維持，就得堅持下去，即令事情表明他們攻打敵方戰線最強大的部位碰得頭破血流時也是如此。在許多這類事例中，其結果就成了戰術上的自殺。”

彭德懷在1950年10月后期至1951年7月停戰談判開始時打了五次“戰役”，他在他的回憶錄中簡單地敘述了這五次“戰役”的每一次時間及其重要性。頭兩次戰役打得異常順手，聯合國部隊被迫退回南、北朝鮮交界的“三八”線。但是，到了1951年1月的第三次戰役末尾的時候，中國人民志愿軍缺乏空軍和高射炮，而且它的供應問題也開始暴露出來。中國的兵力已經減少了大約一半。到了1951年2月，彭德懷感到不得不飛往北京向毛澤東解釋軍事上已顯然危殆的處境。

到了1951年年中第五次戰役末期，中國軍隊已筋疲力盡，蒙受了開戰以來最重大的損失。西方評論家們后來議論說，如果那時一直保持著軍事壓力，中國人可能會被迫同意早日休戰。我們可以再一次引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官方戰史，據說：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撤退是“被擊敗的軍隊的逃跑，有時潰不成軍……從前很少有單個士兵自愿投降的情況，現在則成排、成連，甚至成營的殘余士兵在放下武器后投降了。這在從前是沒有的事，恐怕在朝鮮以后也不會再見得到。敵人是逃跑了”。

但是，聯合國部隊放松了壓力，在1951年7月同意開始停戰談判，因而彭德懷的部隊能夠以營為單位挖掘地洞，并定期出擊。在以后的兩年中美國人傷亡了6萬人，停戰協定才得以簽字。[[35]](#_35___Peng_De_Huai_Zi_Shu_____57)

朝鮮戰爭使中國和美國都蒙受重大損失，流了很多血，損失了很多財產。當然，“抗美援朝運動”在國內掀起了愛國主義熱潮，并且幫助鞏固了新政權，但是，這只能視為偶然的“副產品”。干涉行動的消極影響大大超過了這種實惠。中國在國際上陷于孤立，又被聯合國打上“侵略者”的印記，從此它被排除于聯合國之外達20年之久。它也由于美國第七艦隊的插手而無限期地延緩了它解放臺灣的目標。東北仍然是中國人的，未受侵犯，但那簡直不是什么純收入。

按照這些考慮，中國人曾經批評蘇聯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就無須奇怪了。龍云早在1957年就公開地說過，中國單獨擔負打美國和援助朝鮮的費用，是不合理的。由于那時中國和蘇聯還是盟國，龍云不得不作自我批評，但是，看來很可能他替有這種普遍情緒的中國高級人士出了氣。重要的是，龍云很快又在1958年12月復任國防委員會委員，此時中蘇關系已經惡化。1963年，中蘇裂痕公開化以后，中國人公開了他們關于蘇聯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的觀點：“我們總是寧愿自己承擔必要的犧牲重擔，站在守衛社會主義陣營的最前線，而使蘇聯處于第二線。”[[36]](#_36___Zai_Zhan_Zheng_Yu_He_Ping)第二年，中國人在《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信》中寫道：“至于蘇聯對中國的貸款，必須指出，其中最大部分，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戰爭之中……我們每年都在為蘇聯的這些貸款償本付息，它占去我們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份額。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37]](#_37___Zhong_Gong_Zhong_Yang_Gei)龍云被證明是正確的。

后來，還有另外一些同樣的聲明，其中著名的是中日友協的一位官員1972年1月對日本工會代表團的一次講話，他說：“蘇聯是一個死亡販子。當中國派出志愿軍和在朝鮮戰場上流血的時候，蘇聯人躲在幕后，只販賣軍火。他們連本帶利地索還債務。”[[38]](#_38___Mei_Ri_Xin_Wen_____501__19)自此以后，據中國人透露，1950年以后中國人向俄國人借了13.4億美元，其中半數債務是因朝鮮戰爭而借的。另外，俄國人出售給他們的許多武器是過了時的。中國人的整個戰爭費用達100億美元。[[39]](#_39_Jian_Yao_Xu_De_Wen_Zhang__83)

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這種苦味不是事后才嘗到的。檢查一下同時代的官方報告，人們會注意到，中國領導人在1950年建軍節（8月1日）一味地說蘇聯的好話，但是在1951年建軍節就不再歌頌蘇聯人了——這是在中國人介入朝鮮戰爭以后。[[40]](#_40_Zai_1950Nian_De_Jian_Jun_Jie)從這一事實人們很容易想象，在中國正在作戰的時候，它是怎樣看待蘇聯的。斯大林把北朝鮮置于有被消滅危險的境地，把中國也置于沖突的最前線。

斯大林不可能預見到繼美國的介入而來的便是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行動。但是，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斯大林“懷疑我們在贏得革命勝利以后，中國會像南斯拉夫，而我會是第二個鐵托”。[[41]](#_41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_S)這位蘇聯領袖縱容金日成可能就是想避免這種危險，他用的辦法是在遠東制造緊張局勢，使中美兩國幾乎必然相撞。不管是出于偶然或蓄意如此，結果是莫斯科得利。蘇聯有一份關于中蘇關系的研究就是這樣說的：“朝鮮戰爭……長時期地切斷了中國共產黨中的民族主義領袖們和美國統治集團走向勾結的道路，并且迫使中國的領導人擴大同蘇聯的合作。”[[42]](#_42_Bo_Li_Suo_Fu_He_Ke_Luo_Si_Ke)

人們還注意到，在1950年1月和1月以后，蘇聯拒絕出席聯合國安理會以要求驅逐國民黨中國人的代表團和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它回到聯合國以前派代表團出席。這時，有些觀察家已經懷疑，莫斯科實際上是想繼續排除北京的席位。[[43]](#_43_Ma_Ke_Si__Bei_Luo_Fu____Su_L)現在我們既然知道中蘇關系之間有某種不愉快，就不難想象，蘇聯直到8月份以前，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后最危險的時期，一直拒絕出席安理會，其目的是要利用美國重新介入遠東，使華盛頓和北京打得不可開交。不管斯大林內心里的目的是什么，不容置疑的是，對中國來說代價高昂的朝鮮戰爭，是說明北京后來滿腹牢騷地批評莫斯科的重要的原因。[[44]](#_44_Dui_Yu_Su_Lian_Na_Shi_Di_Zhi)

#### 中國在朝鮮戰爭期間及其以后的外交關系

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努力，自然有助于加強它在斯大林眼中的地位。1952年8—9月，周恩來率領的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了莫斯科，在與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們談判中顯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這是繼1950年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最高級談判之后的第二輪會談。他同斯大林、外交部長維辛斯基等人進行了約一個月的商談之后，發表了一項公報，還有一項《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公告》。與此同時，還簽署了《關于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期限的換文》。

就中國長春鐵路來說，1950年的協定原已規定，中、蘇共同管理該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路的全部財產，在1952年底以前無償地移交給中國政府。1952年12月31日，移交鐵路的最后議定書在哈爾濱簽字，之后又舉行了一定的儀式正式辦了移交。次日，即1953年元旦，毛澤東打電報向斯大林致謝。

至于旅順口海軍基地的共同使用問題，也就是蘇聯在那里駐軍的問題，雙方在1950年已經同意，在締結對日和約以后，或者不遲于1952年年底，蘇方應撤退軍隊和移交設施。1952年4月以后舊金山和約生效，但是在周恩來訪蘇期間，中蘇雙方的談判者都同意，它是敵視中蘇兩國的一紙片面和約，所以他們在旅順口問題上決定推遲行動，直到中蘇同日本另簽一和約時為止。應北京方面的“請求”，蘇軍仍應留駐旅順。

這便是1952年中蘇會談的僅有結果。《人民日報》就解決久懸的鐵路問題發表了一篇題為《歡呼中國長春鐵路移交我國！》的社論，它對蘇聯顯示的“兄弟般的、無私的援助”表示滿意。但是，由于歸還鐵路是在1950年協定早已決定了的，這話的意思很明顯，盡管周恩來代表團在莫斯科滯留很久，它還是沒有從蘇聯人那里得到任何新的讓步，不論在經濟援助方面，還是在蘇聯支持朝鮮停戰方面，都是這樣。

中國人時不時地暗示他們有意于停戰。但是，斯大林那時正在組織他的最后一次清洗政敵的行動，忙于國內事務，因此可以推測，他認為讓中、美兩國在朝鮮陷入困境的時間再長一些是有利的。因此，他對朝鮮停戰并不熱心。

由此可見，如果北京和莫斯科對朝鮮停戰問題意見相左，這就足以說明為什么在周恩來訪問莫斯科期間或在最后發表中蘇公報時，談判者在任何講話中都無一字涉及正在進行的朝鮮戰爭。下列事實也可以印證這種看法：1952年10月5日開始的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一直漠視朝鮮戰爭；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致賀詞時也絕口未提朝鮮戰爭。中國人愿意接受的是，1952年10月的上、中旬由北京主持召開亞洲太平洋和平會議。

#### 斯大林以后的中蘇關系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之死肯定會開始中蘇關系的一個新階段，盡管北京官方不得不表示吊唁，但它可能由于這個原因而對此事件感到慶幸。的確，朝鮮戰爭問題有很快的進展。原來朝鮮停戰談判很困難，現在北京采取的外交主動行動馬上加快了它的進程。3月后期，在周恩來建議自由遣返戰俘的基礎上，達成了關于交換戰俘的談判的協議。4月11日，簽署了交換傷病戰俘的協議；4月26日，朝鮮停戰會議恢復了它的正常會議；6月8日簽署了遣返戰俘的協議；最后，在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最后簽訂，從而結束了在朝鮮半島的沖突。由此可見，朝鮮戰爭的結束主要是斯大林死后通過中國的外交努力所致，這時莫斯科正因嚴重的接班人斗爭而處于癱瘓狀態。

朝鮮停戰以后，中國又找到了新的機會來增加自己的國際威望。像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周恩來—尼赫魯1954年6月的會晤；中國在其中起了積極作用的同年4—7月在日內瓦召開的關于朝鮮和印度支那的會議——這些都大大地有助于提高它的威望。就是在1954年6月5日的日內瓦會議期間，美—中開始了大使級的第一次會談。但是，國務卿杜勒斯拒不與周恩來握手，他只保證保持最低限度的禮儀。

朝鮮戰爭以后的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所以對中國很有利。在國內，1954年9月它召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通過了國家的憲法，這表明了新政權的穩定。在1954年10月1日國慶五周年慶祝會上，北京主人招待了第一個訪問中國的最高級蘇聯代表團。它由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率領；還有第一副總理布爾加寧和副總理米高揚。這導致了中蘇關系的普遍改善。蘇聯代表團簽署了10項文件，包括宣言、公報、協定和議定書等。它們同意，駐旅順口的蘇聯軍隊不必等到中國和蘇聯簽訂對日和約就應撤出。后來米高揚和赫魯曉夫也承認是蘇聯“剝削”中國例證的新疆的中蘇聯合股份公司，這時也宣告結束。

因此對中國人來說，1954年的中蘇會談是碩果累累的，他們可能第一次感到蘇聯的“兄弟般的友誼”是個現實。不像斯大林那樣從不訪問中國（他也確實從未訪問過任何他的盟國），赫魯曉夫開始了訪問北京以進行會談的外交做法。從前，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大多數條約和協定都是在莫斯科簽署和宣布的。現在，它們也開始在北京簽署和宣布了。[[45]](#_45_Jing_Guo_Fu_Cha__Cong_1950Ni)給人的印象是，中國人在他們和蘇聯人的關系中最后終于取得了“平等地位”。

這是怎么得來的呢？其中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沒有了斯大林，蘇聯別無選擇，它必須給予中國以尊重，這是中國已經提高的國際威望和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所要求得到的。第二，蘇聯內部的派系斗爭也必然起了作用。引人注目的是，去北京訪問的蘇聯代表團中沒有外交部長莫洛托夫。

總之，赫魯曉夫在五周年國慶節上的冗長的演講中，大肆贊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它的領袖們，高度評價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所作所為，從參加朝鮮戰爭說起，也說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宣布，因此稱中國現在是一個重要的強國。微妙的分歧仍然在兩國之間存在著，并且后來變成了它們關系惡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在1954年它們的關系確有顯著的改善，中國人因此為他們的工業化計劃取得了主要的援助。[[46]](#_46_Su_Lian_Zai_1950_1957Nian_Zh)

## 萬隆方針

1954—1955年采取的溫和而緩慢的，但卻是穩步的國內發展計劃也反映在那時中國的對外政策中。和平共處成了著名的口號。

1954年4月，中國和印度簽署了關于西藏的協定（其中規定印度放棄從英國人繼承下來的治外法權）：印度商人的特殊地位；印度在西藏土地上派駐分遣小部隊；一個印度擁有的電話電報網。協定的前言里包含了關于國際行為的五項準則。在周恩來—尼赫魯6月份的會晤中這幾點被重新肯定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后來又變成了中國政府外交聲明的主要內容。1954年7月印度支那停戰協定在日內瓦會議上簽字，部分地是由于北京對河內施加了壓力，才使協定的順利完成成為可能。周恩來開完會回國的時候，他因人們普遍贊揚中國在其第一次重大國際會議上的表現而受到了鼓舞，于是滿懷信心地宣布：“日內瓦會議的成就證明，國際爭端是可以用和平協商的方法求得解決的。”[[47]](#_47_Jian_Zhou_En_Lai_Zai_Guo_Wu)

1955年4月舉行的亞非會議的成功也多少得力于周恩來所強調的和平共處的方針。這次會議于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亞的避暑城鎮萬隆召開，有29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參加，它實際上是當時亞洲和非洲全部獨立國家的共同組織。周恩來特別強調了中國的和平共處政策，或叫做“萬隆精神”，他說：“我們亞非國家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獨立，我們并無意于使亞非國家同其他地區的國家對立，我們同樣需要同其他地區的國家建立和平合作的關系。”[[48]](#_48_Jian_Zhou_En_Lai_Zai_Ya_Fei)

周恩來利用了他個人的巨大魅力和外交機敏逐漸減弱了那些懷疑中國（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或懷疑共產主義（如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總理）的領導人的敵對情緒。[[49]](#_49_Guan_Yu_Dui_Wan_Long_Hui_Yi)他因此為18個月后他的成功的亞洲之行和為亞洲政治家們連續來北京作友好訪問打下了基礎。1955年初中國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關系，這也幫助周恩來鋪平了他的道路，因為許多亞非國家的領導人都和鐵托個人關系良好。

對其他與會者來說，中國的講道理的態度已很清楚，因為周恩來建議中—美兩國開展談判來緩和兩國間的緊張關系。其結果是，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在日內瓦開始了大使級談判。這次談判在開始后幾個星期只達成了一項協議，即關于雙方互相遣返平民的問題；但是，這些談判后來移到了華沙，變成了未來多少年間中美外交的主要講壇。中國還向華盛頓擺出了其他一些姿態，其中著名的就是建議交換記者訪問，但被抱堅決敵視態度的杜勒斯所拒絕。1957年下半年北京放棄了溫和的外交政策而采取了好戰態度，其主要原因一定是中美關系未能取得進展。

#### 中蘇緊張關系的出現

中國新的外交路線也受到了蘇聯國內事件發展的影響。在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批評了斯大林，并且大膽地修改了列寧關于戰爭不可避免的教導。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爭論，除了關于批評斯大林的問題、關于戰爭不可避免論外，也還有關于另外的一個新提法，即關于各國共產黨可以無須經過暴力革命而取得政權的思想。在這些問題中，對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袖們說，他們關心的最重大而直接的問題是對斯大林及其“個人崇拜”的批評。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關于這個問題的評論，見于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這篇文章是想擺平斯大林的功過，以平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譴責言詞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引起的混亂。按說毛澤東本人不喜歡這位已故蘇聯的領袖，他應該是歡迎對斯大林的批評的。但在另一方面，毛澤東也不得不提防對“個人崇拜”的攻擊，因為它必然要引起對于他本人的地位和崇拜的疑問（見第二章）。在國際上，主要的直接問題不是理論上的，而是具體的：緊接著非斯大林化所引起的混亂和它所產生的波蘭的動蕩及匈牙利的叛亂之后，怎樣重新建立該集團的團結和蘇聯的領導。面對匈牙利的騷動，蘇聯人以武力恢復了控制。可是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大大地損害了他們的國際地位，并且使世界共產主義陣營出現了嚴重的裂痕。中國共產黨人站出來維護蘇聯的威信，并且支持蘇聯共產黨團結各國共產黨。他們自己的地位因此大大上升了。

最初，中國共產黨支持東歐各黨謀求從莫斯科控制下取得更大的獨立地位。當波蘭在1956年波茲南起事以后的騷動時期，中國共產黨支持波蘭黨的新領導人哥穆爾卡反對俄國人。但是，當納吉領導集團威脅著要使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時，中國共產黨又毫不含糊地對軍事干涉給予支持。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論非斯大林化及其影響的第二篇重要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份文件明顯地暗示，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中國已是一個意識形態權威方面的潛在對手。1957年1月初，周恩來中止他的亞洲之行而率領一個代表團去蘇聯、波蘭和匈牙利當和事佬，既想恢復蘇聯的領導地位，同時又告訴赫魯曉夫和他的同事們，他們不能用斯大林的老方式來同東歐打交道。周恩來到蘇聯和東歐訪問給了全世界這樣一種印象，即中國在樹立了它在亞洲內部關系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后，又開始在歐洲事務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人盡管支持蘇聯共產黨，但他們在對東歐動亂的原因所作的理論分析中卻與蘇聯分道揚鑣了。北京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說，甚至在一個共產黨國家中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也可能有矛盾，但這種觀點從未被蘇聯共產黨接受，也是赫魯曉夫一直否認的。[[50]](#_50_Guan_Yu_Zhe_Ge_Wen_Ti_De_Tao)根據這一立場，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了他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它成了中國共產黨4月30日發動的整風運動的基礎。俄國人對這種發展看來是很不自在的，但是，當勢如傾盆的批評使得“百花運動”在6月8日突然中斷，以后又以“反右運動”為名對批評者進行反擊時，俄國人才又感到了某種寬慰。因此，當毛澤東去莫斯科參加布爾什維克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會時，中國人和蘇聯人的國內政策比較合拍，1954年蘇聯代表團訪問北京時所植根的友誼也可以說還是差強人意的。

表明這兩個國家之間當時友誼的事例有二，都發生在毛澤東訪問莫斯科（11月2—20日）以前。第一，中蘇關于新的防御技術的軍事協定在1957年10月15日秘密簽訂。按照這個協定，蘇聯顯然已允許中國擁有一顆原子彈樣品和核技術。第二，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就在中國成立了中蘇友好協會，此時，在1957年10月也在莫斯科成立了相應的蘇中友好協會組織。

這些發展部分地反映了赫魯曉夫在夏季清洗了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以及后來排擠了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之后，還需要中國共產黨給予新的支持。但是，它們也反映了這兩國領導人之間日益增強的互相依存和友誼。毛澤東對防御協定一定感到特別的滿意，因為他很重視蘇聯在1957年8月發射了洲際彈道導彈，在10月份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11月3日又發射了第二顆人造地球衛星。蘇聯的這些成就使得他發表了關于當前國際形勢的著名論斷：“東風正在壓倒西風。”[[51]](#_51_Zhe_Ge_Kou_Hao_Zai_Zhong_Su)也正是在這種看法的基礎上他懇求莫斯科會議不要害怕核戰爭，他認為人類不會毀滅，而共產主義社會將會從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出現。[[52]](#_52_Guo_Ji_Gong_Chan_Zhu_Yi_Yun)但是，這個口號和毛澤東對核戰爭的態度使他的許多同道們大大地感到困擾。[[53]](#_53_Jian_Zhong_Guo_Zheng_Fu_Fa_Y)

除此之外，中國人和俄國人在莫斯科還就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發生了沖突，因為毛澤東爭辯說，共產黨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取得政權。北京關于這個問題的立場一旦大白于天下，它自然就減少了它周圍的非共產主義國家的信任。周恩來追求的萬隆精神似乎變成了一紙空言，同時這個印象又為1958年中國對中東危機的反應和北京對沿海島嶼的炮擊所證實，而且它在1959年8月以后的中印邊境沖突中變得更是十分清楚了。

#### 中國和日本

最后，讓我們看看北京先是堅持而后來又放棄萬隆方針，是怎樣表現在中日關系方面的。作為中國走向萬隆方針的一部分，北京對東京的政策也有一個大轉變，即從熱情鼓勵“日本人民的反美斗爭”到強調與日本和平相處，這是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初有了這樣一些發展：斯大林以后的時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變化；朝鮮停戰以后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國際舞臺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成功；以及在鳩山和石橋兩屆政府下日本對中國態度的改變。在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以后，北京和莫斯科開始一致行動起來，以一種大異往昔的態度對待日本，強調同日本搞好政府之間的關系的重要性，同時熱情地呼吁中日之間進行交流，認為恢復邦交的時機已經成熟。在1954年10月簽署的一項中蘇聯合聲明中，北京和莫斯科重申了這種態度，后來就變成了當時它們對日政策的基礎。中國共產黨原先鼓勵日本人民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日本政府的斗爭，這時便降低了調子。[[54]](#_54_Ru_Gong_Chan_Dang_He_Gong_Re)

1954年秋季，日本各行各業的著名人士被邀參加北京的國慶典禮，中國紅十字會的李德全夫人也訪問了日本。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越來越熱烈。中國對日本的靈活態度也反映在下列事實中：當日本記者問周恩來總理，他們這樣假設是否正確，即廢除中（臺灣）日和平條約不一定是促進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關系正常化的先決條件，而應該被看成是這樣一個過程的目標或結果時，周恩來回答說：“那都沒有多大關系。”[[55]](#_55_Lun_Ji_Zhe_Ge_Shi_Qi_Zhong_R)自然，中國對日本的這種態度不僅反映了中蘇計劃削弱日本對美國的信賴，也反映了中國的國外和國內政策是溫和的這一事實。換句話說，它是中國共產黨采取的萬隆方針的反映。

可是，中國以這些動機來呼吁恢復邦交，并沒有博得東京方面全心全意的反應。鳩山政府傾向于不以任何言論或行動來觸怒北京，它對中日私人交往采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但也沒有采取步驟來滿足北京的愿望。1956年12月組成的石橋政府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熱烈的歡迎，但它沒有執政多久。接著上臺的岸政府受到中國人越來越多的懷疑。

當岸首相在1957年5—6月間出訪東南亞六國和美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日本的態度趨于強硬。特別是在臺灣，岸表示了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并且強調了日本一臺灣的合作。另外，所有這一切又發生在這樣一種時刻，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政策正發生重大的轉變——從整風運動轉到了“反右運動”。這對北京后來對日本的態度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種態度必然表現出中國放棄了萬隆方針。

輪子幾乎整整兜了一個圈子。1949—1950年盛行的是關于兩個陣營的理論，1957年后期中國的對外政策便不再以這種過分簡單化的提法為基礎了。它的對外關系有了更加微妙的變化。但是，北京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好戰態度又一次高漲起來，并且現在又有所加強，因為它增長了自信心，同時又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是力爭把共產主義集團保持在正確的軌道上，以便重新發動對帝國主義的斗爭。

[[1]](#_1_5)毛澤東：《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毛澤東選集》[503]，第4卷，第1177—1180頁。

[[2]](#_2_5)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503]，第4卷，第1436頁。

[[3]](#_3_5)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503]，第4卷，第1470頁。

[[4]](#_4_5)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1949和1950年的美國和共產黨中國：恢復邦交和承認的問題》[744]。

[[5]](#_5_5)關于司徒—黃華在歷史上的談判問題，見宇佐美滋《司徒大使訪問北京的計劃：一個失去了機會的歷史轉折點》[745]，見《國際問題》，198（1976年9月）。又見多蘿西·博格和沃爾多·海因里希編《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系》[57]，第34—36、207、275頁。

[[6]](#_6_5)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514]，《毛澤東選集》[503]，第4卷，第1477—1478頁。重點是筆者所加的。

[[7]](#_7_5)關于高崗事件更詳盡的分析，見本書第二章；又見中嵨嶺雄《高崗事件和中蘇關系》[541]，載《評論》，44（1977年3月）。關于對雅爾塔協定和蘇聯—國民黨條約的評論，見查爾斯·麥克萊恩《蘇聯的政策和中國共產黨人》[523]，第178—193頁。關于這個問題的各種文件，見艾特肯·K.昊《中國和蘇聯》[814]，第396—411頁。

[[8]](#_8_5)毛澤東寫的那五篇反美文章最初都作為新華社社論發表；都收于《毛澤東選集》[503]，第4卷，第1487—1520頁。

[[9]](#_9_5)《人民日報》，1949年12月18日。

[[10]](#_10_5)關于這一點，見中嵨嶺雄《中蘇的對抗和今天的時代：戰后亞洲的再評價》[539]，第93—95頁。

[[11]](#_11_5)《毛主席答塔斯社記者問》，載《人民日報》，1950年1月3日。

[[12]](#_12_5)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512]，1962年9月24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507]，第432頁。

[[13]](#_13_5)關于伍修權的敘述，見他的《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歷》[818]，第1—24頁。關于不完整的英譯文，見《北京周報》[568]，47（1983年），第16—21、30頁。事實上，伍修權記錯了這個條文，可能是故意的，因為條款中沒有提“第三國”，只是更直截了當地提及日本及其盟國，即美國。但是，在發表伍修權回憶錄的時候，日本和美國已成了中國的朋友。

[[14]](#_14_5)《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59]，第1卷，第75頁；英譯文見格蘭特·羅德和里德·惠特洛克《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匯編》[610]，15b。

[[15]](#_15_5)斯特羅貝·塔爾博特編譯：《赫魯曉夫回憶錄》[389]，第463頁。關于在東歐強行設立聯合公司體系的簡短討論，見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蘇聯集團的團結和沖突》[66]，第125頁。

[[16]](#_16_5)毛澤東：《省市委書記會議總結》[510]（1957年1月），《毛澤東思想萬歲》[507]，第85頁。人們期待已久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于1977年4月在中國出版。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所編輯的第5卷包括1949年9月21日到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寫的文章、講話和其他著作。但是，《毛主席答塔斯社記者問》和我們在這一章所引用的有關中蘇關系和與斯大林打交道的言論則經過嚴重的刪改。《省市委書記會議總結》的一種版本見于第5卷（第330—362頁）中，但不包含毛澤東所講他同斯大林辯論中蘇條約的事。

[[17]](#_17_5)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511]（1958年3月），《毛澤東思想萬歲》[507]，第163—164頁，英譯文見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634]，第101頁。

[[18]](#_18_5)《米高揚的講話》（倫敦：《蘇聯新聞》[Souiet News]，1956年），第8頁。

[[19]](#_19_5)見趙岡和馬逢華《關于盧布—人民幣兌換比率的研究》[92]，載《中國季刊》[133]，第17頁（1964年1—3月）；伍修權：《50年代初期的中蘇關系》[817]，載《北京周報》[568]，47（1983年），第20—21頁。

[[20]](#_20_5)《蘇聯和共產黨中國的同盟條約及有關協定的實質：國務卿的演說。1950年3月15日（摘要）》[743]，載美國國務院《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要文件，1950—1955年》[741]，第2卷，第2466頁。

[[21]](#_21_5)《龍云代表的發言》[487]，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匯刊》，第1403頁。龍云也批評了蘇聯在戰后在東北拆遷工廠設備的事，見麥克法夸爾《百花運動和中國的知識分子》[493]，第50頁。

[[22]](#_22_5)O.B.波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1945—1973年的中蘇關系簡史》[尤里·席洛科夫（譯自俄文）][58]，第113頁。關于蘇聯的工業建設計劃，[參見此處](#_46_Su_Lian_Zai_1950_1957Nian_Zh)，又見本書第三章的討論。

[[23]](#_23_5)關于朝鮮戰爭國際背景更詳細的分析，見中嵨嶺雄《朝鮮戰爭國際背景中的中蘇對抗的根源》[542]，載《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14]，1（1979年1月）。

[[24]](#_24_5)國家安全委員會—48/1，2，1949年12月，《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集》[547]，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國家檔案局；國家安全委員會—48—2，1949年12月30日，同上；國家安全委員會—68，1940年4月14日，同上。

[[25]](#_25_5)艾倫·S.惠廷：《中國跨過鴨綠江》[785]，第17—18頁。

[[26]](#_26_5)施拉姆：《毛澤東》[630]，第263頁。

[[27]](#_27_5)約翰·吉廷斯：《大國三角和中國的外交政策》[269]，載《中國季刊》[133]，39（1969年7—9月）。

[[28]](#_28_5)惠廷：《中國跨過鴨綠江》[785]，第45頁。

[[29]](#_29_5)羅伯特·西蒙斯：《緊張的聯盟》[663]，第102—168頁。

[[30]](#_30_5)《金日成在朝鮮戰爭爆發之日的廣播講話》（1950年6月26日），載神谷不二編《戰后朝鮮問題資料》[381]，第1卷，第309頁。

[[31]](#_31_5)西蒙斯：《緊張的聯盟》[663]，第149—150頁；惠廷：《中國跨過鴨綠江》[785]，第58頁；埃德加·斯諾：《大河彼岸》[672]，第654—655頁。

[[32]](#_32_5)惠廷：《中國跨過鴨綠江》[785]，第68—91頁，關于中國的備戰和斯大林的悲觀看法，見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作戰三十周年》[831]，載《黨史研究》[695]，1980年，第5—14頁。根據這份材料，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是在10月2日。

[[33]](#_33_5)《彭德懷自述》[570]，第257—258頁；英譯本，第472—474頁。

[[34]](#_34_5)《中國各民主黨派關于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聯合宣言》，載《人民日報》，1950年11月5日。

[[35]](#_35_5)《彭德懷自述》[570]，第257—264頁；亞歷山大·喬治：《行動中的中國共產黨軍隊》[265]，第1—2頁。前幾段關于美國海軍陸戰隊戰史的引文，出自上書，第3—4頁。

[[36]](#_36_5)《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人民日報》，1963年11月19日。關于龍云的言論，見《龍云代表的發言》[487]，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匯刊》，第1402—1403頁。

[[37]](#_37_5)《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1964年2月29日。（譯者注：引文據原件有所增補。）

[[38]](#_38_5)《每日新聞》[501]，1972年1月26日，駐北京記者安藤的報道。

[[39]](#_39_5)見姚旭的文章[831]，載《黨史研究》[695]，1980年，第5、13頁。關于蘇聯的貸款數字，[參見此處](#_46_Su_Lian_Zai_1950_1957Nian_Zh)。

[[40]](#_40_5)在1950年的建軍節那天，北京各界人民慶祝“八一”建軍節和反對美國侵略朝鮮和臺灣游行示威籌備委員會發布了主題為“反對美國侵略臺灣和朝鮮”的35條口號，其中第28條是“全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大元帥萬歲！”一年以后的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在18條建軍節口號中，無一條說到斯大林，或蘇聯，或蘇聯共產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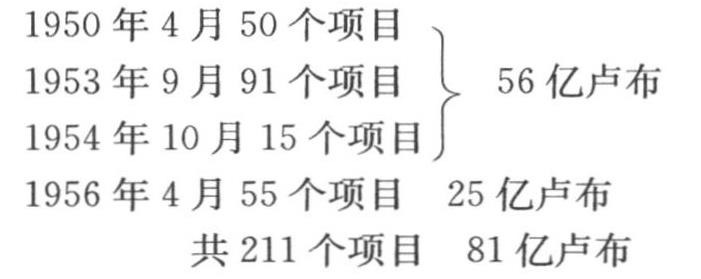
[[41]](#_41_5)《毛澤東思想萬歲》[507]（1969年），第432頁。

[[42]](#_42_5)波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1945—1973年的中蘇關系簡史》[58]，第117頁。

[[43]](#_43_5)馬克斯·貝洛夫：《蘇聯在遠東的政策》[35]，第82頁。

[[44]](#_44_5)對于蘇聯那時抵制聯合國安理會一事，長期以來議論不一。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細討論，見日本外務省調查局第一課《朝鮮戰爭的進程》[259]；西蒙斯：《緊張的聯盟》[663]，第4章；伊豆貝元：《朝鮮戰爭中的中蘇沖突：蘇聯抵制聯合國因安理會的背景》[359]，載《軍事研究》，10.3（1975年3月）。美國已準備在聯合國對中國問題采取相當靈活的態度，見《美國對于因中國加入聯合國各機構引起的問題的態度》[742]，載美國國務院《1950年的美國外交關系》，第2卷，第186—302頁。

[[45]](#_45_5)經過復查，從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以后到1957年7月《科技合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議定書》之間，中蘇兩國所簽署和公布的各種條約、協定、議定書、聯合宣言、聯合公報以及其他這類文件，在1954年10月中蘇會談以前數目達29件，其中24件是在莫斯科簽署和發表，在北京的只有3件，還有2件在哈爾濱；但此后時期的文件，包括作為這次會談結果所簽訂的那些文件計37件，其中12件簽署和發表于莫斯科，22件在北京，一件在旅順口，一件在烏蘭巴托，一件同時發表于莫斯科和北京兩個地方。

[[46]](#_46_5)蘇聯在1950-1957年之間共給了中國81億盧布（舊盧布），用于工業建設援助，其中包括下面211個項目：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1956年2月18日和4月8日，1957年11月4日。）  
　　1958年及以后，蘇聯繼續應允另外的援助，接著在1958年8月增加了47個項目，1959年2月增加了78個項目，總共125個項目。那年的4月份，這些項目與從前的211個項目合并為新的166個項目。因此，預計到1967年由蘇聯援助而可以完成的工業建設總項目可達291個，200億舊盧布。可是，到了1957年11月初，其中只有37個項目完全完成（《人民日報》，1957年11月4日），建設中存在明顯的延誤。在1960年中蘇關系惡化以后，蘇聯在7月份忽然下令撤回所有專家，許多這類工業建設項目都停了工。蘇聯人到底完工了多少項目，其說不一。蘇聯的數字說是完成198項，而西方的材料認為可能完成了154項或130項。同樣，對到1960年夏季中蘇關系已經公開惡化的時候蘇聯貸給中國的款項總數（以美元計），也有不同的估計。莫斯科經常提到總數為20億美元，并指出5億美元是在朝鮮戰爭中給的，可是不清楚這5億美元是否包括在20億總數之內。有些西方的估計則高達26.5億至30億美元。所有貸款無論如何已在1965年償清。

[[47]](#_47_5)見周恩來在國務院第三十三次會議上的外交報告[142]（1955年4月19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59]，3。關于西藏協定的文本，見安貝卡爾和戴夫卡爾《中國和南亞及東南亞的關系的文件集，1949—1962年》[5]，第283—286頁。

[[48]](#_48_5)見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的講話（1954年4月19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59]，3。

[[49]](#_49_5)關于對萬隆會議和周恩來在那里的表現的描述。見喬治·卡欣《亞非會議》[379]。

[[50]](#_50_5)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第172—174頁。

[[51]](#_51_5)這個口號在中蘇爭吵的過程中被莫斯科猛烈地攻擊過。毛澤東在分析當時國際形勢時引用一句中國古老的諺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而首先提出了這個口號。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共產黨。”

[[52]](#_52_5)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和蘇聯兩顆人造衛星上了天，這兩件事標志了兩大陣營力量對比的新的轉折點。十月革命產生了新世界，經過40年，新世界的力量已經超過了舊世界。現在全世界上有27億人口，社會主義各國的人口將近10億，獨立了的舊殖民地國家的人口有7億多，正在爭取獨立或者爭取完全獨立的國家的人口有6億，帝國主義陣營的人口不過4億左右，而且它們的內部是分裂的。現在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毛澤東主席向莫斯科中國留學生實習生的講話：《新世界的力量已經超過了舊世界》，載《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9日）。

[[53]](#_53_5)見中國政府發言人聲明《評蘇聯政府8月21日的聲明》（1963年9月1日），載《人民日報》，1963年9月1日。

[[54]](#_54_5)如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和中國共產黨在1950年1月對日本共產黨的批評所表明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想輸出“毛澤東的道路”，并領導日本、南亞和東南亞的民族解放斗爭。

[[55]](#_55_5)論及這個時期中日關系的著作，見中嵨嶺雄《中國：歷史、社會和國際關系》[540]，第203—215頁。

# 第二篇 尋求中國道路，1958—1965年

## 第七章 “大躍進”和延安領導的分裂

## 綜述

1958年開始時，中國共產黨領袖們對其引導國家走上經濟迅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能力抱樂觀態度。的確，并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員對于用以完成這些偉大工作的最好方式都意見一致，但是總的來說，高度的自信和作為基礎的團結一致的程度無疑足以使中國共產黨以堅定果斷的態度行事。7年以后，深刻的分歧使領導的分裂達到了這樣的程度，毛澤東即將親自發動毀滅性的打擊以反對和他一起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許多同事。這種抨擊又將使中國進入大動亂的十年，以致即使是在80年代初期，當黨的力量、威信和團結已經達到頂點時，北京的領袖們回顧1958—1965年這個時期前的一段時間時，也不無愁悶之感。1958—1965年之間的八年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轉變時期。

的確，1949年以后，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并不是一切都進行順利。領導人之間對于發展工作的速度和形勢有重大的不同意見。例如，1953年財政部長薄一波因他主張的稅收政策而受到尖銳批評，毛認為這類稅收政策將使國家經濟部門的發展放慢。1955年毛對于擬議中的農業集體化的速度，公開地和他的同事們爭論，并有力地推翻了他們已采用的方案。1957年他努力鼓勵非黨知識分子批評黨，這件事曾在最高層中引起激烈爭論。在這一整個時期，當新的政治權力體制得到鞏固時，它曾經一再作出努力以糾正黨和政府官僚機構中的那些被認為是有害的傾向。

可是，1949—1957年時期的要點是，處理矛盾的方式是設法在精英中保持基本團結和維護革命運動蓬勃向前發展。同樣，雖則許多公民極不同意共產黨這一時期的政策，黨的威信和新體制的威信仍然很高。共產黨人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稱，他們的政策將使中國更強、更富，即使他們不得不打碎一些雞蛋來煎出他們的民族蛋餅。共產黨在1958—1965年時期喪失的正是這種威信，同時帶來了實際上的災難性的后果。這一時期總的來說證明具有很大破壞性，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因為它以“大躍進”開始，“大躍進”方案是建立在近于烏托邦的樂觀主義的基礎之上，即認為黨憑借其群眾運動的方法能夠達到一切目的。

1958年春季和夏季，毛和他的同事們大力推行“大躍進”計劃，用以代替1953—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采用的從蘇聯引進的發展策略。中國的領袖們需要某種方法以克服出現的薄弱環節，防止單純地重復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策略，他們決定利用動員群眾的技巧，在抗日戰爭的年代里他們在延安已把這種技巧磨成了銳利的刀刃。這一新策略（連同其各種組成部分，包括農村的公有化）使國家投入了延續到1959年的生產狂潮中。可是，這個策略中的主要部分最終使得生產的高漲成了經濟災難的序幕，而不是期待的富足時代的序幕。

“大躍進”策略在政治關系中引起了重大變化。它從中央政府的官僚手中奪走不少權力，并在許多情況下將其轉移給了地方上的黨的干部。它在生產單位中將技術專家擱置一邊，以善于激發工人熱情的政治通才代替他們。它在所有領域把普及政治的需要抬高到了一個新水平，因為在政治熱情的推動下進行超人的工作是成功地實現這一新的發展方式的關鍵。它也把重要的新的緊張引入了中蘇關系，因為它事實上減少了在中國的許多蘇聯顧問的權力，含蓄地對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蘇聯模式提出了異議。

既然有這許多變化，當“大躍進”開始搖搖晃晃地進行的時候，自然出現了一些嚴重的困難。到了1958年末，毛和其他的人發覺，以躍進為名的極端主義已經造成某些損害，他們適當地修改了目標和政策，以保持運動在軌道內進行。但是1959年初有關國家糧食征購實際結果的消息透露，情況比以前想象的更壞，在那個春季毛帶頭進行了使“大躍進”方案更加合理和效率更高的工作。可是，運動證明很難置于控制之下，因為1958年接過更大權力的那些人繼續反對從那一年的政策作任何后退。

1959年夏季，把“大躍進”置于控制之下的問題，以一種非常有害的方式和上層的精英政治纏在一起。彭德懷——他是軍隊的領導人，長期以來和毛的關系存在麻煩——6月訪問蘇聯和東歐歸來后不久，在廬山召集的一次黨的重要工作會議上尖銳地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彭在廬山的行動的基本原因仍然不能斷定，但毛寧愿把它當做對他個人領導的直接非難，反應激烈。毛要求彭和他的支持者交出權力，并提出蘇聯已經卷入了彭的挑戰。導致的直接后果是雙重的：清洗彭壓倒了控制“大躍進”的努力，于是引起激進政策的持續到1960年的第二次高漲；中國和蘇聯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張。

這兩個結果在1960年都結出了苦果：躍進的高潮給經濟進一步帶來了更多的巨大損害，以至于到了1960年晚些時候饑荒已在國土上蔓延；和莫斯科的關系繼續惡化，以致1960年夏季蘇聯突然取消了他們對中國的所有援助。蘇聯的幫助在那個時候對若干主要的工業發展項目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而這一行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了嚴重的經濟后果。這也分散了北京對農村中正在逼近的經濟災難的注意，因而未能及時地采取解救農村緊張局面的措施。

因此到了1960年末，“大躍進”已經在內地引起了經濟上的災難，而在1960年，大于經濟上的混亂就在城市中到處蔓延開來。這時北京看出了問題的全部嚴重性，擬訂了一系列綱領性的文件以對付這種形勢。在緊要關頭的這一年，所有跡象表明，毛贊成他的同事們所策劃的從“大躍進”大規模后退。實際上，1961年6月毛在北京黨的一次重要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1]](#_1_Yin_Wei_De_Bu_Dao_Zhe_Fen_Zi)，全黨采取了收縮政策，作為官方的原則。

可是，危機一旦開始減緩，當毛尋求恢復他作為確定當前基本任務者的身份時，領導人之間的緊張情況又出現了。在“大躍進”期間，由于他的嚴重錯誤判斷，他的權力和形象受到了損害，他對他的影響力可能下降的擔心增加了。他得出結論，蘇聯國內最近的事件表明，在錯誤的領導下，一個共產黨國家實際上有可能變質，成為具有高度剝削性質的體制。實質上，毛斷定“大躍進”已經損害了依靠動員群眾獲致顯著經濟發展的觀點的信譽，但他仍然堅信動員群眾對于防止革命蛻變成官僚主義的重要性，這樣的事已經在蘇聯出現。

毛的那些直接控制中國共產黨機構的同事們不同意后一見解。他們渴望恢復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紀律，渴望推行一條適當利用專家和專門技術知識以發展經濟的路線。因此，他們具有許多和毛相同的目標，但卻避開了他的有些方法。由于隨著“大躍進”出現的行政權的分散，如果毛找不到幾個重要的伙伴來加強他的力量，那么這些人就很可能成功——雖貫徹毛的基本設想但在方法上加以修改，使它與他們的更加官僚主義的方法協調起來。

毛的這些伙伴有他的妻子江青、他任命來取代彭德懷的林彪，以及保衛系統的重要成員康生，他們同毛澤東及他以前的秘書陳伯達聯合起來，要廢止“大躍進”之后出現的這種做法。這一聯合在1962—1965年之間逐漸形成的過程將進一步予以詳細敘述。參加這個聯合的每一個成員都有其個人的原因，他們一致認為應該改變繼任順序，以使劉少奇（或其他像劉這樣的某一個人）最后不至于從毛那里接過全部權力。因此，這個時期就變得與結盟政治和繼承密謀密不可分了。

當然，爭論的具體問題在這幾年里是有變化的。1962年前期，對農村已經達到的恢復的程度在認識上有重大的分歧。毛認為，恢復已經取得很大成就，足以使北京能夠掌握主動并重新維護其權威。劉少奇、鄧小平、陳云等人不同意，認為黨必須繼續落實緊急措施以解救危局。為那些在1959年就“大躍進”具有危險性提出警告的人平反的問題，這時也提了出來。毛同意這些“右傾分子”中的許多人現在應當予以平反，但他不肯讓彭德懷復職，使他的許多同事（但不包括林彪）大為懊惱。

到了1962年秋季，毛已在“大躍進”后的恢復程度這一點上取勝，于是爭論轉移到在農村恢復政權的威力和聲譽的最好方法這一點上。毛主張在農村中用對農民進行廣泛政治動員的方法以重建黨的政策。最后，他的同事們改用通過內部官僚主義的方式試圖實現農村黨的整頓。毛由于對其他政治局領導人偏愛官僚主義行事方式的傾向感到失望，便采取兩種措施以增強他的那些政策在體制中的作用。

從1963年開始，毛澤東不斷提倡把人民解放軍作為中國人效法的模范組織。人民解放軍在林彪領導下，從研制原子彈的進展（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在1964年10月）到在1962年秋季與印度軍隊的邊界戰爭中獲得一系列給人深刻印象的勝利，在軍事技術工作中表現良好。同時，林在部隊中推行政治工作，以學習在《毛主席語錄》中濃縮了的、教條化了的毛澤東思想為中心。在毛的眼中，人民解放軍成了實現了技術和政治最佳結合的組織，毛謀求擴大它在政治體制中的作用。林彪有力地促進了這種發展——還有這種發展所依賴的主席的權力。

也是從1963年開始，毛指導起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九封“信”。這些論戰的文件詳細地說明了毛的論點，蘇聯已經蛻變成非社會主義的體制，毛把這一發展說成是墮落到了“修正主義”道路。毛用這些信在中國廣泛地揭露修正主義的論點，實質上是要擺明（有點轉彎抹角地）他反對和他對立的同事的政策的理由。

后來成為“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對象的劉少奇和黨的其他領導人在1963—1965年之間，實行一種給人以非常深刻印象的恢復經濟的方案，使1965年的生產恢復到“大躍進”前夕所達到的水平（幾乎是在所有的地區。當然，在一些地區還超過了這些水平）。如前所述，這些領導人似乎盡力順應毛的許多要求，同時疏導這些要求，使之對他們所重建的官僚主義的體制少起破壞作用。可資利用的文件表明，這些領導人并沒有忘記潛藏于林彪、江青、康生和他們的追隨者的陰謀中的危險，但是似乎沒有多少理由相信，在1965年以前，他們在根本意義上把這些危險看成威脅。

劉少奇、鄧小平和與他們具有同樣見解的同事，似乎把局勢看成是困難的，但不是不能應付的。他們的這種估計最終證明是錯誤的而帶來了災禍。他們努力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毛，盡可能地限制他可能聯合的伙伴在體制中的勢力。因此，舉例來說，1964年開始的在非軍事的管理機構中建立軍隊型的政治部門以增強軍隊勢力的企圖，就像江青屢次想取得文化政策的權力那樣受到了強有力的抵制。但是，當這個10年的中期臨近時，毛本人把這一發展較少地看成是國家政策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摩擦，而是更多地從摩尼教善對惡的斗爭這一方面去考慮。這種新看法自然大大地增加了風險，日益不安、心緒不寧的毛開始采取導致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步驟。

以上簡要的綜述指出了這一時期發生的四個主要變化：基本上團結一致的領導演變成意見有深刻分歧的領導；從完全正當的中國共產黨統治演變成遠不能欣然被接受的統治；黨員從相對地有紀律、有生氣的狀況演變成意氣沮喪、半信半疑的狀況；從通過達成一致意見來處理黨內矛盾的方式演變成解決這種緊張關系的基本準則的分歧。總之，在1958—1965年期間，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無論從它在黨內所具有的組織手段來說，還是從它在群眾中所獲致的正當性來說，都喪失了它的某些主要品質。這些損失促成了深刻的意見分歧，從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更詳細的情況有如下文所述。

## “大躍進”的根源

許多種力量促成了共同采取名為“大躍進”的政策的決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仿照蘇聯發展策略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所產生的問題。這是些以經濟問題為其核心的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問題。

由斯大林制定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采用的蘇聯策略需要兩個條件：計劃體制首先將資源導向發展重工業，同時冶金工業要得到最優先的考慮；農村地區急需資金，又因需要提供資源以特別使重工業和一般地使城鎮地區得以發展而被剝削。中國人仿照蘇聯人非常成功地建立了他們的計劃機構，以致在他們各自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人設法把他們將近48%的國家資本投資專用于發展工業，而同類的蘇聯數字卻低于42%。問題出在等式的另一端——剝削農村地區以支持這種城市工業政策。

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曾經將農業既用做出口貨物的源泉，使政府能夠為工業進口機器和技術，也用做迅速擴大的城市工人隊伍的食物的來源。成百萬的農民死亡，或者直接由于莫斯科把集體農莊制度粗暴地強加給他們，或者即使在1929—1932—1933年期間農業生產下降超過25%的時候，政府仍保持農業征購的固定水平，以致造成饑荒，不那么直接地致農民于死地。這種辦法假定農業生產確有剩余，并設法使這些剩余產品用于政治領導的目的。

中國的情況在兩個重要方面不同于蘇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1957年中國的人均產量只有1928年蘇聯的一半，糧食產量是人均290公斤比566公斤；植物油產量是人均1.7公斤比3公斤。因此，蘇聯能夠討論如何保證最適當地支配穩定的農業剩余產品，中國則必須研究一種辦法首先生產并增加這種剩余產品，然后做到控制其分配。第二，在社會成分上蘇聯共產黨員70%以上是城市居民，而中國共產黨員則70%以上住在農村。兩黨社會成分上的差別可能多少使中國共產黨更不愿采取以農村的痛苦和成百萬農村居民挨餓為前提的策略。因此，1957年后期中國在探索一種可以提高農業產量的同時又使資本占用量多的重工業能夠迅速發展的策略。1957年9月和10月初，八屆三中全會上曾熱烈地討論這種策略的各種因素，特別是農業方面的因素。

農業上的問題是，在北京致力于國家向重工業部門投資的同時，如何說服農民增加他們的產量和銷售的貨物。領導人清楚地認識到，直到那時所遵循的方案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要利用政治的和組織的手段來提高農民的產量。但是黨的第五位成員和地位最高的經濟專家陳云卻在這樣的前提下提出他所推薦的解決辦法：農民只對增加了的物質刺激，而不對強迫或思想上的勸勉作出反應。物質刺激不僅要使農民的產品得到好價錢，而且要使他們能用他們掙得的錢買到消費品。因此，國家投資必須或多或少地向輕工業方面轉移，以便提供必需的消費品以實現這一農村策略。輕工業部門也要以相當的利潤率相對迅速地周轉資金，從而在相當時期內為重工業的迅速發展提供足夠的資金。

陳云從根本上爭論說，因此，在這種有條不紊的方法中，每個部門都能幫助其他部門，中國人沒有必要把在部門之間的交易看做一種輸贏相等的游戲。他還指出，要是他的建議被忽視（事實上是被忽視了），要供養大批大批高報酬的城市工業工人是不可能的。陳云1957年的策略在很多方面與蘇聯尼古拉·布哈林1927—1928年的策略相似；和布哈林被斯大林置之不理一樣，陳云也被毛從中央舞臺推開。

陳云建議的政策——50年代中國提出的最全面的可取的發展辦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因急于求成而未被采用。陳自己毫不猶豫地承認，他的平衡增長的方案在以后的幾年中不會產生任何發展的奇跡。但是，對陳的失敗的解釋事實上要復雜些。他的策略認為，中國政府——不同于中國共產黨——在經濟管理中將繼續起主要的作用。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的制度把巨大的權力置于中央政府各部。雖然和所有機構一樣，各部也是在黨的全面控制之下，但是非黨專家在各部的工作人員中最為集中。

部里的工作必然重視讀寫能力、統計技能和抽象概括的能力——這些技能在城市知識分子中遠比在農民群眾中更為普及，而農民群眾在黨掌權前為黨輸送了大量的忠實成員。但是，“雙百”運動及其導致的1957年的“反右運動”大大損害了城市知識分子和主要依靠他們的貢獻的任何發展策略的聲譽。實際上，緊接這個運動而強加給“右派分子”的嚴厲懲罰使許多知識分子完全成了從苦役拘禁地出來的人，因而改變了人力資源參數，而這種參數必然會影響政府所采用的發展策略。

在1957年夏季晚期和秋季，更加激進的反知識分子的氣氛從城市擴散到農村地區。在農村，“反右運動”指向那些對此前兩年席卷中國的農業迅速合作化（本質上是集體化）的功效表示懷疑的人。在中國農業的發展和機械化的低水平上，集體化本身是一項表示人的組織狀況的因素在國家經濟發展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政策。因此，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反右運動”都增強了那些相信適當動員民眾就能完成“資產階級專家”認為不可能而不予考慮的工作的人的地位。在1957年到1958年的冬天，農村的“反右運動”本身對于采取動員群眾以建造水利設施的政策起了促進作用。這項政策證明是非常成功的，但也使那時農村組織結構內在的幾個問題顯著起來了。

第一，缺乏安排人力和資源的適當組織單位，妨礙了大規模的動員工作。第二，如果農民在非農業工作如水壩建造上投入成百萬的勞動日，勞動力就將絕對短缺。第三，在農村中，在基層的政府單位和經濟單位之間建立良好配合關系方面存在問題。1956年，政府取消了區并合并了鄉，但這很快引起了一系列越來越嚴重的組織上的問題，到1957—1958年冬季還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爭論的結果成了在農村中建立一種更大的單位的壓力，這種更大的單位將能管理更多的勞動力資源，也能靈巧地適應政府的行政等級制度。

在1958年初進行一些試驗以后制定的解決辦法是建立人民公社，其后在1958—1962年之間，人民公社本身經歷了組織上的重大變化。最初的公社是巨大的集中化了的單位，包括幾個標準的集市區域。[[2]](#_2_Biao_Zhun_De_Ji_Shi_Qu_Yu_Bao)它們既作為基層政府機構，也作為主要的經濟單位。它們的規模使它們不但能夠管理農業生產，而且也能夠管理當地的工業、商業、教育和民兵。此外，在公社指導下，農業勞動力的組織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許多農民當時被派到專業化的工作隊，從一個村子轉到另一個村子去完成特定的任務。

這些最初的公社管理起來證明規模過大；它們把社員收入的基礎放在以好幾萬農民為單位的總產量上，這種嘗試給予個人努力的鼓勵太少。因此，從1959—1962年，在一系列階段中，有效的集體組織的層次變得更低了。在公社中，這種演變最先促成大隊的設立，然后是設立叫做隊的更小的單位，農民個體的收入取決于這些相繼變得更小的單位的總產量。到了1962年，公社自身也縮小了規模，公社總數由原來的2.5萬個增加到7.5萬個。到1962年，這些變化使得許多公社大體上和以前的標準集市區域相似，使得公社內的最重要的經濟單位——隊——或者和小村子本身一致，或者和大村子中相對地有社會結合力的鄰近的幾個小村子一致。

在城市和農村地區，從專門技能向動員群眾的轉移——作為“反右運動”的結果——表明，最適合做動員群眾工作的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將比它在1953年后遵循蘇聯式策略的期間，承擔起相對來說更為重大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在管理廣度上的這種擴展必然要以政府的官僚體制為代價。某些行政權的分散將縮減中央各部的權力。排斥專門技能的一個主要后果可能是保障發展策略的國家統計制度的破壞，發展策略有賴于可能性和最佳方案的專門測算。在最高一層，由政治局和書記處（以鄧小平為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機構將起重要得多的作用，而總理和國務院的作用相應縮小。

在“大躍進”策略的發展過程中還加進了兩組爭論。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社會地位方面采用蘇聯對必需品的和身份的差別工資的辦法，結果是中國城市社會到50年代中期變得越來越分出了層次。這種層次的劃分擴展到政府官僚機構，1955年供給制被一套復雜的干部等級制度所取代。類似的等級制度也應用于工業、商業和教育系統的不同部門。結果自然是中國人當中的地位意識日漸增強，一種對經濟發展有好處但違反毛澤東革命意愿的名利心受到了鼓勵。一種依靠思想的和強制的動力多于依靠經濟的和職位的動力的方針可能消除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這種有缺點的社會副產品。

另外，毛本人在這個制度中的地位可能受到所推行的經濟發展的類型的影響。他個人在政治上的精力是放在外交政策（特別是對大國）、農村政策和有關革命情況變化的論爭（主要是根據國家當時的基調和情況規定以多快的速度實行改革）這些領域中。城市經濟，特別是財政和計劃的專門事項是他了解得很少的課題。因此，在1958年1月舉行的南寧會議上，毛非常厲害地抱怨說，財政部幾年來送給政治局的表明見解的文件是如此專門和復雜，以致他只好甚至沒有閱讀就簽署。這種狀況自然限制了毛澤東在這一制度中的作用，他決定加以改變，強行通過一種發展的策略，將這種作用由他所不擅長的領域轉移到他認為更有信心的領域。

最后，在最根本的層次上，產生“大躍進”策略的動力是來自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中的非常深遠的思潮。從前，革命一旦面臨似乎是難以應付的成敗關頭時，一批創造性的以廣泛動員各種力量為核心的軍事和政治的政策保住了勝利。中國共產黨在30年代中期進入延安時，是一批原有組織的襤褸不堪的幸存者。盡管有幾年曾經面對來自國民黨或日本人的幾乎是連續不斷的挑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國共產黨和它的軍隊已經在規模上、力量上、活力上大大增大和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在以后的年代里非常自然地傾向于把在野的時代理想化，把它看成這樣一個時期，那時黨真正貼近群眾，官僚主義和社會等級現象并未玷污革命的理想主義，動機良好的領導人和他們的追隨者克服了似乎不能克服的遭遇而生存下來并終于取得了勝利。由于毛嫌惡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社會政治結果和對他所渴望的工業迅速發展機會似乎構成威脅的農業基礎這一薄弱環節，毛和頂層領導的其他許多人看來要回頭注意延安精神（及其方法），把它作為他們的希望的源泉。動員群眾、社會平等、抨擊官僚主義、藐視物質上的障礙——對中國革命的奠基者來說，這些辦法將會再次拯救革命。

因此，有許多種力量推動領導，特別是毛，在1958年采取“大躍進”的策略。發展中的困境，結合著對蘇聯模式的社會結果的不滿，引起了這種對動員方法的探求，以取代以前的做法。黨和政府機構之間以及農村中基層行政單位和經濟單位之間的緊張關系又增加了這種緊迫感。最后，從1957年7月的青島會議開始并持續到下一年，毛開始提倡一種使中國富強的全新的觀點。在一系列會議（9—10月的三中全會、1958年1月的杭州、南寧會議和3月的成都會議）期間具體化了的這種策略，號召用組織和動員的方法來實現農業和工業齊頭并進的迅速發展。合乎邏輯的下一步——“大躍進”——在1958年5月黨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被通過。它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即農業的公社化，在這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成為官方政策。

#### “大躍進”策略

簡單地說，“大躍進”策略有四個主要部分：[[3]](#_3__Da_Yue_Jin__De_Jing_Ji_Ce_Lu)

1.靠充分動員未充分就業的勞動力以彌補工業和農業兩者資金的缺乏。這個辦法在農業地區尤其重要，動員群眾在那里將會導致基本上是自籌資金的發展，從而解決成為障礙的農業問題以求得快速全面的發展，為城市的工業發展提供資源（尤其是食物）。而這又可使中國得以實現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

2.通過為中國經濟的主導部類制定宏偉目標，以及在根本上真正鼓勵使其他部類趕上這些主要部類的任何改革，來完成“計劃”。“困難腳下踩”，寫出了這種做法的氣概。

3.在工業中，既依靠現代的也依靠傳統的方法來提高產量。因此，舉例來說，一方面主要的鋼鐵聯合企業得到大量的新投資，另一方面任何敢于冶煉的團體都可以“土法”煉鋼。總之，傳統部門要給現代化的部門以投入，雖然實際上得不到報償。

4.在所有領域，蔑視技術規范（以及強調技術規范的專家）以利于獲得用這個年代的詞匯來說是“多快好省”的效果。實際上，“多快”淹沒了“好省”。

這個顯然無知的辦法似乎暫時有效。自然，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虛假的——統計制度實際上的破壞，再加上對干部施加的沿著這條路線以創造驚人成績的巨大壓力。并非太不可思議的后果是，數量非常巨大的虛假報告使領導嚴重地誤解了國家事務的實際情況。但是，有兩個因素結合起來的確使1958年成了有顯著實際經濟成就的年份，因而給“大躍進”策略添加了某種可信性。

第一，1958年的氣候異常良好，結果是與通常可能有的情況相比，農業成績較好，其他事項持平。伴隨迅速設立公社而來的組織上的混亂無疑減少了農業產量，但是作為主要條件的氣候狀況，在這個關系重大的年份的大部分時間里，非常有利于至少給人以富裕的表象。

第二，在工業部門，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著手的許多主要項目在1958年開始取得效益，顯示出惹人注目的工業產量的增長。對一個需要相信激進的“大躍進”策略的效力的領導集團來說，客觀條件再次使他們有可能為其信仰找到某種支持。

在1958年開頭和年中的幾個月里，這些不同的因素，既在中國共產黨內也在一般民眾中，導致對“大躍進”的逐漸增強的支持。外國觀察家們對群眾努力完成氣勢驚人的工作任務以躍進到共產主義的激情感到吃驚。一群群農民實際上沒有休息地、不可思議地投入大量時間，連續幾周地維持著令人極度疲勞的進度。當這種激情逐漸達到高潮時，領導對這種努力的功效提高了要求。在某些地區，新成立的公社開始廢除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到了秋季，人們普遍地、想當然地認為延續多年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這導致對許多公社居民免費供應食物。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在貫徹動員群眾的策略中，從政府里那些和他們地位相當的人的手中接過越來越多的工作；在中央，鄧小平領導的黨的書記處獲得了空前的權力和威信。如果“大躍進”獲得了即使是所期待的成就的一個相當部分，它無疑也將使已經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中央領導的團結進一步加強。但事態并未向那個方向發展。

#### “大躍進”的政策

記載表明，劉少奇、鄧小平和大多數其他領導人在整個1958年全心全意地支持“大躍進”的策略。實際上，在政治局一級中那一年明顯地持不同意見的文職人員只有總理周恩來和負責經濟的最高官員陳云。在軍隊中，許多軍事領導人并不喜歡支持民兵和分擔“大躍進”加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民事工作的新義務。在這些持不同意見的軍人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

劉少奇和鄧小平從“大躍進”中得益不少。兩人都主要從事黨務工作，如上文提到的，中國共產黨機構作為一個整體在“大躍進”中大大擴大了它的權力。鄧小平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回溯到20世紀30年代，他可能被看做黨內毛澤東一派的一員。“大躍進”主要是毛主義用來替代蘇聯發展策略的另一個選擇，鄧和這種努力的成就密切相關。鄧通過他的中國共產黨書記處領導人的職位在指揮“大躍進”的事務中起了重要作用。

劉少奇對毛澤東有更大的個人獨立性，但劉也要考慮繼任問題。在50年代中期，毛曾經提出自己應當退居“第二線”，到了1958年初，他表示將讓出自己的國家元首的職位和擺脫黨領導中的許多日常工作。如此，毛澤東就能既確定繼任人選，又可以更充分地致力于中國革命未來方向的研究。劉少奇在1958年或許已很留心繼承問題，而對毛澤東的方案的個人支持在獲取毛應允其為下一個繼任人的策略中是重要的。[[4]](#_4_Liu_Zai_1945Nian_Yi_Zheng_Shi)因此，劉少奇在為中國正式采用“大躍進”策略的黨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表“大躍進”的基調演說，并不出人意外。事實上，1959年4月當毛澤東讓出國家元首職位時，劉的確接替了毛。此外，“大躍進”既然使中國在共產主義的道路上迅速前進，它自然將為繼任者創造一種可羨慕的繼承局面。沒有跡象表明，1958年時劉少奇認為“大躍進”還會造成其他的結果。

上面提到的其他三位領導人的擔心是容易理解的。陳云反對的原因集中在他堅定地認為應為中國尋求適當的發展策略，這種見解和“大躍進”基本的綱要根本不同。周恩來無疑對自己的機構國務院在中國發展策略中的地位降低不滿，此外，周恩來很可能相信和陳云的主張更相近的策略。彭德懷從40年代起在許多爭論問題上和毛澤東的意見不同。那時彭負責和日本對抗的百團大戰，其后毛對這次進攻的計劃和指揮提出了尖銳批評。彭德懷曾經領導在朝鮮的中國部隊，在彭的指揮下，毛的兒子在彭的飛機被擊落時遇了難。[[5]](#_5_Yi_Zhe_An__Yuan_Wen_Ru_Ci)朝鮮戰爭結束時，毛和彭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壞了。單單由于這些個人原因，彭也很可能反對像“大躍進”那種與毛非常一致的策略。

但是彭德懷的反對有比個人怨恨更為堅實的原因。彭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現代化了的、專業的軍事機構，他相信蘇聯是必需的武器、裝備、技術和援助的唯一可能的來源。彭謀求和蘇聯的良好關系，并且理所當然地要人民解放軍以蘇聯紅軍為榜樣。由于他看重蘇聯軍事援助，他幾乎沒有其他選擇。但是，毛不同意所有這些考慮。他認為軍事開支必須削減，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是使人民解放軍增強它的進行游擊戰的能力（以便防御侵略和免遭長期占領），與此同時發展本國的核武器能力。后者可以使核訛詐受挫，不那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容易受到這種訛詐。這個策略的核武器部分無疑非常需要蘇聯的合作，但是傳統派則指出，中國應當發展自己的軍事教范和裝備而不是依靠蘇聯模式。

如上所述，毛把“大躍進”設想為擺脫蘇聯發展模式的束縛的一條出路，這是因為中國自有其非常不同的條件。在軍事方面也是如此，當時毛力求放棄蘇聯模式，他在一次長時間的擴大的軍事委員會會議上說明了這一點。這次會議是在1958年5月黨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大躍進”策略后不久召開的，并延續到了7月。赫魯曉夫曾經支持毛的核援助的要求（其原因，和中蘇關系相比，與共產黨集團的事務更有關系），可是中國傳統軍事策略中的這個轉變增強了已在迅速發展的中蘇緊張關系。[[6]](#_6_Guan_Yu_Zhe_Yi_Shi_Qi_De_Zhon)根據彭的觀點，把游擊戰作為人民解放軍任務的看法，除了損害解放軍外，還貶低了它，因為這種看法要求軍隊與民眾建立更密切的工作關系，這項任務打斷軍事訓練，讓軍隊領導龐大的民兵部隊的發展和管理。

最后，正在這個時候，毛把長期的親密支持者和中國最好的軍事戰略家之一的林彪調進政治局，使林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地位比彭還高。對林和彭兩人來說，含義必定都是清楚的。在1958年，這種緊張關系與領導主體對“大躍進”策略的總的熱情相比，還不明顯，但是當“大躍進”開始遇到嚴重問題時，它就上升到表面，引起了深刻的怨恨，并妨礙了在策略上及時地改變對“大躍進”本身的安排，最終造成了最大的政治和經濟的災難。

1958年秋季，一些領導人的視察旅行表明了問題正在形成。在某些地方，農民食物短缺的情況證明官方統計提供的幾乎所有地方都相當富裕的報告是虛假的。在其他地區，長勢極好的莊稼也沒有完全而適時地收割，因為轉移到地方工業或離鄉參加城市中的國營大工廠的工人太多。1958年時城市人口的增長簡直是直線上升。同時，鋼鐵部門的成績表明1959年生產3000萬噸鋼的理想主義的原目標（1957年的總產量是535萬噸！）是不能達到的。因此，到1958年晚期，毛認識到必須進行調整，盡管他仍然認為“大躍進”的基本策略是正確的。

毛在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開始主張這種調整，然后在武昌中央工作會議和隨后的1958年11月至12月的六中全會上予以貫徹。他要求1959年的鋼的指標從3000萬噸減少到2000萬噸，他又建議政府公布低于那時內部估計的最高的糧食產量統計數字。毛本人使他自己在這個時期的觀點帶有將北戴河會議的革命激情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的特征。[[7]](#_7___Mao_Ze_Dong_Si_Xiang_Wan_Su)但是，實事求是精神——令人不安的1958年底國家實際糧食征購的結果所迫切要求的——很快迫使毛澤東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抑制“大躍進”中日益明顯的過分行動。

這時，中國領導人在2月晚期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聚集在一起以制訂1959年的策略，毛決定需要使用強硬的措辭以防止“大躍進”變成一場災難。在集中討論農村公社問題時，毛聲稱，自己贊成“右傾機會主義”。實質上，他要求減少公有化的程度，把更多的所有權下放給公社本身這一級之下的組織。他要求對基層干部和農民的利益不要采取那種滿不在乎的態度，并威脅說（為了增強效果），如果再不適當地改正，他將退黨。這里，人們感覺到，毛仍然充分相信“大躍進”的基本策略是正確的，但他擔心，執行政策的干部中的“左”傾錯誤將導致既給中國也給毛澤東自身的地位帶來巨大損害的災禍。在這同一時期，毛請陳云在制定適當的工業指標和貫徹有關的措施時發揮積極的作用，以使“大躍進”更合理更有效地進行下去。

隨后一兩個月的事件表明，毛在迫使中層干部緊跟以改正1958年的失誤中遇到了麻煩。有些“大躍進”早期的忠誠擁護者如河南的吳芝圃和四川的李井泉，這時幾乎沒有表現出從他們更早的立場上后退的意向。柯慶施——上海黨的第一書記，也是“土法”煉鋼運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不愿承認這個運動的問題。更普遍的是，支持進行“到底”的情緒在從省到公社各級黨組織中似乎仍很強烈。

還不完全清楚情況為什么就是如此。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下的事實：這些干部由于“大躍進”策略而得到了更大的權勢，可是卻沒有在或許會使他們更深刻地感受到政策壓力的基層工作過。還有，從省到公社各級農民干部更專心致志于這一運動的事實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這種現象，因為“大躍進”有幾分太平盛世運動的氣氛，它可能使農村擺脫城市的控制，使農民干部擺脫城市出身的專家的檢視。總之，所有跡象表明，毛在1959年春季剩下的全部時間里，為了使他的基本發展策略成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抑制“大躍進”的過分行動上。

西藏叛亂中斷了1959年春季對發展問題的集中注意。這個邊境地區——它的社會和中國人謀求建立的共產主義社會有很大不同——已有一段時間潛伏著不滿的情緒。雖然通過允許推遲進行重大改革而達成某種和解，從而在西藏保持了平靜，但從別處傳進來的“大躍進”的消息引起了嚴重的緊張。居住在四川省的西藏人于1956年，居住在甘肅和青海省的西藏人于1958年曾經發動叛亂，從這些地區來的逃亡者住在拉薩，助長了那里的不安。漢族戰士和平民的某些個別行動和錯誤1959年初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中導致了一場實際的叛亂，達賴喇嘛于是逃到印度避難。

叛亂無疑出乎中國人的意料，只能從這個地區之外增派部隊以平息叛亂。盡管比較容易地就挫敗了叛亂的主力，但怎樣處理產生的外交和治安問題卻繼續煩擾著領導，一直到了夏天。[[8]](#_8_Ju_Peng_De_Huai_Hou_Lai_Hui_Y)但是并沒有跡象表明當時領導對怎樣處理這個爭端有分歧。

## 廬山會議，1959年7月

到了7月，當最高領導人聚集在勝地廬山時，西藏叛亂從軍事角度看已經平息，盡管它在外交上的影響才剛剛開始。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現在把注意力轉回到審查經濟形勢和規劃新策略上。毛看來至少對他抑制“大躍進”過分行動的努力正獲得適當成效而感到相當滿意。

可是，廬山會議幾乎整個7月都在繼續，并且證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重大的會議之一。會議快結束時，毛開始猛烈抨擊彭德懷——中國的國防部長、人民解放軍十元帥之一——并著手必要的工作以使林彪元帥取代彭。雖然當時的議事日程仍然是鞏固而不是擴大“大躍進”運動，但毛還是發動了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運動，這個運動使鞏固工作陷入困難，它本身導致了“第二次躍進”，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關于廬山會議這些年來有大量可資利用的資料，但是有關個人的動機和個人的策略仍然得不到解答。

實際上，解釋這個問題要回溯到會議本身召開以前。彭德懷曾經到幾個華沙條約國家旅行，1959年6月12日回到北京。他在這次旅行中曾經會見赫魯曉夫，很可能表示了他對公社計劃及其對軍隊、中蘇關系以及其他種種問題的影響的普遍憂慮。總之，幾乎就在彭回到北京以后，赫魯曉夫突然取消了協議——協議規定蘇聯向北京提供毛非常看重的核援助——又對公社計劃進行了公開的抨擊，這是蘇聯領導人第一次對中國的努力作出這樣公開的批評。

當毛發動他對彭的反擊時，他試圖表明赫魯曉夫和彭共謀，因為赫魯曉夫在“大躍進”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與此同時彭就在廬山不公開地抨擊這項政策。給情況更增添了一層神秘色彩的是，彭在其廬山活動中的一個親密合作者是外交部副部長、和蘇聯有長期密切聯系的張聞天。麥克法夸爾認為，慫恿彭在廬山批評“大躍進”的人的確是張聞天。[[9]](#_9_Luo_De_Li_Ke__Mai_Ke_Fa_Kua_E)

總之，彭德懷就是在廬山這個地方最初在小組討論中對“大躍進”進行了批評，其總的調子似乎和毛澤東幾個月前所作的那種評論是一致的。只有一種評論與毛不一致，大意是毛可能不完全了解他家鄉發生的事情，因為那里的人民接受的國家援助比毛了解的要多得多（這是一種極易引起爭論的說法，因為毛含蓄地自稱他自己比任何其他領導人都更了解中國農村的情況）。

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概括了他對“大躍進”問題的看法。彭決定采取這個行動可能是由于他覺察到在廬山有一種持續而令人不安的不切實際的態度，要不然就是他可能受到了張聞天的鼓動。實際上，彭的目的也許是要使毛為難，也可能要攪亂毛已作出的讓劉少奇繼任的安排。在“文化大革命”中，彭在審問下聲稱，他想把這封信作為對主席表示由衷敬意的信息，只是為了給主席看。[[10]](#_10_Guan_Yu_Peng_De_Huai_Zai_She)但是，使他非常驚奇的是，主席把這封信付印，散發給所有在廬山參加會議的人，并給了它相當正式的堂皇標題：《彭德懷的意見書》。

7月23日毛澤東對這封信作出了猛烈的反應。張聞天（可能還有其他的人）在會議上插進來的評論可能使毛澤東確信，他手里有一個滾雪球似的問題，應該迅速而果斷地處理。另一種說法是，毛可能一接到彭德懷的信，就基本上把彭“掛”了起來，用他的行動作為以他自己喜愛的林彪取代彭的理由。如果林彪是忠誠的，那么赫魯曉夫7月18日在東歐的一次演講中對于公社的公開批評就讓毛澤東占了理。

不管怎樣，毛澤東在7月23日采取的直接反對行動，在可以允許的批評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評論之間劃了一條明晰的界線。他斷言，彭圖謀攻擊主席，而不只是對怎樣更好地進行“大躍進”提出建議。他譏諷地質問道，為什么彭不在春季早些時候的會議上表達他的意見，因為那時彭已經完成了導致彭得出他的否定結論的調查。毛提醒他的聽眾，他自己對“大躍進”中所用的方法曾經嚴厲地批評，但是彭卻保持沉默。現在，離開10月份革命勝利10周年還有幾個月，彭德懷選定在為即將到來的這段時間的政策定調子的一次重要會議上突然發動攻擊，顯然是從某些方面得到了事實上的支持。在北京中南海，彭住在毛的住宅的隔壁，這一事實很可能增加了毛的懊惱和被欺瞞之感。毛的結論很清楚：彭是如此明顯地違反了行為準則，以致他和他的“集團”的錯誤不能不受到糾正。赫魯曉夫對公社運動的批評給譴責彭開了方便之門：彭在把他的批評意見告知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之前，已經告知了蘇聯領導人，以便取得他們的幫助。

毛的辛辣描述震驚了他的聽眾。彭德懷隨后幾個晚上通宵未眠，據說對完全出乎意料的毛的反應感到困惑。既然彭所說的許多話事實上是毛本人在幾個月前贊同過的那種措辭，因此毛態度的激烈使其余的人明顯地感到迷惑不解。如上所述，毛曾正當地抱怨彭先前的沉默。同樣，彭在給毛的信中的某些批評似乎是以巧妙的方式直接而嚴肅地批評毛本人，而不只是批評毛支持的政策（對這些政策彭仍然大多保持沉默）。可是毛的反應卻一反常態，因此很可能有某種另外的利害攸關的緣由。

首先，彭德懷是那批元帥中的一人，一般來說這批人在1949年共產主義勝利后對于最高職務的分配有所不滿。在奪取政權的幾十年中，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是在根據地，但有些人或者是在中國城市組織地下網絡（如劉少奇），或者是做正式與國民黨聯絡的工作（如周恩來）而度過了他們的許多時間。1949年后，后面這一批人不相稱地分擔了最高職務。1954—1955年的陰影似的高崗事件是廬山會議之前政治局一級的唯一一次清洗，它似乎涉及某些前根據地領導人對新政權中的領導職務的異議（主要是對周恩來和劉少奇）。彭德懷據說卷入了那個事件，但是減少損害的愿望導致一個決定，把隨之而來的清洗盡可能控制到最少數的人。因此，毛可能把彭在廬山的行動看成彭要得到更高職位的第二次嘗試。毛不久前把彭的競爭者林彪調到級別比彭更高的中國共產黨的職位上，對比之下，這表明毛事實上在尋求辦法使彭自在地離開政權。彭在廬山的批評可能給毛提供了一個機會，分發彭的信件便是這個部署的第一步。

廬山會議前幾個月，劉少奇擔任了毛讓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務。這再次肯定了劉成為毛的繼任者的資格，在公開場合中劉的照片前所未有地開始被給予與毛的照片同等的地位。這個變化很可能加深了關于繼任問題的暗中競爭，導致彭德懷采取比他在其他情況下可能采取的更為嚴重的行動。這也可能增加了毛澤東對繼任問題嚴重性的敏感，使他更加容易從有人想削弱他的權力（和他選定他自己的繼任人的能力）的企圖方面去考慮彭的批評。

張聞天也參加了這個事件。張聞天在長征時曾經成為黨的總書記，但后來在延安，毛使他自在地離開了這個職務。張是受過高等教育和善于言談的人。1949年以后他漸次被降級。他和蘇聯的緊密聯系使他理所當然地成為北京駐莫斯科首任大使的人選，但是當他從這個職位返回時，他不得意地成了外交部的副部長。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他在1956年黨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從政治局正式委員降為候補委員（1961年他正式地完全離開政治局）。張很可能認為他應得的職位比委任給他的職位要高，在1959年，由于有關“大躍進”和有關繼任問題的緊張情況，他可能已經決定采取行動。張聞天和彭德懷在廬山的私人談話可能加強了他的機會已經到來的意識，他可能巧妙地利用了不那么老練的彭，讓彭去提出評論。張可能認為，他能夠通過彭把他個人的抱負和許多老元帥的抱負結合起來。而且，彭被認為與許多最高領導人很有交情，而張不是如此。因此，在這個事件中，彭可能是配角，而不是策劃者，被張用來在廬山創造一種氣氛，這種氣氛將證實張聞天對“大躍進”的滔滔不絕的批評是正當的。在7月20日的會議上，張終于發表了那樣的批評。[[11]](#_11_Dui_Yu_She_Ji_Zhang_Wen_Tian)

毛澤東對張聞天的這種活動也許早就很敏感，這可能決定了毛考慮彭的批評的框架。這也可能有助于說明毛收到彭的信后等了9天才進行反擊這一事實。當然，另一種代替的辦法是，毛可以只傳播彭的信，在毛澤東明白說出他的強烈意見以前，讓任何支持者在隨后的討論中有足夠的時間亮相。如果毛澤東接受“張聞天當策劃者、彭德懷當配角”的說法，毛澤東仍然可能決定把反擊的矛頭主要指向彭，這有幾個原因：他的降低彭和提升林彪的總的愿望；他需要一個更知名的替罪者；或許彭自己和赫魯曉夫的討論，可能使得他成為兩人中更易受到責難的人。

最后一個可能性是，彭德懷的異議比張聞天的異議對毛澤東含有更大的危險性。彭不同于張，彭和一批重要的贊助者——老元帥們——有密切聯系。而且，彭的職務和張的職務不同，彭作為國防部長有接觸情報的極好機會，使彭能了解毛切望牢牢地保持在他自己控制之下的兩大類人的意見：中國的農民（彭通過軍隊的郵件和其他來源了解他們的意見，因為幾乎所有應征入伍的人民解放軍都來自農村），和人民解放軍本身。因此，毛可能認為必須把他的火力對準彭，即使張在廬山是批評的幕后的主要人物。

廬山會議上的對抗是在接下去的8月的廬山八屆八中全會和9月的擴大軍事委員會會議期間結束的。在后一會議期間，彭德懷正式失去了他的國防部長職位，并被告知去學習幾年。張聞天和另外兩人（黃克誠，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周小舟，毛家鄉湖南省的第一書記）作為“軍事集團”（似乎是誤稱）[[12]](#_12_Zhi_Yu_Ta_Men_Si_Ren_Wei_Shi)的成員同樣被清洗。

#### 廬山會議的影響

如上所示，廬山會議和彭德懷事件的長期影響是深遠的。最重大的影響之一是，毛澤東在廬山似乎破壞了調節最高領導人之間這方面的爭論的不成文的慣例。廬山會議之前，正常情況是，任何領導人都可以在黨的集會上自由地發表意見，爭論可以是激烈的。誰也不會因為說了什么而受到責備，只要他正式接受并按照最后達成的決議行事。但是毛在廬山的行動可以說已經改變了這一切。

首先，毛澤東把最上層同事的內部批評叫做“無原則的派別活動”。然后毛要求其他的人在他自己和他的反對者之間作出抉擇，失敗者要受到懲罰。這種態度最低限度將妨礙政治局委員之間未來的自由討論。由于事實上要求幾乎所有其他最高領導人[[13]](#_13_You_Xie_Ren__Ru_Deng_Xiao_Pi)都要表態，這無疑就要種下以后會產生后果的怨恨。沒有跡象表明，毛澤東在廬山劃線以后有任何高級領導人投票反對他。

彭德懷事件還產生了某些既具有短期重要性也具有長期重要性的人事變動。最直接的結果是林彪升任國防部長。林彪，如前所述，是毛澤東的長期追隨者，林的新職務使毛比起以前來或許能更牢靠地控制人民解放軍。林則堅決地防止彭恢復政治上的原有地位，因為那會對林自己的權力構成威脅。[[14]](#_14_You_Yu_Mao_Ze_Dong_Ri_Yi_Yi)以下將要談到，這個爭端在60年代初期使中國的政治繼續惡化。

還發生了與廬山會議有關的其他人事變動。羅瑞卿離開公安部長的職位，擔任人民解放軍的總參謀長。較不明顯的變動是，華國鋒在湖南省得到提升，擔任一個更高的職位。華的提升可能是由于毛澤東在廬山的緊急時刻他對毛的一次忠誠的行動。如果是這樣，華的貢獻也許是：在毛的故鄉韶山支持毛的發展方式，反對其上級——湖南第一書記周小舟所支持的彭德懷的指責。華情愿割斷與上級的長期關系而為毛效勞，比10年以后當毛澤東再次需要忠誠的部下以清除林彪事件以后的反對者時，對毛有更大的幫助。

最后，如前所述，廬山會議的動態和隨后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斷了毛澤東半年前發動的整頓和鞏固的工作。1959年秋季，反機會主義的運動席卷全國，所有那些幾個月前對“大躍進”政策的功效表示過懷疑的人都被免職。這個運動實際上終止了1959年春調整和鞏固公社的工作，到了1960年初期，新的躍進已經開始進行，這并不出人意料。毛澤東支持這種發展，例如他于1960年3月承認鞍山鋼鐵公司新“憲法”，用一種把重點放在政治上的管理方法取代那里以前仿效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鋼鐵企業的管理方法。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采納毛澤東的12年農業發展綱要（1956年前半年短暫的“小”躍進的一個主要部分）。在同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的親密支持者譚震林再次認可公社計劃。實際上，1960年春季這幾個月都在盡力組織城市人民公社，恢復干部“下放”。現在還不清楚，在彭德懷的非難之外還發生了什么事情，致使毛澤東放棄了1959年早期的分析，而贊成恢復對“大躍進”策略的信心。1960年上半年領袖們把他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中蘇關系這一事實，使得這個“躍進”策略迅速擴大到引起災難的程度。

第二次“大躍進”徹底地失敗了。根據1981年發表的數字，1960年的農業產量只有1958年的75.5%（1961年的產量又下降了2.4%）。輕工業主要用農業產品作為原料，因而輕工業的變化比農業產量的變化晚一年才顯示出來。1960年，輕工業產量減少9.8%。然后1961年下降21.6%，1962年又下降8.4%。這種積累性下降將導致可與食物短缺相比的商品的極度缺乏。重工業產量也急劇下降，1961年與1960年相比下降46.6%，1962年比1961年又下降22.2%。[[15]](#_15_Shu_Zi_Yin_Zi_Ma_Hong_De_Yi)

總之，1959年晚期和1960年重新開始的躍進導致了中國（也許是世界）20世紀破壞性最大的饑荒。這次大規模饑荒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那些錯誤的政策（如1959年時決定要農民讓土地休閑，以避免因為倉儲設施不足難以處理預料中的剩余農產品而造成的損失）必然導致嚴重的食物短缺。由于政權對于問題，對于繼續到1961年的高農業征購定額拿走農村可以到手的糧食的程度缺乏了解，這類短缺大大加劇。惡劣天氣和1960年年中蘇聯專家的撤離增加了困難，但是這后兩個因素都不會引起發生于1959—1961年的多于2000萬人的“超額”死亡（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16]](#_16_Cong_1959Dao_1961Nian__Zhong)

重新開始的“大躍進”的可怕后果和清洗彭德懷的怨恨結合起來，使政治上的一致松散了，這種政治上的一致曾經使延安領導在在野的時代和執政的頭十年中團結在一起。這種政治上的退步經過了一系列爭端的發展過程，任何一個爭端實質上可能都是易于處理的。但是合在一起它們就為延安領導的最終分化創造了條件：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60年代初期，六股各色各樣的繩子編織成了這幅政治退步的掛毯。

其一，赫魯曉夫決定盡力使“大躍進”停止進行，在1960年的危機達于頂點時迅速撤回蘇聯顧問和取消援助，以便向中國表明中國和蘇聯的關系的高度重要性，這些事情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使毛澤東震驚地對俄國革命的發展從根本上重新評價。在蘇聯的發展和其領導人的行動中，毛以前固然覺得有許多地方犯了錯誤，但是他以前并沒有從蘇聯制度根本變質方面考慮。赫魯曉夫粗魯的強制策略引起了這種可能性，而這種思想是令人吃驚的。含蓄的意思是，如果蘇聯革命能夠從社會主義變成法西斯主義（或者社會帝國主義），那么任何社會主義革命在理論上都是可以轉變的。由于毛澤東在北京的地位因“大躍進”的失敗而大為減弱，他顯然開始擔心他在北京的畢生事業可能最終不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會，反而是為一個極度的剝削制度奠立基礎。

因此，毛澤東開始把他的大部分精力專用于處理與蘇聯的爭端，他把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受過訓練又很了解蘇聯事務的康生引進中央舞臺，幫助自己為中蘇關系而戰斗。由于毛在幾年當中開始對自己的繼任人所遵循的路線產生非常嚴重的懷疑，因此毛利用和“蘇聯修正主義”的斗爭，在中國公開了事實上等于對他自己同事的政策所作的批評。據說，康生30年代中期在蘇聯學會了在政治上暗中斗爭的手段，因此在60年代早期，康生在北京的權勢增強了在紫禁城中以斯大林主義，而不是以傳統的毛主義的比賽規則進行斗爭的趨勢。

其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最高層中的威信，由于大失敗的“大躍進”而大受損害。1961年6月，毛在北京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上實際上作過某種形式的自我批評。如前所述，到1959年，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毛澤東都已打算在政治局中退居“二線”，以便能夠把更多的時間專用于主要的爭端而少陷入日常的行政事務。但是1960—1961年的災害一旦完全顯露出來，毛澤東發現自己與他本人所希望的相比，被更有力地排除在日常事務之外。同時，他從前的某些主要支持者，如鄧小平，不再對他表示他自認為應當受到的尊重（林彪證明是顯著的例外）。因此，舉例來說，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抱怨鄧1959年以后不聽他的話。如前所述，鄧以前是毛的一個主要支持者。但是，當收拾“大躍進”災難的殘局的時刻到來時，鄧憑借他的中國共產黨書記處的職位起了主要的作用，在適當的補救辦法和要汲取的教訓方面鄧和毛的意見不完全相同。

第三股繩子恰恰就是不同的領導人從完全失敗的“大躍進”中得出了不同結論這一事實。毛澤東承認，如他隨后的行動所表明的，政治動員本身不能導致快速的經濟增長，因此毛并未宣布增加主要產品，以之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目標。但是，也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證明的，毛仍然相信政治動員具有改變政治權力的前景、價值和分配的能力。作為對比，大多數在廬山反對彭德懷的毛的支持者，在他們對1960—1962年的形勢作了調查研究以后，斷定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整個延安式的“高潮”政治實際上在所有方面已經變得只起反作用。因此，當毛不再把政治運動看做經濟增長的基礎時，他的許多同事則要求完全避免搞運動式的政治。

其四，中國共產黨本身負責組織“大躍進”，作為這個巨大努力失敗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在威信和組織能力方面都受到了損害。當國家慢慢脫出“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低層組織的沮喪情緒變得更加厲害，因為曾經支持第二次躍進的干部現在終于由于他們的“左”傾主張而被清洗，而毛自己的責任則被小心地掩蓋，以保護他的合法地位。例如，毛1961年6月的自我批評從未傳達到基層組織。由于1960—1962年中國共產黨基層干部負擔過重，許多人喪失了他們的革命熱忱，因而使得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在一定程度上立腳不穩，那是不足為怪的。怎樣才能最好的整頓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的問題在上層引起了另外的分歧，因為不同的領導人提出了他們自己處理這個重要爭端的多少有些不同的方法。

第五個問題與中國以多快的速度從“大躍進”的破壞中恢復過來的爭論有關。對功過的不同評價當然可以為采取不同的措施以導致比較正常的局面提供各自的根據。當這個爭論在1962年進行時，毛澤東比他的許多同事更加樂觀；實際上毛似乎已經開始懷疑悲觀的人試圖限制他自己在體制中保有的機動靈活性和周旋余地。當毛變得更關注修正主義時，這類爭論對他有了越來越大的重要性。

最后，不管人們對中國恢復工作的速度抱有什么看法，他們對“大躍進”（特別是它的第二階段）已經造成的非同一般的損害都是毫不懷疑的。換句話說，1959—1961年的事實基本上證明了彭德懷在廬山的所說所寫是正確的。火上添油的是，彭德懷于1962年完成了范圍相當廣泛的農村調查，那年8月他總結了自己的調查結果，向中央委員會提交了一份8萬字的文件，為他的平反提供根據，理由是他在廬山的原則性批評是正確的。但是，林彪不能容忍為彭平反，毛也不愿意。此外，到了1962年，毛可能已經開始考慮格外依靠林和人民解放軍的必要性，因為毛對他的其他同事的擔心增強了。因此，毛阻止為彭平反——這樣做使到那時為止的調節領導人之間關系的準則進一步受到了損害。

## “大躍進”以后：劉鄧綱領

總之，“大躍進”的失敗在中央領導人面前都留下了一大堆問題。這些問題各不相同：從最高領導人之間的人際關系到磨損了的制度的能力，到外交政策與國內政策的關系。基本的政治方法同當前經濟及其他方面的目標一樣，都有爭論。此外，所有這些事情相互影響的方式往往容易加深毛澤東的懷疑，使之更加難于找到意見一致的解決辦法。說得詳細些，這些爭論有如下述：

在1960年7—8月的北戴河會議期間，領導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克服“大躍進”的災害。那年6月蘇聯對中國全部援助的終止迫使北京從自力更生以求發展這方面去考慮問題，并審度農村正在惡化的形勢。在其后的一兩個月中，當夏季的嚴重歉收變得明顯時，當局在北戴河，接著又經過幾次反復的考慮，采取了幾個主動行動：

首先，第二次“大躍進”正式被終止，指導方針這時變成“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取代以前的“多、快、好、省”的提法。毛澤東在1959年首次提出“農業為基礎”的方針，但是直到1960年秋季才實施。它在1961年1月的九中全會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方針。

其次，中國共產黨中央通過重建六個中央局謀求加強對受到破壞的全國的黨的機構的控制（解放初期存在的相應的大行政區政府未重建）。據說，曾經嘗試通過后退到提供更大物質刺激的辦法來解決農村的困難情況。引起災難的秋收暴露了問題的重要性，以致周恩來在11月主持擬訂了有關農村政策的緊急措施，即名為關于人民公社的《十二條》。這份權宜的文件實際上允許在公社之內真正分散權力。用安奉俊（音）的話來說，隨著貫徹《十二條》，“大躍進完全失敗了”。[[17]](#_17_An_Feng_Jun__Yin_____Zhong_G)

但是，解除干部貫徹“大躍進”政策的壓力并沒有指明中國共產黨應當從此走向何處。“大躍進”失敗的具體原因仍然不清楚，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得出適當的答案以使國家回到長期發展的道路上去。相反，在1961年春季，地方領導人一般都被給予很大的靈活性以實施他們認為可以減輕蹂躪著中國的饑荒所必需的任何措施，這些措施甚至包括許多地方對公社的事實上的解散。在政策方面，有兩種解決辦法被采用。第一種由林彪提出，以部隊為中心，強調恢復政治學習，以之作為提高修養和增強紀律的一種手段。第二種由劉少奇和鄧小平提出，即在主要工作領域內進行一系列的調查研究，以便為綱領性的政策文件提供資料。

1960年9月，林彪在部隊中要求擬訂集中學習毛澤東著作的規劃。農村的饑荒在戰士中引起了不可忽視的沮喪情緒，林認為，重要的是恢復政治工作以防止這種現象。既然這種努力一般是針對幾乎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村新兵，就必然會把毛的思想簡單化和教條化。為了試圖使毛的思想能為普通戰士所理解，終于出版了《毛主席語錄》，這本“小紅書”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紅衛兵的圣經。但是，在1960—1963年期間，那些負責中國城市工作的人指責了林彪對毛澤東著作的教條主義解釋在軍隊以外也管用的想法。

劉少奇和鄧小平指導了調查研究和起草一系列綱領性文件的過程，這些文件一般以其各自的條款的數目來稱呼。1961—1962年期間，公布了下列重要的政策文件：《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科研十四條》、《手工業三十五條》、《財經六條》、《文藝八條》、《高教六十條》、《商業四十條》。這些政策文件，其起草過程的具體情形當然都有所不同，但有一些要素是共同的。每一種都有一個黨的領導人負責起草過程。例如，毛澤東主管《六十條》的起草工作，薄一波照管《工業七十條》（在李富春主持初步工作以后），李先念照管財政，周揚和陸定一處理文藝，彭真掌握教育，等等。

此外，在書記處下設立了三個職權廣泛的政策小組以監督和協調有待商討的主要領域的政策：李富春和陳云小組審查經濟政策，彭真負責文化和教育事務，鄧小平控制政治和法律工作。于是，舉例來說，這種工作方式使得陳云于1961年在以下領域作了重要的政策報告和講話：化肥生產、外貿、城市人口增長、農業政策和煤的生產。如下所述，1962年早期，陳云主要專注于中國的形勢和將來要采取的政策的總的審查。[[18]](#_18_Zai_Zhe_Yi_Guo_Cheng_Zhong)

在擬訂各種綱領性文件的過程中，典型的辦法是，負責的人通過開展現場調查，常常包括訪問與他過去有聯系的適當的單位或場所，首先查明實際情況和問題。此外，再召開有關的專家或實際工作者的會議，動員他們給予支持并征求他們的意見。這些文件要起草若干次，大多數草案都反映了黨內的和非黨專家的補充評審意見。這種做法認為專家能夠作出有價值的貢獻，這和林彪同一時期在軍隊中采取的辦法完全相反。對林彪來說，毛的思想既包含了問題的答案，也包含了需要的任何啟示的源泉。因此，在“大躍進”的災難以后，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已超出了個人政治上好惡的范圍，而是包括了制訂政策過程和政治考慮這些根本方面。

劉少奇和鄧小平領導的機構所制定的政策實質上也打擊了作為“大躍進”的基礎的想當然的設想。例如，在化肥生產方面，陳云要求增建14個工廠，每個廠具有每年生產5萬噸合成氨的能力。這些工廠應當是大而現代化的，用以代替“大躍進”期間變得非常普遍的效率差的小規模化肥生產。而且，它們需要從國外引進相當多的主要部件，使中國離開以前的自力更生政策。薄一波的《工業七十條》重新強調專家的作用和物質刺激的效用，這幾乎和毛澤東前一年提倡的“鞍鋼憲法”直接抵觸。《文藝八條》允許重新采用傳統藝術形式，允許藝術家探索范圍更廣的主題。《教育六十條》強調教育質量，砍掉了作為“大躍進”策略一部分而開辦的許多民辦學校，《農業六十條》明確地提出了一批詳細的條例，規定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提供自留地，一般來說，努力使農業生產轉向一種為農民勞動提供更多物質刺激的制度。

這些政策全面地標志著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即不再考慮“大躍進”時的優先事項了。它們使專家和專門技能回到了中心舞臺，更加依靠現代化的投入以實現增長，重新把中央的官僚體制控制加之于各個活動的領域，更多地在個人的物質利益而不是思想動員的基礎上向群眾提出要求。沒有跡象表明毛澤東在1961年期間反對這些傾向。實際上毛親自積極地參與了《農業六十條》的起草工作，并在1961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要求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6月，毛澤東在北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但是，因為這些調查研究和商議導致了政策性綱領文件的出現，毛顯然變得日益不安——而且感到不安的不是他一人。

#### 七千人大會，1962年1—2月

國家以多快的速度恢復，未來的目標和時間因而應當怎樣安排，當有關這方面的根本分歧在1962年出現時，緊張的局面突然爆發了。1—2月召開了七千干部工作會議以審查領導方法并對形勢進行總結。對于前者的共同意見比對于后者的多。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主要報告和幾次其他的發言，他要求更廣泛地運用民主集中制，少由主要人物個人發布命令。在1月26日和27日的演說中，他把最近大部分紛擾的責任歸之于黨中央，強調防止那種粗暴的清洗與反清洗的重要性，這種清洗和反清洗在前一兩年曲折復雜的情況下困擾著黨。劉具體地批評了緊接廬山會議之后的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猛烈抨擊，據說他曾經要求為“右傾分子”，尤其是為彭德懷平反。毛澤東1月30日在會議的講話一般地贊同了這些論題，毛告知聽眾中的干部，他本人在去年6月已經作過自我批評（他也預先通知他們要準備作同樣的自我批評）。因此，這次會議有助于整頓很不一致的黨內決策機構。

但是在其他領域，會議未能得出一致意見。在引起“大躍進”災難的原因方面，劉少奇認為政策上的錯誤決定占70%，蘇聯取消援助和連續幾年的惡劣氣候占其余的30%。毛澤東認為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劉少奇還認為，經濟仍然處于危急時期，恢復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對比之下，毛澤東認為現在形勢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恢復正常。也許毛的意思是，他的評價只適用于政治形勢而不適用于經濟形勢。總之，劉當時對于一般情況似乎懷有比毛遠為憂郁的估計。劉的比較悲觀的估計可能從而為更有效地解救危急形勢的辦法提供了理論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支持毛澤東，似乎對“大躍進”作了全面的肯定的評價。對比之下，在1962年晚些時候的實質性爭論中，周恩來強烈地支持劉少奇和陳云。因此，周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行動顯然反映了他工作上的一貫做法，即每次公開出現意見不一致時，總是支持毛，這比他真正同意毛見解的時候要多。周常常被中國人比作“柳枝”，他在1962年春季的行動再次證實了這種恰如其分的性格描寫，也就是說他既有力量，也有隨風彎曲的適度的才干。并不出人意料，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也得到林彪強烈的口頭支持。

另外三位領導人的見解不很清楚。鄧小平重申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但是在諸如為右傾分子平反等實質性問題上，他支持劉少奇。陳云曾被邀請作財政和貿易的報告，但他表示異議，理由是他還沒有完全弄清楚這個領域的情況。但是，彭真的行動或許最清楚地總括了政治局委員們1962年1月發現自己所處的困難而又動蕩不定的處境。

彭真曾經命令他在北京市各級組織的下屬調查研究“大躍進”災難的原因，并為他準備一份報告。還不清楚他這樣做是根據自己領導工作的需要，還是作為確定從“大躍進”中應當汲取什么教訓的范圍更廣的領導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總之，最初的調查研究于1961年5月晚期開始，11月彭真發出第二道命令，作為這項工作的一個部分，應當檢查1958—1961年之間的中央的一切指令。鄧拓——北京黨的一個書記，1957年以前曾經編輯《人民日報》——負責這次調查研究。1961年12月在暢觀樓召開了一次會議之后，鄧拓向彭報告了集體作出的結論。

他們提出的這份報告把造成災難的過錯直接歸之于“大躍進”策略中的動員政策。中央批準并轉發的虛假報告太多，發布的互相矛盾的指令太多，在號召地方干部行動時實際上完全不顧經濟現實。總之，“大躍進”的災難應主要歸咎于政治局。既然1958年后毛澤東是這個機構的實際領導，暢觀樓報告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成了對毛本人的工作的嚴厲批評。

1962年1月彭真參加七千人大會，據說他準備詳細說明暢觀樓報告提出的問題。但是，當彭領會了會議的性質時，他猶豫了，事實上他并沒有在這次重要的會議上批評毛澤東的領導。彭到那時已完全認清“大躍進”災難的嚴重程度，將來肯定不會再支持這種動員工作。同時，他不能使自己直接和毛爭辯。這種躊躇不前的矛盾心理從而說明，即使在1961年令人難受的經歷之后，在1962年及其以后的一整段時間里，黨內仍然存在支持“大躍進”式政策的強有力的思潮。

鑒于“大躍進”釀成的問題很嚴重，而毛澤東仍然能夠使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樣的秘密會議的結局朝一定方向發展，這件事本身便表明了對毛固有威信的尊重。它反映了1949年后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無與倫比的地位。與其他執政的共產黨不同，中國共產黨設立了第一書記（或總書記）和主席兩個有區別的職務。前一職務是黨組織等級制度的一個重要部分，后一職務則在這一等級制度之外和之上。主席的職務的正式權限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連續的幾種黨章中逐漸形成的，但其實際權力則來源于任職者的才干，這個任職者實際上被看成哲學家首領。在毛同事的眼中，他被概念化地當成了中國革命本身。而人民則認為，毛可能犯嚴重錯誤，因而可能試圖通過官僚主義的手段損害他所創始的事業，但沒有人有勇氣（或膽量）直接就毛對當時形勢和黨的重要工作的根本評價提出疑問。總之，對毛澤東的權力沒有有效的制度上的限制，當毛認為受到挑戰或威脅時，他很熟練地運用了這一優勢。

遺憾的是，能夠得到的七千人大會的文件不足以具體說明會上辯論的動態或最后達成一致意見的詳情。結果似乎是，會議留下了許多只得到部分解決的問題。實際上，會議設法處理的主要爭端，在此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整整幾年里繼續在領導人之中引起不和與關系緊張。這些爭論有如下述。右傾分子的平反：這次會議達成的折中意見是，同意許多人應當調回，但彭德懷和某些其他主要右傾分子應當掛起來。對當前形勢的估計：這次會議并沒有取得能保持一兩個月的一致意見。毛澤東似乎硬讓會議采取了一種適度的樂觀的看法，但幾乎隨即受到挑戰，仍然成為引起爭論的問題。整黨：完成重建有紀律的、能迅速作出反應的黨組織的必不可少的工作雖然在這次會議上有某些進展，但是怎樣才能最好的完成這項工作的爭論將繼續引起領導人之間的不和。因此，1962年1—2月的會議標志著一種無把握的轉變——從1961年的失望朝著1962年及其以后更積極地努力引導事態發展的方向的轉變。雖然這次會議反映了北京再次準備開始采取主動行動這一事實，但是也透露出了前此三年的創傷引起的中央領導內的分歧。

這些思想方面的裂隙在財政部預算的壓力下開裂得更寬了一點。陳云正好在1962年2月的七千人大會以后得到這個預算。按照當時的規劃和項目，中央政府當年得面臨20億到30億元的財政赤字。陳云對財政赤字引起的通貨膨脹壓力一直是敏感的，他準備了一份涉及面很廣的報告，以憂郁的措辭預測總的形勢，要求適當改變計劃，包括按比例大大降低上月討論過的生產指標。陳云擔心食物狀況惡化，建議采取緊急措施額外增加魚和大豆的供應。他還極力主張，不利的農業形勢需要修改新近通過的恢復計劃。這種狀況將限定1962—1965年這段時間為恢復時期，在恢復時期精力仍將集中在農業生產方面，冶金和機器制造工業的發展必須加以抑制。

由于毛在武漢，劉少奇負責政治局的日常事務。他召集西樓會議討論陳的意見，會議是2月21—23日在北京的一座建筑物西樓召開的。西樓會議強烈地支持陳的冷靜的估計，這一估計總的來說似乎都和劉本人在最近結束的七千人大會上描述的圖景相近。此外，劉和鄧小平在西樓都贊成農業中的各種“個人責任”制（事實上是部分地分散），這些辦法曾經在像安徽那樣的受到沉重打擊的省份試行。這種支持反映了對農業情況到這次會議召開時為止仍未“翻身”的看法。李先念在西樓也承認劉少奇對最近國家財政工作的批評是正確的。

西樓會議決定召開國務院各黨的核心小組會議討論這一新的估計。它們在2月26日開會，熱烈支持陳的分析，并把會議結果提交書記處。劉少奇力請書記處把陳的報告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文件并附上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批注意見分發。因為有人（未指名）反對所提出的文件的基調，劉、鄧和周到武漢向毛報告文件的內容和背景。據說毛贊成分發文件。在這以后，陳讓中央財經小組討論這份文件和一份也反映了陳的意見的有關的商業工作的報告。

中央財經小組開會以后，由周恩來負責這個重要的機構。據說，陳由于有病不得不從日常事務中退下來，不過他顯然還是一個不出面的有影響的顧問。[[19]](#_19_Liu_Shao_Qi_Yu_1966Nian__Gon)冶金部拒絕接受陳的分析，仍舊提出較高的鋼鐵指標——到1970年安排2500萬到3000萬噸——以之作為新的五年計劃的核心。陳與此不同，強調恢復時期之后需要平衡發展。1962年初夏，周恩來召集六個中央局的書記，與政治局委員一道集中討論陳的意見，周把陳的意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規劃的正確框架予以推薦。柯慶施——來自上海的毛主義的忠實擁護者，在1958年的土高爐運動中他是一個主要人物——反對周的見解，理由是總理敘述形勢特點的措辭比七千人大會的用語要壞得多。周反擊說，預算赤字是在會議結束以后才獲悉的，是它們導致了這次修正。周的發言因而分發給范圍更廣的人，這顯然壓倒了柯的強烈的反對。

因此，1962年上半年對于形勢出現了兩種大不相同的估計。毛澤東至少受到某些地方官員、軍隊方面的林彪和重工業部門的人的支持，[[20]](#_20_Dui_Mao_De_Zhi_Chi_Wu_Yi_Ye)認為國家正在順利恢復的路上前進，因而為了使中國進一步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開始發揮主動精神的時間已經來到。因此毛反對農業方面進一步非集體化，反對在其他領域，如文化領域走回頭路。毛對蘇聯革命的發展的沉思促使他對中國這幾個月的發展趨勢感到擔心，但是總的來說，從1962年2月至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中國中部的半退隱的生活中度過的。

相反，劉少奇、鄧小平、陳云等人在2月晚期，斷定形勢仍然極端嚴重，在北京真正能夠再次采取主動行動之前，必須有一個有效的恢復時期。嚴酷的農村形勢需要正式承認農民的投機活動和那種稱為“單干”的分散形式，以對農民的物質利益作出更大的讓步。社會風紀普遍不良需要政府在精神食糧方面向大眾的愛好讓步，允許上演舊的歌劇、話劇和創作少談革命政治問題而偏重傳統的受歡迎的主題和人物的其他作品。令人失望的經濟形勢也需要政府勸說以前的資本家和有專門技術的知識分子積極努力以恢復城市經濟。因此，當毛認為總的形勢允許重新作出努力以推動國家再次向他的社會主義理想前進時，他的許多同事卻遲疑不決。他們認為，在可以實行更積極的策略之前，政府應當后退得更遠一些，并在制度上培養其復蘇的能力。

#### 北戴河會議和十中全會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21]](#_21_Zhe_Ci_Gong_Zuo_Hui_Yi_Yu_8Y)上，這兩種看法之間的沖突發生了。劉少奇及與他志同道合的人在參加這次會議之前，曾經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積極貫徹陳云對中國形勢的分析中的政策內容。因此，舉例來說，他們于2月在廣州召開了全國科學和技術工作會議，一個月以后又在同一城市召開了全國戲曲創作會議。兩個會議都試圖向與會的黨外人士的愛好讓步，以求得他們的支持。到了8月初，一個相關的農村短篇小說會議又在大連舉行。其間，鄧小平召開了一次書記處會議，審查關于“單干”的材料，他在會上發表了他后來的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的就是好貓。”當然，前文已經列舉的圍繞陳云評價的一系列事件正在展開。

毛澤東是以另外一種心情對待這次會議的。他顯然越來越感到自己在決策的主流中處境孤立，盡管中央委員會的文件在公布之前仍需得到他的簽署。據說毛曾經停止參加1958年1月的政治局會議。[[22]](#_22___Du_Mai_Xin_Wen_____1981Nia)最初，這也許反映他在“大躍進”開始時得到了更自由地作出決定的權力；或者這也許是他真正想退居“二線”以使他的同事取得更高威望的努力的一個方面。但是時間久了，這很可能對他產生了另外一種意義，使他日益感到自己被他的同事所孤立和怠慢。毛于1962年的確為了在組織中重新樹立自己而開始尋求辦法，而1962—1965年這一時期政治領域最令人關心的一個方面就是組成聯盟，這一聯盟將使上了年紀的黨主席在1966年獲得支配地位。

主席的這種尋求正和三個重要人物——江青、林彪和康生——各自的政治野心的擴張相吻合。其他的人則留在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上，間或起重要的作用。陳伯達——他總是毛主義的效忠者——愿意促進任何可能增強他的保護人的作用的行動。汪東興——毛從前的警衛人員——專注于拜占庭帝國宮廷式的安全方面。周恩來在政治競爭中謹慎從事，他的行事對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一直保持公開。但在1966年的緊要關頭，周斷然靠近毛的一邊，使主席能夠完成必要的聯合以發動“文化大革命”。

但是，由于毛面臨1962年夏季晚些時候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他還得制定他的挑戰的步驟或他的策略。他深為七千人大會以來這幾個月的事件所苦惱，可是，在北戴河會議的頭幾天還要懊惱地聽著報告。最受尊敬的老元帥之一的朱德要求在農業中擴大個人責任制，提倡使他和劉、鄧對農村問題的評價完全一致的其他措施。陳云重申了他對農村情況和工作的見解。其他政治局委員在主要的爭論領域作了報告，[[23]](#_23_Dang_Shi_Zhi_Shi_Zheng_Zhi_J)但遺憾的是，得不到有關他們發言的時間安排或內容的資料。時間安排是重要的，因為毛在8月9日向大會發表講話時用了極為尖刻的挖苦話，以致他的講話很可能嚴重地影響了整個會議進程的氣氛。

毛激烈地抨擊了財政部，財政部的有預算赤字的計劃為陳云2月的報告和隨之而來的一切提供了基礎。然后他強調中國仍然面臨需要階級斗爭這一事實，他顯然認為，從社會主義的政策不斷后退簡直就是增加這個領域的危險。他直接抨擊在農業中采用個人責任制，號召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整頓農業地區的黨組織。他警告要防止資本主義甚至封建主義在中國復辟的可能性。江青后來透露，她曾經向主席做工作，使他對1959年以來文藝的“墮落”保持警惕；毛在北戴河會議的講話中強調需要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她的挑動從中得到了反映。[[24]](#_24_Luo_Ke_Shan__Wei_Te_Ke____Ji)

毛因而成功地扭轉了議程，結果是，議程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他自己主張的頭等大事。他威嚴地出席這些中央秘密會議，他的意見很容易被接受，他也在這些會議上充分利用了他的政治影響。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至少在某些方面顯然對主席的頭等大事提出了異議，因為劉后來解釋說他在北戴河曾經“右傾”，而且在9月24—27日召開的十中全會以前沒有著手改正自己的錯誤。結果是在多少加深了的政治緊張氣氛中，拼合成了一個折中的方案。

十中全會透露了北戴河會議上激化了的所有分裂和矛盾。毛主持這次會議，他向與會者的演說把蘇聯變質和階級斗爭在未來幾十年中仍將在中國存在這一事實緊密聯系起來。但是，在這次會議上，毛被劉和其他的人說服，明確了不應當讓階級斗爭的爭論壓倒十中全會作出的其他政策決定，1959年廬山八中全會以后就曾經發生這種情況。[[25]](#_25___Ren_Min_Ri_Bao_____1982Nia)

毛對階級斗爭的全面關心反映了他更為根本的擔憂，即中國革命正在向“修正主義”的道路滑下去。好嘲笑人的人可能會說，對毛來說，凡是他不喜歡的任何事物都是“修正主義”，但是把這個詞貶低到這樣的水平實際上將使人產生誤解。毛很想領導革命沿著集體主義和相對的平等主義的道路前進。他總的說來不信任根基在于城市的官僚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盡管他的許多具體政策建議具有剝削農村來發展以城市為基地的工業的效果，但他似乎仍然真心誠意地認為自己是中國貧苦農民的代表。雖然毛相信技術進步的功效，不過他仍然不相信促成技術發展所不可缺少的高度文明及其載體。

由于“大躍進”的悲劇性后果，到了1962年，毛不再堅持動員群眾能夠恢復國家的生產能力的主張。因此毛繼續屈從于黨企圖充分利用物質刺激和專門技能以穩定局面的要求。但是到了十中全會時，毛也決定劃出界線。他堅決反對農業生產中的分散化，堅決要保持住公社（或在那些已被放棄的地區恢復公社）。他還認為，現行政策將增強他最不信任的社會中的那一部分人——在農村，是從前的地主、富農；在城市，是從前的資本家、技術專家和知識分子——的力量。他也擔心，一段時間的正常狀態將使許多中層干部中滋生出懶惰的官僚主義傾向，他們在過去就極易染上這種惡習。因此，毛要求采取措施將政治討論引入工作日程（但不中斷正常工作）。他還加強了負責處理那些滑向反革命的人的機構——公安部和中國共產黨的監察委員會。

十中全會在理論上接受了毛的全面分析，但在它的具體條款中保留了1961—1962年期間為了從“大躍進”中恢復過來而擬定的辦法。由此而產生的折中公報，有些段落重復了毛的語言，另外一些段落插進了劉、鄧和陳提出的理論。據傳劉少奇、李先念、鄧子恢和習仲勛在這次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這證實達成這一折中方案是不容易的。這次會議仍然感到為難的一個次要論題是彭德懷事件。如前所述，彭為了為他的徹底平反提供根據，寫出并傳播了為自己辯護的八萬字的報告。毛遲疑不決，只同意將來給彭分派某種低級別的工作。主席認為只有那些充分承認了他們的錯誤的人才能平反——顯然不愿意承認，在彭的案件中錯誤的是毛。

許多中國和西方的史料編纂著作把1963—1965年這段時間描述成兩條路線斗爭的時期，一方面是毛主義陣營，另一方面是一個劉鄧司令部。然而實際情況并不如此簡單。幫助毛于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那批人由不同的分子組成，他們由于不同的原因而結合在一起。因此，需要弄清這些年的一個重要方面：毛主義聯盟的不同組成部分是怎樣形成的，以及每個部分是怎樣影響這個時期的政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當毛開始既要努力對付他可能的聯盟伙伴，又要努力對付劉少奇及其同事所實行的政策時，他自己思想的發展情況。兩個重要的聯盟集團以林彪和江青為首。分析了這兩個聯盟集團以后，我們再轉而分析毛直接對付1963—1965年期間劉及其伙伴的主要政策性倡議的努力。

## 林彪地位的提高

林彪于1959年9月成為國防部長以后，面臨兩項工作。一項是鞏固他在人民解放軍中的地位，另一項是穩固他和毛澤東的關系，并幫助毛增強他自己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力量。林為了完成這兩項互相關聯的工作實行了一種復雜的策略，最終使他處于幫助毛發動并維持“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地位。

林通過恢復黨的軍事委員會的突出地位，開始了他對人民解放軍的改革。這個機構在彭德懷任職的整個時期名義上存在，但實際上它的作用似乎因彭和毛日漸疏遠而減弱了。林使軍事委員會重新活躍起來，任命中國10個元帥中的7人（不包括彭德懷和據說在1959年支持彭的朱德）為常務委員。

關于軍事委員會的組成情況所知甚少，因為中國從未公布它的委員的全部名單和工作人員的詳情。[[26]](#_26_Zai_Di_Er_Shou_Wen_Xian_Zhon)不過，在1976年以前，所有確定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的人都是在職軍人，唯一例外是它的主席毛澤東。軍事委員會是黨的一個正式機構，是黨借以對專職軍人實行監督的行使領導權的工具。事實上，黨的領導人如周恩來，在軍事委員會的重要會議上發表過講話。但是，這個機構日常工作的領導權一般屬于國防部。既然毛是唯一能被確定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文職人員，設立這個機構的真正目的似乎就是在軍事決策中給予中國共產黨的主席[[27]](#_27_Zai_Deng_Xiao_Ping_Yu_Hua_Gu)一個特殊的地位。因此，使軍事委員會重新活躍起來也許應當更準確地看成是重新維護毛和現役軍事部隊的緊密聯系。

林不但把軍事委員推到了舞臺中央，他還進行了人事上的更動以保證他對國防部的控制。他任職的當時就很快解除了7名在職副部長中的3名，并任命了6名他自己的新的副部長。據說，他實際上對中國的高級指揮部做了一次清掃，把從前的7個部門改組成3個，任命那些看來會擁護他的人負責每個部門（包括羅瑞卿，在廬山攤牌以前他是公安機關的負責人）。部內的這些人事變動可能和軍事委員會的重新活躍有聯系：國防部的所有高級職務由軍事委員會正式委派。

如前所述，林在此前后開始在軍隊中強調運用毛澤東思想。人民解放軍中其他的許多人不同意這種觀點，但林把這當做他國防部長任內的中心裝飾品。林的觀點在1960年9—10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結束時成為官方政策。這正好發生在《毛澤東選集》第4卷出版的時候。無論這兩件事在計劃和實施方面有無聯系，林的方針使他進一步得到了煩惱日漸增多的毛主席的喜愛，則是沒有多少疑問的。

實際上，普及特定領導人的著作被看成是重要的政治問題，這突出地表現在出版劉少奇的選集和陳云的論文集（1962年都在編輯）的計劃上。兩者都未出版，據說是因為劉本人反對發表他的著作，而毛實質上把陳的書擱置了起來。[[28]](#_28_Guan_Yu_Liu_Shao_Qi__Jian)在劉1959年4月從毛那里接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務以后，毛和劉的相關的待遇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

其后，林彪連續地采取主動步驟以提高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事務中的作用。他開始迅速地增加軍隊中的黨員人數，也許是由于這將在全國的共產黨事務中給他以更大的發言權。此外，在1963—1965年期間，他在某些方面模糊了黨和軍隊之間的界線，成功地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組織方面的責任。在這幾年中，好幾個軍區的領導人在緊接“大躍進”之后成立的六個中央局的五個局中當了書記。同時，至少有一半省黨委第一書記在軍區成了政治委員，使他們至少是部分地置身于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的指揮系統之中。這種在黨和軍隊中的雙重任職，在理論上曾經用來增強黨對人民解放軍的控制，但經驗表明，實際效果正好相反。實質上，這些都是人民解放軍增強它相對于黨的力量的奪權措施。隸屬于林的人民解放軍也加強了它對平民百姓的控制。毛在1962年命令在軍隊監督下成立民兵，執行這項命令增強了軍隊和非軍事部門的聯系。

既然軍隊有這些功能，毛日益強調人民解放軍是能夠把政治和專門知識成功地結合起來的模范組織——用當時的術語來說，能夠又紅又專。因為就在這幾年，林在軍隊中加強了專業訓練和紀律，而且軍隊正在領導研制中國原子彈的工作。1962年10月人民解放軍還在和印度的短暫邊界戰爭中表現良好，因此提高了它的威望和聲譽。

1963年，人民解放軍樹立了幾個政治上忠誠的正面典型，包括一個在一次偶然事故中犧牲的無私的戰士雷鋒和一個突出的連隊南京路上好八連。1963年11月，繼號召人民效法這些軍隊模范之后，毛全面號召人民“向人民解放軍學習”，既然黨被認為是一切智慧的源泉，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口號。在主席的眼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問題實質上表明了政府管理工作不夠充分，而“大躍進”的災難又大大損害了中國共產黨的聲譽。因此，毛開始把軍隊當做能夠使優秀的政治素質與他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必需的技術一組織專業知識協調發展的模范的機構。

毛很快從號召向人民解放軍學習發展到更直接地采取措施以增強軍隊在政府和黨內的影響。1964年，遵照毛的指示，政府單位在單位內部成立了政治部門——隨后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機構也如此。這些部門以軍隊內部的政治組織為榜樣，不少工作人員不是學過軍隊為此目的而開設的訓練課程，就是本人是新近復員的軍人。這些部門從未牢固地建立——部分地由于政府內和黨內的抵制，部分地由于它們不能明確規定它們的任務，部分地由于在誰將充當其工作人員的問題上不斷有小的爭論。但是，整個這一套做法再次反映了人民解放軍對黨和政府采取的日益擴張的態度——而毛支持這種發展趨勢。

1965年5月，林彪采取了在人民解放軍中取消所有軍銜的不尋常措施。這一主動行動再次使軍隊顯得在政治上是最“先進的”，因為只有它在把革命的平等主義的理想付諸實施。此外，從政治勢力的觀點看，這種措施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增強林在人民解放軍內的權力。從本質上看，這意味著從前軍官的權力現在只能從他實際從事的工作中得來。他不再擁有其本身能夠給予某些權利和特殊待遇的軍銜。既然林在軍隊內占有行使權力的最高職位，其余8個元帥（羅榮桓于1963年去世）和全體軍官本身的獨立自主的權力必將多多少少地被這個措施所削弱。

1965年，人民解放軍還直接控制了公安部隊。原公安部長、在公安機關中有牢固聯系的羅瑞卿，這時是人民解放軍的總參謀長。如我們后來將要看到的那樣，林彪于1965年12月對羅榮桓采取敵對態度，到1966年5月將羅清洗并加以毀謗。清洗的一個結果是使林處于能夠引導公安機關（全國權力最大的機構之一）的力量去支持毛和林自己的更有利的位置。“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似乎他就很好地利用了這種力量。[[29]](#_29_Ru_Xia_Wen_Suo_Shu__Guan_Yu)

但是，和羅瑞卿的沖突不光表現在控制公安力量這個問題上。1965年這一年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來說是很不利的。春季周恩來曾希望組織一次采取反蘇路線的亞非會議，但這個努力失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試圖對8—9月的印度—巴基斯坦戰爭的結果施加影響，卻沒有成功，而蘇聯最終證明能夠在那場沖突中起建設性的調解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精心培養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當其于1965年9月支持一次失敗了的反對軍方的政變企圖時，終于招致災難。所有這些失算在北京產生了一種日漸增強的受到孤立和圍困的感覺，正在這個時候，美國又開始大大加強它在越南的卷入，從而出現了美國在不久的將來直接進攻中國南部的可能性。

在這種令人擔憂的國際環境中，北京的領導人就抉擇和策略問題展開爭論。羅瑞卿似乎更愿意謀求和蘇聯建立較好的關系——以在越南共同努力與美國戰斗為基礎——以求減輕中國所受的一些壓力。羅推薦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蘇聯策略——突出發展常規部隊，以便完全在國門之外與敵人交戰。這個策略從而又要求中國最大限度地增加與軍事有關的重工業的產量，將力爭高效率的工業生產作為最優先的目標。既然這個策略有其后勤方面的要求，它也意味著中國城市將作為這項工作的重要生產基地，而蘇聯的幫助將可用來補中華人民共和國薄弱的工業基礎之不足。

相反，林彪認為，越南應當基本上自己作戰，中國予以間接支持但不直接介入。他稱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策略，這個策略要求誘敵深入國土，然后通過游擊戰術把它拖垮。這又需要：疏散工業，以地區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政策，強調民兵和非常規部隊而不是正規軍的作用，在民眾中激發高度的政治熱情。這在策略上并不需要——而且實際上反對——恢復和赫魯曉夫后的蘇聯領導的友好關系。林把他的論點和毛的語錄緊緊聯結在一起，他提倡的這種策略和主席優先選用的一整系列國內、國外政策和軍事政策巧妙地互相呼應。劉少奇和鄧小平似乎反對其中的許多部分。

因此，在樹立林在軍隊中的地位并增強人民解放軍相對于黨和政府的作用的同時，林也小心謹慎地樹立毛，努力在組織系統中支持主席所選擇的政策。一般來說，軍隊中對毛的信仰全面地提高了主席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的確，從1964年開始，為軍隊使用而編輯出版的毛的語錄書被分發給模范青年以獎勵他們的成就。在更具體的問題方面，如林在關于越南的涉及面很廣的建議中所闡述的那樣，他自己還直接卷入毛和劉、鄧等人的越來越容易發生問題的關系中。林的主要目的有時候看來的確是要加劇毛和他的政治局同事之間的緊張關系。

例如，在正式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的1959年9月的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林對彭和彭的錯誤性質的抨擊遠比毛的抨擊嚴厲。林在力圖鞏固他新近獲得的職位的同時，堅持彭實際上難以挽救，而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華。林的職務最后由毛批準，從而更在毛主席和比較同情彭的其他政治局委員之間打進了一個楔子。在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會上，當為總結中國經濟處境困難的原因而發生爭論時，林迅即為毛（及“大躍進”本身）辯護。林不但有力地支持毛和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而且他還號召所有與會者學習毛澤東思想。雖然缺乏文獻材料以詳細說明林在黨的杰出人物出席的其他會議上所起的作用，但他似乎很可能不斷地作過努力，以樹立毛主席的威信，并惡化毛和其他領導人的關系。例如1966年5月，林含糊地提到反對毛的政變的可能性和毛保護自己免遭那種危險的必要性。

這些活動表明，林彪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他在1959年就任國防部長后立即制定了一整套明確的政治策略。這個策略，除了打算完全地鞏固他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以外，還把他和毛的命運聯結在一起，而當時“大躍進”的災難性后果導致了一種需要，即靠林運用他的力量以增強毛在組織中的地位。總之，林的主動性說明他不只是一個受毛操縱的人，相反，當他的利益和毛的利益一致時，他似乎也努力防止毛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之間的關系的任何改善。當然，林在這種努力中最有成效的工作是什么，大概仍然只有少數幾個參與者本人才知道。

應當提到，毛澤東從未完全成為林彪的主動行動的俘虜。舉例來說，如別的地方提到的，在1964年的東京灣事件之后，毛看出越南戰爭可能逐步升級，從而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越來越大的威脅。作為對策，毛中斷了原有的第三個五年計劃策略，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把主要投資資源用于在中國西南偏遠的內地以建設“三線”工業。毛設立以余秋里為領導人的非正式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這個新策略。這一機構基本上由70年代被叫做“石油幫”的那些人組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它并入并接替了正式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這個機構提出的方案和林彪用來對付越南問題的方案是相同的。但是毛選定了林的仇人彭德懷負責以四川為基地的建設“三線”的指揮部。

#### 文化：江青

為發動“文化大革命”而形成的聯盟的第二個主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及其在文化領域拼湊起來的一批人。實際上，1966年2月當林彪委托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并讓她擔任軍隊的正式文化顧問時，林和江無疑已經勾結起來了。這第一次給了江一個據以實現她的政治目的的正式職務。[[30]](#_30_50Nian_Dai_Chu_Qi_Jiang_Qing)但是，江得到林的這一幫助只是由于她在此之前的幾年里曾經作出很大努力以培養她自己在文化領域的才干并爭取到了她的丈夫對她的觀點的支持。

對于文化政策應當向什么方向發展，江青長期以來有固定的看法；在同樣長的時間里，她也僧恨共產黨的文化當局疏遠她。江青到延安并得到毛澤東的歡心時，她取代了毛的得人心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賀是參加長征的極少數婦女之一，受過極大的苦。毛的同事們得到毛的同意，如果他們不反對毛讓江取代賀成為他的妻子，他將讓江青置身于政治之外。

即使是在延安，江青也曾提倡發展新型的革命文藝節目，在那些年代里她在發展革命戲劇方面是很積極的。她是一個非常靈巧、機敏而心懷奢望的女人，顯然深切地感受到男性統治的文化和宣傳機器對她的強行排斥。1949年以后，江青仍然處于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地位，部分地由于她的持續的健康情況問題，部分地由于文化當局不愿意聽從她或在組織系統中給她一個正式職位。但是，江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毛的不拘禮儀的政治上的知心女友。例如，1959年7月當毛告知她廬山會議上出現了麻煩時，她便飛到了廬山。毛那時不要她來，但顯然沒有阻止她參與其事，實際上毛從會上把她叫來，是要和她商量他對彭的異議的對策。

1959年，江青的健康情況似乎開始好轉，當她的身體健康有了更大保證時，她參與政治和文化事務的勁頭也增加了。廬山會議以后江到上海休養，她在那里的時候到過許多劇院。她對演出的內容感到吃驚，發現“舊”的主題和形式非常流行，認為應當予以糾正。江開始逐漸拼湊一幫人，他們將幫助她實現她的對京劇以及中國文化其他方面的革命化計劃。

對于江青的嘗試，毛當然是重要的，她自己聲稱，到了1962年她已經說服毛必須注意文化領域。實際上，毛于1962年春季指示她為中央委員會的文化政策起草了一份政策報告。江的努力為毛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發出的提倡“無產階級文化”的號召提供了某些基本情況。但是，江的表明見解的文件在1966年5月以前并沒有變成官方政策，1966年5月，她的這份作了重要修訂的文件草案成了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文件之一。

#### 江青和康生

江青發現有兩個在革命以前的歲月里就與她有聯系的人在利益方面和她是天然一致的，他們是康生和柯慶施。康生是山東省諸城人，與江是同鄉。在江青去延安以前他們兩人便彼此相識。康生專門從事三個方面的工作：和其他共產黨聯絡、公安和高等教育。他們之所以走到一起，是由于康生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蘇聯向內務人民委員會學習公安工作的要點時，顯然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受過相當深的訓練，以及他正卷進了與修正主義和反革命的爭端之中。

50年代以前康生曾在公安事務中負重要責任，當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非斯大林化的報告時，他因而受到了某種責備。1956年9月康生從政治局正式委員的地位下降，與此同時，黨刪去了列入中國共產黨章程的毛澤東思想是指導思想的一部分的字句。但是，到60年代初期，事情向著可能有利于康生的方向發展。隨著中蘇爭端達到緊急階段，毛——他仍然是中國方面處理爭端的主要人物——需要一個有康生這種知識的理論家幫助他草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抨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文章。同時，康生聽說——可能通過他和江青的長期友誼關系——毛正打算竭力推動中國文化的無產階級化。康生能夠在這個嘗試中起有益的作用，如果他能把這個嘗試和反革命活動聯系起來從而為他的參與提供根據，就更加如此。

康生在1962年9月的十中全會上實現了這種聯系，他在會上對習仲勛發動攻擊，因為后者與關于劉志丹的一部據稱是反革命小說的寫作過程有牽連，劉志丹是陜西共產黨早期游擊戰的戰士，死于1936年。康生聲稱關于劉的這部小說實際上是誹謗毛，認為為了當前政治批評的目的而利用小說是一個發明。他因而和江青建立了一種思想上的聯系，江青正試圖促使毛注意前此數年她在知識分子的著作中所發現的對毛的政治上的攻擊。

康生隨后充當了江青和一些過激的知識分子之間的橋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把這些過激的知識分子帶到了前臺。康生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使他得以插手主要的教育單位，并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培植骨干分子。后來弄清楚，這些人當中最突出的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關鋒和戚本禹、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聶元梓以及高級黨校的幾個人。[[31]](#_31___Zheng_Ming_____Xiang_Gang)康生和林彪一樣，如果必要，便樂于挑起糾紛以達到他的目的。例如，康在高級黨校攻擊楊獻珍的“合二而一”理論是對毛主席哲學上的前提“一分為二”的否定，是反毛主義的。康通過這種理論上的欺詐設法清洗楊，以增強他在高級黨校的追隨者的權勢。到1964年年中，康本人還深深地卷入了江青使京劇革命化的工作。[[32]](#_32___Zheng_Ming_____Xiang_Gang)

上海市長柯慶施是江青的老朋友。柯在1958年曾經是叫嚷得最兇的“大躍進”（特別是土高爐運動）的支持者之一。1958年春季他成為政治局委員，而上海成了躍進策略的主要受益城市。[[33]](#_33_Jian_Ke_Li_Si_Tuo_Fu__Hao_De)如前所述，甚至在1962年年中柯仍舊支持對當時局勢的毛主義的說明，反對陳云等人的比較悲觀的看法。因此，柯慶施和康生、林彪以及江青一樣，當然要盡力支持毛澤東的立場。

1962年后期，康生和柯慶施談到必須讓文藝刻畫1949年以來的13年中從人民行列中涌現出來的英雄，這是一條與江青本人的思想非常合拍的路線。柯在“大躍進”時期早已站在上海“工人作家”一邊反對專業作家。[[34]](#_34_Jian_La_Ge_Wa_Er_De_De_Lun_W)1963年1月，柯在上海就提出了要求，號召當地的知識分子拋棄舊的節目，采取十中全會階級斗爭的觀點，上演刻畫1949年后工人、農民、士兵行列中的英雄的新戲劇。毛澤東不久就予以支持，而把文化部叫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

1959年，江青在文化事務上和柯慶施在上海有過聯系，60年代初期她始終在這個問題上和他保持接觸（柯死于1965年）。江通過柯聯系上了張春橋（他在上海的文化機關工作）和姚文元（上海的評論家）。而姚又已和上海新近發展起來的“無產階級作家”——50年代拿起筆的工人——建立了很好的關系。[[35]](#_35_Tong_Shang_Shu__Di_309__323Y)

因此，江青在60年代初期對她丈夫做了工作，并開始拼湊她自己的主張進行一次中國文化“革命化”的小集團。文化部、教育部和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部都有江青的老對手，不重視她，而且嘲笑她的工作。在處理文化問題的幾次全國性會議諸如1964年6—7月的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上，沖突發生了。江青已在上海發展她自己的樣板戲，并通過毛澤東繼續施加壓力以革新提供給人民的精神食糧。最后，大約在1964年6月，黨的書記處成立了五人小組以協調文化改革。彭真負責這個小組，人們可以想象到，毛認為彭有可能代替劉少奇作黨主席的接班人。但是，康生是小組成員，非常明顯，康忠于毛澤東和江青，而不是劉少奇或鄧小平。

對于江青來說，五人小組證明是障礙而不是在文化政策中進行積極改革的力量。小組一般聽從北京文化機關（在小組中，由中國共產黨宣傳部的負責人陸定一代表）的選擇。江為了把她在文化和政治領域的優先事項列入國家議事日程，繼續尋求其他途徑。她所采取的手段——最后證明對全國政治有極大影響——圍繞著康生1962年在十中全會上掀起的爭端而施展，即小說和戲劇可以用于政治目的。江特別指出吳晗寫的劇本《海瑞罷官》。這部劇本寫一個面對政敵不公正的攻擊的明代官員的正直行動，而江向毛證明，這部劇本實際上等于暗中為彭德懷辯護。江的具體指責似乎講得通，但很可能是錯誤的——吳晗開始寫有關海瑞的劇本是在廬山會議以前，而且他是應毛澤東當時的秘書之一胡喬木的專門要求而寫的。[[36]](#_36_Guan_Yu_Zhe_Ge_Wen_Ti_De_Zao)然而在1965年越來越充滿懷疑的氣氛中，江說服毛讓姚文元寫了一篇批判文章，抨擊這部被假定為影射了政治問題的劇本。

1965年11月發表的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很重要，這有三個原因。它把文化改革的爭論看做政治的而不是純學術的問題，因而使當局有可能再次開展一場針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政治運動。它抨擊彭真的下級和朋友所寫的劇本，因而對彭真是一個考驗：他是保護吳晗還是站在毛的一邊。[[37]](#_37_Shi_Ji_Shang__Peng_Zhen_Lian)它來自上海（毛當時住在那里），體現了毛的決定，即北京的領導人已遠遠離開毛所提出的論點，毛將不得不主要依靠中央政治機構以外的力量著手抨擊他們。江青的小集團為這一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力量。

但是，江青到1965年為止除了與康生聯系外，所接觸的都是激進的知識分子和在組織系統中級別較低的人。因此，當江加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聯盟時，她招納了一些對1949年以后發展起來的官僚政治準則和做法抱反感的人。這是些有主意的人，而不是有組織才能的人。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們自己將證明，他們長于出主意而不適合做組織工作。

江青的聯盟包括康生，這一事實對于60年代的政治是重要的。康生是無情的，他毫不猶豫地消滅那些妨礙他的人。1962年及其以后，康走向政治舞臺中心，這使他能指望利用彭德懷事件的嚴酷性（它破壞了從前黨內斗爭準則），促使黨的領袖們完全改變政治爭論中的相互對待方式。跟隨江青的激進知識分子從未受過這些黨內準則的鍛煉，因而很容易參與完全違背以前的常規的行為。張春橋是60年代中期這個集團里唯一具有廣泛做官經歷——除了秘密的治安工作以外——的人。不必奇怪，張也是這個集團中對需要維持秩序、樹立威信以及當這個集團取得政權時確保官僚政治基礎等事項最容易產生共鳴的人。

總之，江青想改變中國文化，想對她在文化當局的陸定一和其他領導人手下所忍受的多年怠慢進行報復。她的聯盟包括了那些樂于進行無情斗爭以破壞黨的制度的人。林彪在進行官僚政治的角逐中則更加小心謹慎，這場角逐可能導致他取代劉少奇做毛澤東的接班人。為此林要利用江青的破壞性力量（以及她挑起毛最強烈沖動的能力），因此，如上所述，林在1966年2月通過委任江當軍隊的文化顧問而和她結成聯盟。江后來便用這個職位作為講壇，從那里向那些反對她的文化觀點的人進行廣泛攻擊，而不管那些人和軍隊有無關系。

## 整風

現在讓我們把注意力的中心從毛澤東最后的合作者們移到他本人。到了1962年，毛認為革命同時受到了頂層和基層政治組織的反對力量的威脅。在頂層，毛認為他的同事們要繼續實行的政策只能增強社會上反共產黨勢力的實力。在基層，毛認識到“大躍進”給基層黨組織造成的損害，特別是在農村，是巨大的。他決定，如哈里·哈丁所述，用整風運動來克服這兩個問題。[[38]](#_38_Ha_Li__Ha_Ding____Chuang_Jia)整風實際上可使毛下令設立新的分等級的臨時機構，這種機構將用來對付原有機構，以解決問題。對于毛，它是一種用來增強他在組織系統中的影響的理想工具。

毛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和9月的十中全會上強調需要整風。關于整風的必要性，沒有出現什么爭論，但隨后的事件證明對于利用什么機構卻有重大爭論。農村整風的試驗已于十中全會后在選定的點上進行，試驗結果為農村整風——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早期綱領性文件提供了基礎。

毛本人在1963年2月和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在起草這份文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制訂的《前十條》要求成立“貧下中農協會”，作為對犯錯誤的基層干部實行監督的組織。后來證明，這種做法的問題在于貧下中農在“大躍進”時期也深受痛苦，到了1963年，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要么大失所望，要么腐化了。當這種情況在這一年中變得顯而易見時，鄧小平和彭真制訂了新的措施（《后十條》），并于1963年9月予以公布。

《后十條》承認“貧下中農協會”中的問題，提出了更嚴格的入會標準。更為重要的是，擬訂這份文件的前提是，這些協會本來就不能適當地監督公社和大隊的委員會。因此它要求成立以城市為基礎的工作隊來開展這次整風運動。它進一步主張這些工作隊在處理基層干部的問題之前應當首先處理省、地、縣各級的間題。既然這些較高級的機構位于城市，因而文件提出發動城市“五反運動”以整頓較高級的機構，為在基層貫徹工作打下適當的基礎。[[39]](#_39_Bu_Yao_Ba_Zhe_Ci__Wu_Fan_Yun)結果這些改變使農民的協會實質上處于無重要工作可做的狀態。整風完全變成了黨內的事情。但是，毛澤東把動員非黨群眾看成是對整風過程的有利因素之一，他于1964年6月指出，他擔心這次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沒有充分地把貧下中農發動起來。

在1964年開頭的一段時間里，高級干部下基層開展對當地情況的調查研究工作。這種獲取資料的辦法溯源于延安時期的工作方式，反映了領導人知道不能依靠正常渠道上來的報告這一實際情況。因此，舉例來說，劉少奇到河南省去了18天——河南省在“大躍進”時是一個樣板，在這個運動結束時處于危險的狀態。劉的妻子王光美則用假名在靠近她的家鄉城市天津的桃源大隊住了5個月。

劉少奇的調查結果使他對于農村地區的情況深感悲觀。調查結果證明，腐化現象很普遍，不少基層干部反對黨（農民反對黨的也占不小的比例）。當他們考察歸來時，他們認為反革命力量控制了中國農村不小的部分，需要采取嚴厲的措施以挽救局面。毛澤東很可能同意這種判斷——但他隨后強烈地不同意所采取的措施，后來又強烈地不同意所采取的矯正措施。

1964年9月擬訂的《后十條》修正草案反映了劉少奇對整風運動的看法。修正草案要求組成大的工作隊下到選定的公社，實際上把公社接管過來，從根本上動搖它，以便予以整頓。一個工作隊在一個地點大約停留6個月，嚴厲地處理那些被發現的已經變得怠惰和腐化的干部。與此同時，這些工作隊還將在農村公社進行新的階級劃分——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以后第一次進行了這種工作。按照《后十條》修正草案的日程，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將在全國用5至6年的時間完成。

毛澤東對于實施《后十條》修正草案有三點意見：第一，修正草案把抨擊的目標從修正主義縮小到了貪污腐化。第二，修正草案給予干部的處罰過于嚴厲。第三，修正草案導致強迫公社接受龐大的工作隊，而不是動員群眾自己去開展運動。總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被曲解到了這樣的程度，它不再是宣傳毛關于修正主義的看法的手段，而是已經成了相對來說粗暴地在農村黨組織中重新強化紀律的一種嘗試。

毛澤東對于這些傾向作出的反應是，通過他自己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綱領性文件來取得主動權。1965年1月公布的毛的《二十三條》重新確定了運動的方向，以便它能成為對各級黨組織進行有關修正主義罪惡的普遍教育的運動。在農村地區，這意味著撤回工作隊，許多被工作隊嚴厲懲處的從前的干部恢復了工作——免去了接替他們的人的職務。這簡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擴大了干部隊伍的分裂。

因此，毛利用整風作為在社會上推行他的政治議程的手段的努力，證明只是部分地成功了。當毛從1964年開始試圖通過在政府和黨的機構內設立政治部以使他的政治見解能更快地被接受時，掌權的官僚機構證明它們有能力保護自己處理自己組織事務的權力。《后十條》修正草案是嚴厲的，但其辦法還是使整風問題保持在黨內，防止大規模地利用非黨群眾來整頓中國共產黨。但是，正是毛對中國共產黨內政策方向的日益擔憂——這種擔憂是江青、康生和林彪（與陳伯達等人一道）培養起來的——使得毛越來越堅決地要增強他對這個核心政治組織的影響。

#### 變化中的毛澤東

毛本人并沒有江青那種耿耿于懷的個人的屈辱感，也沒有理由相信他在60年代后期（如果那時如此）以前，對林彪作為他的接班人的想法完全感到稱心如意。[[40]](#_40_Shi_Ji_Shang__Dang_1966Nian)事實上，在1963—1965年，毛澤東似乎不太認真地考慮過樹立彭真作為他的接班人以取代劉少奇。因此，如上文提到的，毛漸漸介入了共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聯盟，但是他與他們當中無論哪個人的目標和看法都不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毛自己又是怎樣得出結論必須對他在政治局中的同事發動正面攻擊呢？

要理解毛在1959—1966年這關鍵幾年心理上的發展變化，有三個因素似乎是極為重要的：他對中國革命可能向什么方向發展的理解有變化；他對接班人問題不斷關心；以及與此相關的他對死亡正在逼近的意識。所有這一切在某種程度上糾結起來，加深了毛的憂慮——他畢生工作導致的政治制度到頭來將偏離他的理想，并證明和它所取代的政治制度同樣是剝削性質的。

毛澤東對革命前途的擔心和他逐漸形成的關于蘇聯政治制度變質的分析是分不開的。的確，毛在他的一生中用了不少時間與中國共產黨內所受的蘇聯影響作斗爭，在思想實質和作風兩個方面他都是中國領導人中最少蘇聯味的。在50年代中期，毛曾經作出協調一致的努力以使中國離開蘇聯發展模式，從1958年開始，他把軍隊和軍事學說也包括在這一努力中。在1959年以前毛已經認為蘇聯領導人常常專橫傲慢，并對中國情況缺乏了解，而在1959年以后他開始深思這樣的問題：蘇聯革命本身是否從根本上誤入了歧途，改變了它的性質。

實際上，當蘇聯開始試圖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聲稱它本身的革命時代已經結束，并謀求和美國達成更穩定的和解時，毛澤東開始懷疑，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勝利是否能保證資本主義不會在那個社會里復辟。許多事情促成了這種思想上的變化。毛認為，他看出了赫魯曉夫1958年試圖對中國海軍施加影響，還看出了赫魯曉夫另外一個企圖，即通過取消核援助的協議和1959年與彭德懷共謀來干預中國事務。在那一年，毛還看到：赫魯曉夫宣稱蘇聯已經成為“全民國家”，而不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41]](#_41_Tong_Guo_Ba_Su_Lian_Jiao_Zuo)他在美國的戴維營最高級會談及與此有關的與西方和平共處的努力；在1959年北京與新德里的邊界緊張局勢中莫斯科表面上中立；以及1960年年中蘇聯從中國撤走顧問。這些只不過是幾個例子。

毛澤東出于這種新的憂慮，開始用一段時間學習蘇聯的政治經濟學，他斷定，在這個重要的理論領域甚至斯大林也造成了某些根本性的錯誤。毛指示中國代表團就有爭議的論點和蘇聯人辯論，而蘇聯的反應更增加了他的憂慮。江青注意到蘇聯顧問于1960年迅速撤走曾使毛“震驚”，[[42]](#_42_Wei_Te_Ke____Jiang_Qing_Tong)他可能從那時起就斷定，為了使蘇維埃制度回到堅實的基礎上，最低限度赫魯曉夫本人必須被取而代之。蘇聯領導不肯罷免赫魯曉夫大大加深了毛的憂慮。

和赫魯曉夫在1958年后的幾次會議上進行過斗爭之后，毛澤東于1963年決定，是將論戰公之于眾的時候了。在這個意識形態的重要方面，他的政治局同事們顯然不能拒絕他的領導。因此，在1963—1964年，毛指導寫了九篇論戰文章，每一篇在中國都廣為宣傳。如上所述，在寫這些文章時毛利用了康生的才能，當時康生已經在國內文化競技場上專注于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

回顧起來，毛似乎是利用九篇論戰文章作為在國內宣傳他的政治觀點的手段。這些論戰文章提出了毛實際上與他在政治局的同事們不同的所有論點，同時又把毛的政治觀點與那時正在進行的反蘇斗爭等同起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同毛對“修正主義”的政治批判的這種聯系，證明是一種有效的結合——事實上很有效，以致后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讓中國的宣傳工具攻擊劉少奇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但是，在這種處理方法中，除了精明的策略外，還有人的悲劇。沒有理由懷疑毛自己不相信他所說的關于蘇聯革命變質的話。顯然他可能認為同樣的力量也正在中國發展，在中國，他的同事們現在主張（如他們在1956年主張的那樣）階級斗爭應當包攝于極為重要的生產斗爭之中。如果允許這種傾向繼續下去，年輕一代將不可避免地和修正主義觀點一道成長。歷史到頭來無疑將證明對毛是無情的，就像斯大林死后對斯大林那樣。毛是一個對中國歷史具有敏銳意識的人，在1965年他把自己和祖國最偉大的皇帝作了比較。他這時可能看到一種可能性，即把他當作事實上將國家引入歧途的人來回憶。同樣不安的是，毛留給中國的遺產可能是一種剝削他所熱愛的農村并和帝國主義勾結的政治制度。因此，當毛在60年代前半期看到中國國內的趨勢時，他對蘇聯革命演變的看法更加深信不疑了。[[43]](#_43_Fu_Dai_Shuo_Ming__1964Nian_1)

毛澤東在中國政治活動程序中所起作用的變化也促成了他的緊迫感。如前所述，據說他曾停止按時出席1958年1月的政治局會議。[[44]](#_44_Zai_Zhe_Ge_Ri_Qi_Yi_Hou__Mao)在這之后，他仍然收到政治局審議的報告，所有用中央委員會名義發出的文件在作為正式文件發布之前他還得批準它們。[[45]](#_45_Zheng_Zhi_Ju_Fa_Chu_De_Wen_J)但是，同樣的限制顯然不適用于以鄧小平為首的黨的書記處所發出的文件，書記處在60年代前半期制定政策的程序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如前所述，毛后來抱怨說，1959年以后，鄧在政策問題上不和他商量。雖然這一抱怨很可能為了加強效果而被夸大，但不滿情緒無疑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不再按時參加政治局會議，但這事實上卻標志著他對政治體制比以前任何時候更起支配作用的時期的開始。毛當時也表示，他希望讓出他作為國家元首的職務，以便他能專心致志于革命發展的重大問題。因此，毛于1958年在黨和國家兩個方面，都設法使自己更處于左右一切的地位，牢固地控制著重要的政策的方向，與此同時，又將他信賴的人安排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在1958—1959年，劉少奇、鄧小平和林彪獲得更大的職權反映了貫徹這個策略的情況。

但是，在“大躍進”失敗以后，毛澤東在1962年發覺他不再能夠完全控制政策的基本方向。劉少奇和鄧少平這時似乎反而限制他接近政治主流，曲解他的指示（例如關于整風的指示）的意義。因此，毛在1958—1959年想退居“第二線”，但因這種做法的內涵在“大躍進”之后起了變化而灰心喪氣。毛因而開始考查他所推薦的接班人，以便斷定他們能否維護他認為對革命前途至關重要的總方針。毛越考查越證明他們（林彪除外）不合適。

毛澤東優先考慮的事和他的接班人優先考慮的事越來越不一致，其核心問題在于他們從“大躍進”汲取的教訓各不相同。如上所述，毛認識到動員群眾對于迅速發展經濟不是主要的。但是與此同時，毛保留了他對動員群眾作為更新意識形態、改革社會和整風的手段的信念。但是，動員群眾并不是北京的中央各部能夠予以落實的政策。相反，就其根本性質來說，動員群眾依賴的是中國共產黨內多面手的技能，而不是技術專家，并且需要容忍充分地下放權力，容許這個策略必然引起的靈活性。因此，動員群眾在某種程度上本來就是一種反知識的和反官僚主義的方法，雖然不完全摧毀中央集權的、專家控制的政治制度也能實現這個目的。

劉少奇和他的同事們從“大躍進”得出結論，中國已經發展到動員群眾不再是政策的有用工具的程度。由于1962年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處于危險狀態，他們認為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將對經濟的控制重新置于中央各部和各委員會的專家之手，必須作出相應的努力以重建能將中央和基層聯系起來的有紀律的黨和國家的機構。重要政治運動所具有的“高潮”政治只能破壞他們正在作出的盡力解救惡劣形勢的努力。運動的方法在延安和50年代初期曾經對中國共產黨很有用處，但是它不再適合于60年代的錯綜復雜的管理國家的工作。

毛澤東通過一系列措施試圖使整個制度回頭注意他自己優先考慮的事情。有些措施，如利用整風運動在組織體系中恢復動員群眾的方法，前文已予詳述。除了這些以外，毛還在不同的領域內時常提出優先選擇的具體政策，其效果是抨擊了劉、鄧面向城市和看重技術的策略的前提。在文化方面，毛受到他的妻子和康生的鼓動，要求作家和藝術家下到基層，以便通過和普通人，特別是和農村人生活在一起以體驗生活。在醫藥方面，他對衛生部進行了一系列抨擊，要求國家最好的醫生離開城市到農村地區行醫。[[46]](#_46_Xiang_Qing_Jian_Dai_Wei__Lan)在教育方面，他主張精簡課程，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應用科學而不是理論研究，以及體力勞動與大學課程有效地相互結合。毛也希望修改學校課本，以便更好地顧及本地的需要和情況。[[47]](#_47_Xiang_Qing_Jian_Xi_Bo_Er_De)在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的提議對于北京有關的部的職能部門所實行的管理來說，都將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毛澤東還反對在組織國家專業化公司以管理主要經濟部門的方案中所體現的經濟上的集中化和專業化。毛把這些公司叫做“托拉斯”，力主以更大程度的行政區自給自足取而代之。如前所述，這個辦法又和1965年毛為了對付美國在越南的威脅逐級上升而提出的戰略巧妙地聯系在一起。[[48]](#_48_Guan_Yu_Tuo_La_Si__Jian_An_F)

毛澤東的主張的效果實際上在所有領域多半是相同的。在每一種情況下，劉少奇等人總是接受毛對現行政策批評的總的矛頭所向，采取某些措施以實現毛的想法。但是，這些措施還是遠遠達不到毛所想的那種激烈的制度調整。結果是，毛越來越認為他的同事們控制的是一個官僚主義的龐然大物，它吞噬了他的迫切要求，使它們變質成為一種很難影響制度的基本功能和傾向的無關痛癢的改良。

最后，毛對這些問題的憂慮在1964—1965年迅速加深，因為，如我們可以獲悉的他的講話和接見所表明的那樣，他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死亡上。從1964年開始，他多次講了“去見馬克思”以及任何人都必然要死的話。1965年早期他在接見安德烈·馬爾羅時也以一種令人吃驚的方式透露出這種擔心。雖然不可能確切地知道毛這時的精神狀態，但似乎有理由像羅伯特·利夫頓那樣推測，毛日益明白他有形的生命行將結束，明白他和他所開創的革命事業的命運在根本上的一致性。換句話說，毛認為他只有通過他所領導的革命沿著正確的道路繼續下去，他才能不朽，[[49]](#_49_Luo_Bo_Te__Li_Fu_Dun____Ge_M)但是當毛環顧周圍時，他所看到的是他挑選的接班人的修正主義對這一事業造成的破壞。毛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負擔因而變得如此沉重，以致他終于認為不得不對他曾經耗費畢生精力所締造的黨發動一場粗暴的正面攻擊。

#### 延安領導的分裂

以上的分析集中于那些歸攏在一起而觸發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種種不同因素。相對來說，還很少談到這個重要運動的對象。關于1962—1965年的政策和發展情況可以寫得很多，這是一個恢復經濟和在許多有關經濟領域的政策制定方面取得顯著成就的時期。但是，這一分析的經濟方面歸入另外一章；在政治方面，看來領導們是在努力重建1956年晚期已經發展起來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中，明確地劃分了責任，有權力的書記處能滿足政治局各方面的要求，政府的行政管理范圍很廣，使用涉及面很廣的國務院委員會以防止這個體制因按照職能而變得四分五裂，等等。[[50]](#_50_1965Nian_Shi__Guo_Wu_Yuan_Ge)

看來這個體制的領導者們自己并不認為他們是在走向和毛澤東的較量。他們仍然尊敬他，努力遷就他的那些很可能他們認為多少是帶錯了方向的政策要求。但是他們難以克制地關心著國家在“大躍進”以后如何重新站穩腳跟，以及他們在處理中國的社會問題時如何重新獲得主動權。在這方面，如前所述，他們不同意毛對1962年——可能包括這時以后——的形勢所作的比較樂觀的估計。而且他們肯定意識到了毛未來的結盟伙伴得以實現其野心的潛在危險。因此，如已指出的那樣，他們努力限制解放軍對其他機構的滲透，試圖使江青不能掌握文化領域的權力。遺憾的是，可以用來具體說明限制康生權勢增大的措施——如果有這樣的措施的話——的資料太少。

的確，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時期的信息，我們大多得自1966—1976年的論戰性的文獻材料（也常常得自幾乎具有同樣偏見的1976年以后的材料），因此我們務必記住有關這八年歷史中的存疑問題。未知的主要問題和有重大疑問的領域如下：

第一，并未參加“文化大革命”結盟的各個領導成員對毛澤東和他這些年優先考慮的政策的看法如何？“文化大革命”期間提供的記載幾乎全是反面的，但是也是有高度選擇性的。例如，當宣傳機關據說試圖縮小毛的優先考慮的事項的重要性時，事實上當時的官方宣傳工具卻極力突出對毛的崇拜和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同樣，雖然有一系列的跡象表明，在這個時期后半期的大部分時間里毛澤東特意提升彭真，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期間所能獲得的所有引用彭的話卻都是他指責毛的衛生政策、江青改革京戲的嘗試，等等。的確，在實質性的爭端上，劉少奇周圍的領袖們看來總是試圖反駁毛，而不只是遷就他（盡管可以理解，他們對江青不那么容忍，對康生[[51]](#_51_Li_Ru__Wang_Jia_Xiang_Zu_Zhi)和林彪更是留神）。因此，到了1964年前后，毛可能在他自己的頭腦里已經開始相當嚴重地曲解了事實，他的妻子等人煽起了他的疑心，他們希望利用領導機關的重新安排而得到益處。雖然劉及其同事們在優先考慮的事項和方法上無疑和毛的意見不完全相同，但毛變化中的精神狀態和對他的死的擔心卻可能使他把那種正常的政策爭論改變成道德上的善惡勢力之間的斗爭。

第二，遺憾的是這段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公安機關和毛澤東的警衛部隊的作用——還向公眾嚴加封鎖，不予透露。如前所述，康生和羅瑞卿兩人在公安系統中曾經是關鍵人物。當羅在廬山會議后離開公安部到解放軍時，公安部由謝富治接任，謝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又青云直上，成為政治上的有力人物。謝于1966—1967年迅速提升，這表明公安部在導致“文化大革命”的沖突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卻不能得知詳情。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前領導人楊尚昆在1966年被正式清洗，據說他在毛的私人住所安裝竊聽器。楊一離職，毛本人的警衛部隊（8341師，該師也為其他高級領導人提供保護）在毛的長期警衛人員汪東興的領導下很快便接過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原來的職能。同一部隊在“文化大革命”中還負責拘留高級領導人。但是在1966年以前的年代里，關于汪東興及整個警衛機構的任務，其具體情況卻知道得很少。

第三，周恩來的作用仍然不很清楚，盡管周在所有這些年里都保持了高大的形象。周的全部經歷表明，在1962—1965年的政策問題上他可能傾向于劉少奇的選擇，可是在1966年夏季、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來說，周的支持證明是至關重要的。周在1966年的表現因而使人們對他前幾年的真正作用提出了問題。周本人是否開始想要取代劉少奇做毛的接班人？如果是這樣，周是否暗地里促成毛不信任他的同事？也許周只是遵循慣例，在任何最后的較量中他都支持毛，雖然他可能試圖削弱某些他所不同意的毛的有關政策方面的抨擊。遺憾的是，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以致于有關他的不同的假設將成為對關系重大的這幾年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釋的依據，而把不同解釋區別開來的不可或缺的資料正在消失。

總之，盡管所有這些年份已經過去，資料已可到手，但是對“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時期仍然是頂多只能部分地了解，而且在未來的若干時間里還將如此。既然“穩健派”有可能對文獻作出貢獻，許多情況還可以進行綜合，但是這些補充的資料仍將留下大量令人不安的缺漏。不過，在目前所能弄清楚的情況的基礎上，對“是什么導致延安領導的分裂”這一問題的答案是明確的，它有三個結合起來的因素：從“大躍進”災難性的后果中汲取的不同教訓；由毛澤東的繼任人選問題產生的緊張關系，這個問題在1958年以后總是排在議事日程上；以及一個上了年紀而且肯定越來越衰老的領導人的日益增長的憂慮。可是，使我們得以判斷這些因素各自的相對重要性和影響力的資料欠缺得太多了。

[[1]](#_1_6)因為得不到這份自白的全文文本，很遺憾，不可能確定這一自我批評的特點是徹底的還是敷衍了事的。

[[2]](#_2_6)標準的集市區域包括傳統地在同一定期市場上買賣貨物的一些村子。這些區域既有經濟的同一性，又有社會的同一性，如婚姻關系經常是在同一集市區域的不同村子的農民之間發生。見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667]，載《亞洲研究雜志》[361]（1964年11月、1965年2月和1965年5月）。中央委員會1961年6月的一項決議命令公社縮小到以前鄉或聯合鄉的規模，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235]，第306頁。

[[3]](#_3_6)“大躍進”的經濟策略將在本書第八章中分析。

[[4]](#_4_6)劉在1945年已正式得到這種應允，但可能還不足以使他具有1958—1959年時的充分自信。

[[5]](#_5_6)譯者按：原文如此。

[[6]](#_6_6)關于這一時期的中蘇關系，見本書艾倫·惠廷所寫的第十一章。

[[7]](#_7_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507]，第258頁。

[[8]](#_8_6)據彭德懷后來回憶，7月的廬山會議進行時，他很記掛西藏問題。《彭德懷自述》[570]，第267頁。

[[9]](#_9_6)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204—206頁。

[[10]](#_10_6)關于彭德懷在審問下對廬山的回憶和在中國公布的這封信的唯一的審定文本，見《彭德懷自述》[570]，第265—287頁。

[[11]](#_11_6)對于涉及張聞天作為主要策劃者的情節，麥克法夸爾提出了有力的證據，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204—206頁。

[[12]](#_12_6)至于他們四人為什么被叫做“軍事集團”，幾年后彭德懷仍然表示迷惑。除了彭否認存在任何集團以外，四人中的兩人也和軍隊沒有聯系。但是彭回憶說，毀損他名譽的人極端堅決地給他們貼上這個標簽。見《彭德懷自述》[570]，第278—279頁。

[[13]](#_13_6)有些人，如鄧小平和陳云由于不同的原因未出席廬山會議。

[[14]](#_14_6)由于毛澤東日益意識到安全受到美國的威脅，事實上彭德懷于1965年被選定去領導中國西南部的“三線”開發工作。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彭的工作。彭被傳喚到北京，受到紅衛兵的批判、鞭打和監禁，直至1974年去世。

[[15]](#_15_6)數字引自馬洪的一篇論文，載《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9日，第5版，英譯文載《外國廣播新聞處》[250]，1982年1月8日，第11—12頁。馬洪沒有指出他的百分數是怎樣計算出來的，他可能利用了每年的總產值。

[[16]](#_16_6)從1959到1961年，中國人口總量下降1350萬。“超額”死亡的數字自然遠高于此數。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年》，第81頁。進一步的論述見本書第八章，[參見此處](#_29_Tong_Shang_Shu__40__Di_1398Y)和[參見此處](#_30_He_Bing_Di____1368__1953Nian)。

[[17]](#_17_6)安奉俊（音）：《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革命》[2]，第47頁。

[[18]](#_18_6)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不同機構的明確規定的任務還不清楚。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似乎承擔起草這些文件的總責。但是涉及的主要個人，包括薄一波、周揚、陸定一（到1962年為止）和陳云，他們自己并不在書記處工作。書記處顯然聯系一批機構，包括與之有關系的國務院的部門，以制定上述政策。國務院在起草這些文件過程中的作用仍不清楚。當然，這些政策一旦被政治局認可，國務院便予以貫徹。

[[19]](#_19_6)劉少奇于1966年“供認”，1962年時他過分受陳的看法的影響。陳似乎也出席了1962年9月的十中全會，雖然“文化大革命”以前沒有他公開露面的其他報道。

[[20]](#_20_6)對毛的支持無疑也來自其他的人，如農業方面的譚震林，但是缺少證實這一點的參考文件。

[[21]](#_21_6)這次工作會議于8月6日開始，繼續到這個月的后期。這類夏季的中央工作會議不只是事務會議，盡管它們在擬定政策方面是極端重要的。除此之外，它們還是社交聚會，常常有夫人伴隨，有文娛晚會，有時間到附近旅行和消遣。主要領導人可能趕不上參加會議的重要部分，大概就閱讀一下會議速記記錄以了解審議的事情。因此，會議似乎常常拖延一兩個月，甚至可能像這里的會議那樣進行到一定程度時轉移地點。這些會議當時一般不報道，因而常常不可能確定開始和結束的準確日期。

[[22]](#_22_6)《讀賣新聞》，1981年1月25日，英譯文載《外國廣播新聞處》[250]/《中華人民共和國》，附件，1981年3月13日，第7頁。

[[23]](#_23_6)當時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陳伯達作農業報告；李先念作商業報告；李富春（可能和薄一波一道）作工業和計劃報告；陳毅作國際形勢報告；劉少奇也向會議發表了講話。

[[24]](#_24_6)羅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797]，第304—305頁。威特克把這次講話的日期定在8月6日，而其他的文獻資料則定在本書正文采用的日期8月9日。

[[25]](#_25_6)《人民日報》，1982年1月15日，第5版，英譯文載《外國廣播新聞處》[250]，25（1982年1月），K22。毛演說的部分原文見《中國的法律與政府》[136]，1.4（1968—1969年冬季），第85—93頁。

[[26]](#_26_6)在第二手文獻中可以見到的對軍事委員會的最完整的說明是哈維·內爾森的《中國的軍事制度》[549]。

[[27]](#_27_6)在鄧小平于華國鋒任職時停止這一慣例以前，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依據職權也是軍事委員會的主席。

[[28]](#_28_6)關于劉少奇，見《人民日報》，1982年1月15日，英譯文載《外國廣播新聞處》[250]/《中華人民共和國》，1982年1月25日，K19—22。關于陳云，見鄧力群《向陳云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707]，第8—9頁。

[[29]](#_29_6)如下文所述，關于公安機關，康生也起了重要作用。

[[30]](#_30_6)50年代初期江青曾擔任文化事務方面的一個不重要職務。

[[31]](#_31_6)《爭鳴》（香港），34（1980年8月），第45頁。

[[32]](#_32_6)《爭鳴》（香港），34（1980年8月），第45頁。

[[33]](#_33_6)見克里斯托弗·豪的論文.載克里斯托弗·豪編《上海：一個亞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發展》[310]，第173—179頁。

[[34]](#_34_6)見拉格瓦爾德的論文，載豪編《上海：一個亞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發展》[310].第316頁。

[[35]](#_35_6)同上書.第309—323頁。

[[36]](#_36_6)關于這個問題的早期的考察，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207—212頁。

[[37]](#_37_6)實際上，彭真兩條路都走不通。他要是保護吳晗（如他后來試圖做的那樣），他將因這種行動而使自己容易受到責難。但是，要是他攻擊吳晗，他也會因承認讓一個反毛主義的分子在他自己的北京市政府獲得高級職務而削弱了自己。由于這一事件對彭真的前途可能產生的消極作用，人們希望對姚文元文章的真實背景知道得更多一些。

[[38]](#_38_6)哈里·哈丁：《創建中的中國》[291]，第196頁。

[[39]](#_39_6)不要把這次“五反運動”和在1952年初期達到高潮的同名運動混淆了，見本書第二章。

[[40]](#_40_6)實際上，當1966年毛對林彪的信賴達于頂點時，據說他曾寫信給江青表示他對林彪不信任。

[[41]](#_41_6)通過把蘇聯叫做“全民國家”，赫魯曉夫指出，在蘇聯剝削階級已被消滅，階級斗爭已經結束。對比之下，“無產階級專政”是當權的共產黨用來進行反對剝削階級殘余的階級斗爭的專政形式。

[[42]](#_42_6)威特克：《江青同志》[797]，第304頁。

[[43]](#_43_6)附帶說明，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之后蘇聯領導在與中國爭論的問題上并沒有改變莫斯科的立場，這一事實使毛澤東確認，是制度而不只是某一個人變了質。這有助于解釋，如前文所述，1965年春季毛澤東激烈反對羅瑞卿的建議，即中國與蘇聯合作以反對美國在越南逐級上升的行動。

[[44]](#_44_6)在這個日期以后，毛澤東只出席他要發表講話的政治局會議。在其他情況下，他靠聽匯報了解政治局會議上發生的事情。

[[45]](#_45_6)政治局發出的文件據說要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所以這一規定事實上使毛澤東能夠控制所有由政治局送出的正式文件。

[[46]](#_46_6)詳情見戴維·蘭普頓的《中國的醫藥政治》[417]，第129—192頁。

[[47]](#_47_6)詳情見西博爾德的《中國的革命教育》[649]，《導言》及第5—62頁。

[[48]](#_48_6)關于托拉斯，見安奉俊（音）的著作[2]，第139—144頁。

[[49]](#_49_6)羅伯特·利夫頓：《革命的不朽》[455]。

[[50]](#_50_6)1965年時，國務院各部和主要委員會的數目達到55個，與“大躍進”時期政府機構調整前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高峰期間的部委數目相同。

[[51]](#_51_6)例如，王稼祥阻止康生有充分機會接觸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的關系的資料，《工人日報》，1986年2月4日；英譯文載《外國廣播新聞處》[250]/《中華人民共和國》，1981年2月26日，L—9。

## 第八章 重壓下的中國經濟，1958—1965年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開始的時候，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教訓及其對中國正在逐漸形成的發展策略的影響，在中國共產黨內并沒有一致意見。1953年到1957年這幾年獲得了空前迅速的經濟發展，但是從1956年起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策略受到了嚴重的懷疑。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工業產量提高得更快，幾乎是農業的5倍。[[1]](#_1_An_Jing_Zeng_Zhi__Bu_Shi_Zong)農業的落后的成績使五年的人均糧食消費——卡路里總攝入量的約90%的來源——的增長低于3%，而且大大限制了工業消費品的發展，因為工業消費品的發展嚴重依賴農業部類的原料供應。

從規劃制定者的觀點看，1954年以后他們無論以實物稅的形式還是用固定價格征購的辦法，能夠從農村得到的糧食的絕對數量都連續下降，這甚至比生產發展緩慢的情況更為嚴重。1956年下半年重新開放農村民間集市增加了完成收購定額的困難。盡管民間集市的交易應當限于次要產品并且不能有按計劃應出售給國家的產品，但集市經營的范圍還是迅速擴大到包括糧食、油料籽和棉花。

國家和集市之間的競爭是如此激烈，致使國務院由于面臨1957年夏季出現的糧食短缺，于8月頒布條例禁止在農村集市上出售糧食、食用植物油籽和棉花（都受到向國家交售定額的限制）。但是，在1957糧食年度（到1958年6月30日為止）內，國家收購的谷物數量下降到略低于1956年的水平，仍然少于1954年或1955年，這表明對集市貿易的禁令未被廣泛實施，農民能夠拒絕把谷物交給國家。

國家控制的糧食數量在下降，但需求卻增加了不少。完全由國家負責供應糧食的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特別是在1956年。此外，在1957年，中國在和其最大的一個貿易伙伴蘇聯的貿易中第一次不得不保持出超。中國對蘇聯的出口幾乎全是農產品、礦物和其他原料，因此維持這種出超對國家控制的農業資源提出了額外需求。盡管1957年需要的最初的出超額不大，大約是1.3億美元，但蘇聯拒絕答應中國1957年提出的在1955年到期的貸款之外再行貸款的要求，這意味著以前的貸款到期時，在以后幾年將增加所需的農業出口余額。[[2]](#_2_Guo_Jia_Tong_Ji_Ju____Zhong_G)

最后，圍繞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最重要的爭論問題是提高中國農業增長率的前景。總理周恩來、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人李富春、財政部長李先念、關心經濟問題的政治局委員陳云和其他許多人的穩健的看法是，農業生產的增長率能夠增加一些，但這要求增加分配給農業的國家投資資金的份額，并增加分配給化肥工業和某些類型的農業機械制造業的投資。這種體現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提案中的看法，含蓄地否定了進一步改革農業生產單位的體制能夠為更迅速的發展提供基礎的論點。實際上，到1958年年初，農業發展與意愿相反，在集體化以后越來越明顯地慢下來了。例如，糧食產量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三年每年增加4%以上，但在后兩年，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變得普遍以后每年都低于3%。[[3]](#_3_Guo_Jia_Tong_Ji_Ju____Wei_Da)

毛澤東有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制定規劃的人在集體化的速度上，更廣泛地說在發展的速度上，特別是在工業發展的速度上，看法過于小心謹慎，因而他在1956年曾和這種看法進行斗爭。盡管當他的動員策略在1956年年中受到抑制時他似乎受了挫折，但他的基本觀點并沒有改變。他仍然傾向于相信，體制上的改革，尤其是當其與動員資源的運動結合起來時，能夠對更迅速的發展道路提供一個引人注目的突破。

如在本書第七章中指出的，毛澤東認為體現在擬議中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觀點是保守的，在1957年晚期和1958年早期這幾個月的時間里他展開了取而代之的努力。這種努力在1957年秋季的八屆三中全會上開始。毛在這次會議上談到了做事的兩種方法，“一種是慢差的辦法，另一種是快好的辦法”，[[4]](#_4_Luo_De_Li_Ke__Mai_Ke_Fa_Kua_E)并且反對給他1956年的動員運動所加上的約束。毛努力繞過計劃制定者對農業的比較謹慎的看法，在當時重新提出了在1956年被不聲不響地擱置下來的他的12年農業發展綱要。11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重新提出1956年躍進的口號：“多快好省”。[[5]](#_5_Tong_Shang_Shu__Di_17Ye)同月，毛在莫斯科宣布，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約在15年內將超過英國，[[6]](#_6_Bo_Yi_Bo____Chong_Jing_He_Hua)幾乎可以肯定，他這樣做事先并沒有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們商量。

當動員的口號和對12年綱要的討論恢復時，計劃制定者反應緩慢。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在1957年12月宣布的幾個五年計劃的指標，說起來實際上甚至可能比周恩來上一年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最初提出的還要謹慎些。例如，提出的糧食和棉花的指標按比例縮減了，糧食從2.5億公噸減至2.4億公噸，棉花從240萬公噸減至215萬公噸。因此，毛在1958年1月黨的重要的南寧會議上，直接批評了周恩來、陳云和李先念，因為他們實際上拒絕支持他提高生產指標的努力。

這一批評也沒有導致很大的變化。南寧會議結束后不久，薄一波將1958年年度計劃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1.96億公噸的糧食產量計劃水平意味著5.9%的增長率，并沒有大大超過5.4%的長期年增長率，后一增長率包含在上年12月李富春提出的規定1962年的糧食指標為2.4億公噸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7]](#_7_Bo_Yi_Bo____Guan_Yu_Yi_Jiu_Wu)

最后，1958年螺旋式上升的生產指標由毛澤東在早春于四川成都召開的一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地方黨委會委員的會議上提出。在這次會議上，毛慎重地贊成一個在河南省制定的宏偉的農業發展方案，這個方案除了其他內容外，還保證在一年之內使糧食產量翻番。但是，毛的慎重由于他自己鼓勵各省之間在提高谷物產量上互相競賽而被破壞了。

## “大躍進”的經濟策略

“大躍進”是以毛澤東對中國農業面臨的緊張狀況的誤解作為根據的。和1956—1957年其他方面顯示的跡象相反，毛仍然相信較大的農業生產單位可以導致有效的規模經營。他還相信，在農業經濟中動員現有資源，主要是勞力，將為更快發展提供一個突破口。

動員勞力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用于可以指望大幅度地提高農作物產量的水利和灌溉工程。盡管支持農業發展的國家資金的分配額有適度增加，但農業發展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本身的力量來實現。

“大躍進”策略的工業部分顯然不同。對體現“兩條腿走路”精神的“土高爐”和其他小規模工廠的方案給予了極大注意。但是工業方面的“大躍進”策略是以生產資料的大量投入為基礎，部分地以進口機器和設備為基礎。總之，工業化策略主要是進一步強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已很明顯的資本密集型的發展方式，而農業發展是以大規模的改革和動員策略為基礎。

這兩種策略在1958年交叉起來。一項空前的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計劃于1957—1958年的冬季在農村動工。這項工程反映出12年農業發展綱要恢復了活力，這個綱要越來越強調幾乎可以不要國家協助或提供資金而由集體單位在本地進行的小規模工程。薄一波報告說，到1958年1月為止，一億農民緊張的工作已成功地為780萬公頃土地提供了灌溉設施。[[8]](#_8_Bo_Yi_Bo____Guan_Yu_Yi_Jiu_Wu)到這一年年末，據稱已增加到3200萬公頃，比1957年9月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聯合下達指示時指標所規定的面積多十多倍。[[9]](#_9_Guo_Jia_Tong_Ji_Ju____Wei_Da)增加的數額據稱幾乎相當于總灌溉面積的兩倍。

為水利工程而大規模地動員勞力導致50年代后期農村的重要體制改革——成立人民公社。盡管農業生產合作社仍然是被認可的組織，但由于對水利運動的要求提高了，因此開始出現局部地、看來是自發地合并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現象。這種合并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被默認，導致合并的加速進行，最后大約在幾個月內出現人民公社。和1955—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樣，新的組織形式很快普及。到1958年末，99.1%的家庭都是公社成員。[[10]](#_10_Guo_Jia_Tong_Ji_Ju____Wei_Da)

公社有幾個顯著的特點：最重要的是，它們在地域上是廣闊的，并具有以前給予鄉一級政府的職能。最初每一個公社平均約有5500個農戶，大約是1955—1956年形成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規模的25倍。公社既負責戶口登記、稅收和治安，也負責籌辦某些公共事業，如小學和初級中學教育以及公共醫療事業。

第二，個人和集體都可做的事情明確地改由后者去做。私人的農業用地——供家庭消費和市場買賣的副食品，尤其是豬的主要來源——在公社制度下被取消。農村周期性的集市也普遍地被削減，進一步減少了從銷售手工業和其他家庭生產的產品中掙得現金收入的機會。其他許多與消費有關的活動如做飯、洗衣和撫養孩子，從家庭轉移到以公社為基礎，以便部分地把婦女從勞動中解放出來去參加農活。這些向集體化程度更高的活動的轉移導致普遍地把私人農具以及在較小范圍內把私人家庭財產充公。

第三，收入分配原則基本上改變。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內，純收入（總收入減去生產費用，各項稅收以及公益金與公積金）按照社員的勞動貢獻進行分配。對比之下，在公社內，純收入的大部分是以人頭作為基礎進行分配，這和這段時期宣傳公社具體體現了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分配原則發展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使是按照勞動貢獻分配的一小部分，現在也是以將勞動力分等并據以付酬的這樣一種制度為基礎進行分配。這一切做法都是為了急劇縮小公社內的收入差別。

隨著公社化運動，同時出現了大量增加糧食產量的想法。實際上取代鄧子恢成為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部領導人的譚震林在1958年8月報告說，創紀錄的夏糧已經收獲，谷類年度產量至少可以達到2.4億公噸，也許多達3億公噸。[[11]](#_11_Mai_Ke_Fa_Kua_Er____Wen_Hua)到了12月，在八屆六中全會的公報上公布的1958年糧食產量是3.75億公噸，為1957年1.85億公噸水平的兩倍。這個數字在1959年4月的國家統計局的公報上得到證實。

造成這些極不真實的數字的原因有：1958年頭幾個月以來農業中明顯地出現了運動氣氛；中國共產黨增強了權力，尤其是公社一級的中國共產黨委員會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以及統計制度普遍混亂。由于基層統計資料的收集工作和監督制度遭到破壞，又有來自上面的要求匯報引人注目的突破產量事跡的強大壓力，公社一級的政治干部便呈報高度夸大了的產量數字，這些數字的準確性未經認真核驗便又上報各級行政機關。這些材料在北京剛一匯總出來就被接受，借以證實毛澤東對農業發展速度可能引人注目地加快的判斷是正確的（至少初期是如此）。

承認這些關于農業產量的數據在幾個方面有較大影響。它為提高投資增長速度和大幅度加快工業發展提供了動力。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最終相信，為不斷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夠口糧這個老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有可能緩和對當前非農業人口增長的限制。

此外，產量激增將大大增加產量和農業地區口糧消費水平之間的余額，為大幅度加快籌措投資資金提供了基礎，這些資金大部分將用來支持工業投資。農村繁榮的假象也使人們設想能成功地在實行公社食堂的同時實行公社的供給制。最后，把浮夸的產量報道當做現實來接受導致錯誤地縮小谷類作物的播種面積，這是一項促成食物大量短缺的政策。

#### “大躍進”中的工業

1958年提高鋼鐵產量指標可以作為例子說明“大躍進”在工業方面的發展情況。1958年2月薄一波提出的最初指標是620萬公噸，比上一年535萬公噸高19%。[[12]](#_12_Bo_Yi_Bo____Guan_Yu_Yi_Jiu_W)三個月后政治局把指標提高到800萬—850萬公噸，而到8月，緊跟著對1958年可能的農業收成的較高估計，毛澤東說服政治局贊成1070萬公噸的指標。[[13]](#_13_Mai_Ke_Fa_Kua_Er____Wen_Hua)在幾個星期之內毛又提出1200萬公噸的高指標。

在整個1958年中，資本投資指標也同樣提高。年初提出的145.77億元指標——比1957年的投資預算額略多22億元——很快被更具雄心的目標代替。[[14]](#_14_Bo_Yi_Bo____Guan_Yu_Yi_Jiu_W)最后，國有單位的投資達到386億元，幾乎是1957年水平的兩倍。[[15]](#_15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盡管小型工業是投資趨向的非常明顯的部分，但絕大部分增加的數額都被引入了中型和大型的國家企業。在1958、1959和1960年，開辦的這類企業（這三年分別是1587、1361和1815個），年年都超過了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所開辦的1384個大中型企業的數量。[[16]](#_16_Cui_Jie____Ji_Ben_Jian_She_D)例如，冶金部門開辦了157個大中型企業，煤炭部門61個，電力部門200個，化工部門85個，建筑材料部門80個，以及第一機械工業部所屬的180個。[[17]](#_17_Wu_Qun_Gan____Guan_Yu_Da_Yue)

隨著與投資趨向相聯系的建設項目的增多和鋼鐵、機械設備以及其他工業品產量的增加，非農業勞動力隨之也空前地增加了。國家單位的職工人數僅僅在1958年就幾乎增加了2100萬，和1957年相比增加了85%。1959年和1960年另外又增加了500萬。1960年結束時，國家單位就業的最高水平是5044萬，是1957年數字的兩倍多。[[18]](#_18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



地圖6 1949—1960年間的鐵路建設

現代部門勞動力的空前增加對國家實行糧食定量配給以及市場供應其他食品提出了不尋常的要求。盡管增加的許多勞動力要么是單身男子要么是把家屬留在農村地區的合同工和臨時工，但城市人口仍增加了3124萬，國家通過糧食定量配給制度供應糧食的人數增加了2800萬。[[19]](#_19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符合糧食定量配給條件的人口的比重在1957—1960年之間增加了1/3，從15%左右增加到20%左右，其中1958年增加了一半以上。[[20]](#_20_Xu_Di_Hua____Jing_Jian_Zhi_G)

投資的大量增加和城市人口的極大增長這兩者導致國家對農村人口提出了空前的糧食需求。1958年，公糧和義務交售給國家的糧食在1956年和1957年的平均數上增加了一千多萬公噸。1959年，收購達到了6740萬公噸的空前高額數字。此外，由于糧食產量與1957年相比降低了2500萬公噸，交售量等于總產量的39.7%。盡管有些糧食返銷給了農民消費者，但國家在1959年購買的糧食，扣除返銷的，占總產量的28%，大大高于1957年17%的凈收購率。[[21]](#_21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

最后，接受夸大了的糧食產量數字在1959年導致了該年農業計劃中巨大的計算錯誤。既然1958年糧食產量極大增加，計劃制訂者便決定縮減總播種面積，而給棉花、食用油籽以及其他非糧食作物分配稍高的份額。結果，1959年的總播種面積比1957年少10%，糧食播種面積下落13%。事實上，1959年的單位面積產量和1957年并沒有什么顯著差別，而總產量下降13%，約2500公噸。[[22]](#_22_La_Di____Zhong_Guo_Xian_Dai)

盡管1959年減少播種面積的錯誤在下一年被部分地扭轉了，但是總產量仍然繼續下降。產量的減少部分地是由于公社制度下造成的農業管理不善。最明顯的是，許多“大躍進”時期興辦的灌溉工程設計拙劣，結果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產量。這在華北平原上更是一點不假。在那里，不能提供適當的排水系統意味著灌溉將導致土壤含鹽量增加，因而降低產量。農業勞動力的大量減少反過來又影響農業產量。在1957—1960年間，非農業職工人數迅速增加的必然結果是農業勞動力減少了2291萬，下降10%還多。[[23]](#_23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最后，1960年的惡劣天氣也會進一步降低產量。最終的結果是：1960年糧食產量1.435億公噸，低于1957年的產量26%，是195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其他食用作物也遭受了災難性的減產。1960年的油料作物產量比1957年的產量少一半，比中國共產黨掌權后的任何其他年份都低。甘蔗和甜菜的產量陡然下降，到1962年可能降到1957年產量的1/3或更低的水平。到1962年，肉類產量只有1957年水平的一半。[[24]](#_24_Tong_Shang_Shu__Di_158Ye)

糧食產量的下降和分配制度方面的失誤導致了20世紀面積空前的饑荒。根據官方資料，死亡率在1956—1957年平均是11.1‰，1959年上升到14.6‰，1960年達到25.4‰的高峰。1961年的死亡率陡然降到14.2‰，但仍比1956—1957年的水平高出不少。1960年死亡人數大量增加，以致在這一個年頭中中國人口減少了1000萬。[[25]](#_25_Tong_Shang_Shu__Di_103__105Y)累計增加的死亡人數——除開預期的正常死亡數——估計有1600萬到2700萬。[[26]](#_26_Jiao_Xiao_De_Shu_Zi_Shi_Jian)這部分地是嬰兒死亡率急劇增加的結果。[[27]](#_27_Guang_Fan_Ren_Wei__Zhong_Guo)人口統計的最后結果比這些數字很可能要大得多，因為出生率從1956—1959年的平均33.0‰下降到了1961年的18‰的波谷。

就歷史時期的比較來說，這些資料表明，喪失的生命遠遠多于中國20世紀其他的歉收或自然災害時死亡的人數。20世紀中國的主要旱災饑荒于1900年、1920—1921年和1928—1930年發生在中國北部和西北部。1920—1921年的饑荒，就持續時間和地域兩方面說，可能是最嚴重的，至少使2000萬貧苦農民受到煎熬，但是經過政府和私人努力部分地得到了緩和，死亡人數估計不超過50萬。[[28]](#_28_Ma_Li__Ke_Lai_Er__Bei_Er_Re)在1928年波及河南、陜西和甘肅的大饑荒中，[[29]](#_29_Tong_Shang_Shu__40__Di_1398Y)死亡人數要多得多，超過200萬。和1920—1921年的饑荒相比，更多的死亡一般歸因于蔣介石北伐導致的鐵路運輸的中斷，這實際上削弱了救濟活動。

人們很可能回想起鐵路時代以前的1877—1878年饑荒的歷史，以便弄清“大躍進”災難的規模。那次饑荒主要發生于陜西和山西，但也波及河南、河北和山東的一部分地區，政府和私人從沿海地區運輸糧食到內地的工作受到運輸工具不足的阻礙。估計有900萬至1300萬人因饑餓和跟著發生的傳染病而死去。[[30]](#_30_He_Bing_Di____1368__1953N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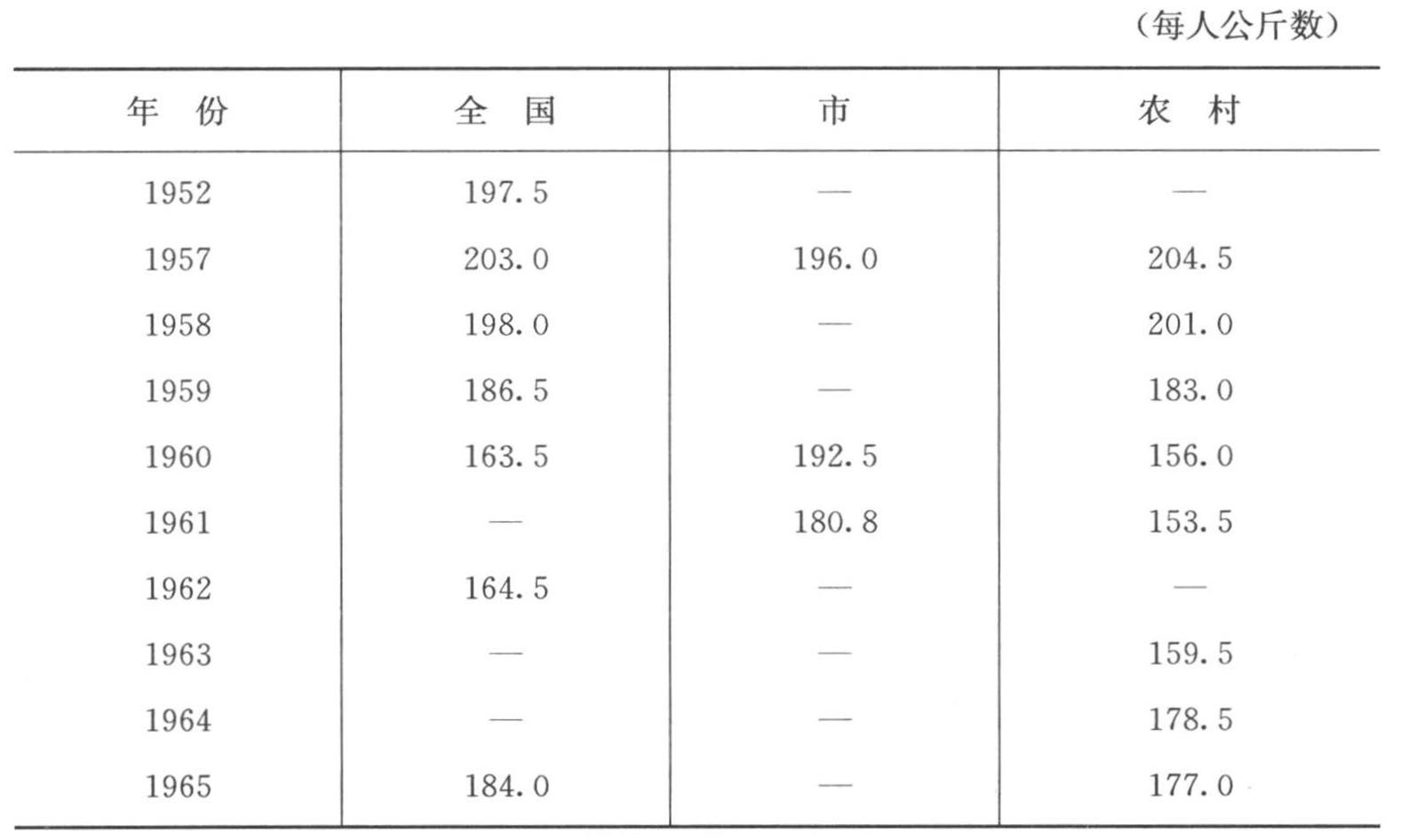
在現代人口統計上，蘇聯農業集體化當時及其以后曾發生過接近“大躍進”危機范圍的災難。一致的估計認為，主要由于政府政策造成的糧食極度缺乏而引起的死亡人數大約為500萬，大致是俄國農民的1/25。[[31]](#_31_Da_Na__G_Da_Er_Lin_Pu_Er)如果用西方對過量死亡人數的估計來代替官方的數字，相比之下，中國饑荒的死亡人數為這個數目的3—5倍，甚至按比例也超過了蘇聯饑荒。

## 中國饑荒的范圍

關于這次大饑荒的范圍所知不多，但是可以提出兩個假定。其一，這次饑荒是不均衡的，是農村事件。其二，即使在農村地區，死亡也高度集中在有些地區。

幾種以經驗為基礎的證據表明，這次饑荒不均衡，主要在農村。首先，如表5所示，平均糧食消費量的下降在農村地區要嚴重得多。到1960年，農村谷物消費量下降了24%，而城市消費量下降不到2%。在1961年，全國平均消費量到達最低點時，農村消費量下降52公斤或25%，而城市消費量只下降15公斤或8%。按絕對數量來說，植物油和豬肉的消費量城市比農村下降得多，但這兩項消費量城市仍為農村的兩倍。此外，由于卡路里攝入量絕大部分是從谷物的直接消費得到，因而城市消費者受的損失無疑比農民要小。

表5 城市和農村糧食消費量，1952—1965年



注：消費量以“貿易糧”單位計算，按中國統計慣例，貿易糧包括未加工的稻谷和小米（原重）以及加過工的其他糧食。在中國統計慣例中，糧食包括禾谷類、薯類（以相當于糧食的重量計算）以及大豆和其他豆類。“－”表示缺乏可以利用的資料。  
資料來源：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150、158頁。王平：《大躍進和調整時期的人民生活》[766]，載柳隨年編《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473]，第163、169頁。謝渡揚：《回顧六十年代初農業的調整》[320]，載柳隨年編《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473]，第64頁。

其次，將死亡率分成“市”和“縣”兩部分的中國資料表明，在饑荒年月里農村地區發生的死亡是不成比例的。甚至在一般或正常年份，包括農村地區也包括小城鎮在內的“縣”的死亡率也比市的死亡率高30%—60%。表6的資料說明，在1960年——全國死亡率最高的一年——縣級登記的死亡人數上升到了高達市登記的死亡率的兩倍以上的水平。

表6 死亡率，1956—1962年



注：“市”指批準成立“市”建制的城市——國務院用這個名稱指行使主要行政和經濟中心的職能的城市——登記的死亡數。在1958年，有185個市，其中北京和上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縣”指市以外的其他地區，也就是在城鎮和農村登記的死亡數。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105頁。

幾乎可以肯定，甚至這些數字也縮小了“大躍進”時期加大了的市和農村死亡率之間的差距。縣的資料合并計算城鎮（那里一大部分居民通過糧食定量配給制度可以得到配給的糧食）的死亡率和周圍農村（那里一般卻得不到政府供應的糧食）的死亡率。

這種歷年資料在消費量方面分別以市和農村計算，在死亡率方面分別以“市”和“縣”兩部分計算，同樣可以用表明饑荒主要是在農村的他種證據予以證實。

第一，在公布的中國資料中很少提到的饑荒一律是指農村饑荒，而不提城市死亡率。[[32]](#_32_Zui_Quan_Wei_De__Nong_Cun_Ji)

第二，家畜的急劇減少證實了農村消費水準所承受的壓力。豬首先被屠宰，因為飼養它們是為了通過在集市上出售豬肉能帶來食物和現金收入。豬的數量在1957—1961年間急劇減少了七千多萬頭，也就是48%。但是，農民也宰殺了他們耕畜的30%以上，在拖拉機時代到來之前，這是農業資源的重大損失。[[33]](#_33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這些方面的下降可以和蘇聯集體化運動和跟著發生的饑荒危機時期的家畜損失相比。

第三，農村地區糧食實際短缺，在1959年后導致大量耕地從種經濟作物轉到種谷類作物。在1959—1962年間經濟作物總面積下降了35%，當時分配給非糧食作物的耕地數量達到了最低水平。下降的最大份額是由棉花播種面積驟然下降造成的，棉花是中國最主要的非糧食作物。[[34]](#_34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次要經濟作物的播種面積甚至以更大的比例下降。

第四，某些農村地區在整個1962年中糧食供應持續地處于饑餓水平表明了農村生活水準所受的異常壓力。遲至1962年春季，在甘肅西北部的敦煌、玉門、酒泉和金塔等縣，70%居民的糧食消費量每天不足1/4公斤，這個水平大約是我們常說的“半饑餓”標準的一半。在甘肅張掖縣，半數農村居民的糧食消費量甚至更低，每天只有3盎司。[[35]](#_35_Wang_Ping____Da_Yue_Jin_He_D)這樣的例子表明，即使全國的數據顯示死亡率回降到了1957年的水平，饑餓狀況在1962年也還繼續存在，尤其是在比較偏僻的地區。

最后，農村集市上可以買到的食品的價格上漲幅度驚人也反映了農村地區糧食短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1959年下半年批準重新開放在1958年公社運動開始時關閉的農村集市。最初這些集市限于買賣不屬于國家統一收購的農產品。但是早在1960年這一禁令就沒有普遍推行。到1960年下半年，由于實際的短缺，絕大多數農產品的農村集市價格漲到國家收購價格2—3倍的水平。可是谷物的價格卻暴漲到國家固定價格的10倍，而在1961年，這個差距就更加大了。[[36]](#_36_Zhao_Xing_Han___Cao_Zhen_Lia)農村自由集市糧食價格是每公斤2—4元，為所有谷類征購價格平均每公斤0.13元的15—30倍。集市上的豬肉價格漲到每公斤10元，為國家收購價的14倍。[[37]](#_37_Xue_Mu_Qiao____Guan_Yu_Yi_Ji)這些食品價格上漲的幅度大大高于其他嚴重饑荒事例中有記錄的上漲幅度，為上述人口統計資料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明。[[38]](#_38_Zai_1943Nian_De_Meng_Jia_La)

政府從農村抽調谷類的史無前例的比率、公布的農村饑荒的材料、家畜存欄數的下降、農作制的改變和農村集市糧食的極度昂貴，所有這些表明饑荒主要是在農村。但是，即使是在農村地區，饑荒的死亡似乎也集中在某些地方。這種推測是以兩種由推斷而來的看法和有限的資料為基礎的。其一，全國谷物產量年年呈現出相對小的波動，因為全國的產品是在極不相同的氣候和種植條件下生產的。但是，如果考慮到像華北平原、西北黃土高原這些地區；或者更擴大一些，如果考慮到省一級，波動就更大。例如，遼寧省1960年的糧食產量降到310萬公噸的波谷，是1958年水平的一半，低于1957年水平40%，下降幅度比全國平均數要大得多。[[39]](#_39___Liao_Ning_Jing_Ji_Tong_Ji)

在50年代，中央政府在地區之間調撥大量糧食，不但支援專業化的作物制度或有大量城市人口的省份，而且用來緩和由于洪水、旱災或某種其他自然災害造成的地方性糧食短缺。例如，遼寧省因為是最城市化的省份，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每年得到大約166萬公噸的調撥糧食，是所有省份中數量最多的。[[40]](#_40_Ken_Ni_Si__R_Wo_Ke____Zhong)在“大躍進”時期，這些地區之間的農產品流通量削減了。例如，省際之間的糧食運輸總量在1958年減少了150萬公噸。[[41]](#_41_La_Di____Zhong_Guo_Xian_Dai)

在某種程度上，發生這種削減的原因是，地方自給自足是公社運動思想的一個主要方面，但是，這種削減之所以發生也有另一個原因，極度的政治動員使地方政治領導人難以要求中央給予糧食援助。的確存在一些有文獻記載的說得通的事例：有些地方政治干部禁止把當地糧食短缺的消息傳播出去，因為這種消息和他們先前報告的“豐收”前后矛盾。由于通常能緩和地方糧食短缺的地區之間農產品的流通量被削減，總產量嚴重不足的地區更不可能指望調撥的糧食。

中國資料提到1960年山東、河南、山西、安徽和江蘇幾省一些地區的“非正常死亡”。[[42]](#_42_Liu_Sui_Nian_Bian____Liu_Shi)這些省份中，安徽可能是人口減少最嚴重的。1960年全省的死亡率猛增到68‰，為全國平均數的3.5倍多。[[43]](#_43_Yi_Zhe_Zhu__Yuan_Wen_Ru_Ci)由于1960年的出生率是11‰，這個省的人口在一年中很可能下降了將近6%，也就是200多萬人。[[44]](#_44_Tuo_Ma_Si__P_Bo_En_Si_Tan)單單安徽人口的下降就可能說明官方公布的1960年全國人口下降數足足為20%的原因。[[45]](#_45_Can_Jian_Ben_Shu_Biao_6)值得注意的是，安徽1960年死亡率的增加量大大超過印度孟加拉邦1943年大饑荒期間出現的增加量。[[46]](#_46_Zai_Meng_Jia_La_Yin_Ji_E_Er)其二，饑餓造成的死亡在歷來專門種植非糧食作物的地區一定更嚴重。在正常情況下，這些地區的農民在當地農村集市買糧或靠從政府購買糧食。“大躍進”開始時，地方農村交易因集市普遍關閉而中斷。即使在集市重新開放以后，交易的價格實際上也變得極不利于這些農民。集市上可以買到糧食，價格上漲了許多倍，可是直接賣給政府或在農村集市上出售的纖維作物——煙草、甘蔗等等——的價格卻提高得不多，甚至下跌。那些依靠政府售糧過活的人情況可能更糟，因為這個時期的混亂情況和強調自給自足減少了政府的返銷糧。

不論是何種情況，非糧食作物生產者或畜牧產品生產者出售他們的產品以換取通常提供比較低廉的卡路里來源的谷物的能力都減弱了，同時種植纖維作物和其他非糧食作物的生產者也更不容易獲得糧食。在饑荒情況下，死亡集中在農村非食物生產者的類似情況是普遍地可以看到的。對中國饑荒的這一假設的可靠性似乎可以從表述性的證據中得到證實。在“大躍進”期間遭到破壞的山東西北部歷來是棉花產區，這一地區的一些農民來到黃河以南，在那里他們能夠用他們的衣服和其他所有物換取糧食，借以度過60年代初期的日子。[[47]](#_47_He_Ze___De_Zhou___Liao_Cheng)這種現象表明，政府能掌握的谷類糧食的再分配中斷了。

不可能外出或住在遠離有余糧的地區的農民生活得更差。寧夏南部的固原縣是一個例子，這個偏遠的適于畜牧的縣在50年代主要靠銷售皮革、肉和羊毛獲致農村繁榮。這時死亡率很高，以致人口（1957年是27.5萬人）在1959年和1960年兩年都下降。[[48]](#_48_Zhong_Guo_Ke_Xue_Yuan_Di_Li)有關固原地區內鄰近幾個縣的表述性的報告甚至表明饑餓不只是在一個縣，范圍要更廣闊。西北畜牧業地區的饑荒和1972—1974年間埃塞俄比亞的饑荒有許多相似之處，那里受災最重的區域是東北的沃洛省，特別是阿法爾的牧畜地區以及哈勒爾蓋省內的牧畜地區。在這些事例中，牲畜和牲畜制品價格的下降（和糧食價格比較）實際上降低了畜牧者出售牲口以購買糧食的能力，而糧食在饑荒前的年代是卡路里攝入量的主要來源。

## 黨對饑荒危機的對策

“大躍進”引起的危機給中共提出了1949年執政以來所面臨的最嚴重的難題。可是處理政治事件的程序不但使黨難以預先考慮危機的嚴重程度，而且導致了加深饑荒的決策。甚至更可驚的是，黨在已經掌握了發生范圍廣闊的饑荒的不容置疑的證據后，黨仍然無能為力，不能或不主動對20世紀最大的饑荒作出適時的、有內聚力的明確對策。

農業方面的動員策略失敗的跡象早在1958—1959年冬天已可得知。1958年11—12月在武昌舉行中央全會時，中央委員會的委員清楚，宣布1958年糧食產量是3.75億公噸和棉花產量是350萬公噸之舉，是沒有什么根據的。根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對那次會議上的討論的敘述，統計制度已壞到不可能有任何信心地去了解實際產量的水平。按照彭的說法，會上有些同志認為產量超過5億公噸，并且不顧精確的計算，認為“工業現在大大落后于農業”。彭對公布的產量水平的精確性提出異議。據彭說，毛澤東親自作出了宣布3.75億公噸數字的決定。[[49]](#_49_Ni_Gu_La_Si__R_La_Di___Ken_N)公布的產量數字因此反映了政治的而不是統計的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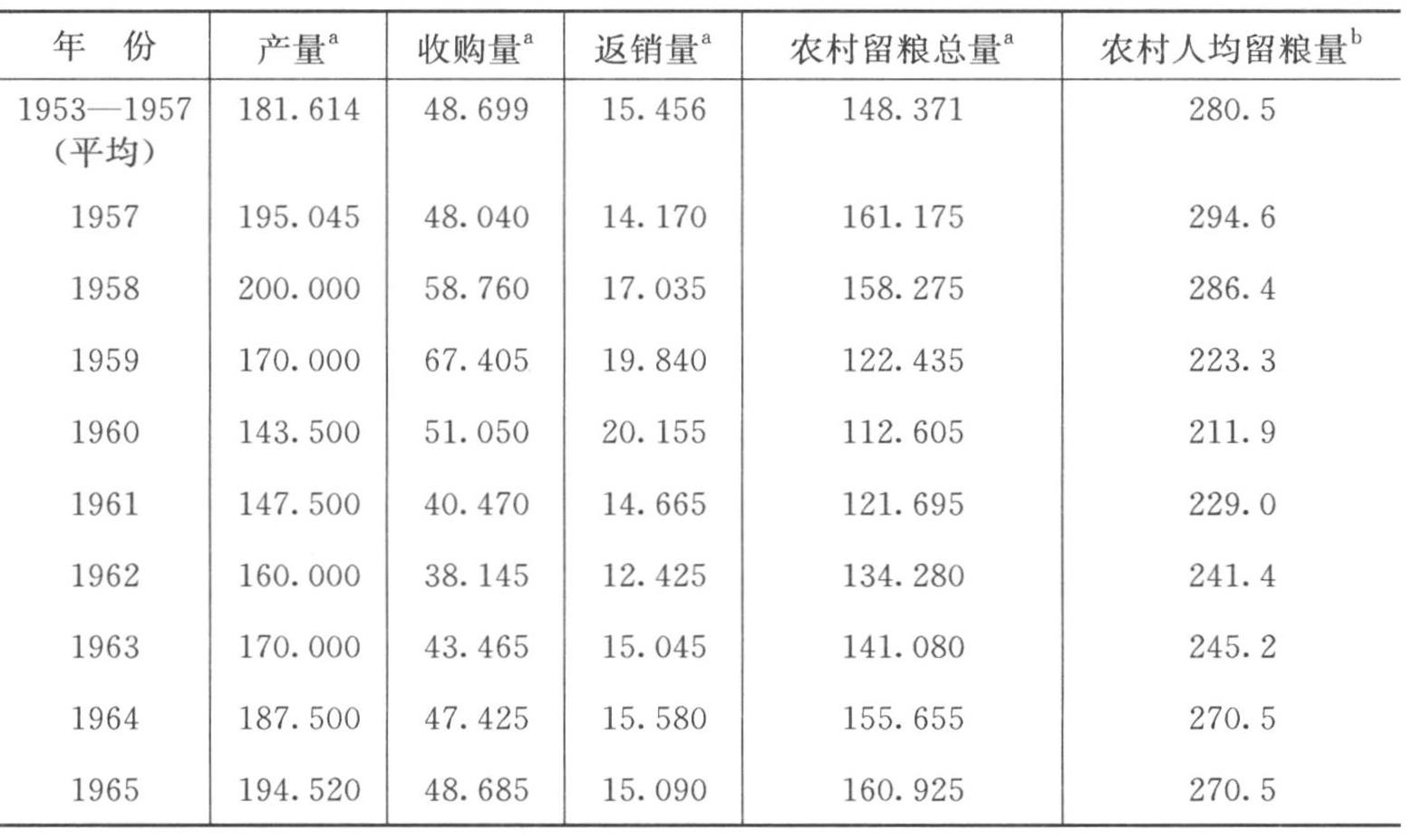
雖然這些數字成了1959年農業計劃的根據，但至少有兩個政治局委員對公布的谷物產量的巨大增長量的正確性提出了異議。彭德懷在武昌會議結束后的某個時候，為了直接調查農村情況而到了湖南省。彭發現他訪問的農村的情況是嚴重的，并斷定以前提交給中央的產量數字是夸大的。彭等不及回到北京再直接報告他的研究結果，擔心“群眾有餓死的危險”，他便發了一封緊急電報給中央委員會，請求將省的稅收和義務交售的定額減少1/4。[[50]](#_50_Tong_Shang_Shu__xli__Li_Rui)

陳云（黨的位居第五的領導人，更是經濟事務方面的最高級人物）也不相信提交給北京的各地報告，于1959年春季針對性地專門訪問河南，該省在1957—1958年的水利運動中，隨后又在建立公社中起了突出的開路作用。他也發現，地方政治干部不了解這個省農村地區的狀況，沒有掌握真實糧食情況的足夠資料，受了基層提交的夸大了的報告的欺騙。[[51]](#_51_Deng_Li_Qun____Xiang_Chen_Yu)還不清楚陳是怎樣使他的發現引起其他政治局委員注意的，但是，認為陳云對情報保守秘密是不可置信的。

彭德懷和陳云在1958—1959年冬春之際的報告發出信號，“大躍進”的基本策略出現了問題。規模巨大的公社體制和大量的政治動員并沒有提高農業產量，雖然1958年的氣候條件總的來說比1956年或1957年都有利。[[52]](#_52_1958Nian_Yin_Zai_Huo_He_Zi_R)

彭德懷在1959年7月于廬山召集的黨的關系重大的會議上向“大躍進”策略，更重要的是向毛的領導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挑戰。但是，彭的抨擊被毛斷然拒絕，“大躍進”進入了新的高潮，不可能再對政策進行批評。更為重要的是，為工業化而強化的資源動員正在加速進行。在1959年，投資額提高到國家收入的43.4%，達到空前的高峰。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從農民那里增收谷物、蔬菜和纖維作物以支持這種努力。對農村人口提高谷物收購數量的結果見表7。包括必須留給用于牲畜飼養和來年作物種子的糧食在1959年引人注目地下降到人均223公斤，只有1957年水平的3/4。同樣，即使產量下降，1959年國家對油料籽的收購量與1957年相比，仍提高了1/4。出口到蘇聯的農產品的數量日益增多，用以支付逐漸增加的、占較高投資額的主要部分的進口機械和設備。

表7 糧食總產量和政府與農業地區的交易量



注：a.100萬公噸。b.公斤。全部按原糧（即“原重”）計算。農村留糧等于總產量減去收購量加返銷量。收購量和返銷量資料指生產年度，即日歷年的后半年加下一日歷年的前半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103、393頁。

最可驚的是，正在1959年死亡率上升的時候，中國的谷物出口量如表8所示，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1959年的出口量（主要是稻米和豆類）達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平均水平的兩倍，而進口量（大部分是小麥）卻降到六年中的最低水平。因此，1959年的凈出口量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年度平均水平的兩倍多。與此類似，1959年棉紗和棉布的出口量分別是1957年水平的兩倍和將近兩倍。按價格計算，中國對蘇聯的出口量在1957—1959年之間上升了50%，在1959年占中國出口量的60%。[[53]](#_53_Guo_Jia_Tong_Ji_Ju____Zhong)

表8 糧食出口量和進口量，1952—1965年 （1000公噸）



注：出口和進口均以原糧（“原重”）計算。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422、438頁。

此外，在1958—1962年的“大躍進”危機的高峰期，政府用于農村救濟的費用每年少于4.5億元，集體農業中的每一個人每年合0.8元左右，[[54]](#_54_La_Di____Zhong_Guo_Xian_Dai)而糧食短缺地區的集市價格已經達到每公斤2—4元。集體單位內部的公益金并不能成為對饑餓的農村人民提供有效援助的另一個來源。在死亡危機達于頂點的1960年，公益金總額只有3.7億元。[[55]](#_55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

由于危機嚴重，在1960年對饑荒作出的幾種僅有的政策上的明顯反應是微不足道的。首先，谷物收購量縮減了1600多萬噸（表7）。但是，由于返銷給農民的糧食并不多于前一年，總產量又下降了2500多萬噸，農村留下的糧食甚至從1959年的低水平進一步下降，農村死亡率于是直線上升。其次，出口縮減，中國人開始討論大規模進口小麥。但是，1960年的出口量仍然高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平均水平不少（表8），而進口的決定與作為對付農村危機的對策相比，似乎和出現的城市消費標準的危機更有關系，到進口合同談判開始時農村危機已經繼續了一年半。城市消費標準在1958年和1959年保持不動不只是由于收購達到創記錄的水平，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靠降低國家控制的糧食庫存。在一次保存所剩不多的剩余庫存的努力中，通過定量配給制度供應城市居民的糧食定量在1960年9月人均每月減少了一公斤。[[56]](#_56_Liu_Sui_Nian____Liu_Shi_Nian)小麥進口合同于10月談判并簽字。

最后，周恩來起草的一份文件包括了農村政策方面的改變，文件的標題是《關于農村工作的緊急指示》。中央委員會于1960年11月認可的這一指示不顧某些黨員的反對，謀求通過改變農業的內部體制緩和農村危機。指示正式承認公社對于提供適當刺激和勞動密集型耕作方法的有效管理是太大了，把有權作出決定的單位由公社向下轉移到大隊，大隊是三級農業組織結構中規模居間的比公社小的單位。指示在某種意義上也謀求提高最低一級單位生產隊的權力。

雖然決定進口谷物，把決定權和收入分配權下放至公社的較低層次，這些措施有可能部分地減輕與公社制度有關的阻礙作用，但直到1960年晚期對“大躍進”策略才著手重新評價，處理危機的更具內聚力的對策才開始出現。這個主動行動由周恩來領導的，他恢復了重要的制定政策的組織財經小組以領導制定恢復策略。周重建這個小組的主要做法是他親自邀請陳云回來，讓陳在厘定經濟政策方面起積極的作用。陳在廬山會議召開前的1959年上半年以后沒有露面，可能是由于健康原因，但更可能是由于他反對“大躍進”的政策。在60年代初期，陳云在擬訂恢復策略中作為主要人物又重新出現。

陳云的看法的核心是，只有更平衡的發展策略才可能實現持久的恢復。雖然他很自然地贊成降低農村社會主義的程度，但他認為，農村體制內部的改革既不能為恢復也不能為將來的持續發展提供適當的基礎。陳云的策略包括更深遠的改革：更積極地運用價格政策；根據作物類型和區域間貿易的相對優越性提高農業生產的專門化程度；發展給農業提供化肥的現代化學工業；恢復正常集市渠道；大量減少投資額并在投資結構中由冶金和機械轉向消費品和可以用來支持農業生產的重點工業品；以及在農業地區重新安置將近3000萬人，他們在1957年后最初由于城市可做的工作增多，后來由于求食而移居城市。[[57]](#_57_Deng_Li_Qun____Xiang_Chen_Yu)

在中國最高層領導人中，陳云對中國農業問題了解最深。很清楚，陳云的看法看來是由1955—1956年的集體化的經驗形成的，這種經驗證明，生產中無論存在什么規模的經濟都遠遠不足以彌補大生產單位所起的阻礙作用，大生產單位在分散生產的條件下很難對個體勞動進行監督，這使得按個人生產能力付酬很困難。因此，陳云和毛澤東的意見極不相同，毛仍然尋求主要通過加強動員勞動力和在農業中增加其他投入以發展農業。此外，陳在1955—1956年曾經反對關閉農村集市以致減少農民賺得額外收入的機會。最后，陳主張較低投資額——和毛明顯不同，毛似乎對“大躍進”的過量投資額引起的問題不在意，遲至1960年仍然相信30%左右的投資額是可以維持的。[[58]](#_58_Ke_Ye_Er_De__Ai_Li_Ke__Bu_Lu)

但是，由于連續不斷的反對，周恩來、陳云等人將要用兩年以上的時間去促成這些政策得到贊同和貫徹。爭論最初集中在農業政策上。1961年，陳云等人的農村調查增強了那些尋求比1960年《關于農村工作的緊急指示》所導致的改革更為根本的改革的人的權力。陳在對他的家鄉——靠近上海的青浦縣的調查中發現，即使在這個相對地繁榮、沒有報道過自然災害的長江流域地區，也是“糧食不夠吃”，黨的干部管理不當破壞了積極性，夸大的自報產量仍在向上級報告。陳建議進一步加強家庭生產、擴大自留地，以及農村政治干部對種什么作物的決定少進行干預。[[59]](#_59_Chen_Yun____Qing_Pu_Nong_Cun)

陳云對農業的擔心不只是根據對個別地區的調查研究。國家糧食儲備連續下降和恢復地區間糧食調撥的困難也使他憂心忡忡。到1961年年中，國家糧食儲備減少到略多于日常儲存，而在1956年年中和1957年年中國家糧食儲備曾分別達到2135萬公噸和1820萬公噸。[[60]](#_60_La_Di___Li_Bo_Ta_Er_Bian)1960年12月，當北京、天津、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以及遭受了重大自然災害的地區受到了難以承受的維持糧食供應的壓力時，中央政府發出緊急指示，要求那些有余糧的省份動員所有可用的人力以保證完成省的調運糧食的義務。[[61]](#_61_Liu_Sui_Nian____Liu_Shi_Nian)可是，與第一個五年計劃乃至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當1958年的自給自足政策被放棄而地區間的糧食調運恢復時相比，調運的總數是很小的。[[62]](#_62_Ken_Ni_Si__R_Wo_Ke____Zhong)

由于農民越來越不愿意向國家出售，即使維持適度收購水平也是困難的。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均產量的低水平和農村的饑餓狀況。但是，由于農村嚴重缺乏消費品，在許多余糧地區，即使按1960年實行的較高價錢農民也不愿出售糧食。在工業產品減少和分配制度被破壞的時候，農民幸而有了多于他們自己消費需要的余糧，他們感興趣的是獲得實在的商品而不是購買力迅速下降的貨幣的數量。為了使農民出售他們的糧食，從1961年冬季開始國家不但必須付出較高價錢，而且不得不保證農民購買農村中供應數量不足的商品的權利。按新的較高的固定收購價格售出750公斤谷物，其交換條件是給予農民生產者按當時的零售價格購買以下商品的權利：15英尺[[63]](#_63_Ying_Zuo_Chi__Xia_Tong)棉布、一雙膠鞋、20英尺針織品、1.5公斤糖、兩包香煙、400克裝填衣被用的絮棉。[[64]](#_64_Zhao_Xing_Han___Cao_Zhen_Lia)

改進短缺商品供應以給予積極鼓勵的做法因得到批準而加強。1962年3月，為了使政府掌握更多糧食，頒布了一項嚴厲制止在農村集市上買賣糧食的指示。[[65]](#_65_Liu_Sui_Nian____Liu_Shi_Nian)但是，如表7所示，收購工作恢復得很慢。

農業地區中繼續存在的這些問題促使陳云等人謀求進一步改革。1962年1月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反映了所作的努力，報告描繪了農村仍然存在的嚴峻情況。但是爭論還在繼續。除了毛澤東和他的最親近的擁護者以外，還包括一大批干部在內的“大躍進”的支持者，在1962年認為，調整政策已為新的躍進提供了條件，他們謀求在預定于1963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中體現這些政策。周恩來、劉少奇、陳云和其他穩健的領導人贊成把調整時期延長到1965年，這將導致繼續優先考慮農業發展和延緩冶金部王鶴壽等所推行的雄心勃勃的工業化方案，王鶴壽等人仍然強烈支持以重工業為基礎的工業化策略。[[66]](#_66_La_Di___Li_Bo_Ta_Er_Bian)這個正在進行的爭論是引人注目的，因為它表明1960—1961年的整風運動不足以在經濟政策上廣泛地恢復一致意見，整風運動撤換了一批不能“充分理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區別”的“左”傾的省和省級以下的政治領導人。[[67]](#_67_Fu_Lei_De_Li_Ke__C_Tai_Wei_S)

#### 投資的規模和結構

陳云、李富春等人最優先考慮的事是果斷地控制投資的水平和比率。資本積累速率的急劇增加，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平均24%到1958—1960年平均34%，對經濟提出了嚴峻的要求，并使資源利用效率突然發生引人注目的下降。物資短缺和協調眾多主要項目的困難致使完成項目所需的時間大大增加。結果是工資總額大幅度增長，主要是支付大量建設工人，但工業產品卻沒有相應地增加。工業產品產量的增加和高工資總額不相稱的情況當然和農業產量同時下降嚴重地摻和在一起。

這種失調也反映在政府預算上，政府預算是大多數投資項目的資金來源。早在1958年預算就有赤字。到1960年赤字大量增加，超過80億元，約為歲入的15%。這種發展導致了過大需求和通貨膨脹的壓力。到1961年投資支出和政府開支被大量壓縮。政府開支1961年下降290億元，1962年又進一步下降60億元。到1962年預算結余接近10億元。國家投資在1960—1962年間下降得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從389億到71億元。作為國民收入一部分的積累降至10.4%的低水平。

投資下降部分地反映了“大躍進”的經濟崩潰，但是，尤其是在1960年以后，也反映了財經小組在制定政策方面的優勢。例如，鋼產量從1960年的1866萬公噸縮減到1962年的670萬公噸；煤產量從39700萬到22000萬公噸；水泥從1565萬到600萬公噸；金屬切削機床從153500臺到22500臺，等等。

與減少投資同時，關閉了好幾萬建筑和工業企事業單位，將近3000萬城市居民被迫在農村重新定居。特別是在1961年，由于建設項目減少和2.5萬個國家工業企事業單位關閉，547萬工業工人和295.6萬建筑工人失去了工資收入來源，還有大約1000萬城市居民在農村重新定居。盡管爭論激烈，但在財經小組的堅持下，1962年又關閉了另外1.8萬個國家工業企事業單位，又有419萬工業工人和157萬建筑工人失去他們的工作，同時有2000萬城市居民遷居農村。[[68]](#_68_Liu_Sui_Nian_____Diao_Zheng)

這種大規模強制重新定居方案累積起來的效果是很大的。國家企事業單位的工業勞動力減少45%；建筑工人的數目減少35%。到1963年年中城市居民減少2600萬，有權靠國家定量配給制度得到谷物的非農業人口減少2800萬。[[69]](#_69_Xie_Du_Yang____Hui_Gu_Liu_Sh)壓縮勞動力減少了國有工業的工資總額，從1960年的114.1億元到1963年的低水平80.2億元，還減少了建筑業的國家工資總額21.4億元，也就是52%，降低了過大需求引起的通貨膨脹壓力。此外，關閉虧損的工業企事業單位增加了預算收入。曾經達到46億元高峰的國家工業企事業單位的持續虧損到1963年減少到12億元，這大部分是靠關閉持續虧損的企事業單位做到的。[[70]](#_70_Hao_Qun_Gan____Guan_Yu__Da_Y)

#### 農業政策

盡管對“大躍進”導致的農業危機的最初對策是極不充分的，但到1961年顯然有了更實質性的政策改革。這些改革謀求對中國農村當前的福利需要作出反應并為農業的恢復和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一次最有影響的改革是明顯減少向國家義務交納的谷物。與1959年的6740萬公噸相比，1961年降到了4050萬公噸。更加重要的是農村保留的產量份額上升到82.5%，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的份額大致相等。減少征購定額使1958年開始的農村消費的急劇下降得以終止。這類減少對財政有極大的沖擊，因為大部分減少的征購量屬于公糧，農民交公糧給國家沒有任何財政補償。因此，有償交付的份額（所謂收購定額）增加了。這些改革的財政效果是農業稅減少了113億元。交售谷物的補償費（所謂定額收購價）在1961年提高了27%。大多數其他農產品收購價在1962年或1963年也以較小數額提高。油料籽1961年國家提價19%，棉花1963年國家提價1000。[[71]](#_71_Tong_Shang_Shu__Di_46Ye)最后，農村地區的福利開支增加了，以便對低收入農村居民提供更多的收入和商品。農村每年的人均福利開支，1963—1965年是1958—1962年一般水平的三倍，雖然按絕對數值來說仍然不高。[[72]](#_72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

采取了更廣泛的措施以促進農業的恢復，并為農業的持續增長打下基礎。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黨在管理農業中的作用，但是它們同樣也含有積極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放寬了對農村民間集市的約束和恢復小塊自留地。早在1959年秋季，農村周期性的集市已在一些地方重新開放，增加了農民的賺錢的機會。1961年年中正式承認自留地，這是1958年秋季公社運動開始后的第一次，盡管許多地區在此之前已經予以恢復。分配作自留地的面積占耕地的5%—7%。同時，國家取消了公社成立時硬性規定的對私人家庭副業生產的禁令，允許恢復私人家庭飼養豬、羊、雞、鴨和其他家畜，還可以從事家庭紡織、縫紉、刺繡和其他手工業，以及采收野生植物（如蘑菇）、釣魚、打獵、養蜂和養蠶。這些活動的大部分產品可以在農村民間集市上出售。

由于作出決定的權力在1961—1962年下移到公社—大隊—小隊三級結構的最低一級，以及小隊的規模縮小到平均20—30戶，和1955—1956年冬季以前農業組織的主要形式初級生產合作社相當，黨的作用也減弱了。這一改革實質上減少了主要居于大隊和公社兩級的黨的干部作出決定的大部分權力。

此外，以前黨的干部任意調撥和分配農業資金的做法也少了。小隊在總收入中可以撥出用于投資和公益金的份額分別限制在3%—5%和2%—3%。而且這些資金的支出要由每一小隊作出決定，而不是由上級干部作出決定。[[73]](#_73_Xie_Du_Yang____Hui_Gu_Liu_Sh)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勞動與報酬之間的聯系，而這種聯系在基本核算交給由黨的干部直接控制的大單位時實際上曾被破壞了。

在中國農村的某些地區，改革超出了官方認可的范圍，集體農業完全瓦解。土地被分給了當地的社員，恢復了個體農業。單干戶有義務完成國家分配的銷售額，但在其他方面，在農作制、投入的用途等問題上可以自由地作出他們自己的決定。在所有重要的范圍內黨對農村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都突然下降了。[[74]](#_74_S_C_Chen____Lian_Jiang_Xian)

維持長期農業增長的積極措施集中在投資和支持農業生產的專業化上。分配給農業、水利工程等的國家投資額，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7.8%和1958、1959年的10.5%比較，1963年提高到了25%以上。此外，工業中的投資結構轉向支持農業。例如，專門調撥了鋼鐵、木材、竹材之類的物資，用以增加中小型工具、帶柄工具、大車和船只的產量。到1962年年末，這些項目的可供量恢復到了公社前的水平，彌補了1957—1961年之間由于毀壞或磨損而造成的工具、船只和車輛的大量損失。[[75]](#_75_1957Nian_Dao_1961Nian_Zhi_Ji)

除了單純地恢復“大躍進”破壞的農業部類的資源之外，還進行了廣泛的改革。1961年陳云在通過黨的決策機構推行一項發展化肥工業的重要計劃中是起了作用的。[[76]](#_76_Chen_Yun____Jia_Su_Fa_Zhan_D)這表明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做法相比有了根本改變，當時分配來發展化肥工業的投資資源是極少的。這反映出陳確信，動員勞動力不能為農業的持續增長提供基礎。此外，按照陳云的規劃而建設的工廠的規模，是作為“大躍進”時期通常叫做“兩條腿走路”方針的一部分而建設的小型工廠的許多倍。工業支持農業發展的原則基本上背離了中國共產黨執政頭10年的政策。

采用專業化政策也促進了農業的長期發展。在“大躍進”危機達到高峰的時候，非谷類作物的播種面積壓縮了，在60年代早期，某些地區提出地方谷物自給自足可以為農業的恢復打下基礎。陳云斷然反對這種方針，因為它將導致很低的效率。他認為，削減經濟作物已經做得太過分了。如果國家商業系統不能供給生產糧食條件比較優越的地區多種多樣的農產品，那么這些地區就將占用糧田，從而減少他們對國家的銷售額。[[77]](#_77_La_Di____Zhong_Guo_Xian_Dai)乍看起來自給自足似乎可以為發展提供基礎，但是陳指出，這只會導致所有地區生產更多的獲利較少、成本高昂的產品。

到了1963年，陳云的觀點在“高產穩產”區的政策中得到了體現。[[78]](#_78_Liu_Sui_Nian____Liu_Shi_Nian)按照這個方案，治水好的和糧食實際上或有可能高產的地區，通過額外供應化肥和其他投入而得到支持，集中從事谷物生產。這些地區成為政府收購的大部分谷物的產地，收購的谷物主要用來養活城市人口。歷來以種植纖維和油料籽作物、煙草等較為有利的生產者也得到支持，恢復了他們歷來所種的作物。

## 經濟恢復，1963—1965年

#### 農業對策

總的來說，農業恢復計劃只獲得了一般的成功。谷物產量從1960年14350萬公噸的低點到1965年上升到剛剛低于“大躍進”前的高峰年1957年的水平。但是，從那以后人口已經增加了8000萬，人均產量仍然大大低于“大躍進”前的水平。這意味著1962年中央委員會通過的在五年時間內逐漸減少糧食進口的目標沒有獲得多大成績（表8）。[[79]](#_79_Tong_Shang_Shu__Di_200Ye)

在比例上無例外地比谷物下降得更多的纖維作物、甘蔗和甜菜以及其他一些非谷類作物的產量水平，到1965年超過了“大躍進”前的水平。但是油料籽作物卻顯著落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播種面積仍被壓縮。到1965年，許多重要作物的單位產量超過了“大躍進”前的水平：糧食提高10%以上，棉花將近50%，油菜籽將近60%。這些資料表明，60年代早期采用的專業化政策在隨后幾年里對生產率的增長作出了貢獻。畜牧業的產量和水果產量證明是恢復的有力典型。肉和木材的產量都比1957年的水平提高40%。[[80]](#_80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

雖然不是所有作物都恢復到了1957年的水平，但農業得益于6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栽培對化肥反應迅速的矮稈水稻品種，形勢較好。水澆地的數量在1965年上升到3300萬公頃，比1957年多600萬公頃。更值得注意的是，足足有1/4的總灌溉面積用機械抽水（使用電力泵或汽油泵），而1957年僅占4%。這改善了灌溉管理，對于與栽培高產水稻品種同時出現的作物復種制是至關緊要的。

#### 工業對策

工業恢復遠比農業迅速。1963—1965年，輕、重工業產量每年分別增長27%和17%。到1965年，鋼、電力、水泥和重型汽車等主要產品的產量水平是1957年的兩倍多。工業消費品的產量也大幅度上升。例如，1965年縫紉機和自行車的產量分別是1957年的四倍和兩倍多。

比一般產品產量增加的水平更令人難忘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出現了重要的工業新部門；一批重要的投資項目也完工了，這些項目曾經由于蘇聯取消技術援助而遭受挫折。顯著的例子是石油和石油化學產品。中國人在50年代曾經嚴重依靠從蘇聯進口石油和石油產品。50年代中期每年原油產量只有每天2萬桶左右，主要靠1949年以前開發的西北部甘肅省的玉門油田。由于產量和煉油能力有限，中國依靠進口。例如，在1955—1957年，進口量大致是本國產量的兩倍。[[81]](#_81_Bao_Da_Ke____Cong_Quan_Qiu_J)中國于50年代著手進行一項有魄力的石油勘探計劃，導致了50年代晚期在東北部松遼流域的發現，在那里開發了中國最著名的油田——大慶。

這些努力的結果是原油產量的持續增長。盡管大部分重工業產品的產量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大幅度下降，但在整個“大躍進”和整個恢復時期原油產量卻年年上升。到1965年，全年度日產量超過20萬桶，差不多是50年代中期水平的10倍。天然氣的產量也不斷上升，1965年達到年產11億立方米，為第一個五年計劃年最高水平的40倍。

煉油和相關的石油化學產品、化肥以及制藥工業也有相應發展。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煉油只限于小型設備，每年的分餾能力平均稍稍超過100萬噸（每日2萬桶）。在1958年甘肅蘭州和1963年大慶的主要大型煉油廠建成并投產以后，精煉產品的數量和品種大幅度上升。1963—1965年的精煉產品的平均產量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的七倍，補充國內產量的進口的原油和精煉產品急劇下降。周恩來在1963年晚期自豪地宣布中國石油基本自給自足，到1965年進口量降到100萬噸，只有本國產量的10%。

合成纖維工業在1957年還處于初期階段，每年只能生產200噸。到1965年，年產量的水平是5.01萬噸。化學農藥的產量在1957年只有2200噸，但到1965年上升到1.05萬噸。同樣，化肥產量在1957年僅有15.1萬噸，而到1965年達到173萬噸。

新工業產品不限于化學制品之類的生產資料，而且也包括消費品。鐘表工業于1957年拿出了它的第一批產品400只手表。在隨后幾年中，產量不斷上升（在60年代初期沒有回降過），到1965年年產量超過100萬只。

因此，盡管工業投資在60年代前半期急劇減少，重點部門仍在繼續發展，有時還很快。這種調整所以成為可能，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中國獨立地建成了一些主要工廠，如一個生產石油精煉設備的工廠——該廠在50年代中期或后期最初由蘇聯援建，但在60年代中期蘇聯取消技術和管理援助后拖延了下來。

#### 穩定物價

恢復生產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導致了物價尤其是農村集市的物價重新穩定。在1961年市場缺貨的高峰時期，集市物價指數達到1957年的4.92倍的水平，甚至國營零售商店的價格也上漲了不少。[[82]](#_82_Xiang_Jing_Quan____Liu_Shi_N)幾乎是作為緊急措施以吸收過剩購買力，陳云制定了一項計劃，在1961年和1962年每年進口100多萬噸糖（是50年代平均年進口量的10倍），制成糖果主要在城市市場上高價銷售。城市地區的餐館也增加了食品原料尤其是珍饈美味的配給量，以很高的售價轉賣。[[83]](#_83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

從1962年起物價開始下跌，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采取了這些措施，但更為根本的是由于農業生產部分地恢復了。到1964年，農村集市價格下跌到只有1957年價格2倍的水平。國家職工生活費指數也降低了。在1961—1962年，他們付出的錢增加了20%多，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通貨膨脹率的6倍。生活費指數于1963—1965年下降，部分地由于城市市場價格降低，部分地由于零售商品的國營價格降低，后者在1961—1962年也曾經上漲。

#### 結束語

中國的國民收入反映了工農業的恢復。以實際價值計（考慮了價格水平的變動以后），1965年的國民總收入比1957年多29%，比1962年的波谷高51%。比較而言，國民收入的下降和恢復的速度都超過了美國30年代大蕭條時期國民收入的波動幅度。美國在1929年和大蕭條低谷的1933年之間，國民平均收入下降32%，相比之下，中國在1959—1962年間下降35%。由于美國經濟深層結構上的問題，美國在1940年以前沒能重新達到1929年的產量水平，1940年上距大蕭條開始10年，上距波谷7年。比較起來，中國到1964年已重新達到“大躍進”前的總產量水平，從低點算起要少兩年，原因在于倒退主要是政策失誤引起的。一旦政策得到改正，恢復就能開始。

盡管按國民收入計算恢復很快，但這既不能用來遮蓋“大躍進”的災難，也不應用來遮蓋某些領導成員未能充分理解國家陷入深淵的實質。在1958—1965年的整個時期內國民收入的增長每年只有3.2%，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達到的8.9%急劇地降了下來。[[84]](#_84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影響更大的是，“大躍進”導致了20世紀最大的饑荒，隨后又使將近3000萬人不得不重新定居。此外，盡管按人均實際價值計的國民收入到1965年超過1957年水平15%，但個人消費還沒有恢復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達到的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農業在最主要的消費品方面未能重新達到“大躍進”前的人均產量水平。如表5所示，人均谷物消費仍然低于1957年水平將近10%，實際上也少于1952年。農村消費甚至下降更多，仍然比1957年少13.3%（表5）。同樣，1965年的棉布消費仍比1957年少8.7%，而且農村人口不是按比例承受負擔，他們的消費仍少于1957年17.1%。食用植物油消費也下降，因為人均產量仍然比1957年少了將近1/4。[[85]](#_85_Wu_Qun_Gan____Guan_Yu__Da_Yu)農村地區的消費尤其低，每年人均只有1.1公斤，低于1957年水平40%，而且可驚的是，低于1960年已經下降了的水平1/4。[[86]](#_86_Wang_Ping_____Da_Yue_Jin__He)

這些數字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大躍進”在農業部門的嚴重影響。但是，它們也反映了正在進行的關于適當發展策略的爭論和保證足夠資源以維持農業發展的困難。周恩來、陳云和其他穩健人物終于成功地把調整時期延長到1965年，將第三個五年計劃的開始延緩到1966年。他們在關于鋼產量指標高低的重大爭論中引人注目地成功了，使原來提出以供選擇的2500萬和3000萬公噸減少到2000萬公噸。[[87]](#_87_La_Di___Li_Bo_Ta_Er_Bian)

但是，從更廣的意義上說，他們只不過稍稍改變了“大躍進”的失調的發展策略，在貫徹“把農業放在首位”的策略中并不完全成功。事實上，到1965年末國有工業的固定資產達到960億元，為1957年水平的3.5倍。[[88]](#_88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恢復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策略的持續壓力仍然存在。[[89]](#_89_Liu_Sui_Nian_____Diao_Zheng)即將到來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和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年）的特點明顯地反映在下列幾項政策中：

第一，在調整的最后三年中，投資增長速度急劇提高。作為本身增長很快的國民收入的一部分的積累，從1962年的10.4%上升到1963—1965年的平均數22.7%。[[90]](#_90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第二，分配給農業的投資額從1962年的21.3%的最高點下降到1965年的14.600，預示在此后十多年里還將繼續下降。[[91]](#_91_Nong_Ye_Bu_Zheng_Ce_Yan_Jiu)此外，在1962—1965年間，國家在某種程度上為了得到更多資金以發展工業，將其支付農民必須交售給國家的農產品的價格平均降低了6%。[[92]](#_92___Zhong_Guo_Tong_Ji_Nian_Jia)最后，黨在農村的作用再次增強。早在1962年，毛澤東就在為農村“階級斗爭”的新高漲而工作，借以反對他所認為的資本主義的重新抬頭。這在短期內便導致了恢復黨對農業生產的控制、收縮農村集市交易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農業生產率的停滯不前。

對中國農民來說，不幸的是，“大躍進”的主要教訓并沒有被足夠多的中國最高政治領導人所充分了解。于是一項失調的發展策略又強有力地出現在前面，這項政策將在10年中導致工業迅速發展（只在1966—1967年有短暫下降），但農業的成效卻要遜色得多。

[[1]](#_1_7)按凈增值（不是總產值）和可比價格計算。在第一個計劃期間工業和農業的增長率分別是每年18.7%和3.8%。楊堅白、李學曾：《農輕重結構》[825]，載馬洪、孫尚清合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488]，第106頁。

[[2]](#_2_7)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359頁。

[[3]](#_3_7)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681]，第119頁。

[[4]](#_4_7)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16—17頁。

[[5]](#_5_7)同上書，第17頁。

[[6]](#_6_7)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的六十周年》[583]，載《紅旗》，1981年第13期，第66頁。

[[7]](#_7_7)薄一波：《關于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582]，載《人民手冊》[364]，1959年，第240頁。

[[8]](#_8_7)薄一波：《關于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582]，載《人民手冊》[364]，1959年，第235頁。

[[9]](#_9_7)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681]，第130頁。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34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關于今冬明春大規模地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載《人民手冊》[364]，1958年，第533—534頁。

[[10]](#_10_7)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681]，第43頁。

[[11]](#_11_7)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82—83頁。

[[12]](#_12_7)薄一波：《關于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582]，載《人民手冊》[364]，1959年，第230頁。

[[13]](#_13_7)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89—90頁。

[[14]](#_14_7)薄一波：《關于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582]，載《人民手冊》[364]，1959年，第237頁。

[[15]](#_15_7)《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156]，第295頁。

[[16]](#_16_7)崔捷：《基本建設的調整》[726]，載柳隨年編《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以下簡稱《六十年代》）[473]，第73頁。譯者注：原文如此。據所列數字僅兩年超過。

[[17]](#_17_7)吳群敢：《關于大躍進失誤和調整的歷史經驗》[815]，載柳隨年編《六十年代》[473]，第26頁。

[[18]](#_18_7)《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156]，第107頁。

[[19]](#_19_7)《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103頁。

[[20]](#_20_7)徐棣華：《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327]，載柳隨年編《六十年代》[473]，第123124頁。

[[21]](#_21_7)《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393頁。

[[22]](#_22_7)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42頁。

[[23]](#_23_7)《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122頁。

[[24]](#_24_7)同上書，第158頁。

[[25]](#_25_7)同上書，第103—105頁。

[[26]](#_26_7)較小的數字是將官方關于增加的死亡率的資料應用于官方公布的一系列總人口的數字而得出的。但是西方人口統計學者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的資料在1949年后的整個時期里少算了死亡率。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如果不承認實際死亡率高于公布的死亡率，中國關于年齡結構和按年齡的生育率資料便不能和公布的人口總數一致。科爾估計，在1953—1964年之間登記了全部死亡人數的63%，在1964—1982年之間，登記的死亡人數上升到85%。科爾估計，如果考慮到少登記的死亡，在1958—1963年之間多死2700萬人。安斯利·科爾：《1952—1982年間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175]，第70頁。

[[27]](#_27_7)廣泛認為，中國的嬰兒死亡率資料一直少報了，這大概解釋了沒有登記死亡的大部分原因（[參見此處](#_26_Jiao_Xiao_De_Shu_Zi_Shi_Jian)）。利用官方公布的年齡結構、按年齡的生育率和人口總數重新推算的中國人口動態表明，1957年和高峰的1960年之間的嬰兒死亡率增加了一倍多。朱迪斯·班尼斯特：《中國人口新資料的分析》[17]，載《人口和發展評論》[586]，10.2（1984年6月），第254頁。

[[28]](#_28_7)瑪麗-克萊爾·貝爾熱爾：《1920—1922年的中國生存危機》[40]，載《經濟、社會、文化紀事》[10]，38.6（1973年），第1361—1402頁。

[[29]](#_29_7)同上書[40]，第1398頁，估計死亡人數“超過200萬”。何炳棣：《136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302]，第233頁，估計在陜西一省有300萬人死亡。

[[30]](#_30_7)何炳棣：《136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302]，第232頁。

[[31]](#_31_7)達納·G.達爾林普爾：《1932—1934年的蘇聯饑荒》[193]，載《蘇聯研究》，15.3（1964年1月），第259頁。

[[32]](#_32_7)最權威的“農村饑荒”參考資料是薛暮橋和駱耕漠寫的。在“大躍進”開始時，薛同時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和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和國家統計局局長。到1961年他只保留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駱在“大躍進”時期也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薛暮橋：《當前我國經濟若干問題》[330]，第14頁。駱耕漠：《關于我國計劃經濟的形成及其發展的曲折過程的分析》[477]，《經濟研究》[140]，1981年2月，第42頁。

[[33]](#_33_7)《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177頁。

[[34]](#_34_7)《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156]，第138—139頁。

[[35]](#_35_7)王平：《大躍進和調整時期的人民生活》[766]，載柳隨年編《六十年代》[473]，第169—170頁。

[[36]](#_36_7)趙興漢、曹振良：《淺談農產品收購中的一物多價》[89]，載《價格理論與實踐》，1982.4，第26頁。項鏡泉：《六十年代調整時期穩定物價經驗初探》[312]，載《價格理論與實踐》，1982.2，第22頁。

[[37]](#_37_7)薛暮橋：《關于一九五八——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建設的情況和經驗》[332]，《經濟參考資料》，1[139]，第13—14頁。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225頁。

[[38]](#_38_7)在1943年的孟加拉饑荒中，有300萬人死于饑餓和相關的事件，主要的日常食品稻米的價格到1943年5—8月上漲到最高峰，為1941年水平的4—5倍。饑荒的前一年1942年國家制訂了一項禁止各邦間稻米貿易的禁令，有效地制止了谷類流入孟加拉邦，否則將減緩該邦谷類價格的螺旋上漲。直到印度全國政府制訂出統籌各邦間糧食運輸的計劃，才在1943年的最后幾個月打破了價格的螺旋形上升。1974年的孟加拉國饑荒提供了另外一個例子，其谷類價格上漲的幅度遠遠低于中國。1974年10月稻米零售價格上漲到高峰，比1973年12月水平高210%，在受饑荒影響最嚴重的朗布爾地區，稻米最高零售價格比1973年12月水平高265%。雖然政府公布的由于饑荒而死亡的官方數字是2.6萬人，獨立的估計則把死亡數提高了許多倍。見A.K.沈《貧窮與饑荒：一篇關于權利與權利喪失的論文》[648]，第64、66頁。

[[39]](#_39_7)《遼寧經濟統計年鑒，1983年》[449]，第424頁。

[[40]](#_40_7)肯尼思·R.沃克：《中國食用糧食的收購和消費》[759]，第87頁。

[[41]](#_41_7)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41頁。

[[42]](#_42_7)柳隨年編：《六十年代》[473]，第180頁。

[[43]](#_43_7)譯者注：原文如此。應為2.5倍多，參見本書表6。

[[44]](#_44_7)托馬斯·P.伯恩斯坦：《斯大林主義、饑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時期的糧食收購》[46]，載《理論與社會》[710]，1984年第3期，第344頁。

[[45]](#_45_7)參見本書表6。

[[46]](#_46_7)在孟加拉因饑餓而死亡的高峰年1949年，格里諾估計有370萬人死亡，其中170萬不是在饑餓狀態下死去的。死亡絕大部分發生在農村，孟加拉原來的農村人口是5520萬。因此，1943年的死亡率是67‰，略多于30‰的正常死亡率的兩倍。雖然安徽省高峰年的死亡率和孟加拉邦實際上相等，但正常死亡率可能是孟加拉的一半左右——因此，安徽死亡率的增加量要大得多。保羅·R.格里諾：《現代孟加拉的繁榮與苦難：1943—1944年的饑荒》[277]，第200、309頁。

[[47]](#_47_7)菏澤、德州、聊城和惠民四個地區陷入這種狀況的深度是驚人的。到1961年，棉花產量少于第一個五年計劃水平的10%，谷物產量降到100萬公噸以下，比較起來，1956—1957年的平均產量是300萬公噸，1959年是225萬公噸，1960年是160萬公噸。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117頁。

[[48]](#_48_7)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經濟地理研究室：《中國農業經濟地理總論》[165]，第366頁。

[[49]](#_49_7)尼古拉斯·R.拉迪、肯尼思·利伯塔爾編：《陳云的發展中國的策略》[425]，ⅩⅩⅤ。

[[50]](#_50_7)同上書，xli。李銳：《讀 〈彭德懷自述〉》，載《光明日報》，1982年3月30日，第5版。

[[51]](#_51_7)鄧力群：《向陳云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707]，第54—55頁。

[[52]](#_52_6)1958年因災禍和自然災害而減產三成以上的播種面積是1373萬公頃。1956年和1957年遭受同樣損失的面積分別是1523萬公頃和1498萬公頃。《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212頁。

[[53]](#_53_6)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統計資料選編》[158]，載薛暮橋編《中國經濟年鑒，1982年》[331]，viii—38、vii—47、viii—59。

[[54]](#_54_6)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131頁。

[[55]](#_55_6)《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156]，第195頁。

[[56]](#_56_5)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180頁。

[[57]](#_57_5)鄧力群：《向陳云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707]，第8頁。

[[58]](#_58_5)克耶爾德·埃里克·布羅茲加德：《改革例證：中國經濟的調整與改革，1953—1982年》[64]，載《現代中國》[532]，1983年第2期，第255—256頁。

[[59]](#_59_5)陳云：《青浦農村調查，一九六一年八月》[117]，載《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112]，第130—146頁。

[[60]](#_60_5)拉迪、利伯塔爾編：《陳云的發展中國的策略》[425]，ⅹⅹⅰⅹ—ⅹⅹⅹ。

[[61]](#_61_5)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181—182頁。

[[62]](#_62_5)肯尼思·R.沃克：《中國食用糧食的收購和消費》[759]，第155、158頁。

[[63]](#_63_5)應作尺，下同。——譯者注

[[64]](#_64_5)趙興漢、曹振良：《淺談農產品收購中的一物多價》[89]，《價格理論與實踐》，1982年第4期，第28頁。王平：《財貿方面調整的情況和經驗》，載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148頁。

[[65]](#_65_4)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195頁。

[[66]](#_66_4)拉迪、利伯塔爾編：《陳云的發展中國的策略》[425]，ⅹⅹⅹⅰⅰⅰ。昊群敢：《關于大躍進失誤和調整的歷史經驗》[815]，載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35頁。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472]，《黨史研究》[695]，1980年第6期，第29頁。

[[67]](#_67_4)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中國的政治與清洗》[702]，第448—450頁。

[[68]](#_68_4)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472]，第27頁。《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126頁。

[[69]](#_69_4)謝渡揚：《回顧六十年代初農業的調整》[320]，載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60頁。

[[70]](#_70_3)昊群敢：《關于“大躍進”失誤和調整的歷史經驗》[815]，載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48頁。

[[71]](#_71_2)同上書，第46頁。

[[72]](#_72_2)《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453頁。

[[73]](#_73_2)謝渡揚：《回顧六十年代初農業的調整》[320]，載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57頁。

[[74]](#_74_2)S.C.陳：《連江縣的農村人民公社》[102]，第81—122頁。

[[75]](#_75_2)1957年到1961年之間在中國南部大約損失了75%的小型鐵制農具、35%—40%的竹木工具、40%的傳統中型農具、35%的 農用船只，在中國北部損失了30%的大車。謝渡揚：《回顧六十年代初農業的調整》[320]，載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54頁。

[[76]](#_76_2)陳云：《加速發展氮肥工業，一九六一年五月》[116]，載《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12]，第108—115頁。

[[77]](#_77_2)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第45頁。

[[78]](#_78_2)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207頁。

[[79]](#_79_2)同上書，第200頁。

[[80]](#_80_2)《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162—164、171—172、178、245頁。

[[81]](#_81_2)鮑大可：《從全球角度看中國經濟》[25]，第460頁。

[[82]](#_82_2)項鏡泉：《六十年代調整時期穩定物價經驗初探》[312]，第22頁。

[[83]](#_83_2)《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439頁。陳云：《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1962年2月）》[118]，載《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12]，第169頁。

[[84]](#_84_2)《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23頁。

[[85]](#_85_1)吳群敢：《關于“大躍進”失誤和調整的歷史經驗》[815]，第37頁。

[[86]](#_86_1)王平：《“大躍進”和調整時期的人民生活》[766]，載柳隨年《六十年代》[473]，第173頁。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472]，第24頁。

[[87]](#_87_1)拉迪、利伯塔爾編：《陳云的發展中國的策略》[425]，ⅹⅹⅹⅰⅰⅰ—ⅹⅹⅹⅰⅴ。

[[88]](#_88_1)《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12頁。

[[89]](#_89_1)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472]，第29頁。

[[90]](#_90)《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25頁。

[[91]](#_91)農業部政策研究室：《中國農業經濟概要》[530]，第103頁。

[[92]](#_92)《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57]，第455頁。

## 第九章 教育的新方向

根據對中國1949年以后習慣上的時期劃分，1958年的“大躍進”標志著蘇聯直接影響的結束和一條新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個時期引導中國教育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則之一，很可能是受到了對教育方面“斯大林模式”的批評的啟發，而這種批評是蘇聯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開展起來的。蘇聯早在1956年通過的關于勞動在教育中的作用的決定，直至1958年正式頒布之前，在蘇聯的教育中一直未被廣泛推行。這些被視為“赫魯曉夫改革”的決定，旨在縮小教育與實際生活的距離。在推行這些決定時，赫魯曉夫抱怨那些未能升入大學的高中畢業生沒有做好生產勞動的準備。他指出：“正是一些青年人，他們不愿意去做工或務農，覺得那樣有損于他們的身份。”[[1]](#_1_Yin_Zi_Jian__Ying_Ge_Wa__Luo)

因此，1958年蘇聯教育改革的構想是：讓所有中學生都做好參加勞動的準備，而不論他們何時結束學業，生產訓練也被列入必修課中。每年升入蘇聯高等院校的新生，至少應有80%從那些中學畢業后勞動過兩年以上的人中招收。[[2]](#_2_Qiao_Zhi__Z_F_Bei_Lei_Dai___W)

赫魯曉夫的改革從來沒有同蘇聯的教育體制成功地結合過，也沒有使它的主要倡導者逃脫政治上垮臺的命運。在中國，一種有關勞動教育的類似的討論也是從50年代中期開展起來的，而1958年的改革則具有一種更為復雜的歷史。一部分原因是，改革的主要倡導者在位的時間更長，因此改革持續的時間更久。另一部分原因是，政策的實施依據的是群眾運動的方式，改革開展得更為堅定，更為猛烈。這種“方式”，是在1949年以前的農村經驗（這種經驗和延安發展模式都是中國共產黨在適應民族習慣時所獲得）的基礎上的又一新發明。

早在40年代中期，毛澤東就已發現了很多這類慣常的做法，它們使群眾的力量與情緒能夠用來戰勝對重大社會變革的反抗。這一發現在許多方面都很好地滿足了黨的需要，包括土地改革、農業改造以及50年代初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反動表現的運動。采取群眾運動方式所要付的部分代價，就是在運動過程中時常發生的過火行為。但是，毛澤東在他的1927年關于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的一個經常被翻印的段落中寫道：“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而在群眾運動最后的“鞏固”階段，這些損失總是被控制住，過激舉動也得以糾正。在那種時候，過激舉動就可能被歸咎為是少數不聽信號而仍遠遠跑在前頭的誤入歧途的人所為，或者是少數“在幕后”蓄意制造麻煩的人所為。不過，在1958年，為了推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還更著名），這一方法還是被最狂熱地利用了。這一次，過激舉動不是那么容易被遏止，最終的責任也不那么容易被轉嫁。[[3]](#_3_Guan_Yu_Jiang_Qun_Zhong_Yun_D)

中國的新戰略實際上并未放棄蘇聯模式，更確切些說，是力圖造成一種能讓人接受的對蘇聯模式的適應性。其結果便產生了“兩條腿走路”的思想，即希望既采用現代手段也采用傳統的或土生土長的手段來獲取更多、更快、更好的成果。這后一種手段，從精神上與形式上說都來自黨的延安經驗，只是現在整個社會與經濟都正在被調動起來，同時設法致力于使一體性、質量、計劃的原則同靈活性、數量、地方自主的原則結合起來。因此，即使就教育而言，1958年改革的目標也遠遠超過了蘇聯在同一時期所提出的目標。

## 教育“大躍進”：1958年

教育方面的重要文獻是1958年9月19日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發的“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4]](#_4___Ren_Min_Ri_Bao_____1958Nian)這項指示號召開展文化革命，批評了教育工作中忽視政治、忽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忽視生產勞動的錯誤。它要求同那種“為教育而教育”、“勞心與勞力分離”以及“教育只能由專家領導”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堅決的斗爭。

為了加強黨的領導，這一指示概括地論述了不久將在整個教育制度中實施并保留了該制度主要特點的一些改革。這些特點正如繼承于蘇聯制度中的許多特點一樣，在提出它們的政策變成歷史以后仍將繼續長期存在。所有中央政府各部門所屬的學校，在政治上應該受當地黨組織的領導。在一切高等學校中，應當建立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這是因為一長制，或者說一個人的管理，容易脫離黨的領導，因此是不妥當的。

學校黨委，應當配備黨員去做校內的學術和行政領導工作；而黨委成員，包括黨委書記，要力求擔任政治課的教學、研究工作。在提拔師資時，要首先注意政治思想條件、學識水平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正式的學校文憑和資歷應當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鑒定學生的時候，同樣要首先注意政治覺悟的程度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后注意課內學習的成績。

為了最終打破每所學校在教學、科研和行政管理上的資產階級學術統治，提出了六項措施。這些措施旨在使“群眾”（包括學生）參與學校管理的各個方面成為制度化。六條“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的第一條，是“大鳴大放”和大字報。要聘請有實際經驗的人同專業教師共同授課。學生們要參與對同學的鑒定。包括黨團干部在內的領導人員要盡可能在生活和勞動中同學生打成一片，教師應該接近學生，與學生之間建立“民主的平等的”關系。

在所有各級學校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每個學生必須依照規定參加一定時間的勞動。為了推行新的勤工儉學運動，學校應在所在地區政府的指導和幫助下辦農場或工廠。學生們可以在學校自辦的工廠和農場中勞動，也可以到校外的工廠和農業合作社去參加勞動。工廠和農業合作社也要辦自己的學校。

對教育提出的數量指標，就像對經濟所提出的一樣，是過高的。自1958年起的3—5年時間內，要基本上掃除文盲并普及小學教育。在相同的時間內，農業生產合作社（或假定在剛剛建立的新的公社制下的它的同級單位）要社社有中學，還要使學齡前兒童都能入托兒所或幼兒園。在15年內，要使每個有條件的自愿的人，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然后再用15年時間從事高等教育的提高工作。

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是全國統一的。但是，為了這個統一的目標，可以采用很多不同的辦學形式，包括國家辦學與集體辦學并舉；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并舉；成人教育與兒童教育并舉；全日制學校、半工半讀學校和業余學校并舉；免費的學校與不免費的學校并舉。

更具體地說，在群眾中迅速普及教育和提高工農業技術水平的任務交給了半工半讀學校和業余學校。這是因為這些學校可以不要政府的財政支持就自己辦起來。它們也不需要專業人員，依靠的是“能者為師”的原則。這類學校在課程、師資、設備方面將逐漸變得更加完備。這時候，業余學校與半工半讀的學校就沒有區別了，所有學校都將變為免費的學校。

1958年9月的指示還規定，某些現有的正規學校應擔負提高教育質量的任務。這部分學校必須有完備的課程，注意提高自己的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質量。這一指示說：“這些學校應該在不損害原有水平的情況下，努力幫助建設新校的工作；但降低這些學校的水平，對整個教育事業來說是不利的。”

同一指示包含了將在今后20年內設法促進教育的發展，并沿著有利于穩定的道路繼續探索能令人滿意的平衡的所有要素。據說，在1958年，當時的大辯論是針對“某些資產階級教育家”以及贊同他們的“我們的某些同志”的，他們打算限制教育發展的范圍和速度。據說他們還提倡只搞一種形式的學校制度：由國家開辦并由國家提供資金，具有正規的校舍、正規的教師和正規的教育方法的學校制度。這些“錯誤建議”遭到了反對。毛澤東“兩條腿走路”的戰略被用來作為適當時期內在工農群眾中普及教育的唯一手段。

陸定一進一步解釋了新的戰略，他說，沒有這個新的戰略，“我國要想普及中小學教育就很困難……因為國家無法負擔這筆龐大的經費，而且生產也會大受損失”。為此，他宣布：“我們共產黨人與資產階級教育學者不同。”[[5]](#_5_Lu_Ding_Yi____Jiao_Yu_Bi_Xu_Y)

10年之后，這些“錯誤建議”將被認為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以及幾千年舊教育制度的殘余”。[[6]](#_6___Shi_Qi_Nian_Jiao_Yu_Zhan_Xi)劉少奇后來被定為倒退路線的象征性代表，可能是因為一些更具體的理由。毫無疑問，除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不合邏輯的指控外，沒有證據能證明，當50年代資產階級教育家提倡一條腿走路的時候，劉少奇是站在資產階級教育家一邊的。

一方面，堅決地反對引進蘇聯教育模式的，正是資產階級教育家們自己；而后來加給劉少奇的罪名，也是說他贊成資產階級教育家的意見。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的是，1958年9月的指示是那些指控劉少奇的人們作為革命性文獻而接受的，但這一指示卻包含著明確的指令，即提倡兩種不同的教育：符合正規制度的求質量的學校教育和符合半工半讀趨勢的大眾教育。這反映在這一時期的主要口號“兩條腿走路”中。然而，正是這種“雙軌制”，后來卻被指責為劉少奇修正主義在教育中的最主要的特征。[[7]](#_7_Tong_Shang_Shu__Di_31__33Ye)

當這條新路線看來肯定要推行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們對它提出了反對。他們已不必再事事效仿蘇聯了，但是丟掉的這個包袱只不過是被另一個同樣沉重的包袱所代替，基本的蘇聯式高等教育結構仍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實際上，他們在1957年5月和此前發出的大多數怨言，在“反右運動”和隨之而來的“大躍進”過程中都被蕩滌一空。他們所反對的狀況實際上更強化了。后來對劉少奇提出指控的那個事實，由于道理不足而不再提了，因為從邏輯上說不可能同時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他身上：既提倡蘇聯模式，又站在反對這一模式而又要求單軌制正規教育形式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一邊；既主張雙軌制，又反對1958年9月指示所明確說明的“兩條腿走路”方針。[[8]](#_8_Guan_Yu_Gen_Ju_Qi_Ta_Zi_Liao)

既然后來的指控中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那么，對1958年的指示及隨之而產生的政策的似乎最有道理的解釋就是，這些指示和政策正好代表了黨在那個時期所主張的東西，即，一種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既普及教育，同時又盡力保持現有體系的優點的企圖。為了能弄明白后來的指控的意思，我們必須轉而考慮1958年所提出的方針是如何實施的，以及教育制度在那一過程中是如何得到改造的。

1958年，在農村，公社代替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教育的擴展成了創造這一新的農村組織形式的運動的陪襯。據說在1958年，有6000萬人投身于“掃盲運動的高潮”。“數百萬人”上了新成立的成人農民業余學校。到了1958年第四季度，在很多地區，這種業余學習“陷于停滯”，因為這種學習受到了秋收和伴隨全國性土法煉鋼運動而增加的活動的雙重壓力。公社接到指示，學習活動明年春天再行恢復。[[9]](#_9___Zhong_Gong_Zhong_Yang___Guo)

在1958年，小學也“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據報道，到9月份，新建立的小學校已有33.7萬所，全國小學生入學人數從1957年的6400萬人增加到8400萬人。根據一個月以后的另一項報道，小學生入學人數實際已達9260萬人，小學校的數目則已接近100萬所。[[10]](#_10___Cong_Mei_You_Zhe_Yao_Duo_R)如前所述，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手段就是建立民辦學校。作為既席卷農村又席卷城市的群眾運動的一部分，這些學校被開辦、起來，數字在不斷增加。

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這種民辦主張都適用于中學。它使得中學的人學人數到1958年秋季學期開始時比1957年的700萬人增加了一倍，達到1400萬人。民辦思想同半工半讀課程相結合的農村民辦中學，是這一時期的發明。這些學校代表了在農村推進群眾性中學教育的最初嘗試。據官方統計，1955年全國每個縣平均只有1.7所中學。城市中學未計算在內。[[11]](#_11_1958Nian_Ru_Xue_Ren_Shu_Gen)

新的農村中學就方向上說是職業性的。除了基本的語言、數學和政治課外，還要上農業生產技術課。學習規定以初中念完為期限，目的是使學生為將來作為農業生產者而生活做好準備。這些學校通常是以半工半讀為基礎進行管理，企圖通過學生勞動項目的收入大部分實行自給。學校的建筑與土地由合作農場以及后來的公社提供，隨后所需的費用則主要通過學生的生產勞動所得來支付，學生最重要的生產勞動是在由集體為此目的而分給學校的土地上從事耕作。

官方對宣傳這些學校的經濟性質甚為迅速。來自江蘇省的一組數字表明，在普通初級中學中，國家每年要為每個學生負擔187元的費用，而農村中學的學生卻只需13元。就最初提供的數字而言，它與浮夸的要求相吻合，與那個時代的風氣是一致的。到了這一運動的調整階段之后的1960年，已有了將近3萬所這類學校，平均每個公社約有一所，其學生總數達到290萬人。[[12]](#_12_Luo_Bo_Te_D_Ba_Lun_De_Sen)

當民辦思想應用于學校教育的第三級，并以15年內普及高等教育為目標時，就不那么成功了。據稱，到1958年8月，高等院校的數字已從1957年原有的227所增加到1065所。大學生人數從40萬人增加到70萬人。另外，到1958年秋，已建立了2.35萬所業余“紅專”大學和半工半讀大學。[[13]](#_13_Guan_Yu_1957Nian_De_Shu_Zi)

業余“大學”是由工廠和公社為成年工人和農民開辦的。這些學校自稱在各個學科中——不論是專業學科還是普通學科，都能提供較為先進的指導，對任何符合教師條件的人都給予信任。在調整時期以及隨后出現經濟困難的那幾年，大多數這類學校都未能幸存下來，只有少數后來還有耳聞。

不過，結合半工半讀而運用民辦思想的試驗，在1958年時遍布于所有各級。其中最富有創造性和最成功的例子——可能由于創辦它得到國家領導人的欣賞——是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江西共大），它也創建于1958年。這所學校在調整時期仍然保留了下來，接著又成了全國的樣板。在國家領導人中，與這一農村教育的試驗有個人聯系的，有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負責建立這所學校的省里的最高領導人是江西省省長邵式平（據認為是該大學的創建者）、省委書記劉俊秀（共大第一任校長）和副省長汪東興（校黨委書記，不久后他調回北京，再次負責公安部，“文化大革命”期間升入中央政治局）。這所大學是由江西省領導與中央的國家農墾部及省的農墾局共同建立的。

江西共大的特點是有一個建立在全省農墾基地之上的分校網，各個分校成了農墾工作的組成部分。學生們（以及工作人員）起初的主要工讀活動是墾荒。這些土地原本都是未經開墾的，由農墾局根據協議分配給他們，他們將其再造為森林地或植上樹。學校的建筑也是由學生和學校的工作人員建的。從1958年到1962年，學生用于學習和勞動的時間大約各占60%和40%。1962年以后，學校的基本建設已經完成，學習時間增加到約70%。

學生的主體以從中學到大學的年齡段者為多。1958年的第一屆學生中，有很多是曾被派往農墾基地的干部，分校就是在那些基地上建立的。但是，成年干部和工人從沒有成為學生的主要來源。這所大學主要在江西省內招生，但從1958年到1965年間，也有從其他各地來入學的。例如，有好幾千學生來自上海。招生是通過各種不同方式進行的，至少在開始時，學生受教育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從“粗識幾字”的到高中生都有。分校很快就在全省普遍建立起來，一個縣至少有一所，此外還有專區一級的分校以及位于省會南昌市郊的主校。這些學校都教授從初中到大學的各級學校的課程。分校在學校事務和政策問題上受母校的指導和領導，而整個聯合體的精力則主要放在農業和林業專業上。

截至1980年，畢業于共大的學生累計20萬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成了“農村基層干部”，雖然不一定是畢業分配去的。共大畢業生的分配工作遵循兩條不同的原則。縣級分校的學生根據“社來社去”的原則通常仍返回其本公社，然后根據當地的情況按需分配工作。他們中的很多人后來成了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領導。

專區級分校和主校的畢業生（1965年以前有很多來自外省的學生），有時是按照社來社去的辦法，有時則根據正常的工作分配計劃和步驟來進行。按照后一種辦法分配的學生，就成了縣里和省里負責農業、林業、農墾以及其他一些領域（共大不時開設這些領域的課程）的機關和部門的干部。這些畢業生中的很多人后來成了公社黨委書記。共大學生通常是分在江西省工作，不過有些外來的學生又回到本省去了。

江西共大從來也不是完全自給自足的（能夠不依靠國家某種形式的財政支持而生存下去），但從這整個聯合體的全部歷史看，其相當一部分收入仍舊是依靠學生的勞動和學校的生產事業。經過一段時間以后，它的那些事業發展了起來，除了農墾和造林，還包括工廠、林業中心、果園和牧場等。這樣，為了未開墾土地的分配、有利可圖的產品項目的轉讓、供應品的有保證的配給以及運輸和銷售最終產品，便需要有一個縣級和專區級支持的擴大的網狀組織。不過，據學校的行政官員說，地方當局在面臨稀有資源競爭的情況下情愿加強支援網的一個原因，是這所學校起先是由高級別的領導人所創辦，而且隨后得到了創辦人的關照。按這些行政官員的看法，政治和行政的支援網是這所大學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不論政治與經濟如何發生變動，包括60年代初經濟困難時期它的分校有一半被關閉，這所學校的重要地位仍然得到了毛澤東的確認，他在1961年7月30日的指示中贊揚了它的半工半讀方向。它的地位一直維持到1979年，此后它的主校改成了一所正規的全日制農業大學，其分校則被撤銷。這樣做的原因是，堅持半工半讀方向所培養出來的是一種已不再被中國新的標準化的高教制度所承認的學生。[[14]](#_14_Ju_Zuo_Zhe_1980Nian_10Yue_Za)

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之所以獨一無二，不僅因為它取得了如此的成功，還因為它是全省性的學校，以及它持久地信賴半工半讀的課程。正規的全日制中等和高等學校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響應了1958年關于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起初，在1958年下半年，大煉鋼鐵風行一時。干部、知識分子和學生參加農業勞動在這一時期也被大肆宣揚。另外，到1958年底，中等和高等學校共開辦了15萬多個工廠、車間和10300個農場。在這些工廠和車間中，有7200個是高等院校所辦，21500個是中等專業學校所辦，122800個是中學所辦。[[15]](#_15___Jiao_Yu_Gai_Shu_______Bei)

由于力求與蘇聯模式相適應，因此有關教育發展方面的“大躍進”戰略并未過多地拋棄蘇聯模式，但它仍然顯示了對所有這些革新的自力更生性質的強調。在突出勞動與學習相結合的實踐的和理論的意義的同時，也同樣強調了這些革新在經濟上所具有的意義。用于農業中學的預算分配表明，國家教育預算的主要部分繼續用于正規的全日制學校。在接近1958年底發表的一份有關文教的財政工作報告中，這一點也得到了證實。就在那一年中，據說大學生的人數增加了78%，中學生增加了一倍，小學生的入學人數則增加了70%，所有這些主要是地方辦半工半讀學校這一新事物的成果。而在同時期內，國家財政支出僅增加5%。[[16]](#_16___Cai_Zheng_Bu___Wen_Hua_Bu)

然而，1958年的新路線看來對“右派”學術批評家一開始就沒什么妥協的余地。正如情況所表明的那樣，新的高等教育的專門化結構仍然保持下來，教研組作為基層組織單位也保留下來。在這個時期，蘇聯式體制中很多不太重要的特點被拋棄或得到修正，但取代它們的東西仍然與傳統學術性不合。高教部被撤銷，新的學位制方案也被撤銷，后者直到70年代后期才恢復。已經列入這些方案內的學生在1959年是不帶學位而分配工作的。

“三三”制被引入了高等學校。這是一種支配了所有法定工作時間的循環制，即教學人員要用1/3的時間從事教學，用1/3的時間進行研究，用1/3的時間開展社會調查。目的是培養教學人員能同樣良好地完成這三項工作。[[17]](#_17_Su_Shan_Nuo__Pei_Po____Zhong)

教學計劃與教科書的修改立即開始，為的是將學生參加勞動和內容更為實用這些新的要求結合進去。但是這些修改必須通過“民主的”方式來完成，要由學生、技術專家和職業教師共同參加。筆者在香港的一位被采訪者是50年代末北京的一位年輕的大學教師。他敘述了他們是如何修改大學化學基礎課教材的，他把這種刪減和簡化形容為是一種相當合理的努力。相比之下，引起一位俄國科學家反感的是，他發現昆明師范學院學化學的低年級學生在學習中修改了他們的有機化學課本。化學系也決定拋棄美國和蘇聯的無機化學教學中所遵循的專門用來鑒別所有普通元素的“資產階級”方法，而代之以集中力量研究銅，因為云南有大量的銅。[[18]](#_18_Mi_Ha_Yi_Er__A_Ke_Luo_Qi_Ke)

一種大學入學的新形式也在1958年開始采用。那一年沒有進行全國統一的大學入學考試。取代它的是由高等院校單獨或聯合進行的各自的考試，就像它們1952年以前的考試辦法一樣，不過教育部仍下發了考試科目的指導大綱。可是，1958年的大學招生還有個特點，就是強化了對政治標準的使用，這種使用是從正反兩方面進行的。有某種家庭背景的青年——主要是那些出身于資本家和地主家庭的人，特別是那些其父母在以前的運動中被挑選出來作為打擊對象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視。

如果這種問題足夠嚴重，那么有這種問題的人就將完全被拒之于大學校門之外。舉例來說，筆者在香港的一個被訪問者，他的父親是逃往臺灣的江西的一個資本家兼地主，還是國民黨軍官。由于這種再壞不過的家庭出身，他的兒子在1958年不能進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雖然他在那年通過了該大學的入學考試。他也不能進入這一地區的其他任何大學學習。最后他只能在精心地掩蓋了自己的真正出身之后，才進了哈爾濱的一所技術學院。沒有太嚴重政治問題的人可以進大學，但也只能是師范學院之類的不太受歡迎或沒什么聲望的學校。

相比之下，工農出身的投考者或參加過革命工作的干部投考者則可以優先入學。更具體地說，在1958年，工人、農民、速成中學的工農畢業生及干部，只要具備推薦的條件，不需經過任何書面考試就可以上大學。[[19]](#_19___Guang_Ming_Ri_Bao_____1958)大批學生顯然是以這種方式上了大學。中國高等學校中每年出身于工農的學生比例，從1951年的19%增加到1957年的36%。由于實施了新的優先入學辦法，到1958年這部分人增加到48%，而1959—1960年則增加到50%。[[20]](#_20_Guo_Jia_Tong_Ji_Ju____Wei_Da)

科學計劃也受到了影響。20年規劃的實施時間表被縮短了5年。研究所抓緊提前完成分派給它們的任務。另外，還建立了數百個新的研究所，設立了數千個新的科研項目。那些不滿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即對中國的“飛躍”持懷疑論者，看到了他們的地位被工人階級同事們削弱了。幾千名熟練工人被提升為工程師和技術員，而同樣多的農民則變成了科學家。后者中有很多人被委派到農業研究所和農業大學的崗位上去。據報道，到1960年，有4.5萬名上海工人和農民科學家參加了那里的科學技術協會，接近其會員人數的一半。這些科學家被稱贊為新型的知識分子，他們并不是老式知識分子的變型，他們仍繼續從事生產勞動，并不把他們的腦力工作當做個人所有的權利來對待。[[21]](#_21_Zheng_Zhu_Yuan____1949__1963)

## 余波：1959—1960年

到1958年底，所有戰線上的群眾運動高潮都已過去，然后常有的緊縮和反思開始了。像過去多次出現的那樣，“群眾運動的規律”繼續發揮著作用。隨著事態的發展，運動的參加者們發現他們自己被重新分為左或右，這要由他們所關心的事物和傾向性來定。彭德懷在1959年7月黨的廬山會議中站到了對立面上，其結果是被罷了官。毛澤東則寸步不讓，但據后來的解釋，他也不是沒有為前一年發生的某些經濟上的過分行為承擔責任。

與工業和農業的統計數字不同，教育的統計數字不必等到廬山會議上才往下修正。在1959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周恩來雖然沒有實際上承認對教育的數字估計過高，但他提供的1958年入學數字比幾個月前所公布的要低得多。他提供的數字是：大學生66萬人，中學生1200萬人，小學生8500萬人（有關簡要數字參見392頁表9）。

在指出今后的道路時，周恩來在他的報告中評論說：“去年一年，各級學校都有了很大的發展；現在需要在這個大發展的基礎上進行整頓、鞏固、提高的工作。”在進一步表明黨的教育方針將要著手的重大行動時，他又說：

在各級全日制的正規學校中，應當把提高教學質量作為一個經常的基本任務，而且應當首先集中較大力量辦好一批“重點”學校，以便為國家培養更高質量的專門人才，迅速促進我國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22]](#_22_Zhou_En_Lai____Zheng_Fu_Gong)

教育部新部長楊秀峰在同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作了更為明確的發言。他說，在1958年，由于缺乏經驗，學校為了生產勞動而砍掉了太多的課（中文原文為“上課少了些”，——譯者）。現在應該努力對此作出改正，把生產勞動正式列入教育計劃，但要明確其目的性。他重申了1958年9月指示中的這一點：必須將群眾性半工半讀學校的勞動與以求質量為方向的全日制學校的勞動區分開來。他說：我們要“提高各級全日制學校的質量，并且在全日制學校當中，挑出一批學校，作為重點，著重提高質量，使成為教育事業中的骨干”。他贊揚這種有選擇性的發展是一種“合理使用有限的力量”的方法，這樣才能“既照顧普及，又注意提高”。[[23]](#_23_Xin_Hua_She_____Ying_Yu__Bei)

這樣，不平均發展的路線就很明確地形成了。但它是1958年9月那個“革命性”指示的直接的必然結果，該指示毫不含糊地號召要把半工半讀學校的勞動與其他學校的勞動區別開來。這種雙軌制以及其中所固有的社會不平等，后來被稱為是劉少奇與毛澤東關于教育方針的主要分歧點。假如的確如此，那么這兩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也應該發生在后來，要不然列入1958年9月革命性指示中的關于求質量的學校的條款就是違背毛澤東的意愿的。爭議可能是當整個社會卷入“兩條腿走路”變得明顯時產生的。而且，這種爭議，只有在該制度以被規定的方式實際開始發揮作用之后才可能發生，也就是說，只有在群眾運動發動起來之后，在用來發動群眾的原則開始制度化之后，它才可能發生。

緊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于1959年的五六月間共同發布了一系列有關教育的指示。其中一項關于高等學校的指示承認，在1958年中，各省、市和中央政府各部成立了700多所新學校。這項指示提到：“某些學校符合高等院校的標準，可以繼續辦下去。”指示接著列出了用來確定應否允許一所學校繼續辦下去的具體標準；如果可以辦下去，就應給這所學校確定準確的名稱，如學院、技術學校或干部培訓班等。

另一項關于對學制進行試驗性改革的指示指出，很多學校根據1958年10月發布的一項中央指示貫徹了這種試驗。1959年5月的新指示就試驗提出了嚴格的界限，它涉及課程的改變、教學方法以及將中小學從12年制減并為10年制（12年制是以1949年以前的學制為基礎，也是以美國的實踐為基礎；蘇聯則實行10年制）。今后在各省、市，只有少數專門被選定的中小學才能繼續這種應當置于教育部監督之下的試驗。在關于試驗預計要持續到1961年的這個決定中，要求所有其他全日制學校都要在現有的體制下辦學。1960年，陸定一和教育部長楊秀峰在報告中指出，這種試驗著重于質量，目的是在努力縮短正規學習時間的情況下依然保持高標準。

1959年的另一項指示規定了各級全日制學校勞動和學習的時間。大學每年的勞動時間被定為2—3個月，教育部被授權在全部課程內指定出專用于主要課程的總課時。高中學生的勞動時間為每周8—10小時，初中學生為每周6—8小時，9歲以上的小學生為每周4—6小時。這些時間表構成了1961—1962年起草的全日制學校較為正式的條例的基礎。1963年頒布了新的條例，這些條例稍稍減少了勞動時間，中學每年為一個月，高小每年為半個月。

1959年恢復了全國統一的大學入學考試，以后每年照此實行，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但是，在1959年，工人、農民和干部仍可在推薦的基礎上，由他們所報考的學校評定后入學，而不必參加全國入學考試。[[24]](#_24_1959Nian_Zhi_Shi_De_Yi_Wen_J)

有關科學和技術方面緊縮的早期詳情（如果有的話），不得而知。前面提到的1958年時在中國工作的俄國科學家指出，當他1960年回國時，科學研究的組織和實施都沒有什么變化，只是同以前相比，有更多的人來到實驗室和辦公室工作。在他第二次旅行并接著叛逃到西方后，他扼要地講了與中國科學研究有關的兩點。第一點是中國的事業過于模仿當代蘇聯的體制，既不考慮其缺陷，也不考慮它是否適合于一種不發達的科學環境中的各個方面。第二點是黨的決策者未能把握住與科學工作有關的特殊問題。他們遵循蘇聯的建議，將科學研究的力量集中在專門化的研究所，而不是大學。由于甚至沒有足夠的訓練有素的科學家來充實研究所，這就加劇了現時的科學人才供應的緊缺狀況。同時，這些科學家不能帶出新手，而大學則失卻了培養下一代科學家的能力。新建的研究所在物質方面要比蘇聯同類的機構優越，但是沒有足夠的訓練有素的人員來保證教學與研究的進展。

根據這位蘇聯觀察者的看法，科研機構在相當程度上摻雜進了不稱職的領導。科學院及其在省里的分院，不是由科學家來領導，而是由那些不懂科學發展的必要條件（即時間和完善的準備工作）的黨的官僚來領導。工作經常受到政治活動和會議的干擾；研究計劃在能取得任何成果之前總是時斷時續，看起來沒有一定之規。與處于早期發展階段時的蘇聯導師們相比，中國領導人甚至更加輕視有別于實際運用的純科學。

另外，老一代訓練有素的科學家被懷疑為階級敵人，而外行不管是否受過訓練，都得到鼓勵去從事研究。最后，他談到了黨的官僚強加給所有科學研究的保密要求。它不僅禁止與外部世界的一切聯系；也禁止中國內部科學共同體的不同學科間的科學交流。[[25]](#_25_Ke_Luo_Qi_Ke____Zai_Hong_Se)

顯然，在1961—1962年之前，科學戰線上的重要調整沒有受到注意。當時的官方政策承認了“大躍進”時期的發展超過了合理限度，并要求許多新成立的研究所合并或撤銷，以便提高質量，在那些設備最好的研究所中集中開展研究。官方還承認，科學事業需要技術和訓練，需要一個穩定的、組織良好的科學共同體。群眾路線的參與也許是“過于簡單化”了。[[26]](#_26_Zheng_Zhu_Yuan____1949__1963)

## 兩條腿走進60年代

試圖用“群眾運動規律”的思想作為框架以對方針的貫徹進行分析，其困難在于，這樣做需要假定一位超然于爭端之上的領導人。作為運動的首創者，他不僅要使運動進行下去，而且后來還要決定運動達到最高峰的時刻，以及鞏固階段何時能安全開始。這是關鍵性的一步。必須充分脅迫反抗勢力，使它不再是一種威脅，而新的領導者則必須做好開始實施新方針的準備，運動本來就是為了實施新方針而發動的。

這是計算代價和可以進行糾偏的時刻。自然，并非所有的錯誤都能輕易糾正，特別是當這些錯誤與自然災害糾纏在一起時。同樣自然的是，當運動從一個階段進展到下一個階段的信號發出時，某些參與者拒絕對此作出反應。這是一個易犯的錯誤，因為運動的原則從未提前宣布過。這些還沒有學會運動規律，至少是還沒有學會機會主義的價值的少數個人——通常是青年人，他們是些缺乏閱歷的參加者，易把起初的動員階段理解得過于呆板——他們代表了群眾運動方式的受損方面。他們與運動所打擊的正式目標一起，總是要為運動作出犧牲，并付出最沉重的代價。

假設運動的發起人仍然權力在握，他就仍然具有其后對運動的轉彎變向作解釋的權力，以便使自己處于最有利的地位。但是，當運動向前發展時，他實際上將無法控制運動發展的所有轉彎變向本身。如果這是一場真正的群眾運動，如果它是超出領導一群眾正式的聯系途徑而在眾多民眾被動員起來自發參與的基礎上形成的，那么，這一運動將暫時被允許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去發展，它本身還要承擔某種風險。這是必然的，因為正是在運動失控時，便要出現過頭行為。根據毛的說法，只有這樣做才能糾正錯誤，克服阻力。這些情況也使得任何其他人實際上難以對隨后的解釋作出識別——何為事實，何為杜撰；難以確定在任何特定時期內誰對什么實際上負有責任。

當然，這就是使群眾運動成了毛作為貫徹方針的方法這樣一種有用工具的原因。至少在暫時情況下，這種方法給了他作為運動的發起人的地應，給了他以反對敵對勢力的一種群眾力量的壓倒優勢，而不論這種敵對勢力可能是誰，或可能是什么。它還使他有可能——只要他依然控制著黨中央及其宣傳工具——將錯誤與過激的責任轉嫁到那些在運動中實際上做了錯事的人身上去，從而掩飾這種責任。

作為發起人，他保持著區分什么是正確行為與什么是錯誤行為的權利，保持著事件向前發展時更改定義標準的權利。例如，狂熱行為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它在某個階段是有益的，而在另一個階段則是有害的。如此，政治盟友可以變成敵人；某個時期曾作為正確的東西提倡的，在另一個時期就會被棄置一旁。在運動的鞏固調整階段，當殘存的任何敵對勢力可能以各種方式重新組合，企圖奪回它們失去的某些東西時，情況尤其復雜。

在下一個主要運動的初始階段，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自1958年以來的幾年內所發生的事件，被解釋成是劉少奇及其同伙對1958年推進的毛的正確教育路線所作的逐步破壞。然而，一種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釋是，60年代初教育方面的發展——在1958年群眾運動的高潮及其1959年的調整階段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1958年9月指示所開辟的路線前進的，盡管它遭到了這個時期無法預料的經濟困難的破壞。運動就是這樣在前進，這條路線所固有的矛盾也隨之發展。

舉個例子，既發展半工半讀學校又發展重點學校和全日制學校的決定，可能最初是想要“既顧到數量，又顧到質量”，這是教育部長在1959年初宣布的。但在實施這條路線期間，這兩種學校制度的差別，更重要的是接受其教育的兩種人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嚴重了。

在這種發展背景下，出現下面的情況就是必然的了：毛澤東本人在60年代中期放棄了他曾運用于教育的“兩條腿走路”的口號，而以否定的措辭把它重新解釋為是劉少奇的有害的、不平等的“雙軌制”，或兩種教育制度。在這一發展背景中，也包含了其他一些矛盾。但不論怎么說，兩種不同形式的學校教育之間存在著分工的不同，企圖以此為基礎來建立一種教育制度，實際上是更擴大了這兩種學校教育形式的差別。

#### 半工半讀思想的“失敗”

就60年代初期而言，當時的來自官方的有關教育的數據資料，尤其是全國范圍的資料，是很難見到的。[[27]](#_27_Li_Ru__Can_Jian_Ba_Lun_De_Se)這可能是大混亂的一種反映，這場引起所有各部門統計數據的大混亂是由那個時期的經濟困難造成的。有關這幾年的大部分可以得到的資料，是事后公布的，即在“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和正式開場的1964—1968年間，由官方報刊以及非官方的紅衛兵刊物公布的。紅衛兵的材料傾向于反映當時所盛行的毛主義的解釋，但卻詳細地展示了大量以前無法得到的資料。[[28]](#_28_Zhu_Yao_Yi_Zhe_Xie_Zi_Liao_W)現在還有甚至更大量的來源基本相同但通過不同渠道收集的資料補充進來。這些資料是香港學者對從前紅衛兵時代的學生的訪問記，而這些學生最初是來自廣州。[[29]](#_29_Xian_Zai_Huo_Hen_Kuai_Jiu_Ke)

根據這些后來的數據，農業中學在60年代初急劇減少。據官方計算，1960年，這些學校全國共有3萬所，在校學生為290萬人。到1962年，農業中學減少為3715所，入學人數為26萬人。小學也被壓縮，與1958年所宣布的學齡兒童80%上小學的比例相比，這一時期只有56%。[[30]](#_30_Jia_De_Na____Zhi_Shi_Qing_Ni)

這種滑坡很可能要歸因于經濟問題。但是半工半讀思想在1964—1965年又一次流行起來，那時它也被引入小學一級。而官方報刊在那一時期對這一思想的宣傳則暴露了它沒有取得成功的更為根本的原因。那個預定要由這種學校提供服務的對象群，把這種學校視為正規的全日制學校所提供的“真正”教育的二等替代物。對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的傳統看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并且由于仍處在維持生存水平的農村經濟中的日常生活經濟狀況而增強了。

在香港對幾位從前的中國農村學校教師的訪問透露，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假設有一種選擇：或是送他們的孩子去縣城的正規全日制中學（當時一個縣一般只有一兩所），或是送孩子去離家近一些的半耕半讀中學，大多數農村家長都要選擇前者。這是因為，他們知道前者質量高，這種教育可以為他們的孩子提供一個逃避農業勞動生活的機會。事實上，絕大多數農村孩子沒有機會進正規中學。上這些學校的主要還是些縣城里的孩子以及農村中的杰出學生。但是，假如要在送孩子去新的半耕半讀農村中學和讓孩子全天在家勞動以補充家庭收入這二者間作選擇的話，絕大多數農村家長寧愿選擇后一條道路。農民們的推理是，為什么要到學校去為勞動生活做準備，為什么當留在家里勞動更有利可圖時卻要去學校做毫無收益的勞動呢？這些都是從農村家庭對成本一利得的精打細算中顯露出來的典型問題。

由于農業勞動仍然毫無改變地被視為人類生產活動階梯上的最低一級，因此半耕半讀農業學校就繼續被人們看做是提供向上和向外發展道路的正規教育形式中最低下的一種。如果某個農村青年上了這樣一所學校，并且仍然不得不回到農業勞動中去，就會被所有的人認為是受了屈，至少被認為是一種浪費。只要有這種環境存在，當地的干部和教師——他們得不到那種使得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堅持下去并取得成功的高級支持者的激勵——便無法把他們自己的半耕半讀學校建設成為一種可以接受的替代物。[[31]](#_31_Guan_Yu_Zhe_Yi_Shi_Qi_De_Wen)

這里，還有以另一種形式表現的，最早在1957年就承認了的發展著的問題，即怎樣提供合理的中級教育形式，它既可以成為某些人的大學預備學校，也能使大多數人在此完成學業。如果沒有任何中學，問題就不會發生。如果有了中學但卻表現為兩種不同的形式，那么在那些久已對利益不均的每一個具體表現都非常敏感的人們中間，必然出現的矛盾就尖銳起來了。

盡管如此，1965年4月，教育部還是召開了關于農村半耕半讀教育的第一次全國會議。會議贊揚了為在農村普及小學教育、發展中學教育鋪平道路方面所取得的“多快好省”的成績。這次會議報告了正規全日制學校的許多不足，并要求它們進行整頓。但這次會議承認，“兩種教育制度”，即全日制和半工半讀制度，將一起繼續存在相當長一個時期，然而半工半讀代表了社會主義教育發展的長期方向。在中學一級，半工半讀學校教育將成為這種制度的主要依靠。[[32]](#_32___Ren_Min_Ri_Bao_____1965Nia)

1965年11月，舉行了城市半工半讀會議。劉少奇引人注目地出現在這兩次會議上，并在兩次會議上都表示，發展兩種教育制度就是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但是，半工半讀班級的低下地位顯然也被認識到了。在城市中，它被作為一種手段而得到提倡，依靠這種手段，那些小學畢業而不能升入正規初中的學生能被組織起來邊勞動邊學習。另外，只有少數城市青年此后還能繼續他們的學習或是在城市中找工作；大多數人將不得不接受在農村中的工作任務。半工半讀學校被看作一種為城市青年過那種生活做準備的工具。[[33]](#_33___Ren_Min_Ri_Bao_____1965Nia)

后來對劉少奇的指責，正是說他宣揚了兩種分離的、不平等的教育制度的這種顯而易見的發展，而沒有提倡半工半讀思想本身。他被說成是閹割了這一思想的“革命性精髓”。

#### 正規全日制的“成功”

專業學者，不論是受通才型的西方學問影響的，還是被迫接受更專門化的蘇聯模式的，或是不得已而選定新的中國社會主義方向的，他們仍然還是知識分子。他們利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所提供的機會，利用“大躍進”以后所承認的恢復教育秩序和質量的需要，為某種制度的建立而邁出了他們自己的“腿”。這種制度，不僅在他們自己的眼里，而且同樣在其他任何人的眼里，都完全優于另一制度。

在金字塔頂端的照例是精英們的重點學校，這些學校在全日制學校制度的各級上發展起來。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有關重點學校的歷史，似乎湮沒在時間的迷霧中了。據1980年在中國對12所大學及許多中學的行政管理人員所作的訪問，關于這一制度的準確起源以及何人對此負責，都沒能得到明確的回答。一位教育部的發言人有個最為詳細的答復，其中有一些還是由別人補充的，所有這些答復還沒有在別處遭到過反駁。這位發言人否認這個制度曾受過蘇聯教育范例的任何啟示。相反，這一制度的起源應歸之于這種重點思想：它是中國共產黨在1937—1949年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經濟發展策略的基礎，這一策略就是在貧困的農村根據地為經濟建設的目的而集中使用人力、物力。

這種思想隨后被用在教育方面。其最早的實例是“中心學校”，推行這種學校是1942年延安改革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對這種思想的宣傳推廣，現在可以追溯到1953年由毛發出的辦好重點中學的一項被廣為引用的指示，盡管這一指示在當時并未發表。直到1959年，在周恩來于當年4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援引了上述指示之后，重點學校才開始有組織地建立起來。它們在“大躍進”期間出現的群眾性教育迅速擴展的背景下，被用來當做保持教育質量的一種手段。[[34]](#_34_Su_Shan_Nuo__Pei_Po____Zhong)盡管從50年代中期起重點學校就已存在——通常是簡單地指定那些1949年以前最有聲望的學校——但這種制度直到1960—1966年期間才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協調一致的發展。

1965年以前，發展城市半工半讀學校的作用是為農村培養人才；相反，以城市為基礎的重點學校制度的主要作用從一開始就是為高等院校培養人才。重點學校的意思直接被解釋成大學的預備班，與這種學校相聯系的每個人的生活都圍繞著這個目標。例如，1962年，廣州城區與近郊區的中學根據其大學升學率而劃分了等級。學校被分為三類。在第一類最好的學校中，每年都有70%—90%的畢業生能夠升入大學，廣州的大學生大多數都是來自第一類中學。第二類學校通常可達到15%—30%的升學率，或者還要少些。第三類學校包括民辦中學和農業中學，它們的學生通常進不了大學。

具有從初中升高中進而升大學的最高升學率的學校，被指定為重點學校，保證它們能得到最好的教師，最充足的財政經費，最良好的設備以及最優秀的小學和初中畢業生的源源不斷的供應。那些在中學入學考試中獲得最高分的能夠進入第一類學校，學術成就的天平也因此而向他們傾斜。僅據1962年官方所宣布和當地報紙所發表的材料看，這種等級體系仍然繼續在內部使用，并根據公眾意見進行了改善，此后它成了評價這些學校的根據。[[35]](#_35_Luo_Sen____Hong_Wei_Bing_De)

所有原始資料顯示，在60年代初期，這種用于中小學的等級制度不僅限于廣州，而且成了一種全國性的現象。例如在鄰省福建，在那些相鄰的沿海城鎮中有一些1949年以前由華僑提供基金而創建的好學校，由于這些學校的布局及其地理上的接近，便促成了一種全省性的考試競爭方式。這些競爭每年在大學入學考試時達到頂點，福建也因這些學校所達到的升學率而受到了全國的稱贊。省教育廳廳長王于井利用其職位和聲望的影響推動這種工作，親自視察沿海城鎮和升學率高的學校。她鼓勵這些學校為奪取優勝紅旗而展開競賽。這種競爭進行得非常堅決。據在香港被訪問的一位從前的學生說，在經濟蕭條的那幾年中，他所在的學校里年齡小些的學生要把他們每月糧食定量的一部分捐給畢業班的大同學。這不僅僅是要在緊張的試前死記硬背階段保持這些學生的體力，而且也是要使整個學生群體投入為學校贏得好評和“榮譽”的斗爭中去。

至于在這種新的成績等級制度中受惠的是什么人的子女，羅森和昂格爾在一次對廣州一些中學的隨機取樣調查中發現，“優秀的”工農階級的青年在那些升學率最低的質次的正規初級中學中占多數。這就導致了新學校都建立在從前沒有學校的工人階級聚居區內。相比之下，在最好的重點初中里，只有11%的學生出身于工農家庭；48%則是“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干部是另一“優秀”類別，他們不僅是官僚等級制度中的高級官員，而且都是在1949年以前入黨和參加革命的。

在鄰近的一些初級中學中，比例幾乎完全相反，只有8%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學生，卻有42%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知識分子的孩子在質量較低的學校中占20%，而在精英學校中卻占32%。在招生人數更少的高中一級，競爭就更為激烈，學術標準因此較高，干部子女的比例明顯下降。在最好的重點學校里，他們占學生總數的27%，而工農青年占12%。知識分子孩子的比例達到34%，而其他非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占36%。[[36]](#_36_Yin_Zi_You_Luo_Sen_He_Ang_Ge)

這項調查涉及1962—1966年的5年時間。在更為詳盡地觀察了那一時期的變化后，羅森得出結論，由于有關方針目的的沖突加劇，教育制度日益分為兩叉。在1961—1962年，恢復了對學校成績和入學考試分數的強調，以便在1958—1959年靠推薦接受工農入學的試驗之后提高質量。陳毅的著名講話為此定了調。他在1961年指出：“學習專業是學生的政治責任。”第二年周恩來再次肯定了“大躍進”后的調整，他在1962年4月的二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報告中表明了這一點。他強調，政府將繼續調整文化、教育、科研和公共衛生事業，改進工作質量。[[37]](#_37___Quan_Guo_Ren_Min_Dai_Biao)

但是，提高正規學校的質量并非是事情的全部。1961年，毛澤東寫了一個指示，贊揚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半工半讀方向；1962年，他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著名告誡。[[38]](#_38___Cong_Zhong_Hua_Ren_Min_Gon)這一號召出現在毛澤東給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信中和全會公報上，它表明1962年9月召開的這次會議再次肯定了階級斗爭學說。[[39]](#_39__Gong_Bao___Zai___Bei_Jing_Z)

重申階級斗爭還預示了最后融合進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來臨。這一運動是作為一場教育與灌輸運動而展開的，旨在糾正“大躍進”以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發展起來的農村干部的貪污腐敗以及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等“不良傾向”。[[40]](#_40_Li_Cha_De__Bao_Mu___Fu_Lei_D)到1964年，這場運動逐步升級為以農村干部為對象的大規模整風運動，并伴隨了新的全國范圍的對政治的強調。

從1963年起，重新把高中和大學入學標準的重點放在了政治條件和階級出身上。針對每一個人尤其是針對青年人的“社會主義教育”加強了，其注意力集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觀念、階級斗爭和直接參加勞動上面。對那些不了解1949年以前的中國的小學生和中學生來說，關鍵問題是要將舊社會的剝削壓迫之苦與新社會之甜進行對比。每個有苦難經歷可以訴說的老工人和老農民，成了學校集會與講壇上經常被請來的發言人。由于國家正在從“大躍進”以后的經濟低谷中擺脫出來，由于青年人可能難于正確地進行比較，這種做法便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性。例如，在廣州，社會教育的一個早期課題，就是“回憶對比大旱之年新舊社會的不同遭遇”。廣東在那時，即1963年5月，正處于一場嚴重的旱災之中，這場旱災是“連續幾年”頻繁的自然災害中最近的一次災害。

作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大學師生在1964—1965年曾一度有幾個月被派送到農村，在那里，他們參加工作組，調查農村干部，重新給農民家庭分類，并獲取農民生活的第一手知識。到1965年年中，不斷加劇的政治活動被稱為是一場“文化戰線上深入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一位評論員指出：“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發生變化以后，作為意識形態一種類型的文化，也必須隨之發生變化。”否則，社會主義革命就有半途而廢的危險，其成果將會損失殆盡。[[41]](#_41_Dian_Zhu__Yin_____Wen_Hua_Ge)這一論題進而預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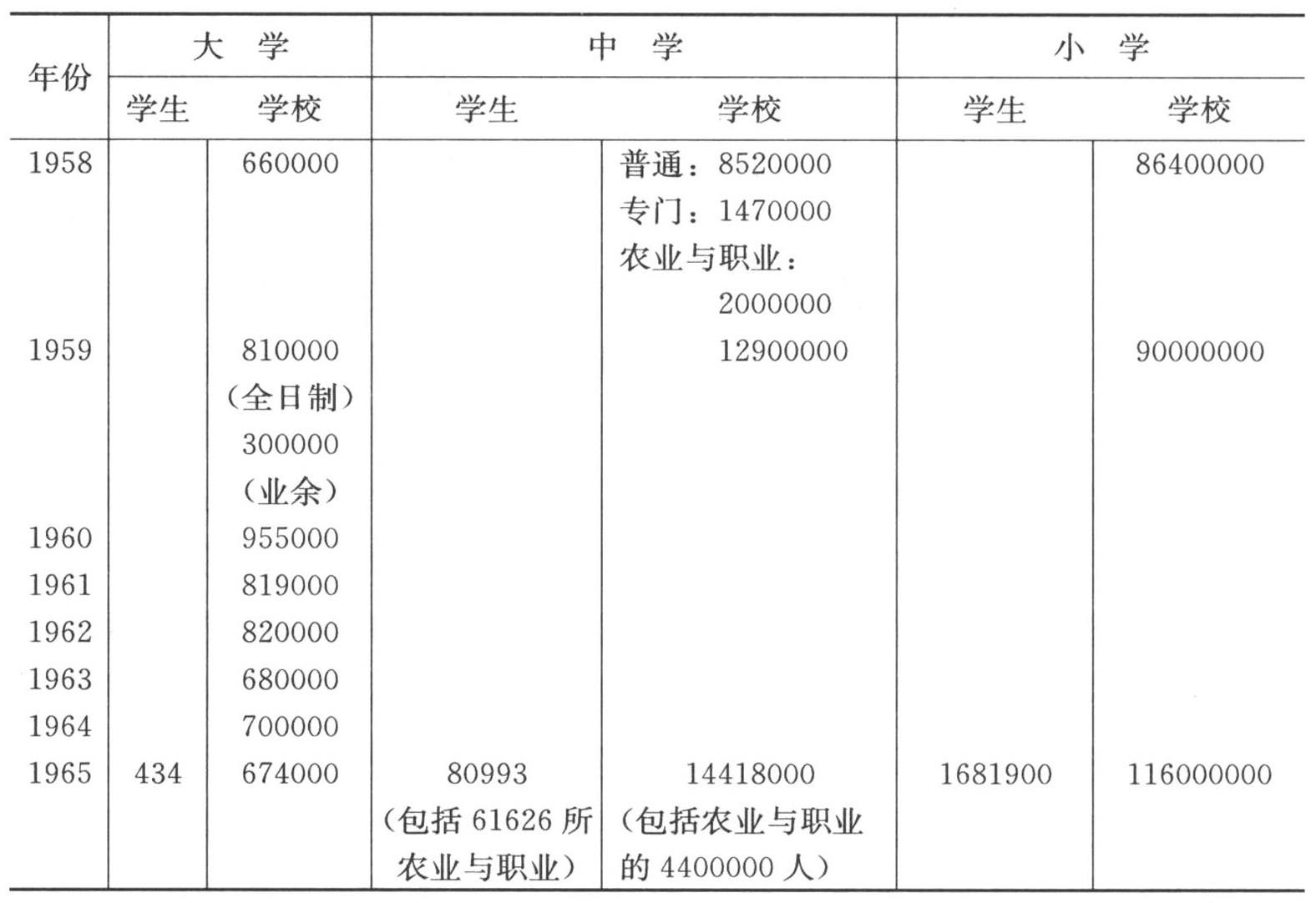
在1964年初的春節講話中，毛澤東還批評了正規中小學教育的學究氣和不切實際性，這是他對這一問題所作的許多公開性評論的第一次。12年學制太長；課程設置既多且繁；考試過于呆板；學生畢業后難以找到工作，因為他們只做了繼續學習的準備，而不是打算去從事勞動。[[42]](#_42___Chun_Jie_Tan_Hua_____1964N)這也預告了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發展的主題。

可是，對學校成績的強調依然令人不安地與不斷發展著的政治活動結合在一起。1964年，高教部得到恢復，表明了對精英層質量的繼續關心。第二年，高教部長承認，大學入學條件實際上仍然遵循1958年以前的定則，工農青年只有當其考分達到競爭標準時才能給予優先。

由于在這些矛盾的要求下進退兩難，正規學校制度只得努力去滿足兩方面的要求。政治學習和競賽運動，如1963—1964年學習社會主義英雄雷鋒的運動，被帶進了依然為追求合格率所支配的學校生活。這種對合格率的追求甚至擴展到了普通學校，它們也加入了競爭，都沿著提高分數的最佳途徑去制定策略，以此來提高它們的聲望。在這些情況下，重新以階級出身為重點的精英層的主要受益者，就只能是那些革命干部的子女，他們具有無可挑剔的階級憑證，除此之外是那些知識分子以及其他中產階級成員的高分子女。出身不好或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發現，不論其學習成績如何，獲得入學許可都越來越困難。

工農青年，盡管有著好的階級出身，也難以在競爭中取勝。在他們生活的地區，提供給他們的多是一些最新的學校，其中很多不過是剛剛建立的，甚至連高中班都沒有。當然，1961—1962年以后，高中一級幾乎沒有發展。因此，工人階級的青年在學術上處于劣勢。他們由于經濟上的原因，在念完初中或許在上職業學校以后，為了找工作，也很愿意結束自己的正規教育。廣州在1964—1965年建立了31所新的職業學校，主要是在半工半讀基礎上開辦的。[[43]](#_43_Luo_Sen____Hong_Wei_Bing_De)

表9 1958—1965年學校數與學生數



資料來源——1958年：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681]，第192頁；1959年：楊秀峰：《積極進行學校制度的改革》，新華社，北京，1960年4月8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623（1960年6月29日），第11頁；1960—1964年：羅伯特·泰勒：《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700]，第138頁；1965年：入學學生總數引自《北京周報》[568]，5（1978年2月3日），第16—17頁；學校數與農業、職業學校入學人數引自《1980年中國百科年鑒》，第535—536頁。

蘇珊·舍克的進一步分析，顯示了在這種競爭的學校結構內的學生生活狀況。在那些她在香港訪問過的青年人中，有一半學生上的是最好的重點中學。其他人則曾是正規全日制城市學校的學生。她的被訪問者中有2/3是在廣州的學校上的學；其他人則是在廣東省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城鎮學校接受的教育。約有一半人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其中大多是教師、醫生和其他白領勞動者的孩子；幾乎所有剩下的人都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只有極少數人出身好，是工農青年。正像他們的入團申請書所表明的那樣，只有1/3的人在政治上是積極的。所有這些人都是在1960—1966年間上的中學。

即使是離開了本土來到香港的這群學生，也普遍接受了平均主義和集體主義思想。但是除此之外，他們也顯露了學生的行為方式，特別是在高中一級——在16—19歲之間——這些行為方式與那些思想形成了對照。與他們共存的是一個非正式的學生亞文化群，支配這個亞文化群的目標是在大學中贏得一個受人羨慕的地位，或者等而次之，在中學畢業后分配給一個城市工作。在美國的高中里用于約會、體育運動和課外活動的時間，在中國的環境里，則被用來將學生引導到“互助”關系和加強個人競爭的成人世界中去。

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也學會了對性質相反的行為作出評價，但不是出于“正確的”推理。不積極的人總是想躲避積極分子，不愿與他們共有秘密，因為這種秘密日后可能被用來傷害自己的前途。私人友誼絕沒有被這種緊張關系損害，實際上卻得到了加強。學生們尋求志同道合的伙伴，這些伙伴能夠信賴，不會為了個人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利用朋友的坦率。學生們還傾向于把正式的同學鑒定會變為相互保護的儀式。這些青年人在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在積極分子中辨別誠實與虛偽；在同學中識別背叛與忠誠；學會了區分真正的友誼與自私自利的同盟。

然而，舍克的調查結果表明，在不同類型的學校中，學生們的表現也可能不同。例如，在全日制的技術中學（中等專業學校）里，學生的表現看來與官方的思想較為接近，學生積極分子受到同學們的羨慕。這些學校中的學生已經準備接受在他們畢業以后保證分配給他們的普通技術工作。而在大學預備班里，賭注既高又非常不可靠，成功就意味著有一個可靠而受人尊敬的未來，失敗則可能被放逐到農村去勞動。[[44]](#_44_She_Ke____Jing_Zheng_De_Tong)

羅森發現了類似的區別。由于個人的政治積極性是除繼承下來的階級出身和取得的考試分數外的又一種衡量標準，因此，表明積極性的愿望在有名氣的學校中比在一般學校中更加明顯。取得青年團員的資格被視為上大學的墊腳石，那些在學術等級上處于上流的學校，其入團率相應也是最高的。

政治學習與競賽運動在緩和這種競爭與追求功利的氣氛時只獲得了極小的成功。這些運動的確使許多學生產生了積極性，既有真實的也有假裝的。在這一過程中，有些學生，甚至整班學生，決心不去考大學，志愿到農村安家落戶。但是，只要考試和通過考試而來的大學經歷仍然是正規學校制度成功的公認頂點，那么，識別哪些學生是“為革命”而學習，哪些學生在走為個人利益和榮譽而奮斗的資產階級道路，就仍然是困難的事。

在這種趨勢下，農村工作是中學所有可能選擇的職業中最不理想的工作。不過，從1961年開始，它日益受到提倡，因為相對于新的進入勞務市場的人數而言，城市的工作機會減少了。除了那些被群眾運動產生出來的熱情所激發而自愿到農村工作的人外，幾乎所有的人顯然都把到農村工作視為一場無論如何都應避免的災難。

農村是城市垃圾傾場的看法，被1961—1965年間所采取的選擇工作的方式證實了。由于1965年城市半工半讀會議的肯定，那些能夠繼續學習的青年和能夠得到工作的青年得以留在了城市。大多數剩下的人，將不得不到農村去。到農村去工作，成了懲罰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一種手段，同時也打上了在城市的地位與成就的等級制度中失敗的烙印。[[45]](#_45_Tuo_Ma_Si__P_Bo_En_Si_Tan)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到1965年為止的中國的教育制度，是對“工農群眾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這一“大躍進”思想的嘲弄。此外，對這一思想的濫用，也是毛“兩條腿走路”方針的必然結果。這一結論尤其是基于這一假設：重點學校的思想不是對1958年改革的歪曲，而是它不可缺少的部分。

民辦學校與半工半讀學校是從1944年普及教育的戰略直接派生出來的。所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現在所管轄的范圍包括整個國家，而不僅僅是落后的邊遠地區。因此毛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經驗上去，但是方法不同，他改造了關于重點的思想，以之作為一種起保證質量作用的選擇辦法。也是從1949年以前的經驗改造來的群眾運動的熱情，則是將新的兩條腿走路的模式送入中國社會的運載工具。

這些結果應是1958年9月指示的起草人們能夠預見到的，但顯然他們沒有預見到。延安模式可能在封閉的環境中充分發揮過作用，這種模式起初就是根據這種環境而設計的。但是當把它們移植到由學術專家而設并為學術專家而設的現代正規學校制度上來的時候，任何政治修補與意識形態改造都不能使這種正規制度和實際存在的分裂結構有什么不同。當正規制度把優質教育奉獻給那些處于最受益地位的人的同時，要讓半工半讀制度擔負起教育農民與工人階級的任務，這證明了它只不過是一種使所有的舊裂痕立刻制度化的新手段。那種從“兩條腿走路”方針產生出來的教育制度，實際起的作用是擴大了精英與群眾的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農民與其他人的差別。

到1964年，這些后果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很可能在那個時候，毛澤東才決定將他創造的這個制度在它得到進一步發展以前摧毀掉，并指責“資產階級教育家”對建立這個制度負有責任。當然，他當時有充分的理由必須摧毀這個他們所管理的制度。農民們自己也看不起半耕半讀農業中學。工農出身的青年仍然大量地被排斥在精英的大學預備班之外。這種大學預備班，在1959年剛剛發出開辦的信號后，幾乎立即就煥發出了活力。

但是，最有力的打擊可能是：接班人一代，即那些革過命的干部們的子女，正在最好的重點學校里匯集。在那里，這些階級出身好的繼承人正在被那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腦力活動的興趣以及職業抱負所侵蝕，而這些正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至少20年來努力要從中國知識階層中清除掉的東西。

毛和他的同事們曾經在農村中度過了大半生。黨的歷史上最重要的教訓也是從農村生活的體驗中得來。然后他們又都已轉移到了城市，他們的子女也已變成了城市青年。他們本身也以城市人經常表現出來的同樣厭惡來看待農村生活。眼下，他們還能得到階級憑證的保護。要不然，他們也得去設計各種個人戰略以逃避農村工作，就像另一些生來特權較少的人已經在做的那樣。與那些參了軍、復員后要找個非農業工作的典型農村青年相仿，革命干部們也已發生了變化。但是，他們曾發誓要克服的中國社會內的基本的城鄉矛盾，仍與從前一樣尖銳。

這些需要考慮的事情為1966年毛主義的指示提供了某種實質性的東西：“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已經鉆進黨內，并且正在威脅著下一代。解決的辦法就是努力將60年代發展起來的對立的、競爭的結構統統摧毀。這將在另一場群眾運動的過程中來完成。指望有一種教育制度能符合下述條件，將被證明是更為困難的——以某種能有效地、比較公平地將城市—鄉村、精英—群眾這些矛盾的目標結合在一起的結構來代替原來的那些結構。

[[1]](#_1_8)引自簡·英格瓦·洛夫斯特《中國的教育政策》[478]，第61頁。

[[2]](#_2_8)喬治·Z.F.貝雷戴、威廉·W.布里克曼和杰拉爾德·H.里德編：《變化中的蘇聯學校》[39]，第86—100、290—291頁；簡·彭納、伊凡·I.巴卡洛和喬治·Z.F.貝雷戴：《蘇聯教育的現代化和多樣性》[571]，第102—117頁；奈杰爾·格蘭特：《蘇聯教育》[275]，第96—103頁。

[[3]](#_3_8)關于將群眾運動作為實施政策的一種方法的文章，是以對土地改革時期群眾運動的分析為基礎的，這種分析見于40年代后期的黨內文獻（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574]，第254—260、264—274、294—297、312—327頁）。也參見本書第四章，[此處注釋](#_41_Ru_Lu_Ding_Yi____Xin_Zhong_G)。

[[4]](#_4_8)《人民日報》，1958年9月20日，第1版。

[[5]](#_5_8)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載《紅旗》第7期（1958年9月1日），見《當代背景材料》[735]，516（1958年9月2日），第4頁；也參見林楓《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農群眾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文化革命中去》，新華社——英語，北京，1960年6月1日，見《當代背景材料》[735]，622（1960年6月28日），第13頁。

[[6]](#_6_8)《十七年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載《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見彼得·J.西博爾德編《中國的革命教育》[649]，第29頁。

[[7]](#_7_8)同上書，第31—33頁。

[[8]](#_8_8)關于根據其他資料所得出的相同結論，參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108—113頁。

[[9]](#_9_8)《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農村地區繼續掃除文盲、鞏固和發展業余教育的指示》，1959年5月24日，譯文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155]（以下簡稱《法律匯編》），載《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多種叢書[374]，14，346（1962年7月2日），第321頁。

[[10]](#_10_8)《從沒有這么多人上學》，載《北京周報》[568]，30（1958年9月23日），第4頁；《三季度的成果：仍然加速增長》，載《北京周報》[568]，33（1958年10月14日），第14頁。

[[11]](#_11_8)1958年入學人數根據《三季度的成果》，14；早期學校統計數字根據《時事手冊》，23（1956年12月10日），譯文見《中國大陸雜志選粹》[736]，71（1956年），第27頁。

[[12]](#_12_8)羅伯特D.巴倫德森：《共產黨中國的農業中學》[20]，載《中國季刊》[133]，8（1961年10—12月），第106—134頁；本文的修訂版見原作者：《共產黨中國的半工半讀學校》[19]，第6頁。

[[13]](#_13_8)關于1957年的數字，參見本書第四章表4。關于1958年的數字，據《從沒有這么多人上學》，載《北京周報》[568]，30（1958年9月23日），第4頁；《三季度的成果》，載《北京周報》[568]，33（1958年10月14日），第14頁。

[[14]](#_14_8)據作者1980年10月在江西共大的為期一周的訪問，此前不久官方將這所學校更名為江西農業大學。也參見約翰·加德納的《知識青年與城鄉差別，1958—1966年》[261]，載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編《共產黨中國的城市》[438]，第250—253頁；巴倫德森：《半工半讀學校》[19]，第39—56頁。

[[15]](#_15_8)《教育概述》，《北京周報》[568]，2（1959年1月13日），第5頁；凌揚（音）：《學校辦工廠》，《北京周報》[568]，39（1958年11月25日），第15頁。

[[16]](#_16_8)《財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和衛生部在全國文教系統財政工作經驗交流會上的報告》，1958年11月5日，譯文見《法律匯編》[155]，載《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多種叢書[374]：14，335（1962年7月2日），第315頁。關于50年代的教育預算，也參見利奧·A.奧林斯《共產黨中國的專業人才與教育》[560]，第14—17頁。

[[17]](#_17_8)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大學》[576]，載《現代中國》[532]，8.2（1982年4月），第162頁。

[[18]](#_18_8)米哈伊爾·A.克洛奇科：《在紅色中國的蘇聯科學家》[393]，第137—140頁。

[[19]](#_19_8)《光明日報》，1958年7月3日，第1、2版。

[[20]](#_20_8)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681]，第200頁；李洪勇（音）：《中國文化革命的政治》[430]，第79頁。

[[21]](#_21_8)鄭竹園：《1949—1963年共產黨中國的科學和工程人力》[121]，第61—67頁。

[[22]](#_22_8)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59年4月8日，轉載于羅伯特·R.鮑伊和費正清編《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59]，第517頁。對1958年三級學校入學人數的一個最高估計（《北京周報》[568]，33（1958年10月14日），14），分別為70萬，1400萬和9260萬。

[[23]](#_23_8)新華社——英語，北京，1959年4月28日，見《當代背景材料》[735]，577（1959年5月14日），第14頁。

[[24]](#_24_8)1959年指示的譯文見《法律匯編》[155]，載《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多種叢書[374]，14，346（1962年7月2日），第318—343頁。關于教學試驗，參見陸定一的報告（新華社——英語，北京，1960年4月9日）和楊秀峰的報告（新華社——英語，北京，1960年4月8日），均載《當代背景材料》[735]，623（1960年6月29日）。學校條例譯文見蘇珊·舍克《1963年全日制中小學暫行工作條例，注釋及翻譯》[661]，載《中國季刊》[133]，55（1973年7—9月），第511—546頁。

[[25]](#_25_8)克洛奇科：《在紅色中國的蘇聯科學家》[393]，第28—31、102—104、130—131、135—140、176、194—213頁。

[[26]](#_26_8)鄭竹園：《1949—1963年共產黨中國的科學和工程人力》[121]，第31—33頁。

[[27]](#_27_8)例如，參見巴倫德森的以這些資料為基礎的關于農業中學的最新著作《半工半讀學校》[19]，第28—38頁。

[[28]](#_28_8)主要以這些資料為基礎的敘述，有加德納的《知識青年與城鄉差別，1958—1966年》[216]和李洪勇（音）《中國文化革命的政治》[430]。

[[29]](#_29_8)現在或很快就可利用的研究是：安妮塔·詹（音）：《中國社會結構的反映：廣州學生的變化中的看法》[77]，載《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頁；安妮塔·詹（音）：《毛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性格發展與政治上的積極精神》[76]；安妮塔·詹（音）、斯坦利·羅森和喬納森·昂格爾：《學生與階級斗爭：廣州紅衛兵沖突的社會根源》[79]，載《中國季刊》[133]，83（1980年9月），第397—446頁；斯坦利·羅森：《紅衛兵的派性與廣州的文化革命》[620]；斯坦利·羅森：《下鄉青年在中國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廣州實例》[619]；蘇珊·L.舍克：《競爭的同志：中國的職業性刺激與學生的策略》[660]：喬納森·昂格爾：《毛統治下的教育：廣州學校中的階級與競爭，1960—1980年》[713]。

[[30]](#_30_8)加德納：《知識青年與城鄉差別，1958—1966年》[261]，第246頁。

[[31]](#_31_8)關于這一時期的問題，也參見朱莉婭·匡（音）《大躍進的教育試驗及其內在的矛盾，1958—1959年》[412]，載《比較教育學評論》[187]，3（1979年10月），第443—455頁；朱莉婭·匡（音）：《轉變中的中國教育：文化革命的序曲》[411]，第81—129頁；昂格爾：《毛統治下的教育》[731]，第48—65頁。關于農村對待農業勞動的態度，參見威廉·L.帕里什、馬丁·金·懷特《當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563]，第110—111頁。

[[32]](#_32_8)《人民日報》，1965年5月30日，第2版。

[[33]](#_33_8)《人民日報》，1965年12月16日，第1版。

[[34]](#_34_8)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大學：毛澤東以后的入學政策及其對中等教育結構的影響——一份研究報告》[575]。

[[35]](#_35_8)羅森：《紅衛兵的派性》[620]，第18—22頁。

[[36]](#_36_8)引自由羅森和昂格爾共同對70年代中期生活在香港的一些原廣州學生所作的一項調查：羅森：《紅衛兵的派性》[620]，第26頁；昂格爾：《毛統治下的教育》[731]，第26—27頁。

[[37]](#_37_8)《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新聞公報》，載《北京周報》[568]，16（1962年4月20日），第6頁。

[[38]](#_38_8)《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到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兩條路線斗爭概述》，譯文見《當代背景材料》[735]，884（1969年7月18日），第20頁。

[[39]](#_39_8)“公報”，載《北京周報》[568]，39（1962年9月28日），第7頁；《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512]，1962年9月24日，載斯圖爾特·施拉姆編《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634]，第189—190頁。

[[40]](#_40_8)理查德·鮑姆、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32]；理查德·鮑姆：《革命的序幕》[30]。

[[41]](#_41_8)滇竹（音）：《文化革命的成果》，載《北京周報》[568]，42（1965年10月15日）。關于對青年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可參見（舉例）廣州《羊城晚報》，1963年5月28日，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739]，116（1964年1月28日），第1—3頁；《北京日報》，1963年11月30日，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739]，123（1964年8月21日），第23—26頁；《北京日報》，1964年5月4日，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739]，126（1964年9月18日），第4—7頁；《北京日報》，1964年10月12日和上海《文匯報》，1964年9月12日，譯文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739]，133（1965年2月12日），第13—18頁。

[[42]](#_42_8)《春節談話》，1964年2月13日，載斯圖爾特·施拉姆編《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634]，第201—211頁。毛澤東的評論，在1966年以后作為批判正規學校的依據而得到廣泛宣傳，毛的談話中加入了×××同志關于教育的談話，后來發現這位同志是鄧小平。盡管由這兩個人所作的批評都直接反對正規學校，但鄧和另一個未辨明身份的同志的發言還是贊成制度的多樣化以及在小學和中學兩級實行“兩條腿走路”。他們特別提倡兩種不同的班：一種是大學預備班，另一種是職業班。毛除說了一句贊同的話以外，并未對這一觀點作詳細闡述。只有鄧評論說必須提高質量。毛顯然專注于這些改革：至少按照當時正規學校制度中所公認的傳統標準來衡量，這些改革將對其起暗中破壞的作用。

[[43]](#_43_8)羅森：《紅衛兵的派性》[620]，第一章各處。

[[44]](#_44_8)舍克：《競爭的同志》[660]，第59—60頁，以及全書各處。

[[45]](#_45_8)托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鄉：中國青年從城市走向農村》[43]；羅森：《下鄉青年在中國文化革命大躍進中的作用》[619]。關丁城市青年的工作選擇，參見D.戈登·懷特《下鄉青年的政治》[781]，載《中國季刊》[133]，59（1974年7—9月），第491、517頁。

## 第十章 黨和知識分子：第二階段

## “大躍進”中給知識分子所做的努力抹黑

“反右運動”中對具體的知識分子的鎮壓，在“大躍進”中改變成了一般地反對智力活動。當知識分子和學生都在“百花運動”中批評黨時，領導把知識分子當做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主要人物的希望落空了。在十來年思想灌輸和思想改造運動之后，知識分子仍然懷疑黨的政策。宣傳部長陸定一在“大躍進”時期的講話反映了領導對知識分子大失所望。在“百花運動”中，他曾用毛的口號鼓勵知識分子以其西方學識積極參與國家建設和工作，而在1958年3月13日《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中，他卻把西方學識當做“毒草”予以否定：“資產階級的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已經完全破產。它對我們只有一個用處，就是當做毒草來加以研究，以便使我們有個反面的教員，使我們學會認識毒草，并把毒草鋤掉變為肥料。”

雖然知識分子在“大躍進”中比“反右運動”時較少成為攻擊的直接對象，但他們在中國社會中的相對地位卻進一步降低了。和“百花運動”時期相比，“大躍進”時期強調的是政治上可靠，而不是專業技術。提出了一個新口號，要求從事一切職業的人，包括知識分子在內，要“又紅又專”，而重點在“紅”。當運動取得勢頭時，重點幾乎完全轉移到了“紅”。才智被等同于政治信仰，不再被看成是少數人所專有，這種變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武器武裝起來的黨的干部受到贊揚，認為他們強于西方方式和思想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和專家。此外，群眾的創造力和智力，與過去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想化，當做近似于神秘教義的東西來接受。剛從文盲狀態中擺脫出來的農民和工人被捧成科學家、哲學家和詩人，由于他們的“無產階級”覺悟，他們實際上可以取得任何成就。對比之下，知識分子由于他們沽染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而受到誹謗。

學問完全被看成是實用的，并且等同于工業和農業生產。對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而言，科學和工程學的重要性仍在增加，但是即使是科學家和工程師也奉命要向普通農民和工人的成就學習。學術標準降低了。對現代化至關重要的數學和科學理論的學習被忽視，以便有利于掌握專門的技能。

幾乎所有年紀較大的城市知識分子和學生都被送到農村和較小的城鎮勞動改造一段時間，他們將在那里通過體力勞動和與群眾結合而受到再教育。他們在大學和研究中心的職位由比較年輕的、受過更多政治灌輸的黨的干部所填補，他們乘這個時機擠進了知識隊伍。那些設法留在他們機構中的年紀較大的知識分子被降職擔任下手或者甚至勤雜職務。過去的教科書被廢棄，新教科書由黨的干部和較年輕的學者以及大學畢業生集體撰寫。知識分子和其他的人一樣被要求為革命而大量生產他們所生產的東西。犧牲質量以提高數量。

為“大躍進”而利用文學，典型地說明了在智力和創造性努力的其他領域中所發生的事情。交付給作家們的宏大計劃，必須在1958年內完成。黨執政以來作品很少的著名作家巴金，保證要在一年時間里寫一部長篇小說、三部中篇小說和翻譯幾篇作品。作家協會宣布，中國的專業作家將創作700部小說、劇本和詩，這些作品將是易于讀懂的，并有助于新人新事的出現。盡管對專業作家提出了異乎尋常的要求，但更重視的卻是不掌握熟練技巧而承擔了政治任務的作家。和在其他領域中一樣，專業和業余之間的區別被模糊了。“作家”的人數1957年還不足1000人，1958年猛增到了20萬人以上。幾千忠誠的業余愛好者甚至成了薈萃杰出人物的作家協會的會員。

“大躍進”反知識分子的和集體主義的風氣在匿名的業余作者的集體創作活動中表現了出來。它們創作了“大躍進”時期最有特色的文化成果——工人和農民在大型集會上創作的詩和歌詞。黨的干部提出主題和思想，并在群眾朗誦它們時記錄下來。黨巧妙地利用這些詩歌創作會來表達黨的意愿，而且用這些詩歌激發群眾迅速推動經濟發展的熱情。

中國共產黨從30年代晚期以來一直使用這種灌輸思想和動員的方法，但從來沒有達到像“大躍進”中這樣深入細致而普遍的程度，這時詩歌連續不斷地通過喇叭廣播，到處粘貼在墻上。中國最主要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完全放手發表工人和農民的作品。

中國的文化沙皇周揚為“大躍進”的文學藝術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雖然這個理論被當做毛澤東獨創的思想提了出來，但它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思想的重申。事實上，早在1934年，蘇聯的文化領袖日丹諾夫就提倡革命的浪漫主義，所下的定義是，按照共產主義理想狀態中會有的情況描寫人物和事件。在和蘇聯的關系正在惡化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大躍進”中試圖使它的文化政策擺脫其蘇聯淵源和蘇聯在斯大林后的時代里對現實主義而不是對社會主義的強調，因而用另外的名目來表述蘇聯的文學理論。但是與“大躍進”之前和蘇聯的關系較好時完全一樣，文學作品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現未來的美景，并激發對黨的政策的熱誠。

## 在“大躍進”余波中對知識分子的放松

由于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經濟混亂，黨修改了公社制度，同意給予自留地，認可私營服務性行業，容許物質鼓勵，以便補救“大躍進”的經濟損失。黨也放松了它對知識分子的控制，以便在這一努力中爭取他們的合作。1961年開始并延續到1962年秋季的相對放松時期，既和“百花運動”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比較溫和、比較寬容的兩個間歇期，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前一時期抑制知識分子的副產品。

和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相比，“反右運動”和“大躍進”使更多的知識分子沉默不語，感到沮喪。相當一部分人面對加強了的批評和強制的勞動改造變得越來越消極。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藝術，甚至一般的學科的學者都不愿創新和參與其事。這種從抑制到相對放松的變化，除了其本身的辯證發展規律以外，還受到政治和經濟原因的支配。中共面臨混亂的經濟以及由于1960年中蘇分裂蘇聯科技專家的撤走，非常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因此它指望使他們重新活躍起來，給他們提供了思想和物質的鼓勵。

在1961—1962年放松后面的推動力量是劉少奇和黨的官僚機構，而不是在發動“百花運動”中曾經起了很大作用的毛澤東。劉和大部分官僚機構以前只是勉強同意“百花運動”，現在他們卻領導了使知識界恢復活力的工作。他們和毛一樣，對使知識分子的精神自由化或使之多元化并沒有興趣。但是他們愿意鼓勵一定程度的思想上的活躍和批評，如果這種活躍和批評能創造一種對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更加有利的氣氛而又不致削弱政治控制。

表面上，1961—1962年的放松有許多和“百花運動”相同的裝飾和口號。幾個高級官員為之造聲勢。陳毅副總理1961年8月發表的講話，使人聯想起周恩來1956年1月發表的宣告開展“百花運動”的講話，陳毅在講話中號召更加尊重學者，更加看重他們對國家的貢獻，試圖以此鼓舞知識界。和毛在“百花運動”時說過的一樣，陳解釋說，黨多年的教育已經使得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總之，陳在知識分子的改造方面很有信心，因而他相信他們不再需要在政治會議和體力勞動中花費時間，以致忽略了他們自己的工作。陳宣稱：只要專家們在他們的專業中證明是有成果的，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貢獻，就不應當反對他們少參加政治活動。陳并且宣布，知識分子并不需要全面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完全受黨的思想意識的約束。在毛主義的用語中，這意味著一個人可以專多紅少。

陳毅對共產主義重新作了說明，在措辭上更接近于赫魯曉夫的實用主義的解釋，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更偏重于意識形態的看法。陳聲稱，知識分子表明他的政治態度，不是靠不斷地表白他對政權或其政治制度的忠誠，而是靠對現代工業、農業、科學和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按照陳的看法，這種行動是社會主義政治觀點的一種表現。他擔心，如果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沒有這種變化，國家的科學和文化將永遠落后。[[1]](#_1___Guang_Ming_Ri_Bao_____1961N)

周恩來，特別是在1961年6月19日的一次講話中，也支持更大的言論自由，這次講話在1979年以前沒有發表，但其內容在知識界很可能是眾所周知的。他甚至認可對黨的領袖們所已同意的決定進行批評。“即使是黨已經研究通過的東西，也允許提意見。中央工作會議正式通過的東西都允許討論，允許提意見，加以修改”。[[2]](#_2_Zhou_En_Lai____Lun_Wen_Xue_He)盡管周沒有提倡對發言權提供法律保證，他卻主張采用一種更符合西方態度而不是以前黨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的方式。只要一個人的工作不反對黨，不反對社會主義，就應當被容許。在智力活動和政治活動之間也應當有個分別。他還拋棄了對政治可靠性的強調——這是“大躍進”的特點——而重視專家的意見。

周在60年代早期的看法是，與通曉政治卻無技能的人相比，精于其本職工作的人對社會主義發展的價值要大得多。甚至毛在那時也表示了總的看法：應當允許知識分子的工作相對地不受政治原因的妨礙。毛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會上指出，知識分子不必一定是革命的，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我們就將聯合他們，并讓他們繼續從事其工作。[[3]](#_3_Si_Tu_Er_Te__Shi_La_Mu_Bian)他對放松表示了明顯支持，號召人民發表他們的看法，只要他們不違反黨的紀律和不參加秘密活動就不必害怕懲罰。

黨作了專門努力以爭取科學家的合作。為了克服“大躍進”期間科學水平的下降，1961年1月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第九次全會要求改善科學工作的地位。科學工作者得到保證：有足夠時間從事他們自己的研究，并增加物質鼓勵。他們在指導工作方面也被給予更多的責任。各級行政官員奉命在技術問題上要注意科學和技術人員的意見。評價科學工作者應當根據他的專門知識，而不是根據他的思想。《光明日報》在1961年11月5日指出：我們“不要拿科學家在哲學思想上是唯物論者或唯心論者作為標準來判斷他在自然科學上有成就或無成就。一個在哲學上是唯心論的科學家可能在自然科學上有很大的成就，這在科學界是極多的。”

和“百花運動”時期一樣，開了摩根遺傳學課程，同時也用贊譽的口吻提到那些以前被貶低的科學家，如牛頓、哥白尼和愛因斯坦。更加注意為學生提供更廣闊的理論科學教育，而不僅僅是專門化的技術訓練。由于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在履行他們對國家的義務時，有了更大的處理權，黨已為新的專家階級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專家們的決定的根據是與政治更加無關的標準，他們的行動可能意味著一種對黨的控制的潛在挑戰。

甚至在社會科學方面，知識分子也被給予了更多的自由。社會科學工作者受到鼓勵去探索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各種嘗試和提出不同的假設。權威刊物《紅旗》登載的幾篇文章向社會科學工作者建議，他們不一定要專注于直接與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有關系的問題。隨著這種號召，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討論，尤其是在經濟方面。有幾個經濟學家提出了類似于蘇聯改良主義經濟學家提出的建議。他們對于經濟問題，像他們的蘇聯同行那樣，提倡一種注重實效的而不是空頭理論的態度。他們極力主張以利潤和效率而不是以政治標準作為投資的根據，主張由市場而不是行政決定來確定價格。除了利潤和價格機制之外，有些經濟學家還推薦用數學方法，差額地租、經濟核算和資本利息作為促進中國現代化的手段。

1961—1962年許給作家的自由，其范圍與以前放松的時期所許給他們的相似。和在早些時候的間歇期一樣，號召作家利用種種表現風格和表現手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不再像在“大躍進”時期那樣，被規定為唯一的文學類型。此外，還強調更專門的文學標準和藝術的內在價值。這種更有創造力的看法不僅被黨的領導人所容忍，而且被積極地提倡。和在“百花運動”中一樣，不但允許作家風格多樣化，而且允許他們的題材和主題多樣化。《文藝報》的一篇專論寫道：“作家藝術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不同情況，自由地選擇與處理他所擅長、他所喜愛的任何題材”。[[4]](#_4___Wen_Yi_Bao_____778__3_1961N)作家們不再必須去描寫建設工程乃至階級斗爭；他們現在被允許描寫家庭生活、愛情、天性和日常生活的瑣碎事情。

不過，和“百花運動”不同的是，1961—1962年發表意見的極少數知識分子僅限于機械地重復官方路線。盡管經濟學家的討論無疑具有政治含義，但當局這時克制著沒有進行反擊。在這個經濟危機時期，從以下的現象可以明顯地看出黨的領導人的擔憂：他們愿意研究，或者至少是允許發表比較激進的經濟建議，這些建議有可能導致更有效地利用稀少的資源。

甚至小說家巴金所寫的一篇表面上很大膽的文章《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和毛澤東的路線也是一致的，這篇文章是為紀念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0周年而寫的。盡管巴金的論證表述得很有力，但這些表述與當局抨擊官僚主義窒息了中國文化生活的說法仍是一致的。巴金的文章的開頭以一種憂傷的語氣表達他對日漸衰老而沒有創作出任何他認為有價值的東西而感到的不安。這種不安必定是大多數1949年后極少出版文學作品的五四作家所共有的。巴金悲嘆道，作為作家，他沒有履行他的義務，相反，“這些年來我不斷地叫：全心全意地獻身于人民文學事業……可是我一直把時間花在各種各樣的事情上面……寫得少，而且寫得很差”。是什么妨礙他履行作家的責任，巴金斷言，是指揮他可以寫什么內容的文學界的官僚主義。

巴金這樣描寫這些官僚主義者：“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他們喜歡制造簡單的框框……更愿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里頭。倘使有人不肯鉆進他們的框框里去，倘使別人的花園里多開了幾種花……他們就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5]](#_5___Shang_Hai_Wen_Xue_____652)巴金并沒有引出明顯的結論，說拿圈捏棍的官僚主義者的存在應歸因于黨的政策。用普通的話來說，他跟當時的當局一樣，也強調了領導與被領導之間更加團結的必要。巴金建議，做到這一點要靠表達不同觀點的民主方法，而不是靠嚇唬不同意見的人服從的專斷專橫的方法。

因此，表面上，這個放松時期似乎是本著原來的“百花運動”的精神。在實際行動中卻并不如此。盡管用了許多相同的方法，用了幾個相同的字眼，但從剛一開始它的范圍就限于科學和學術問題。黨不愿意容許1957年春季那種大撒手的討論。放松剛一開始，它就要求明確區別學術領域的爭論和政治舞臺的爭論。有些知識分子以前曾經要求這種區別，以便他們能夠在他們自己的領域內更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而沒有強加的政治標準。黨現在這樣要求是為了知識分子不致把黨容許學術問題中的更自由的討論理解成，像1957年發生過的那樣，準許他們審查政治問題。

這次有限制地放松的特點可以從陳毅所作的號召知識分子爭論的講話中看出來。除了強調知識分子的優點和不再強調政治可靠性以外，陳毅堅決認為需要繼續進行思想灌輸。許可的是，和管制更嚴的時期相比，思想改造將以不同的方式進行。黨尋求通過使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一種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行動，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灌輸。陳毅清楚地說明了這一目的，他聲稱：“思想改造主要是靠個人的覺悟，要他自己好好考慮，企圖用強制的辦法、群眾的壓力來解決思想問題是不行的。”[[6]](#_6___Guang_Ming_Ri_Bao_____1961N)

思想改造會要在一種心理上少受威脅的氣氛中進行。黨把60年代早期的這種會叫做“神仙會”，以把它們更輕松自在的方式和以前運動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會所使用的強大壓力區別開來。這種會將留下一種飄然的感覺，仿佛一個人成了神仙；這種會不是靠強迫來改造知識分子，而是用“和風細雨”來滋潤他們。

這個用語也曾在“百花運動”中使用，不過是為了不同的目的。那是指知識分子在批評干部時所用的方法，而不能反過來用。這個用語的意思實際上由陳毅作了說明，他說，在改造別人時，我們一定“不能損害人家的感情，打擊人家的心靈……要耐心地誠懇地采取耐心教育的態度，不要隨便采取簡單的辦法”。[[7]](#_7___Guang_Ming_Ri_Bao_____1961N)和以前一樣，知識分子被分成學習小組，但這些小組中的討論要引導成為非正式的閑談，而不是干部逼迫作出的自白。如果在閑談的過程中犯了思想“錯誤”，個人并不受到排斥，仍然是小組的成員，并且受到同志式的對待。如《人民日報》所說，黨的目的是：“通過思想交流，互相幫助，大家自然就會對方向、是非有相同的明確的認識。”[[8]](#_8_Liu_Guo_Jun_____Shen_Xian_Hui)

黨號召在學術領域和政治領域的爭論之間要有明顯的區分，就是要把知識分子的討論限制在學術領域內，但這并不意味著把黨限制在政治領域內。黨和過去一樣，尋求對學術實行控制，尤其是在非自然科學方面。只有對黨有益的學術討論才是被允許的。自相矛盾的目的仍然是黨對知識分子政策所具有的特征。這個政策謀求鼓勵知識和科學方面的努力，與此同時卻又堅持思想控制。鼓勵學者們尋求真理，但真理不能與毛的教導或黨的現行綱領背道而馳。出版非官方的刊物、墻報、組織獨立團體以從事自發的意見交流，與1957年春季一樣，是不允許的。

#### 1961—1962年放松的獨特之處

由于新自由的性質模糊，由于知識分子過去的經驗，除了少數人外，大多數知識分子和非黨人士都不愿參與其事。他們擔心，運動的目的是審查他們的思想，而不是改進文化和科學。有幾個人指出政治和學術領域討論之間的分界線不明確，不肯表示自己的意見。他們聲稱他們有關學術問題的意見可能被解釋成為有關政治問題的看法。另外一些人還以了解不夠為托詞謝絕討論。

和“百花運動”不同，那時批評主要來自知識界和學生，而1961—1962年聽到的批評卻來自黨領導集團中居于高位的知識分子—官員，尤其是來自中央宣傳部和中共北京市委，也就是在實行放松中起作用的組織。他們用的是更曲折地通過文學和歷史的引喻進行批評的儒家方式，而不是“百花運動”的更直率的西方方式。此外，在1957年春季，“民主”領袖和學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一黨統治表示異議，而在1961—1962年，知識分子—官員卻不攻擊他們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黨。倒不如說，他們是在巧妙地批評毛澤東和他的動員群眾、經濟躍進和思想改造運動的政策。他們也為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辯護，彭德懷在1959年7月因批評“大躍進”而被毛免職。

不過，60年代早期比較寬松的氣氛、日漸加強的對“大躍進”的失望以及對中國上了年紀的領導人的能力的擔心，還不能充分解釋為什么這些知識分子—官員決心公開批評，他們對表示異議的后果是完全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是幕后操縱者，但沒有提出多少證據。他們和北京市委的領導人彭真有比較直接的聯系，而彭真則具體主管知識分子事務和領導黨的宣傳部的正副部長陸定一和周揚。不過，這些政治上機敏的官員不大可能聽任對毛澤東和他的政策進行攻擊，除非他們得到了劉和鄧的支持，劉和鄧自己不可能不加隱諱地批評毛而不損害團結一致的領導的門面。事實上，劉曾贊同“大躍進”，并曾在貫徹“大躍進”中支持毛。但是，劉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對“大躍進”的革命說教方式和穿插著的激變方式表示失望。這種辦法曾經適用于游擊戰時代，但是現在劉譴責它們有損于建設一個現代的、工業化的社會。這種看法含蓄地同意了知識分子—官員的批評。

#### 北京市委的知識分子

1961年5月，彭真指示他在北京市委最親密的助手對“大躍進”作出評價。在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的指導下，大約有12名市委委員集合在一起研究中央委員會關于“大躍進”的指令。審議的結果是，他們不但向彭真提出對“大躍進”的批評，而且在北京的劇院、報紙、雜志、影片、講演和討論中突然發出對毛澤東的批評——雖然是間接的；同時為彭德懷辯護——同樣是遮遮掩掩的。彭真是否明確地提倡這種攻擊，還不清楚，但這種攻擊沒有他的批準或者至少是容忍，顯然不可能在他的管區內出現。既然彭過去在政治上具有正統派的觀念，他就不大可能在思想上和知識分子—官員完全一致。不過，據說彭真讀了他們的一些文章后說，內容“豐富多彩”，“很受歡迎”。[[9]](#_9___Dao_Hui__San_Jia_Cun__De_He)

鄧拓是和北京市委有聯系的知識分子—官員的領袖。他是新聞工作者、歷史學家、詩人和古典學者，他以他對“大躍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結合著對五四時期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儒家傳統準則（尤其是關懷農民處境）的重申，為這批人樹立了知識分子的榜樣。在1952—1957年期間，他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從1954年到1960年，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主席。1957年鄧拓被免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職務，或許是由于鄧和他的庇護人彭真一道，不愿支持毛的“百花運動”，大概還不肯宣傳毛關于正確處理內部矛盾的思想。鄧的老朋友彭真于是委派他到北京市委，他在那里辦了一個叫做《前線》的理論刊物。

鄧拓和北京的一個副市長吳晗親密地在一起工作，吳晗是第一流的明史學家，代表了另外一部分知識分子。在30年代和40年代，他在民主黨派中很活躍，并和西方化的學者如胡適和馮友蘭有交往。鄧拓的另一個合作者是作家廖沫沙，他是30年代上海文學界的一個杰出人物，是北京市委統一戰線工作部的領導，也在宣傳部任職。這幾個人來自不同的背景，但有長期個人交往，并對某些原則意見一致。

他們最銳利的武器是雜文，這是一種短小、含蓄、諷刺的小品文形式，魯迅在30年代曾經非常有效地用來反對國民黨和他在思想上的敵人，他的追隨者也在延安用過。鄧拓、吳晗和廖沫沙是寫這種雜文的能手。他們用筆名吳南星在《前線》上發表了67篇雜文，名為《三家村札記》。鄧拓也在《北京晚報》和《北京日報》上發表了他自己的系列文章：《燕山夜話》。

他們把官僚主義的領導人大概私下說過的話寓言似的但卻是生動地在公開場合說了出來。這些雜文由于含蓄，不大可能被廣大讀者充分了解。但它們的間接寓意很可能被知道黨的事情的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精英所了解。尤其是鄧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歷史事件轉彎抹角地批評當代的人和事。他的雜文表面上似乎是溫和的社會和歷史評論，但實際上卻是對毛的領導和政策的毀滅性的（雖然是含蓄的）批評。和魯迅的雜文一樣，這些短論是用伊索寓言式的語言寫的，想讓有限范圍的具有類似見解的知識分子和領導人了解。

有幾篇雜文似乎是指責對毛的個人崇拜。它們指出，一個人乃至一小批人是不可能了解一切事情和掌握一切事情的。在他們的一篇短論《專治“健忘癥”》中，他們暗示，毛患了一種導致他不合理的行為和決斷的精神錯亂癥。“得了這種病的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其結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變成喜怒無常……容易發火，最后就發展為瘋狂。”忠告——顯而易見是暗指毛說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趕緊完全休息……勉強說話和做事，就會出大亂子”。[[10]](#_10_Wu_Nan_Xing____San_Jia_Cun_Z)

鄧拓對毛的最大膽的批評可能包含在《王道和霸道》中。鄧把古代歷史學家劉向對王道的解釋“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結合”，和霸道作了對比，霸道“依靠權勢，蠻橫逞強，頤指氣使，巧取豪奪”。他說，用現代的說法，王道可以看做是群眾路線，而霸道可以看做“主觀武斷”、“一意孤行”。[[11]](#_11_Ma_Nan__Deng_Tuo_____Wang_Da)

與鄧拓懷疑毛的統治能力一樣尖銳的是，他攻擊了毛的“大躍進”政策。鄧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中對強迫使用農民勞動力以從事大規模建設工程提出抗議。鄧再次用古代統治者作為例子批評現在的統治者。他寫道：“早在春秋戰國及其前后時期，許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經知道愛護勞動者的重要意義……《禮記·王制篇》寫道：‘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他最后說：“我們應當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啟發，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愛護勞動力。”[[12]](#_12_Deng_Tuo____Ai_Hu_Lao_Dong_L)

在另外一篇短論中，鄧拓論及德國哲學家厄恩斯特·馬赫時，悲嘆馬赫及其追隨者相信他們能夠完成他們所希望的任何事情，結果他們碰上現實的限制，最后毀滅了他們自己，從而暗中批評了毛澤東的唯意志論的發展觀念。在一篇題為《今年的春節》的短論中，鄧直接提到“大躍進”引起的食物短缺，指出傳統的政府預防這種短缺，而現在的政府卻沒有履行它對人民的責任。

在攻擊毛澤東和“大躍進”的同時，鄧拓為彭德懷進行辯護。他的幾篇雜文顯而易見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潔的官員，他們因為抗議不公正的行為而受到不正當的控告。他描述的一個人物是明代的高級官員李三才，李三才因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發宦官的罪惡而被罷了官。李一再上書要求皇帝親自審問，但他被拒絕了。據傳，李于是說：“余難自抑，欲以帛百端盡述余之苦。”[[13]](#_13_Deng_Tuo____Wei_Li_San_Cai_B)這可能是暗指據傳彭那時正在寫的為自己辯護的8萬字自述。鄧于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報》發表這篇短文，彭的辯護最終在1962年6月提交黨的中央委員會。

這些雜文不管怎樣挑剔毛和“大躍進”的毛病，它們與官僚政治領導的看法一般仍然是一致的。但是，其他雜文就不一定和領導一致了。它們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領導所不準許的學者們在政治決策中的發言權。它們記述宋、明和清代的學者、詩人、藝術家和進諫的人，這些人在批評嚴酷的統治者時英勇而正直，而不管后果如何。鄧還贊美那些“歡迎雜家”的傳統統治者，他說的“雜家”就是具有非正統觀點的知識分子。“現在我們如果不承認所謂‘雜家’的廣博知識對于各種領導工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那將是我們的很大損失。”[[14]](#_14_Deng_Tuo____Zhi_Mou_Shi_Ke_K)

鄧屢次舉出晚明的東林黨人，作為參與政治的知識分子集團的范例。與毛輕視當官的做學問或學者議政的態度截然相反，鄧聲稱：“片面地只強調讀書，而不關心政治；或者片面地只強調政治，而不努力讀書，都是極端錯誤的。”[[15]](#_15_Deng_Tuo____Shi_Shi_Guan_Xin)他在文章結尾說，如果我們的祖先知道這種道理并努力仿效，生活在現在的人難道可以不懂并照這種道理去做嗎。他稱贊東林黨人，還因為他們拼死糾正他們在社會上看到的錯誤。他發表了一首描述他們的勇氣的詩：

莫謂書生空議論，

頭顱擲處血斑斑。

力抗權奸志不移，

東林一代好男兒！[[16]](#_16_Deng_Tuo____Tai_Hu_Yin)

這首詩后來也可以用來作為鄧拓及其伙伴的墓志銘。

盡管吳晗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相對地沉默寡言，并在1957年抨擊右派分子中起了積極作用，但他在1959年卻突然開始寫作關于正直的明代官員海瑞的文章。毛在1959年4—5月的黨的會議上曾經號召效法海瑞對官僚主義惡劣行為的批評。毛的秘書胡喬木請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寫關于海瑞的文章。但是，吳晗的一部著作——有關這個著名的地方官被朝廷罷官的劇本，后來卻被當做對毛的政策、“大躍進”和彭德懷被免職的間接批評而受到攻擊。

這部劇本集中描述蘇州農民的困苦處境，他們向海瑞控訴，他們的土地被地方官員沒收。海瑞不顧地方官員的威脅和賄賂，在一次恢復這個地區的繁榮和穩定的努力中，要求退回非法沒收的土地，平息不滿，停止霸道行為。海瑞還下令處死一個地主的兒子，因為他殺害了一個老年農民。地方上的地主和官員懇求皇帝寬恕地主的兒子并解除海瑞的職務，皇帝就這樣辦了。這部劇本盡管寫的是歷史事件，卻揭露了使農民窮困和不顧農民愿望的政策。因而有可能被解釋成為彭德懷努力幫助農民而辯護。雖然這部劇1961年2月上演時得到了好評，但演出幾次以后就被停演了。

#### 和黨的宣傳部有聯系的五四作家

一批在黨的宣傳官僚機構中擔任高級職務的作家、劇作家、文學批評家、詩人、新聞工作者表示了和北京市委的知識分子—官員的見解近似的看法。這幾種人從30年代起在導致黨執政的長期斗爭中一直有緊密的聯系。他們在不同時期，在日本、上海、延安、重慶和香港，在“左翼”文化和新聞界曾一起工作。在和宣傳部有聯系的一批人中，有的是中國最著名的五四作家，如田漢、夏衍、陽翰笙、巴金和茅盾。這批人的黨的領導者是周揚和一個40年代在延安形成的親密同事的小團體。

盡管從毛1942年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后，周揚的主要職責是保證思想上的正統性和開展一系列毫不留情的運動與清洗，但他在60年代早期卻是懷疑毛在指導中國發展中一貫正確的那批人中的一個成員。在從“大躍進”的教育革命后退和振興智力活動及文化的努力中，周揚是一個領導人。他在公開講話中，支持更具創造性的、更多樣化的風格和較少空論的題材。在向小會和他的朋友們講話時，他支持以更西方化的態度對待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揚被指責一直在鼓吹自由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觀點，但事實上直到60年代早期為止，在執行毛的文化政策方面他一直是堅定的。

情況可能是這樣，當官僚集團和毛在“大躍進”之后發生意見分歧時，周揚這個典型的黨的馴順的成員，贊同官僚集團和他以前執行毛的政策一樣，毫不遲疑地執行他們的政策。但是，他偏離毛的政策不只是由于集團的或組織的原因。除了他對毛的政策大失所望之外，他還對“大躍進”時期表現出來的反知識分子、反專業的觀點有不同的意見。雖然他主要是一個文化官員，但他也是一個西方化的城市知識分子，對包括19世紀歐洲偉大作家在內的傳統造詣很深。雖然在“大躍進”運動中周揚是推動受到土生土長的民間傳說滋養的集體業余寫作的一個領導人，但他保持了傳統的西方化的文學和學術的見解。

在60年代早期，周揚和他的同事謀求減輕“大躍進”在文化上的影響和重新振奮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在1961年的一次文學座談會上，周揚推薦文化上的審慎的非政治化，作為減輕“大躍進”引起的緊張的一種方法。在那樣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里提倡無關政治的藝術創新，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行動，但也是一個與黨降低前一時期政治熱情的努力相一致的行動。

周揚還降低了階級傾向性作為評價文學的標準的重要性。文學應當吸引除了反動分子以外的所有階級，而不只是工人和農民。《人民日報》慶祝毛主席延安講話20周年的社論《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解釋說，延安講話以來形勢已經改變，因而也就必須改革文化，以便文化能夠為更高層的讀者服務。[[17]](#_17___Ren_Min_Ri_Bao_____1962Nia)

雖然允許知識分子不考慮馬克思列寧主義，但由于和蘇聯決裂，和西方疏遠，他們不能像在“百花運動”中那樣面向國外。因此，他們重新上演20年代和30年代在比較自由的上海創作的劇本和電影。重新上演的一個劇是陽翰笙寫的《李秀成之死》，陽翰笙是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副主席和黨的書記。這個劇最初在1937年作為統一戰線的文化政策國防文學的作品上演過，并在那時得到黨的公開贊成。這個劇于1956年重新上演，又于1963年2月再次搬上舞臺。在30年代，這個劇鼓吹階級合作反對共同敵人，但在60年代早期的背景下，卻似乎象征了彭德懷和毛澤東之間的沖突。李秀成被描寫成一個英勇的人，敢于拼著性命向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提出異議，洪秀全則被描寫成不愿聽從這個伙伴的忠告，頑固地堅持一種導致太平軍失敗的政策。

60年代初期在銀幕上和戲院中重新塑造的30年代小說和故事中的人物，是在革命當中進退兩難的、疑惑的、痛苦的、感情矛盾的人，不能確知應朝哪條路走。仿佛上演他們的故事是為了和“大躍進”文學作品的理想化的英雄和壞蛋相對照，“大躍進”的文學作品和傳統的中國文學作品一樣，通過虛構的英雄和壞蛋的典型教導道德價值和準則。

這些變化了的30年代的人物，成了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故事中所描寫的“中間人物”。他們也是夾在新舊社會之間具有雙重性格的人，他們的矛盾更多地存在于他們自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他們和其他階級之間。他們是1962年8月在大連召開的一次會議的論題，這次會議由周揚主持，由周的主要副手邵荃麟闡述。邵盡管原來是短篇小說作家，但主要還是以有權勢的文學方面的官員而知名。1949年以后，邵作為思想改造運動的領導人很快出了名。可是在大連會議上，他斷言，“中間人物”代表了普通的中國農民，他們不是黨描述的完美英雄，而是處于“落后”和“先進”思想之間的中間階段的人，自身兼有積極的和消極的因素。邵號召作家們描寫絕大多數還沒有委身于革命的人，而不要去描寫英雄和壞蛋的極端例子。

邵荃麟的觀點直接攻擊黨的基本的政治和思想的教導。他揭穿了官方對現實的看法和實際存在的狀況之間的差異，并暗示被當做革命支柱的無數中國工人和農民并不是官方所描述的值得仿效的革命者。事實上，在“進步的”和“落后的”道路之間搖擺的，并不像黨斷言的那樣只是少數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而是人口的絕大多數。

由于作家們被強制地襲用思想上的八股，而不是以講究實際的現實主義態度寫作，邵荃麟惋惜模范人物在“大躍進”時被形容得太過分，這意味著“脫離現實”。[[18]](#_18___Wen_Yi_Bao_____778__8_9_19)農民潛在的共產主義動力并不像毛澤東和黨所期望的那樣，已在“大躍進”中出現。邵認為，過高估計農民對革命的思想上的準備促成了“大躍進”的失敗。

對毛澤東政策的批評者們因此越出了政治上支持他們的人所允許的批評。劉少奇和官員們可能需要對“大躍進”、動員群眾和經濟上不合理的事進行批評。他們甚至希望思想和文化更加繁榮，還希望放松對學術和創造性工作的思想限制，這樣有助于解決“大躍進”所引起的一些問題。但是，在后來“文化大革命”期間對黨的官僚主義領導人的猛烈指控中，并沒有跡象表明他們愿意放棄對學術——尤其是鄧拓和吳晗所要求的那種類型的人文主義的學術——的政治和思想的控制。而且，劉少奇和官員們與毛澤東一樣，不愿意在制定政策和按正常程序對他們的政策進行公開批評方面給予知識分子發言權。他們也不愿意允許對農民和工人的革命基本信仰的懷疑。領導支持特定的批評和相對地放松控制，這并不意味著它將容許他人插手政治、分散它的權力和懷疑它的群眾支持。

## 對毛的思想上的階級斗爭的抵制

在1962年9月的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了從60年代早期的相對放松轉向增強對知識分子的控制。他提倡思想上的階級斗爭，這是不言而喻地號召向批評他的人進行攻擊。他表示擔心，在很大程度上受思想甚至受虛構的文學作品影響的輿論，能夠推翻政權，這反映出他日益著迷于思想覺悟。十中全會標志著毛開始努力制止對他的政策的批評、制止革命勢頭的減退，并實行“文化大革命”。他最初試圖通過黨的官僚機構去完成這些工作。

但是，毛的思想上的階級斗爭的號召在學術界觸發了一種表示異議的新形式。黨和非黨的知識分子都投入關于階級斗爭的爭論，在爭論中毛思想的主要意識形態的根據受到了懷疑。盡管異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一致的主旨是希望少一些而不是多一些兩極分化——減弱而不是加強階級斗爭，調和而不是強調中國社會中的差異。

有些著名的學者談到需要團結全國為社會所有階級共有的目標而奮斗。他們試圖在中國傳統中找出不只和某些時代某些階級有關，而是和所有時代所有階級有關的道德價值和美學價值。通過在他們各自的領域——歷史、哲學和美學——中尋找中間立場，他們的討論含蓄地推翻了毛的思想上的階級斗爭的號召。1963年在農村發動的制止自發的個體農業傾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并沒有擴大到知識界。

那么，在毛提倡思想斗爭并加緊控制知識界的時期，背道而馳的思想怎么能夠表現出來呢？負責加緊控制的宣傳部和北京市委正是曾經負責60年代放松的機構。口頭上他們同意毛澤東恢復思想上的階級斗爭的要求，但在實際上他們擔心一個新的運動將導致像“大躍進”那樣的破壞而不愿照辦。對毛以前政策的失望使得領導者不是那么輕易地對他的新的要求作出反應。而且，既然他們管轄的部門就是異議的根源所在，他們當然并不急于推行一個最終將歸咎于他們自己的運動。

并且，如毛澤東后來所指責的，在各種文化領導層中已經出現一個正在增強的官僚化的過程，這是任何極權主義的組織在革命階段結束以后都不可避免的。文化官員們掘壕自固，依靠在30年代上海比較自由的環境中和40年代的內戰中發展起來的親密個人聯系而結合在一起。他們也關心革命精神被腐蝕，但被以前的運動弄得筋疲力盡，吃夠苦頭，他們不愿再次發動他們過去策動過的那種全國性的激烈的思想改造運動。因此，盡管他們以華麗言詞號召階級斗爭，但他們的語調卻是溫和的。他們可能不同意某些和他們、和劉少奇，同樣也和毛澤東意見相反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允許進行某些坦率的思想上的爭論。結果是沖淡了毛對階級斗爭的要求。在“大躍進”的余波中，文化官員和知識分子一樣都希望有一個和睦的而不是沖突的時期。

這些官員在中國的大學于“大躍進”之后恢復傳統的教育實踐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黨的書記處委托周揚挑選大學文科課程的教材。他試圖完全改變“大躍進”時期強調政治、毛澤東思想和群眾辦科研的做法，重新提出專業的、以學術為方向的教育以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周揚指出：如果我們把所有學生培養成政治積極分子，那么我們的政治積極分子就太多了。他們將成為沒有專業知識的空頭政治家。[[19]](#_19___Zhou_Yang_Fan_Ge_Ming_Xiu)作為提高學術水平的部分措施，增加了西方培養的老教授的薪金，使之大大高于“大躍進”時期中大量培養出來的年輕教師的工資。周揚還委派許多杰出的西方培養的學者去領導一些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將挑選文科教材以取代年輕教師和學生在“大躍進”中編寫的材料。這些知識分子像五四作家支配文學刊物一樣，也支配主要的學術刊物。這些刊物的專欄引起了知識分子的熱烈爭論，這些爭論最終觸及了中國領導面臨的根本的思想問題。

從“大躍進”的革命實踐和嚴重混亂后退回到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更有助益的儒家的觀點，因為這種觀點體現了全面的持久的道德價值。這種對儒家學說全面再評價的努力在“百花運動”中已經開始。這種努力在“大躍進”的余波中再次提出，到1963年取得了一定勢頭。學者們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表達他們的再評價，很像19世紀中國的文人學士以正統的儒家學說表達他們對西方思想的介紹。例如，哲學家馮友蘭表示，早期馬克思主義的一小部分，《德意志意識形態》，是他認為儒家學說具有普遍性的根據。雖然馮說，當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發展時，孔子代表新興的地主階級，但馮認為，孔子學說對所有非統治階級——農民、手工業工人、商人——和對地主一樣都有意義。在與奴隸主和貴族的斗爭中，地主必須賦予他們的意識形態以一種“普遍性形式”。[[20]](#_20_Feng_You_Lan____Guan_Yu_Kong)馮斷言，儒家關于仁的概念（仁愛或人類友善）有階級特性，但也體現了所有階級的普遍倫理標準，因為地主要利用它來獲得廣泛的支持。

更肯定地評價儒家的另一個推動力是1962年11月——毛澤東在十中全會上講話后僅一個月——召集的一次會議。從全中國來的知名學者出席的這次會議成了對中國歷史的種種非馬克思主義解釋的討論會。其中最有爭議的是廣州中山大學劉節的看法：中國歷史的模式和西方模式不同。階級斗爭可能曾經支配西方歷史的發展，并且可以解釋當代的事件，卻不曾支配中國的發展。劉堅決認為，由于階級斗爭的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近代明確地表述的，古代的思想家不可能理解這種思想。我們不應當把我們時代的問題不適當地強加于古人。[[21]](#_21___Zhong_Guo_De_Zhe_Xue_Yan_J)

許多歷史學家除了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的階級觀點表示異議外，還對毛主義關于中國歷史中農民起義是革命運動的觀點表示懷疑。有些學者以嚴密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爭辯說，農民是一種保守的力量，并不要求新的制度，像上層階級那樣只要財富和權力。盡管他們的論證是以歷史學的術語表述的，并且充滿了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但是他們和那些支持“中間人物”的概念的人一樣，反駁了毛主義頌揚農民為革命者的說法，并對“大躍進”提出了另外一種形式的批評。他們認為政治精英和農民一樣創造歷史，并告誡說，要防止夸大農民起義的作用。盡管他們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對農民革命潛力評價不高這種觀點的支持，但也受到儒家有關農民的傳統觀點和西方學術中讓歷史事實決定分析的傳統觀點的影響。他們說，歷史事實證明，農民反抗統治階級的起義是自發的無計劃的反對鎮壓的行動，而不是有組織的革命運動。

許多年以來，并且在1963年的討論中，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提出了一種后來被叫做讓步論的觀念。這種觀念對把革命當做改善中國農民命運的動力含蓄地提出了疑問。在一個王朝被推翻后，新的統一王朝暫時放松了它對農民的鎮壓。它在減輕租稅、分配小塊土地和開墾新的土地方面愿意對他們讓步。這些行動并不是革命的；相反，它們由于向農民提供福利而阻礙了革命。因此，改善農民生活是階級調和而不是階級斗爭。

馮友蘭依照他的階級之間有共同利害關系的看法，也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家，為了本階級的長遠利益，往往主張對于被統治階級的利益作一些讓步，以減少他們的反抗。”[[22]](#_22_Feng_You_Lan____Pi_Ping_He_Z)不愿冒起義危險的農民促進了社會對立階級的共同行動，這轉而推進了社會。是階級斗爭的緩和而不是階級斗爭的強化被看做歷史的動力和改善農民處境的動力。

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許多經濟學家，也懷疑毛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在經濟領域強化階級斗爭的努力。其中最著名的是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他在20年代就是黨員，曾在蘇聯學習，并在60年代早期當討論利別爾曼的經濟改革時再次訪問過蘇聯。他回國后提出了類似的改革建議，如給予企業更大的經營自主權，允許一部分利潤留歸企業用做鼓勵增產和改善管理的獎金。既然科學知識將代替群眾運動，那么是利潤而不是政治覺悟將成為投資和發展的決定因素。孫把利潤看做技術可行性和有效經營的最敏感的標志。在農業經濟方面，他贊成恢復個體家庭經濟和給每個農民家庭規定產量指標。他和他的同行們并不懷疑社會主義計劃原則或國家調節的任務，但他們指出，忽視物質刺激在經濟上是不合理的和有害的。

對毛政策的更直接的批評是孫把公社的特點說成是一種“急躁冒進……的錯誤”。他在對干部訓練班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想一步登天，就來一個越大越好，結果助長了瞎指揮……忘記了生產力，把人的主觀能動性過于夸大。”[[23]](#_23_Gong_Wen_Sheng____Sun_Ye_Fan)他重申馬克思主義的看法，革命要靠增加生產和技術進步。只有生產力發展到高水平，才有可能實現按每一個人的需要進行分配的原則。盡管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控隨聲附和孫的思想，但他并沒有像被責備的那樣提倡“利潤掛帥”，他的物質刺激政策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相比，相對來說是有限度的。

不過，孫與其他學術界和文化界人物一樣，他的批評和建議在為廣泛而深入地改變“大躍進”的經濟、教育和文化政策而創造輿論傾向方面是起了作用的。這些批評和建議也導致毛爭取另外一批知識分子去批駁他們的評論和提出不同的解決辦法。

## 激進的知識分子

“大躍進”以后，當毛的老戰友和黨的官員們對他的領導提出疑問時，他變得越來越對他們起疑心，越來越轉向所信任的少數知己，特別是他的妻子江青、他以前的秘書和捉刀人陳伯達以及與黨的保衛機構有長期聯系的康生。他們在60年代早期又繼而與一批年輕的激進知識分子發生了緊密聯系，這些激進知識分子在譴責年紀較大和有地位的知識分子的看法時，扮演了令人注目的角色。他們包括來自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和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兩批不同但又部分重合的人，都擅長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他們雖然接受過學術方面的訓練，但他們有兩點不同于年長的知識分子：他們所受教育的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性更強，在學術等級制中地位較低。他們在組織和管理工作方面經驗也較少。他們和年長的知識分子對立，既有思想方面的原因，也有兩代人之間的、個人的和機會主義的原因。

張春橋是這批人中年紀較大的一個。他1910年出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和他的知識分子對手一樣，30年代他活躍于上海的“左翼”文學界，40年代在邊區做宣傳工作。但是，直到1949年以后他才開始獲得重要職務。在“大躍進”中，他積極闡述毛澤東的政策，不久以后，他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成員。1963—1964年，當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毛的心腹柯慶施給予毛的妻子江青以改革京劇的機會（在北京，中央宣傳部黨委和北京市委拒絕給她這種機會）時，張春橋和黨的高級官員有了聯系。上海市委宣傳部，特別是張和他的年輕同事姚文元，被動員起來幫助江青。

姚文元最初因與中央宣傳部周揚身邊的文學官員聯合而出了名。[[24]](#_24_La_Si__La_Ge_Wa_Er_De____Zuo)盡管他在反對胡風、艾青、丁玲和馮雪峰以及右派分子的運動中很積極，但他特別令人注目的原因是，50年代晚期他攻擊文學理論家巴人，認為巴人的觀點存在全民共同人性的因素；攻擊巴金，在巴金的作品于1958年再版后不久，給他貼上“反動的”標簽。姚終于被叫做“棍子”，靠罵人壓制作家。他的批評極大地激怒了年長的五四作家，以致周揚和他的助手林默涵親自干預，制止他對他們的攻擊。

受到文化官僚機構的漠視后，姚文元、張春橋和江青聯合起來，成了天然的盟友。他們和一批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有聯系的年輕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主要人物是關鋒、戚本禹、林聿時和林杰——聯合起來，大大增加了他們向年長知識分子的觀點挑戰的智力本錢。

張春橋和他們當中的幾個人至少在“大躍進”時期就早有聯系，當時他和哲學家關鋒以及另外一個同行吳傳啟寫文章，提倡按照軍事共產主義和巴黎公社的做法限制物質刺激。事實上，張推行毛的“大躍進”觀點的文章大概引起了毛的注意。這篇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由毛寫了編者按語，按語沒有完全贊同它的意見，只號召讀者用它作為討論的起點。[[25]](#_25___Ren_Min_Ri_Bao_____1958Nia)

60年代早期的激進知識分子的文章和講話有種種論題，但共同的特點是它們吸取毛的思想的激進方面比吸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要多。他們繼續闡釋毛在“大躍進”期間表現出來的信念，但這時是用意識形態和政治的用語而不是經濟用語表述。和他們的指導人一樣，他們堅持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并不能自動地改變資產階級思想。必須進行思想上的階級斗爭以反對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筑，資產階級上層建筑即使其生產資料已被消滅，仍然殘存并發揮作用。“大躍進”中曾被激發起來以克服自然力和經濟限制的主觀意志這時又將被激發起來反對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思想的勢力。他們把主觀意志和革命熱情等同起來，試圖動員群眾的主觀意志以反對占優勢的資產階級上層建筑，尤其是反對年長的知識分子。

1963—1964年和年長知識分子爭論中所用的論證方法、詞藻和準則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思想體系上的基礎。在反對現存的思想和官僚主義體制時，他們是中國的新“左”派。他們的論點不但表達了他們自己思想上的不同意見和個人的對抗，而且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受過教育的青年對社會經濟方面的真正不滿，他們反對等級制度中缺乏變動性，反對受過充分培養的年長者和受過較少培養的年輕人之間的不平等。

他們和著名知識分子的爭論使他們在激進知識分子和學生中得到了某種支持，使他們獲得了聲望和臭名，這些可以被政治首領用來謀求對體制的破壞。還不清楚毛在多大程度上鼓動這個集團和他們在多大程度上鼓動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時期里，毛和他的心腹朋友江青、陳伯達、康生和柯慶施常常提到一般的論題和準則，但他們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并沒有直接監督這些人的寫作——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也不能完全支配激進的知識分子。

和年長的知識分子形成對比，激進分子在毛的十中全會講話后，迅速而有力地接受了他提出的進行思想上的階級斗爭的要求。盡管年長的知識分子控制了學術刊物的編輯部，激進分子也能在這些刊物上發表文章。他們對年長學者的普遍批評是，他們散布了不同階級有共同利益的思想，可是實際上只存在階級斗爭。但是，在1963—1964年，他們和年長知識分子在理論上和思想上的爭論還未達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將形成的那種極端對立。形勢還沒有嚴重到足以引起毛和黨的官員之間，或他們和年長知識分子之間的不可挽回的分裂。盡管激進分子響應毛的階級斗爭號召，但他們在1963—1964年的論證還沒有簡單化為以后那樣的陳詞濫調。他們使用了范圍廣泛的資料，并承認問題的復雜性。他們參加熱烈的交流，而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按照學術標準，以一種心平氣和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討論。在這個時候他們還不反對中央宣傳部，只是在文化機構內組織小集團。

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年紀較輕的知識分子中，哲學家關鋒可能是最有名的。從50年代早期以來，他寫了許多關于中國古代哲學家如莊子、荀子和孔子的有學術見解的論文。有幾篇是和兩個同事林聿時和林杰合作的。關鋒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因批評馮友蘭不顧階級特性，提倡對哲學思想的超階級的解釋而出了名。他攻擊這樣知名的哲學家，可能部分地出于求名的動機，但也和他以前的學術態度，即強調哲學和社會理論的階級性的看法是一致的。關和一個同伴斷言，階級斗爭和發展是不可分的：“客觀的文明社會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26]](#_26_Guan_Feng___Lin_Yu_Shi____Gu)他們在反駁翦伯贊關于農民起義是反抗壓迫者的自發行動的觀點時斷言，否認反對地主的起義是反封建主義，也就是否認農民的革命性。激進的歷史學家戚本禹和林杰在稍后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堅決主張，不是像翦伯贊斷言的對農民的讓步，而是農民反對地主階級的革命斗爭推動了歷史的發展。[[27]](#_27_Qi_Ben_Yu___Lin_Jie____Jian)

論文的作者們按照這種對歷史的看法斷定：“必須堅持階級斗爭的理論，同階級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28]](#_28_Qi_Ben_Yu___Lin_Jie____Jian)他們責備翦伯贊這樣的學者不但反對用階級斗爭去解釋歷史，而且反對用歷史研究去為當前的政治斗爭服務。這種反駁預示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預示了對那些知識分子——他們不管是在個人研究的情況下還是在反對同事的情況下，都拒絕聽從毛對斗爭的號召——的攻擊。

激進知識分子還用歷史人物作類比以批評當時的領導人。戚本禹以一種和陽翰笙的劇本正好相反的態度，對待太平軍最后的將領李秀成這個人物。陽把李描寫成一個向獨斷獨行的領袖挑戰的勇敢的人物，反過來，戚把他描述成一個放棄革命斗爭并出賣領袖的人。既然當時努力為彭德懷恢復名譽并批判“大躍進”，戚的描述既可能用以類比彭對毛的批評，也可能用以類比劉及黨的領袖們后來抵制毛的政策。戚并不否認李參加過革命斗爭，“李秀成在太平天國革命史上的這些功績是應該予以充分估價的，是不能抹殺的。但是，他在被敵人俘虜以后喪失革命氣節、背叛革命事業的事實，也是否定不了的”。他認為必須鄙棄那些在不利情況下背棄革命事業的人。背叛不只是缺點或錯誤，而是反革命的行為。因此李不能被寬恕，因為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區分敵我。[[29]](#_29_Qi_Ben_Yu____Ping_Li_Xiu_Che)戚反對對非難革命政策的人的任何寬容。

盡管激進知識分子批評著名的學者如馮友蘭和翦伯贊，但他們沒有公開攻擊那些和北京市委或黨的中央宣傳部聯系密切的人。吳晗關于歷史的某些看法受到了批評，但沒有公開提到他的雜文或他對海瑞這個人物的利用。1964年，戚本禹、關鋒和林杰寫了關于吳晗劇本的評論，但他們的論文被北京市委和宣傳部壓下，沒有發表。只是當北京的知識分子一官員及其政治上的支持者將要被打倒時，這些評論在1966年4月才得以發表。

“文化大革命”中有過這樣的指責：有人處心積慮地努力把這些爭論嚴格地保持在歷史和哲學范圍內，以防止攻擊具體個人和具體政策。結果，爭論表現為學術討論，而沒有顯露出它們本來是有后臺的政治和思想斗爭。爭論雙方，即使是激進分子一方，都引用了許多中國的和西方的歷史資料，也都承認爭論的復雜性和有所保留。他們的論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將變成口號，但在較早的這個時期，它們表面上是學術性的，有見識的。

#### 京劇改革

激進分子攻擊文化當局的另一個側面是改革京劇的工作。江青將在這一努力中起帶頭作用，這并不奇怪，因為這是她有自己的經驗的領域。[[30]](#_30_Luo_Ke_Shan__Wei_Te_Ke____Ji)盡管她把自己看做知識分子，然而她所受的正式教育并不廣博。她畢業于初級中學，曾在山東實驗戲劇學校學習。30年代她到了上海，在低水平的影片中扮演小角色。在那個時候，后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戲劇電影界領導人的五四作家田漢、夏衍和陽翰笙，在“左翼”集團里是主要的電影編劇人和影片導演。他們不欣賞她的演劇才能，不肯給她重要角色，很明顯，這漸漸引起了她對他們的敵意，以致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將予以報復。

1938年日本轟炸上海時，她和許多上海知識分子及學生一道前往延安。她在那里受到來自她的故鄉山東諸城縣的康生的照顧。他幫助她在魯迅藝術學院得到一個職務。她在毛和他的第三個妻子離婚后和他結了婚。由于黨領導集團某些成員的堅決主張，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被迫答應將不參加政治活動。她來自上海的“仇人”在文化領域內升遷到了有權勢的職位，而她的任務和聯系卻限制在文化部審查影片的電影指導委員會內。

直到60年代早期當對毛和“大躍進”的間接批評觸動了她時，她相對來說是不活躍的。她自稱她勸毛注意這些批評。她曾談到她這個時期的任務：在教育和文化領域內，我是一個游動哨兵……我的職責是仔細檢查某些刊物和報紙，把值得注意的……東西……提交給主席。[[31]](#_31_Jiang_Qing____Wei_Ren_Min_Zu)她還審查了一百多部劇本，并讓康生向她的老對手中華人民共和國戲劇界的領導人夏衍轉達她的看法：最近上演的多數劇目很壞，吳晗的《海瑞罷官》應當禁演。夏幾乎沒有給予注意。盡管吳晗的劇被禁止了，但傳統劇、歷史劇和鬼戲仍繼續演出。1962年12月，她再次批評了戲劇節目，這次并要求停演鬼戲。但是，盡管鬼戲隨后被禁演，傳統劇和歷史劇仍在上演。

由于存在宣傳機構的這種阻力，江青把她的攻擊轉向京劇。這種中國傳統戲劇的主要形式被看成是歌劇，因為它結合了唱功、做功、模擬、道白和武術。它的人物和情節是定型的，將善惡之間的對抗戲劇化，是向未受教育的群眾以及文化精英傳播思想上的教導和道德價值的一種有效手段。江青試圖把傳統的人物間的關系改革成工農兵英雄人物和地主、資產階級壞蛋之間的對抗的階級斗爭。

和描寫“中間人物”的故事形成對比，江青的京劇表演了男女英雄的事跡，他們沒有疑懼、缺點、憂傷或心緒不寧，完全為思想上的目標所鼓舞，為革命而成就了超人的功績。她努力改革傳統歌劇，拋棄它的內容但利用它的程式化的技巧和風格，并與中國民間舞蹈和革命歌曲結合起來。她不接受西方文化，但吸收最平庸的、傳統的蘇聯式舞蹈、音樂和歌曲。這些辦法加上階級斗爭、軍事沖突和供模仿的英雄人物的內容預示了將要支配“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文化。

她的這一努力得到了毛的支持。自從延安時代起她就曾關心傳統歌劇的改革，但傳統歌劇證明是不易改革的。即使在“大躍進”時期，當大多數有創造力的藝術刻畫階級斗爭時，京劇劇團仍在上演傳統節目。60年代早期，京劇和地方劇一樣是繁榮的。1963年12月，毛痛斥傳統歌劇，不僅是因為它不易改革，而且因為它被用來批評他。他還抨擊負責上演這些歌劇的文化官員：文化部很少關心文化。舊劇充滿了封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但文化部一點不關心。

在大約與此同時的另一次講話中，毛要求對此事立即采取行動：在文化領域內，尤其是在戲劇范圍內，封建和落后的東西占了統治地位，而社會主義的東西卻被忽視……既然文化部負責文化事務，就應當注意這方面出現的問題，指導審查，認真改正。如果什么事情也不做，文化部就應當改成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洋人、死人部。毛的話是“文化大革命”的華麗言詞的先聲，不過他仍然給改革留下一個機會，加了一句：如果情況得到了改正，那就不必改變名稱了。[[32]](#_32____Yan_An_Wen_Yi_Zuo_Tan_Hui)

江青得到毛的認可，著手她的上演革命樣板戲的計劃。上海市委宣傳部主持的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6日的華東戲劇會演說明了這個計劃的目的。柯慶施在會演開始時公開重申毛上月的指示，并譴責“不健康的資產階級情調和那些反動、荒誕、色情、迷信的東西對群眾的影響。對比之下，社會主義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思想武器”。[[33]](#_33___Jie_Fang_Ri_Bao____She_Lun)新的革命樣板戲將起這種作用。

文化機構對毛的壓力和江青的改革努力反應遲緩。但是，把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像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評述的那樣說成思想上的兩條路線斗爭，是不十分準確的。和江青及其伙伴一樣，文化機構也主張改革，但是它試圖使改革和它本身官僚政治的需要一致起來。然而，盡管這還不是兩條明顯對立的路線之間的直接對抗，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存在兩個集團之間的沖突。江青只被列為京劇改革討論的一個發言者，而且她的講話當時的報紙并未發表，這一事實表明，如她后來所指責的那樣，官員們拒絕給予她新聞報道的機會。

盡管某些文化官員多多少少不愿改革京劇，但江青和官員之間的沖突與其說是是否需要改革，不如說是由誰來進行改革。這是派系斗爭，而不是什么思想斗爭。她受文化官員阻礙的原因，與其說是他們不愿贊同毛的京劇改革要求，不如說是他們憎惡她對他們的領域進行干預。只是當“文化大革命”中這些官員被清洗時，她才得以放手使京劇革命化，并使之成為中國主要的文化精神食糧。

## 黨的整風，1964—1965年

毛思想上的階級斗爭的號召和進行京劇改革的建議，雖然在宣傳工具中和在會議上得到了響應，但實際上并未落實，于是他就在1963年晚期和1964年，越過對具體文藝形式如歌劇和小說的批評而攻擊文化官僚機構本身。1963年12月12日，毛斷言：各種文藝形式問題不少。在許多部門中社會主義改造至今成效甚小，還是“死人”統治著……社會和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但作為為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的一個部分的文藝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此我們應當繼續進行調查研究，認真注意這個問題。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34]](#_34_Mao_Ze_Dong____Zai_Ke_Qing_S)他在下一天（12月13日）給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中，甚至提出了更嚴厲的批評，責備某些委員保守、自大、自滿。[[35]](#_35_Mao_Ze_Dong____Zhong_Yang_We)他譴責這些，根據是他們只談他們的成績，而不承認他們的缺點，或表面上應付一番。

他在1964年2月春節有關教育的講話中，預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極端的反智力的特點：在全部歷史中，科舉考試得中狀元的人極少成就大名。他指出，明代僅有的兩個政績良好的皇帝勉強才能夠讀寫。他輕視知識分子在中國發展中的作用。他說，在嘉靖朝（1522—1567年），知識分子當權時，情況不好，國家混亂……讀書太多顯然是有害的。[[36]](#_36_Shi_La_Mu_Bian____Mao_Ze_Don)毛吩咐，把演員、詩人、劇作家、作家趕出城市和政府機關。他們應當定期地分批下放到農村和工廠。他甚至以嚴厲制裁相威脅，只有他們下去了，他們才會有飯吃。[[37]](#_37_Tong_Shang_Shu__Di_207Ye)

文化官員們或者是不理解、誤解了毛的話，或者是故意不予理睬。他們可能感到有足夠把握，他們的官僚政治的保護人對于毛的意見口頭上說得好聽，但除了例行公事以外，實際上并不執行。他們的確如毛所要求的，送了一批批知識分子、文化干部和學生到農村和工廠去。但是，他們沒有重視他1963年12月的指示：在他們的領域內實行“思想改造”，并“認真”審查他們自己的部門。

他們含蓄地拒絕了毛對他們妨礙革命的主要批評，接受了他對執行他的政策不夠有力的次要的責備。周揚在1964年1月早期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承認：有時工作抓得不夠緊，在扶植社會主義新事物方面不夠努力。[[38]](#_38___Wen_Yi_Zhan_Xian_Shang_De)但是，周對他的部門和同事的這種批評是半心半意的。支持他抵制毛的思想斗爭要求的原因可能是，他知道在毛1963年的講話后不久，劉少奇發表了和毛的看法針鋒相對的有關上層建筑的意見。毛認為上層建筑落后于經濟基礎的變化，而劉據說卻斷言現在上層建筑的工作和經濟基礎是適應的。[[39]](#_39___Huan_Hu_Mao_Ze_Dong_Wen_Yi)周對毛改革文化領域的號召響應不力有其職務上的正當理由。

由于文化官員規避毛的命令，毛在1964年6月27日發出了更有力的指責性的指示。而且，他的怒氣與其說是針對參加這些爭論的知識分子，不如說是針對允許這些爭論發生的文化官員們。他說，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進，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40]](#_40___Guan_Yu_Wen_Yi_De_Zhi_Shi)

但是，他們在1964年發動整風并不只是由于毛的壓力；它也表現出他們自己對思想修養衰退的關心。當一些年長的知識分子繼續要求寬松的時候，官員們卻謀求加緊控制。他們過去允許知識分子進行批評是出于實用的原因，而不是因為他們是思想自由的提倡者。既然經濟恢復在進行，他們并不需要太多的批評，這種批評，和江青努力規避黨的正常做法一樣，對有條不紊的發展可能正好起破壞作用。官員們和毛之間的分歧，與其說和應否重新加緊控制有關，不如說和如何做到這點有關。毛要求的是擴展到頂層文化機構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官員們卻開展限于文學和學術領域的整風。它只膚淺地觸及極少數毛指責過的“高高在上的”文化官員。

開展整風的是通常負責思想改造運動的人——宣傳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的官員們。1964年春季，黨的書記處設立了一個協調文化改革的高級別的工作組，叫做五人小組。它以彭真為首，成員有陸定一、康生、中央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人民日報》總編輯和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小組中唯一接近江青及其伙伴的人是康生；其余的人和文化機構是一致的。毛的心腹朋友和激進知識分子通過康生能夠插手整風，但他們只起次要作用。

軍隊也在運動中起次要作用。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后，人民解放軍在文化領域中日益變得令人注目。人民解放軍設立了歌劇、文學和藝術的團體，但這時它們是平行于——而不是取代——黨的團體。在以毛的思想使官僚機構重新獲得活力的努力中，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官員被安插進文化、宣傳和教育的機構，就像他們被安插進經濟和行政機構一樣。但是，這個網狀系統不是在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的控制之下，而是在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控制之下。黨的領導在很大程度上負責這次整風，并下決心防止這次整風爆發成為有可能轉而反對自己的群眾運動。實際上，1964年夏季發動的黨的整風并不是一次冷酷打擊的運動，而是一系列反對僅次于最高層文化官員的一些著名知識分子的小型運動。

官員們似乎努力要把注意力從他們自身引開，挑選了一個在他們核心集團以外的知識分子作為主要靶子。他就是中央委員和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楊獻珍。他在蘇聯過了20年，20世紀20年代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30年代是蘇聯外國文學研究所中國部的負責人。既然政府日益進行反蘇責罵，楊就成了合適的靶子。楊還在高級黨校和陳伯達發生派系沖突。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楊提出了和毛當時強調斗爭正好相反的概念。

當反對楊獻珍的運動在宣傳工具中展開時，黨校、大學和研究所對調和論的企圖——如楊所贊同的“合二而一”的用語所表達的——進行了集中反擊；“合二而一”同毛強調階級斗爭的用語“一分為二”背道而馳。毛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所論述的非對抗性矛盾的概念中，在《矛盾論》所論述的對立面的相互關系中，也都談論過對立統一問題。但是，毛強調，在不斷的斗爭中一種力量被另一種力量所轉化，和統一相比，轉化是更根本的；而楊強調，統一并不能消除對立，而是各自依然獨立，因互相需要而結合在一起。他主張尋求對立思想意識的共同點，但允許差別繼續存在。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這種思想的言外之意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家之內容忍不同的觀點和階級。

除了平息調和的要求外，對楊的批判也被用來抑制1964年仍有共鳴的對“大躍進”的批評。楊在“大躍進”中曾在學術界發動一場名為“思維與存在問題”的爭論，這場爭論可以被解釋成對毛的政策的含蓄的批評。楊認為無論怎樣博識的人也不能不顧歷史的無情規律，或者使他的意識同客觀情況固有的限制相對立。楊的論點包含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社會必須經過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不能一躍而進入共產主義。既然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過激的改革將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它們和中國的實際不符。

與攻擊“合二而一”思想時一樣，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未公開發表的論文把這些意見歸之于楊的。1958年，在一次訪問農村以后，楊寫了一篇文章，對中國社會革命的性質提出疑問，并否定群眾在“大躍進”中的能動作用。他警告說：拋棄客觀規律和對主觀作用的片面論述就是形而上學，這只能變成唯意志論。[[41]](#_41_Cong_Wei____Yang_Xian_Zhen_T)和在“中間人物”的討論當中一樣，楊把“大躍進”的失敗歸因于毛的革命幻想和不革命農民的現實之間的矛盾。

批評楊的主要人物是他意識形態上的老對手艾思奇，艾要懲戒楊和像楊這樣沒有完全投身于繼續斗爭的人。他的話已經暗示出即將來臨的“文化大革命”對追求緩和的黨內同事的攻擊。他指出“這條路線不但在敵我之間一分為二，在朋友之間，也把最接近的朋友和動搖不定的朋友一分為二”。他警告說，如果黨容忍那些動搖不定的人，那么社會主義就不能實現。“不是分清敵友，而是敵友不分，或者在朋友中只是一味‘求同存異’，沒有斗爭……就會把革命領錯了路而使革命失敗。”[[42]](#_42_Ai_Si_Qi____Bu_Rong_Xu_Yong)雖然擔心動搖不定的同志和繼續斗爭只是1964年整風的許多內容之一，但它將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基調。

整風還攻擊了楊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看法：政策必須順應歷史尚未展開的階段，才能為社會主義創造條件。這次討論類似于西方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許多次思想和哲學的爭論——有些人相信存在永遠不變的歷史規律，有些人如列寧相信人類有能力形成自己的歷史。毛在1963年5月，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中最后一次闡述列寧主義傳統，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一個人認識他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規律的問題，要到“由精神到物質的階段……把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才能得到證明。[[43]](#_43_Mao_Ze_Dong____Ren_De_Zheng)因此，毛堅持，人必須實踐才能知道他是否準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

和毛認為思想取決于行動形成對比，楊的罪名是認為思想只是一種物質發展的被動的反映。他因否認主觀能動性和革命精神而受到批判。實際上，楊并不否認主觀的和革命的精神，但他強調主觀的和革命的精神必須同清醒地重視客觀限制結合起來。他以及幾個具有他的看法的黨領導集團的成員，無疑認為他們是按馬克思主義的，也是真正列寧主義的傳統行事。即使是列寧對主觀因素和革命意志的強調，也附有真正努力去準確了解“客觀現實”的條件。

關于楊的思想的討論主要是一場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關于按階段順序發展的觀點和經由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到毛的盧梭一雅各賓唯意志論的觀點之間的思想爭論。關于這次爭論，黨的官員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穩健的辦法。楊被免去高級黨校副校長的職務，由他的老對手艾思奇接任。但是楊沒有受到強烈的指責和被扣上以前運動中給知識分子對象定性的帽子。大部分批評學術性多于政治性，比較實事求是而不是一味論戰。

楊的見解批評了當局突出未來的烏托邦而不是處理當前的現實，同樣，邵荃麟關于農民是“中間人物”而不是革命者的看法也含有這樣的意思：官僚機構和毛一樣不了解農民的真正需要。因此，整風的另一個論題是反駁邵的“中間人物”思想。當局不是針鋒相對地討論這個問題，而是用邵的批判反擊他本人，指責邵和許多小說家如趙樹理、周立波和馬烽，正是他們把農民描寫成動搖不定和感情矛盾的人，因而表現出他們自己脫離了農民。

但是，邵是這場反對“中間人物”運動的主要靶子。即使存在從毛和他的伙伴那里來的壓力，但選擇像邵這樣的人——中國作家協會黨組負責人，和文化官僚機構有直接聯系——似乎也是由于官僚機構本身為了要繼續掌權。把攻擊限制在一個重要官員身上，保護了他的同事們，尤其是周揚。因此，邵成了文化當局“失誤”的替罪羊。

周揚親自指導這場反對邵的運動。他本人校閱了許多評論文章，試圖使討論避開政治問題而限制在文學問題上。在周揚的指導下，運動很快從指責邵和“中間人物”的否定階段轉到明確社會主義新人的新行為方式、新價值和新信念的肯定階段。和邵的懷疑革命、因斗爭而感到迷惑、想得到物質利益的農民形象形成對比，當局把農民描述成絕對樂觀、不惜自我犧牲和堅持革命信仰的英雄。

盡管周揚努力控制運動，但激進的知識分子，最突出的是姚文元，仍然介入了這次討論。他們當時的公開看法和文化當局沒有多大差別。姚甚至間接承認大多數農民仍然是不革命的，但是寫大多數就是對正在萌發或發展的新事物的排斥和壓制，是對表面上仍然廣泛存在的舊事物的擴大保護。[[44]](#_44_Yao_Wen_Yuan____Shi_She_Hui)因此，姚建議作家們不要描寫大多數而要描寫少數。積極地、充分地、生動地塑造英雄人物，從而啟發和鼓舞人民。[[45]](#_45_Tong_Shang)

這個時期塑造了幾個和“中間人物”形成對照的英雄人物。從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的大量文學作品中的非英雄人物到60年代中期的英雄人物的變化，反映了從承認人和經濟的局限性到相信自我犧牲的新人能夠克服一切障礙的變化。主要文學作品的主人公從信仰模糊的普通農民和工人改變成了“平凡的”英雄，通常來自人民解放軍，例如雷鋒，他們對毛主義的奉獻和無私品德的信仰，以及對毛的忠誠是堅定不移的。

伴隨這種變化的是從個人所寫的傳統的小說、短篇故事形式轉移到更容易駕馭的、半虛構的、幾乎是作為神話予以介紹的由編委會署名的日記，如《雷鋒日記》。50年代后期仍在寫作的有名望的作家發表的作品越來越少，主要屬于人民解放軍宣傳部的用假名的集體的作品越來越多，這是人民解放軍日益插手文化領域的一個跡象。

反對“中間人物”的運動轉入電影藝術方面繼續進行。電影不但描寫了非英雄的主人公——尤其是在據30年代文學作品改編的影片中——而且是由曾經引起江青怨恨的夏衍和陽翰笙指導的。她曾像插手歌劇一樣，試圖插手電影。她向陸定一和周揚指出很多她聲稱毛要批判的影片。但是只有幾部受到批判。的確，受到批判的影片都和她過去的仇敵有關系，但是在宣傳部的監督下，批判本身一般是溫和的。最受注意的影片是《林家鋪子》，由夏衍根據茅盾的小說改編成電影。盡管1959年最初放映時很受歡迎，1964年卻受到批判，因為主要主人公的種種人際關系不是以尖銳的階級矛盾為基礎。這個故事在30年代曾有積極影響是被承認的，因為它展示了小資產階級的困境并增進了他們對革命的支持。但是現在它被看做是不適當的，因為已不再需要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合作了。

相對來說，電影的整風一般是有限度的。這部影片和其他幾部影片一起受到了批判，但并沒有群眾運動或批判它們的大規模的會議，有的乃是和這些影片的作者和制片人有密切聯系的同行的溫和批評。可是少數批評暗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將向五四作家傾瀉的那種攻擊。例如，有一篇評論斷言夏衍代表了這種知識分子：他們雖是黨員，但仍然在內心深處隱藏著一個資產階級王國。[[46]](#_46_Su_Nan_Yuan_____Lin_Jia_Pu_Z)此外，它譴責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對青年有一種腐蝕性影響。

這次整風在利用宣傳工具、批評和自我批評會和選擇個人靶子方面類似于其他思想改造運動，但是它的處理方法卻是不同的。盡管主持者大多數是指揮1955年反胡風運動和1957—1958年“反右運動”的宣傳部的同一批人，然而這次整風卻不那么直截了當，那么徹底，對它的受害者比較寬大。也許這批人和他們以前一樣，急于要阻止毛所說的“滑向修正主義”，但是有一些因素使他們躊躇不前——日益官僚化，擔心令人頭暈眼花的失去控制的另外一次全面的運動，以及對毛的政策的懷疑。此外，群眾被發動起來的整風將不但像在“百花運動”中那樣對他們本身是一種威脅，而且對整個黨也是一種威脅。

結果，似乎對毛的愿望有了誤解，這在一些情況下是真實的，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則是故意的。毛在“百花運動”中，在1957年3月12日向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所作的講話，以前沒有發表過，而在1964年6月整風剛剛發動的時候發表了。盡管有些措辭似乎經過修改，但這個講話既然是在毛對知識分子和黨不那么失望的時候作的，因而要求批評要有限度和體諒別人。毛告誡說，對知識分子的批評必須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而且，他提倡對有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采取耐心的方法：“這種人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會有的，我們應該允許他們不贊成。”[[47]](#_47_Mao_Ze_Dong____Zai_Zhong_Guo)這個講話，連同毛的簡短指示，在如何貫徹整風的問題上是不明確的，如果有所指，那就是主張說服，而不是強迫。

不管是否是故意的，宣傳機構寧愿把毛的話解釋成有限制地進行整風的命令。和過去一樣，點名批評個人是作為傳遞思想信息的工具。但是不是像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一個明確的靶子，或是在“反右運動”中有一個像丁玲集團或中國民主同盟那樣的明確的團體，這次同時發動幾個戰役反對幾個有關但不相同的靶子，這有助于分散這次運動。

除了楊獻珍和邵荃麟以外，這次整風還批判了哲學家馮定強調所有人的共同本能，歐陽山描寫沒有階級內容的愛情，以及美學家周谷城談論統一整體意識。這是一個廣泛的運動，涉及哲學、歷史、文學理論、藝術和思想體系，但它是不徹底的——夸張的文詞和事實之間、宣布的政策和執行情況之間存在差距。此外，以前運動的革命激情已不復存在；受影響的是大城市中的一小批黨的知識分子。和既影響知識分子也影響群眾的反胡風運動相反，沒有作出多少努力以使普通工人和農民卷人。沒有過去和將來運動所特有的大型斗爭會或大字報。

大多數整風主要是在文化部和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悄悄地開展的。和公布胡風的信件或在“反右運動”中重新發表丁玲的小說和文章相比，出現了似乎是有意封鎖材料的情況，所以難以形成大規模的批判。除了邵荃麟大連講話的斷斷續續的引語外，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大連的講話的真實記載。據說周揚制止公布它們。除了“一分為二，合二而一”的說法外，沒有作出什么努力去簡化思想上的主旨以保證它們能被沒有文化的人所理解。大部分評論具有一種難以理解的充滿馬克思主義抽象概念的思想論爭的特點，仿佛是要轉移對它的政治含義的注意。盡管這次整風無疑是政治性的，其內容卻顯然是學術性的。

對點名靶子的處理是寬大的。他們始終被叫做“同志”，這種稱呼，胡風和丁玲在針對他們的指控剛開始時便失去了。和過去不同，這次整風結束時全國各地都沒有發表作為進一步思想灌輸資料的難堪的自我批判。沒有發表楊獻珍、邵荃麟或其他人的公開自白書。不承認他們的“錯誤”的人和刊物，沒有受到任何程度的懲處。和1954年馮雪峰及其《文藝報》的同事因拒絕學生對俞平伯的批判而被清洗形成對比，《中國青年》由于它最初拒絕攻擊馮定，只發表了一篇不疼不癢的自我批評便算了事。

然而有證據表明，周揚和文化當局受到了壓力。不只邵荃麟，而且周揚的親密同事、江青過去的仇敵田漢、夏衍和陽翰笙都被免職。茅盾也不再當文化部長。被認為由周揚及其伙伴完全把持的刊物《文藝報》發表了許多文章批評它自己曾經贊揚像趙樹理和歐陽山這樣一些描寫“中間人物”的作家。有一個評論家譴責《文藝報》說的是革命，行的卻是修正主義。另一個評論家譴責它依靠一小批專業作家而不考慮群眾來稿。這些便是“文化大革命”中對文化官員的主要指控。

周揚的一些親密伙伴的去職和來自江青的挑戰似乎標志著周揚經管了幾近30年的文化機構終結的開始。可是，盡管文化機構為了得到毛的諒解，非常主動地將它的某些最著名的人物免職并改組它的領導班子，但它的工作仍然照樣進行。盡管毛曾指責大多數文化官員搞修正主義，但和前幾次運動相反，當時像胡風事件的所有追隨者和像丁玲事件的所有伙伴都受到與他們的領袖相似的懲罰，這次批判了少數同事便就打住，對他們的指責也多半限于一些具體的錯誤。如后來“文化大革命”中所描寫的，他們像“車”，犧牲他們是要保“帥”——周揚。甚至周的其他親密伙伴林默涵、袁水拍、何其芳，這次都沒有受到批評。

周揚的上級宣傳部長陸定一接過茅盾的文化部長的職務。到了1965年春季，對夏衍、陽翰笙和田漢的批評已經減弱。周揚能夠保護他的機構的大部分免遭攻擊。而且，他似乎曾經防止人民解放軍滲透進他的機構，這種滲透已經影響了其他官僚機構。到1964年年末，以人民解放軍政治委員制度為榜樣而建立政治部門的工作，在幾個主管經濟的部中取得相當進展，而存文化部中這種制度卻沒有什么跡象。

盡管那些被挑選出來批判的人不像過去那樣是眾所周知的知識分子，而是在宣傳和思想方面有長期經歷的黨員，但他們并非位居文化領導集團的最上層。他們也不是曾經最尖銳地批評毛和“大躍進”的人。“三家村”集團成員之一的廖沫沙寫了一篇自我批評，卻沒有提到他參加“三家村”或他批評毛主義綱領的事。很可能，當周揚謀求保證對他的老友進行溫和的批評時，彭真保護了“三家村”。反對他們下屬的激烈批判運動將使他們作為贊助者而受到反彈過來的打擊。像過去的運動那樣，沒有提到下屬的錯誤反映了他們領導人的錯誤這一事實。

和以前運動最重要的不同可能是，在對替罪羊的否定評價方面和在強迫接受一條不可更改的路線方面并沒有全體一致的看法。這次有著不同的看法，有為受害者作某種辯護的，有多多少少偏離強加的路線的。攻擊者占優勢，但辯護者和主張緩和的人并沒有像在其他運動中那樣從舞臺上消失。將要統治“文化大革命”的所有論題——階級斗爭、意識的改造、對青年和黨領導人當中革命精神衰退的擔心——在1964年的整風中都出現了。但是，這次討論是有矛盾的，再次反映了文化當局有不同的看法，從而又反映了政治領導內部的不一致。

這次整風的另一個獨有的特點是，當它展開時，對某些批評家，尤其是對激進的知識分子進行了公開的批評。姚文元因他以前批評審美學家周谷城而在1964年受到指責。《人民日報》1964年8月2日的一篇文章說姚的評論自相矛盾和與歷史事實不符。在這篇可能是間接評論毛的文章中，兩個批評家形容姚的觀點是以歪曲現實的僵硬公式為基礎。[[48]](#_48_Jin_Wei_Min___Li_Yun_Chu)這些反批評反映了文化官員仍然占有優勢的地位。可是他們沒有走得太遠，因為毛同樣保護激進的知識分子。

到了1965年年初，周揚謀求迅速地正式結束這次整風。他早些時候，即在1964年11月，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各個協會中暫時停止整風，理由是別處需要干部。1965年2月末，他召開了一個編輯和撰稿人的會議，他在會上指責整風中最近的評論是教條的、簡單化的和言過其實的。其后，整風便逐漸停止了。和他在以前運動中的習慣一樣，他在1965年4月15日和16日總結了成績并宣布整風結束。

周在他最后的報告中再次承認，在批判修正主義和貫徹整風中他行動遲緩。但是他不承認像毛在1963年12月13日指示中所追究的任何嚴重缺點。關于他的某些同事，周同意他們做了一些他們應當為此而受到批評的事情，但是他堅決認為：黨沒有把他們看做右派分子。我們和他們的矛盾和斗爭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斗爭。[[49]](#_49___Wen_Yi_Zhan_Xian_Shang_De)他們可能在文化領域中誤入歧途，但沒有在政治領域中犯修正主義的錯誤。周揚還聲稱，他們已不再持有某些這類看法，因此不應當再受到批評。

在科學方面，和在藝術及人文學科方面一樣，毛的指示被置于不顧，在某些情況下還受到抵制。在1964年2月13日的春節教育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毛曾贊揚本杰明·富蘭克林和詹姆斯·瓦特是科學家的榜樣，他們在他們的日常工作中有所發現。對比之下，許多大學的科研部門只是聚會的場所，在那里存在極其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50]](#_50_Shi_La_Mu_Bian____Mao_Zhu_Xi)艾思奇在《紅旗》新設的欄目《自然科學和唯物辯證法》中爭辯說，科學成就取決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應用，并且指責那些不肯將辯證法應用于科學研究的人。

可是在1965年，《中國青年報》發表了許多號召青年“專”而不“紅”的文章。它建議他們不管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并且要在研究中心而不是在田間和工廠工作。在一次關于“紅與專”的座談會上，有人甚至鼓勵使用資產階級專家，這樣做恰恰是因為推動他們的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一些資產階級技術專家盡管他們的世界觀還沒有得到改造，而他們卻可以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如果他們在馬列主義研究上花時間太多，那么專得一定會差一些。”[[51]](#_51_Tian_He_Shui____Hong_Zhuan_E)

《中國青年報》的一篇社論認為，一個人的“紅”并不表現在參加會議和政治學習方面。對一個科學家來說，紅表現在把他的大部分時間用于專業活動方面。它告誡說：我們決不應當吹毛求疵地把獻身于學習、積極努力從事深入研究和專業工作看做個人主義的表現。[[52]](#_52___You_Hong_You_Zhuan_Shi_Shi)

因此，毛有理由對1964—1965年的整風不滿。它不是擴大成為一次較大的群眾運動，而是漸漸消失，變成相對來說是低調的、無成效的事件，成了種種看法的傳播媒介，有的背離了他自己的看法。黨在言詞上強烈，但在實際執行方面卻是膚淺的，而人民解放軍則正在用革命的激情和行動努力進行思想灌輸。正是毛授權開展他認為十分必要的思想改造的機構抵制、甚至反對他的要求。到了1965年秋季，毛已經放棄了依靠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并和他所親近的江青、陳伯達、人民解放軍和激進知識分子一道發動了他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和黨的整風形成對比，毛的“文化大革命”將在思想、發動群眾和徹底清洗不聽從他的命令的人等方面強制地做到全體一致。

知識分子從60年代早期起所表現的對穩定和和解時期、對專業和思想標準、對思想和現實之間的一致性以及對農民真正要求的認識等方面的關心，都被壓制下去。他們的倡導者被清洗，其中的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但是在毛之后的時代，鄧小平的領導將與少數知識分子和青年一樣，尋求實現涉及上述這些事項的改革。

[[1]](#_1_9)《光明日報》，1961年9月3日，第2版。

[[2]](#_2_9)周恩來：《論文學和藝術》，《文藝報》[778]，1979年2月；《北京周報》[568]，（1979年3月30日），9。

[[3]](#_3_9)斯圖爾特·施拉姆編：《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634]，第169頁。

[[4]](#_4_9)《文藝報》[778]，3（1961年），3。

[[5]](#_5_9)《上海文學》[652]，5（1962年），3。

[[6]](#_6_9)《光明日報》，1961年9月3日，第2版。

[[7]](#_7_9)《光明日報》，1961年9月3日，第2版。

[[8]](#_8_9)劉國鈞：《“神仙會”促進了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載《人民日報》，1961年5月16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2.513，11。

[[9]](#_9_9)《搗毀“三家村”的黑后臺》，《光明日報》，1967年6月18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3977，14。

[[10]](#_10_9)吳南星：《三家村札記·專治“健忘癥”》[819]，《前線》，14（1962年）；《當代背景材料》[735]，第792期，第4頁。

[[11]](#_11_9)馬南（鄧拓）：《王道和霸道》，《燕山夜話》[489]，四集，第13—16頁。

[[12]](#_12_9)鄧拓：《愛護勞動力的學說》，《燕山夜話》[489]，一集，第58頁。

[[13]](#_13_9)鄧拓：《為李三才辯護》，《燕山夜話》[489]，五集，第150頁。引文不見于該文，此處按英文翻譯。——譯者

[[14]](#_14_9)鄧拓：《智謀是可靠的嗎？》，《燕山夜話》[489]，四集，第17—19頁。譯者按：引文出自鄧拓《歡迎“雜家”》，《燕山夜話》，一集。

[[15]](#_15_9)鄧拓：《事事關心》，《燕山夜話》[489]，二集，第60—62頁。

[[16]](#_16_9)鄧拓：《太湖吟》，《光明日報》，1960年9月7日。譯者按：組詩《太湖吟》中，《過東林書院》一首作：“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訪高子止水》一首作：“力抗權奸志不移，東林一代好男兒！攀龍風節揚千古，字字痛心絕命辭。”

[[17]](#_17_9)《人民日報》，1962年5月13日。

[[18]](#_18_9)《文藝報》[778]，8/9（1964年），15—18。

[[19]](#_19_9)《周揚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中國大陸雜志選錄》[737]，648，11、15。

[[20]](#_20_9)馮友蘭：《關于孔子討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哲學研究》[97]，6（1963年），載《中國的歷史和哲學研究》[138]，1.4（1968年夏），第84頁。

[[21]](#_21_9)《中國的哲學研究》[137]，（1972—1973年秋冬），第18頁。

[[22]](#_22_9)馮友蘭：《批評和自我批評》，載《中國的歷史和哲學研究》[138]，第1卷，第4，86—87頁。

[[23]](#_23_9)貢文聲：《孫冶方的“理論”是修正主義謬論》，《人民日報》，1966年8月8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3766，17。

[[24]](#_24_9)拉斯·拉格瓦爾德：《作為文學評論家和理論家的姚文元》[597]。

[[25]](#_25_9)《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也見帕里斯·張《中國文化革命中的激進分子和激進思想》[85]，第81頁。

[[26]](#_26_9)關鋒、林聿時：《關于哲學史研究中階級分析的幾個問題》，《哲學研究》[97]，6（1963年），載《中國的歷史和哲學研究》[138]，1.4（1968年夏），第66頁。

[[27]](#_27_9)戚本禹、林杰：《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紅旗》[345]（1966年3月24日）第19—30頁，《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374]，第35、137頁。

[[28]](#_28_9)戚本禹、林杰：《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紅旗》[345]（1966年3月24日）第19—30頁，《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374]，第35、137頁。

[[29]](#_29_9)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歷史研究》[444]，《人民日報》、《光明日報》1963年8月23日轉載，標題有改動，《北京大公報》也予轉載，見《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374]，26，631。13—14、15。

[[30]](#_30_9)羅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797]。

[[31]](#_31_9)江青：《為人民作新貢獻》，《東方紅》，1967年6月3日，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739]，192，7。

[[32]](#_32_9)《〈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1942—1967年）毛主席關于文藝的重要指示》，《文藝紅旗》，1967年5月30日，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4000，23。

[[33]](#_33_9)《解放日報》社論，1963年12月25日，第3版。

[[34]](#_34_9)毛澤東：《在柯慶施同志報告上的批示》，《毛澤東思想萬歲》[507]，載《當代背景材料》[735]，901，41。

[[35]](#_35_9)毛澤東：《中央委員會關于加強相互學習和克服保守、自大、自滿的指示》，《毛澤東思想萬歲》[507]，載《當代背景材料》[735]，892，15。

[[36]](#_36_9)施拉姆編：《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634]，第204頁。

[[37]](#_37_9)同上書，第207頁。

[[38]](#_38_9)《文藝戰線上的激戰》，《首都紅衛兵》，1967年7月7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842，17。

[[39]](#_39_9)《歡呼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勝利》，新華社，1967年5月17日；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3950，13。

[[40]](#_40_9)《關于文藝的指示》，《毛澤東思想萬歲》[507]，載《當代背景材料》[735]，891，41。

[[41]](#_41_9)叢衛：《楊獻珍同志為什么要頑固地反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光明日報》，1964年12月11日，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3380，5。

[[42]](#_42_9)艾思奇：《不容許用矛盾調和論和階級調和論來偷換革命辯證法》，《人民日報》，1965年5月20日，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3475，7。

[[43]](#_43_9)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四篇哲學論文》[505]，第134—135頁。

[[44]](#_44_9)姚文元：《使社會主義文藝蛻化變質的理論》，《光明日報》，1964年12月20日，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3374，4。

[[45]](#_45_9)同上。

[[46]](#_46_8)蘇南沅：《〈林家鋪子〉是一部美化資產階級的影片》，《人民日報》，1965年5月29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766，9。

[[47]](#_47_8)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當代背景材料》[735]，740，10。

[[48]](#_48_8)金為民、李云初：《關于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人民日報》，1964年8月2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747，25。

[[49]](#_49_8)《文藝戰線上的激戰》，《首都紅衛兵》，1967年7月7日；《當代背景材料》[735]，842，27。

[[50]](#_50_8)施拉姆編：《毛主席向人民講話》[634]，第208頁。

[[51]](#_51_8)田和水：《紅專二者不可兼得》，《中國青年報》，1964年12月26日，載《當代背景材料》[735]，757，6。

[[52]](#_52_7)《又紅又專是時代對青年的要求》，《中國青年報》社論，1965年7月24日，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3517，5。

## 第十一章 中蘇分裂

1958—1964年，中蘇爭論成了中國外交政策中壓倒一切的問題。[[1]](#_1_Lun_Shu_Zhong_Su_Zheng_Lun_De)50年代前半期，北京關注的是中美關系中的臺灣問題、朝鮮戰爭、被排斥于聯合國以及美國的經濟封鎖。這些都是重要問題，涉及到主權、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諸方面。在這個意義上，中蘇關系與中美關系有著密切聯系，因為中國在防御和經濟發展上都依靠莫斯科。

這些問題并沒有從北京的議事日程上消失，但在1958年以后，與中蘇爭論相比，它們成了第二位的問題。臺灣海峽除去1958年和1962年短暫的緊張時期外，是一個相對靜止的對抗點。同樣，朝鮮也保持一種“不戰不和”的分裂局面。中國迅速與歐洲、非洲和亞洲國家發展關系，大大抵消了對其聯合國席位實質性的（如果不是象征性的）剝奪。外貿的擴大，打開了通向歐洲與日本的科技通道，沖淡了美國封鎖的影響。

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召開的多國共產黨會議，與1958年和1959年赫魯曉夫在北京和毛澤東的兩次會見相比，在中蘇同盟中煽起了更大的爭吵，終于導致同盟的形存實亡。1960年，蘇聯取消一切經濟援助，以及此后不斷升級的邊界事件，將有限的友好關系變成了某種程度的敵視。中國指責蘇聯1959年在精英層和1962年在新疆少數民族問題上介入中國內部事務，從而在盟國之間互相抵觸的在國外的優先權常有的分歧中，增加一個爆炸性因素。最后，毛指斥赫魯曉夫為思想異端，給過度吹噓的“磐石般的團結”以最后的一擊，這個徒有虛名的“團結”，曾經是斯大林時期中蘇關系的特征。

不過，中蘇分裂盡管惹人注目，卻不是簡單的歷史的重復。有多種因素促使莫斯科與北京分離。從個人方面說，尼基塔·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的個性，就和一般同盟所需要的磋商、妥協與合作格格不入。這兩位獨斷獨行者特有的對人的態度，也把正常的分歧變成了相互的敵視。

這些分歧包括政治、經濟和軍事諸方面。兩個共產黨之間的齟齬，要追溯到20年代中期。中國人不聽斯大林的勸告，依靠自己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這使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與其他共產黨領袖相比，有如鶴立雞群。有利于莫斯科的力量對比，至少在政治上被有利于北京的威望對比所抵消。

這種力量與地位上的不相稱，在50年代前半期與中國完全依賴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同時存在。貿易和援助條款以及沒有明言的中國在核時代對蘇聯的軍事依賴，對雙方來說都引起了實際的與心理上的問題，這在50年代后半期愈來愈明顯。中國經濟與軍事發展的巨大需求，加重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和戰后東歐衛星國的需求而造成的蘇聯資源緊張。北京對莫斯科在輕重緩急上的考慮有不同看法，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這些基本上是雙邊的問題之外，同盟還面臨在第三國關系上的協調問題。蘇美1955年在日內瓦和1959年在戴維營的最高級會談，與北京同華盛頓之間缺乏外交承認形成對照。伴隨蘇聯強調“和平共處”而來的，是對核時代的戰爭冒險的警告。這意味著蘇聯默認美國對臺灣的防衛義務，它使中國國民黨人在同共產黨人的內戰中，免于最后失敗。在南亞，正當印度與中國的邊界爭端爆發為與西藏叛亂相聯系的武裝沖突時，莫斯科卻向新德里求愛。更遠一點說，中國自命亞非會議的領導，而蘇聯則對新獨立的第三世界懷有野心。甚至蘇聯花相當大的代價獲得的緩沖地帶東歐，也不是北京不可及的，特別是在1956—1957年，有的東歐國家領導把尋求中國的幫助作為向莫斯科討價還價的手段。到60年代初，這導致北京公開支持阿爾巴尼亞反對克里姆林宮。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構架內部，這兩個共產黨巨人爭相對全世界的共產黨和民族解放運動施加理論與實際影響。蘇聯的議會道路與中國的革命道路，各有其支持者。一個與此有關的問題是，支持資產階級政權而不支持他們的反對派共產黨，重新引起了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統一戰線的歷史爭論。在這個理論上有點深奧的抽象爭論后面，是權力和影響的真正競爭，在最高層惡化了中蘇關系。

但是，把北京在國外的所作所為都說成是它同莫斯科的爭論引起的，是不對的。有許多行動是針對別的國家或對它們作出的反應，完全與爭論無關。亞洲弧形地帶對北京來說是注意的焦點，對莫斯科則是次要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固然助長了中蘇的競爭，但它們本身就值得注意。除了外交政策這個獨立的外部因素外，內政在決定中國的對外關系中起著重要作用。同樣，經濟因素的影響，無論著眼于人口統計學與發展的一般層面，或是“大躍進”的特殊后果，都不能忽視。

中蘇關系的多面性，給分析與敘述帶來嚴重困難。究竟同盟是怎樣和為什么分裂的，我們沒有多少可靠的直接證據。雙方大量的爭論文章有時候是可靠的并透露了真情，但很多卻部分地受到歪曲或完全隱瞞了真相。

最后應提請注意的是：“中國”、“北京”、“領導”等用語所表示的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致，幾乎根本不存在。這種用語抹殺了個人、派別或集團所持的看法。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個令人煩惱的問題還不能得到回答。因此，我們只好照字面抄寫，而不把任何特定時間在某個具體政策上的一致當真。

由于1958—1964年間中國的外交政策專注于中蘇爭論，這就提供了一個中心主題，我們將圍繞它來敘述其他方面的發展。這樣，為了考察分裂的后果，就有必要對它的前因，即1957年11月執政的共產黨莫斯科會議，作扼要的追述。

## 第一階段：1958年

#### 重新闡明的中蘇關系：1957年11月

布爾什維克革命40周年，為國際共產主義的新總路線的設計和執政的共產黨之間的關系的調整，提供了一個講壇。這也是毛第二次訪問莫斯科和第二次公開會見赫魯曉夫的場合。對毛來說，這個時間選擇從幾方面看都很湊巧。南斯拉夫不同意莫斯科對執政的共產黨的態度，促使鐵托抵制這次會議，但南斯拉夫派出了一個強大的代表團。鐵托的缺席，使赫魯曉夫不安，因為他本想以他的個人威望，彌合斯大林造成的裂口。在國內，赫魯曉夫戰勝主席團的大多數，他們在頭年6月曾提議撤銷他的第一書記職務。但那是一次僥幸的脫險，一些赫魯曉夫的批評者準備在機會到來時再次向他挑戰。

而毛呢，他剛經歷了一個短命的和有點尷尬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實驗，這個實驗是放松對知識分子和政治批評的限制。在一陣公開批評的風暴之后，那個夏季的一場嚴厲的“反右運動”恢復了黨的嚴格控制。同時，毛的著名演說《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1957年6月公開發表，在世界范圍內——特別是在東歐贏得了注意。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利益上的“非對抗性”矛盾是正常的，沒有理由對之采取命令主義態度與強制手段，這是難得的承認。結果，盡管毛的這些闡述當時在中國證明是破壞性的，卻有利于他的國際聲望。

在會議前夕，還發生了一件事，似乎有利于赫魯曉夫，卻被毛巧妙地加以利用。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進入軌道，連同前此在8月26日宣布的洲際彈道導彈試驗成功，象征蘇聯具有了同美國在戰略核武器上的成就相匹敵的能力。但克里姆林宮知道把象征變成事實還需要一段時間，沒有過分宣傳，以避免向仍舊保持優勢的美國挑戰。毛卻沒有這種顧慮，他滿有信心地宣稱：“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2]](#_2_Bu_Re_Jin_Si_Ji____Ji_Tuan)這樣，毛就在實際上給赫魯曉夫出難題，要他以一種過分自信的（如果不是過分挑釁的）姿態，用人造地球衛星造成的心理優勢，壓“美帝國主義紙老虎”。

各種情況的結合，使毛得以在莫斯科會議上對有重大爭論的問題插進中國的觀點。“和平力量已經大大成長，已經有實際可能來防止戰爭”的斷言，被毛的“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就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土壤”[[3]](#_3_Quan_Wen_Jian_He_De_Sen____Zh)的警告所抵消。附隨的原話明確地對后一種前景作了更濃厚的渲染。此外，在對赫魯曉夫強調的取得政權的“和平道路”作了詳盡闡述之后，注意的是“非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而且歷史經驗也證明，統治階級是不會自愿讓出政權的。”在關于放松還是加強國內和黨內控制的爭論上，會議宣言堅決斷言：“在目前條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義，或者說右傾機會主義。”

一般地說，語言比較溫和的地方，反映了赫魯曉夫更愿強調的東西，雖然分歧還不像后來那樣明顯。同時，主張在內政和外交上實行更強硬的路線的，也不僅僅是毛。此外，毛還支持赫魯曉夫反對哥穆爾卡，后者的波蘭式社會主義道路和含蓄地提出的擺脫莫斯科的控制而獨立的主張，是向正確路線的標準蘇聯定義提出的挑戰。這個支持對于加強赫魯曉夫在會議中的地位，其重要性不亞于毛斷言蘇聯在科技和武器制造上的成就，已經使國際形勢達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結果，集團的領導責任落到莫斯科頭上，但闡釋集團的政策，需要北京點頭。這樣，讓蘇聯居集團之首，并不使中國處于被動地位。

中蘇在莫斯科的交易，不僅是口頭上的互惠。會議前夕，蘇聯同意在研制核武器上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幫助。正如北京后來聲稱的，在1957年10月15日，簽訂了一個《國防新技術協定》，并說赫魯曉夫答應“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4]](#_4___Ping_Su_Lian_Zheng_Fu_Ba_Yu)這說明為什么陪同毛的是他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而到11月6日，又有一個軍事“友好”代表團參加進來，到11月29日才離開。同時，一個以郭沫若為首的科學代表團和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小組同他們的蘇聯同行會見。12月11日，一個為期五年的中蘇科學合作協定連同1958年科學合作議定書在莫斯科簽字。

看來這些協定對中國的核武器計劃有比較大的幫助，如同美國情報后來所透露的那樣。[[5]](#_5_Xia_Mian_Yi_Duan_Yin_Zi_Zuo_Z)雖然莫斯科從未證實過中國的聲明，但它對北京的援助是真實的，盡管在1959—1960年就終止了。在蘭州附近建立的一座氣體擴散工廠，是標準的蘇聯設備的復制，至少在外觀上是這樣。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支援用的基礎設施是按照蘇聯設計布置的。在附近可以看見一個與蘇聯導彈一模一樣的導彈，至于它是模型還是可以使用的，則不能確定。這樣，是否真有答應一個“原子彈樣品”的事，可以存而不論，而這些顯示實際分享核武器技術的指示物，表明1957年的協定有效地促進了中國的研制計劃。

總之，中蘇在1957年秋的交互作用，似乎真地加強了同盟，盡管那時也播下了以后關系緊張的種子。如毛提出“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共產黨”，既有有利影響，也帶有潛在麻煩。

同樣，毛澤東夸大蘇聯的導彈成就，可能令人驚慌失措，但這在當時并不預示中國方面有冒險行動的危險。更令人煩惱的是，毛以一種騎士的豪爽態度談論核戰爭，他說，在這場戰爭中，盡管“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不過，無論毛的大言壯語如何令他的蘇聯聽眾不安，卻不妨礙赫魯曉夫同意中國分享核武器技術。盡管蘇聯領袖將會后悔并終于取消這個決定，但在當時卻沒有表現出這種謹慎。這樣，中國的外交政策就在新闡明的中蘇關系中進入了1958年，這個關系是通過最高層的順利協商建立的。

#### 1958年：概觀

幾年后，毛把1958年看成中國革命勝利以后的發展的一個水準基點：“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定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6]](#_6_Mao_Ze_Dong____Zai_Kuo_Da_De)這句就中蘇關系而說的話的含義，在內政與外交上都得到證實，它具有深遠的影響。

內政方面，“大躍進”招致赫魯曉夫公開的與私下的批評，說是照抄“軍事共產主義”。這傷了中國人的感情，被認為是干涉內政和公開侮辱一個同盟國。毛在1958年公然漠視蘇聯的經濟方法，完全不理睬蘇聯顧問，他們的無所作為導致1960年的最終撤退。最后，夸張地宣稱“大躍進”的成功與斷言人民公社提供了越過蘇聯發展階段的通向共產主義的捷徑，含蓄地向社會主義陣營假定的意識形態和經濟上的領袖克里姆林宮提出了挑戰。

國際關系方面，中國堅定不移地攻擊東歐的“修正主義”，超過了蘇聯的立場，特別是1958年春對南斯拉夫的攻擊。7月，赫魯曉夫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黎巴嫩登陸時對中東危機的謹慎處理，引起北京提出一條更強硬的路線，要求作出更好戰的反應。此后不久，兩位領袖在中國首都進行了歷時三天的秘密會談，會談時有蘇聯高級軍官在場。但在會談中，毛沒有通知赫魯曉夫即將在這個月下旬對沿海島嶼金門進行炮擊和封鎖。這個單方面行動，引起美國在臺灣海峽大規模部署海軍和空軍，而且，根據蘇聯權威人士提供的消息，這個行動還促使赫魯曉夫決心取消剛在頭年簽訂的核武器技術協定。

對1958年的這個簡短的概觀，說明內政與外交的重大發展及其復雜的相互影響。學者似的分析至今是以探索因果聯系來驗證一個假設，即用一個單一的因素來解釋中國政策的兩個方面。這個方法強調國內政治，表現為在“齊放與爭鳴”試驗的余波及其“反右”結局中，“左”派或“激進”派占了優勢，“溫和”派或“右”派處于劣勢。[[7]](#_7_Zha_Ge_Li_Ya____Chong_Tu)然而，雖有專題研究，卻沒有找到對中國在這兩方面的表現作整體性說明的足夠的證據。盡管“文化大革命”當中及其以后的解釋與揭露，部分地弄清了一些孤立的事件，但仍不能說明在臺灣海峽的行動和向莫斯科的意識形態挑戰后面的全部考慮。

這不是否定這個假設，而是避免把內政和外交政策歸因于一個總的因果關系的解釋，因為那樣一來，邏輯推理和似乎合理的設想必然代替了直接證據。的確，就金門島來說，在政策的起因上，不僅需要而且也許應該把內政與外交分開。臺灣海峽的形勢，至少部分地取決于中美關系，它的歷史要追溯到1954—1955年的第一次沿海島嶼危機。因此，它本身就值得注意，特別是已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1957年12月陷于停頓，以及在此之前的兩年里，北京想在臺灣問題上達成一個暫時協定的愿望未能實現。

同樣，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刺耳攻擊，部分地是對鐵托在1958年3月的一個重要聲明中正式提出他的“社會主義的獨特道路”的反應。這是重提一個主要爭論，它第一次出現在1948年，導致共產黨情報局公開譴責貝爾格萊德，它一直困擾著貝爾格萊德與莫斯科的關系，此后在不同程度上也困擾著與北京的關系。

分析這個時期的第二個重要的假設斷言，蘇聯的導彈成就促使北京在從東歐到東亞的一系列問題上堅持它的立場。但這個論點至今也未得到證明。1958年事件的經過，提供了足夠的解釋，不需要一個整體論的假設。在可以把政策歸因于個別人亦即毛的限度內，認定一個單一的因素決定各種各樣表面相似的行動，似乎是有理的。但問題是，所有這些內政和外交上的決定，是在什么程度上由毛一個人單獨作出的。鑒于毛在那年秋天辭去國家主席只保留黨主席的職務，這個問題就特別有意義。在可以得到更多的證據之前，不忙于作出因果關系的解釋，同時，我們可以將事件按發展順序加以排列。按先后順序，而不按重要性的順序，我們先考察黎巴嫩危機的處理，然后是北京最高級會談和炮擊金門。最后，“大躍進”的泛濫后果也值得一提。

#### 黎巴嫩和北京最高級會談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魯曉夫和毛在北京的秘密會談，是雙方先在南斯拉夫問題，后在美軍在黎巴嫩登陸問題上的爭論積累成為分歧之后舉行的。兩位領導人是在這種政治氣氛中交換意見。3月間，南斯拉夫共產黨發表了一份長達230頁的南共綱領草案，正式宣布一整系列在內政和外交政策上的廣泛立場，向莫斯科提出并經1957年11月執政的共產黨會議認可的立場提出公開挑戰。這個文件在共產主義世界征求意見時，引起強烈的反應。它所主張的不結盟與中立地位，與華沙條約的原則背道而馳。在對西方和第三世界社會主義者的態度上，它完全漠視了當地共產黨人的領導作用。它強調的內部自治和各國共產黨一律平等，與長期形成的以莫斯科為首的概念相對立。

毫不奇怪，以克里姆林宮為首的其他共產黨宣布抵制即將召開的南共代表大會。但是，盡管《共產黨人》雜志僅僅在大會開幕三天前發表了一篇詳盡的批評，莫斯科仍采取了一種克制態度，稱南斯拉夫為“同志”，并公開宣布“永遠是南斯拉夫的朋友”。[[8]](#_8_Zha_Ge_Li_Ya____Chong_Tu)

北京可沒表現出這種克制。在大會閉幕后，《人民日報》沒有使用“同志式的”語調，而是攻擊南共“領導集團”和他們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說這是開倒車，或甘冒與集團決裂的危險。[[9]](#_9___Xian_Dai_Xiu_Zheng_Zhu_Yi_B)北京還宣稱，1948年共產黨情報局關于鐵托的決議仍然是正確的。這是中國第一次承認由斯大林開始的攻擊。斯大林的第二個動議，1949年共產黨情報局的一個把鐵托同“美帝國主義”捆在一起的決議，已經在1955年赫魯曉夫調停爭端的貝爾格萊德之行后撤銷。

接下來的一個月，當北京逐漸加強攻擊時，莫斯科卻固執地較慢作出反應，并且不像北京那么嚴厲。此外，蘇聯還同南斯拉夫保持正常的國家關系。貝爾格萊德則當它的駐北京大使被拒絕接近中國領導之后，撤回了大使。赫魯曉夫繼續稱鐵托為“同志”，北京則使用了貶義的“鐵托集團”。這樣，雖然蘇聯的批評幾乎在每一點上都反駁了鐵托，但在語言的選擇上卻明確無誤地表達了赫魯曉夫的愿望：“保留一線希望，在某些問題上尋求可以接受的對話形式”。[[10]](#_10_Zha_Ge_Li_Ya____Chong_Tu)與此對照，中國的攻擊則似乎故意要摧毀這種可能性。

有人提出毛有兩重動機：首先，加強集團的團結，反對中立主義或貝爾格萊德提出的不同意識形態，以便更有力地對付帝國主義；其次，通過攻擊南斯拉夫在和平共處與緩和東西方緊張關系上的觀點，阻止赫魯曉夫同西方搞緩和的意向。這種分析根據的是1958年5月中國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會議上的聲明。陳云重復毛頭年11月在莫斯科說的話，宣稱：“一切‘恐美病’都是毫無根據的。任何對于帝國主義戰爭力量估計過高，對于和平和社會主義力量估計不足，都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他更加嚴厲地說：“如果說在以前，例如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寧、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面對著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和十四國武裝干涉，都毫無所懼，那么，當此社會主義陣營已處于完全優勢的情況下，怎么能對帝國主義反而更害怕呢？”[[11]](#_11_Zha_Ge_Li_Ya____Chong_Tu)與此對照，赫魯曉夫的報告則用生動的語言描繪核戰爭毀滅性的后果，號召單方面的和相互的裁軍，強調“負責的政治家之間的會議將會導致爭論問題的解決”。

差不多與此同時，毛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在措辭上把赫魯曉夫對核戰爭的陰暗描繪同他自己著名的信念——中國在損失一半人口之后會生存下來——結合起來。他的話值得大段引證，因為是在內部講的，反映了他自己的看法。在小標題為《準備最后災難》的一段里，他警告說：

現在講點黑暗，準備大災大難……戰爭瘋子甩原子彈怎么辦？甩就甩吧！戰爭瘋子存在一天，就有這個可能……

戰爭與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戰爭的可能性。現在爭取和平的可能性比過去大。社會主義陣營力量比過去強大……但也有戰爭的可能性，要準備有瘋子。帝國主義為了擺脫經濟危機……

要準備真正打怎么辦？要講講這個問題。要打就打，把帝國主義掃光。然后再來建設。從此就不會再有世界大戰了……

打起仗來無非是死人。打仗死人我們見過。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了個資本主義全部滅亡，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12]](#_12_Mao_Ze_Dong____Zai_Ba_Da_Di)

毛扼要地講了中國由漢至唐曾多次損失上千萬人口以支持他的分析。但他沒有像他在莫斯科或陳云在華沙那樣斷言社會主義陣營的優勢。他也不是在一種好戰的或挑戰的場合講這個題目。他更沒有想用中國的行動去試探美國的決心的意思。從這些話來看，中國私下的態度不能說是魯莽的或冒險主義的，更不是企圖引發一場可能導致蘇美核戰爭的東西方沖突。

不過，中國公開的夸張言詞與論戰，不管是表面指向南斯拉夫或拐彎抹角地提到華沙，都表示了中蘇在對抗帝國主義的正確戰略與策略上的分歧。這些分歧在中東危機中變得更為明顯，這次危機始于伊拉克的起義，它導致伊拉克脫離它的西方盟友，終止于美海軍陸戰隊在黎巴嫩和英軍在約旦登陸。

赫魯曉夫對這些事件的反應，是建議美、英、法、蘇和印度立即在日內瓦或別的地方舉行最高級會議。他在7月19日寫給艾森豪威爾的信，用恰當的溫和語言，提出這個獨特的建議：“我們向你呼吁并非出于恫嚇，而是出于理智……各國領導人不應當依靠煽起戰爭狂作為出發點，而應當依靠理智和冷靜來尋求解決的辦法。”[[13]](#_13_Zha_Ge_Li_Ya____Chong_Tu)這就拒絕了兩天之前《人民日報》闡述的立場：“不能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有任何的姑息容忍……如果聽任美國侵略者為所欲為，那么，不但中東的人民要遭受奴役，而且新的世界戰爭也將不能幸免……因此讓全世界人民緊急行動起來。”[[14]](#_14_Tong_Shang)

更糟的是，赫魯曉夫的建議排除了中國而包括了印度。三天后北京終于認可了它，并在此后對分歧保持緘默。赫魯曉夫在7月23日進一步抱怨北京，他同意西方的反建議，五國最高級會議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范圍內舉行，這樣就包括了臺灣，而排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8月3日，一份中蘇聯合公報透露，赫魯曉夫與陪同他的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7月31日以后曾秘密會見毛和他的同事。馬林諾夫斯基在8月1日沒有參加人民解放軍的周年慶祝會或在會上講話，聯系到國際局勢，這說明這次最高級會談是為了緊急目的而匆忙召開的。時間的選擇還可能具有國內的含義。7月25日，北京宣布，中共中央軍委在5月27日至7月22日舉行了有高級軍官1000余人參加的“擴大會議”。毛和他的高級將領根據當前國際局勢，談到中國軍事能力的發展原則和國防問題。

不幸的是，對這兩件事，至今都沒有發表過詳細的報道，雖然后來中國和蘇聯的資料有兩點是一致的：第一，毛沒有同赫魯曉夫討論即將開始的炮擊金門；第二，關于以某種方式共同使用中蘇在中國的軍事設施的問題，引起相當大的爭論，最后未取得一致。對這兩點，即使不免于推測，仍應多說幾句，因為它們對后來中蘇關系的緊張起了作用。

1958年11月下旬，毛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說：“中蘇會談……其實會上沒有談一句臺灣局勢問題。”[[15]](#_15_Mao_Ze_Dong____He_Ge_Xie_Zuo)蘇聯后來宣稱，事先沒有“像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精神所要求的那樣”進行商量，因而看來是確實的。[[16]](#_16_M_I_Ma_Qia_Luo_Fu_Deng____Zh)提到中蘇條約的“精神”而不提條約本身，在處理關系的方法上強調了基本分歧。對毛來說，金門純屬內政問題，中國可以想怎么處置就怎么處置。同莫斯科商量非但沒必要或不明智，而且也不適當，因為這等于邀請外國干預內政。

但對赫魯曉夫來說，美國對蔣介石承擔義務和美國軍事力量出現在臺灣海峽，不能不影響蘇聯。至少，中美在臺灣海峽的對抗，可能使蘇聯對另一次柏林危機的時間選擇與策略變得復雜。最糟的是，由于雙方都有盟友，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軍隊的地區性交火，可能使它們各自的超級大國支持者卷入，從而使事態升級。雖然這不一定導致美蘇沖突，但將危及赫魯曉夫一直在策劃的最高級會議。

1958年8月23日開始了炮擊金門，為了對美國在該地區和華盛頓作出的初步反應預留地步，北京在9月6日提出中美談判的建議。第二天，赫魯曉夫寫信給艾森豪威爾，警告說，侵犯中國“也就是對蘇聯的侵犯”。但私下里，據說他這時就已決定，毛的行為使蘇聯有理由終止核分享協定，雖然這個決定的正式通知直到第二年的6月才出現。[[17]](#_17_A_S_Hui_Ting_Dui_M_S_Qia_Pi)

在北京最高級會議上關于所建議的軍事合作的苛刻交易，其結果也許已經使赫魯曉夫懷疑核分享是否明智。沒有比這更不合時宜的了，因為中國在前幾個月里重新強調了“自力更生”和反對依靠外國人（蘇聯人）。這個國內動向與同盟內部緊張關系的加劇是一致的，后者已經明顯地表現在對南斯拉夫和中東問題的分歧態度上。

1958年上半年，毛作了一系列講話，中心是喚起與動員中國人民實行“大躍進”。[[18]](#_18_Jian___Zai_Zui_Gao_Guo_Wu_Hu)在這個問題上，他一再攻擊“崇洋”的“奴隸思想”，明確地反對依靠蘇聯。下面的摘錄，說明了他講話的主旨：

（1958年3月10日）：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因為我們不懂（重工業、計劃、銀行和統計工作），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衛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吃雞湯，因為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后來又說能吃。不管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了都奉行。總之是蘇聯第一……

蘇聯的設計，用到中國大部分正確，一部分不正確是硬搬……我們對整個經濟情況不了解，對蘇聯和中國的經濟情況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從。現在情況變了，大企業的設計、施工，一般說來，可以自己搞了；裝備，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19]](#_19_Shi_La_Mu_Bian____Jiang_Hua)

（1958年6月28日）：戰爭中按照蘇軍條令執行是不行的，還是搞自己的條令……“八大”決議中有一節關于技術改革的問題，按照今天的發展情況來看，提的不妥當，就是過分強調依靠蘇聯的幫助。爭取蘇聯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還是自力更生……這次會議主要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我們有豐富的經驗，比蘇聯的多，把自己的經驗看得那么不值錢，是不對的……目前蘇軍顧問搞的東西（作戰計劃、想法）都是進攻的，都是勝利的，沒有防御，沒有打敗仗的，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20]](#_20_Tong_Shang_Shu___634__Di_125)

毛在內部講話中詳加闡述的主題，在公開文章中只作了比較簡單的暗示，暗示正在減少對蘇聯援助的依靠。5月，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預告，要把軍事武器改進的基礎放在本國的而不是蘇聯的方法上：“我們中國的工人階級和科學家一定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制造出最新式的飛機和原子彈來。到那時……可以用祖國的工人、工程師、科學家自己制造的原子武器和導彈。”[[21]](#_21_Ai_Li_Si__Lan_Ge_Li__Xie)

這些在內部講話和公開聲明中，暗示了降低對蘇聯援助所抱的希望，與1957年的原子彈分享協定的精神正好相反，而這一協定已在履行中。一種解釋可能是，和赫魯曉夫建議美蘇談判核禁試問題有關。他在4月4日致世界各國首腦包括周恩來的信中指出，由于現在只有蘇聯、美國和英國擁有核武器，“比較容易達成”一項禁試協定，而當“經過一段時期之后，其他國家也可能掌握核武器，到那時，達成停止試驗的協定自然就更加復雜了”。[[22]](#_22_Mai_Ke_Fa_Kua_Er____Wen_Hua)4月22日，他同意艾森豪威爾總統關于美蘇就如何監督停試進行技術研究的建議。

對這個明顯地反對北京最終擁有核能力的建議，中國人的憤懣是可想而知的，除此之外，中蘇擬議中的在其他領域的軍事合作也發生了爭論。的確，這可能是促成北京最高級會談的近因。會談中究竟提出了什么建議和要求，雙方事后的報道有出入，但在一點上一致，即在聯合使用中國海、空軍和通信設施上發生爭吵。[[23]](#_23_Bo_La_Ke_De___Guan_Nian)前幾個月在較低層次發生的爭執，顯然導致了在北京加以解決的嘗試。但沒有取得一致。相反，雙方分手時，關系可能比從前更壞。究竟是赫魯曉夫希望增加聯合設施來交換核分享呢，還是毛要求范圍更廣的現代武器而對蘇聯的要求未作讓步，從現有證據看，還不能斷定。但中國人對一支外國軍隊在本國出現的敏感，加上毛重新強調“自力更生”，造成了使雙方此后互相怨恨的一種僵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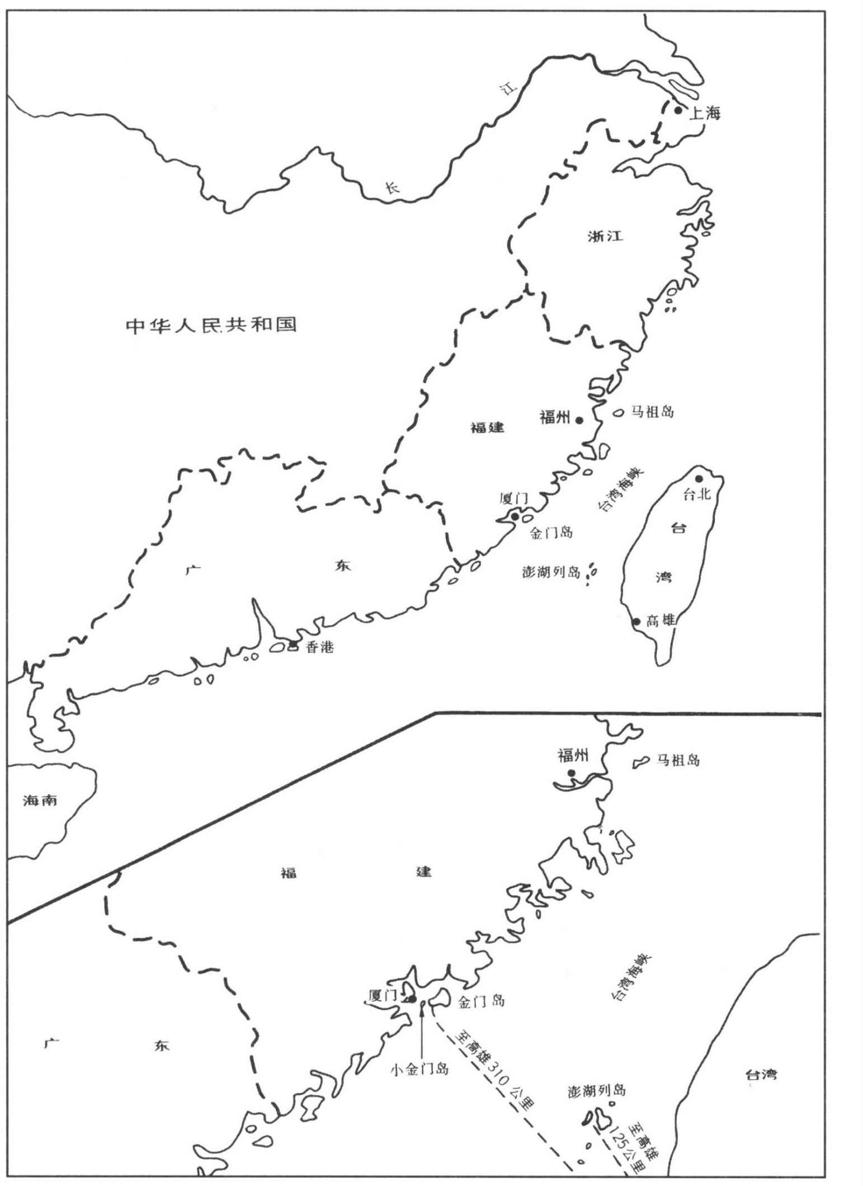
#### 炮擊金門

1958年8月23日，中共炮兵部隊向金門島發射了大約4.1萬發炮彈，是近十年來一再發生的敵對行動中總數最高的。[[24]](#_24_Bo_La_Ke____Guan_Nian_____58)目標的三面離大陸炮兵陣地不過幾千碼。將近8萬名國民黨軍隊和4萬名平民，主要依靠來自125英里之外的臺灣的海上供應來維持這個沿海基地——蔣介石政權最后剩下的合法領土之一。金門與廈門隔海相望，國民黨駐軍的大炮有效地封鎖了廈門港的出入口，威脅著附近的航運。

此后一星期內，福建省無線電臺不斷地向金門播出投降的最后通牒，同時間歇地對金門進行不同強度的炮擊。[[25]](#_25_Zui_Chu_De_Tou_Jiang_Hao_Zha)米格—17式飛機對軍事目標進行轟炸和掃射，同時海軍部隊阻斷從臺灣來的供應。8月2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登出國防部對四天前擊沉一艘國民黨船只的嘉獎令，宣稱這“顯示了我人民海軍的威力，給盤踞金門的蔣賊軍與臺灣的海上聯系以嚴重威脅，使之更加處于困境”。[[26]](#_26_Tong_Shang_Shu__585__Di_122Y)嘉獎令命令海軍“再接再厲，與前線陸軍、空軍部隊密切協同配合，準備隨時給蔣介石賣國軍增援部隊以更大的打擊”。

但8月27日以后，軍事行動的節奏和水平急速下降。這只能部分地歸因于臺風的影響。美國對炮擊的反應提供了一個補充解釋。在炮擊開始后的幾天里，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第七艦隊和在日本的第五航空隊進入加強戒備狀態。駐在地中海的第六艦隊中的“艾塞克斯”號航空母艦和四艘驅逐艦，奉命開往臺灣地區。除此之外，有另外兩組航空母艦編隊，加強臺灣海峽的巡邏，美國還在臺灣舉行了一次防空演習。太平洋戰區的美國軍事指揮官們在島上開會，檢查前些時候宣布的將在9月初舉行的中美聯合軍事演習，它將包括38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到8月29日，有50多艘美國艦只，包括6艘航空母艦和50。多架戰斗機和轟炸機，它們或已到達臺灣地區，或正在途中。第二天，第七艦隊的一支分隊準備為開往金門的國民黨供應船只護航。

美國的政治聲明，雖然意義含糊，卻留有卷入的足夠余地，增加了北京的擔心。炮擊開始那天，杜勒斯國務卿發表了一封信，回答國會關于最近在沿海島嶼附近大陸軍事行動增加的意義的質詢，他指出：“如果有人假定，即使中國共產黨人想用武力改變現狀，現在進攻并企圖占領這些島嶼，可能是一種有限行動的話，那將是非常危險的。”[[27]](#_27_Bo_La_Ke____Guan_Nian_____58)



地圖7 沿海島嶼

8月2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聲稱，有1/3的國民黨軍隊在這些島上，這就使“這些島嶼與福摩薩的防御體系連接得比以前（1954—1955年）更緊”。[[28]](#_28_Tong_Shang_Shu__585__Di_158Y)他援引1955年的福摩薩決議，該決議超過1954年關于臺灣和澎湖列島的共同防御條約的限制授權總統，在他認為對保衛臺灣是必要的時候，得使用武力。他還警告，如果這些島嶼受到侵犯，“美國不會放棄它的義務”。四天后，美國陸軍部長布魯克在臺北警告北京，“不要低估”美國的警告。

事情的發展顯然與毛的期待相反。9月5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承認：“你看金門、馬祖打這樣幾炮，我就沒有料到現在這個世界鬧得這樣滿天風雨，煙霧沖天。”[[29]](#_29_Mao_Ze_Dong____Zai_Zui_Gao_G)盡管他把這種“混亂”歸咎于“人民害怕戰爭，害怕美國給各地帶來災難”，但沒有掩飾對他的失算感到吃驚。

9月6日，周恩來公開建議恢復從頭年12月以來陷于停頓的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他的講話緊接在杜勒斯9月5日發表的聲明（這是到那時為止美國支持國民黨人的最明確的許諾）之后，但仔細研究中國人的言行，其中暗示了他們在杜勒斯記者招待會前就已有了減少戰爭發生危險的決心。一個月后，在10月6日，彭德懷元帥宣布停止炮擊和封鎖一星期。又過了三星期，他宣布只在單日炮擊。緊張緩和下來，沒有發生進一步的行動。

在計劃炮擊金門時中國人主要考慮的是預料到的美國的反應。毛在內部的自我批評，說明他沒料到反應會這么強烈。但中國官員在炮擊結束后立即宣布成功，聲稱炮擊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國軍隊卷入，從而使他們不可能在“兩個中國”運動中對沿海島嶼棄之不顧。[[30]](#_30_An_Nuo__Lu_Yi_Si__Si_Te_Lang)這后一種解釋，看來是一種事后的補苴。最初向金門駐軍廣播的最后通牒，要求他們投降。此外，毛9月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要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采取主動，慢慢脫身……怎么脫法呢？就是這十一萬人[他所估計的金門和馬祖的國民黨軍隊人數]走路”。[[31]](#_31_Mao_Ze_Dong____Zai_Zui_Gao_G)毛特別指出金門和馬祖的“陷阱”并沒有關閉，可以“逃跑”。

這說明這一行動有一系列目的，最好的結果是，趁美國軍事力量專注于中東危機時，奪取這些島嶼。即使這個目的達不到，那么炮擊也可能迫使華盛頓給予北京對臺灣的權利以應有的尊重，恢復大使級會談。與此有關的是頭年發生的某些事情。

1957年，在北京經過兩年努力想同華盛頓達成一項暫時協定之后，關系突然惡化。那年5月，美國透露出想在臺灣部署射程為650英里、能攜帶核彈頭的“斗牛士”導彈。6月，杜勒斯國務卿發表一篇不尋常地敵視與不妥協的對華政策演說。12月，當華盛頓方面的大使級會談代表被調往別處，由一個低一級的官員代替他時，北京停止了中美大使級會談。

1958年2月，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回顧外交政策的講話回敬了美國，有意不提先前的“和平解放臺灣”，痛罵華盛頓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6月30日，北京公開要求美國在15天之內派出一名大使級代表，恢復會談，否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認為美國已經決心破裂中美大使級會談”。[[32]](#_32_Bo_La_Ke____Guan_Nian_____58)華盛頓拒絕順從最后通牒，故意延遲美國駐波蘭大使為代表的任命。這時，爆發了黎巴嫩危機。

幾個月后，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把這兩件事聯系起來：

美國人歷來欺侮我們、在中東事件以前，他公開發表一個備忘錄，說中國之壞，壞得透頂……他又斷絕日內瓦的談判。那好，我們就限個期限來談。后來到了中東事件的末尾，他東西來了，他比我們那個期限推遲了幾天。我們的限期是十五，他十七號回的信，要談判。我們沒有發表，因為這個時候，我們不在乎你那個東西，我們要打炮了，我就不發表那個東西。[[33]](#_33_Mao_Ze_Dong____Zai_Zui_Gao_G)

中國人突然將“解放臺灣”的主題引進支援黎巴嫩的群眾示威游行，并加速將噴氣戰斗機、大炮和軍隊運到沿海島嶼和臺灣的對面。7月22日，主要的軍報《解放軍報》醒目地登出一條電訊，紀念在金門以南的一個小島挫敗國民黨入侵五周年，宣稱“人民解放軍海防部隊官兵，一致表示……時刻準備解放祖國領土臺灣和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34]](#_34_Bo_La_Ke____Guan_Nian_____58)《人民日報》在第二天重登了這條電訊。

7月29日，米格—17飛機第一次以戰斗姿態在沿海出現，擊落兩架在金門以南巡邏的國民黨戰斗機。一年多前修建的一些機場，在7月底8月初已可使用。一條通往廈門的長達500英里的鐵路（在福建修建的第一條鐵路）已在2月完成，現在擔負起大約400門指向金門的大炮和集結在福建前線的30萬人以上的軍隊的后勤任務。

這樣，北京同華盛頓的關系在1957年年中開始嚴重惡化。它在大使級會談上的強硬立場，始于1957年12月。它對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以中東危機為契機，始于1958年7月下旬。這說明一系列決定及其貫徹執行，是在失敗的赫魯曉夫—毛會談之前。把強調“自力更生”與堅持“解放”臺灣是“內政”聯系起來看，毛似乎希望，進攻金門會促使駐軍投降而不引起美國的反響，以此向赫魯曉夫顯示北京的決心、華盛頓的軟弱和莫斯科的瞎擔心。

但是，毛的失算不僅帶來了中美軍事對抗，而且嚴重地惡化了中蘇關系。9月5日，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和他的高級中國專家M.S.卡皮查一起到達北京，商討金門事態。第二天，周要求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9月7日，赫魯曉夫寫信給艾森豪威爾說：“對我國偉大的朋友、盟邦和鄰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犯也就是對蘇聯的侵犯。忠于自己義務的我國，將盡一切可能同人民中國一道來維護兩國的安全。”[[35]](#_35_Bo_La_Ke____Guan_Nian_____58)他為北京的行動辯護，說北京“致力于解放本國領土”，“完全有合法權利”和“合法的自衛措施”。

但私下里，蘇聯首腦顯然被毛的單方面行動所激怒。據卡皮查說，赫魯曉夫拒絕他的同事們對公開支持毛所表示的反對，他辯解說，一旦艾森豪威爾介入，同盟需要他作出反應，但在緊張消除后，有必要重行檢查中蘇關系。[[36]](#_36_A_S_Hui_Ting_Dui_M_S_Qia_Pi)據傳毛在會見葛羅米柯時對逐步升級的核戰爭危險采取的掉以輕心的態度，進一步促使蘇聯決心撕毀1957年的核協定。

莫斯科同北京的公開論戰發生在1960年中期，這些論戰包括蘇聯宣稱它在金門事件中制止了美國的一次進攻，中國則否認有這種進攻的可能，尤其是在赫魯曉夫寫信給艾森豪威爾的時候。[[37]](#_37_1963Nian_8Yue_21Ri_He_9Yue_1)毛在緊接這件事之后的講話中，沒有任何指責蘇聯支持不充分的話，因此，隨后的交鋒不大可能反映當時關系緊張的真正原因。中國人既未邀請也不需要蘇聯人介入他們的行動，而且正好相反，從原則上將它排除了。但金門在蘇聯停止核援助的決定中所起的作用，不管是真是假，證明是重要的。

#### “大躍進”和蘇聯的批評

在炮擊金門期間，北京用“大躍進”的口號動員全國。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宣稱這些“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將“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而建設社會主義是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積極地做好準備。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38]](#_38_Quan_Wen_Jian___Bei_Jing_Zho)

雖然這一發展的基本意義與重要性純屬內政問題，但它溢入中蘇關系，引起了同盟內的進一步摩擦。在中國方面，人民公社及其供給制、公共食堂和托兒所，被官方歡呼為“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事件，而且是世界歷史上的偉大事件”，“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事”。[[39]](#_39___Zhu_Fu_Zhu_Xi_Zai_Xin_Jian)與此對照，在整個秋季，蘇聯人在有關中國的正式講話、消息和官方聲明中，有意地避免提及人民公社。赫魯曉夫在同參議員赫伯特·漢弗萊談話時，說人民公社是“反動的”。[[40]](#_40_Tong_Shang_Shu__837__Di_99)他把它們同革命后莫斯科流產的公社試驗相比附，說這個試驗的失敗是因為“沒有刺激，你就不能得到產品”。他的話公開后，中國人認為違反了盟國之間應有的行為準則。

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全體會議的一項決議推遲了早先提出的建成社會主義的時間，說要“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建成共產主義的時間就更長了。[[41]](#_41_Tong_Shang_Shu__837__Di_125)它宣布，與按“需”分配相對立，“按勞分配”將“在長時期內，必要占有重要地位”，如果過早地實行按“需”分配，“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這個從8月下旬提出的立場的退卻，既未結束中國國內也未結束中蘇之間在“大躍進”問題上的爭吵。蘇聯繼續對經濟后果持懷疑態度。蘇聯顧問由于他們的警告受到輕蔑而感到失望。[[42]](#_42_Guan_Yu_Su_Lian_Gu_Wen_Zai_1)蘇聯官員憎恨日益增加的向中國交貨的要求。蘇聯領導人對中國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感怒不可遏。雖然基本上是一個內政問題，但毛的輕率的經濟試驗，必然影響到對外關系，就像他炮擊金門的決定表面上也是內政問題一樣。

炮擊金門在人民解放軍方面來說，是以丟臉告終。毛的“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的反復告誡，未能約束住他的手。同樣，“大躍進”以1960—1961年的經濟災難告終。毛對經濟的無知（他過后才承認），加上傲慢自大，導致他的失敗。在莫斯科看來，這兩件事情上的重大失誤表明了妄自尊大。這個看法終于促使蘇聯在1960年取消援助，從而使1958年中國宣布的“自力更生”成為必要。

## 第二階段：1959—1960年

#### 概觀

1959一1960年，中蘇同盟由于關系緊張而接近破裂，它是下述事實造成的：赫魯曉夫在美國同艾森豪威爾會談，莫斯科在中印邊界爭吵中公開保持中立，北京向克里姆林宮的意識形態領導地位挑戰，蘇聯取消援助，以及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各國共產黨會議上的論戰。盡管以上的事態發展對國家、地區和世界政治有著引人注目的深遠意義，但也還有另外一些關系需要中國迫切注意。西藏叛亂迫使對重要的喜馬拉雅山山口宣布控制，因為通過它們，游擊隊可以逃跑，也可以回來。這引起中印關系不和，而以前他們曾發誓友好，雖然實際上是競爭。

中印關系緊張又引起中緬邊界爭論，因為有爭議的麥克馬洪線穿過這個地區。此外，緬甸的共產黨起義對北京是否誠心支持鄰國的“人民戰爭”是一個考驗。老撾也向革命的花言巧語挑戰，因為根據1954年日內瓦協議成立的中立政權，到1958年讓位給了一個美國支持下的反共政府。更遠一點，印度尼西亞提出了難題。先是美國想通過一次蘇門答臘叛亂推翻蘇加諾的企圖遭到失敗。然后，由軍隊領導的反共勢力想通過煽起反華情緒刺激北京作出過火反應，以破壞蘇加諾的親北京方針和他與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聯系。

這些事態發展充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議事日程，它們提出的問題，即使不要求行動，也要求回答。意識形態和理論公式可以指導北京在社會主義集團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上同莫斯科論戰。但把它們照搬到特殊情況中來就是一種不合適的指南。毛澤東可以根據在1960年把中蘇關系帶到破裂邊緣的總政策，親自控制重要的聲明。但周恩來和外交部則看來與此不同，他堅持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采取的比較克制的態度，用“上層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1959—1960年發生的大多數重大對抗中，他都采取這種態度。

#### 老撾

老撾的事態發展，揭示出北京在謹慎的外交與革命暴力之間的選擇。前者在這個時期占優勢。根據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建立的老撾國際監督和監察委員會，安排了1958年5月的選舉，這次選舉老撾共產黨陣線得票最多。中立的首相富馬親王因此要求國際監督和監察委員會離開，它的使命顯然完成了。當它在1958年7月離開時，親王已經辭職，而“左”—中聯盟已經被一個以培·薩納尼空為首的反共聯盟所代替。他的領導的結果，是1959年1月一個臺灣領事館的開設，這時培·薩納尼空宣布不再受日內瓦協議的約束，并公開威脅要和美國結盟。北京正確地指控華盛頓一直在幕后操縱。它擔心老撾同臺灣勾結，因為在邊界山林地區的國民黨殘部正在向云南騷擾。

2月，陳毅正式指責“美帝國主義”破壞日內瓦協議，陰謀侵略印度支那。他還要求老撾國際監督和監察委員會執行協議。3月，東南亞條約組織舉行軍事演習，以假想的中國進攻為對象，演習中包括了核武器。中國新聞媒介指責這個把泰國、老撾和南越聯合起來的“三國軍事同盟”，但沒有號召巴特寮采取對策。

3月，中國不得不承認邊境的“騷亂”，把云南境內的間諜活動與暴亂歸咎于美國向國民黨軍隊空投補給。[[43]](#_43_Li_Chai_Jin__Yin_____Gong_Ch)同月爆發的西藏叛亂，也許使憂慮更加深重，因為它導致達賴喇嘛逃往印度，跟隨他的有上萬名難民，他們可能是未來的游擊隊員。中央情報局—國民黨間諜網對西藏叛亂的支持，使北京關于老撾的指責是可信的。[[44]](#_44_Ai_Lun__S_Hui_Ting____Zhong)

5月，培·薩納尼空下令解除巴特寮兩個營共1500人的武裝，于是爆發了戰斗。一個營逃走，并在共產黨北越的幫助下，開始攻擊萬象軍隊。同時，北京加強了語調。它攻擊老撾和泰國外交部長的聯合聲明（這個聲明認可老撾參加一個地區性組織），并再一次要求老撾國際委員會挽回局勢。但背地里，北京開始與河內合作。它提供數量不大的軍援、顧問、訓練，并在少數民族中招募人員，以支持巴特寮。[[45]](#_45_Li_Chai_Jin____Lao_Zhua)那個夏天，老撾和法國的一項聯合公報授權美國供應和訓練老撾軍隊。8月，北京作出反應，正式要求恢復老撾國際委員會的監察監督活動，根據日內瓦協議撤回美國的所有軍事卷入，恢復到以前的狀況。

9月中旬，聯合國調查小組的到來，顯然對雙方起到了抑制作用，傷亡人數和零星戰斗的明顯減少，證實了這一點。調查小組的報告聲稱有中國援助的證據，包括武器、軍服和醫藥品，但它暗示，比起北越的作用來，是第二位的。軍事局勢因此僵持不下。

1959年底的右翼軍事政變，被北京譴責為“法西斯軍事獨裁”，獨裁者富米·諾薩萬繼續攻擊巴特寮部隊，使北京發誓要和“美國擴大老撾內戰的冒險”對抗。[[46]](#_46___Ren_Min_Ri_Bao_____1Yue_8R)但沒有繼之以行動。1960年5月，周恩來訪問河內，發表了一個聯合公報，僅僅要求老撾國際委員會恢復活動和堅持日內瓦協議。

北京相對消極的態度似乎證明是正確的，因為1960年8月，一個中立的軍官貢勒在萬象奪取了政權，目的是結束美國的干涉和恢復富馬親王的首相職位。但中國想在富馬親王和巴特寮之間重建統一戰線的努力，受到由美國和泰國支持的、富米·諾薩萬在寮國平原的對立組織的反對。到12月中旬，富米的軍隊占領了萬象，富馬逃往柬埔寨。重新開始的內戰，使兩個超級大國成為對抗雙方的代理人，美國用顧問、坦克和大炮支持富米，貢勒和巴特寮則得到蘇聯的空運補給和北越的供應。

陳毅發表強硬講話，警告說，這是自1954年以來“美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地區策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武裝干涉”，是一個“陰謀”，最終目的是進攻中國和越南，因此中國不得不采取“適當措施”。[[47]](#_47_Li_Chai_Jin____Lao_Zhua)但北京繼續贊成河內提出的重開日內瓦會議和恢復老撾國際委員會活動的建議。這樣，到這一年的年終，中國的公開態度沒有實質性改變，它贊成協商而不是戰爭，只是在秘密支持巴特寮武裝部隊上略有改變。

#### 柬埔寨、泰國和緬甸

中國對非共產黨鄰國老撾的政策，同樣地避開了激進的革命路線，與它同莫斯科的論戰形成對比。當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1956年訪毛并公開拒絕東南亞條約組織的保護時，中柬關系還是非正式的個人關系。幾個月后，北京給柬埔寨2240萬美元建立膠合板、水泥、紡織和造紙廠，這是北京第一次給一個非共產黨國家的援助。那年12月，周恩來訪問金邊，但正式的外交關系始于1958年7月。

柬埔寨政府懷疑派往柬埔寨的中國經濟代表團資助左翼報紙并在學校和民間團體中擴大“左”派影響，于是限制外國參與華僑占支配地位的某些行業，對學校實行控制，同時取締民間團體。[[48]](#_48_Mei_Er_Wen__Ge_Er_Tuo____Zho)1960年，據說有幾百名華僑因顛覆活動被捕，加上其他種種事情，有幾十名華僑在周恩來于5月的另一次訪問之后被驅逐回中國。但是，這些活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旨在搞一次真正的革命運動，或僅僅是北京企圖改變當地華人前此的親臺灣傾向，則至今都很難說。就柬埔寨的左翼活動來說，到1961年為止，法國和僅次于法國的蘇聯的影響要明顯得多。

與老撾對照，1960年結束時，北京與柬埔寨的關系往好的方向發展，劉少奇訪問金邊的結果，是簽署了一個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49]](#_49_Yi_Zhe_An__Liu_Shao_Qi_Dang)雖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但這一條約象征兩國關系在將來日漸密切。

中國與泰國的關系，在這幾年實際上不存在。曼谷顯然敵視中柬關系，證據是它在1958年10月全面禁止從中國進口貨物，以及打擊共產黨和“左”派的活動。1959—1960年，中國、北越、巴特寮老撾的合作，被看成是對泰國安全的潛在威脅，如果老撾受共產黨控制的話。曼谷因此加強了對富米·諾薩萬的支持和與美國秘密計劃的合作。

北京對泰國在老撾境內及其周圍的活動，只在口頭上作出反應，很少在泰國本國向泰國挑戰。泰國共產黨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麻煩。它這時同中國唯一明顯的關系，是一封祝賀中國10周年國慶的電文，完全不提革命的事。與柬埔寨不同，泰國人多、經濟實力強的華僑社會，堅持親臺灣的傾向。

與老撾毗鄰的第三個非共產黨國家緬甸，向北京提出三個難題。在緬甸的國民黨殘部對云南造成威脅。邊界爭執使雙方軍隊都卷了進去。緬甸共產黨，特別是所謂的白旗派，沿中國邊界用游擊戰反抗仰光的統治。國民黨殘部的存在，不像在老撾和泰國那么嚴重。一半以上的軍隊已經在前幾年撤回臺灣，剩下的人對鴉片生意比對反共活動更感興趣。同時，共產黨起義者似乎很少得到中國的幫助，從1954年至1958年，仰光沒有報告有中國武器的跡象便是證明。[[50]](#_50_Yue_Han__H_Ba_Qi_Li____Mian)

但從1954年起，中緬邊界就是一個難解的結。在1956年的一次小沖突之后，互相從佤族地區和克欽邦有爭議的地區撤走軍隊，使緊張有所緩和，但從1956年至1958年的談判沒有取得成果。這對仰光是個敏感的問題，因為要控制一條長達1350英里的邊界，其中許多地方被反叛的撣族、克倫族和克欽族等少數民族以及白旗派殘余所分割。

但緬甸堅持不懈地追求中立，這對中國有好處，排除了美國出現的可能。當1959年10月聯合國的一項譴責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中使用武力的決議進行表決時，緬甸棄權，中立的政治價值就顯露出來了。這促成奈溫在1960年1月訪問北京，達成一項邊界協議，從中緬實力對比的懸殊來看，這個協議比所能期望的還要寬宏大量。[[51]](#_51_Zhong_Guo_De_Dao_Mian_Ji_Wei)只有西端部分沒有定界，那里中、緬、印三國的交界處是在有爭議的麥克馬洪線上。

當然，很可能是中印爭執促使北京與仰光和解，不僅是為了報答緬甸在聯合國表決時棄權，而且給新德里一個信號：和解是可能的。在這方面，中國在1960年3月21日同尼泊爾簽訂了邊界和經濟援助協定，接著在4月28日同加德滿都簽訂了友好條約，在這中間，周恩來在新德里會見了尼赫魯，這些都不是巧合。陳毅的阿富汗之行和1960年8月26日在喀布爾簽訂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無疑也是出于同樣的動機。中國愿意在領土爭端上妥協；但是，如果印度不愿仿效，它就可能在鄰國中陷入政治孤立。

#### 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與上述國家不同，沒有任何與中國毗連或靠近的領土，可以被看成一個特殊問題。但在1958—1960年間，它也迫使北京在“上層統一戰線”和一種比較嚴厲的立場之間作出選擇：前者以國家關系為主，但要求中國在利益上作出讓步，后者是對抗與壓力，可能包括革命。

像在老撾那樣，北京在1959年有過短暫的猶豫不決，曾嘗試采取一種比較強硬的立場。但終于在1960年向雅加達退讓。也像在老撾那樣，雙邊關系中，一方面交織進美—臺關系，另一方面交織進蘇聯政策。印度尼西亞不涉及中國的安全問題。此外，對北京來說，蘇加諾是一個比梭發那·富馬更強和更可靠的朋友。

1958年初的蘇門答臘叛亂向雅加達的統治提出了挑戰。接著美國第七艦隊出現在印度尼西亞沿海，詭稱在必要的時候保衛美國人的生命安全。但是，東南亞條約組織可能支持叛亂的暗示、美國B—26飛機從菲律賓基地運送中國國民黨武器的跡象，以及俘獲一個以沖繩為基地的美國飛行員的事實，這些加在一起，泄露了華盛頓一臺北的勾結。[[52]](#_52_Dai_Wei__Mo_Xin_Ge____Zhong)

1958年4月，北京謀求利用這個事實，向印度尼西亞貸款1600萬美元購買大米和棉布。5月，它公開將臺灣與叛亂聯系起來，認為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間有共同安全利益。北京保證的未加詳細說明的幫助，附有一個非公開的建議，據說包括“志愿人員”。[[53]](#_53_Tong_Shang_Shu__535__Di_146Y)日益壯大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參政，加強了這個有利的國際環境，雖然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方針明顯地更傾向于莫斯科而不是北京，不過無論從哪方面說，這都得感激蘇加諾的“有控制的民主”。

但是，當蘇門答臘的叛亂得到控制后，局勢就迅速起了變化。印度尼西亞在它與親臺灣僑團的關系由于臺北的活動而破裂之后，目標轉向其余的華人，把他們作為控制對象。軍隊指揮官看來會得到他們所接管的華人商店，平民也將由于金融和制造業方面華人競爭的減少而受益。最重要的是，保守的軍事領導想使蘇加諾改變他的親北京立場，轉而親西方并在印尼共產黨變得更強大最后脫離蘇加諾而獨立之前與其決裂。在蘇加諾方面，他拒絕壓制軍隊，因為他們曾鎮壓叛亂，他還要依靠他們實現他的擴張計劃，首先取得西伊里安然后取得馬來西亞的統治權。

于是，在1959年5月，印度尼西亞商業部宣布，將在12月之前，吊銷所有在鄉下的外僑零售商的營業執照。中央軍隊的一項命令，批準地方指揮官“出于安全的理由”將外僑從他們的居住地遷走。一個西爪哇上校因此下令所有的外僑在12月之前遷入城市。這些事態發展打開了歧視之門，在全國范圍內反對并沒收華人的商業利益。

這些步驟是在雅加達的權限之內合法地采取的。雖然它們違反1955年的中國一印度尼西亞雙重國籍問題條約的精神，但這個條約還有待雅加達批準。北京缺乏提出抗議的任何正式根據，于是，在9月建議進行“秘密外交”，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蘇班德里約遂于10月訪問北京。但據說他受到群眾大會上慷慨激昂的演說的叱責和這樣的威脅：如果歧視華僑的措施不加收斂，新加坡的碼頭工人將抵制印度尼西亞貨物。[[54]](#_54_Dai_Wei__Mo_Xin_Ge____Zhong)他回國后不久，商業禁令有所緩和，西爪哇對在5月之前申請為印度尼西亞公民的華僑免除禁令。

但是，當西爪哇的上校采取先發制人的（并往往是粗暴的）行動驅逐華僑時，局勢緊張起來。中國大使館人員去該地利用傳單和會議發動抵抗。印度尼西亞官方的反應是逮捕當地華人并對所有使館人員的活動加以限制。12月，陳毅要求立刻批準條約，保護華僑及其權益，遣返賣掉財產后自愿回國的華僑。第二天，北京開始了一個有組織的運動，說服從外面去的或在當地土生土長的華僑離開印度尼西亞回國。

成千擔心他們的生命財產的人響應這個號召。為應付一次可能的集體迫害而出現的消費品囤積，以及由于搶購外匯，引起了通貨膨脹。對主要出口產品如椰肉干、石油、橡膠和錫的加工和交易至關緊要的華僑，以及向農民提供貸款、溝通城鄉交易的華僑，他們可能的離去有造成經濟根本混亂的危險。

北京增加了壓力，但雅加達的態度很堅決，不允許從這個國家帶出財產和外匯。兩個首都日益增長的對抗意識，威脅著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它經受不起跟中國走下去的后果，也經受不起喪失一個主要的財政支持來源。[[55]](#_55_Tong_Shang_Shu__Di_180Ye_Ji)這個窘境正是印度尼西亞政府的法令立意要造成的。1960年2月，在這個爭吵的高潮，赫魯曉夫訪問雅加達，提供2.5億美元信貸，對北京來說，問題就更復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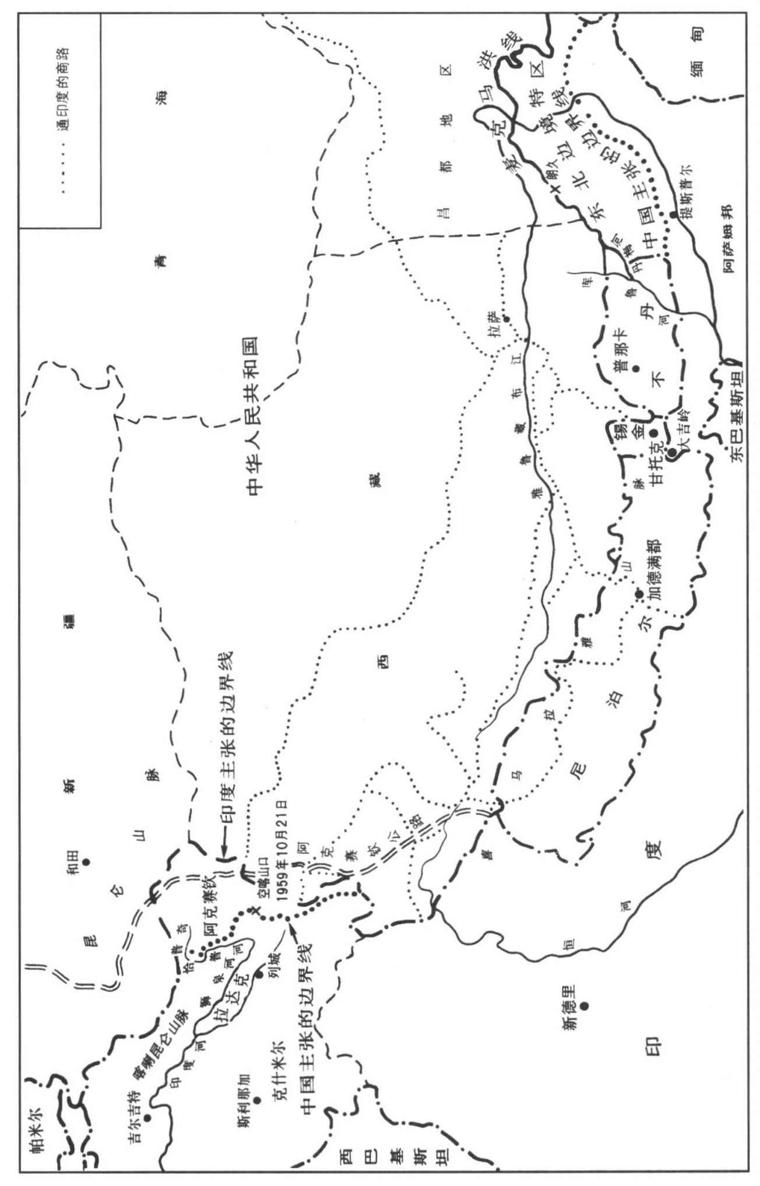
這一連串相反的壓力，促使北京在所有的問題上讓步，1960年4月10日周恩來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說的話，就是一個信號。他特別提到“修正主義”陰謀挑撥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關系，這就暗示了最后被迫作出的這個決定，是由于害怕莫斯科利用這個爭吵，從而討好蘇加諾、軍隊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此外，在時間的選擇上，與中國同緬甸和尼泊爾的邊界協定巧合，與中印爭吵相聯系。

#### 印度

1959—1960年中印關系出現的危機，影響到中國其他的國際關系，特別是同蘇聯的關系。從1954年起，北京和新德里公開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私下對邊界問題有分歧，這表現在兩國各自的地圖上。不過，由于西段的拉達克實際上無人居住，雙方又都尊重東段的東北邊境特區，問題尚處于休眠狀態。

其后，在1958年，北京透露新建成一條連接新疆和西藏的公路，它穿過阿克賽欽高原，該地在新德里的地圖上屬于印度。印度派去查看的巡邏兵被俘，并被扣押了一個月，這引起了印度的抗議。那年12月，尼赫魯在寫給周恩來的信中重申他的立場，沒有提到公路。周在1月作了回答，說邊界從未劃定，公路是在中國領土上。[[56]](#_56_Ha_Luo_De__C_Xin_Dun____Shi)周建議，盡管東段的麥克馬洪線是非法的，但雙方應繼續維持邊界現狀。尼赫魯在3月的回答，重申了印度要中國在各點上回到它的邊界一側的要求。

同時，一場醞釀已久的康巴人的叛亂，從西藏東部蔓延到了拉薩地區。1959年3月10日，首府的一次群眾示威游行試圖勸阻達賴喇嘛逃往印度。但它的后果卻是人民解放軍開火，隨即發生暴亂，在猛烈的戰斗中，達賴逃走。北京對新德里公開同情西藏人表示抗議，但3月31日，達賴喇嘛及其數千追隨者得到新德里庇護。這引起北京報界的進一步攻擊，5月16日，正式譴責印度“干涉中國內政”。[[57]](#_57_Tong_Shang_Shu__297__Di_287Y)



地圖8 中國印界

控制主要的喜馬拉雅山口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它們成了游擊隊進入西藏和難民進入印度的通道。1958年8月，人民解放軍企圖堵塞這種流動，結果在東段的朗久與印度巡邏隊發生沖突，一名印軍被殺。印度人放棄了這個陣地，讓中國人占據了。9月8日，周恩來為人民解放軍的行動辯護，說他們的目的是防止殘余的西藏武裝叛亂分子出入邊境。[[58]](#_58_Ha_Luo_De__C_Xin_Dun____Shi)但周重申他的建議，通過協商解決邊界分歧，在解決之前，雙方維持邊界現狀。

同時，在9月6日，中國官方告訴蘇聯代辦，新德里曾挑起邊界爭端。他們警告莫斯科，“尼赫魯正在力圖利用蘇聯向中國施加壓力，不能上當”。[[59]](#_59___Ren_Min_Ri_Bao_____1963Nia)但三天后，蘇聯代辦將一項準備在9月10日發表的塔斯社聲明的文稿交給中國政府，聲明稱中印邊境事件是“可悲的”，以一種完全中立的態度含蓄地反對中國的立場。[[60]](#_60___Ta_Si_She_Sheng_Ming_____1)塔斯社責備“西方國家的某些政治集團和新聞界”試圖“阻撓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并在赫魯曉夫訪問艾森豪威爾的“前夕使局勢復雜化”。

根據北京后來的駁斥，莫斯科不聽中國的規勸，提前發表塔斯社聲明，“公開暴露了中蘇之間的分歧……不問是非曲直”。[[61]](#_61_Tong_Shang_Shu__268__Di_114Y)此外，1959年9月13日，莫斯科簽署一項協議，給予印度第三個五年計劃3.75億美元以上的援助，這項援助的談判從7月就開始了。克里姆林宮對印度的援助比以前多了一倍，從而表明了它在逐步升級的中印對抗中站在哪一邊。

在赫魯曉夫于美國之行之后在北京出現期間，這個問題顯然觸發了他和北京領導人之間的一場尖銳交鋒。北京方面說赫魯曉夫“不愿意了解邊界問題的真相……一口咬定反正打死人就是錯誤的”。[[62]](#_62_Tong_Shang_Shu__268__Di_115Y)但10月21日在西藏、新疆、拉達克交界處的空喀山口戰斗中，死了更多的人，有9名印軍被打死，10名被俘。11月，中印雙方遞交備忘錄，中國建議雙方從麥克馬洪線后撤20公里，并建議在年底之前進行談判，未取得一致，但雙方停止了邊界巡邏，從而減少了進一步沖突的危險。

最后，在1960年4月，周恩來在新德里會見尼赫魯，但他6天后離開時，在邊界爭執上未達成任何協議。為了西藏的安全，中國拒絕在經過拉達克的公路尤其是山口的問題上妥協。同樣，在尼赫魯自己的國大黨內表現出來的印度民族主義情緒，以及輿論的反對，也阻撓尼赫魯接受北京關于在拉達克維持現狀的建議，盡管這將包括北京接受麥克馬洪線。

同時，中印關系繼續給中蘇關系增加麻煩。赫魯曉夫回到莫斯科后，公開譴責邊界沖突是“可悲的”和“愚蠢的”，使他“遺憾”和“痛心”，但沒有站在中國一邊，連暗示一下都沒有。北京不斷非公開地向蘇聯大使提出抗議，說這種“嚴守中立”實際上是反對中國，偏袒印度。但是，1960年2月上旬，蘇共中央在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中說，北京的做法是“狹隘的民族態度的表現”，而新德里“是一個在軍事和經濟方面遠比中國軟弱的國家”，不可能“真的會妄想對中國發動軍事進攻”。[[63]](#_63___Ta_Si_She_Sheng_Ming_____2)這就使雙方的立場固定起來，成為不可調和的爭論。

#### 蘇美關系與中蘇關系的比較

1959年9月至10月，在赫魯曉夫相繼對美國和中國進行訪問期間，“和平共處”與“武裝斗爭”兩條路線的理論問題和臺灣這個實際問題，把蘇美關系和中蘇關系聯系了起來。兩個問題都無須立刻在行動上作出抉擇，無論它是以同美國進行戰爭的形式，或以奪取臺灣的企圖出現。但是，赫魯曉夫的旅行，迫使北京對他的各種各樣的聲明作出反應。拿西藏、中印邊界、老撾和印尼的情況來說，它們全都立即威脅著中國的利益，因此，赫魯曉夫的話招致北京強烈的批評就不奇怪了。

北京的論戰，由《紅旗》發難，針對赫魯曉夫一艾森豪威爾會談，在1959年8月他們宣布此事之后和9月他們會談的前夕就開始了。它的主題是攻擊這樣一些人，他們“認識不清楚帝國主義的本質，對帝國主義抱著這樣那樣的幻想，因而經常處于被動地位”。更壞的是，他們認為“美帝國主義者”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不再號召進行長期、艱苦的反帝國主義斗爭，而“帝國主義再也不會做搗亂的工作了”。[[64]](#_64___Bei_Jing_Zhou_Bao_____568)

1959年9月30日，赫魯曉夫在北京反對這條路線。他表面上是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10周年國慶，聲稱，“現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領導人，開始表現了一定的以現實主義態度來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勢的傾向”，他特別提到他的印象：“艾森豪威爾總統……明白必須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因此，我們這方面應該盡力排除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的戰爭，應該用談判來解決爭端。”[[65]](#_65_Tong_Shang__568__1959Nian_10)任何企圖“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都將是錯誤的”。

10月31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蘇聯首腦含蓄地把毛比做托洛茨基。赫魯曉夫把1918年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列寧“靈活的外交政策”與托洛茨基“臭名昭彰的口號‘既不簽訂和約，也不進行戰爭”，相比，說“他這樣做迎合了德國帝國主義者的口味”。[[66]](#_66_Zha_Ge_Li_Ya____Chong_Tu)中國有“法律上和道義上的權利”收復臺灣，對此，赫魯曉夫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避免提到它的“解放”。至于老撾，“在那里發生的小戰斗，只要采取明智的態度和遵守國際協定，是可以解決的”；因此，蘇聯反對“即使是微小的戰爭火苗，因為它會助長侵略勢力”。

總之，在對付“美帝國主義”問題上，是對抗還是妥協，北京同莫斯科的分歧是根本性的。盡管在赫魯曉夫同艾森豪威爾的公開交換意見中，沒有特別提到臺灣，但蘇聯首腦的話，含蓄然而清楚地反對中國用武力得到它。在中印邊界爭端的問題上，也發生了同樣的觀點沖突。而且，在每個問題上，原則立場的分歧都與利益立場的分歧相對應。除了激發起北京的民族主義感情的臺灣和邊界這兩個涉及領土的問題外，還存在著地位與威望的問題。赫魯曉夫可以在同等的外交地位上和艾森豪威爾會見，但就美國的承認和聯合國席位來說，毛卻在會見范圍之外。同樣，在邊界爭端中采取中立，莫斯科可以增加它對新德里的影響，而北京的影響則減少了。

這些外交上的利益沖突，加上對中國國內發展的尖銳分歧，在同盟內部造成了一個近乎全面的僵局。赫魯曉夫通過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了毛的個人領導能力。蘇聯阻撓中國的核武器計劃，妨礙了它未來的防御潛力。從目前掌握的證據來說，這兩個問題之間的聯系只能根據情況進行推測。但主要的事態發展在時間上的巧合，足以加強毛對赫魯曉夫的口是心非的懷疑。此外，當然還可能有秘密情報加強了這種懷疑。

這樣，在國防部長彭德懷率領“軍事友好代表團”從東歐和蒙古回來一星期后，蘇聯1959年6月20日的取消1957年核援助協定的信來了。當華沙條約締約國開會時，彭在波蘭。據傳當他與赫魯曉夫同時訪問阿爾巴尼亞時，他們曾有過一次友好的談話。彭在回國途中兩人又在莫斯科會面。7月14日，彭上書毛，即著名的攻擊“大躍進”并含蓄地攻擊毛本人的信。7月18日，赫魯曉夫打破半年來暫停公開批評中國的做法，大罵那些在20世紀20年代提倡公社的人是“不懂共產主義為何物，并且不知道怎樣建設它”。因此毫不奇怪，在后來的廬山會議上，北京指控彭的攻擊得到“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的支持”。[[67]](#_67___Bei_Jing_Zhou_Bao_____568)

不管是赫魯曉夫與彭德懷共謀，或是他感到毛在會議上受到反對，想加以利用，因而采取獨立行動，兩人見解的巧合，使毛有理由作出共謀的暗示。如果說在1958年8月的最高級會談時，赫魯曉夫在與毛的非公開談話中對“大躍進”持批評態度，盡管令人惱火，還是可以容忍的；[[68]](#_68___Su_Lian_Zheng_Fu_Sheng_Min)但是，游說中國的政界，停止援助中國的原子彈計劃，在侮辱之外又加傷害，則是不能容忍的。這種事態發展似乎是為了對中國內政進行政治干預而施加經濟壓力。

#### 中蘇分歧公之于眾

1962年2月，華沙條約締約國發表了宣言，宣稱：“當代國際生活中的主要問題是能否完全排除新戰爭的可能性，在目前條件下，新戰爭會導致億萬人的死亡和整個整個國家的毀滅。”[[69]](#_69_Quan_Wen_Jian_G_F_He_De_Sen)兩個月后，《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承認，“帝國主義戰爭會給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犧牲”，但再次保證說：“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70]](#_70_Tong_Shang__343__Di_93__94Ye)

這兩個聲明記錄了莫斯科和北京在對待美國及其伙伴的總路線上的對立態度。向多數聽眾發表它們，說明雙方都愿意把爭論從雙邊的對抗擴大到多邊的對抗。但在這個過程中，不再提1958—1959年的具體問題，重點轉移到意識形態和理論問題。這預示了一個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斗爭，它由北京發起，向莫斯科提出挑戰。

1960年是空前的公開論戰與非公開激烈爭吵的一年，兩個共產黨首都通過大量的文章和會議展開他們的爭論。在2月的華沙條約會議上，中國的代表雖然只有一個觀察員，但明確地聲明不同意會議宣言。然后在4月，《紅旗》和《人民日報》登出對列寧著作的長篇闡述，證明北京的立場不僅在此時此地是正確的，而且完全符合奠基者的教導。文章用暗示的手法，引經據典地揭露赫魯曉夫的眾所周知的立場是“現代修正主義”。6月，在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上，中國人利用主人的身份，游說各國代表反對莫斯科的總路線，從而把雙邊的爭論變成多邊的討論。

莫斯科迎擊北京的挑戰，以紀念列寧誕生90周年為名，由一個政治局委員發表了一篇冗長的意識形態上的反攻文章。6月，在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之后，展開了進一步的交鋒，但第一次在精選出來的聽眾面前面對面的交鋒，發生在1960年6月20—26日布加勒斯特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大會上。一個關于這次會議發言的可靠報道，透露了雙方在50個共產黨的代表們面前展開舌戰的程度。[[71]](#_71___Zhong_Su_Zheng_Lun_Ji_Qi_Y)

赫魯曉夫批評中國人的全球戰略和國內經濟發展。他宣稱，不能把核武器信托給他們，并把毛與斯大林相比——自負，與現實隔離。中國人回敬，指責赫魯曉夫背叛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蘇聯領導人責罵那樣一些人，他們“行動像孩子，玩拼字游戲”，“現在機械地重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在幾十年前說的話”。[[72]](#_72_N_S_He_Lu_Xiao_Fu____Zai_Luo)中國共產黨在休會時散發一個聲明，譴責赫魯曉夫采取“家長式的、武斷的、專橫的態度”。[[73]](#_73_Tong_Shang_Shu__268__Di_350Y)

中國共產黨的聲明是對蘇聯共產黨6月21日致中共通知書的回答，這個通知書是赫魯曉夫在會議開幕時散發的。中國共產黨的聲明宣稱，赫魯曉夫在會上“突然襲擊地提出了會談公報草案”，沒有預先征求意見，也沒有在會上充分討論。中國人進一步宣布，“在有機會時”，他們將“繼續同蘇共和其他兄弟黨，就我們同赫魯曉夫同志的分歧觀點，進行認真的討論”。對《蘇共致中共通知書》，也將在適當的時候予以答復。這樣，布加勒斯特會議就成了一系列新的（包括公開和非公開的）交鋒的第一個回合。

當一陣疾風暴雨般的論戰在那個夏天的報刊上出現時，莫斯科突然于7月中旬通知北京，將在9月初撤回全部蘇聯技術人員。北京后來宣布，有1390名專家撤離，343項合同被“撕毀”，“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被取消”。[[74]](#_74___Bei_Jing_Zhou_Bao_____568)莫斯科抵賴說，自從“大躍進”開始，專家已不可能起任何實際作用，并引證它1958年提出要他們那時就離開的建議。[[75]](#_75___Su_Lian_Zheng_Fu_Sheng_Min)雖然他們也許成了多余的，但據北京說，他們撤走時，帶走“成千的”藍圖和技術資料，這只能煽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加強對毛自夸的“自力更生”方針的支持。北京對撤退專家的反應是公開宣稱它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努力……建設社會主義”。9月10日，它非公開地答復6月21日的蘇共通知書，譴責莫斯科通過撤回技術人員施加壓力，但在結尾輕蔑地說：“真理是不能用錢買的。”[[76]](#_76___Yi_Yi_____75__Fu_Lu__Di_4Y)

從9月30日到10月22日，26國共產黨的代表齊集莫斯科，為將于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召開的81國共產黨會議起草一份宣言。在這兩次集會上，以赫魯曉夫、蘇斯洛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為一方，以鄧小平為另一方，展開了唇槍舌劍的交鋒。毛未出席會議，他和金日成是唯一缺席的集團領導人。劉少奇在會上很少說話，但在胡志明的慫恿下，在對會議聲明議定一致意見的成功的最后努力中同赫魯曉夫私下見了面。[[77]](#_77_Tong_Shang_Shu_Fu_Lu__Di_33Y)

蘇聯方面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從理論上闡述對待戰爭的正確態度，包括一般戰爭、局部戰爭、“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戰爭。中國人則作出針鋒相對的回答，并超出這個范圍，重提兩個首都之間的具體政策爭論。鄧小平回顧1956—1959年的事件，包括外間所傳蘇聯對中國軍事設施的要求、莫斯科對中印爭端的反應、公開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赫魯曉夫未經證實的對艾森豪威爾談論中國的言論、蘇聯報刊的反華運動（其中包括對中國的威脅）、撤回技術人員，以及未加詳細說明的“邊界侵犯”。[[78]](#_78_Tong_Shang_Shu_Fu_Lu__Di_25)

在出席會議的81個共產黨中，只有極少數支持北京，其中的阿爾巴尼亞一直在攻擊蘇聯的政策和實踐。在一些問題上，澳大利亞、日本、北朝鮮、北越和印尼的代表或多或少站在中國一邊。但是，赫魯曉夫成功地動員了占壓倒多數的支持，反對不在場的毛。這次會議一致通過了一個調和的文件，它把分歧意見勉強拼合攏來，避免了一次公開的分裂局面，但沒有增進所有出席者發誓要維護的“團結”。這些加上莫斯科撤回經濟顧問和援助、1960年公開與非公開的論戰，實際上結束了中蘇同盟，只剩下工作關系。赫魯曉夫將爭論個人化，表現在他采取最嚴厲的路線，反對毛的個人領導地位，這就給對抗加上一個額外的因素，至少在四年后他下臺之前，排除了任何和解。

## 第三階段：1961—1962年

1961—1962年，中國的外交政策議事日程沒有增加新的內容，但以前的問題有了新的變化，總的來說是變得更壞了。中蘇分歧加進了阿爾巴尼亞作為爭論的前哨，在印度問題上的爭論變得更加激烈，隨著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爆發了公開的論戰。印度沿有爭議的喜馬拉雅山邊界同中國的偵察戰術競賽，觸發了一場短暫的戰爭，在戰斗中，人民解放軍以破竹之勢打到拉達克和東北邊境特區沒有爭議的邊界。臺灣的蔣介石想利用“大躍進”造成的經濟災難，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入侵姿態，人民解放軍對此作了相應的部署，北京召喚華盛頓去華沙開大使級緊急會議。幾乎與此同時，一大批出逃的人越過新疆邊界，導致北京譴責莫斯科企圖分離廣大的中亞地區。在鄰近的老撾，另一次日內瓦會議結束了共產黨與非共產黨軍隊之間正在進行的對抗，雙方主角和他們的代理人在分歧上達成妥協，足以化解危機，并掩蓋對整個印度支那的日益增長的爭奪。

但是，使1961—1962年有所不同的，是“大躍進”令人吃驚的后果，由于蘇聯撤回顧問和援助，情況更糟了。20年后發表的統計數字表明了中國人口的絕對下降，原因是饑餓與疾病導致的死亡增加和低懷孕率與高嬰兒死亡率導致的出生率減少。這時獲得的人民解放軍的秘密檔案，透露了軍隊士氣的下降，原因是家鄉絕望的經濟情況和整個農村實行軍事管制，后者是為了防止搶劫糧倉和殺害干部。

這個國內背景促成外交政策上一種增大了的外部威脅感，這種外部威脅被看成是針對中國的經濟困難而來的。1962年中期，這種威脅在西、南、東三方面出現，兩個超級大國直接或間接地卷入了其中一方面或幾方面。雖然這些全都不是新問題，但它們對中國領導者的影響是空前的，以致一個消息靈通的外交官說他們“嚇慌了”。[[79]](#_79_Dang_Shi_Zuo_Zhe_Ke_Yi_Li_Yo)

#### 中蘇爭論

恩維爾·霍查拒絕受1960年莫斯科聲明的約束，也沒有被莫斯科要對阿爾巴尼亞進行政治干涉的威脅所嚇倒。反之，他和毛聯合起來謾罵蘇聯“修正主義”。1961年2月，在地拉那的黨代表大會上，出現了一個早期的中—阿協議，那以后，莫斯科撤回了經濟顧問和援助。10月，在蘇共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和阿爾巴尼亞的尖銳攻擊，引起周恩來退出會場。赫魯曉夫于是斷絕同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系，并在1962年從蘇聯與東歐聯系的主要組織經互會和華沙條約集團中，將阿爾巴尼亞驅逐出去。那年春天，莫斯科通過維護“社會主義”團結的言詞和行動，修補與貝爾格萊德的裂痕，從反面駁斥了北京的攻擊。1962年9月，蘇聯國家元首勃列日涅夫訪問南斯拉夫，以鞏固恢復了的關系。

在家門口，一個明顯的蘇聯顛覆活動的威脅在新疆出現。1961—1962年，與中國其他地方相類似的經濟失調，促使非漢族居民逃亡，他們越過蘇聯邊界去找他們的生活水平較高的同族人。移居者有6—8萬人。他們中有許多人得到官方心照不宣的鼓勵，像同時在香港邊界出現的情形那樣。但是，成群出亡的增長與速度顯然引起北京的驚慌，1962年5月，突然加強了限制。由于遷移需要得到蘇聯領事館的默許，發給旅行簽證，地方暴亂和人民解放軍的鎮壓不可避免地涉及蘇聯人。據說周恩來為這些動亂向莫斯科道歉，但在7月，新的限制迫使蘇聯關閉在新疆的所有領事館，并把邊界變成一條無人居住的安全地帶。

接著，北京公開指責莫斯科企圖“分離”新疆。這種事情當時并未發生，但當時的狀況很容易使某個或更多的集團信以為真。此時回想起1871年俄國人占領伊犁河谷和1944—1949年蘇聯支持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就進一步給爭論火上加油。

同時，一種漸漸出現的蘇印軍事關系，似乎預示了次大陸的一個更加堅固的反華聯盟。1961年4月，莫斯科賣給新德里8架四引擎軍隊運輸機在拉達克使用。莫斯科接著提供能在17000英尺高度空運人員和給養的直升機。1962年6月，蘇印就蘇聯提供工廠最后在印度成批生產噴氣式戰斗機進行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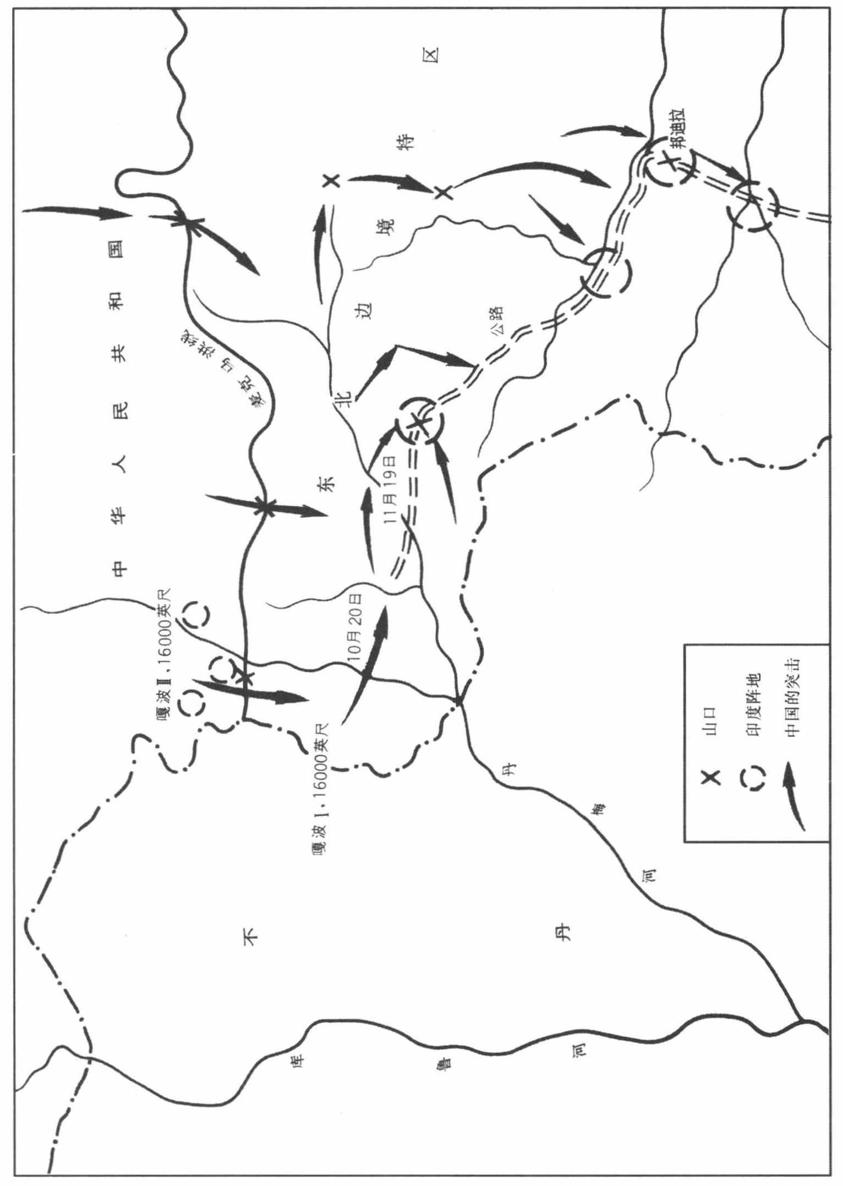
第三個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事態發展，是1962年8月莫斯科通知北京，它已接受美國的建議，停止核擴散，不向非核國家轉移核技術。這些國家也要同意保持作為非核國家。北京立即要求莫斯科不要用條約的形式同意這個協定，否則將公開譴責。

在這個實質性分歧的背景下，1962年10月發生了古巴導彈危機。在長達一星期的對抗中，中國人從克制發展為發表一個保證支持莫斯科的政府聲明。但危機剛過去，北京就公開責備莫斯科把中程導彈運進古巴是“冒險主義”，在美國發出最后通牒后將它們撤出來是“投降主義”。群眾集會嚴厲指責蘇聯的做法，為古巴的主權辯護。

北京對莫斯科的短暫支持，正值中印在喜馬拉雅山邊境發生戰斗的第一個星期，這可能反映了北京拿不準蘇聯會作出什么反應。《真理報》以立即支持中國的立場酬答這個表態。但中印戰爭一結束，北京對古巴問題的態度也就改變了，1962年12月12日，赫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講話，對印度好戰的說法表示輕蔑，說中國有關國家安全的論點是把國家安全與邊界爭端混為一談。

與在公開的報刊上或秘密會議上進行的意識形態辯論對照，在阿爾巴尼亞的對抗和涉及戰爭或近乎戰爭狀態的國家利益沖突，使莫斯科在一些真正重大的問題上反對北京。這種更進一步的緊張關系終于分解了中蘇同盟，使其不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

#### 中印戰爭



地圖9 1962年中印戰爭

1962年上半年，印度巡邏隊推進到喜馬拉雅山邊境有爭議的地區建立前哨據點，這與先前人民解放軍的推進相似，但往往落后于他們。如果像北京聲稱的，存在可以決定所有權，那么雙方都能玩這個游戲。由此而發生的對抗、抗議和偶然事件，逐步上升為公開的謾罵，并在夏末秋初加快了秘密外交的步伐。9月中旬，北京警告新德里不要“玩火”，并建議一個月后進行沒有先決條件的討論。截止時間過去了，印度沒有依從，同時更嚴重的事件造成了雙方的傷亡。10月20日，在印度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沒有爭議的西藏領土時，人民解放軍在邊境的東段和西段發動了一次協同進攻，反對所謂印度的“大規模的全面進攻”。

一個星期后，人民解放軍停止了進攻，北京靜觀新德里、莫斯科和華盛頓的反應。外國進攻引起的民族主義情緒，加強了印度拒絕調解的態度，加上兩個超級大國由于忙于它們自己的紛爭，對此比較消極，促使中國在三星期后恢復了進攻。11月20日，在發起進攻整整一個月后，北京宣布單方面停火，把軍隊從1959年11月7日的實際控制線后撤20公里，條件是印度軍隊也停止戰斗，并且不再企圖收復沖突開始前占有的陣地。

人民解放軍證明它在各方面都占優勢。占據高地，并有很好的公路供應路線，人民解放軍的火力很容易就摧毀了印度的進攻，印軍是上山，并且僅僅依靠搬運工爬上高海拔的崎嶇地帶搬運給養。中國人把印度軍隊從北京聲稱的所有領土上趕走，但沒有越過任何沒有爭議的邊界。人民解放軍俘虜3968人；印度則一個也沒有。新德里宣布的傷亡數字為死亡1383人，失蹤1696人。北京沒有發表可供比較的統計，但從戰斗的特點看，中國的損失無疑小得多。許多印軍小隊在突然襲擊下倒下，其余的逃走。在政治上，北京給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不僅無償歸還全部東北邊境特區，而且歸還全部戰俘以及開列出詳細清單的卡車、大炮和彈藥。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赫魯曉夫處理古巴問題的暗中對比中，毛既不是“冒險主義”，也不是“投降主義”。他獨一無二的結束戰爭行動的做法，排除了“帝國主義”或“修正主義”替尼赫魯采取任何行動的可能，而同時保住了具有戰略意義的阿克賽欽高原，新疆至西藏的公路就從那里通過。

#### 臺灣制造的緊張局勢

1962年5月29日，外交部長陳毅在一次與新聞界的會見中，詳細談到中國對美國和印度的外交政策問題。他一再提到臺灣利用大陸的嚴重經濟問題在美國支持下進犯大陸的可能性。承認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在中國“可能有幾百萬”，陳指出，“蔣介石的進犯，意味著他們又有一個攻擊政府的理由”。[[80]](#_80_Ai_Lun__S_Hui_Ting____Zhong)

北京的警報是對臺灣準備進攻的跡象作出的反應，臺灣準備進攻似乎是受到了美國高級官員訪臺的鼓勵。3月，臺北提前一年征召新兵，并無限期地延長原定退伍的軍人的服役時間。它還把海上運輸組成“動員編組”。5月，向工商業征收一種稅率很高的“入侵準備捐”。同時，華盛頓任命一個具有兩棲作戰經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海軍上將為駐臺灣大使。

這時，在1962年的整個5月間，數萬難民越過香港邊界，從經濟混亂中尋求救助。這引起全世界對中國國內危機的注意，導致從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向香港緊急運送糧食，以及美國提高中國移民限額。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于6月的頭三個星期，趕調10萬人以上的軍隊到臺灣對面的浙江和福建。6月23日，北京只提前24小時通知召開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對支持蔣介石侵犯大陸提出警告，特別暗示了朝鮮戰爭給美國帶來的后果。

除了美國大使否認有任何這樣的企圖外，四天后，肯尼迪總統公開確認，美國的政策是“反對在這個地區使用武力”。這些再保證證明是可信的，人民解放軍撤銷部署，危機于是過去。但是，這個插曲促成了來自印度的威脅的意識，因為印度與臺灣和中央情報局進行合作，為西藏游擊隊提供庇護和給養。這種聯系受到《人民日報》一篇文章的注意，它報道一家印度報紙的話：中國面臨“在兩條戰線上作戰”的前景。這樣，新疆的居民出逃、蘇聯對新德里的軍事援助、印度巡邏隊的前進行動和臺灣的進犯準備，所有這些在時間上的巧合，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

#### 老撾：第二次日內瓦會議

北京在新疆、臺灣海峽和西藏以好戰的態度對待威脅。在老撾，證明使用外交手段就夠了。1961年初，肯尼迪政府曾討論武裝干涉，但最后接受了英國的建議，即召開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安排國際委員會監督停火，然后成立一個以梭發那·富馬為首的中立的聯合政府。

北京于是不再反對國際委員會的活動，支持日內瓦協商，同時暗地里用軍用品和顧問加強巴特寮。中國的政策目的是減少美國干涉的威脅，使老撾脫離東南亞條約組織的保護，減少河內和巴特寮對蘇聯援助的需求。協商一直拖到1962年，這時右翼軍隊突然進攻巴特寮。共產黨的一次猛烈反攻，威脅著當地力量的均勢，肯尼迪總統于是派遣五千多名海軍陸戰隊到泰老邊境，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派出空軍部隊，對一次東南亞條約組織會議作出呼應。

莫斯科采取低姿態，而北京公開威脅進行干涉。不過，在私下里，北京的勸告顯然使巴特寮有所克制，三方面最后同意組成聯合政府，并立即得到中國的承認。1962年7月23日，日內瓦會議以確認老撾的中立結束，雖然只由14個簽字國聯合協商作出保證。在協商過程中，停火從未見效，但以后逐漸平靜，三方各自保有自己的軍隊。北京小心地把公開的漂亮話、外交上的妥協和對巴特寮的暗中支持混合起來，成功地使莫斯科相形見絀，阻止了華盛頓，而沒有冒公開對抗的危險。

## 第四階段：1963—1964年

#### 概觀

在穩住瀕于崩潰的經濟，擋開在新疆、西藏和臺灣海峽的明顯威脅后，北京的內憂外患的壓力在1963—1964年減少了。但沒有一個重要問題得到解決，有些問題則惡化了。中蘇爭論爆發成公開論戰，雙方通過發表冗長而詳細的信件、聲明，互相指責，互相揭發。毛火上加油，暗示他可能要求歸還所有根據沙俄條約割讓的領土。由于中國堅持就有爭議的邊界舉行雙邊討論，邊界事件成倍地增加。最后，在莫斯科與華盛頓簽訂一項核禁試條約后，北京爆炸了它的第一顆原子彈。

由于美國在南越的軍事存在迅速膨脹，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日漸增加。美國威脅北越，如果它不停止支持南方的共產黨叛亂，就要對它進行轟炸。1964年8月，美國飛機借口北越巡邏艇在東京灣襲擊美國驅逐艦，攻擊了北越的巡邏艇基地。北京因此派遣米格戰斗機到河內，表示支持北越，莫斯科則避免直接卷入。

老撾被牽連進越南戰爭，因為共產黨從北至南的滲透路線，遭到從泰國的美軍基地起飛的飛機的襲擊。這樣一來，又促使北京增強它在老撾的存在，并鼓勵泰國共產黨的好斗性。在赫魯曉夫的下臺、周恩來去莫斯科試探新領導的失敗之行和印度支那可能發生中美對抗的兇兆中，結束了1964年。在這些反面的事態發展中，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北京外交進展上的一個正面象征，它多少抵消了中國策略在亞非競技場上的挫折。中國同巴基斯坦、柬埔寨、緬甸和印尼的關系，由于外交手段對革命言辭占了優勢，繼續得到改善。至于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從“大躍進”的災難中恢復過來以后，貿易有很大的增長，北京認識到，從高層“非官方的”經濟協定中，比從早先無益地企圖迫使或說服日本重新考慮它同臺北和華盛頓的聯系，在經濟和外交上得到的實惠更多。

#### 中蘇的裂縫擴大

1962—1963年之間的冬天，莫斯科同北京的爭論在東歐國家的黨代表大會上表面化，接著，中國猛烈攻擊第三者的黨，拿它們代替真正的靶子蘇聯。亞洲和歐洲感到憂慮的共產黨人呼吁和解，促使雙方同意在1963年7月舉行會談。但到6月，北京違背“暫停”論戰的保證，公開列出25個原則性論點，供雙邊會談討論。這個會談按計劃在7月5日開始，但八天之后，《人民日報》恢復了它的反蘇社論。莫斯科立即作出反應，在一篇公開發表的長文中，回顧了爭論的起因和歷史。

表面看來，中國是不妥協的，在雙邊關系上制造更大的緊張。但背地里，蘇聯的政策在多國核武器協議的范圍內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它旨在限制中國。這個問題本已擱淺，但自從赫魯曉夫1958年3月曇花一現地單方面停止試驗和他1959年1月提出亞洲無原子武器區的建議以來，這個問題就潛在地造成不和。北京曾支持這兩個建議，盡管不及時。但更近一些，它曾私下一再警告莫斯科，反對“同美國簽訂某種條約，來剝奪中國人民采取措施抵抗美帝國主義核威脅的權利”。[[81]](#_81___Zhong_Guo_Zheng_Fu_Fa_Yan)

不顧北京的反對，1963年7月15日，在中蘇會談中間，赫魯曉夫開始同美國和英國談判在大氣層禁止核試驗。7月21日，中蘇會談休會，“再過一些時候”繼續舉行。7月25日，禁試條約簽字。

赫魯曉夫的時間選擇，再具刺激性不過了，北京相應地作出反應。政府聲明、社論、兩黨之間的通信，在中國和蘇聯的報紙上激增，對意識形態異端、政治上的背叛和兩國的國家利益包括安全受到直接威脅的指責，都用文件作了詳細的證明。除了追溯到蘇共二十大和炮擊金門的行動與事件外，出現了一個新的爭論點，涉及中蘇邊界和沙俄從中國奪去的土地。

領土問題的最初出現，差不多像一個旁白，當赫魯曉夫1962年12月回敬中國批評他在古巴導彈危機上的行為是“投降主義”時，責罵毛繼續容忍葡萄牙和英國統治澳門和香港。1963年3月，北京回答美國共產黨重彈赫魯曉夫的老調，引證了許多19世紀帝國主義侵奪中國領土的例子，包括俄國通過三個“不平等條約”奪去中國西部、北部和東北部的許多領土。《人民日報》社論結尾說：“你們提出這一類問題，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條約問題通通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你們是不是想過，這樣做會引起什么后果呢？難道你們認為，這樣做對你們真的會有什么好處嗎？”[[82]](#_82___Ren_Min_Ri_Bao_____1963Nia)

北京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中，指責莫斯科1962年在新疆進行顛覆活動時，“引誘和脅迫幾萬中國公民跑到蘇聯境內”。[[83]](#_83___Ren_Min_Ri_Bao____He___Hon)莫斯科回答說：“從1960年起，中國的軍人和平民一貫侵犯蘇聯邊界。僅1962年一年，就有五千多次……記錄在案。”[[84]](#_84___Su_Lian_Zheng_Fu_Sheng_Min)莫斯科的聲明指責北京拒絕就邊界問題進行商量以避免某些誤會，而“對據說是過去造成的……某些部分不公平的劃界，作出明確的暗示”。

1964年2月25日，雙方就這個問題在莫斯科進行會談。四天后，北京指責道：“最近幾年蘇聯方面經常破壞邊界現狀，侵占中國領土，制造邊界事件。”[[85]](#_85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_Z)但這個聲明宣稱：“盡管與中俄邊界有關的舊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仍然愿意尊重它們，并以它們為基礎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說法沒有維持多久。7月10日，毛接見日本客人時，威脅要重新討論整個領土問題，指出：蘇聯面積有二千二百萬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億二千萬。現在是結束這種分配的時候了……大約一百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的地區變成了俄國的領土，從那時起，海參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區成了蘇聯領土。我們還沒有提出算這筆賬。[[86]](#_86___Shi_Jie_Zhou_Bao_____Sekai)隨后，周恩來聲明，日本報紙對毛主席的話作了某些不正確的解釋，但他沒有駁斥會見報道的任何具體部分。蘇聯的宣傳工具充分利用毛的話，作為中國“擴張主義”的證明。毛的這番話也許使蘇聯人暗下決心增加面對中國的軍隊，這方面的證據從1965年出現，在隨后幾年繼續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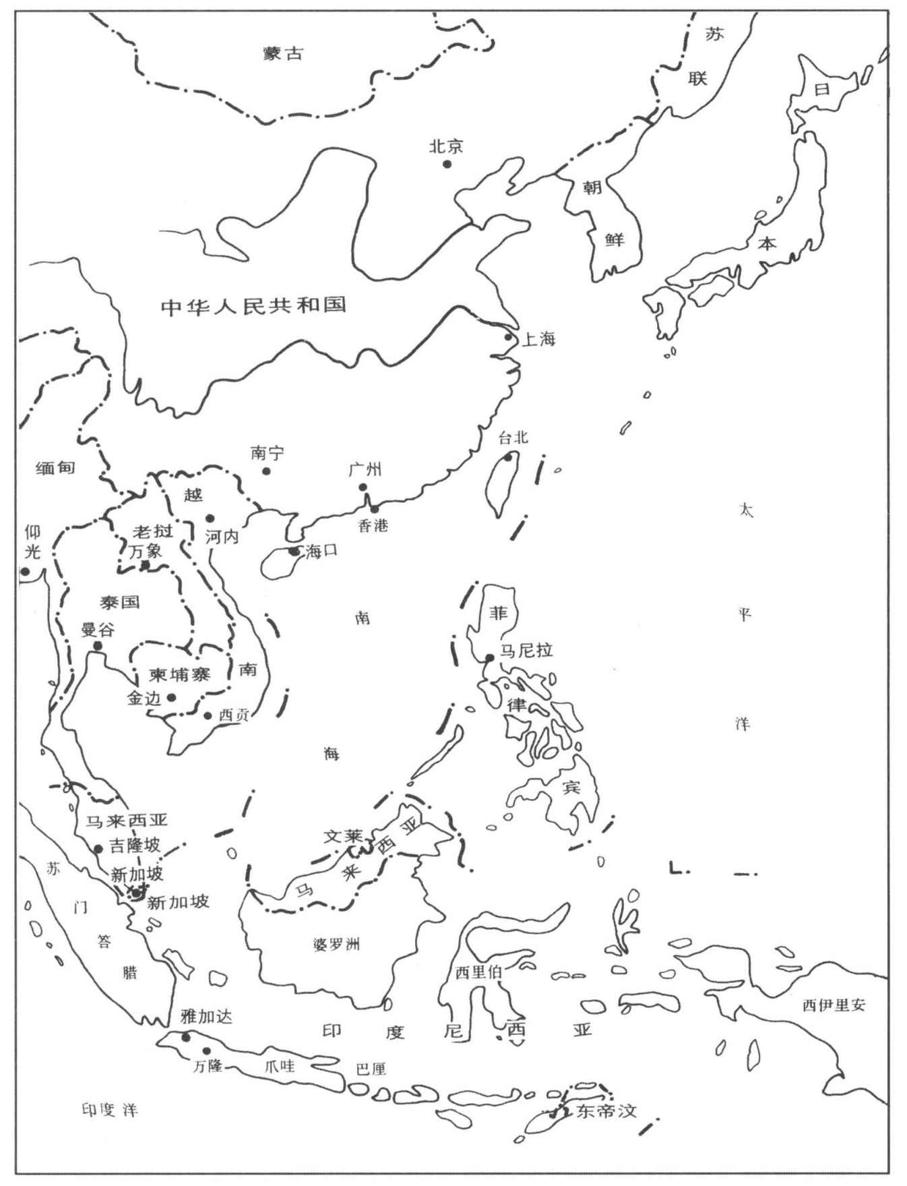
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在一次實際上的政變后下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阿歷克賽·柯西金就任領導。10月16日，中國爆炸了它的第一顆原子彈。事件的這個巧合，為周恩來11月5日赴莫斯科進行1963年7月以來的第一次高級會談提供了一個吉利的背景。但當周11月14日回到北京時，沒有發表任何聯合公報，中蘇關系基本上停留在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以前的狀況。

#### 印度支那戰爭加劇

在日內瓦形成的脆弱的老撾和解，經不住派別之間的戰斗，由于河內與華盛頓在南越的隱蔽斗爭升級，局勢惡化了。北越利用老撾運送軍隊和給養到南方進行游擊戰爭，促使美國通過泰老中間地帶對滲透路線和巴特寮基地進攻。1964年6月，在進行這種進攻時，炸中康開市的中國代表團駐地，炸死一人，傷五人。北京提出抗議，但沒有公開的行動。

8月，兩艘美國驅逐艦在東京灣執行電子情報任務，配合隱蔽的南越人攻擊北越的雷達設施，遭到河內魚雷艇的襲擊，沒有造成大的損害或任何傷亡。兩天后，這兩艘驅逐艦在夜里回來時，又報告它們遭到襲擊。（后來發現報告是錯誤的。）約翰遜總統立即下令空襲六個北越海軍基地。莫斯科跟河內的愿望相反，建議把這個事件提交聯合國，但北京派出一中隊由在中國訓練的越南人駕駛的米格-15和米格-17式飛機。

中國公開地發出警告：“美帝國主義任何時候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領土、領海和領空，中國人民義無反顧，必將堅決支援越南人民反抗美國侵略者的正義戰爭……如果它敢于發動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進攻，中國人民絕不會袖手旁觀，坐視不救。”[[87]](#_87___Bei_Jing_Zhou_Bao_____568)暗地里，北京在它的南方地區增加戰斗機的品種，并在緊靠印度支那的北邊，修建了三個新機場，其中兩個看來是預備支持北越的空中防御的。[[88]](#_88_Ai_Lun__S_Hui_Ting____Zhong)



地圖10 中國和東南亞

到1964年底，美國在泰國的軍事人員達到6500人，絕大多數是空軍。飛機從泰國的秘密基地出動，加上中央情報局領導的老撾人的出擊，從地面和空中攻擊巴特寮和老撾東部的所謂胡志明小道。10月1日，泰國共產黨祝賀中國國慶的賀信號召推翻曼谷政權，表現出空前的好戰。一個月后，秘密電臺泰國人民之聲用漢語廣播，發起泰國獨立運動，公開承認目標是驅逐“美帝國主義出泰國和推翻他儂政府”。[[89]](#_89_Mei_Er_Wen__Ge_Er_Tuo____She)同時，北京電臺將它的泰語節目從每周14小時增加到21小時。

這些措施沒有一項使北京承擔了任何具體行動的義務。各種公開的和隱蔽的手段，目的都在于制止華盛頓將它空襲北越的威脅付諸實行和制止曼谷參與老撾的斗爭。但盡管這些措施僅限于表示將來可能采取的步驟，卻改變了中國卷入印度支那的性質。北京對河內的保證暗示中國將對美國轟炸北方作出反應，如果美國真這樣做的話。不作出反應，會使中國此后的制止努力喪失信譽，從而在中蘇對第三世界的影響的競爭中，有利于莫斯科。此外，北京鼓勵泰國共產黨的好斗性，改變了它自1955年萬隆會議以來的溫和姿態。放松對當地起義的控制，再要收住就很難不向河內作出讓步，因為河內也是泰共的保護人，且不說這樣做對中國在別處的革命聲譽也是潛在損害。

#### 亞非世界

這個革命聲譽已經受到與中國外交目的相反的壓力，特別是在當時已被納入亞非的第三世界。1964年初，北京提出，在國際體系中有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它“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獨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另一部分是整個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既剝削和壓迫別人，同時又受到美國的控制、干涉和欺負……在這方面，它們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人民有共同點”。[[90]](#_90___Ren_Min_Ri_Bao____She_Lun)

這一闡述，正好是在1950年以來第一個主要大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一星期作出的。1964年1月27日，法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從而證明對這個“中間地帶”第二部分的說法有道理。盡管戴高樂總統的行動在日本引起爭論，池田首相沒有表示要照他的樣子行事而不跟美國走的意向。1964年11月接任首相的佐藤，起初似乎答應加強關系，但不久，中國人認為他像他的兄弟、50年代后期擔任首相的岸信介一樣敵視他們的利益。他們只得滿足于作為1962年廖—高碕貿易協議的結果而建立的事實上的外交聯系，它導致把外交和貿易官員派進北京的日本“民間”貿易辦事處。

在“中間地帶”的第一部分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贏得承認的有肯尼亞、布隆迪、突尼斯、剛果（布拉柴維爾）、中非共和國、贊比亞和達荷美，時間都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11月之間。這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外交關系的國家，總數達到52個。

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的突出地位，增強了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來訪問10個非洲國家的重要性。他的多重使命是，解釋中國為什么拒絕簽署核禁試條約而同時爆炸它自己的原子裝置，鼓勵反蘇立場和在經濟上“自力更生”，并把革命言辭提高到一個不符合他的總理身份與外交家名聲的高度。所有這些帶來的結果是各種各樣的。

北京對非洲的政策在三個層次上運轉：官方的、個人的和革命的。象征性的許諾和貸款，只能象征性地與西方和蘇聯的援助項目對抗，但不能在實際上競爭。周恩來通過亞非人民團結組織認識的好斗的個人和有潛力的反對派領袖，得到津貼和去中國旅行的機會，往往使當地政府感到頭疼。造反者得到公開的宣傳和暗中的金錢、武器援助與勸告。

但當中國的被保護人把矛頭指向黑人政府，如同在盧旺達、喀麥隆和剛果（利奧波德維爾）那樣時，非洲人的反應往往是批評性的，同中國援助安哥拉和葡屬幾內亞的反殖民地游擊隊時不同。因此，周恩來在索馬里斷言“整個非洲大陸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就受到這樣一些領導人如突尼斯的布爾吉巴總統和埃塞俄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私下的和公開的反對。

周恩來的一個特殊問題是，非洲人不愿在中蘇爭論中有所偏袒，并對中國企圖操縱亞非人民團結組織以達到這個目的感到失望。1963年2月在坦噶尼喀召開的亞非人民團結組織會議，參加者分成了支持莫斯科或北京的派別。中國人在反對蘇聯和印度立場的幾個要點上占了優勢，并主宰了以后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分支機構的會議。一個結果是，北京提出召開另一次萬隆會議，但缺乏支持。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數非洲領導人要求召開第二次不結盟會議，這將排除中—蘇爭論者。后一個會議的計劃在1964年3月出現；馬里拒絕參加，這是周的游說取得的唯一成功。實際在7月召開的會議，通過了贊成和平共處和反對生產、獲得與試驗核武器的決議，全都反駁了北京的觀點。

同亞非世界個別國家在國家關系上取得的成功，多少緩和了這些挫折。北京同桑給巴爾左翼政權的密切聯系，在1964年4月桑給巴爾與坦噶尼喀合并后仍然保持，新國家坦桑尼亞得到北京一筆為數4200萬美元的巨額信用貸款，加上1964年6月一筆280萬美元的贈款。那年8月，尼雷爾總統宣布，他已經邀請了中國專家訓練坦桑尼亞軍隊。中國的迫擊炮、重機槍和反坦克炮，在下年2月公開展示出來。[[91]](#_91_J_D_A_Mu_Si_Te_Lang____Ge_Mi)

在南亞，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關系穩定地加強。雖然巴基斯坦領導人明顯地拒絕任何同盟，但他們暗示的一個非正式諒解，在1964年得到北京的低調支持，當時中國聲明，在印巴的克什米爾爭論中，站在巴基斯坦一邊。在周恩來的拉瓦爾品第之行后，2月發表了聯合公報，要求爭論“按照克什米爾人民的愿望獲得解決”，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穆斯林。在這次訪問中，外交部長陳毅提出“亞洲人的亞洲”，以迎合他的對手外交部長布托，后者對東南亞條約組織的矛盾態度，使陳把巴基斯坦描述成“既是結盟的又是不結盟的”。[[92]](#_92_Ha_Li_De__B_Sai_Yi_De____Ba)

7月，中國答應給巴基斯坦6000萬美元無息長期貸款，用黃麻、棉花和成品償還，巴基斯坦則購買中國的水泥、糖廠和機器。10月，新華社宣稱，兩國有著“反對外國侵略與干涉的共同事業”。這個說法沒有提到承擔明確的義務，但暗示了北京與拉瓦爾品第之間關系的一個發展，同莫斯科與新德里的關系相并列。

對柬埔寨，中國也保證支持，但未明確它的實際內容。1963年11月，金邊拒絕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后，北京宣布：“如果……柬埔寨王國竟然遭到美國及其仆從國家所策劃的武裝入侵，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堅決站在柬埔寨王國一邊，并且給予全力的支援。”[[93]](#_93_Mei_Er_Wen__Ge_Er_Tuo____She)但第二年10月，西哈努克親王透露，他未能使北京同意一項共同防御條約或聲明進攻柬埔寨就等于進攻中國。他去北京壓范文同總理接受現行邊界也失敗了；中國發起這個談判，但沒有為柬埔寨提供支持。不過，在這個限度內，北京鞏固了它和金邊的保護與被保護關系，以對抗華盛頓與曼谷和西貢的聯盟。

仰光拒絕在中印沖突中站在新德里一邊反對北京，這之后，緬甸從中國的外交優先于革命中得到好處。1963年4月，劉少奇去緬甸首都，同意完成10個援建項目，包括橋梁、水電站和生產膠合板、紙張、糖和紡織品的設備。中國的聲明在談到“民族解放斗爭”時，小心地不提緬甸共產黨，而在劉訪問的那個月，仰光宣布大赦，并提出無條件地同所有的造反者談判。那個夏天，白旗派的資深干部從中國回到緬甸。北京的影響顯然促使白旗派代表團同緬甸政府在9月開始了討論。[[94]](#_94_Tong_Shang_Shu__Di_100Ye)

1964年3月，這些討論的失敗和仰光禁止所有的政黨（除去官方支持的），沒有改變中國的政策。1964年2月和7月周恩來和陳毅對仰光的訪問，顯露出在許多問題上有分歧，但存在足夠的一致，使援助項目可以繼續進行，并使中國報紙停止發表批評性意見。1964年的夏秋期間，當緬共中央委員會決定采取一條更好戰的路線，要“贏得戰爭，奪取政權，完全消滅”仰光政權時，北京保持沉默。泰國共產黨推翻他儂的號召，包含在10月1日它給北京的國慶賀電中，但緬甸的賀電沒有提這種要求，盡管它剛決定了要戰斗。它反而稱贊“政府的和平中立外交政策”。

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關系，由于中國強調政府之間而不是黨之間的聯系，同樣獲得成功。1964年3月，北京提出將中國銀行在印度尼西亞的資產交由雅加達控制。由于這家銀行曾經在華僑商業團體中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籌集資金，這個建議似乎表示北京斷然放棄干涉印度尼西亞內政的誠意。在1964年10月的開羅不結盟會議上，蘇加諾要求支持他對抗馬來西亞遭到拒絕，就于11月4日飛到上海與周恩來會談。三個星期后，陳毅去雅加達進行一星期的磋商，結果發表了一個聯合新聞公報，在廣泛的問題上取得空前的一致，包括支持“粉碎”馬來西亞的斗爭。[[95]](#_95_Mo_Xin_Ge____Yin_Du_Ni_Xi_Ya)中國還為外匯儲備和經濟發展提供一筆5000萬美元的信貸。

北京在“遼闊的中間地帶”追求一種心照不宣的聯盟，就如它對世界事務的公開分析那樣，使政府關系成為主要的，革命關系成為次要的。阿尤布·汗、西哈努克、奈溫和蘇加諾得到劉少奇、周恩來和陳毅的青睞，劉和周并給予他們數量不大的經濟援助，這從中國明顯的窘迫情況來看，表示的情意是相當大的。除了利用這些領導人和政權對他們的緊鄰的不滿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還小心地培養反蘇或反美態度的萌芽，這可以加強中國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地位。這樣，盡管中蘇在意識形態上唇槍舌劍的論戰使北京成為一個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激進革命者的角色，但中國在1963—1964年的外交政策卻與近10年前著名的萬隆會議時相似，只有正在升級的越南戰爭威脅著中國自己確定的利益。

#### 1964年：分水嶺的一年

從幾方面看，1964年是中國對外關系的一個分水嶺。關鍵領域在性質上的變化，給不遠的將來提出了新的問題和前景。首先，中蘇爭論深入擴大。其次，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升級，激起北京增加對河內的支持。第三，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使它成為核大國小團體的一員，但并沒有增加它在今后若干年內的防御能力。它甚至引起一個可能的威脅，即蘇聯、美國或兩者都參加的預防性攻擊。

逐漸惡化的中蘇關系，由于毛澤東在7月的接見中，公開向蘇聯控制西伯利亞和蘇聯遠東的許多地方的合法性提出挑戰而加速惡化。在同一個月發表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第九篇論戰系列文章《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擴大了攻擊蘇聯領袖的范圍，它斷言：“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它]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96]](#_96___Bei_Jing_Zhou_Bao_____568)

但四個月后，周恩來去莫斯科，看看赫魯曉夫的下臺是否能夠改善關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北京7月的分析證明是正確的，至少赫魯曉夫的同事們在中蘇關系上維持強硬路線。這預示一個長期的激烈對抗，不是莫斯科的任何領導更換所能改變的。

越南愈益惡化的局勢，使中蘇關系進一步復雜化。只要莫斯科和北京的爭論停留在政治范圍內，不論是意識形態還是戰略問題，對中國的切身利益來說就不是主要的，特別是對它的國家安全來說是如此。自然，邊界事件和劃界上的小分歧，可能擴大到需要進行較大的防御戰。但無論如何，在報紙上和在共產黨的會議上進行舌戰，涉及的是語言而不是行動。

但東京灣事件后，出現了美國空襲北越和擴大美國在南越的存在的前景。這迫使北京增強了它對河內的贊助，包括使北越放心和盡可能制止美國。在這種情況下，中蘇爭論威脅著中國以及越南的安全。它至少使對河內的軍事援助的運輸變得復雜了。最壞的情況是，它可能鼓勵華盛頓入侵北越，就像它在北朝鮮曾經做過的那樣，如果需要，就阻斷或破壞中國援助它的盟國的能力。美國空軍攻擊中國，可能像在朝鮮那樣不會受到中蘇同盟的禁止，因為這對伙伴已經使他們的爭吵發展到了似乎不可彌補的地步。

首先，對中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在于蘇美勾結起來防止北京很快擁有一種可以使用的核能力的前景。1959年，莫斯科違背向北京提供一個原子彈樣品的諾言。1963年，莫斯科和華盛頓就反對大氣層試驗達成了協議。有兩個超級大國反對中國的核未來，兩者之一或兩者都能攻擊初期的生產設施，破壞——也許是一勞永逸地——這個難得的力量來源。這樣，1964年10月的試爆，既是使中國人感到驕傲也是使他們感到擔心的事情。

其次，中國恢復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第三世界的地位的前景，顯得非常暗淡。促進第二次萬隆會議的努力，由于亞非互相沖突的爭論和普遍不愿讓中蘇對抗進一步分化各個組織而遇到阻礙。接著，印度尼西亞在1965年1月5日突然退出聯合國，致使周恩來要求“徹底改組”聯合國，如果不成，“也可以另立一個革命的聯合國”。[[97]](#_97_Zhou_En_Lai_Zong_Li_1965Nian)這增加了北京同第三世界其他政權的問題，它們在這個世界組織中的會員地位，是被普遍認可的資格的一個表征。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中蘇關系、印度支那戰爭、中國與第三世界的相互影響，這些相互聯系的問題迅速地發展到一個危險的匯合點，而這時國內政治即將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最終是破壞性的轉折，它將威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具有結合力的實體的生存。國內外政策的糾結已經證明是危險的。1959年彭德懷對毛的經濟管理提出挑戰，與赫魯曉夫詆毀人民公社和撕毀核分享協定巧合。這對毛在1964年行將結束時合理地處理他面臨的國內外問題，是一個不妙的兆頭。這個問題的全部后果，要在以后18個月才尖銳地顯示出來。的確，從這一點看，1964年結束了中國對外關系中的一章，在今后許多年里，中國的對外關系還要經歷更大的危險和緊張。與此相比，在1958—1964年期間，盡管有金門事件和中印戰爭，還要算是相對平靜的。

[[1]](#_1_10)論述中蘇爭論的文獻，不但數量大且給人以深刻印象。我所依據的主要著作有：茲比格涅夫·K.布熱津斯基的《蘇聯集團》[66]（以下簡稱《集團》）；亞歷山大·達林等編的《國際共產主義的分歧》[192]；約翰·吉廷斯的《中蘇爭論概觀，1963—1967年》[268]；威廉·E.格里菲思的《中蘇的分裂》[281]；威廉·E.格里菲思的《中蘇關系，1964—1965年》[282]；G.F.赫德森等的《中蘇爭論》[343]（以下簡稱《爭論》）；庫爾特·倫敦編的《一致與矛盾》[480]；以及唐納德·S.扎戈里亞的名著《中蘇沖突，1956—1961年》[837]。

[[2]](#_2_10)布熱津斯基：《集團》[66]，第299頁。

[[3]](#_3_10)全文見赫德森：《爭論》[343]，第46—56頁。

[[4]](#_4_10)《評蘇聯政府八月三日的聲明》，《北京周報》[568]，6（1963年8月16日），第7—15頁。

[[5]](#_5_10)下面一段引自作者有權使用的美國政府情報，作者于1961—1966年在國務院情報研究辦公室任職。

[[6]](#_6_10)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見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毛主席向人民講話》[634]（以下簡稱《講話》），第176—178頁。

[[7]](#_7_10)扎戈里亞：《沖突》[837]，特別是第2章。

[[8]](#_8_10)扎戈里亞：《沖突》[837]，第180頁。

[[9]](#_9_10)《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北京周報》[568]，11（1958年5月13日）。

[[10]](#_10_10)扎戈里亞：《沖突》[837]，第182頁。

[[11]](#_11_10)扎戈里亞：《沖突》[837]，第188頁。

[[12]](#_12_10)毛澤東：《在八大第二次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1958年5月17日），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以下簡稱《萬歲》（1969年）[507]，第207—208頁。

[[13]](#_13_10)扎戈里亞：《沖突》[837]，第198頁。

[[14]](#_14_10)同上。

[[15]](#_15_10)毛澤東：《和各協作區主任的談話》（1958年11月30日），《萬歲》（1969年）[507]，第255頁。

[[16]](#_16_10)M.I.馬卡羅夫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第28頁，轉引自喬納森·波拉克《中國外交政策中的觀念和方法：金門決策》（哲學博士學位論文，密歇根大學，1975）[585]，第347頁；又見A.S.惠廷對M.S.卡皮查的訪問記，1975年6月10日。

[[17]](#_17_10)A.S.惠廷對M.S.卡皮查的訪問記。

[[18]](#_18_10)見《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28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的講話》，1958年6月28日，載施拉姆編《講話》[634]。

[[19]](#_19_10)施拉姆編：《講話》，[634]，第103頁。

[[20]](#_20_10)同上書，[634]，第125—130頁。

[[21]](#_21_10)愛麗絲·蘭格利·謝：《共產黨中國在核時代的戰略》[318]，第112頁。

[[22]](#_22_10)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66頁。

[[23]](#_23_10)波拉克的《觀念》[585]（第350—352頁）查閱了蘇聯和中國的原始資料，包括美國學者對卡皮查的訪問記，并開列了蘇聯的要求，可能包括海軍進入中國港口，為蘇聯海軍提供通信設施，建立沿中國海岸的中蘇聯合艦隊，蘇聯在中國設置雷達跟蹤站以監視美國導彈，以及在中國建立蘇聯截擊機基地。中國的要求可能是蘇聯擴大潛艇建造援助，最終包括核潛艇；蘇聯的防空部隊受中國控制；以及對進攻金門的各種空中與地面支援。

[[24]](#_24_10)波拉克：《觀念》[585]，第117頁。波拉克的數據，是根據不再作為機密的美國政府文件和經過徹底查對的新聞報道，以及中國的消息來源，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在內。

[[25]](#_25_10)最初的投降號召威脅“在金門登陸”和完全封鎖；中國新聞社1958年8月28日福建前線普通話廣播，出處同前[585]，第128—129頁。隨后廣播的最后通牒，省去了入侵的威脅。炮擊密度每天3000—36000發。

[[26]](#_26_10)同上書[585]，第122頁。

[[27]](#_27_10)波拉克：《觀念》[585]，第157—158頁。

[[28]](#_28_10)同上書[585]，第158頁。

[[29]](#_29_10)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5日），載《萬歲》（1969年）[507]，第239頁。

[[30]](#_30_1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國在臺灣海峽的戰略》[688]，《新時代》，46（1958年11月），第8—11頁。

[[31]](#_31_10)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8日），《萬歲》（1969年）[507]，第239頁。

[[32]](#_32_10)波拉克：《觀念》[585]，第89頁。

[[33]](#_33_10)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4月15日），《萬歲》（1969年），第290頁。

[[34]](#_34_10)波拉克：《觀念》[585]，第89頁。

[[35]](#_35_10)波拉克：《觀念》[585]，第230—231頁。

[[36]](#_36_10)A.S.惠廷對M.S.卡皮查的訪問記，1975年6月10日。

[[37]](#_37_10)1963年8月21日和9月1日蘇聯政府聲明；1963年9月1日中國政府聲明；見威廉·E.格里菲思《中蘇分裂》[281]，第365、382和439頁。

[[38]](#_38_10)全文見《北京周報》[568]，29（1958年9月16日）；轉引自扎戈里亞《沖突》[837]，第97頁。

[[39]](#_39_10)《朱副主席在新疆軍區和生產兵團視察作重要指示》，《解放軍報》1958年9月26日；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紅旗》1958年第10期。轉引自扎戈里亞《沖突》[837]，第102—103頁。

[[40]](#_40_10)同上書[837]，第99、126頁。

[[41]](#_41_10)同上書[837]，第125—126頁。

[[42]](#_42_10)關于蘇聯顧問在1958—1959年間的經歷和批評的扼要重述，見O.B.波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1945—1973年的中蘇關系簡史》[58]，第144—145頁。

[[43]](#_43_10)李儕今（音）：《共產黨中國對老撾的政策：個案研究，1954—1967年》[429]（以下簡稱《老撾》），第52頁。

[[44]](#_44_10)艾倫·S.惠廷：《中國的威懾微積分學：印度和印度支那》[786]，第1章詳述了在西藏的秘密活動的證據。

[[45]](#_45_10)李儕今：《老撾》[429]，第55頁。

[[46]](#_46_9)《人民日報》，1月8日；北京電臺，1月11日；《人民日報》，1月22日；《大公報》，1月23日；李儕今：《老撾》[429]，第65—66頁。

[[47]](#_47_9)李儕今：《老撾》[429]，第74頁。

[[48]](#_48_9)梅爾文·格爾托：《中國與東南亞，生存政治學》[286]（以下簡稱《生存》），第62頁。

[[49]](#_49_9)譯者按：劉少奇當時并未訪問金邊，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是1960年12月19日在北京簽署的。

[[50]](#_50_9)約翰·H.巴奇利：《緬甸與中國》[15]，見A.M.哈爾珀恩編《對華政策：六大洲所見》[287]，第308頁，

[[51]](#_51_9)中國得到面積為59平方英里的3個村子和佤族地區的73平方英里土地；緬甸得到“1941年線”上6個村子中的4個，加上南碗指定區的85平方英里土地，見梅爾文·格爾托《生存》[286]，第95頁。

[[52]](#_52_8)戴維·莫辛戈：《中國的印度尼西亞政策，1949—1967年》[535]，第141—145頁。

[[53]](#_53_7)同上書[535]，第146頁。

[[54]](#_54_7)戴維·莫辛戈：《中國的印度尼西亞政策，1949—1967年》[535]，第165—166頁。

[[55]](#_55_7)同上書，第180頁及以下各頁。

[[56]](#_56_6)哈羅德·C.欣頓：《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297]，第285頁。

[[57]](#_57_6)同上書[297]，第287頁。

[[58]](#_58_6)哈羅德·C.欣頓：《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297]，第289頁。

[[59]](#_59_6)《人民日報》，1963年11月2日，見吉廷斯《概觀》[268]，第114頁。

[[60]](#_60_6)《塔斯社聲明》，1959年9月9日，同上書[268]，第326頁。

[[61]](#_61_6)同上書[268]，第114頁。

[[62]](#_62_6)同上書[268]，第115頁。

[[63]](#_63_6)《塔斯社聲明》[268]，第115頁。

[[64]](#_64_6)《北京周報》[568]，1959年9月22日。

[[65]](#_65_5)同上[568]，1959年10月6日。

[[66]](#_66_5)扎戈里亞：《沖突》[837]，第282頁。

[[67]](#_67_5)《北京周報》[568]，1966年7月1日。

[[68]](#_68_5)《蘇聯政府聲明》，1963年9月21日，見吉廷斯《概觀》[268]，第96頁。根據這個說法，“中國領導人充耳不聞”。

[[69]](#_69_5)全文見G.F.赫德森《爭論》[343]，第66頁。

[[70]](#_70_4)同上[343]，第93—94頁。

[[71]](#_71_3)《中蘇爭論及其意義》[75]，中央情報局，1961年4月1日，絕密#142274—b（以下簡稱《意義》）。原為絕密，本文引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莫斯科和莫斯科會議前起草聲明期間的三次對抗的第一手報道。其中許多材料為1963年的公開論戰所證實。

[[72]](#_72_3)N.S.赫魯曉夫：《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0年6月21日，見吉廷斯《概觀》[268]，第346—347頁。

[[73]](#_73_3)同上書[268]，第350頁。

[[74]](#_74_3)《北京周報》[568]，1963年12月6日，見吉廷斯《概觀》[268]，第142頁。

[[75]](#_75_3)《蘇聯政府聲明》，1964年8月14日，同前[268]，第137—139頁。

[[76]](#_76_3)《意義》[75]，附錄，第4頁。

[[77]](#_77_3)同上書附錄，第33頁。

[[78]](#_78_3)同上書附錄，第25—26頁。

[[79]](#_79_3)當時作者可以利用的情報。對這個時期和這些問題的全面論述，見惠廷《中國的威懾微積分學：印度和印度支那》[786]，第1—5章。

[[80]](#_80_3)艾倫·S.惠廷：《中國的威懾微積分學》[786]，第63—64頁。

[[81]](#_81_3)《中國政府發言人聲明》，1963年8月15日，見約翰·吉廷斯《概觀》[268]，第186—187頁。

[[82]](#_82_3)《人民日報》，1963年3月8日，見丹尼斯·J.杜林《中蘇沖突中的領土要求》[206]，第30頁。

[[83]](#_83_3)《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1963年9月6日，同前[206]，第32頁。

[[84]](#_84_3)《蘇聯政府聲明》，1963年9月20日，同前[206]，第32頁。

[[85]](#_85_2)《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4年2月29日致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同前[206]，第37—38頁。

[[86]](#_86_2)《世界周報》（SekaiShubo），1964年8月11日，同前[206]，第43—44頁。一種權威的但非官方的中文本，見《萬歲》（1969）[507]，第540—541頁，證實了日本人的報道。

[[87]](#_87_2)《北京周報》[568]，32，1964年8月7日。

[[88]](#_88_2)艾倫·S.惠廷：《中國的威懾微積分學》[786]，第176—177頁。

[[89]](#_89_2)梅爾文·格爾托：《生存》[286]，第12—13頁。

[[90]](#_90_1)《人民日報》社論，1964年1月21日；又見《北京周報》[568]，4，1964年1月24日。

[[91]](#_91_1)J.D.阿姆斯特朗：《革命外交》[12]，第224頁。

[[92]](#_92_1)哈利德·B.賽義德：《巴基斯坦與中國》[624]，見哈爾珀恩《對華政策：六大洲所見》[287]，第258—259頁。

[[93]](#_93)梅爾文·格爾托：《生存》[286]，第65頁。

[[94]](#_94)同上書，第100頁。

[[95]](#_95)莫辛戈：《印度尼西亞》[535]，第208—209頁。

[[96]](#_96)《北京周報》[568]，1964年7月17日。

[[97]](#_97)周恩來總理1965年1月24日在為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蘇班德里約舉行的宴會的上講話，見《北京周報》[568]，1965年1月29日。

# 后記

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記錄是勝利與悲劇參半。它的初期證明是建國努力的驚人成功。和平統一的恢復所產生的普遍安心情緒，有助于新政府很快確立威信。經濟恢復，通貨膨脹得到控制。土地改革和城市的一系列運動，表明這個政權樂意使用各種強迫形式包括死刑以消滅反對者和恐嚇潛在的批評者。黨的國家迅速地控制了社會的各個階層。

盡管這些任務異常巨大，中國領導人也感到有足夠的信心在朝鮮戰爭中打敗美國人。結果，戰爭的成就幫助鞏固了政權，加強了中國與到那時為止多少對它有些警惕的蘇聯的同盟。到1953年簽訂停戰協定時，中國領導人按照蘇聯的樣板并在蘇聯的幫助下開始了他們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5—1956年，在毛的指揮下，中國共產黨表現出它的精湛的組織技巧，在幾個月內使中國的五億農民集體化了（這個過程在蘇聯用了好幾年，付出了無數生命）。

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它很快得到工業和手工業方面相似成就的補充），容許在國內放松控制，因為政權把注意力中心從意識形態目標轉移到經濟目標上，并為發展的利益謀求盡可能廣泛的聯合。但是，當毛對蘇聯的貶低斯大林運動和匈牙利事件作出反應，并企圖用“百花齊放”和整風運動進一步緩和黨的統治方法時，這個試驗就在他的面前爆炸了。接著，1957年的“反右運動”使中國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和技術領導停止活動。然而，那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中國人可以祝賀他們自己在富強的道路上邁出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第一步。盡管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已經被它的亞洲鄰人看成初期的超級大國。

但中國的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被他們初期的成功引入了歧途。他們對緩慢的發展步子不耐煩，將它歸咎于蘇聯的方法而不是中國的落后。他們的革命勝利告訴他們，人民能夠戰勝明顯地占壓倒優勢的敵人。決定的因素是具有勝利意志的“群眾”的精神，而1949年勝利后，在一系列由“階級斗爭”觀念支持的群眾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動員人民的技巧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中國城市和鄉村的經濟與政治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將在最后一卷考察這個變化對中國城鄉居民的影響。對蘇聯的工業化模式大失所望，對延安的比較簡單、較少城市氣的、集中化的生活的懷念，使毛和他的同事們設想出一個戰略，要利用中國眾多的人力資源去完成經濟發展。如果中國守紀律的千百萬人，組織在新發明的人民公社中，難道大自然就不能像國民黨軍隊那樣被制服嗎？

“大躍進”的悲劇和它導致的數百萬人的死亡，是這種極端的狂妄自大的代價。在它陰暗的余波中，中國領導人似乎同意了設法恢復經濟的極大重要性。“大躍進”的災難性政策被拋棄了；人民公社制度被大幅度修改。到1965年，主要的經濟指標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時間和生命已經損失了，但也許痛苦的經驗將來會對這個政權有幫助。“大躍進”引起的政治創傷，導致少數長征領導同志的失寵和它的主要發起人毛的丟臉。毛從政府退下來，但他的同事們努力用物質刺激來獲得經濟增長使他苦惱。可是，在中國領導的最高層，曾經在過去的共產主義運動中起過良好作用的廣泛團結，表面上似乎是完整的。中國人民已被證明的恢復力，表明一個新的開始是可能的。

但是不然。在“大躍進”中，北京和莫斯科在種種政策問題上的醞釀中的爭論，開始沸騰了。一當中國人堅持他們的權利，向莫斯科的全球戰略提出質問時，俄國人突然撤回了他們的技術援助人員。蘇聯人的橫暴，重新喚起了中國領導人對百年來列強凌辱的憤怒。蘇聯在中印邊界爭端中的中立，似乎是對國際共產主義團結的背叛。美國、英國和蘇聯在1963年的部分禁試條約上簽字，在中國人看來是一個證據，證明蘇聯領導人已經拋棄中國——和列寧主義——而贊成遷就美帝國主義。北京在論戰中嚴厲地談到資本主義在革命故鄉的復辟。

也許所有的中國高級領導人都對蘇聯對待他們國家的態度感到憤慨。幾乎可以肯定，他們也同意在“大躍進”的災難之后，在國內應當做些事來恢復黨和人民的信心。似乎只有毛得出這樣的教訓：若不采取激進的、緊急的措施，中國將跟隨蘇聯走上修正主義的錯誤道路。

雖然在毛的老同志中很少有人能認識到這一點，但長征—延安一代人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對大多數中國領導人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頭15年的經驗培養出一個信念，即經濟發展和人民幸福必須優先于社會工程。越南戰爭的擴大，有把中國再次卷入同美國沖突的危險；應當避免國內斗爭。

但是，毛現在明顯地愈來愈想到自己的死，害怕若不動徹底的外科手術，和他的名字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革命，就將變成一場徒勞。在我們的最后一卷里，我們將跟蹤他的思想發展，記述他在中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分析這動亂的10年對中國人民和他的后繼者的影響。

在目前這一卷里，某些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主題已經出現：開國統治者的決定性作用，這是因為他要按照他的觀念塑造新的政權并且走在那些幫助他創業的伙伴的前面；統一中國作為承擔天命的最終證明的極端重要性；絕對必須有一種正統意識形態來說明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需要一個官僚主義精英集團來闡釋這種意識形態并貫徹它的教導。

但到1965年已經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簡單地是變大了的舊的最高權力。復興是傳統中國的神話，即使不是它的現實；這個國家的新統治者的口號是變革。現代通訊技術幫助他們控制人民，這是最妄自尊大的皇帝所夢想不到的。他們致力于現代化是在削弱傳統社會；即使變化來得比他們希望的慢，那也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急躁——特別是毛的急躁，但也有他的同事們的急躁——破壞了過去的節奏。他們認識到，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在顯赫的孤立中我行我素的中央王國。在中國之外，有一個需要趕超的不按北京的鼓點行進的更廣大的世界。但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領導人囿于一個信念，認為他們能夠單獨地完成這個任務。他們自己的愚行加上外部危險，最后使他們認識到事情并非如此。這種無知的結局將是我們最后一卷的一個重要主題。

# 參考文獻介紹 政治掛帥：略論1949年后的中國研究

這篇文章安排在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具體方面的各章書目介紹之前。它通過鑒別有關當代中國的主要資料，說明它們的主要局限，評價外國研究者可以到手的變化著的混雜在一起的資料的意義，探索關于中國的學術著作的發展。

研究1949年后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學者，面臨許多嚴重的約束。當代中國的研究者學習使用駁雜的資料：大陸的中文報紙及其譯文，逃亡者和西方居民的敘述，對逃亡者和海外華僑的訪問，小說，外國政府的分析（有時部分地根據秘密得到的情報），從個人觀察推知的情報和在中國的實地調查。由于這些資料的每一種都有固有的局限性，研究中國實質上就是從多種多樣的資料中尋找匯合點。如果各種資料指向一個相似的方向，研究者可以多少相信結論的確實性，但當資料指向根本不同的方向時，分析者就必須具有合格的判斷力，并設法調和明顯的不一致。

但在談這些問題之前，對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困難再作一點一般的觀察，我想是適當的。主要的困難是：中國政府的保密；大多數外國學者，在1979年以前不能在中國進行研究，因而必須倚賴斷續而不完整的資料去研究現實社會，以及可資利用的各種資料的意外中斷。可以得到的資料既闡明中國也歪曲中國的程度，使研究者在方法論問題上徘徊了30年。

保密的傾向明顯地表現在中國政府拒絕公布1959—1978年的任何可靠的統計數字。不愿意透露“大躍進”失敗到什么程度、對國家安全的極度擔心、“文化大革命”中統計網點的破壞，以及一種深深植根于文化的對保密的偏愛，合起來使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成了一個真正的謎。生產統計資料、人口數字、政府的收入與支出、個人收入與消費、外貿情報、就業統計、黨和政府重要會議的記錄、法律簡編、官員的任免情報、政治和軍事官員的傳記資料，所有這些都是不可能得到的。外國政府和西方學者用了很大的精力收集這些資料，這種情況的存在一般被視為當然。從1978年起，中國政府逐漸開始公布統計數字，并企圖重建其中幾年的資料。但國家一級的許多重要統計數字仍然無法得到，省一級的資料仍很罕見，而許多可以得到的統計數字或者使人感到迷惑，或者是不準確的。

外國學者遇到的又一個難題是：在1979年以前，就研究的論題來說，中國實際上關上了大門。誠然，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曾有幾家西方和日本的報紙派記者駐在北京，而從1949年起，幾乎一直有一些西方大學生在中國的大學里學習。西方外交官也偶爾發表他們對北京的印象。但是，西方人是被隔離的，不得進入研究的圖書館，不能自由旅行或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持續地住一個時期。在中國確有西方僑民受雇于政府，但他們的著作相當缺乏批判力而且膚淺。在1979年之前，就一切實際論題來說，都不得不在遠處研究中國。用以了解現實社會的可供選擇的材料，都必須予以扶植。

為了補償，西方學者在香港建立起一個研究基地，那里的主要檔案集中在聯合研究所（URI）和大學服務中心（USC）。那時在這些檔案館里的研究，是把對中國逃亡者的訪問整理成有關當代中國各方面的專題著作。[[1]](#_1_Tuo_Ma_Si__Bo_En_Si_Tan____Sh)對香港提供情報者的訪問本身，成了一門藝術，研究者得知道逃亡者的所長與所短。他們的局限是：大多數提供情報者來自中國南方和沿海，他們中間缺乏比較高的官員，難于估計他們的可靠性和他們可能有的政治偏見。這些缺陷中的大多數，可以通過富于想象力的然而又是嚴格的訪問程序得到斟酌和考慮，但有時候由于提供情報者相對的少和無法將他們置于他們的住所或工作場所的背景下，給這個情報來源帶來了限制。1979年中國對外國人的研究實行開放，并沒有擴大到允許社會科學家去采訪在統計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人口抽樣實例，或在一個持續的時期內對現實社會進行觀察。因此，訪問逃亡到香港的人，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即使是有缺點的當代中國資料來源。

另一個困難是原始資料的不連續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個35年中，只有少數出版物沒有中斷。《人民日報》、上海《文匯報》和政府的雜志《新華月報》（從1956—1961年改為《新華半月刊》），是唯一想得起來的三種。“大躍進”以后，許多雜志和報紙停止賣給外國人，其他的出版物則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

部分地補償這種不連續性的，是一系列獨特而有啟發性的資料，對不同時期有用，并對研究有重大影響：（1）朝鮮戰爭后，有的中國戰俘愿意被送往臺灣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提供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情況；[[2]](#_2_Jian_Wei_Lian__Bu_La_De_Bo_Le)（2）中國洗腦技術的美國犧牲者，在50年代中期被釋放，他們的敘述闡明了中國人使用小組壓力的技巧；[[3]](#_3_Luo_Bo_Te__Li_Fu_Dun____Si_Xi)（3）1957年“百花運動”中迸發出來的對這個政權的看法；[[4]](#_4_Dan_Ni_Si__Du_Lin____Gong_Cha)（4）可以利用《工作通訊》，這是人民解放軍的一種內部刊物，臺灣獲得1961年的許多期；[[5]](#_5_J_Qie_Si_Te__Zheng____Zhong_G)（5）1962年，一批難民流入香港；[[6]](#_6_Bao_Da_Ke_He_Wo_Ge_Er____Gong)（6）1962—19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關于福建連江縣和廣東寶安縣的文件；[[7]](#_7_Mo_Li_Si__Fu_Li_De_Man____Zho)（7）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小報；[[8]](#_8_Li_Hong_Yong__Yin_____Zhong_G)（8）1972年中央委員會敘述林彪事件的秘密文件；[[9]](#_9_Gao_Ying_Mao_Bian____Lin_Biao)（9）1976年鄧小平的反對者散發的對鄧在1975年復出時期的政策進行譴責的文件；[[10]](#_10_Ken_Ni_Si__Li_Bo_Ta_Er_Deng)（10）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群眾發表的意見；[[11]](#_11___Ge_Ming_Shi_Chao_____395)（11）1977年敘述“四人幫”罪惡的中央委員會秘密文件；[[12]](#_12_Wang_Xue_Wen__Yin______Si_Re)（12）1978—1979年民主墻運動中的大字報和刊物；[[13]](#_13_Zhan_Mu_Si__Tong__Yin__Bian)（13）1980—1981年對“四人幫”和林彪的同謀進行審判時發表的起訴書。[[14]](#_14_Zui_Gao_Ren_Min_Fa_Yuan_Yan)

這些資料引起相當大的注意，但不清楚它們所提供的見解是只限于所涉及到的具體時間、地點、問題呢，還是一般說來都適用。資料缺乏連續性和短期內資料的突然增多，也許使中國看起來比實際上更動蕩，更不安定，更反復無常。資料的不連續性使人很難準確地指出趨向。

還有一個問題是這篇文章想要部分地解決的，就是關于掌握原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的目錄。收錄中國電臺廣播的幾個主要翻譯機構，它們的目錄一般得不到。最近幾年，許多帶有“內部”標志的中文書，已經在西方出現，但沒有一個中心協調組織來指出什么書可以得到。各種曇花一現的材料——在中國的旅行日記和報告，同中國有往來的機構的香港會談記錄和業務通訊——在許多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都可以找到，但它們通常都沒有編目，或在目錄中看不出它們的內容。

對第二手資料的掌握，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一大難題。這些問題引起的后果是，精明的內行學者養成了讀腳注的習慣。一本書到手，先查腳注，看有沒有新的資料。

[[1]](#_1_11)托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中國青年從城市走向農村》[43]；杰羅·姆·A.科恩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程序入門，1949—1963年》[179]；理查德·所羅門：《毛澤東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674]；伊日拉·F.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一個省城的規劃與政策，1949—1968年》[749]；林恩·懷特：《在上海的經歷：在一個發展中的中國城市里涉及個人能力的社交指南，1949—1966年》[782]。

[[2]](#_2_11)見威廉·布拉德伯雷《群眾在戰斗與被俘中的表現：朝鮮戰爭中的共產黨戰士》[61]；亞力山大·喬治：《行動中的中國共產黨軍隊：朝鮮戰爭及其余波》[265]。

[[3]](#_3_11)羅伯特·利夫頓：《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對中國“洗腦”的研究》[454]；埃德加·H.斯凱恩：《中國人對戰俘的灌輸計劃》[627]，見《精神病學》，19.2（1956年5月），第149—172頁；埃德加·H.斯凱恩等：《強制的勸說》[628]。

[[4]](#_4_11)丹尼斯·杜林：《共產黨中國：學者反對派的政見》[205]；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百花運動和中國的知識分子》[493]；聶華苓：《百花文學》[552]。

[[5]](#_5_11)J.切斯特·鄭：《中國紅軍的政治：人民解放軍〈工作通訊〉的譯文》[122]；約翰·威爾遜·劉易斯：《中國的保密軍隊報紙：“牽連”與“揭發”》[440]，見《中國季刊》[133]，18（1964年4—6月），第68—78頁；拉爾夫·L.鮑威爾：《共產黨中國的軍政關系》[587]。

[[6]](#_6_11)鮑大可和沃格爾：《共產黨中國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權》[28]；科恩編：《刑事程序》[179]；盧西恩·派伊：《中國人的政治精神：政治發展中的危機的心理文化研究》[592]；理查德·所羅門：《毛的革命》[674]；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749]。

[[7]](#_7_11)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人的家系與社會：福建和廣東》[256]；S.C.陳和查爾斯·P.里德利：《連江縣的農村人民公社》[102]。

[[8]](#_8_11)李洪勇（音）：《中國文化革命的政治：個案研究》[430]。

[[9]](#_9_11)高英茂編：《林彪事件：權力、政治和軍事政變》[384]。

[[10]](#_10_11)肯尼思·利伯塔爾等：《中國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治》[453]。

[[11]](#_11_11)《革命詩鈔》[395]，兩卷；蕭蘭編：《天安門詩鈔》[821]。

[[12]](#_12_11)王學文（音）：《“四人幫”事件：中共中央文件的正式揭露》[764]，見《問題和研究》[358]13.9（1977年9月），第46—58頁。

[[13]](#_13_11)詹姆斯·佟（音）編：《中國的地下刊物》[719]，見《中國的法律與政府》[136]，第一部分，13.2—3（1980—1981年秋冬），第二部分，14.3（1981年秋）；詹姆斯·西摩：《第五個現代化：中國的人權運動，1978—1979年》[651]；戴維·S.G.古德曼：《北京街頭的呼聲》[272]。

[[14]](#_14_1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記事》[727]；《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審判：審判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1980年11月—1981年1月》[276]。

## 基本資料及其局限

#### 中國出版物

中國出版物——書籍、刊物和報紙為研究中國提供了主要的資料。這些資料來自這個政治體制的各個機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它進駐北京之后不久，出版了《人民日報》，并從1958年起，出版《紅旗》雜志作為它的指導性理論刊物。國務院出版一份公報，刊登主要指示。[[1]](#_1___Zhong_Hua_Ren_Min_Gong_He_G)

在一次重要的全國性會議，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共青團或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大會之后，通常都有專刊。一本小冊子匯集了會議的主要文件：高級領導人的講話、指示、決議，等等。中央各部、各省、大學、研究院和群眾團體如婦聯和共青團，一般都有各自的出版社，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中（1966—1976年）陷于癱瘓外，出版了許多書籍、小冊子、刊物和報紙。從20世紀50年代起，許多地區或專區和縣都出版報紙，在“大躍進”時期以后中斷。在毛以后時期，地方出版社開始出版地方志、地方文學作品和一些刊物。

建立書目管理

研究者的一大難題是建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書籍、刊物和報紙的書目管理。中國出版的兩種書目對此是有幫助的：期刊《全國新書目》和年刊《全國總書目》。這兩系列的目錄書和小冊子在大陸出版，按主要的論題類別把書名分類。中國國外的主要圖書館，擁有這兩系列書目中的絕大多數，在大陸中國的圖書館中，不難得到全套。但這兩個系列的書目，有著嚴重的局限性。

有許多書名在西方圖書館中根本沒有實際用處，在大陸圖書館也往往找不到書。而且，有些在大陸印刷的非常有趣和有用的書籍和小冊子，既不在《全國新書目》中，也不在《全國總書目》中。這些出版物帶有“內部”的標志。它們所包含的材料，出于各種理由，使作者或政府認為是敏感的，因此不允許在非中國人中間流傳，或法律禁止帶出這個國家。這種機密或秘密材料（大多數是1949年以后時期的）沒有列入大陸的書目。因此，根據中國書目編纂一本引人注目的書名目錄，用處是有限的。對書籍和小冊子的書目管理，最后只能通過孜孜不倦地梳理中國國內外圖書館的目錄，通過獲得出入書庫的機會，以及通過擁有私人收藏的西方和中國學者的幫助，建立起來。

建立對刊物和報紙的書目管理是另一件事。大多數主要報紙出版詳細的索引。《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的文章，分類編入《人民日報索引》和《光明日報索引》。有幾種地區和省的報紙，如《南方日報》也出版索引。除《人民日報索引》可完全得到外，其他報紙索引西方圖書館一般只有部分收藏，但大陸圖書館往往全都有。

另一種極有用處的索引是《全國主要報刊資料索引》。它的文章分類比較精細，而且有不少期甚至涉及“內部”刊物的文章。西方圖書館有這個索引1955—1959年的全部和20世紀60年代與70年代的零星部分，但在許多大陸圖書館可以看到全部。在廣泛收藏省級報刊的中國圖書館使用這個有價值的書目，對研究確定好的題目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使用中國報刊的一個主要困難，是發現它們的存在。許多是屬于“內部”保密級的，因此《全國總書目》不常提到。這個書目也不提出版物的性質。《當代中國研究指南》出版于1967年，仍然是對中國定期出版物的一個獨一無二的指南，它開列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許多部級刊物，其中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到70年代才恢復。[[2]](#_2_Bi_De__Bo_Dun_He_You_Jin__Wu)

有了定期出版物的名單以后，研究者面臨一個新的難題：到何處去找這些刊物和報紙？西方收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紙和期刊，一般沒有聯合目錄。確有幾個部分目錄，[[3]](#_3_Te_Bie_Can_Jian_G_Lei_Meng_De)但如今已過時。研究者別無選擇，只好到一些主要的收藏當代中國資料的地方去尋找：在澳大利亞，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和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在英國，有大英博物館和東方與非洲研究院；在法國，有國立圖書館（巴黎）；在西德，有亞洲情報研究所（漢堡）；在香港，有大學服務中心、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在日本，有國立議會圖書館、經濟發展研究所和東洋文庫；在瑞典，有大學圖書館（斯德哥爾摩）和隆德大學圖書館；在臺灣，有國際關系研究所和調查局；在美國，有國會圖書館（華盛頓）、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伯克利）、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紐約）、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密歇根大學亞洲圖書館（安阿伯）、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托）、華盛頓大學遠東圖書館（西雅圖）。

另一個選擇是利用中國的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市圖書館是主要的知識庫，中國科學院的社會科學圖書館和幾所大學的圖書館也有豐富的藏書。北京圖書館從1949年起，出版一種有用的館藏報紙目錄，它透露出收藏的廣泛，有全國性的、省的，甚至有省以下的報紙。[[4]](#_4___Bei_Jing_Tu_Shu_Guan_Guan_C)

有三種有價值的報刊文章匯編或摘要值得提到：《復印報刊資料》，聯合研究所的剪報檔案，《新華月報》。人民大學編輯出版一種全年合訂本，收入重要的或有啟發性的文章，題目范圍很廣泛。這個系列和《復印報刊資料》，是翻印人民大學的剪報檔案。它顯然是在1978年以后開始出版的，在1980—1981年向外國人開放。1982—1983年，標上“內部”，繼續向全國的許多圖書館分送，1984年重新向外國人開放。在中國以外，聯合研究所在它的香港檔案館繼續保持剪報服務。這種服務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一直很活躍，此后逐漸萎縮。許多西方圖書館得到的是縮微膠卷檔案，香港浸禮會學院得到原檔案。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這個檔案特別豐富，當時聯合研究所有一個進取的與基金充裕的計劃以獲致中國出版物，并有一個勝任的班子剪輯和整理檔案。的確，聯合研究所的剪報檔案對60年代和70年代初寫成的專題著作，提供了大量的參考文獻。[[5]](#_5_Li_Zi_Shi_Yue_Han__Wei_Er_Xun)

中國人出版一種定期的主要報刊文章的摘要。從1949年起，《新華月報》以月刊的形式出現（從1956—1961年，以半月刊的形式出現，名為《新華半月刊》）。這種篇幅很大的出版物，平均200—250頁，內容是重要的指示、講話、社論、評論、新聞電訊，以及每月的大事記。1979年，《新華月報》變成專門的檔案刊物，即政府和黨的政策的一種半官方公報，同時出現一個新的姊妹刊物《新華月報文摘版》（后名《新華文摘》），重印全國各地報刊上有關歷史、經濟、哲學、文化、政治的文章，以及短篇小說和詩歌。

中國出版物的局限和機會

使用中國出版物帶來難題和限制。出版物由國家控制，為統治者的目的和官僚機構的多種多樣的組織利益服務，官僚機構控制著各個出版社。中國的新聞事業缺乏獨立、批評和盡責的傳統，社會科學則缺乏超然的傳統。出版物公開承認為宣傳任務服務，宣傳當前的政策（通常是說好），詆毀先前的、被拋棄了的政策。相當大一部分國內報紙所報道的“新聞”，在西方記者看來不是新聞，而是對當前政策的解釋（它可以巧妙地不同意某些部分）和來自模范單位的報道，這些單位成功地貫徹了國家的政策，或來自地方的報道，講這些地方由于忽視政策而陷入了明顯的困難。報道外交事務，也傾向于恪守官方的政策。

只是在毛澤東以后的時期，才開始出現一些書籍和刊物，以系統的方式分析國內政策的效果，或闡明政治、社會和經濟過程。例如，新華社從1981年起出版的一種發行很廣的期刊《瞭望》，報道中南海（北京的政府所在地）的個人活動與考慮過程。高級官員寫的不少回憶錄，透露了從20年代到毛去世時的黨內人物、作風和政策爭論的一鱗半爪。小冊子和報刊文章開始講述1949年以來高層政策斗爭的發展情況。除毛以外的高級官員的演講和著作集開始出現；如朱德、陳云、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鄧小平等人的選集，現在可以得到。社會科學刊物的數目日益增加，開始從各方面詳談當前的政策選擇，并透露反官僚主義的爭論意見。看來這些小冊子是真想把中國的某個方面告訴一個感興趣的讀者，而不是向讀者說教，那個方面為什么是有利的。

但所有這些都是最近才有的事，在1949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代里，把出版物作為可靠的資料來源有效地加以利用，是一門藝術。中國以外的學者研究出各種技巧，以比較精確的方式翻譯難解的中國出版物。例如，中國外交政策的觀察家仔細檢查新聞媒介中的所有聲明，以了解中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態度的發展，如參加朝鮮戰爭，中國在1958年金門一馬祖危機中的舉動，在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和中蘇爭論中的表現。[[6]](#_6_Jian_Ai_Lun__S_Hui_Ting___Zho)從這些研究中了解中國人表示他們意圖的方式，中國人在危機中的表現，中國對雙邊關系的處理。研究高層政治斗爭的學者，仔細檢查《人民日報》刊登的領導人照片中誰出現，誰缺席，和他們排列的位置，注意領導人宣布當前口號所用的不同順序（例如，領導人是說“抓革命，促生產”呢，還是“促生產，抓革命”？），留心領導人引用了哪一位元老的話（只引用毛澤東的話？劉少奇的話引用沒有？等等），仔細閱讀有關一個領導人的新聞，他以前負責別的領域，而現在有了新的職務（撤去以前的職務和任命新的職務都沒有正式宣布）。從無數這樣的線索中，西方解釋出1955—1956年關于農業合作化的爭論，1956—1957年對知識分子政策的爭論，和在“大躍進”問題上高層領導人之間的分裂。[[7]](#_7_Yan_Jiu_Zhong_Hua_Ren_Min_Gon)值得注意的是，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毛以后時期透露出的情況，表明這些解釋雖不是在每個細節上都正確，但在大體上是正確的。

同樣，在分析政策的貫徹執行和進行社會學的分析時，也開始采用新的策略。一種顯而易見的方法是閱讀所有能夠得到的關于一個具體現場的材料，對那個現場作詳細的考察，再通過訪問豐富這些資料。[[8]](#_8_Lin_En__T_Huai_Te_Di_San____Z)另外一種方法是研究一個具體政策的發展和它在一個時期內的貫徹，[[9]](#_9_Guan_Yu_Jiao_Yu__Luo_Bo_Te__T)還有一種方法是考察一個或一套機構，利用所有能夠得到的關于這個組織的材料：有關它的法律條文，談到它的任務的講話和文章，有關它的下屬機構的文章，等等。[[10]](#_10_Qiao_Zhi__N_Ai_Ke_Long____We)這種研究通常主要依賴所要調查的機構控制下的出版物——例如，研究青年團，要從青年出版物中取得大量材料；研究工會，要從工會出版物中取得大量材料，等等。（研究人民解放軍除外，因為軍隊出版物通常是高度保密的，不能得到。）不論是把注意力放在一個具體的現場，還是放在政策問題或是機構上，依賴出版物都會碰到問題。出版物談結構而不談過程，更注意正式的而不是非正式的方面。它使人感到中國的機構是有效率和勝任的，它暗示政策是符合實際的，它示意全國是一致的。雖然這些意見準確地傳達了來自北京的想法，但實際情況往往離政策很遠。中國比它的精英人物通常承認的要參差不齊得多——至少在毛澤東的時期是如此。

結果是促進了另一種使用出版物的策略：把資料聚集起來，把事例放在它們特定的背景中，從中國極大的多樣性導引出可以證實的假設。例如，在研究企業管理時，斯蒂芬·安多斯和安德魯·瓦爾德用了187個從出版物上搜集來的管理實例，驗證何種類型的工廠在一個時期內運用特殊的管理形式。安多斯和瓦爾德想知道哪一類工業（重、輕或化學）更易采用工人參加管理，或干部參加勞動。理查德·鮑姆根據廣東報紙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在農村的后果，仔細標出它們的地理位置，以確定哪一類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在1966—1969年的動亂中受害。[[11]](#_11_An_Duo_Si____Zhong_Guo_De_Go)

在不同的研究中，約翰·伯恩斯和伊麗莎白·佩里都仔細閱讀出版物中有關農民的政治表現的報道。伯恩斯由此發展出一種類型學，研究農民如何追求他們的政治利益，而佩里則探索引起農民參加暴力抗議的情況發展。[[12]](#_12_Yue_Han__Bo_En_Si____Zhong_G)弗雷德里克·泰韋斯仔細閱讀省一級出版物，以估計各省響應中央各種計劃的程度，然后通過參照各省的某些政治與經濟條件，對這種響應作出解釋。他按響應的程度排列各省，又按黨組織的強弱或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排列各省，驗明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13]](#_13_Fu_Lei_De_Li_Ke__Tai_Wei_Si)

這些以及其他的研究嘗試，仔細地積累了許多實例、事例、行為或實踐的例子（包括工廠管理、省里對中央指示的響應，或農民的利益追求等類型），這些是研究者想了解的。行為類型學于是發展起來，并根據類型學，把記錄下來的實例加以分類。運用社會科學的一種傳統方法，這些實際應用被看做因變數。分析者的任務是通過參照行為發生的不同場合，解釋實例在不同行為類型中的分布狀況。這樣，盡管大陸的出版物有缺陷，仍然可以用來對彼時彼地的特殊現象的變化試著進行解釋。不過，這些分析的正確性，多少仍有待證明。出版物沒有提供一個有代表性的樣品；能從出版物上搜集到的實例，通常數量很少，不允許使用復雜的質量分析技術；對實例的來龍去脈知道得不夠多，不能驗證和衡量所有有關的自變數。

中國出版物的翻譯

中國出版物是大多數問題必不可少的情報來源。自然，某些問題完全被排除在出版物的論述范圍之外：自然災害和大的政策失誤，如1960—1962年的饑荒與營養不良的程度，或“文化大革命”的恐怖與死亡；政策在黨的高層的形成過程；公安系統的組織與任務；人事制度（任命、升遷與免職是怎樣作出的）；確定與變更價格的方法；國家的中間層——省、特區、自治區和縣的組織、職責與作用。不論是在經濟、政治或文化方面，出版物對這個體制的最高層和基層的報道都比中層多。除去這些重大的脫漏外，出版物能使研究中國的學者對當前政策、領導人之間的政策分歧和基層的發展得到一個總的印象。不過，即使在這些題目上，出版物在說明的深度上仍有不足。因此，研究者必須把出版物與其他資料結合起來。

中文出版物的一個重要部分有譯文。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和其他單位，用多種外文出版供海外閱讀的材料。例如，《人民中國》半月刊從1950年開始出版，至1957年由《北京周報》接替，該刊從1958年3月起，用20種以上的外文出版。中國政府由新華社發布一份每日英文電訊稿。1981年，英文《中國日報》開始在北京出版。

外文出版社通過它所翻譯的許多長篇小說和在《中國文學》上發表的短篇小說，提供了接觸中國小說的機會。此外，政府和共產黨的主要聲明、重要講話以及它們的摘要，照例是以小冊子或書籍的形式翻譯出版。這樣，《毛澤東選集》、《鄧小平選集》、每次人民代表大會的文件和中央全會的公報，在中文本出版后不久，就由外文出版社發行。

外國政府把一些中國的譯文編進它們自己的翻譯叢書，并為這些叢書另外翻譯了新聞電訊、報刊文章和書籍。例如，英國廣播公司出版日刊《世界廣播摘要（遠東）》[63]，這套刊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就有了，它收入來自中國的主要新聞的全文或摘要，包括省級新聞廣播的譯文。美國政府已經出版了幾套翻譯叢書。從1950年至1979年，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保持一個很大的出版物監視單位，它發行幾套叢刊：《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1974年后，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報刊概覽》）；《中國大陸雜志選粹》[736]（后來名為《中國大陸雜志選錄》[737]，1974年后更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報刊概覽》）和《當代背景材料》[735]，這是一種題目類似的文章的合編。總領事館為這三個翻譯叢刊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詳細的目錄索引。但這個索引不涉及增補的叢刊，增補的叢刊歸入低級安全保密級，后來才向一般公眾開放。《世界廣播摘要（遠東）》可以訂閱，并且是縮微膠卷，因此許多圖書館都有。總領事館的叢刊，在它們出版的大部分時間里，只發給數目有限的專門研究東亞的圖書館。因此不像《世界廣播摘要（遠東）》那么容易得到，盡管涉及面更廣。

美國政府的外國廣播新聞處提供一種監聽中國廣播的每日匯編。這個匯編以外國廣播情報服務處全球范圍監聽的一部分的分冊形式出版。1967年以前，廣播監聽的中國部分在亞洲分冊里，而在1968年，《外國廣播新聞處（中國）》[250]以單行本出版。按慣例，它只分送給少數圖書館和學者，但后來可以通過預訂得到。香港的出版物監視單位關閉后，《外國廣播新聞處》收入了一些以前《中國大陸報刊概覽》—《中國大陸雜志選錄》叢刊所包含的材料。[[14]](#_14___Wai_Guo_Guang_Bo_Xin_Wen_C)

美國政府的第三種翻譯叢書，是《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374]，它提供1957年以來的中國書籍和報刊文章的英文翻譯（特別是省一級的）。這套叢書的歷史，以及堅持作索引的種種努力，是非常復雜的。只要說一點就夠了，《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改變過幾次，因此有幾種持續時間不同的分類叢書，題目包括農業、科學與技術、地方政治、能源、教育，以及每期《紅旗》雜志的全文翻譯。美國政府以香港為基地的翻譯叢書在1979年6月結束后，《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叢書被冠以《中國報道》（China Report）的名稱，并改為六個分類叢書：農業；經濟事務；政治的、社會學的與軍事的事務；工廠與設備資料；科學與技術；《紅旗》。《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叢書由于它經常變動，沒有一個方便而連貫的索引以供檢索。1957—1960年上半年有一種單獨的索引，而另一位編者編了從1962年至1970年期間的索引。[[15]](#_15_Jian_Li_Cha_De__Suo_Li_Qi_Bi)從1979年起，有的分類叢書偶爾把以前各期的內容匯編成單行本。

還有三種有用的翻譯叢書值得提及。從1955年至1977年，香港的聯合研究所出版的《聯合研究服務》[734]按各個當代題目匯集譯文。M.E.夏普公司從1968年起，出版一系列季刊，每種季刊刊登一個專門領域的譯文：《中國的法律與政府》、《中國的經濟》、《中國的教育》、《中國的社會學》。這些不同的季刊經常出專號。例如，《中國的法律與政府》就出過關于林彪事件、黨的組織、人事管理等專號。一個英國政府機構的香港分支——地區情報處，監聽省級電臺的廣播，出版《省級電臺廣播》（Prouincial Radio Broadcasts）周刊，從1963—1974年，分送少數圖書館、新聞記者和學者。這套優秀的叢刊的有些項目，常常是《外國廣播新聞處》和《世界廣播摘要（遠東）》所沒有的。

除了這些經常性的中文資料翻譯叢書之外，還有許多限定題目的專門匯編。例如，有關下列題目的原始文獻：中國的教育政策，[[16]](#_16_Si_Tu_Er_Te__Fu_Lei_Ze____Zh)農業政策，[[17]](#_17_Zhao_Guo_Jun____Da_Lu_Zhong)經濟組織，[[18]](#_18_Zhao_Guo_Jun____Da_Lu_Zhong)軍事命令，[[19]](#_19_Gao_Ying_Mao_Bian____Ren_Min)中美關系，[[20]](#_20_Luo_De_Li_Ke__Mai_Ke_Fa_Kua)中蘇爭論，[[21]](#_21_G_F_He_De_Sen___Li_Cha_De__L)幾個經過挑選的時期的重要政策聲明，[[22]](#_22_Luo_Bo_Te__R_Bao_Yi_He_Fei_Z)領導原則[[23]](#_23_Yue_Han__W_Liu_Yi_Si____Gong)和專題短篇小說選。[[24]](#_24_Pei_Li__Lin_Ke_Bian_____Ren)

總之，通過翻譯提供接近中文新聞媒介的門路的嘗試是很廣泛的。但覆蓋面很不均衡，欲對大多數問題進行認真的研究需要使用中文資料。幾家全國性大報的文章和社論、高級領導人的講話，重要的國家指示，是容易得到的，而省級報紙、部級刊物以及篇幅跟一本書一樣大的專題論著，并不是都有譯文。由于政府（中、美、英的）對主要的翻譯業務提供經費和管理，它們傾向于為政府眼前的利益和目的服務，而這并不總是同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長遠利益和目的相符。例如，《外國廣播新聞處》叢書在美國情報部門內是廣泛使用的。雖然它的內容包括題目范圍很廣的報道，有家庭生活、社會環境、地方政治等，但它的任務是告訴讀者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的意圖、潛在能力與戰略。《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叢書關于社會環境、地方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情報，比《外國廣播新聞處》多，但它也特別著重于中國的科學發展和涉及美國的商業問題。結果，翻譯叢書在諸如全國性政治、外交政策、軍事和科學論題上的覆蓋面比較廣，而關于黨史、文學、哲學、地方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文章的報道，則不大令人滿意。翻譯的范圍在不同時期也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雖然不能得到確實數字，但可以得到英譯文的中文出版物的百分比在兩個時期可能是很低的：第一，從1949年至1954年，這時西方的監聽和翻譯機構正在建立中；第二，從1978年至今，這個時期中國出版的報紙、刊物和書籍的數量猛增，而翻譯機構沒有相應地增加。覆蓋率最高的時期大概是50年代后期，那時翻譯工作進展迅速；還有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69年），那時中國出版界引人注目地減少了出版物的數量，重復很普遍，而且出版的東西有很多是已經翻譯了的。60年代初期、7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就弄不清了，因為許多先前是公開發行的出版物，被列入“內部”，不允許帶出這個國家。

#### 回憶錄和旅行報告

許多以前在中國居住過的中國人和西方人，發表了感想、回憶、日記，或關于他們在大陸經歷的自傳性記述：40年代后期，聯合國救濟總署的一個技術專家，在農村看見過土地改革；1949年留在北京的一對美國夫婦，被當成外國間諜關進監獄；一個天主教神父在共產黨的革命中受到宗教迫害；一個中國新聞記者在50年代逃到香港；一個學生經歷了她所在大學的改革；一個在朝鮮戰爭中被俘的美國人，他選擇留在中國直到1965年；一個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法國人的人，在走向自由之前，在監獄和勞改營度過幾年；一個在中國的蘇聯科學家，他最后叛逃到西方；一個瑞典外交官，他目睹了“大躍進”后最糟幾年的北京；一個在中國的非洲學生，受到中國的種族歧視；一個加拿大記者，他在60年代中期從北京發出報道；一個在非洲的年輕中國外交官叛逃到美國；一個受雇當英語教師的澳大利亞人，他所在的學院處于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旋渦中；前孫中山廣東軍政府外交部長的兒子，他長期受雇于外文出版社，記述了紅衛兵對外事系統的沖擊；河南省一個年輕的“文化大革命”參加者，同他的美國語言老師結了婚，然后移居到美國；一個英國外交官卷進了1978—1979年的民主墻運動；幾個美國、英國和加拿大記者，他們在毛澤東以后的時代的早期，從北京發出報道。這份名單是上百個這類記述的一部分，傳達了親身經歷者關于在中國生活的非同尋常的故事。[[25]](#_25_Wei_Lian__Xin_Dun____Fan_She)

這些記述為中國的出版物提供了有價值的補充。它們往往談到一些中國出版物所不談或談得不充分的題目：監獄制度；中國生活中觸目的不公正、暴力、壓迫、社會的不斷變動；中國共產黨的嚴密控制和逃避控制的機會。親身經歷者偶爾被卷進政治意義重大的事件，如1957年5月北京大學的“百花運動”，或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親身經歷者參與中國的生活史，看到了出生、結婚、禮拜、養兒育女、找工作、變老、死亡。

由于中國的出版物不肯細講中國的這些方面，由于中國小說喜歡用過分光輝的詞句描寫生活，個人的記述就為社會科學家和社會歷史學家提供了特別重要的材料。例如，《劍橋中國史》第15卷馬丁·懷特的文章，從親身經歷者的記述中汲取了不少材料。但這些記述有著嚴重的局限。顯然，它們并不比觀察者機敏，有許多作者不是很嚴謹、很有察覺力，或很好問。回憶錄往往不完整。許多西方觀察者不會講漢語，從而成了他們的翻譯者的俘虜。許多人本想深入了解中國，結果只是看到了中國。許多中國人報道中國，揀西方人或出版者愛聽的說。還有一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向他們自己或向讀者證明他們的生活是正當的。總之，親身經歷者關于中國的記述，具有這一類固有的缺陷。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在高度分割的社會里練就高瞻遠矚能力的問題，在這樣的社會里，某一職業與居住區的成員，可能很少知道別的地方的發展情況，而由于政策的變化，生活經常是在變動中。結果是，個人觀察的正確性往往受到時間和地點的限制，很難知道這類記述所提供的見識是否具有普遍意義。

一個與此有關的類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短期訪問者的記述。在70年代中國開放以前，這類通常由新聞記者所寫的報道，是大學生和公眾用以窺視所謂竹幕后中國的流行方式。典型的做法是，到北京、某些省城和幾個供參觀的工廠和公社作一兩個月的旅行，然后寫出旅行報告，企圖捕捉住中國的基調。它們的標題就傳達出它們的調子：《我看見了紅色中國》、《中國醒來的時候》、《中國沒有蒼蠅》、《蟻冢》、《黃風》、《大河彼岸》。[[26]](#_26_Li_Sha__Huo_Bu_Si____Wo_Kan)它們對在讀者中形成中國這個時期的形象有影響。瀏覽一下這些書，提醒我們，現時來自中國的報告能夠把人引入歧途到什么程度，特別是如果旅行者進入中國而沒有充分的準備。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往往被忽略，而當前的成功和表面的一致常常被強調。70年代有一個時期，當中國的開放使訪問者在欣快情緒的支配下蜂擁到這片他們新發現的土地時，這種類型的報告增加了。那些得出比較暗淡但比較準確的評價的人，知道反面的報道會危及他們的中國主人和朋友，往往既不談他們的反應，也不私下散布他們的印象。即便是大學里的中國專家，大多數也不太清楚在毛的最后幾年里，經濟困難、政治恐怖和國家精英之間關系緊張的程度。

但有一類旅行報告證明是有用的，這就是訓練有素的職業觀察家對中國有限的方面所作的嚴謹的報告。[[27]](#_27_Zhe_Lei_Bao_Gao_De_Li_Zi_Bao)例如，美國的美中學者交流委員會派出許多科學代表團到中國去考察各個領域的狀況。社會科學家代表團、人文學者代表團，在特定的地方，工程師和技術員也去。其他國家的各種機構也在進行類似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同北京打交道的公司，開始在它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中國的機構作出簡要的描述和評價。有些公司——例如在70年代初獨家承建幾座大型化肥廠的普爾曼—凱洛格公司——對中國有廣泛的暴露。中國雇用的外國人常常寫一些范圍廣泛和引人入勝的有關他們經歷的記事。結果產生許多有關某些學術和商業領域的專題著作和非公開的論文，可以作為基準，用以衡量毛以后時期的連續性與變化[[28]](#_28_Li_Ru__Jian_Mei_Guo_Quan_Guo)這些代表團的成員，也常常把他們的觀察寫進日記或記事，供私下傳閱。這些材料對將來研究70年代的中國，可能十分有用。

同樣有價值的觀察者記事，是同中國人進行談判的政治人物、外交官和軍人的回憶錄。馬修·李奇微和C.特納·喬伊是朝鮮戰爭和板門店和談的美方參加者，他們的兩本朝鮮戰爭記事，對這些題目提供了原材料。1950年下半年印度駐華大使的回憶錄，對中國通過外交手段阻止美國軍隊接近鴨綠江，提供了重要情報。[[29]](#_29_K_M_Pan_Ni_Qia____Zai_Liang)印度外交官阿瑟·拉爾提供了中國人1962年在日內瓦的表現的內幕。[[30]](#_30_A_Se__La_Er____Gong_Chan_Dan)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理查德·尼克松、吉米·卡特、亨利·基辛格、賽勒斯·萬斯、日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亞力山大·黑格、威廉·薩弗埃爾和羅伯特·霍爾德曼的回憶錄，它們記述了1972—1982年的中美關系，描寫了許多中國領導人。寫回憶錄的也不限于比較健談的美國和印度官員。英國、加拿大、荷蘭、法國、日本和蘇聯的官員也記述了他們同中國官員的交往。這些記述不總是準確的，有的則是為個人利益服務的，但它們都有獨特的見聞與見識。

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得以對這些根本不同的并且常常是曇花一現的材料的書目進行核查。少數大學圖書館有計劃地購買所有這些從前的居留者、旅行家和官員所寫的個人記事，但從目錄的書目提要項目，通常既看不出書的種類，也不大知道作者的情況，更不可能請中國高級官員驗證一下該書是否簡化了與他們的會談。這些書對政治史家可能很有用，即使作者當時并不明白會見中所傳達的信息的重要意義。例如，回想周恩來從1971年至1973年對西方人士的許多次會見，其中包含了關于林彪事件和他自己的國內政治斗爭的微妙信息。然而在這些會見中，只有少數幾次被完全和準確地記錄下來，而它們的匯編，西方連一本也沒有。

對曇花一現的材料的取得，甚至更加困難，雖然就美國來說，有三個收集工作是有益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保有它自己的組織檔案，詳細記錄了它早期與中國商業和工業機構的謹小慎微的接觸，并將訪問者記述中國經濟各個方面的文章，編成內容廣博的檔案。這些檔案存放在密歇根大學的杰拉爾德·R.福特總統圖書館。美中學者交流委員會建立了關于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廣泛的檔案，通過全國科學院可以得到它們。最后，密歇根大學的本特利歷史圖書館，依靠一筆基金贈款，建立了中美關系檔案，它企圖收集凡是可以得到的在70年代初訪問中國的美國人所寫的旅行報告，包括私人日記。[[31]](#_31___Zai_Zhong_Guo_De_Mei_Guo_R)

#### 藝術創作

大多數外國社會的研究者，常常發現他所研究的那個社會的藝術創作具有內在的美學價值，但當藝術家經常處于恐怖和政治控制之下時，藝術創作就不會繁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也是這樣，自1949年以來，引起公眾注意的藝術創作很少，看來也不會有持久的價值。中國人民在毛主義時代體驗到的緊張情緒、英雄主義與剝奪，使藝術的被愚弄顯得更加可悲。一個與歷史相稱的詩史時代，在藝術創作中作了不適當的表現。

然而，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卻發現這些藝術創作對許多研究目的是有用的。也許，最沒有充分地加以利用的信息來源是虛構的文學作品：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劇本、歌劇和詩歌。其他的藝術創作則更多地揭示了社會：招貼畫、電影、廣播和電視劇、繪畫、廣告、通俗喜劇，等等。這些材料對經濟學家或政治學家也許不像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或文化史家那樣有直接的重大意義，但它們愈來愈多地被一切社會科學用做了解大眾文化的形成和表現的手段。（我們在這里看到了包括萊維一斯特勞斯和布勞德在內的法國社會學家和社會歷史家在中國研究領域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了對驗證全體居民的共有意識及其對精英人物的影響的日益增長的興趣。）但因為是由國家指導、審查和控制藝術創作，一些不同的藝術形式如小說、兒童故事和招貼畫，就多是表達政治領導人的信念和目標，而很少反映大眾的價值觀念——雖然作品一定要充分體現當前的文化才能使它的信息被理解。

因此，以藝術創作為根據的大多數研究，就是要利用這些材料來弄清楚領導人企圖向大眾反復灌輸的信念和價值觀念。例如，社會學家瑪麗·謝里登利用虛構的文學作品探索英雄模范所做的貢獻，這些英雄模范是中國人民的仿效對象，[[32]](#_32_Ma_Li__Xie_Li_Deng____Dui_Yi)查爾斯·里德利和艾琳·布盧門撒爾在各自的研究中分析兒童讀物的主題，以查明向13歲以下孩子灌輸的價值觀念。[[33]](#_33_Ai_Lin__Bu_Lu_Men_Sa_Er____Z)約瑟夫·黃把中國的長篇小說作為生活的反映來研究。[[34]](#_34_Yue_Se_Fu__Huang____Gong_Cha)文藝界被用做高層政治斗爭的一個戰場，尤其是在毛澤東的時期，有幾位學者研究被爭奪的領域（特別是江青企圖改革的京劇），以及60年代初借古喻今的戲劇和批評。[[35]](#_35_Jian_Mo_Er__Ge_De_Man___Zhon)

有少數學者企圖從虛構的文學作品中得到社會學的資料。他們的論點是，虛構的文學作品與行為模式有某種關系，即使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想化描寫，也反映了有關的真實，如中國地方領導人的社會經濟描述，小集團的行為動態，解決沖突的機制等。[[36]](#_36_Te_Bie_Jian_Fu_Lei_De_Li_Ke)最后，少數中國作家揭示了中國官僚主義作風的性質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愴感情，其感人而有洞察力的風格不亞于任何社會科學家。小說家王蒙詳細描寫了黨內的人事工作。愛調查研究的新聞記者劉賓雁揭示了黨委內部的權力關系。陳若曦講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酷、虛偽與痛苦。1976年貼在天安門廣場的悲憤的詩詞，有力地傳達出70年代中期許多城市居民的憤世嫉俗與怨恨。這類作品對于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如索爾任尼琴和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對于了解斯大林主義及其遺產一樣必要。

因此，藝術創作對了解精英人物和群眾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補充渠道。80年代，中國開始出版許多有關文化領域的研究指南和書目提要。但盡管有這些幫助，仍然很難得到有關的材料。一種英文資料來源《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特別有幫助。也許從遠處了解中國文學的唯一辦法，是通過主要的文學出版物，如《文藝報》，但這些是直系刊物，有些更有趣和富有革新精神的作品，出現在知名度較小的刊物和地方刊物上。在中國文藝界險惡的淺灘上航行，不時會碰上宗派主義、謹小慎微和含沙射影的暗礁，大多數研究者需要中國知情人士的幫助——雖然他們給予這種幫助是小心謹慎并可能是為個人利益服務的。但到80年代中期，許多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學者，通過會議見到了他們的中國同行，并同他們保持直接聯系。在他們的幫助下，翻譯中國新的虛構文學作品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成了中國研究中最活躍與最令人興奮的領域之一。[[37]](#_37_Li_Ru__Pei_Li__Lin_Ke_Bian)

#### 訪問從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

自1949年以來，有計劃地訪問從前的中國居民，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情報來源。有幾個因素說明了訪問逃亡者的重要性。學者對研究現實社會無能為力，無疑是主要的因素。這不僅因為在毛的時期實地研究中國在事實上不可能，而且因為中國對研究的開放還不到能進行現場研究的程度。除了1979—1981年的一個短暫時期和少數其他難得的情況外，外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者一直不能使用他們的學科的研究方法：長期住在一個社區里，向他們所研究的居民提出秘密的與公開的問題單，進行隨機取樣。

即使在有觀察與訪問機會的地方，學者也不得不在權力主義的政治制度下進行他的研究。關于提供信息者的機密性，總是有不能保持的危險。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有必要采取不尋常的措施，以保護向他們提供信息的人不受政治迫害，特別是在這些人提供了政府所不喜歡的數據或說明的情況下。此外，從問題是否受歡迎、許可停留時間的長短和研究者為加深調查而需要接觸文件材料等方面來說，在中國進行現場研究，至今仍然是艱苦與受限制的。這意味著多數研究者寧肯在進入中國之前做好準備；初步研究在中國之外完成。

此外，相當多的中國人移居香港、臺灣、印度和西方國家，提供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提供情況的人。逃亡者來自中國各地，其中大多數來自廣東和沿海城市（特別是上海）。雖然在逃亡者中，知識分子所占的百分比比他們在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高出許多，但在逃亡者中也有農民、工人和青年，因此可以對不同職業和不同代的人進行研究。雖然少數過去的黨員、公安人員和人民解放軍成員離開了這個國家，但逃亡者中最大的缺陷是擔任過重要職務的官員相對地少。不像蘇聯和東歐，中國還沒有一個高層的叛逃者。但是，在1962年由于惡劣的經濟情況而逃到香港的逃亡者中，有少數層次較低的官僚，他們有助于了解中國的組織情況。

有些偶然的觀察家懷疑這些離開中國的人能夠提供有用的情報，因為他們對這個政權抱有偏見。這種懷疑看來是沒有根據的。許多逃離大陸的逃亡者，不是出于對政權的恐懼或反感，而是為了親屬團聚或為了改善經濟條件，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懷有相當深的愛國主義感情。而且，許多人雖然疏遠這個政權，卻并不把這種情緒夾帶進他們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實踐或社會風俗的敘述中。總之，精心安排的訪問程序和設計完善的問題單，能夠把提供情況者的偏見的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逃亡出來的提供情況者的局限，主要不在偏見而在不完整和記憶的淡化，難于核實他們所提供的情報，以及研究者在辨別正確提問方面所面臨的難題。現場研究的一個很大好處是，觀察者沉浸在社區里，開始調整詢問，提出一套經過修改的問題；在離開研究現場的地方訪問提供情況的人，研究者很難確定什么是提供情況者應該知道的，和什么是最好的和最恰當的問題。另一方面，提供情況者從他對社區的義務中解脫出來后，可能談論他在家鄉不愿意談論的敏感問題。

因此，訪問從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居民，成了研究中國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1963年香港大學服務中心的建立，推進了這件事情。從那時起，差不多有幾百個研究項目都涉及訪問和利用大學服務中心及聯合研究所的圖書館，從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達到一個高潮。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一直有提供情況的人移居香港，但有三批人引起特別的注意：50年代初期和中期來的城市知識分子和商人，他們是在經受迫害之后離開的；1960—1962年的經濟蕭條時期到香港尋求避難所的廣東農民和其他的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逃避“文化大革命”動亂的青年。這三批人中的每一批，都為具體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機會。

一些國家的政府也在香港支持訪問研究項目。到70年代后期為止，英國和美國政府領導了一項廣泛的計劃，目的是從新近到達香港的人中確定中國的經濟狀況。這些訪問中的一部分是美國農業部估計中國農業產量的依據，有縮微膠卷可供利用。日本政府訪問了1949年以后留在大陸的日本人。他們往往是有見識的技術人員，和中國人結了婚，在工廠以至市政部門擔任負責的技術職務。聯合研究所也采訪大陸的日常情況，可以得到制成縮微膠卷的訪問記錄。

從70年代中期起，出現了兩種新型的提供情況的人：旅居國外的中國人和住在中國的外國外交官和商人。前者包括中國的外交官、商業代表、新聞記者、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在80年代，不再像毛澤東時期那樣受到嚴密的監視與約束，居留海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數目激增。現在還沒有重要的研究項目提出要利用這一批提供情況的人，但在非正式的、不作記錄的前提下，許多中國人是樂意對想要了解他們國家的外國人有所幫助的。他們往往比聚集在香港的逃亡者有較好的職位和更多的見識。把高層政治斗爭中不清楚的方面補綴起來，也逐漸變成可能了。但外國觀察家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核實情報，使其達到學術性的文獻編集標準。這些資料的優點是，它們展示出中國政治生活中非正式的與個人的一面，以及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這些方面是出版物或逃到香港的人都沒有透露過的（如精英人物中間的婚姻模式和他們的家庭生活）。

對中國的某些有限方面作了大量曝光的外國人，也是80年代一個增長中的資料來源。外語教師、商人、科學家、律師、學生、導游、合資企業的經理、外交官、軍官和藝術家，自70年代后期以來，都同他們的中國對手有廣泛的職業上的接觸。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有少數人記述了他們的經歷，但多數人還沒有這樣做。現在，以分散的方式存在著大量的情報，涉及中國官僚主義的不同方面、經濟和某些官員。例如，世界銀行已經存儲了大量關于中國重要經濟部門的專家評價；多國能源公司對石油、煤炭、天然氣和核能工業有獨到的見解；基金會的代表同中國社會科學院有影響的領導人已經成為熟人。除了少數例外，在中國分析家中，還沒有人企圖把這類情報以系統的方式集合起來。盧西恩·派伊根據他對同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商人的訪問，寫出了開拓性的專題論著《中國人的商業談判作風》，顯示出這方面的潛力。

能不能建立起對逃亡者、旅居者和外國人的訪問記的書目管理呢？這個問題從兩點來看是合時宜的。第一，就拿為專題論著提供情況的人來說，有沒有任何檔案？回答是“沒有”，這樣，學者只好閱讀第二手文獻，這是咎由自取。例如，下列作者的著作都談到50年代和60年代的公安系統：鮑大可、伊日拉·沃格爾、杰羅姆·科恩、維克多·李、斯坦利·盧布曼。[[38]](#_38_Jian_Ke_En_Bian___Xing_Shi_S)寧愿讓類似之處歸因于這些學者在1963—1966年期間都訪問過有限數目的逃亡到香港的人，也不愿讓第二手報道的相似來增強對研究結果的準確性的信任。重復并非是完全的，只不過因為曾在福建和廣東的公安系統中工作過的相對來說為數不多的逃亡者，是所有這些報道的來源。同樣地，維克多·福肯漢、戈登·貝內特和本文作者曾根據十分相似的線索寫過中國的官僚主義作風，特別是在財政領域。[[39]](#_39_Wei_Ke_Duo__Fu_Ken_Han____Fu)所以毫不奇怪，結論都差不多，因為所有這些作者都程度不同地倚賴同一個見多識廣的前廣東財貿系統的干部。在青年研究方面，也多少存在類似的情況，但不嚴重，因為這方面提供情況的人比較多，但在70年代初以大學服務中心為基地的學者所用的資料中，仍有尚待查核的重復。

社會科學的專業標準，一般要求訪問資料有準確的腳注和對訪問記進行認真登記。理想的做法是，把抄本和注釋歸檔，備第二次分析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所做的訪問逃亡者的談話記錄，對于能讀到它們的將來的學者會很有益處。這是衡量中國實際發展的基線，不幸的是，除去某些例外，中國研究領域沒有堅持這些標準。伊日拉·沃格爾在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存有一套很有用的訪問記，那是他對60年代中期廣東省的研究的副產品。奧德麗·唐尼索恩曾慷慨地與別人共享她有關中國財政情況的許多訪問記。我在1964—1965年關于地方政府的訪問記和1971—1972年關于中國官僚主義作風的訪問記，也是這么處理的。馬丁·懷特存有他關于地方社會組織的訪問記。這些資料存放在密歇根大學本特利歷史圖書館。據我所知，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像這樣儲存起來備第二次分析之用的成套訪問資料了，這將長期不利于這個領域。

盡管有這些問題，根據逃亡者訪問記所寫的專題著作，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在中國對研究開放后，學者們所發現的中國，并沒有太大地偏離通過香港的研究所發現的中國。有三種很不相同的研究方法，都以訪問逃亡者為基礎，值得提及。1964—1965年，鮑大可深入細致地訪問了三個中下級官僚，又比較粗略地訪問了其他幾個人，然后描述出一個部、一個縣和一個公社的結構。這本書后來作為了解80年代中國機構的出發點，變得非常有用。馬丁·懷特和威廉·帕里什合作，訪問了幾百個來自中國各地的人，收集有關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農村和城市生活的資料。他們利用這些資料制定標準的生活模式，用以檢驗情況的差別與范圍，以及解釋變化。他們的專題著作將在許多年內影響研究的議事日程。最后，安妮塔·詹（音）、理查德·馬德森和喬納森·昂格爾訪問了幾個從同一個農村來的人，反復核對他們所得到的材料，寫出這個村子從1962—1983年的政治史。這些和其他以訪問逃亡者為根據的專題著作的成果是，學術界對中國基層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進程的了解，也許超過對東歐大多數社會主義社會的了解，更無疑超過對蘇聯和現場研究受到限制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了解。

#### 現場研究

從1979年起，西方和日本的學者有機會在中國進行現場研究。一小批人類學者、社會學者和政治科學家，從1979—1981年，可以在中國農村住上一個時期；1981年后，中國政府對這類活動加以限制。[[40]](#_40_Zhe_Lei_Yan_Jiu_De_Chu_Bu_Ch)此外，在農村作短期停留、重復訪問同一個農村地點、通過公開與秘密的問題單對城市地區進行調查研究、訪問中國官員等，都是可能的。除去少有的例外，通過對居民區和工作單位的廣泛觀察，進行城市現場研究，到現在為止還不可能。[[41]](#_41_Yi_Ge_Li_Wai_Shi_Gai_Er__Hen)除了這些機會之外，學者還結合在中國的教學工作進行研究。例如，盡管禁止現場研究，在省立大學教書的人類學者，仍可進行農村研究。和大學和研究所有密切聯系的法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在進行他們的專門研究，政治科學家則利用他們的大學同中國機構建立的聯系進行態度調查。

舉一些例子，已經著手的現場研究有：農村生活，對老人的照顧，婦女地位，毛澤東以后的大學管理，河北省水資源的開發與分配，國家與省一級的預算過程，在四川省和遼寧省的定點人口統計簡況，南京、石家莊和武漢近郊縣的領導，外交政策機構的組織，意識形態的最新發展，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生活。[[42]](#_42_Li_Zi_Bao_Kuo_Su_Shan_Nuo__P)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發表的大多數有關當代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依據個人觀察和在中國的訪問。

沒有一份在中國進行實際研究的全體學者的現成名單。研究當代中國是一個世界范圍的事業，來自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丹麥、法國、德國、日本、新西蘭、瑞典、蘇聯和美國（只提主要的國家）的學者，不是在進行人類學研究，就是忙于訪問計劃。安排這類研究，往往是通過非政府的贊助，個別國家甚至沒有保存集中的記載。到80年代中期，常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外國學者去訪問一個官僚或學者，才知道另外一個外國人在幾天前剛訪問過他，提了差不多同樣的問題。有些中國官員和學者，花相當大一部分時間會見外國人。

只有少數研究者把他們從現場工作中得來的原始資料歸檔，這些資料包括訪問記錄、注釋、統計數字和單位的說明。如果不馬上作出巨大的努力來搜集這類原始研究資料，它們很可能喪失，也就無從進行第二次分析了。[[43]](#_43_Shi_Di_Wen__Ba_Te_Le_Shi_Yi)正如從卜凱或甘布爾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研究中或從日本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社會調查中得到的原始材料，證明對當前的研究很有價值一樣，從當前的中國研究中搜集資料，建立一個單獨的檔案館，即使接觸機會受到高度限制，也總比沒有它好。

在中國進行研究有許多好處。學者對他們的研究有一個視覺印象；抽象的概念得到現實的印證。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在初聽之下給人一種不屈不撓而且效率高的調子，但當知道大多數生產大隊實際上就是那些窮困的、呆滯的、滿是塵土的傳統村莊時，事情看來就不一樣了。當分析家們經過北京各個部門潮濕昏暗的走廊，看到在過分擁擠的辦公室里坐在辦公桌前打盹的官僚時，他們發現這不是他們原來所想象的中國官僚機器有條不紊的活躍景象。當然，視覺印象可能把人引入歧途，但有很多東西是從對中國的實際研究中而不是從先入之見中得到的。

雖然以經驗為根據的研究成果不容易概括，但從到現在為止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幾點結論。

第一，在北京宣布的政策以及報刊對它的詳細闡述同它在基層的實際貫徹之間，存在很大的距離。它可能被過分曲解，從而超出了北京的愿望，或受到冷漠，遠遠達不到北京的意圖。統計數字和新聞報道也沒有充分反映出中國現實的多樣性與差異性。這不僅是為了表明與中央指示一致進行不準確的和歪曲的報道，而且即使是準確的數量資料，也難以看出質量差別。例如，從各省的小學入學人數看，中國的農村兒童幾乎普遍有受教育的機會。在各省之間和一個省的各縣之間是存在差別的，但統計數字表明，在每個地方80%以上的農村兒童都進了小學，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記錄。但是，這些數字一點不說明學校教育的質量。有關醫生和保健、飲食、工業生產等方面的數字，也存在類似的問題。親自的觀察促使學者要謹慎解釋中國的數據和提高對這個國家的多樣性的敏感。

第二，通過現場研究和訪問所揭示的中國，比通過其他資料顯示出來的中國，像臺灣、香港和1949年以前的中國那樣，更是“中國的”。特別是當資料的外表被逐漸剝掉之后，大陸中國人的利害關系、動機因素和信仰，使人想起在這個文化區的其他部分的中國人：看重家庭，強調人際關系中的禮尚往來，報恩意識和忠于同一社會關系網中的人，喜歡和諧與害怕亂子，不善于處理沖突。[[44]](#_44_J_Bu_Lu_Si__Ya_Ge_Bu_Si____Z)這樣一些概念如“派”、“感性”、“關系”、“禮貌”和“德”，對理解當代社會和文化跟過去一樣重要。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同等看重這些特質。事實上，另一個現場研究的結果涉及文化的多樣性。有些人尊重教育上的成就，另一些人則詆毀它。有些人逃避“亂”，另一些人則好像在尋找它。現場研究既使人對概括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個性產生較大的遲疑，也使人產生一種親身體會即盡管如此，中國仍然保持著它明顯的社會特質。我們看見的社會，比以往在資料中看見的更為復雜；到目前為止，毛的革命還沒有把這個社會改造成他所想象的樣子。

研究者得到的第三個壓倒一切的印象，是看到一個政治體制的橫斷面，在這個體制里，討價還價，達成一致和官僚主義政治是普遍的。問題是，這個研究結果是只適合于毛以后時期呢，還是它也概括了自1949年以來（就如它概括了1949年以前）中國政治這個方面的特點（也許不像那么強烈與突出）。至少自“大躍進”以來，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許多官僚個人和地方單位享有有保證的收入來源，從而有了某種權勢。把這些下級機構看成是獨立的或自治的是不對的；它們仍然依靠上級單位分配物資。同時，這些下級單位控制著上級單位需要用以完成它們的任務的資源。這樣，基本上根據在中國的現場研究中進行的訪問，對中國的經濟和政體究竟是高度集中還是分散這個老問題，已經從研究結果中得出新的看法，即在許多重要領域，這個體制既不由中央也不由地方支配，而是以相互依賴為特點。研究任務于是變成了解中央、省和地區的相互依賴和與此相聯系的討價還價，以及中央—省—地關系的變化，這種變化取決于地區和涉及的起作用的領域。舉三個例子來說，中央政府與上海、四川、青海的關系，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同時，中央、省和地方的相互作用，比如說在公安、能源、教育和水資源管理等領域，是很不相同的。

這些以及其他一些強調通過現場研究和訪問中國官員的對當代中國的了解，得來并不容易。在中國，研究的障礙是難以對付的。提供情況的人很容易給自己招來麻煩，因為他們泄露了與當前政策相反的情況，或者安全官員認為他們違反了有時是欠明確的安全法規。為了保護提供情況的人，進行學術研究的學者把情報作為背景資料，從報紙上求得證實，引用公開的材料。或者，研究者隱瞞資料來源，有時甚至更改關于地點或機構的細節。總之，學者不得不停止遵守職業準則，即為了知識的積累、驗證與復制，要精確地報告資料來源。在中國的學術研究工作者寧愿被迫采取一種同樣正直但不相同的新聞記者準則，即在必要時通過隱瞞提供消息者姓名的技巧，準確地弄清事實。

在中國進行研究的另一個難題，是這個體制的許多方面仍然對調查者關門。到現在為止，對外國學者關門的重要方面有：黨和黨的組織部，軍隊，公安機關和中南海這個大綜合體的決策過程，它相當于克里姆林宮或白宮綜合體，是國務院和黨中央委員會機關所在地。這就是說，學者對公開的政策了解較多，而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進行過程了解較少。

由于這些以及其他的障礙，研究者發現訪問和現場研究往往補充和豐富了從其他資料來源得出的研究結果，但它們不能代替文件研究以及可能時在香港進行訪問的需要。如果研究者在進入中國之前作了相當準備，那么他們在中國的調查會有很大的提高。他們提的問題因而更有針對性，得到的回答因而可以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上。有些社會科學家顯然是出于訓練時養成的習慣，輕視依靠出版物而相信個人觀察，他們報告的研究結果（常常是這個體制的不足與過分的地方）看起來“新”，其實與此同時，出版物上正在進行這方面報道。的確，我們懷疑，如果較高的當局不承認這些過分之處，它們是否會被透露給外國調查者。

## 英文第二手文獻

我們已經指出支撐中國研究的各種資料來源。接觸每種資料來源的機會，各個時期不同，因此，任何特定時期可以得到的資料的范圍，與這個時期以前和以后可以得到的資料的范圍不同。原始資料的不連貫性，構成中國研究的一個基本方面，向方法論和分析提出了嚴重的挑戰。既然資料基礎在不斷改變，我們如何衡量連續性與變化？前一個時期的新資料，如“文化大革命”揭示的關于精英人物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斗爭，使繼續重新解釋以前的事態發展成為必要。中國研究領域里的新手可能認為分析家不同意他們對過去事件的解釋，其實這種分歧實在應歸因于新情報的獲得。

簡單地說，西方對中國的解釋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很難確定這種解釋上的變化在什么程度上是由于中國的事態發展，在什么程度上是由于可以得到的情報的不連貫性。進一步說，盡管對過去作出了新的解釋，但對一個時期最初的印象一旦形成——以那個時期所能得到的情報的獨特組合為根據——那個形象就會存留下來，而向第一印象提出挑戰的新情報往往受到很大的懷疑，雖然新情報的可靠性并不比最初的資料的可靠性差。總之，當代中國的研究是一個不斷擾動和變化的領域；當學者結合關于過去事態發展的最新資料進行研究時，就需要不斷地修改他們的解釋。雖則大多數分析家對資料問題的態度是謹慎的，這個領域偶爾也發生弊端。舉一個例子，有的分析家迷戀新的研究發現，企圖根據這種新發現重新解釋整個過去。例如，研究者在1966—1970年得到的文獻，說明了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不斷增長的沖突和他們在1965—1966年關系破裂的原因。有的分析家孤立地抓住這個材料而忽視中國共產黨的這兩個巨人之間長期合作的記錄，著手把他們之間的關系從一開始就描繪成敵對的。

另一個極端是企圖拒絕新材料或進行巧辯。例如，毛澤東的專制甚至殘暴的特點，是到了他的晚年才變得完全明顯的，這從他以前的同事對他的行為的描述和有關在他領導下制定政策的過程的透露可以看出來。雖然有些解釋抓住這個材料，把毛自他在黨內掌權起就描繪成一個暴君，而其他的解釋則傾向于把毛的陰暗面限制在他衰老的晚年，對他的早期保存一個光輝的形象。

在重新解釋過去方面還有一個挑戰，這就是在毛以后時期得到的關于“大躍進”以后時期（1960—1962年）經濟蕭條的深度和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程度的情報。中國農村在建立人民公社之后，營養不良與饑餓現象比那時外部世界一般所了解的更為廣泛與嚴重。“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分裂了知識分子的組織和城市地區的社會生活。社會的和文化的解釋，沒有充分反映這些痛苦的經驗和它們引起的人民對官場的態度，遺漏了中國現代發展的主要方面。但在80年代之前，對這些事情知道不多，就談不上進行探索并將它們反映在分析中了。對偶爾研究中國的學者來說，結論是明顯的：書是什么時候寫的和當時可以得到什么資料，在形成分析的輪廓中至少同作者對待一個題目的不可避免的偏見和沒有明言的假設一樣重要。因此，在評述有關中國的第二手文獻之前，回顧一下這個領域發展的各個階段，是有用的。

#### 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極權主義模式的優勢

中國體制最初的形象來自兩類資料：中國出版物，逃亡者訪問記和報道。后一類的相當大一部分談到思想改造和中國制度的強制方面。[[45]](#_45_Ai_De_Hua__Heng_Te____Hong_S)當中國的統計系統開始形成并提出可靠的生產數字時，中國出版物開始以某種準確性描繪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1955年公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進一步表明一種經濟與政治制度在平穩地和有效地運行。除了高崗事件，美國學者沒有發現在高層有其他分歧。而且，中國出版物鐵板一塊的性質與沒有出現大的清洗，暗示領導層是一個團結的集體，決策是集體作出的。中蘇同盟和蘇聯在中國的廣泛存在，進一步促使分析家強調這個新政權的性質類似于蘇聯：它的領導者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高層政治領導對整個社會與文化實行極權主義的控制；中央計劃經濟，這種經濟中的資源分配是由政治決定的。

中國的這個形象，自然引出幾個關鍵性的問題，引起學者的興趣與爭論。第一個問題是，毛澤東是否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創造性貢獻。[[46]](#_46_Jian_Xu_Hua_Ci____Mao_Zhu_Yi)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國的傳統思想。[[47]](#_47_Jian_Fu_Lan_Ke_Lin__Huo_En)第三個問題是，控制與動員的機制如何實際起作用，特別是對知識分子，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初經歷了嚴厲的共產黨統治。[[48]](#_48_Jian_S_B_Tuo_Ma_Si___Gong_Ch)研究極權主義模式全盛時期的代表著作有：W.W.羅斯托等的《共產黨中國的展望》[621]；理查德·沃克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中國：第一個五年》；吳源立（音）的《共產黨中國經濟概觀》；鮑大可的《1949—1955年的早期共產黨中國》[23]；李卓敏的《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441]；彼得·S.H.湯的《今日共產黨中國》[694]；美國參議院政府工作委員會的《共產黨中國的國家政策機構》。在有了事后20年的認識的有利條件之后，再去讀這些著作，是有啟發的。它們所根據的資料，沒有提供絲毫關于各級統治集團對貧乏資源的無休止的爭奪、控制機構的缺點以及某些文化與社會模式的頑固性方面的情況。這些著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雖然程度各有不同）也表現出對中國事態發展的敵意或反感；看到成就時，也承認得比較勉強。當時的國際政治顯然對學術認識有影響。（我們懷疑，20年后這本書的讀者是否也會有類似的反應。）然而，這些著作具有值得注意的學術價值，因為新近的中國歷史編纂工作把20世紀50年代描繪成毛統治下的太平盛世，其特點是規律性、可預報性、合理性、有效性，甚至對人民還有幾分仁慈。而這個時期的第二手文獻卻提醒人們這些年月的易變性、試驗性、無情，甚至是亂糟糟。

極權主義模式的支配地位在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仍然保持著，不過，由于斯大林以后時期蘇聯制度在性質上的變化和對共產黨政權的理解更加老練而有所緩和。1960年，《中國季刊》的創辦給這個領域提供了講壇，使分析加強了。受過比較法律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科學訓練的一代比較年輕的學者開始進入這個領域，較大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不僅在美國，而且在英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紛紛建立起來。1963年，香港的大學服務中心敞開大門，從而促進了對逃亡者的訪問。此外，1961—1962年的許多難民，其中有前官僚、農民和知識分子，他們對這個制度比較地不那么疏遠。最后，由于“大躍進”的災難，政府停止發表它的經濟工作的統計數字，以前外部世界可以得到的省級報紙和政府各部的刊物，已不能夠得到。資料來源起了很大的變化，從主要依靠中國出版物，轉向對照使用情報較少的出版物和逃亡者訪問記。同時，幾種難得的資料——1957年“百花運動”中迸發出來的批評，從前不可能得到的人民解放軍的《工作通訊》，有關清洗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情報，以及縣級機關的文件——說明了以前被掩蓋起來的政治問題、過程和政治斗爭。

這些事態發展使研究事項有了進展，雖仍著重在極權主義模式的范圍。香港的訪問揭示出中國社會仍在極權主義的控制之下，這重新喚起學者對下述問題的興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共產黨人使這個分裂的國家重歸統一的手段。[[49]](#_49_Shu_Er_Man____Gong_Chan_Dang)可以就中國官僚機構的結構向從前的官員進行采訪，雖然由于缺乏高級官員而不能對決策過程進行確定性的研究。[[50]](#_50_Jian_Bao_Da_Ke___Gong_Chan_D)從毗鄰香港的廣東省來的大量逃亡者，使人能對該省與中央政府的關系進行詳細的研究。[[51]](#_51_Wo_Ge_Er____Gong_Chan_Zhu_Yi)中蘇爭論和中國脫離蘇聯模式，促使對中蘇的共產主義進行比較研究。[[52]](#_52_Ku_Er_Te__Lun_Dun_Bian____Yi)“百花運動”、“反右運動”和由此引起的知識分子逃往香港，引起了對知識分子階層的興趣。[[53]](#_53_D_W_Fu_Ke_Ma____Zhong_Guo_De)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仔細檢查中國頭10年發展的數字，收集記載經濟成績與實踐的日志和法定的摘要，經濟學家開始發表比較精深的經濟分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奧德麗·唐尼索恩題為《中國的經濟制度》[202]的廣博的制度概觀。毫不奇怪，國民收入概算與對具體經濟部門制度的描述，開始引起注意。[[54]](#_54_Liu_Da_Zhong_He_Ye_Kong_Jia)軍隊的《工作通訊》和彭德懷事件，推動了對軍隊的研究。[[55]](#_55_La_Er_Fu__Bao_Wei_Er____Gong)把中國出版物與逃亡者的報告結合起來，也利于對政治關系、中國的法律制度，以及研究政治的小團體的動態的研究。[[56]](#_56_Jie_Luo_Mu__Ke_En____Zhong_H)這一時期主要出版物的這份不完全的名單的觸目之處，是集中注意力于國家及其對老百姓的控制，可以得到的資料說明了中國的這些方面。可以得到的資料與從極權主義模式導引出來的研究事項之間的這種一致，一直保持到60年代中期。

自然，其他一些重要的智力趨勢使這個領域活躍了起來。特別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他們的著作往往富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集中注意力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與哲學思潮。例如，許華茨在一系列卓越的論文中，探討毛主義中國的思想發展，把這些發展放在中國傳統思想的背景中加以研究。[[57]](#_57_Zhe_Xie_Lun_Wen_Shou_Ru_Xu_H)斯圖爾特·施拉姆寫了公認為優秀的毛澤東傳記，集中注意力于他的思想發展，并從中國的傳統影響中探索他的某些思想根源。[[58]](#_58_Jian_Si_Tu_Er_Te__R_Shi_La_M)約瑟夫·利文森試圖把中國表面上處于統治地位的信仰體系馬克思主義的出現，與儒學在現代的發展聯系起來。[[59]](#_59_Te_Bie_Jian_Yue_Se_Fu__Li_We)這些以及其他一些由歷史學家所寫的著作，論述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局限于此，展望了共產黨統治的頭15年，揭示出使毛和他的同事們絞盡腦汁的一個根本思想問題：如何使中國現代化而不失去中國的獨特性。

另一種展望出自對宗教、農村社會和家庭組織感興趣的人類學者。[[60]](#_60_Shi_Jian_Ya____Zhong_Guo_Non)避開極權主義模式，而轉向國家與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傳統模式，人類學者關注的是國家改造社會的能力。這是個更為復雜的問題，因為社會有能力同化國家機器的下層機構，或向它提出實際挑戰。最后，少數分析家根據現代化理論提出警告說，中國領導人自1949年至60年代中期所進行的經濟和政治改造，并非只有中國才有；別的地方的現代化過程中也出現過精英集團的內部沖突和人民中間的嚴重的社會緊張。這些分析家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警告說，不應把中國持續的穩定視為當然。[[61]](#_61_Te_Bie_Jian_Lu_Xi_En__Pai_Yi)歷史學者、人類學者和現代化理論家的研究課題，得自理論素養的比得自可利用的資料的更多。也許值得指出，在我看來，他們的著作比那些基本上取決于可以得到的資料的研究項目，更好地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 20世紀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斗爭模式的優勢

“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深刻地影響了論述中國的第二手文獻。出乎意料的是，中國的極權主義在1966—1976年期間更甚于其他任何時期，這時社會、文化、經濟各個方面的政治化達到最高點，對領袖的神化達到歷史上從未達到過的個人崇拜頂點，恐怖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然而除去少數例外，研究領域卻從極權主義模式轉向更加復雜的方面以解釋中國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模式不再能使研究者著迷，特別是它對于說明變化無能為力。而且，極權主義模式假定有一個相對來說不受斗爭影響的、受過鍛煉的政治統治集團。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啟示，那就是：不僅在這個運動剛剛發動以后，而且在這以前，中國就受到斗爭的折磨。

重要的不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事實，1966年以后獲得的新材料，對中國分析家也有重大影響。特別這時在有組織的混亂中發行的紅衛兵小報和其他曇花一現的材料，提供了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關于高層政治迄今不為人知的情況。以前往往不知其存在的重要指示的原文，現在被公之于世。像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樣一些重要會議的主要材料，出現在社會上。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講話和文章的有價值的匯編，在中國國內流傳，其中一些流傳到國外。這種泄露的原因，是互相敵對的戰斗組力圖玷污對立面的聲譽。

與此同時，難民繼續逃往香港，其中有愈來愈多感到幻滅的能說會道的年輕人（許多是從前的紅衛兵），他們曾被送往中國農村。有重要意義的是，中國出版物的質量起了變化。通過歷史影射現實的政策辯論不斷增加。甚至中國的新聞記者也得不到可靠的統計數字來充實他們的報道。的確，由于國家統計局已被取消，檢查產品的數量與質量變得極其困難，最高領導人對他們的經濟和政治究竟知道得怎樣，也不清楚。大致說來，1966—1976年的主要資料，由三部分組成，即香港的訪問、“文化大革命”泄露的特殊材料和愈來愈枯燥乏味的出版物。（出版物質量的下降和難以獲得，導致西方學者日益依靠美國和英國對電臺廣播的監聽。）香港監聽哨的重要性增加了。身臨其境的新聞記者和外交官，是首先寫出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長篇報道的人。[[62]](#_62_Si_Tan_Li__Qia_Nuo____Mao_Yu)

現實和這些資料顯示出一個斗爭中的社會：領導人被自相殘殺的斗爭所折磨；精英集團中的一部分人與社會上的一部分人串聯起來，折磨社會上其他部分的人；地方上的單位分成勢不兩立的兩派，互相攻擊。記述的關鍵問題是要弄清楚：斗爭爆發的確切時間，引起這個體制分崩離析的原因以及斗爭過程帶來了什么。研究者很快就在所有這些問題上發生了分歧。有些人把“文化大革命”歸因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另外一些人歸因于廬山會議，還有一些人歸因于毛對60年代初的政策和機構調整愈來愈不滿意。更有一些人避開全部爭論，而展開一場更為復雜的辯論，內容是，在易變的聯盟中產生了分歧，這種分歧在1964—1965年發展到一個危機階段。[[63]](#_63_An_Feng_Jun__Yin_____Zhong_G)

至于斗爭的根源，有些人集中注意力于毛的企圖改造中國；另一些人強調結構上的缺陷和毛主義體系的分裂；還有一些人把混亂歸因于政治文化上的深刻缺陷；有少數人則企圖歸因于越南戰爭帶來的外部壓力和內政造成的結果；更有人研究社會內部的和經濟的壓力。記述上的第三個基本任務，是把握“文化大革命”的斗爭過程：紅衛兵是怎樣組織起來和怎樣互相作戰的，在一些具體單位發生了什么事情，等等。學術工作仍處在初期階段；有些典型的著作現在可以得到；但在這些著作寫作時，對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動力，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只有模糊的了解。[[64]](#_64_Jian_Li_Hong_Yong__Yin____Zh)

除去描述，對一個斗爭中的中國的感性認識，會推動對中國的權力分配和政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新的資料使這兩個課題都能進行。資料也刺激了對中國公共政策的興趣。毛在教育、公共衛生、農業、公安、文化、企業管理、軍隊事務、控制官僚主義等方面的改革，和國家改變分層體制的嘗試，激起外部對毛的政策本質的興趣。此外，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報和官方的出版物上，有許多文章詳細講到自1949年以來“修正主義者”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兩條路線斗爭”。大意是說，毛在每個領域的支持者，如何受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代理人的反對、阻撓或破壞。彭真和羅瑞卿被認為在公安工作上推行了劉的“黑線”，鄧子恢曾經是他在農業方面的極壞的幫手，薄一波和陳云是經濟領域的主要罪人。這些揭露成了熱心探索具體領域的政策發展的外國研究者著述的內容。

更準確地說，新的問題逐漸支配了這個領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對中央決策過程的性質展開了熱烈的討論。[[65]](#_65_Li_Ru__Jian_An_De_Lu__Nei_Se)有些人把決策過程看成是主要受毛的控制；這位主席把斗爭引進了這個體制。另外一些人用新的資料證明，宗派斗爭是這個體制特有的弊病，毛和他的聯盟者就是幾個在斗爭的宗派之一；這個體制的動力，來自互相斗爭的宗派力圖生存下去，壯大自己，戰勝對手。還有一些人強調，政治斗爭是在實際存在的復雜問題上展開的，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未必使這些派別在一個又一個問題上互相反對。更有一些人拒絕參加辯論，認為決策過程隨著時間與問題的不同而變化。看法之多，表明新資料除了它已經提出的問題之外，還可以引出更多的實質性問題，但資料的性質不允許對非此即彼的解釋作嚴格的檢驗。

在中央與省的關系問題上，存在同樣的情況。有些人把這個經濟體制看成是中央控制的，而另一些人則說它是“由許多小單位組成的”，其中的下層單位——省、縣、公社——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并有頂住中央的能力。“文化大革命”中對各省官員的責備，為辯論的雙方都提供了依據。總之，各省對北京從1966—1976年發布的不同政策作出的顯然有差別的反應，以及各省廣播電臺在主題內容和著重點上的明顯不同，這些在企圖解釋這種現象的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中，引起了一片爭吵。[[66]](#_66_Ao_De_Li__Tang_Ni_Suo_En)

唐納德·克萊因和安妮·克拉克編的一本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精英人物的重要參考書《中國共產主義人名詞典，1921—1965年》[392]的完成，美國政府積累起來的傳記檔案的比較容易得到，以及經過“文化大革命”中的提升與清洗引起的精英人物的較大變動，刺激了研究精英人物浮沉的興趣。[[67]](#_67_Meng_Di__Lei__Bu_La_De____Zh)這種對中國精英人物的數量分析發生興趣的另一個原因，是缺乏關于其他題目的確鑿資料；這個領域之所以引起興趣，是因為比較說來，這里的機會比別處大。關于精英人物升降浮沉的原因，在這個領域里也爆發了熱烈的討論。什么最能解釋提升與貶抑：是非正式的保護人與受保護人的關系，真才實學，正式的官僚地位，還是意識形態與政策優先？如果保護人與受保護人的關系具有決定意義，那么保護的根據是什么：是同鄉，老同志，老同學，還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資格更老的后臺？如果提升的標準是真才實學，那么什么本領是成功必不可少的？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人都想證明自己是對的，但由于資料的性質，最后只能得出非常模糊的研究結果。牽涉的因素很多，而這些因素的分量又隨著時間、機構、地點和統治集團的層次的不同而變化。事業成功的標準，50年代不同于60年代，黨內不同于軍內，上海不同于湖南，并有助于區別在一個公社里、在省一級和在中央委員會里的政治關系。

盡管這個發現也許不值得驚奇，但它強調對中國的多樣性要有敏銳的感覺，避免簡單的概括。資料剛剛開始允許（事實上是要求）人們看到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的富于差別的圖景。結果，經過仔細研究的專題著作增多起來，它們針對的是在具體時間、地點條件下的具體社會部門。對中國社會的差別性的敏感和不再著迷于極權主義模式，引出兩個新問題。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層模式和總體性質是什么？社會的不同部分和政治體制如何相互影響，這些部分采取什么戰略以影響國家的政策？在這一點上，資料也允許人們提出高深的問題，不過，研究結果仍然是初步的，往往不能令人滿意。[[68]](#_68_Jian_Wei_Ke_Duo__Fu_Ken_Han)

總之，“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時期的資料，允許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提出比以前成熟的問題。他們經受了一次文獻爆炸，但仔細檢查這些文獻，發現先前根據往往是不完全的資料所寫的專題著作的結論，不是過頭而是不及。扎實的研究結果，不因大量新資料的出現而受影響。經濟學者和人類學者的情況最糟。唯一可靠的關于中國的統計數字，來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貿易關系的第三國的報道。毫不奇怪，分析中國的對外貿易成了經濟學者所喜歡的題目之一，他們還勇敢地對中國的經濟工作作出估計。[[69]](#_69_Ya_Li_Shan_Da__Ai_Ke_Si_Tan)部分地為了彌補確鑿資料的不足，他們還用比較觀點和歷史觀點去看中國的發展經驗，并對此進行窺察。[[70]](#_70_De_Huai_Te__Po_Jin_Si____136)盡管有這些做法，但再清楚不過的事實是，中國統計數字的缺乏與不可靠，嚴重地阻礙了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人類學者的情況甚至比這還要糟。由于被拒絕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集中在香港和臺灣。

歷史學家不愿意采用使人迷惑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材料和對紅衛兵材料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懷疑，他們對寫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當代中國，比他們早先更加躊躇。[[71]](#_71_Li_Wai_You__Fei_Zheng_Qing)他們在新聞記者和政治學家占優勢的第二手學術文獻中，痛苦地失去了自己的看法，這些文獻專門注意有關政治斗爭、精英人物的浮沉、決策過程，以及中國國內的多樣性與差異性等問題。就如對待極權主義問題那樣，有不少分析家由于竭力要說明當前的形勢而嚴重地低估了中國的變革潛力。這個難點加上70年代初新的資料來源（對中國的短期訪問）的沖擊，導致對毛的政策效果作出過分樂觀的估計，從而掩蓋了公眾對這個政權的普遍失望。關于“文化大革命”怎樣離開了中國發展的主流，這是歷史學家應當提供的；關于持續的高經濟增長率的障礙，這是經濟學家不能提供的。

有四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應當提及。鮑大可在他的《前途未卜》[24]中，對毛的后繼者將面臨的問題的范圍作了估計。鮑大可拋棄中國政治的斗爭模式，假定理性終會占上風，認為在毛以后時期，經濟上、國家安全上、社會政策上的變革是必然要發生的。弗朗茲·邁克爾汲取香港、臺灣對毛的評價，寫成一篇控訴這位主席的嚴厲的訴狀。[[72]](#_72_Fu_Lang_Zi__Mai_Ke_Er____Mao)讀者從這部研究著作里必然會得到的印象是，一種與斯大林的命運相似的命運，在等待著這位當代中國的暴君。鄒讜在一系列犀利的論文中，把極權主義模式與歷史觀點結合起來，證明社會的極端政治化與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是與五四運動以來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潮流不相符的。[[73]](#_73_Zou_Dang____Cong_Li_Shi_De_J)鄒讜進一步說，在中國，宗派斗爭引起生死斗爭；勝利者將消滅他們失敗了的對手。鄒讜的動力分析暗示了政策突然逆轉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勝利的一派要同中國社會長遠的趨勢保持一致。最后，理查德·洛溫撒爾，一個共產黨革命的比較研究學者，早就認為基于烏托邦幻想的政權是不能持久的，不可避免地會屈服于更加獨斷的官僚主義統治。[[74]](#_74_Li_Cha_De__Luo_Wen_Sa_Er)至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分析，分析家由于不讓可以得到的資料和當前事件完全支配他們的研究項目而得到好處，他們在處理材料時，心目中有一個由歷史觀點和比較觀點所充實的動力模式。

最后要說的是，這個領域的發展，不是典型積累式的，即在前人的研究結果上建立新的研究。我們的分析的一個主要意思是，許多論述1949年以后中國的著述由于新資料的出現而過時，因此對先前的研究結果進行再解釋就仍有必要。這樣，就需要優先對新近的和最好的分析作有選擇的評述，其次才是先前的專題著作，即使它們有可稱贊的學術價值并在當時對這個領域起了促進作用。下面的書目介紹，就是根據這個原則編寫的。

[[1]](#_1_1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國務院出版，從1955年至今，不定期。

[[2]](#_2_12)彼得·伯頓和尤金·吳：《當代中國研究指南》[47]。

[[3]](#_3_12)特別參見G.雷蒙德·納恩編《國際收藏的中國定期刊物，1949—1960年》[554]；伯納黛特·P.N.史和理查德·L.斯尼德：《共產黨中國的期刊》[656]。

[[4]](#_4_12)《北京圖書館館藏報紙目錄》[567]。

[[5]](#_5_12)例子是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的《共產黨中國的領導》[436]；弗朗茲·舒爾曼的《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637]；詹姆斯·湯森德的《共產黨中國的政治關系》[720]。

[[6]](#_6_12)見艾倫·S.惠廷《中國跨過鴨綠江》[785]和《中國的威懾微積分學》[786]；喬納森·波拉克：“中國外交政策中的觀念和方法：金門決策”[585]；唐納德·扎戈里亞：《中蘇沖突》[837]。這些研究把對中國出版物的仔細閱讀和對外交、軍事行動的研究結合起來。

[[7]](#_7_12)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與實踐（“北京學”）方面的例子，見安奉俊（音）《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革命：政策進程的動力》[2]；帕里斯·H.張：《中國的權力和政策》[86]；默爾·戈德曼：《中國知識分子：建議和異議》[271]；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和第2卷[496]。

[[8]](#_8_12)林恩·T.懷特第三：《在上海的經歷》[782]；多蘿西·索林格：《中國西南的地方政府和政治一體化，1949—1954年：個案研究》[670]；肯尼恩·G.利伯塔爾：《天津的革命與傳統，1949—1952年》[452]；唐納德·麥克米倫：《中共在新疆的政權與政策，1949—1977年》[524]；戈登·貝內特：《華東：一個中國人民公社的歷史》[36]；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1949—1956年》[662]。

[[9]](#_9_12)關于教育，羅伯特·泰勒：《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政治與大學招生：1949—1978年》[700]。關于公共衛生，戴維·M.蘭普頓：《中國的醫藥政治：1949—1977年的政策發展過程》[417]。關于農業機械化，本尼迪克特·斯塔維斯：《中國的農業機械化政策》[685]。關于企業管理，斯蒂芬·安多斯：《中國的工業革命：1949年至今的政策、計劃和管理》[9]；鐘昌吾（音）：《毛主義與發展：中國的工業管理政策》[153]。關于科學技術，理查德·P.薩特梅爾：《研究與革命：中國的科學政策與社會變化》[692]。關于官僚主義管理，哈里·哈丁：《創建中的中國：官僚政治的問題，1949—1976年》[291]。關于少數民族政策，瓊·托伊費爾·德雷爾：《中國的四千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少數民族與民族平等》[210]。關于糧食管理，肯尼迪·R.沃克：《中國食用糧食的收購和消費》[759]。

[[10]](#_10_12)喬治·N.埃克隆：《為中國政府的預算提供資金：大陸中國，1950—1959年》[212]；凱瑟琳·H.蕭：《共產黨中國的貨幣與貨幣政策》[314]；李卓敏：《共產黨中國的統計制度》[442]；本尼迪克特·斯塔維斯：《中國的人民公社與農村發展》[684]。

[[11]](#_11_12)安多斯：《中國的工業革命：1949年至今的政策、計劃和管理》[9]；安德魯·瓦爾德：《報刊報道與中國社會的研究》[757]，見《中國季刊》[133]，79（1979年9月），第569—592頁；理查德·鮑姆：《農村的文化革命：剖析一種有限的造反》[31]，見托馬斯·魯賓遜編《中國的文化革命》[617]，第367—476頁。

[[12]](#_12_12)約翰·伯恩斯：《中國農民利益的表達，1949—1974年》[70]，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79年；伊麗莎白·J.佩里：《社會主義中國的農村暴力行為》[581]，見《中國季刊》[133]，103（1985年9月），第414—440頁。

[[13]](#_13_12)弗雷德里克·泰韋斯：《中國各省的政策：主題與變奏》[703]，見約翰·M.H.林德貝克編《中國：一個革命社會的管理》[457]，第116—192頁。

[[14]](#_14_12)《外國廣播新聞處每日報道索引：中國》[351]（康涅狄格州，新迦南：新聞庫，1975—）。見書目提要對這個出版物的全面介紹。

[[15]](#_15_11)見理查德·索里奇編《當代中國：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出版的關于中國的報導的書目》[676]；西奧多·基里亞克編《美國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研究譯叢書目索引》[413]，第1—8卷。

[[16]](#_16_11)斯圖爾特·弗雷澤：《中國的共產主義教育：前10年的成績》[254]；彼得·J.西博爾德編：《中國的革命教育：文獻和注釋》[649]。

[[17]](#_17_11)趙國俊：《大陸中國的農業政策：文獻研究，1949—1956年》[94]。

[[18]](#_18_11)趙國俊：《大陸中國的經濟計劃及組織：文獻研究，1949—1957年》[95]。

[[19]](#_19_11)高英茂編：《人民解放軍與中國的建國》[386]；高英茂：《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政治工作制度》[388]。

[[20]](#_20_11)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中美關系，1949—1971年》[494]；吉納·蕭和邁克爾·威吞斯基：《中美關系正常化及其政策含義》[313]。

[[21]](#_21_11)G.F.赫德森、理查德·洛溫撒爾和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中蘇爭論》[343]；戴維·弗洛伊德編：《毛反對赫魯曉夫》[247]；亞力山大·達林等編：《國際共產主義的分歧》[192]；約翰·吉廷斯：《中蘇爭論概觀》[268]；威廉·格里菲思：《阿爾巴尼亞與中蘇分裂》[280]，《中蘇的分裂》[281]和《中蘇關系，1964—1965年》[282]。

[[22]](#_22_11)羅伯特·R.鮑伊和費正清編：《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59]；聯合研究所：《中共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1966—1967年》[732]和《中共中央文件》[732]；H.欣頓編：《1949—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獻概覽》[299]。

[[23]](#_23_11)約翰·W.劉易斯：《共產黨中國的主要原則》[439]。

[[24]](#_24_11)佩里·林克編：《（人妖之間>及劉賓雁在毛以后所寫的其他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461]。

[[25]](#_25_11)威廉·辛頓：《反省》[300]；阿林和阿黛爾·里克特：《釋放的俘虜》[614]；卡洛·休戈：《在毛澤東的土地上》[689]；埃里克·周：《人必須選擇》[145]；瑪麗亞·晏（音）：《宏大的園地：紅色中國學生生活寫照》[833]；莫里斯·R.威爾斯：《叛徒》[794]；包若望和魯道夫·切爾明斯基：《毛澤東的犯人》[18]；米哈伊爾.克洛奇科：《在紅色中國的蘇聯科學家》[393]；斯文·林奎斯特：《緊要關頭的中國》[458]；伊曼紐爾·約翰·赫維：《在中國的一個非洲學生》[296]；查爾斯·泰勒：《在紅色中國的記者》[698]；董繼炳（音）和漢弗萊·伊萬斯：《思想革命》[729]；尼爾·亨特：《上海日記》[348]；杰克·陳：《文化革命內幕》[100]；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羅：《革命之子》[446]；羅杰·加賽德：《活躍起來：毛以后的中國》[262]；福克斯·巴特菲爾德：《中國：活躍在苦海中》[72]；理查德·伯恩斯坦：《從世界的中央尋求關于中國的真相》[42]；杰伊和林達·馬修斯：《十億》[520]；戴維·邦納維亞：《中國人》[56]；約翰·弗雷澤：《中國人》，第253頁。

[[26]](#_26_11)利莎·霍布斯：《我看見了紅色中國》[304]；羅伯特·吉萊恩：《中國醒來的時候》[284]；G.S.蓋爾：《中國沒有蒼蠅》[260]；蘇珊·拉賓：《蟻冢》[414]；威廉·史蒂文森：《黃風》[687]；埃德加·斯諾：《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672]。

[[27]](#_27_11)這類報告的例子包括S.D.理查森的《共產黨中國的林業》[612]；W.R.格迪斯：《共產黨中國的農民生活》[263]；巴里·里奇曼：《共產黨中國的資本家和經理》[613]，見《哈佛商業評論》（1967年1月），第57—78頁；杰弗里·奧爾德姆：《中國的科學：一個旅游者的印象》[558]，見《科學》，147.3659（1965年2月），第706—714頁。

[[28]](#_28_11)例如，見美國全國科學院出版的美中學者交流委員會編寫的報告[185]。它們評價了中國各門科學的狀況：植物研究（1975年），固態物理學（1976年），昆蟲防治（1977年），理論數學和應用數學（1977年），古人類學（1977年），口服避孕藥和類固醇化學（1977年），小麥（1977年），天文學（1977年），地震工程學和減少意外事故（1980年），海洋地理學（1980年），核科學（1980年），牲畜農業（1980年）。又見余英時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古代史學，漢代研究代表團的報告》[836]；美中學者交流委員會：《中國的傳統繪畫和現代繪畫》[185]；安妮·瑟斯頓和賈森·派克編：《中國的人文主義的與社會科學的研究》[714]；魏斐德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史研究》[753]；美中學者交流委員會：《美中學者交流委員會經濟代表團訪華報告》[185]；美國農村小型工業代表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村小型工業》[6]。

[[29]](#_29_11)K.M.潘尼卡：《在兩個中國》[561]；馬修·李奇微：《朝鮮戰爭》[615]。

[[30]](#_30_11)阿瑟·拉爾：《共產黨中國如何談判》[416]。

[[31]](#_31_11)《在中國的美國人，1971—1980年：密歇根大學國立中美關系檔案館指南》[7]。

[[32]](#_32_11)瑪麗·謝里登：《對英雄的仿效》[655]，《中國季刊》[133]，33（1968年1—3月），第47—72頁。

[[33]](#_33_11)艾琳·布盧門撒爾：《中國道德教育中的榜樣：兒童讀物透視》[53]，密歇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76；查爾斯·里德利、保羅·戈德溫和丹尼斯.杜林：《共產黨中國培養模范公民》[616]。

[[34]](#_34_11)約瑟夫·黃：《共產黨中國的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作為生活反映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337]。

[[35]](#_35_11)見默爾·戈德曼《中國知識分子》[271]；克萊夫·安斯利：《吳晗的異端邪說》[11]；詹姆斯·普西：《吳晗：借古非今》[590]；科林·麥克拉斯：《中國的業余戲劇，1949—1966年》[498]和《文化革命后的京劇（1970—1972年）》[499]，見《中國季刊》[133]，55（1973年7—9月），第478—510頁。

[[36]](#_36_11)特別見弗雷德里克·蓋恩斯蘭《文化與決策：中國、日本、蘇俄和美國的社會勢力》[258]，密歇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84。

[[37]](#_37_11)例如，佩里·林克編：《人妖之間》[461]；佩里·林克編：《頑強的毒草》[462]；佩里·林克編：《玫瑰與刺》[463]；尤金·約揚編：《艾青詩選》[225]；蘇珊·沃爾夫·陳譯：《馮驥才：菊花及其他故事》[103]。分析見邦尼·S.麥克杜格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俗文學和表演藝術，1949—1979年》[522]；梅儀慈《丁玲的小說》[240]；杰弗里·C.金克利編《毛以后：中國的文學和社會，1978—1981年》[391]。

[[38]](#_38_11)見科恩編《刑事訴訟程序》[179]；斯坦利·盧布曼：《毛與仲裁：共產黨中國的政治斗爭與爭論的解決》[486]，見《加利福尼亞法律評論》，55：5（1967年11月），第1284—1359頁；維克多·李：《惠陽的公安局與政法工作，1952—1964》[445]，見劉易斯編《共產黨中國的城市》[438]；鮑大可：《共產黨中國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權》[28]。

[[39]](#_39_11)維克多·福肯漢：《福建的縣政府》[233]，見《中國季刊》[133]，59（1974年7—9月），第518—543頁；戈登·貝內特編：《中國的財政與貿易：政策讀物》[37]；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國官僚機構內部的聯絡方法》[557]，見《中國季刊》[133]，57（1974年1—3月），第1—39頁。

[[40]](#_40_11)這類研究的初步成果，見瑪杰里·沃爾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當代中國婦女》[802]；斯蒂文·莫舍：《破碎的大地》[533]；威廉·帕里什編：《中國農村發展的難題：發展中的爭論》[562]。

[[41]](#_41_11)一個例外是蓋爾·亨德森和邁倫·科恩的《中國的醫院》[295]。

[[42]](#_42_11)例子包括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大學》[575]；德博拉·戴維斯一弗里德曼：《長壽：中國的老人與共產黨革命》[196]；戴維·M.蘭普頓編《毛以后中國的政策貫徹》[418]中的幾篇文章；蒂倫·懷特：《在中國農村貫徹“一對夫妻生一個孩子”的人口計劃：國家目標與地方政策》[784]，見戴維·M.蘭普頓《政策貫徹》[418]；史蒂文·巴特勒：《中國農村行政機構中的矛盾與決策，1969—1976年》[71]；鮑大可：《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26]；斯圖爾特·R.施拉姆：《“經濟掛帥”？三中全會以來的意識形態與政策，1978—1984年》[636]，見《中國季刊》[133]，99（1984年9月），第417—461頁；安妮·瑟斯頓：《中國文化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見的創傷》[713]，《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第一部分，57.4（1984—1985年冬），第599—620頁，第二部分，58.1（1985年春），第5—27頁。

[[43]](#_43_11)史蒂文·巴特勒是一個例外，他與人共享他的關于河北人民公社的原始材料。劉易斯·普特曼為這些意外的材料作了計算機使用的準備。

[[44]](#_44_11)J.布魯斯·雅各布斯：《中國的政治聯盟中排他主義的一個雛形：一個臺灣鄉區中的“感情”與“關系”》[360]，《中國季刊》[133]，78（1979年6月），第237—273頁；盧西恩·派伊：《中國人的政治精神》[592]；理查德·所羅門：《毛澤東的革命》[674]；理查德·W.威爾遜：《學做中國人：臺灣兒童的政治社會化》[795]；瑪杰里·沃爾夫：《林家：一個中國農民家庭的研究》[801]；莫頓·弗里德：《中國社會的組織：對中國一個縣城的社會生活的研究》[257]。

[[45]](#_45_11)愛德華·亨特：《紅色中國的洗腦》[347]；利夫頓：《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對中國“洗腦”的研究》[454]；埃德加·斯凱恩、英奇·施奈爾和柯蒂斯·巴克：《強制的勸說》[628]。

[[46]](#_46_10)見許華茨《“毛主義傳說”的傳說》[643]，《中國季刊》[133]，2（1960年4月），第35—42頁；《論毛澤東的“創造性”》[642]，《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34.1（1955年10月），第67—76頁，和《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639]；魏特夫：《“毛主義”的傳說》[799]，《中國季刊》[133]，1和2（1960年1月和4月），第72—86頁和第16—31頁；阿瑟·A.科恩：《“毛主義”有何創造？》[178]，《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10.6（1961年11月），第34—42頁，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177]。

[[47]](#_47_10)見富蘭克林·霍恩《中國的政治傳統》[308]；戴維·S.尼維森：《共產黨的倫理學與中國傳統》[553]，《亞洲研究雜志》[361]，16.1（1956年11月），第57—74頁；芮沃壽：《斗爭與調和：現代中國競爭準則的表征》[810]，《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6.1（1953年10月），第31—44頁；賀凱：《傳統的中國審查機關與新的北京政權》[342]，《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uiew），45.4（1951年12月），第1041—1057頁。

[[48]](#_48_10)見S.B.托馬斯《共產黨中國的政府與管理》[711]；趙國俊：《共產黨中國的群眾組織》[93]；H.阿瑟·斯坦納：《共產黨中國當前的“群眾路線”策略》[686]，《美國政治科學評論》，45.2（1951年6月），第422—436頁；文慧·C.陳：《共產黨中國的戰時“群眾”運動》[106]；反對集中營制度國際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迫勞動和集中營的白皮書》[184]；魏文啟（音）：《1952年以前的共產黨中國的法院與政策》[775]；陳錫恩：《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104]；查默斯·約翰遜：《共產黨對知識分子階層的政策》[367]。

[[49]](#_49_10)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637]。

[[50]](#_50_10)見鮑大可《共產黨中國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權》[28]。

[[51]](#_51_10)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749]。

[[52]](#_52_9)庫爾特·倫敦編：《一致與矛盾；中蘇關系的主要方面》[480]；唐納德·特雷德戈爾德編：《蘇聯的共產主義與中國的共產主義：相似點與不同點》[721]。

[[53]](#_53_8)D.W.福克馬：《中國的文學教條與蘇聯影響，1956—1960年》[249]；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持不同文藝見解者》[270]。

[[54]](#_54_8)劉大中和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1933—1959年的國民收入和經濟發展》[474]；沃爾特·蓋倫森、亞力山大·埃克斯坦和劉大中編：《共產黨中國的經濟趨向》[218]；W.W.霍利斯特：《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與社會價值，1950—1957年》[305]；肯尼思·R.沃克：《中國農業的計劃：公有化與私人經濟成分，1956—1962年》[758]；亞力山大·埃克斯坦：《共產黨中國的國民收入》[213]；德懷特·珀金斯：《共產黨中國的市場管理與計劃》[577]；喬治·埃克隆：《為中國政府的預算提供資金：大陸中國，1950—1959年》[212]。

[[55]](#_55_8)拉爾夫·鮑威爾：《共產黨中國的軍政關系》[587]；約翰·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任務》[267]；埃利斯·喬菲：《黨與軍隊：中國軍官的職業化與政治控制，1949—1964年》[366]；愛麗絲·蘭格利·謝：《中國的秘密軍事文件：軍事學說與戰略》[319]，《中國季刊》[133]，18（1964年4月），第79—99頁。

[[56]](#_56_7)杰羅姆·科恩：《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程序入門，1949—1963年》[179]；詹姆斯·R.湯森德：《共產黨中國的政治關系》[720]；馬丁·懷特：《中國的小團體與政治儀式》[788]。

[[57]](#_57_7)這些論文收入許華茨的《共產主義與中國：不斷變動的意識形態》[641]；又見他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640]。

[[58]](#_58_7)見斯圖爾特·R.施拉姆的著作《毛澤東》[630]，《毛澤東的政治思想》[631]；又見陳志讓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108]。

[[59]](#_59_7)特別見約瑟夫·利文森的三部曲《儒家的中國及其現代的命運》[434]；又見約瑟夫·利文森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思想》[433]。

[[60]](#_60_7)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667]，《亞洲研究雜志》[361]，24.1，2，3（1964年11月，1965年2月和5月），第3—44、195—228、363—400頁；楊慶陞：《一個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農村》[822]，《中國社會的宗教》[824]和《共產主義革命中的中國家庭》[823]；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東南部的家系組織》[255]和《中國人的家系和社會：福建和廣東》[256]。

[[61]](#_61_7)特別見盧西恩·派伊的《一定條件下的中國》[595]，《外交事務》，45.2（1967年1月），第229—245頁。

[[62]](#_62_7)斯坦利·卡諾：《毛與中國：不斷革命》[383]；愛德華·E.賴斯：《毛的道路》[611]。

[[63]](#_63_7)安奉俊（音）：《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革命》[2]；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與中國“文化革命”：群眾批評的政治》[201]；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495、496]。

[[64]](#_64_7)見李洪勇（音）《中國文化革命的政治》[430]；斯坦利·羅森：《紅衛兵的派性與廣州的文化革命》[620]。

[[65]](#_65_6)例如，見安德魯·內森的《中國共產黨政治的一個宗派主義典型》[545]，《中國季刊》[133]，53（1973年1—3月），第1—33頁；安德魯·內森與埃德溫·溫克勒之間的爭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搖擺》[546]，《中國季刊》，68（1976年12月），第720—750頁；鄒讜：《中國共產黨政治中非正式團體的研究的序言》[725]，《中國季刊》65（1976年3月），第98—114頁。

[[66]](#_66_6)奧德麗·唐尼索恩：《小單位組成的中國經濟：文化革命以來的某些經濟趨勢》[203]，《中國季刊》[133]，52（1972年10—12月），第605—619頁；尼古拉斯·拉迪：《中國財政管理中的集中與分散》[424]，《中國季刊》，61（1975年3月），第25—60頁，和《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分配》[421]；奧德麗·唐尼索恩和尼古拉斯·拉迪：《評中國財政管理中的集中與分散》及《答復》[204]，《中國季刊》，66（1976年6月），第328—354頁；羅伯特·M.菲爾德、凱思林·麥克格林和威廉·B.阿布尼特：《中國的政治斗爭與工業增長：1965—1977年》[241]，載《毛以后的中國經濟》[373]，第1卷，第239—284頁；弗雷德里克·泰韋斯：《中國各省的政策》[703]。

[[67]](#_67_6)蒙蒂·雷·布拉德：《中華人民共和國精英人物研究：文獻評論》[68]，《亞洲觀察》（Asian Suruey），19：8（1979年8月），第896—910頁；羅伯特·A.斯卡爾皮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英人物》[625]；威廉·丁：《中國軍隊宗派主義的縱向研究》[717]，《亞洲觀察》，19：8（1979年8月），第789—800頁；保羅·汪：《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中國高層領導》[805]；D.邁克爾·蘭普頓：《通向權力之路：當代中國精英人物的浮沉》[419]。

[[68]](#_68_6)見維克多·福肯漢《當代中國的公民與團體》[232]；戴維·古德曼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團體與政治》[273]；維克多·倪和戴維·莫津戈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548]；詹姆斯·沃森編：《革命后中國的階級與社會階層》[771]。

[[69]](#_69_6)亞歷山大·埃克斯坦編：《中國經濟產品的數量測度》[216]。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資助的叢書：《大陸中國的一個經濟側面》[370]，兩卷；《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評價》[371]；和《中國：經濟的再評價》[372]。又，艾倫·P.L.劉：《共產黨中國的政治文化與集團斗爭》[464]。

[[70]](#_70_5)德懷特·珀金斯：《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578]；德懷特·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的現代經濟》[580]；羅伯特·德恩伯格編：《從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的發展經驗》[200]。

[[71]](#_71_4)例外有，費正清：《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國》[226]；莫里斯·邁斯納：《毛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526]；約翰·伊斯雷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356]，見查默斯·約翰遜編《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與政治》[368]；詹姆斯·P.哈里森：《取得政權的長征：中國共產黨的歷史，1921—1972年》[292]；理查德·C.桑頓：《中國：為權力而斗爭，1917—1972年》[712]。

[[72]](#_72_4)弗朗茲·邁克爾：《毛與不斷革命》[529]。

[[73]](#_73_4)鄒讜：《從歷史的角度看文化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724]。

[[74]](#_74_4)理查德·洛溫撒爾：《共產黨政策中發展與空想的對立》[481]，見查默斯·約翰遜編《共產主義制度的變化》[369]，第33—116頁。

# 各章參考書介紹

米歇爾·奧克森伯格在前面那篇全面的分析文章中，列出有關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資料和由此產生的主要書籍。下面有關本書各章的書目介紹，不可避免地在許多參考書上與那篇總的評述相重復。

我們想，這個重復可能是有幫助的，因為撰稿者都根據他們所寫的題目，各自提出對重要著作的選擇，而奧克森伯格教授則著重于中國的政治問題。

## 第一章 中國的再統一

探討這個變化多端的題目，我們可以從朝代的比較開始，特別是它們的建立與滅亡。有關這個題目的文獻比我們可能期望的要少。1944年，14位京都和東京的學者聯合起來，進行一項“征服的王朝”的共同研究，其中就有當時日本想要取而代之的。在中國事變中，對以前的實例作一個歷史考察可能是有用的。1943年，東亞研究所出版了一本300頁的《異族統治中國史》[718]。這本書考察了北魏、金、元、清等幾個朝代的由來、職官與軍事制度、經濟與宗教機構，以及對中國和中亞的政策。1952年，香港新亞學院的錢穆教授出版了一本類似的開路之作，題為《中國歷代政治得失》[127]。這個題目分析的是漢、唐、宋、明、清五朝的政府組織、考試制度和經濟制度。這本雖然簡短然而有趣的概觀，現在已由薛君度和喬治·O.托頓第三譯成《中華帝國的傳統政府：批判性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賀凱出版了一本對朝代比較有重要幫助的《中華帝國職官詞典》[340]（斯坦福，1985年）。它擴充了原有的中文手冊《歷代職官表》[338]，并提供了實用的英文對應官銜。

關于朝代的建立和它們重新統一中國的記事，見芮沃壽對隋、霍華德·J.韋克斯勒對唐、小埃德蒙·H.沃西對宋、愛德華·L.德雷爾和約翰·W.達迭斯對明的研究，小約瑟夫·F.弗萊徹對滿族人的研究可與魏斐德研究滿清征服的新作《大事業》[754]結合起來看——以上在第一章第10頁注①中，均作了注釋。關于秦漢兩朝的建立，見《劍橋中國史》第1卷，1—5章。一旦開始研究，會發現關于朝代建立的文獻是極多的，但全面的比較研究卻意外地少。

## 第二章 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

對1949—1957年的研究，必須主要地建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出版物的基礎上。在那幾年里，特別是50年代中期，這些材料在可利用性和相對地詳盡與坦率上都有可取之處。除了可以得到全部重要的中央報刊如《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和《學習》之外，還可以得到許多省級報紙和從50年代中期起的政府部門的專業刊物，雖然在收藏上存在相當大的空白點。收藏這些出版物最豐富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香港聯合研究所根據這些資料編了一種很有用的、范圍廣泛的剪報檔案。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在其所編各種叢書的相當廣泛的基礎上，提供中國報刊的英文翻譯——特別是《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中國大陸雜志選粹》[736]（后來改為《選錄》）和《當代背景材料》[735]。提供這種英文翻譯的，還有聯合研究所從1955年開始的《聯合研究服務》[734]。

當代官方文件的各種匯編，也是可以得到的。特別有用的是年刊《人民手冊》[364]和期刊《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155]。主要的英文匯編有：《1955—1959年的共產黨中國：政策文獻，附分析》[186]；《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219]；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編：《百花運動》[493]；以及哈羅德·C.欣頓編：《1949—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獻概覽》[299]。

補充當代文獻的，另有幾個資料來源：親身經歷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發展的中外人士的個人記述；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發表的報道；和毛以后時期出現的資料。所有這些資料提供了進一步的看法和信息，但各有偏見，需要用現有資料進行仔細估價。中國逃亡者的第一手報告已被結合進各種第二手著述中，在提到的這個時期，值得注意的有伊日拉·F.沃格爾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一個省城的規劃與政策，1949—1968年》[749]。逃亡者寫的關于這個時期的主要作品有周鯨文：《十年暴風：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真相》[148]；羅伯特·羅和漢弗萊·埃文斯：《逃出紅色中國》[479]；穆富升（音）：《百花凋謝：毛統治下的中國知識分子》。[[1]](#_1_Mu_Fu_sheng_The_wilting_of_th)1949—1957年在中國的外國人所寫的書有博德：《北京日記，1948—1949年：革命的一年》[55]；阿林和阿黛爾·里克特：《釋放的俘虜》[614]；莫里斯·威爾斯：《叛徒：一個美國人在共產黨中國的12年》[794]。此外，還有鮑大可的《共產黨接管前夕的中國》[22]，雖然對共產黨的實際統治僅有簡短的記述，但對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繼承的形勢，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識。

1966—1969年出現的“文化大革命”資料，基本上有兩類：關于許多領導人在1966年以前的所謂罪行的大有爭議的“揭發”；可疑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文件，它們只有在那時才可以得到。揭發不僅見于1966—1969年的官方出版物，而且特別見于所謂的紅衛兵資料——小報和小冊子，它們由各種“造反”組織非正式出版，但得到中共黨內高層中一些派系的支持。各主要圖書館都收藏有這類材料的匯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各種叢書中有范圍廣泛的譯文。此外，電臺廣播的揭露可查看《外國廣播新聞處：共產黨中國》[251]；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摘要：遠東》[63]；《中國省級廣播電臺新聞》[551]。

用處更大的是1949—1957年的文件，大多通過1966—1969年的紅衛兵資料可以得到。原文分析建立了對這些文件的高度信任，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對黨內的講話和指示。毛的言論最值得注意的匯編有《毛澤東思想萬歲》[506、507]、《毛澤東思想雜集》[508]；陳志讓編：《毛澤東》[109]；陳志讓編：《毛澤東文集及書目》[110]；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634]。

毛去世后，官方出版了他1949—1957年時期的著作《毛澤東選集》第五卷[502、503]，它既提供了一些以前得不到的文獻，又提供了一些與“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式發表的原文不同的（但一致的）原文。另一本重要匯編是《陳云文選（1949—1956年）》[114]。此外，官方新聞媒介和一批內容充實的回憶錄、年表、黨史，回顧了1949—1957年間的許多事態發展。當前（80年代初）官方對這個時期的看法，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607]〔《北京周報》，27（1981）〕，和權威性較小的廖蓋隆《歷史經驗和我們的發展道路》[447]（《問題和研究》[358]，1981年10月和11月）。廖的文章僅是日益增多的內部文章、書籍、刊物和文獻之一，它們在中國官方機構中發行，它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這一時期或別的時期有重要闡述，現在外部也可以得到，西方圖書館有收藏。最后，日益增多的學者的交換，提供了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共同討論1949年以后的重要事件的機會。

現在已經開發出一批數量很大的關于1949—1957年時期的第二手文獻。這類文獻的主要指南有：彼得·伯頓和尤金·吳：《當代中國研究指南》[47]（其中也包括原始材料）；米歇爾·奧克森伯格、南希·貝特曼和詹姆斯·B.安德森合編：《當代中國政治的第二手英文文獻書目》[556]；施堅雅等編：《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669]（包括西文、中文和日文出版物）；和年刊《亞洲研究書目》[50]。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對50年代初期和中期以及總的來說對當代中國的專題研究是很少的；最值得注意的出版物都是一般性的，如鮑大可的《1949—1955年的早期共產黨中國》[23]；彼得· S.H.湯：《今日共產黨中國》[694]；S.B.托馬斯：《共產黨中國的政府與管理》[711]。但從60年代中期起，新一代學者開始寫出視野廣闊和老練的研究著作。關于中國政治，包括1949—1957年期間的重要關節在內，有很多作品，主要是：哈里·哈丁：《創建中的中國：官僚政治的問題，1949—1976年》[291]；弗朗茲·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637]；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中國的政治與清洗：1950—1965年的整風和黨的準則的衰敗》[702]；詹姆斯·R.湯森德：《共產黨中國的政治關系》[720]；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749]。

有些集中于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包括這個時期的重要斷面，如阿瑟·A.科恩：《毛澤東的共產主義》[177]；斯圖爾特·R.施拉姆：《導言：從歷史角度看文化革命》[633]，見他的《中國的權力、參與和文化變化》[632]；許華茨：《共產主義與中國：不斷變動的意識形態》[641]；約翰·布賴恩·斯塔爾：《繼續革命：毛的政治思想》[679]。此外，許多研究專門領域的專題著作闡述了1949—1957年時期的一些方面。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如杰羅姆·艾倫·科恩：《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程序入門，1949—1963年》[179]；瓊·托伊費爾·德雷爾：《中國的四千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少數民族與民族平等》[210]；約翰·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任務》[267]；埃利斯·喬菲：《黨與軍隊：中國軍官的職業化與政治控制，1949—1964年》[366]；戴維·M.蘭普頓：《中國的醫藥政治：1949—1977年的政策發展過程》[417]；本尼迪克特·斯塔維斯：《中國的農業機械化政策》[685]；馬丁·金·懷特：《中國的小團體與政治儀式》[788]。

過去15年中，出現了高質量的專題研究，它們是專門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八年的。關于中國城市的權力鞏固過程，最好的研究是肯尼思·G.利伯塔爾的《天津的革命與傳統，1949—1952年》[452]；蘇珊娜·佩珀的《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574]的最后幾章，可以作為前書的補充。多蘿西·J.索林格的《中國西南的地方政府和政治一體化，1949—1954年：個案研究》[673]，考察了解放后地方政府的性質。威廉·布魯格的《中國工業企業中的民主與組織（1948—1953年）》[65]，分析了1949年后的工業組織的政策。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的《中國精英人物的訓練：整風的強迫與說服的方法，1950—1953年》[701]，對黨早年的整風運動的考察，比《政治和清洗》[702]更詳盡。

有幾本重要著作對主要的農村改造——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和1952—1956年的合作化——作了考察。50年代后期的一本杰出的論著，是楊慶陞的《一個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農村》[822]。更近的作品有托馬斯·保羅·伯恩斯坦：《中國和俄國農業集體化的領導和動員的比較》[44]；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1949—1956年》[662]；約翰·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改革：農業體制的改造》[804]。除此之外，關于這些問題還有幾篇重要文章，如杰弗里·希林勞：《中國南部的土地改革與農民動員，1947—1950年》[658]，見戴維·萊曼編《土地改革與農業改良主義：對秘魯、智利、中國和印度的研究》[431]；肯尼思·R.沃克：《回顧集體化：1955年秋至1956年春的“社會主義高潮”》[760]，《中國季刊》[133]，26（1966）。

兩篇未發表的哲學博士學位論文，對50年代中期的政策制定過程，作了相當重要的說明。查爾斯·托馬斯·芬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與政策制定，1954—1955年》[243]，考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官僚化的最高階段時，各個政策領域的相互關系。米歇爾·C.奧克森伯格的《共產黨中國的政策的明確表述：群眾灌溉運動問題，1957—1958年》[555]，把研究延伸到“大躍進”，揭示了很多形成中共規劃的政治、技術與管理的因素。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對1956—1957年的重要事態發展——政治自由化，關于經濟政策的辯論，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和黨的整風——有非常廣泛的研究：《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1956—1957年的人民內部矛盾》[495]。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看法和不同的解釋，見下列各書的有關部分，D.W.福克馬：《中國的文學教條與蘇聯影響，1956—1960年》[249]；默爾·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持不同文藝見解者》[270]；理查德·H.所羅門：《毛澤東的革命與中國的政治文化》[674]；泰韋斯：《政治和清洗》[702]。

有幾種研究的輔助讀物值得注意。香港時事通訊《中國新聞分析》[132]，是從1953年以來提供有關各種論題的極有價值的資料摘要。肯尼思·利伯塔爾的《1949—1975年黨中央和政府會議研究指南》[451]，汲取當代和“文化大革命”的資料，確定1949年后主要的決策會議。很多著作提供了傳記資料，如唐納德·W.克萊因和安妮·B.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人名詞典，1921—1965年》[392]，以及《現代中國人名詞典》[264]，《共產黨中國人名辭典》[787]。

## 第三、八章 經濟

1960—1978年期間，少發表或不發表經濟數字的政策和中國國內禁止認真的經濟分析，不僅在更近一些的時期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突然開始之前的幾年里，就已經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析起了抑制作用。國家統計局于1979年發表20年來的第一份公報，及隨后發表的大量新材料，既有數量又有質量，既包括當前的也包括歷史的發展，使情況起了顯著的變化。在統計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中國統計年鑒》，從1981年以來由國家統計局用中、英兩種文字出版。它們不僅提供當前的統計數字，而且提供了1950年以后的大量統計數字，其中許多是以前沒有發表過的。例如，1981年的年鑒（1982年出版）包括了1950—1981年許多進出口產品每年的數量，以及同一時期與26個貿易伙伴實現的進出口價值。后來的幾冊透露了關于早些年的新數字，也提供了每年對許多系列的修正。

此外，從1981年起，中國出版規模巨大的《中國經濟年鑒》[162]，它提供主要的經濟文件、經濟政策聲明和有關經濟發展的法律與法令的全文；評述各省和省一級自治區的經濟發展。還出版幾個重要部門的年鑒，如《中國農業年鑒》[170]從1981年開始出版，《中國煤炭工業年鑒》[169]從1983年開始出版。所有這些年鑒包含的材料，既涉及長遠的也涉及新近的發展。

提供中國人的分析或講話原文的最重要的書籍有，馬洪和孫尚清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488]；《陳云文稿選編（1949—1956年）》；這本書后來在中國公開出版，書名《陳云文選（1949—1956年）》[113]；《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112]；這本書后來公開出版，書名《陳云文選（1956—1985年）》[115]；《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490]；以及柳隨年編的《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473]，此書對于我們了解“大躍進”的后果極為重要。

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刊物《黨史研究》，發表了許多批判性的經濟分析和以前不能得到的講話。從這些材料中選出的幾本匯編已經出版，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朱成甲編的《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149]。周太和編的《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147]，提供了主要改革與政策倡議的編年提要。房維中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年）》[235]是一部規模巨大的簡編。

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手文獻，范圍很廣但質量參差不齊。有關50年代的，由于有國家統計局和計劃部門發表的相當全面的報告，一般說來，遠比有關20世紀60年代的令人滿意，因為后者在1978年以前幾乎沒有什么原始資料。關于50年代的報道，內容最廣泛與最令人滿意的有，李卓敏：《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441]，此書著重點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3—1957年）；亞歷山大·埃克斯坦：《中國的經濟革命》[215]，此書涉及整個毛澤東時期，但它最有力的分析是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大躍進”的。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1956—1957年的人民內部矛盾》[495]，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1958—1960年的大躍進》[496]，對“大躍進”前夕和“大躍進”時期黨的最高層的經濟決策，提供了最有洞察力的分析。

20世紀60年代的前半期，沒有受到西方學者多少注意。中國在這個時期堅持的統計封鎖證明是有效的，把1959—1962年之間的一次大規模饑荒成功地隱瞞了20年，根據不同的估計，這幾年的死亡人數高出正常情況1600萬到2700萬人。雖然饑荒本身是一個日益引起注意的題目，但對20世紀60年代前半期經濟發展的廣泛研究尚未出現，不過，下面提到的專題研究中，有一些是研究這個時期的具體問題的。

關于20世紀50年代經濟發展的專題文獻是很多的。評價中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的，有兩部突出的研究著作，希格魯·伊舍卡瓦：《大陸中國的國民收入與資本積累：對官方統計數字的考察》[355]；劉大中和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1933—1959年的國民收入和經濟發展》[474]；德懷特·珀金斯：《共產黨中國的市場管理與計劃》[577]，此書探索50年代經濟中社會主義計劃的擴大與市場方向部分的收縮；亞力山大·埃克斯坦：《共產黨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214]，此書對50年代外貿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特別是蘇聯的技術轉讓，提供了最全面的研究；尼古拉斯·R.拉迪：《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分配》[421]，此書從分析中央與省的財政關系入手，探索經濟中現代部門的資源分配的集中化程度；奧德麗·唐尼索恩：《中國的經濟制度》[202]，此書對國家的經濟官僚機構的發展及其與計劃模式和資源分配的關系，提供了詳盡的報道。

關于工業發展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托馬斯·G.羅斯基的《中國向工業化的過渡》[601]；和趙岡的《共產黨中國工業增長的速度與模式》[90]；約翰·菲利普·埃墨森在他的《1949—1958年大陸中國的非農業就業》[224]中，把工業中的勞動力吸收和城市經濟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

有兩本研究農業發展的書以20世紀80年代初為下限，它們是尼古拉斯·R.拉迪的《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422]和肯尼思·R.沃克的《中國食用糧食的收購和消費》[759]。前者探索農業計劃體制的發展，后者探索國家執行的強制交售農產品制度的發展。

至今仍然很有價值的較早時期的農業專題論著，有德懷特·H.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578]，此書將1949年以后的發展，置于歷史的長河中進行考察；和趙岡的《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1949—1965年》[91]，此書詳細探索了“文化大革命”前農業組織變革的經濟后果。

## 第四、九章 教育

1949—1965年的標準原始資料，前面已經列舉，關于教育的研究，必須基本上依賴它們。中國的官方報紙、刊物、偶爾發布的國家法令摘要，構成主要的原始資料。得到中國原始資料最方便的途徑，是通過聯合研究所的剪報檔案服務機構，它的存在到1983年為止。這些資料現藏香港浸禮會學院，供不愿看縮微膠卷的人使用。有關從幼兒園直到大學的教育政策與實施等各方面的檔案，數量很大，能對許多研究著作提供一個基礎。

教育問題上最有用的公認為優秀的翻譯服務，是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當代背景材料》[735]叢書（起自1950年）；《中國大陸雜志選錄》[737]（起自1960年）；從1955年至1960年名為《中國大陸雜志選粹》[736]。其他有用的翻譯服務有該領事館的《中國大陸報刊概覽》[738]（起自1950年）；《外國廣播新聞處，每日報道——共產黨中國》[251]（美國政府編，起自1968年）；《中國省級廣播電臺新聞》[551]（英國地區情報處編，香港，起自1963年）；《中國問題》[134]（英國地區情報處編，起自1964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每日新聞發布》[550]（起自1948年）；《聯合研究服務》[734]（香港聯合研究所，起自1955年）；以及美國政府的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的各種叢書[374]。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1968年）的紅衛兵非正式出版物，對收集60年代初的資料也有幫助。由于這些資料是在白熱化的舌戰中編成的，用時應加注意。它們包含有別處得不到的資料，如關于政策在個別學校貫徹落實的情況。紅衛兵對學校辦公室和檔案室的沖擊，使學者再次成為社會動亂的意想不到的受益者。斯坦利·羅森[619、620]和李洪勇（音）[430]的作品（見書目），至今是利用這些材料的著作中最著名的。這些紅衛兵出版物的規模最大的摘要，是20卷本的《紅衛兵出版物》[603]，華盛頓特區研究圖書館協會的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在1975年重印，它的姊妹篇，一套多卷本的增補資料，在1980年重印。同樣資料的英文譯文，可以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在60年代后期的發行范圍有限的《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的《補遺》[739]和《中國大陸雜志選錄》[737]中找到。

學術研究也受到毛以后時期比較寬松的政策的好處，其中包括為早期的政策恢復名譽，它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詆毀。在文獻資料方面，1968—1976年主要是個空白時期，但在70年代后期開始出版許多新材料，回顧受到很多誹謗的17年（1949—1966年）。遺憾的是，這類材料的大多數根據的是第二手資料，并且帶有明顯的偏袒十七年和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偏見。不過，人民教育出版社當前（80年代中期）的出版書目，顯示出一個可喜的跡象，即有些關于早些年代的書正在寫作中，許多關于1949年以前的書也正在出版，對老解放區的教育和民國時期知名的非黨教育家，有某種有意思的重視。

一本特別有價值的研究工具書，是1984年出版的《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年》[161]。其中有140頁重印了1949—1981年的文件和有關教育的指示——盡管每個門類都缺少1964—1978年的資料，這是受毛主義影響的年代。另一本有用的參考書，是1983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年》[154]。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人的資源。作為口述歷史的訪問記，不論是在中國國內進行的，或是香港的中國人講述的（他們從過去的親身經歷中了解這個制度），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訪問資料的教育論著的作者，有斯坦利·羅森、蘇珊.舍克和喬納森.昂格爾。

盡管可以得到豐富的資料，中國以外的學者并沒有很好地研究50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年），中國的“教育革命”才把這個問題列為值得研究的項目。從此，國際注意力集中在它的經驗與后果上。早些年，無論是教育專家或社會科學家，看來都沒有怎么被這個題目所吸引。對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的崩潰，也出現了類似的興趣減退。“十七年”還留下許多未經開拓的領域。

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其對毛以后時期的含義來說），是50年代蘇聯影響的程度。失敗的或不得人心的試驗，很難提供研究的動機。但1950—1957年的“向蘇聯學習”階段，是值得研究的，因為它能告訴我們關于那個時期移植模式的效力、建立的機構和培訓的人員的不斷的影響。

另一個沒有進行探究的失敗的試驗是“大躍進”。那時開始的教育改革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義發動的，并明顯地為后來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試驗樹立了許多先例。但到目前為止，這種聯系的性質還沒有文件加以證明和明確地予以說明——也沒有對失敗的分析，這種分析必然會引出沒想到的結果和沒有記載過的收獲。

假如這是關于50年代研究的狀況，那么關于60年代初期的研究要算是不錯的，相對來說是過多的。但上面提到的羅森、舍克和昂格爾的著作，基本上是根據訪問資料，他們把對文件的研究任務，主要留給了別人。同時，對這個時期的比較常規的研究，只是部分地完成了這一任務，如陳錫恩、朱莉婭·匡（音）、簡-英格瓦·洛弗斯特、羅納德·普賴斯等人的著作（見第四章、第九章腳注和書目）。這些著作都更著重理論和政策，而不是實行和貫徹，后者只有通過訪問和現場研究才能揭示出來。現在，外國研究者進入中國比較容易了，我們希望，這將使這兩個目標在個人研究中較容易地結合起來。

## 第五、十章 黨與知識分子

關于知識分子和思想動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基本的中文資料。主要的資料來源，分散在全國性報紙和刊物上。延安的報紙《解放日報》，是關于延安時期游擊區知識分子的主要資料來源。它包括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討論和知識分子自己的陳述。“左翼”和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主要資料來源，是從1938—1946年在重慶出版《新華日報》。1949年后，關于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黨—知識分子的討論的主要資料來源，是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和知識分子的報紙《光明日報》。黨的理論刊物《學習》（它在“大躍進”中被《紅旗》取代）是最關心思想問題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中國青年報》，是思想動向的另一個資料來源。一些主要大學的刊物，也登載思想—政治的討論，不過這些刊物在毛的時期很難得到。

其他有關知識分子特別是文藝界知識分子和50年代及60年代的爭論的資料來源，有《文藝報》、《文藝學習》、《人民文學》和《上海文學》。50年代文藝界一些最主要的知識分子如周揚、胡風、丁玲、馮雪峰、艾青，他們的作品可以在這些刊物中找到。60年代好爭論的知識分子如鄧拓、吳晗和馮友蘭的作品，可以在《歷史研究》、《哲學研究》和《學習與研究》中找到。

他們的作品也有印成單行本的，馬南邨（鄧拓）：《燕山夜話》[489]；吳南星（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札記》[819]；廖沫沙、夏衍.、吳晗、唐弢和孟超：《長短錄》[448]；艾思奇：《艾思奇文集》[4]。

毛對知識分子的看法的譯文，可以在他的五卷本選集中找到，其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最直接的關系。毛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看法的稍后的資料，有毛的《四篇哲學論文》[505]和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的《毛主席向人民講話：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634]。“百花”時期知識分子的文章和陳述的譯文，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編的《百花運動》[493]。“百花”時期的文學作品和評論，見聶華苓編的《百花文學》[552]，共兩卷。

關于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知識分子的反應，最全面的討論有，默爾·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持不同文藝見解者》[270]，時間從30年代后期到“大躍進”時期，以及他的《中國知識分子：建議和異議》[271]，時間從60年代初直到毛以后時期。其他的著作研究這個問題的各個方面。羅伯特·杰伊·利夫頓的《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對中國“洗腦”的研究》[454]，討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杜韋·福克馬的《中國的文學教條與蘇聯影響，1956—1960年》[249]和魯道夫·瓦格納的《詐騙和偵察》[750]（見沃爾夫岡·庫賓和魯道夫·瓦格納編的《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學批評文集》[399]），討論50年代蘇聯的思想傾向對中國的影響。對60年代初好爭論的知識分子的研究有：詹姆斯·普西：《吳晗：借古非今》[590]；蒂莫西·奇克：《鄧拓：文化、列寧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內二中擇一的馬克思主義》[98]。研究60年代激進的知識分子，見帕里斯·張的《中國文化革命中的激進分子和激進思想》[85]；拉斯·拉格瓦爾德：《作為文學評論家和理論家的姚文元：中國日丹諾夫主義的出現》[597]。

從政治角度看思想發展的主要著作有：理查德·所羅門：《毛澤東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674]；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1956—1957年的人民內部矛盾》[495]和《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1958—1960年的大躍進》[496]。

## 第六章 對外關系：從朝鮮戰爭到萬隆路線

雖然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和外交有大量的研究著作，但有關從朝鮮戰爭到萬隆路線這一時期的出版物卻很少。它們之中，雅克·吉勒馬的《執政的中國共產黨，1949—1976年》[285]和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的《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1956—1957年的人民內部矛盾》[495]，與弗朗茲·H.舒爾曼的《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637]一樣，對中國對外關系的國內背景，作了很可靠的論述。中嵨嶺雄的《中國：歷史、社會和國際關系》[540]，對了解當代中國事務的基本輪廓是有用的。

對中國外交政策進行一般觀察的杰出著作有：費正清：《美國與中國》[228]第4版；鮑大可：《共產黨中國與亞洲：對美國政策的挑戰》[21]；哈羅德·C.欣頓：《中國的強橫要求：1945年以來中國對外關系的分析》[298]修訂版；R.G.博伊德：《共產黨中國的外交政策》[60]。對中國對外關系的各個方面作全面論述的有，入江啟四郎和安藤正士編：《當代中國的國際關系》[354]；O.B.波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的《1945—1973年的中蘇關系簡史》[58]，比較多地反映了蘇聯官方的看法。

關于原始資料，我們可以利用中國的官方材料，如《毛澤東選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59]叢書。關于美國政府的文件，見《美國的對外關系》[252]叢書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集》[547]。還有毛澤東的非正式發表的文獻，如《毛澤東思想萬歲》[506、507]；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回憶錄，見斯特羅貝·塔爾博特編譯、愛德華·克蘭克肖作詳細注釋的《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后的遺言》[390]；以及斯特羅貝.塔爾博特編譯的《赫魯曉夫回憶錄》[389]。

關于“親蘇”時期或所謂蘇聯模式的50年代初期，我們可以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下列各書上：關于這個時期的蘇聯外交政策，見馬克斯·貝洛夫的《1944—1957年蘇聯在遠東的政策》[35]；亨利·魏的《中國與蘇俄》[774]；J.M.麥金托什的《蘇聯對外政策的戰略與策略》[500]；以及亞當·B.尤拉姆的《擴張與共存：蘇聯外交政策史，1917—1967年》[730]。這些是“經典的”專題論著，提供了基本概念和重要的分析框架。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之間“隱蔽的”斗爭，中嵨嶺雄的《中蘇的對抗和今天的時代：戰后亞洲的再評價》[539]，討論了雅爾塔會議后的有關方面；入江昭編的《亞洲冷戰的起源》[537]，是美國、歐洲和日本學者的文章的合集。

關于中美關系，鄒讜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723]，是最好的作品之一。多蘿西·博格和沃爾多·海因里希編的《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系》[57]，是一本歷史論文集。此外還有南希·B.塔克的《屈辱的模式》[728]和宇佐美滋的《司徒大使訪問北京的計劃：一個失去了機會的歷史轉折點》[745]，見《國際問題》（Kokusai mondai）。

關于朝鮮戰爭與中國的研究，相對地說有很多。歐內斯特·R.梅的《過去的“教訓”：美國外交政策中對歷史的利用與誤用》[521]和信夫清三郎的《朝鮮戰爭的爆發》[659]，從美國和日本的有利地位看朝鮮戰爭，對它的基本性質作了深刻的歷史說明。就中國的立場來說，艾倫·S.惠廷的《中國跨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的決定》[785]和斯圖爾特·R.施拉姆的《毛澤東》[630]，是富有成果的貢獻。此外還有羅伯特·R.西蒙斯的《緊張的聯盟：北京、平壤、莫斯科和朝鮮內戰的政策》[663]。

關于中國對萬隆路線的戰略轉變的研究比較少，但埃德加·斯諾的《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672]；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的《百花運動和中國的知識分子》[493]；中嵨嶺雄的《論當代中國：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內部動力》[538]，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變化的背景，作了基本分析。

唐納德·S.扎戈里亞的《中蘇沖突，1956—1961年》[837]是關于中蘇意識形態爭論的最好的書。約翰·吉廷斯的《中國軍隊的任務》[267]和彼得·范內斯的《革命與中國的對外政策：北京支持民族解放戰爭》[746]，分別對中國軍隊和中國的革命外交，作了扎實的分析。

## 第七章 “大躍進”

雖然當代中國的資料在“大躍進”陷入困境后變得不詳實起來（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不容易得到），但關于它卻有豐富的中文資料。首先當然是全國性報刊（如《紅旗》、《新華半月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其中許多對這個時期作了詳細索引（《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都每年出版索引）。研究指南（如詹姆斯·宋的《<紅旗>1958—1968年：研究指南》[675]，彼得·伯頓和尤金·吳的《當代中國研究指南》[47]）大大方便了對其他資料的有效利用。比較專門的出版物，如政府各部的刊物，也很有幫助（如蘭普頓在他對醫務政策的研究中所表明的）。有關公共衛生、財政和貿易，以及其他領域的這類刊物，均可以得到。

從1965年起，中國出現了幾大類資料，對研究“大躍進”至“文化大革命”這一時期很重要。首先，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和其他非官方資料的大量涌現。許多紅衛兵出版物均收入中國研究資料中心的20卷本《紅衛兵出版物》[603]。美國和海外的中國中心，還有大批紅衛兵資料的補充材料。題為《毛澤東思想萬歲》[506]、[507]的兩卷重要的毛澤東著作，非正式地出版于1967和1969年，兩卷本《毛澤東思想雜集》[508]是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從中選譯的，這些是毛在這個時期未發表的講話的主要原始資料。

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出現了對政治科學家特別有用的三類資料。一類是日益增多的回憶錄，作者是政治領導人和他們的助手或同事，其中有些對1958—1965年的政治運動提出了真知灼見。《彭德懷自述》[570]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其他如《回憶王稼祥》[344]，對這個時期也偶爾有深刻的看法。

第二類重要資料包括各種有關黨史的出版物。許多省級出版社出版了黨史，如湖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167]，還有一般的參考出版物，包括黨史問答和一連串黨的會議的詳情。最后，統計一覽表填補了這個時期的許多空白。

許多關于內政的第二手著作，對研究1958—1965年有用。一類是全國和地方的一般政治史，包括對這個時期個別部分的詳細敘述。例子有安奉俊（音）：《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革命》[2]；詹姆斯·P.哈里森：《取得政權的長征》[292]；莫里斯·邁斯納：《毛的中國》[526]；愛德華·賴斯：《毛的道路》[611]；理查德·所羅門：《毛澤東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674]；伊日拉·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749]。關于具體問題的專題著作，也提供了重要資料，如戴維·M.蘭普頓的《中國的醫藥政治》[417]，弗雷德里克·泰韋斯的《中國的政治和清洗》[702]和哈里·哈丁的《創建中的中國》[291]，僅是三個例子。

直接而完全地集中注意力于1958—1965年時期的，還有第二手的英文文獻。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的《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提供了最詳盡的有用的政治史。理查德·鮑姆和弗雷德里克·泰韋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32]和鮑姆的《革命的序幕》[30]，對60年代初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很好的記述。陳云在1956—1962年期間發表的關于經濟的主要意見，收入尼古拉斯·拉迪和肯尼思·利伯塔爾編的《陳云的發展中國的策略：一種非毛主義的可取辦法》[425]。

有關這個時期的期刊文章也格外豐富，既有對具體政治事件的研究（如戴維·查爾斯的《彭德懷元帥的免職》[96]），也有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如弗雷德里克·泰韋斯對省的預算的研究，見約翰·M.林德貝克編的《中國：一個革命社會的管理》[457]）。有幾篇哲學博士學位論文，如尼娜·哈爾彭的《經濟專家與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1955—1983年》[288]（密歇根大學政治科學系，1985年），也提供了重要的情況與見解。

## 第十一章 中蘇分裂

由于這個時期剛過去不久，不能利用標準的美國國務院資料，同時，蘇聯和中國守口如瓶，又嚴重地限制了蘇聯和中國材料的價值。一切事情都有例外，但大都明顯地違背官方的常規。例如，情報自由法令允許喬納森·波拉克（《中國外交政策中的觀念和方法：金門決策》[585]）說明1958年金門危機的幾個方面，從而反映出蘇聯和中國的態度。同樣，赫魯曉夫的回憶錄（《赫魯曉夫回憶錄》[389]）盡管是為個人利益服務的（跟所有這類著作一樣），并且有真實性問題，但對我們仍有啟發。當然，最有啟發的資料，是毛的未公開發表的講話和文章（主要有兩本，發行于1967年和1969年，書名都是《毛澤東思想萬歲》[506]、[507]）。它們是一個來路不明的派別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中發行的，為臺灣所得并影印出來。比較不那么聳人聽聞，但同樣難得的是唐納德·扎戈里亞的《中蘇沖突，1956—1961年》[837]，它肇始于中央情報局，他以前曾在那里工作，利用了權威的但高度保密的資料，特別是關于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的兩次對抗。

這種依賴秘密資料的做法雖然可靠，但不是正統的方法，對它們極有價值的補充，是20世紀60年代初蘇中兩黨和兩國政府之間大量的論戰通信。約翰·吉廷斯（在《中蘇爭論概觀》[268]中）將它們重新作了極好的整理與分析，攻擊與反擊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扎戈里亞的著作，并在一些事例上超過了它。由于每一方都把自己說得極好，把對方說得極壞，因此，在問題的范圍、它們的時間選擇和含義上，就大有探討的余地，下列作者就做得很好：威廉·E.格里菲思（《中蘇的分裂》[281]、《中蘇關系，1964—1965年》[282]、《阿爾巴尼亞與中蘇分裂》[280]）；亞力山大·達林（《國際共產主義的分歧》[192]）和G.F.赫德森、理查德·洛溫撒爾、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中蘇爭論》[343]）。

這些著作雖然值得注意（不管是否得到公認），但同各有關政府發表的通常是枯燥乏味的聲明相比，它們的準確性顯然不如檔案材料。例如，M.S.卡皮查在波拉克仔細研究過的他私下的會見與談話中，關于1958年8月赫魯曉夫與毛就中蘇軍事合作前景進行會談時各方的具體見解，就與毛的話大相徑庭。無論赫魯曉夫或毛，或由此引起的論戰上的變化，都沒有充分透露蘇聯的核武器制造援助的程度，像1963—1964年通過攝影情報所顯示的那么清楚。

除了標準的共產黨對學術研究和公布檔案的限制外，莫斯科同北京的現行關系也禁止它們充分而坦率地重提過去的事。因此，我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和有時帶傾向性的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推測。直到1985年才出現的毛以后時期的回憶錄，也沒有對這個時期有新的說明，雖然在彭德懷（《彭德懷自述》[570]）、伍修權（《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歷》[818]）和王炳南（《回顧九年的中美會談》[765]）的著作中，出現了和早年有關的珍貴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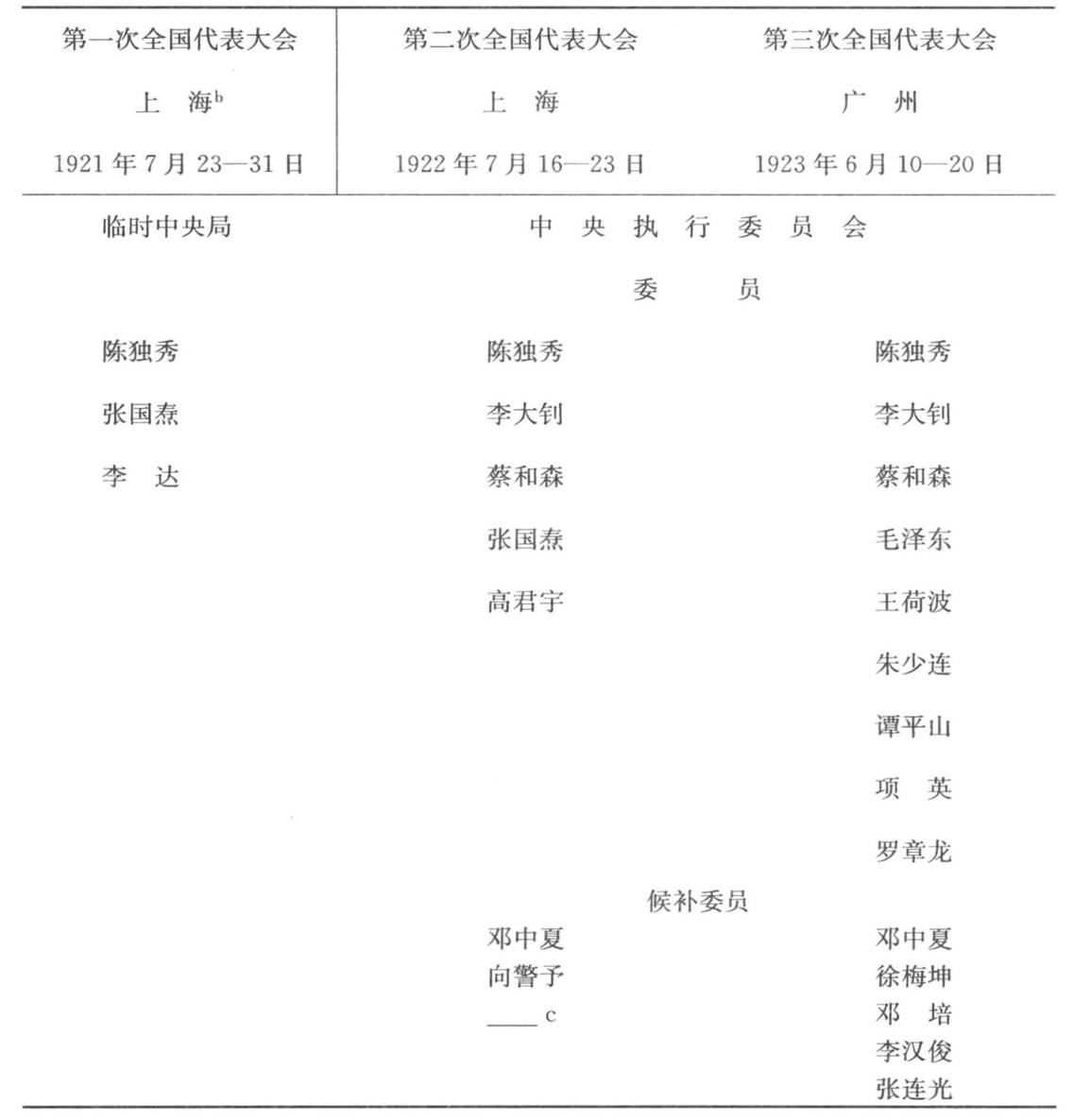
總之，關于這個時期的分析對“歷史”的說明究竟正確到什么程度，是大有爭議的。對于不那么明顯的外交關系，就更用得著這個防止誤解的說明了。因為北京除比較公開的外交之外，還常常進行秘密外交。對環繞中國的從巴基斯坦到朝鮮的亞洲弧形地帶，單獨的研究如戴維·莫辛戈的《中國對印度尼西亞的政策，1949—1967年》[535]，通過深入細致地訪問當地官員，把一個本來貧乏的題材寫得很詳盡。比使用互相影響的記載更困難的，是推測促成中國的態度的觀念和決心。美國獲得并出版的秘密軍事刊物（《工作通訊》[408]），對60年代初的人民解放軍只作了很少的說明。而這個刊物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高層的真正思想，尚難確定。

這種情況與毛以后時期出版物所反映的清楚得多的國內政治和經濟發展情況，造成鮮明的對比。統計資料、個人回憶錄和文件集提供了一塊比較肥沃的園地，而外交政策的土壤相對來說卻是貧瘠的。至今沒有一本由中國學者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說明國內的限制與國外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我們只能希望，周恩來的文件有朝一日能被這種研究所利用，這樣，這些決定性年代的更加準確的再現，可以為外國學者提供一個研究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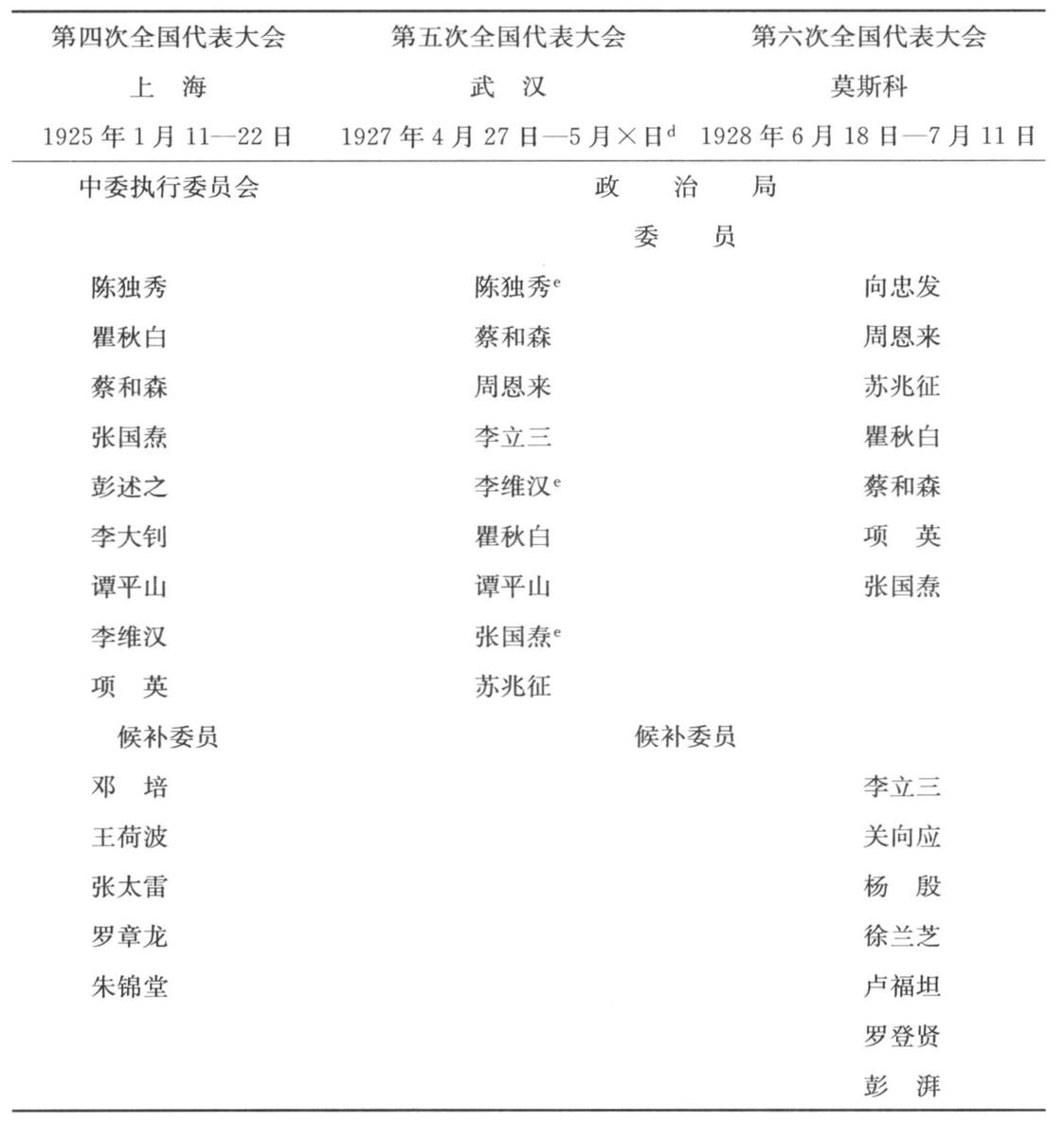
[[1]](#_1_13)Mu Fu-sheng，The wilt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under Mao.

# 會議與領導人

表10 黨的領導，1921—1928年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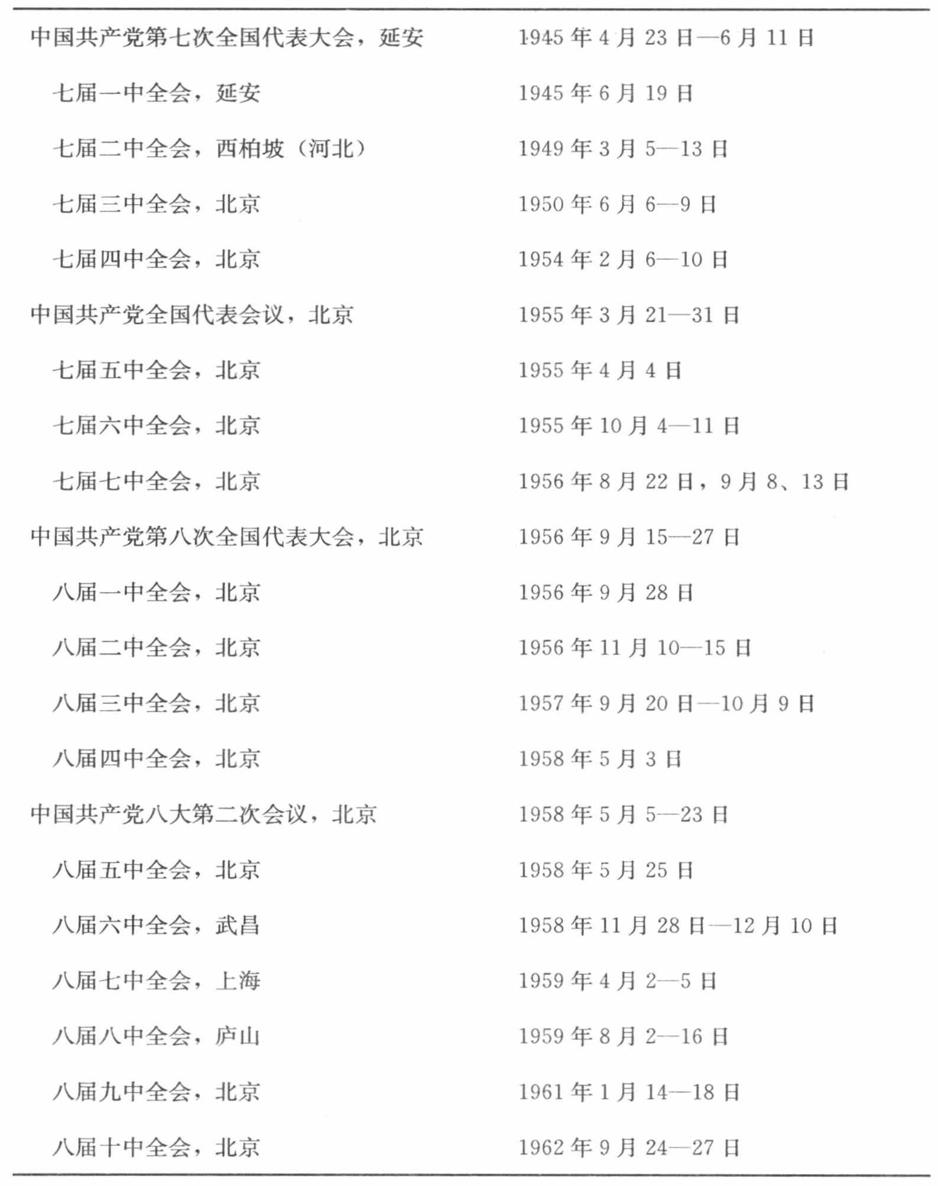


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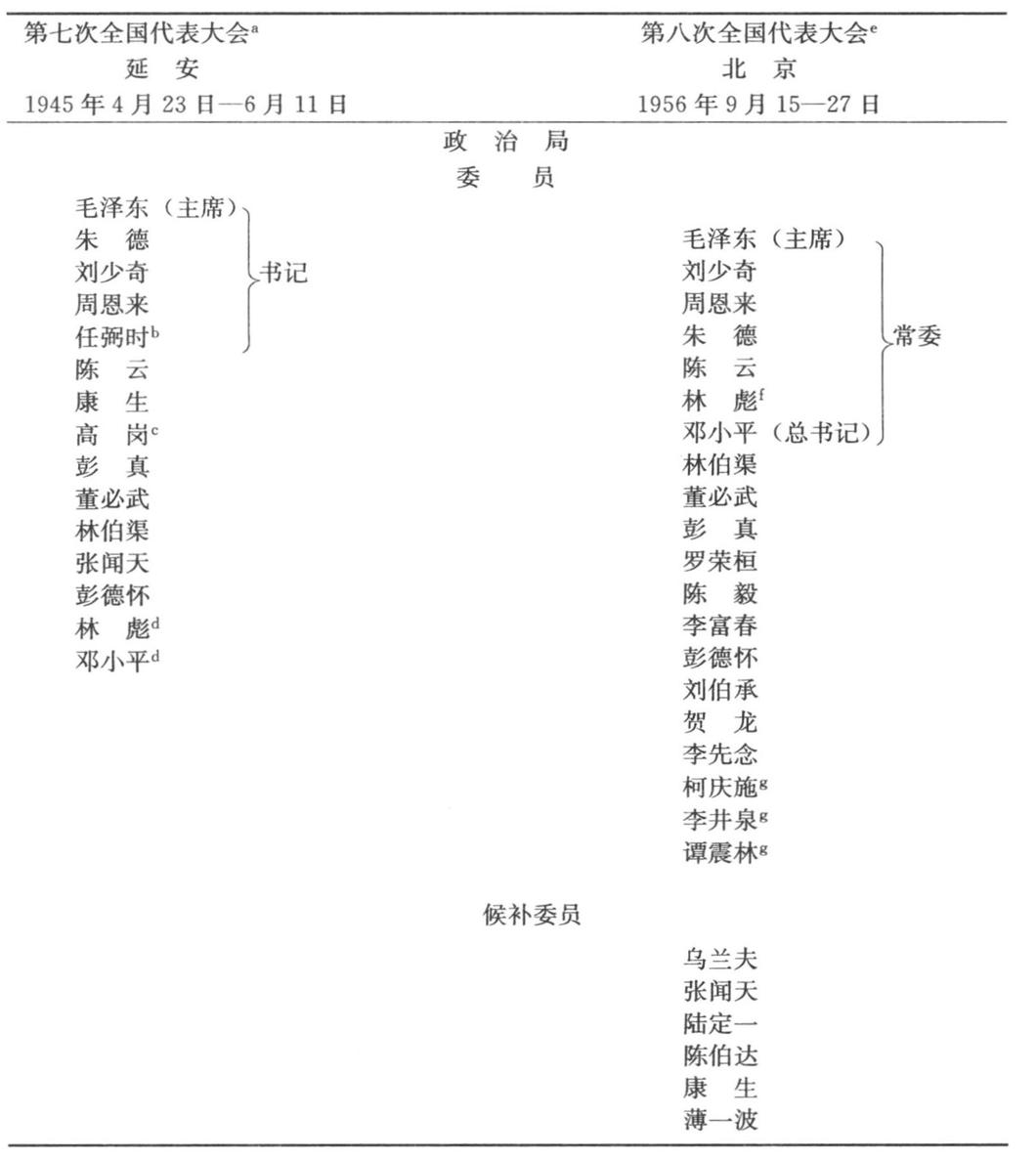
a.在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間的17年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生了許多重要變化，大多數是毛澤東在長征期間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成為主要人物的結果。只有1928年在莫斯科當選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經受住了其后時期的斗爭，并于1945年再度當選。  
b.由于可能被捕，代表們離開上海，最后一天的代表大會是在浙江嘉興南湖的船上舉行的。  
c.第三個候補委員的名字待確定。  
d.這次全國代表大會據說延續了大約15天。  
e.政治局常委。  
資料來源：朱成甲編：《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149]，第3冊，第558—565頁。

表11 黨的高級正式a會議，1945—196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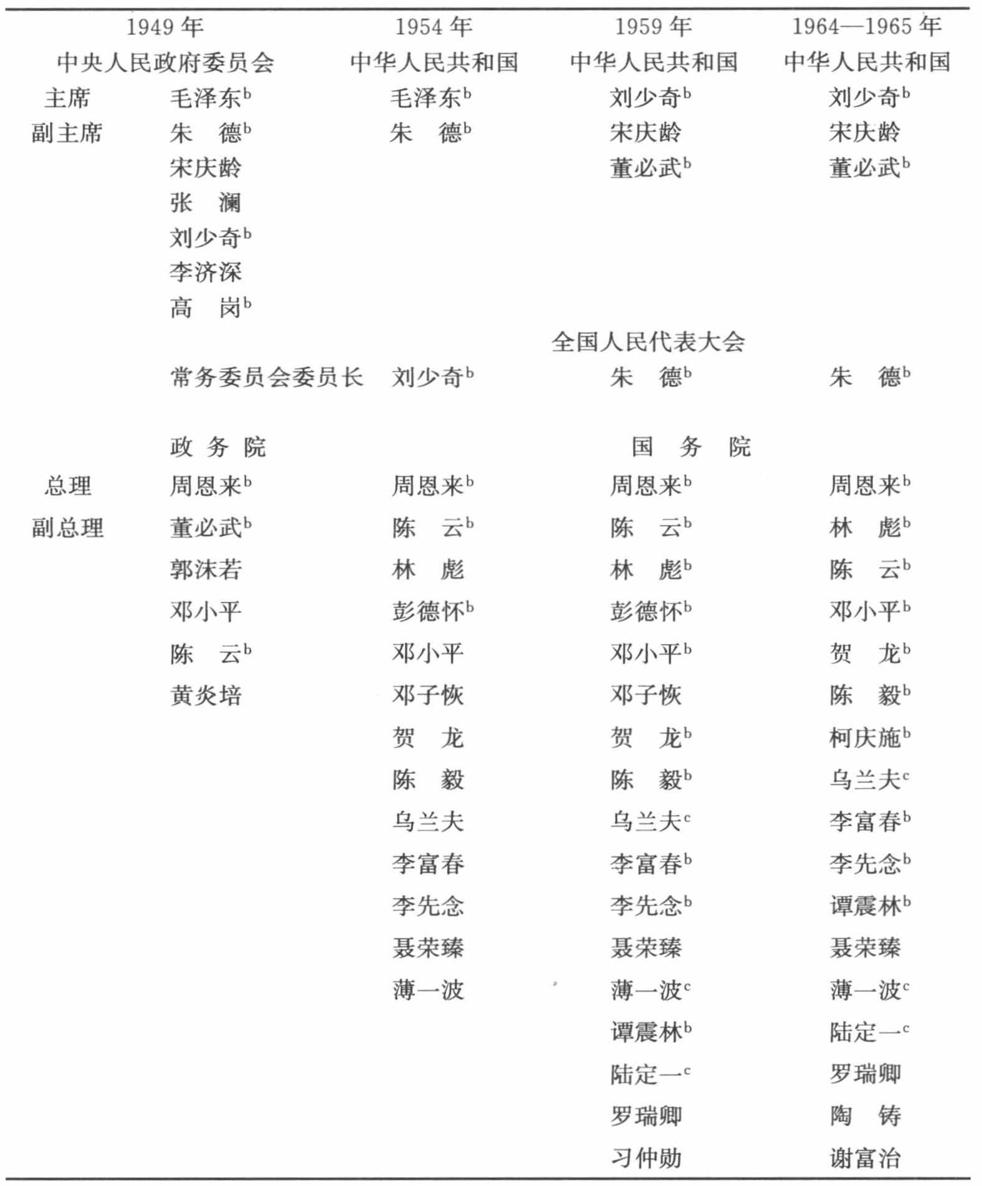
a.“正式”一詞用來區別這些會議和其他重要的高級會議，如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工作會議。  
資料來源：朱成甲編：《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集》[149]；郝夢筆、段浩然等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289]。

表12 黨的領導，1945—1965年



a.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后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1955年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后的七屆五中全會補選。  
b.任弼時于1950年去世。  
c.1955年全國代表會議宣布高崗被開除出黨并自殺。  
d.七屆五中全會選為政治局委員。  
e.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后的八屆一中全會選舉，1958年八大第二次會議后的八屆五中全會補選。  
f.林彪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升為政治局常委。  
g.八屆五中全會選為政治局委員。

表13 國家領導人，1949—1965年a



a.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由1949年9月21日至30日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任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于1949年10月1日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于1949年10月19日任命其為副總理。1954年、1959年和1964—1965年的任命是在那幾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出的。  
b.任命時是政治局委員。  
c.任命時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 參考書目

[1]“Agricultural cooperativ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CB，373（20January 1956），1—31.

《共產黨中國的農業合作化》，見[735]

[2]Ahn，Byung—joon.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uolution ：Dynamics ofpolicy processes.Seattle，Wash.，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6.

安奉俊（音）：《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革命：政策進程的動力》

[3]Ai Ch’ing.“Liaoc-hieh tsoc-hia，tsun—chung tsoc-hia”（Understand writers，respect writers）.CFJP，11March 1942.

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見[126]

[4]Ai Szu-ch’i.Ai Szu-ch’iwenc-hi（Ai Szuc-h’i collected works）.Peking：Jenmin，1981.

艾思奇：《艾思奇文集》

[5]Ambekar，G.V.，and Divekar，V.D.Documents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1949—1962.Bombay：Allied Publishers，1964.

G.V.安貝卡爾、G.D.戴夫卡爾：《中國和南亞及東南亞的關系的文件集，1949—1962年》

[6]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美國農村小型工業代表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村小型工業》

[7]Americans in China，1971—1980：A guide to the Uniuersity of MichiganNational Archiue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81.

《在中國的美國人，1971—1980年：密歇根大學國立中美關系檔案館指南》

[8]An Tzu-wen.“Training the people’s civil servants.”People’s China，1January 1953.

安子文：《培養人民的勤務員》

[9]Andors，Stephen.China’s industrial reuolution ：Politics，planning，and man-agement，1949to the present.Asia Library Serie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7.

斯蒂芬·安多斯：《中國的工業革命：1949年至今的政策、計劃和管理》

[10]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uilisations.Six times a year.Paris：Armand Colin.1929—

《經濟、社會、文化紀事》

[11]Ansley，Clive.The heresy of Wu Ha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1.

克萊夫·安斯利：《昊晗的異端邪說》

[12]Armstrong，J.D.Revolutionary diplomacy：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J.D.阿姆斯特朗：《革命外交：中國的對外政策與統一戰線原則》

[13]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Originally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Five times a year.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c.，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1955—

《亞洲研究學會通訊》（原名《亞洲研究通訊》）

[14]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Semi-annual.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1979—

《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

[15]Badgley，John H.“Burma and China.”In A.M Halpern，ed.，Policies toward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303—328.

約翰·H.巴奇利：《緬甸與中國》

[16]Balazs，Etienne.Chinese ciu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白樂日：《中國的文明和官僚政治》

[17]Banister，Judith.“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Population and deuelopment reuiew，10.2（June 1984），241—271.

朱迪斯·班尼斯特：《中國人口新資料的分析》

[18]Bao Ruo-wang（Jean Pasqualini），and Chelminski，Rudolph.Prisoner of Mao.New York：Coward，McCann，1973.

包若望（讓·帕斯夸尼爾）、魯道夫·切爾明斯基：《毛澤東的犯人》

[19]Barendsen，Robert D.Half-work half-study schools in Communist China.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1964.

羅伯特·D.巴倫德森：《共產黨中國的半工半讀學校》

[20]Barendsen，Robert D.“The agricultural middle school in Communist China.”CQ，8（October-December 1961）106—134.

羅伯特·D.巴倫德森：《共產黨中國的農業中學》，見[133]

[21]Barnett，A.Doak.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New York：Harper，1960.

鮑大可：《共產黨中國與亞洲：對美國政策的挑戰》

[22]Barnett，A.Doak.China on the eue of Communist takeouer.New York：Praeger，1963.

鮑大可：《共產黨接管前夕的中國》

[23]Barnett，A.Doak.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1949—1955.New York：Praeger，1964.

鮑大可：《1949—1955年的早期共產黨中國》

[24]Barnett，A.Doak.Uncertain passage：China’s transition to the post-Mao era.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4.

鮑大可：《前途未卜：中國向毛以后時代的過渡》

[25]Barnett，A.Doak.China’s economy in global perspectiue.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

鮑大可：《從全球角度看中國經濟》

[26]Barnett，A.Doak.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4.

鮑大可：《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

[27]Barnett，A.Doak.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

[28]Barnett，A.Doak，with Ezra Vogel.Cadres，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in Communist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鮑大可與艾茲拉·沃格爾：《共產黨中國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權》

[29]Bastid-Bruguière，Marianne“Currents of social change，”in CHOC 11.535—602.

馬里尼亞·巴斯蒂：《社會變化的潮流》，見[73]

[30]Baum，Richard.Prelude to reuolution：Mao，the Party，and the peasant ques-tion，1962—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

理查德·鮑姆：《革命的序幕：毛、黨和農民問題，1962—1966年》

[31]Baum，Richar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Anatomy of a limited rebellion，”in Thomas Robinson，ed.，The Cultural Reuolution inChina，367—476.

理查德·鮑姆：《農村的文化革命：剖析一種有限的造反》

[32]Baum，Richard，and Teiwes，Frederick C.Ssu-ch’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mouement of 1962—1966.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No.2.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8.

理查德·鮑姆、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33]BDRC.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詞典》

[34]Becker，C.H.，Tawney，R.H.，et al.The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inChina.Repor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Experts，1932.

C.H.貝克爾、R.H.托尼等：《中國教育的改革》（國聯教育專家考察團的報告，1932年）

[35]Beloff，MaxS.ou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7.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馬克斯·貝洛夫：《1944—1957年蘇聯在遠東的政策》

[36]Bennett，GordonH.uadong：The story of a Chinese people’s commune.Boulder，Colo.：Westview，1978.

戈登·貝內特：《華東：一個中國人民公社的歷史》

[37]Bennett，Gordon，ed.China’s finance and trade ：A policy reader.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8.

戈登·貝內特編：《中國的財政與貿易：政策讀物》

[38]Benton，Gregor.“The Yan’an‘literary opposition’.”New Left Reuiew，92（1975）.

格雷戈爾·本頓：《延安的文學反對派》

[39]Bereday，George，et al.，eds.The changing Souiet school.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0.

喬治·貝雷戴等編：《變化中的蘇聯學校》

[40]Bergère，Marie-Claire.“Une crise de subsistence en Chin（e1920—1922）.”Annales ESC，38.6（1973），1361—1402.

瑪麗-克萊爾·貝爾熱爾：《1920—1922年的中國生存危機》，見[10]

[41]Bergère，Marie-Claire.“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in CHOC，12.722—825.

瑪麗-克萊爾·貝爾熱爾：《中國的資產階級，1911—1937年》，見[73]

[42]Bernstein，Richard.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The search for the truth a-bout China.Boston：Little，Brown，1982.

理查德·伯恩斯坦：《從世界的中央尋求關于中國的真相》

[43]Bernstein，Thomas P.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uillages：The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托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鄉：中國青年從城市走向農村》

[44]Bernstein，Thomas Paul.“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Russia：A comparison.”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0.

托馬斯·保羅·伯恩斯坦：《中國和俄國農業集體化的領導和動員的比較》

[45]Bernstein，Thomas P.“Cadre and peasant behavior under conditions of insecurity and deprivation in the grain supply crisis of the spring of 1955，”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365—399.

托馬斯·P.伯恩斯坦：《1955年春糧食供應危機時干部和農民在不穩定和被剝奪情況下的行為》

[46]Bernstein，Thomas P.“Stalinism，famine，and Chinese peasants：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ory and Society，3（1984），339—377.

托馬斯·P.伯恩斯坦：《斯大林主義、饑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時期的糧食收購》

[47]Berton，Peter，and Wu，Eugene.Contemporary China ：A Research guide.Stanford，Calif.：The Hoover Institution，1967.

彼得·伯頓、尤金·吳：《當代中國研究指南》

[48]Bianco，Lucien.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uolution，1915—1949.Trans.from the French by Muriel Bell.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盧西恩·比安柯：《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年》（穆里爾·貝爾由法文譯為英文）

[49]Bianco，Lucien“.Peasant movements，”in CHOC，13.270—328.

盧西恩·比安柯：《農民運動》，見[73]

[50]Bib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Annual.Ann Arbor，Mich：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56—

《亞洲研究書目》

[51]Bielenstein，Hans.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

[52]Black，Cyril Edwin，ed.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Acompara-tiue study.New York；Free Press，1975.

西里爾·埃德溫·布萊克：《日本和俄國現代化的比較研究》

[53]Blumenthal Eileen“.Models in Chinese moral education：Perspectives from children’s books.”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76.

艾琳·布盧門撒爾：《中國道德教育中的榜樣：兒童讀物透視》

[54]Blumenthal，Irene and Benson，Charles.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Souiet U-nion：Implications for deueloping countries.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No.288.Washington，D.C.：World Bank，1978.

艾琳·布盧門撒爾、查理斯·本森：《蘇聯的教育改革：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

[55]Bodde，Derk.Peking diary，1948—1949：A year of reuolution.Greenwich，Conn.：Fawcett Publications，1967.

德克·博德：《北京日記，1948—1949年：革命的一年》

[56]Bonavia，David.The Chinese.London：Allen Lane，1981.

戴維·邦納維亞：《中國人》

[57]Borg，Dorothy and Heinrichs，Waldo，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relations 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多蘿西·博格、沃爾多·海因里希編：《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系》

[58]Borisov，O.B.，and Koloskov，B.T.Sino-Souiet relations 1945—1973：Abrief history.Trans.from the Russian by Yuri Shirokov.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5.

O.B.波里索夫、B.T.科洛斯科夫：《1945—1973年的中蘇關系簡史》（尤里·席洛科夫由俄文譯為英文）

[59]Bowie，Robert R.，and Fairbank，John K.，eds.Communist China，1955—1959：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r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羅伯特·R.鮑伊、費正清編：《共產主義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

[60]Boyd，R.G.Communist China’s foreign policy.New York：Praeger，1962.

R.G.博伊德：《共產黨中國的外交政策》

[61]Bradbury，William.Mass behauior in battle and captiuity：The Communistsoldier in the Korean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威廉·布拉德伯雷：《群眾在戰斗與被俘中的表現：朝鮮戰爭中的共產黨戰士》

[62]Braudel，Fernand.The perspectiue of the world.vol.3of his Ciuilization and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Trans.from the French，ed.Le temps dumonde.Paris：Colin，1984；New York：Harper & Row，1984.

費爾南德·布倫德爾：《對世界的透視》（《15至18世紀的文明和資本主義》的第3卷，譯自法文）

[63]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Part 3.The Far East.London：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1966—1969.

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摘要，第3部分，遠東》

[64]Brodsgaard，Kjeld Erik.“Paradigmatic change：Readjustment and reform in the Chinese economy，1953—1981.”Modern China，9.2（1983），3—72.

克耶爾德·埃里克·布羅茲加德：《改革例證：中國經濟的調整與改革，1953—1981年》

[65]Brugger，WilliamD.emocrac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1948—1953）.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威廉·布魯格：《中國工業企業中的民主與組織（1948—1953年）》

[66]Brzezinski，Zbigniew K.The Souiet bloc：Unity and conflict.Rev.and enlarged 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茲比格涅夫·K.布熱津斯基：《蘇聯集團的團結和沖突》

[67]Buck，（John）Lossing.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3vol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7；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7.

卜凱：《中國的土地利用》

[68]Bullard.Monte Ray：“PRC elite studie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Asian Survey，19：8（August 1979），896—910.

蒙蒂·雷·布拉德：《中華人民共和國精英人物研究：文獻評論》

[69]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Chung-yang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70]Bums，John“Chinese peasant interest articulation，1949—1974.”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9.

約翰·伯恩斯：《中國農民利益的表達，1949—1974年》

[71]Butler，StevenC.onflict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s rural administra-tion.1969—1976.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forthcoming.

史蒂文·巴特勒：《中國農村行政機構中的矛盾與決策，1969—1976年》

[72]Butterfield，Fox.China：Aliue in the bitter sea.New York：Times Books，1983.

福克斯·巴特菲爾德：《中國：活躍在苦海中》

[73]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HOC）.Vol.3.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ed.Denis Twitchett.（1979）.Vol.10.Late Ch’ing 1800—1911，Part 1，ed.John K.Fairbank.（1978）.Vol.11.Late Ch’ing 1800—1911，Part 2，ed.John K.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1980）.Vol.12.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Part 1，ed.John K.Fairbank.（1983）.Vol.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2，ed.John K.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1986）.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劍橋中國史》。第3卷《中國隋唐，589—906年》上，丹尼斯·特威切特編；第10卷《晚清，1800—1911年》上，費正清編；第11卷《晚清，1800—1911年》下，費正清、劉廣京編；第12卷《中華民國，1912—1949年》上，費正清編；第13卷《中華民國，1912—1949年》下，費正清、費維愷編。

[74]Carrère d’Encausse，Hlne，and Schram，Stuart Reynolds，comps.Marxismèand Asia：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London：Allen Lane，Penguin Press，1969.

埃萊娜·卡雷勒·德昂科斯、斯圖爾特·雷諾茲·施拉姆編：《馬克思主義和亞洲》

[75]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he Sino-Souiet dispute and its significance.Washington，D.C.：CIA，1April 1961，TS# 142274-b.

中央情報局：《中蘇爭論及其意義》

[76]Chan，AnitaC.hildren of Mao：Personality deu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u-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5.

安妮塔·詹（音）：《毛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性格發展與政治上的積極精神》

[77]Chan，Anita.“Images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The changing perspectives of Canton students.”World Politics，34.3（April 1982），295—323.

安妮塔·詹：《中國社會結構的反映：廣州學生的變化中的看法》

[78]Chan，Anita，Madsen，Richard，and Unger，JonathanC.hen uillage：The recent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安妮塔·詹、理查德·馬德森、喬納森·昂格爾：《陳村：毛的中國的一個農民集體的近代史》

[79]Chan，Anita，Rosen，Stanley，and Unger，Jonathan“.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CQ，83（September 1980），397—446.

安妮塔·詹、斯坦利·羅森、喬納森·昂格爾：《學生與階級斗爭：廣州紅衛兵沖突的社會根源》，見[133]

[80]Chang Chie“n.More people go to college.”People’s China，22（16November 1954），23—25.

張健：《更多的人上大學》

[81]Chang，Hao.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張灝：《梁啟超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1890—1907年》

[82]Chang，John K.Industrial deu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a quantita-tiue analysis.Chicago：Aldine，1969.

約翰·K.張：《共產黨統治前的中國工業發展，數量分析》

[83]Chang，K.C.（Kwang-chih）.Art，myth and ritual：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張光直：《藝術、神話和禮儀：古代中國通往政治權力的道路》

[84]Chang Kia-ngau.The inflationary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8.

張嘉璈：《螺旋式上升的通貨膨脹：1939—1950年在中國的經歷》

[85]Chang，Parris.Radicals and radical ideology in China’s Cultural Remlu-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帕里斯·張：《中國文化革命中的激進分子和激進思想》

[86]Chang，Parris.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University Park，Pa.，and London：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rev.ed.1978.

帕里斯·張：《中國的權力和政策》

[87]Chang Shou-Yung.Huang-ch’ao chang-ku hui-pien （Collected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Imperial dynasty）.60chüan.Shanghai：求實書社，1902.Taipei reprint：文海出版社，1964.

張壽鏞：《皇朝掌故匯編》

[88]Chao Chung and Yang I-fanS.tudents in mainland China.Kowloon，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56；3rd ed.，1958.

趙重（音）、楊一帆（音）：《中國大陸的學生》

[89]Chao Hsing-ban，and Ts’ao Chen-liang.“Ch’ien t’an nung-ch’an p’in shoukou-chung ti i-wu to chia”（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high prices for the procurement of some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Chia-Ro Li-lun yü ship-chien（Price theory and practice），4（1982），26—30.

趙興漢、曹振良：《淺談農產品收購中的一物多價》《價格理論與實踐》

[90]Chao Kang.The rate and pattern of industrial growth in Communist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5.

趙岡：《共產黨中國工業增長的速度與模式》

[91]Chao Kang.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ommunist China.1949—1965.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0.

趙岡：《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1949—1965年》

[92]Chao Kang and Mah Feng-hwa.“A study of the rouble-yuan exchange rate.”CQ，17（January-March 1964），192—204.

趙岡、馬逢華：《關于盧布—人民幣兌換比率的研究》，見[133]

[93]Chao Kuoc-hünT.he mass organiz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3.

趙國俊：《共產黨中國的群眾組織》

[94]Chao Kuo-chünA.grarian policies of mainland China：A documentarystudy，1949—195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趙國俊：《大陸中國的農業政策：文獻研究，1949—1956年》

[95]Chao Kuoc-hünE.conomic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in mainland China：A documentary study，1949—1957.2vols.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趙國俊：《大陸中國的經濟計劃及組織：文獻研究，1949—1957年》

[96]Charles，David A.“The dismissal of Marshal P’eng Teh-huai.”CQ，8（October-December 1961），63—76.

戴維·A.查爾斯：《彭德懷元帥的免職》，見[133]

[97]Che-hsueh yen-chiu（Philosophical research）.Peking：1956—

《哲學研究》

[98]Cheek，Timothy.“Deng Tuo：Culture，Leninism and alternative Marx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Q，87（September 1981），470—491.

蒂莫西·奇克：《鄧拓：文化、列寧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內二中擇一的馬克思主義》

[99]Cheek，Timothy.“The fading of wild lilies：Wang Shiwei and Mao Zedong’s‘Yan’an Talks’in the First CPC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AustralianJournalof Chinese Affairs，11（January 1984），25—58.

蒂莫西·奇克：《凋落的野百合花：王實味與毛澤東在中共第一次整風運動中的“延安講話”》

[100]Chen，Jack.Inside the Cultural Reuolution.New York：Macmillan，1975.

杰克·陳：《文化革命內幕》

[101]Chen，Jo-hsi.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Proletarian Cultural Reuolution.Bloomington，In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

陳若曦：《殷市長的處死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故事》

[102]Chen，S.C.，and Ridley，Charles P.The rural people’s communes in Lien-chiang.Stanford，Calif.：The Hoover Institution，1969.

S.C.陳、查爾斯·P.里德利：《連江縣的農村人民公社》

[103]Chen，Susan Wolf，trans.Feng Jicai：Chrysanthemums and other storie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5.

蘇珊·沃爾夫·陳譯：《馮驥才：菊花及其他故事》

[104]Chen，Theodore Hsi-en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

陳錫恩：《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105]Chen，Theodore Hsi-en.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Academic and reuo-lutionary models.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1.

陳錫恩：《1949年以來的中國教育：學術的和革命的模式》

[106]Chen，Wen-hui C.Wartime“mass”campaigns in Communist China.Lackland.Tex.：Air Force Personnel and Training Research Center，1955.

文慧·C.陳：《共產黨中國的戰時“群眾運動”》

[107]Ch’en Chen-han，Hsu Y-nan，Lo Chih-ju，Ku Ch’un-fan，Wu Pao-san，andü Ning Chia-feng“Wo-men tui-y tang-ch’ien ching-chi k’o-hsueh kung-tso tiü i-hsieh i-chien”（Some of our views on current work in the science of economics）Ching-chi yen-chiu （Economic research），5（1957），appendixes，123—133.

陳振漢、徐毓楠、羅志如、谷春帆、巫寶三、寧嘉風：《我們對于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

[108]Ch’en，Jerome.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uolu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

[109]Ch’en，Jerome，ed.Mao.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9.

陳志讓編：《毛澤東》

[110]Ch’en Jerome，ed.Mao papers：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陳志讓編：《毛澤東文集及書目》

[111]Ch’en Shih-hui.Kuan-yü fan-tui Kao Kang，Jao Shus-hih fant-ang yin-mou huot-ung ti wen-t’i（Questions concerning opposition to the anti-Party conspiratorial activities of kao Kang and Jao Shu-shih）.In《教學參考》（Teaching reference）.N.P.：中共安徽省委黨校圖書資料室，December 1980.

陳詩惠：《關于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問題》

[112]Ch’en Yun.Chen Yun t’ung-chihw en-kao hsuan-pien（1956—1962）（Selected manuscripts of comrade Ch’en Yun 1956—1962）.Peking：Jen-min，1981.

陳云：《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

[113]Ch’en YunC.h’en Yunw enk-ao hsuan-pien（1949—1956）（Selected manuscripts of Ch’en Yun 1949—1956）Peking：Jen-min，1982.

陳云：《陳云文稿選編（1949—1956年）》

[114]Ch’en Yun.Ch’en Yun wen—hsuan（1949—1956）（Selected works of Ch’en Yun，1949—1956）.Peking：Jen-min，1984.

陳云：《陳云文選（1949—1956年）》

[115]Ch’en Yun.Ch’en Yunwen-hsuan（1956—1985）（Selected works of Ch’en Yun，1956—1985）.Peking：Jen-min，1986.

陳云：《陳云文選（1956—1985年）》

[116]Ch’en Yun.“Chia-su fa-chan tan-fei kung-yeh，i-chiu-liu-i nien wu-yueh”（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emical fertilizer industry[May 1961]），in Ch’en Yun t’ung-chih wen-kao hsuan-pier，1956—1962.108—115.

陳云：《加速發展氮肥工業，一九六一年五月》

[117]Ch’en Yun.“Ch’ing-P’u nung-ts’un tiaoc-h’a，i-chiu-liu-i nien pay-ueh”（An investigation of rural Ch’ing-P’u[August 1961]），in Ch’en Yun t’ung-chihwen-kao hsuan-pien，1956—1962，130—146.

陳云：《青浦農村調查，一九六一年八月》

[118]Ch’en Yun.“Muc-h’ien ts’ai-cheng ching-chi-ti ch’ing-k’uang ho k’o-fu k’unnan ti jok-an pan-fa（i-chin-liu-erh nien erh-yueh）”（The current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me methods for overcoming difficulties[February 1962]），in Chen Yun t’ung-chih zwen-kao hsuanp-ien，1956—1962.157—172.

陳云：《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1962年2月）》

[119]Ch’en Yun.“Fa-chan nung-yeh shih t’ou-teng ta-shih”（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 matter of major importance），in Ch’en Yun，Ch’en Yun t’ung-chihwen-kao hsuan-pien，1949—1956，127—130.

陳云：《發展農業是頭等大事》

[120]Ch’en Yun.“Shih-hsing liang-shih t’ung-kou t’ung-hsiao”（Implementing planned purchase and planned sale of grain），in Chen Yun t’ung-chih wen-kao hsuan-pien 1949—1956.189—203.

陳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121]Cheng Chu-yuan.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manpower in Communist Chi-na，1949—1963.Washington，D.C.：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65.

鄭竹園：《1949—1963年共產黨中國的科學和工程人力》

[122]Cheng，J.Chester.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Red Army：A translation ofthe Bulletion of Actiuiti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tanford，Calif.：The Hoover Institution，1966.

J.切斯特·鄭：《中國紅軍的政治：人民解放軍〈工作通訊〉的譯文》

[123]Chiang Kai-shek.China’s destiny.Introduction by Lin Yutang.Trans.Wang Ch’ung-hu（iChinese edition，1943）.New York：Macmillan，1947.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林語堂序，王寵惠譯

[124]Ch’iang Yuank-an，and Lin Pang-kuang.“Shih-lun i-chiu-wu-wu-nien tangnei kuan-yü nung-yeh ho-tso-hua wen-t’i ti cheng-lun”（A discussion of the debate within the Party in 1955concerning the issue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ization）.Tang-shih yen-chiu （Research on party history），1981.1，10—17.

強遠淦、林邦光：《試論1955年黨內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

[125]Ch’iang Yuan-kan and Ch’en Hsueh-wei.“Ch’ung-P’ing i-chiu-wu-liu-nien ti‘fan mao-chin’（”A fresh review of the“anti rash advance”of 1956），Tang-shih yen-chiu，1980.6，34—40.

強遠淦、陳雪薇：《重評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

[126]Chieh-fang jih-pao （Liberation daily）.Yenan：1941—1945.Cited as CFJP.

《解放日報》

[127]Ch’ien Mu.Traditional gouernment in Imperial China：A critical analy-sis.Trans.Chün-tu Hsueh and George O.Totten，Ⅲ，with Wallace Johnson et al.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2.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薛君度、喬治·O.托頓第三、華萊士·約翰遜英譯，題為《中華帝國的傳統政府：批判的分析》）

[128]Ch’ien Tuan-sheng.The gou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1970.

錢端升：《1912—1949年的中國政府和政治》

[129]Chin-shih Chung-kuo ching-shih ssu-hsiang yen-t’ao-hui lun-wenc-hi（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theory of statecraft of modem China），25—27August 1983.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84.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130]China：Socialist economic deuelopment.Annex G.Education Sector.World Bank Document（1June 1981）.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81.See also World Bank.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附錄G《教育部門》

[131]China Daily.Peking：1981—

《中國日報》

[132]China NewsAnalysis.Hong Kong，1953—1982；1984—F.ortnightly.1953—1982published by Fr.Ladany.《中國新聞分析》

[133]China Quarterly，The Quarterly.London：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Paris），1960—1968；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68—

《中國季刊》

[134]China Topics.Irregular.London：n.p.，“T.B.，”1961—

《中國問題》

[135]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Kuanyü chin-tung ming-ch’un ta-kuei-mo ti k’ai-chan hsing-hsiu nung-t’ien shui-li ho chi-fei yun-tung ti chueh-ting”（Decision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this winter and next spring of a movement to develop large scale initiation and repair of agricultur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the collection of manure），in Jen-min shou-ts’e，1958（People’s handbook，1958）.Peking：Takung-pao ch’u-pan-she，1958.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國務院：《關于今冬明春大規模地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

[136]Chinese law and gouernment.Quarterly.Armonk，N.Y.：M.E.Sharpe，1968—

《中國的法律與政府》

[137]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Quarterly.Armonk，N.Y.：M.E.Sharpe，1969—

《中國的哲學研究：譯文雜志》

[138]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Formerly Chinese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Quarterly.Armonk，N.Y.：M.E.Sharpe，1967—

《中國的歷史研究：譯文雜志》（原名《中國的歷史和哲學研究》）

[139]Ching-chi is’an-k’ao tzu-liao （Economic reference materials），vol.1.Peking：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aterials Office，1979.

《經濟參考資料》第1卷

[140]Ching-chi yen-chiu （Economic research）.Peking：1955—

《經濟研究》

[141]Ch’ing-tai ch’ou-pan i-wushih-mo （Complete record of the management of barbarian affairs in the Ch’ing dynasty）.80chiian for the late Tao-kuang period（1836—1850）；80chiian for the Hsien-feng period（1851—1861）；100chüan for the T’ung-chih period（1862—1874）.Peiping：Palace Museun photolithograph，1930.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晚期（1836—1850年）80卷，咸豐時期（1851—1861年）80卷，同治時期（1862—1874年）100卷

[142]Chou En-lai.“PRC Foreign Minister Chou En-lai’s report on the foreign policy at the 33rd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19April 1955）.”Collected foreign relations docum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3.Peking：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

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3次會議上關于外交政策的報告（1955年4月19日）》（1955年4月19日周恩來在亞非會議全體會議上作了發言——譯者）

[143]Chou En-lai.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Vol.1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1.

《周恩來選集》

[144]Chou En-lai.“Report on the proposals for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 for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in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Communist Party of China.Vol.1（Documents），277—348.

周恩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145]Chou，Eric.A man must choose.New York：Knopf，1963.

埃里克·周：《人必須選擇》

[146]Chou Shun-hsin.The Chinese inflation，1937—194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

周舜莘：《1937—1949年中國的通貨膨脹》

[147]Chou T’ai-ho，ed.Tang-tai chung-kuo ti ching-chi t’i-chih kai-ko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Peking：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84.

周太和編：《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148]Chow Ching-wen.Ten years of storm：The true story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60.

周鯨文：《十年風暴：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真相》

[149]Chu Ch’eng-chia，ed.Chung-kung tang-shih yen-chiu lun-wen hsuan（Selected essays o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3vols.Changsha：Hu-nan Jen-min，1984.

朱成甲編：《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

[150]Ch’üan-kuo chu-yao pao-k’an tzu-liao so-yin （Index to national improtant periodical materials），Shanghai：上海市報刊圖書館，1955—

《全國主要報刊資料索引》

[151]Ch’üan-kuo hsin shu-mu（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new books）.Peking：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圖書館，1955—

《全國新書目》

[152]Ch’üan-kuo tsung shu-mu （Cumulative national bibliography）.Peking：Chung-hua，1956—

《全國總書目》

[153]Chung，Chong-wook.Maoism and development：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management in China.Seoul：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0.

鐘昌吾（音）：《毛主義與發展：中國的工業管理政策》

[154]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chiao-yü ta-shih-chi，1949—1982（Education chro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82）.Peking：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年》

[155]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fa-kuei but-pien （Compendiu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RC）.Peking，1956—1958.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

[156]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kuoc-hia t’ung-chi chü.Chung-kuo t’ung-chi nien-chien 1981.（Chinese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1）.Peking：Chung-kuo t’ung-chi ch’u-pan-she，1982.Cited as TCNC 198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

[157]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kuoc-hia t’ung-chi chit Chung-kuo t’ung-chi nien-chien 1983.（Chinese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3）.Peking：Chung-kuo t’ung-chi ch’u-pan she，1983.Cited as TCNC 198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

[158]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kuoc-hia t’ung-chi chü.“Chung-kuo chingchi t’ung-chi tzu-liao hsuan-pien”（A compil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statistics），in Hsueh Mu-ch’iao，ed.，Chung-kuo ching-chi nien-chien 198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統計資料選編》

[159]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tui-wai kuan-hsiwenc-hien-chi（Collected foreign relations docum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Peking：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

[160]Chung K’an.K’ang Sheng p’ing-chuan （Critical biography of K’ang Sheng）.Peking：紅旗出版社，1982.

仲侃：《康生評傳》

[161]Chung-kuo chiao-yü nien-chien 1949—1981（Chinese education yearbook 1949—1981）.Peking：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年》

[162]Chung-kuo ching-chi nien-chien（Chinese economic yearbook）.Peking and Hong Kong：1984—F.or 1982ed.，see Hsueh Mu-ch’iao.For 1981，1983eds，see 5th and 6th items above.

《中國經濟年鑒》

[163]Chung-kuo ch’ing-nien pao（China youth news）.Peking：21April 1951（suspended August 1966，resumed October 1978）—《中國青年報》

[164]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kuo-wu-yuan kung-pao（Gazette of the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ublished by the State Council，irregular，195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165]Chung-kuo k’oh-sueh yuan ti-li yen-chiu-so ching-chi ti-li yen-chin-shi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eography Research Institute，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Office）.Chung-kuo nung-yeh ti-lt tsung-lun （A treatis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geography）.Peking：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80.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經濟地理研究室：《中國農業地理總論》

[166]Chung-kuo kung-ch’ant-ang chung-yang wei-yuan-hui（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Chung-kung chung-yang i-chiu-liu-ssu-nien erh-yueh erh-shih-chiu-jih kei Su-kung chung-yang-ti hsin”（Lett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29February 1964）.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給蘇共中央的信》

[167]Chung-kuo kung-ch’an-tang li-shih chiang-i （Teaching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Wuhan：Hu-pei jen-min.1984.《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

[168]Chung-kuo kung-ch’an-tang liu-shih-nien to-shih chien-chieh （Brief introduction to major events in the CCP’s sixty years）.Publised by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Political academy，CCP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Peking：解放軍政治學院出版社，1985.

《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

[169]Chung-kuo mei-t’an kung-yeh nien-chien （Chinese coal industry yearbook）.Peking：煤炭工業出版社，1983—

《中國煤炭工業年鑒》

[170]Chung-kuo nung-yeh nien-chien 1980（Chinese agricultural yearbook 1980）.Chinese Agricultural Yearbook Compilation Commission.Peking：Agri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1981.

《中國農業年鑒》

[171]Clark，Grover.The balance sheet of imperialism：Facts and figures on col-on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6.

格羅弗·克拉克：《帝國主義的資產負債表：殖民地的事實和數字》

[172]Clark，Grover.A place in the sun.New York：Macmillan，1936.

格羅弗·克拉克：《發展的順境》

[173]Clark，M.Gardner.The deuelopment of China’s steel industry and Souiettechnical aid.Ithaca，N.Y.：Committee on the Economy of China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73.

M.加德納·克拉克：《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和蘇聯的技術援助》

[174]Clubb，O.Edmund.China and Russia：The great ga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O.埃德蒙·克拉布：《中國和俄國的重大比賽》

[175]Coale，Ansley.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1984.

安斯利·科爾：《1952—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

[176]Coble，Parks M.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u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0.

帕克斯·M.科布爾：《1927—1937年的上海資本家和國民黨政府》

[177]Cohen，Arthur A.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阿瑟·A.科恩：《毛澤東的共產主義》

[178]Cohen，Arthur A.“How original is‘Maoism’？”Problems.of Communism，10.6（November 1961），34—42.

阿瑟·A.科恩：《“毛主義”有何創造？》

[179]Cohen，Jerome Alan，ed.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1949—1963：An introduc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杰羅姆·艾倫·科恩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程序入門，1949—1963年》

[180]Cohen，Paul A.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保羅·A.科恩：《王韜和清末的改革：處于傳統和現代之間》

[181]Cohen，Paul A.Discou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保羅·A.科恩：《關于近代中國史事的美國歷史著作》

[182]Cohen，Paul A.，and Schrecker，John E.，eds.Reformin nineteenth-centuryChina.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6.

保羅·A.科恩、施里奇編：《19世紀中國的改革》

[183]Cohen，Stephen F.Bukharin and the Bolsheuik reu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New York：Vintage Books，1975.

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1888—1938年的政治史》

[184]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Contre le Regime Concentrationnaire.White bookon forced labour and concentration cam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aris：n.p.，1957—1958.

反對集中營制度國際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迫勞動和集中營的白皮書》

[185]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SCPRC）.Various trip reports by academic delegations：Solid state phys-ics in China（1975）；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1976）；Solid state phys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6）：Insect contro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7）；Pure andapplied mathema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7）；Paleo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7）：0ralcontraceptiuesand steroid chemi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7）：Wheat in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7）；Astronomy in China（1979）；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hazards reduction in China（1980）；Oceanog-raphy in China（1980）：Nuclear science in China（1980）；Animal agricul-ture in China（1980）；Report of the CSCPRC Economics Delegation to th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80）；Traditional，and contemporary paint-ing in China（1980）；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1983）；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1985）；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1985）.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See also the overlapping list on p.563，n.42.

美中學者交流委員會學術代表團所寫的多種旅行報告：《中國的固態物理學》（19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針刺麻醉》（197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固態物理學》（197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昆蟲防治》（197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論和應用數學》（197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古人類學》（197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口服避孕藥和類固醇化學》（197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小麥》（1977年），《中國的天文學》（1979年），《中國的地震工程學和減少意外事故》（1980年），《中國的海洋地理學》（1980），《中國的核科學》（1980年），《中國的牲畜農業》（1980年），《美中學者交流委員會經濟代表團訪華報告》（1980年），《中國的傳統繪畫和現代繪畫》（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程技術教育》（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1985年），《中國的美國研究》（1985年）。也見本書《書目介紹》第597頁注①所列部分一致的目錄。

[186]Communist China 1955—1959；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with a foreword by Robert R.Bowie and John K.Fairbank，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955—1959年的共產黨中國：政策文獻，附分析》。羅伯特·R.鮑伊、費正清序

[187]Comparatiue Education Reuiew.Quarterly.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比較教育評論》

[188]“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eptember 20，1954）in Harold C.Hinton ed.，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Adocumentary suruey，1.99—106.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9月20日）

[189]Contemporary China.Vol.1.1955.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Vol.2.1956—1957，1958.Vol.3.1958—1959，1960.Vol.4.1959—1960，1961.Vol.5.1961—1962，1963.Vol.6.1962—1964，1968.

《當代中國》。第1卷《1955年》，第2卷《1956—1957年》，第3卷《1958—1959年》，第4卷《1959—1960年》，第5卷《1961—1962年》，第6卷《1962—1964年》

[190]Creel，Herrlee G.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Vol.1，The WesternChou empi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顧立雅：《中國經世術的起源》，第1卷《西周帝國》

[191]Cressey，George B.Land of the 500million：A geography of China.New York：McGraw Hill，1955.

喬治·B.克雷西：《五億人的國土：中國地志》

[192]Dallin，Alexander，with Harris，Jonathan，and Hodnett，Grey，eds.Diuersityi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A documentary record，1961—196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

亞歷山大·達林、喬納森·哈里森、格雷·霍內特編：《國際共產主義的分歧：1961—1963年間的文獻》

[193]Dalrymple，Dana G.“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1934.”Souiet Studies，15.3（January 1964），250—284.

達納·G.達爾林普爾：《1932—1934年的蘇聯饑荒》

[194]Dardess，John W.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約翰·W.達迭斯：《儒家思想和專制制度：明代建立時的專業精英》

[195]Davis，John Francis.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2vols.New York：Harper，1836.

德庇時：《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

[196]Davis-Friedmann，Deborah.Long liu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reu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德博拉·戴維斯-弗里德曼：《長壽：中國的老人與共產黨革命》

[197]Dawson，Raymond Stanley.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uil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雷蒙德·斯坦利·道森：《中國變色龍：分析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幾個概念》

[198]DeBary，William Theodore，and the Conference o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Thought.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

威廉·西奧多·狄百瑞及17世紀中國思想討論會：《新儒學的開展》

[199]Dennerline，Jerry.“Fiscal reform and local control：The gentry-bureaucratic alliance survives the conquest，”in 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86—120.

杰里·登納林：《財政改革和地方管理：清征服后紳士與官僚的結盟》

[200]Dernberger，Robert F.，ed.China’s deuelopmental experience in compara-tiue perspectiu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羅伯特·F.德恩伯格編：《從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的發展經驗》

[201]Dittmer，Lowell.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uolution：The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與中國文化革命：群眾批評的政治》

[202]Donnithorne，Audrey，China’s economic system.New York：Praeger，1967.

奧德麗·唐尼索恩：《中國的經濟制度》

[203]Donnithorne，Audrey.“China’s cellular economy：Some economic trend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Q 52（OctorberD-ecember 1972）605—619.

奧德麗·唐尼索恩：《小單位組成的中國經濟：文化革命以來的某些經濟趨勢》，見[133]

[204]Donnithorne，Audrey，and Lardy，Nicholas.“Comment：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s fiscal management，”and“Reply，”CQ，66（June 1976）.328—354.

奧德麗·唐尼索恩、尼古拉斯·拉迪：《評中國財政管理中的集中與分散》及《答復》，見[133]

[205]Doolin，Dennis J.，trans.Communist China：The politics of student opposi-tion.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1964.

丹尼斯·J.杜林譯：《共產黨中國：學者反對派的政見》

[206]Doolin，Dennis.J.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Souiet conflict.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1965.

丹尼斯·J.杜林：《中蘇沖突中的領土要求》

[207]Doolin Dennis J.，and North，Robert C.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1966.

丹尼斯·J.杜林、羅伯特·C.諾思：《中國人的人民共和國》

[208]Drake，Fred W.China charts the World：Hsu Chi-yüand his geography of1848.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5.

弗雷德·W.德雷克：《中國繪制世界地圖：徐繼畬和他1848年的地理著作》

[209]Dreyer，Edward L.Early Ming China：A political history 1355—143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愛德華·L.德雷爾：《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

[210]Dreyer，June Teufel.China’s forty millions：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瓊·托伊費爾·德雷爾：《中國的四千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少數民族與民族平等》

[211]Eastman，Lloyd E.Throne and mandarins：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uersy，1880—188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勞埃德·E.伊斯門：《皇帝和官員：1880—1885年中法爭執時期的中國方針》

[212]Ecklund，George.Financing the Chinese gouernment budget：MainlandChina.1950—1959.Chicago：Aldine，1966.

喬治·埃克隆：《為中國政府的預算提供資金：大陸中國，1950—1959年》

[213]Eckstein，Alexander.The national income of Communist China.Glencoe，I 11.：The Free Press，1961.

亞歷山大·埃克斯坦：《共產黨中國的國民收入》

[214]Eckstein，Alexander.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foreigntrade：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New York：McGraw-Hill，1966.

亞歷山大·埃克斯坦：《共產黨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與對美政策的關系》

[215]Eckstein，Alexander，China’s economic reuolu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亞歷山大·埃克斯坦：《中國的經濟革命》

[216]Eckstein，Alexander，ed.Quantitatiue measures of China’s economic outpu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

亞歷山大·埃克斯坦編：《中國經濟產品的數量測度》

[217]Eckstein，Alexander，Chao Kang，and Chang，John“.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The rise of a frontier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history，34.1（March 1974），239—264.

亞歷山大·埃克斯坦、趙岡、約翰·張：《東北的經濟發展：一種邊境經濟的興起》

[218]Eckstein，Alexander，Galenson，Walter，and Liu，Ta-chung.eds.Economic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Chicago：Aldine，1968.

亞歷山大·埃克斯坦、沃爾特·蓋倫森、劉大中編：《共產黨中國的經濟趨向》

[219]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vol.I：Docu-ments.vol.Ⅱ：Speeche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1.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卷《文件》，第2卷《發言》

[220]Eisenstadt，S.N.Modernization：Growth and diuersity.Bloomington：Indian University Press，1963.

S.N.艾森施塔特：《現代化：發展和多樣性》

[221]Eisenstadt，S.N.Modernization：Protest and chang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6.

S.N.艾森施塔特：《現代化：抗議和變化》

[222]Eisenstadt，S.N.Reuolu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Acompar-atiue study of ciuiliz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8.

S.N.艾森施塔特：《社會的革命和改造：文明的比較研究》

[223]Elman，Benjamin A.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本杰明·A.埃爾曼：《從哲學到語言學：中華帝國晚期的思想和社會方面的變化》

[224]Emerson，John Philip.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 mainland China，1949—1958.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Statistics Reports，Series P—90，No.21.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

約翰·菲利普·埃墨森：《1949—1958年大陸中國的非農業就業》

[225]Eoyang，Eugene，ed.Selected poems of Ai Qing.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82.

尤金·約揚編：《艾青詩選》

[226]Fairbank，John K.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費正清：《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國》

[227]Fairbank，John King，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

[228]Fairbank，John King.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Haryard University Press，1979.4th ed.，enlarged，1983.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

[229]Fairbank.John 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中國傳統的外交關系》

[230]Fairbank，J.K，Banno，M.and Yamamoto，S.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Tokyo：Tuttle，1955；Reissued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費正清、M.坂野、S.山本：《日本對現代中國的研究》

[231]Fairbank，J.K.，Bruner，K F.，and Matheson，E.M.eds.The I.G.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2v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費正清、K.F.布魯納、EM馬西森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1907年的中國海關》

[232]Falkenheim，Victor.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5.

維克多·福肯漢：《當代中國的公民與團體》

[233]Falkenheim，Victor.“County administration in Fukien，”CQ，59（July-September 1974），518—543.

維克多·福肯漢：《福建的縣政府》，見[133]

[234]Fan，K.，ed.Mao Tse-tung and Lin Piao：Post-reuolutionary writings.Garden City，N.J.：Anchor Books，1972.

K.范編：《毛澤東和林彪：革命以后的著作》

[235]Fang Wei-chung，ed.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ching-chi to-ship-chi1949-1980（A record of major economic ev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80）.Peking：She-hui k’o-hsueh，1984.

房維中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

[236]Feuerwerker，Albert.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

[237]Feuerwerker，Albert.“Economic trends in the late Ch’ing empire，1870—1911，”in CHOC 11.1—69.

費維愷：《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1870—1911年》，見[73]

[238]Feuerwerker，Albert.“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in CHOC 12.128—207.

費維愷：《外國在中國的存在》，見[73]

[239]Feuerwerker，Albert.“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ory and Society ，13（1984），297—326.

費維愷：《中華帝國晚期的狀況和經濟》

[240]Feuerwerker，Yi-tse Mei .Ding Ling’s fic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梅儀慈：《丁玲的小說》

[241]Field，Robert Michael，McGlynn，Kathleen M.，and Abnett，Wiltiam B.“Political conflict and industrial growth in China：1965—1977，”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S.Congress，The Chinese economy post-Mao.1.239—284.

羅伯特·邁克爾·菲爾德、凱思林·M.麥克格林、威廉·B.阿布尼特：《中國的政治斗爭與工業增長，1965—1977年》

[242]Fincher，John H.Chinese democracy：The self-gouernment mouement in lo-cal，prouincial，and national politics 1905—1914.London：Croom Helm；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1.

約翰·H.芬徹：《中國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全國政治中的自治運動》

[243]Fingar，Charles Thomas.“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54—1955.”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7.

查爾斯·托馬斯·芬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與政策制定，1954—1955年》

[244]First fiue-years plan for deu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3—1957.Peking：Foreign Languages，Press，1956.

《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

[245]Fletcher，Joseph，F.，j r.“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in Mongolia，Sinkiang and Tibet，”in CHOC 10.351—408.

小約瑟夫·F.弗萊徹：《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見[73]

[246]Fletcher，Joseph F.，Jr，and Li，Gertraude Roth.“The rise of the Manchus，”in CHOC 9，in press.

小約瑟夫·F.費萊徹、格特魯德·羅思·李：《滿洲人的崛起》，見[73]

[247]Floyd，David ed.Mao against Khrushcheu，New York：Praeger，1963.

戴維·弗洛伊德編：《毛反對赫魯曉夫》

[248]Fogel，Joshua A.“A new direction in Japanese sinology.”HJAS，44.1（June 1984），225—247.

喬舒亞·A.福格爾：《日本中國學的新方向》，見[293]

[249]Fokkema，Douwe W.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a nd Souiet influence 1956—1960.The Hague：Mouton，1965.

杜韋·W.福克馬：《中國的文學教條與蘇聯影響，1956—1960年》

[250]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uice.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Commerce.1958—C.ited as FBIS.

《外國廣播新聞處》

[251]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uice ：Communist China.Washington，D.C.：FBIS，1966—1969.

《外國廣播新聞處：共產黨中國》（1966—1969年）

[25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66—.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Cited as FRUS.《美國的對外關系，1866— 年》

[253]Fraser，JohnT.he Chinese.New York：Summit Books，1980.

約翰·弗雷澤：《中國人》

[254]Fraser，Stewart，ed.Chinese communist education ：Records of the first dec-ade.Nashville，Tenn.：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65.

斯圖爾特·弗雷澤編：《中國的共產主義教育：前10年的成績》

[255]Freedman，Maurice.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London：Athlone Press，1958.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東南部的家系組織》

[256]Freedman，Maurice.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London：Athlone Press，1966.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人的家系和社會：福建和廣東》

[257]Fried.MortonT.he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A study of social life of aChinese county seat.New York：Praeger，1953.

莫頓·弗里德：《中國社會的組織：對中國一個縣城的社會生活的研究》

[258]Gaenslen，Frederick.“Culture and decision making：Social influence in China，Japan，Soviet Russia，and the United States.”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84.

弗雷德里克·蓋恩斯蘭：《文化與決策：中國、日本、蘇俄和美國的社會勢力》

[259]Gaimushō chōsa kyoku daiikkaC.hōsen jihen no keii （Process of the Korean War）.Tokyo：Gaimushō.1951（unpublished）.

外務省調查局第一課：《朝鮮戰爭的進程》

[260]Gale，G.S.No flies in China.London：Allen &.Unwin，1955.

G.S.蓋爾：《中國沒有蒼蠅》

[261]Gardner，John“.Educated youth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ies，1958—1966，”in John W.Lewis，ed.，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235—286.

約翰·加德納：《知識青年與城鄉差別，1958—1966年》

[262]Garside，Roger.Coming aliue：China after Mao.New York：McGraw-Hill，1981.

羅杰·加賽德：《活躍起來：毛以后的中國》

[263]Geddes，W.R.Peasa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IthacaN..Y.：Cornell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1963.

W.R.格迪斯：《共產黨中國的農民生活》

[264]Gendai Chugoku jimmei jiten（Modern China biographic dictionary）.Tokyo：Gaimush6，1966.

《現代中國人名詞典》

[265]George，Alexander，L.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n action ：The KoreanWar and its afterma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

亞歷山大·L.喬治：《行動中的中國共產黨軍隊：朝鮮戰爭及其余波》

[266]Gernet，Jacques.A history of Chinese ciuiliz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Trans.J.R.Foster of Gernet，Le monde Chinois.Paris：A.Colin，1972，1980.）

雅克·熱爾內：《中國文明史》（J.R.福斯特譯自熱爾內：《中國世界》）

[267]Gittings，John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約翰·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任務》

[268]Gittings，JohnS.uruey of the SinoS-ouiet dispute：A commentary and ex-tracts from the recent polemics 1963—1967.London：Oxford Univertsity Press，1968.

約翰·吉廷斯：《中蘇爭論概觀：近期論戰的評注與摘要，1963—1967年》

[269]Gittings，John.“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CQ，39（July-Sepetmber 1969），41—54.

約翰·吉廷斯：《大國三角和中國的外交政策》，見[133]

[270]Goldman，Merle.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默爾·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持不同文藝見解者》

[271]Goldman，Merle.China’s intellectuals：Aduise and diss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tiy Press，1981.

默爾·戈德曼：《中國知識分子：建議和異議》

[272]Goodman，David S.G.Beijing street uoices.London：Marion Boyars，1981.

戴維·S.G.古德曼：《北京街頭的呼聲》

[273]Goodman，David，ed.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ew York：M.E.Sharpe，1984.

戴維·古德曼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團體與政治》

[274]Goodrich，L.Carrington，and Fang Chaoyi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2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傅路特、房兆楹編：《明代人物傳記詞典》

[275]Grant，Nigel.Souiet education.Middlessex，Eng.：Penguin Books，4th ed.1979.

奈杰爾·格蘭特：《蘇聯教育》

[276]Great trial in Chinese history.A：The trial of the Lin Biao and Jiang Qingcounter-reuolutionary cliques，Nou.1980—Jan.1981.Peking：New World，1981.

《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審判》，A：《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980年11月—1981年1月》

[277]Greenough，Paul R.Prosperity and misery in modernBengal：The famineof 1943—194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保羅·R.格里諾：《現代孟加拉的繁榮與苦難：1943—1944年的饑荒》

[278]Gregory，Paul R.and Stuart，Robert C.Sou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New York：Harper &.Row，1974.

保羅·R.格雷戈里、羅伯特·C.斯圖爾特：《蘇聯的經濟結構和成績》

[279]Grieder，Jerome B.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A narratiuehistory.New York：Free Press；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1.

杰羅姆·B.格里德：《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國家》

[280]Griffith，William.Albania and the Sino-Souiet rift.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63.

威廉·格里菲思：《阿爾巴尼亞與中蘇分裂》

[281]Griffith，William E.The Sino-Souiet rift.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64；London：Allan & Unwin，1964.

威廉·E.格里菲思：《中蘇的分裂》

[282]Griffth，William.Sino-Souiet relations.1964—1965.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67.

威廉·格里菲思：《中蘇關系，1964—1965年》

[283]Guillain，Robert，Six hundred million Chinese.Trans.from French by M.Savill.New York：Criterion books，1957.Published in England as The blueants.London：Seeker & Warburg.1957.

羅伯特·吉萊恩：《六億中國人》（M薩維爾譯自法文。英國版名《藍螞蟻》）

[284]Guillain，Robert.When Chinawakes.New York：Walker，1966.

羅伯特·吉萊恩：《中國醒來的時候》

[285]Guillermaz，Jacques.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1949—1976.Trans.Anne Destenay.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6.

雅克·吉勒馬：《執政的中國共產黨，1949—1976年》（安妮·德斯特內伊譯）

[286]Gurtov，Melvin.China and Southeast Asia，the politics of suruiual：A studyof foreign policy interaction.Lexington，Mass.：D.C.Health（Lexington Books），1971；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

梅爾文·格爾托：《中國與東南亞，生存政治學：對外政策相互影響的研究》

[287]Halpern，A.M.，ed.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orm six continents.New York：McGrarw-Hill，1965.

A.M.哈爾珀恩編：《對華政策：六大洲所見》

[288]Halpern，Nina.“Economic specialists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economic policy，1955—1983.”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85.

尼娜·哈爾彭：《經濟專家與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1955—1983年》

[289]Hao Meng-pi and Tuan Haoj-an，eds.Chung-kuo kung-ch’an-tang liu-sh ih-nien （Six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vols.Peking：解放軍出版社，1984.

郝夢筆、段浩然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

[290]Hao Yen-P’ing.The commercial reu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商業革命：中西商業資本的興起》

[291]Harding，Harry.Organizing China：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1949—1976.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哈里·哈丁：《創建中的中國：官僚政治的問題，1949—1976年》

[292]HarrisonJ.ames Pinckney.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New York：Praeger，1972.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取得政權的長征：中國共產黨的歷史，1921—1972年》

[293]Haru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Semi-annual from 1977；previously annual.Cambrid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36—

《哈佛亞洲研究雜志》

[294]Hauser，Ernest O.Shanghai：City for sale.New York.Harcourt Brace，1940.

歐內斯特·O.豪澤：《待售的城市上海》

[295]Henderson，Gail，and Cohen，Myron.The Chinese hospital.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蓋爾·亨德森、邁倫·科恩：《中國的醫院》

[296]Hevi，Emmanuel John.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New York：Praeger，1963.

伊曼紐爾·約翰·赫維：《在中國的一個非洲學生》

[297]Hinton，Harold C.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6.

哈羅德·C.欣頓：《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

[298]Hinton，Harold C.China’s turbulent quest：An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relations since 1949.New York：Macmillan，rev.ed.1972（1970）；paperback，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

哈羅德·C.欣頓：《中國的強橫要求：1949年以來中國對外關系的分析》

[299]Hinton，Harold C.，ed.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Adocumentary suruey.5vols.Wilmington，Del.：Scholarly Resources，Inc.，1980.

哈羅德·C.欣頓編：《1949—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獻概覽》

[300]Hinton，William.Fanshe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6.

威廉·欣頓：《反省》

[301]Ho Chih（Ch’in Chao-yang）.“Hsien-shih chu-i-kuang-k’uo ti taol-u”（Realism-the broad road）.Jen-min wen-hsueh.9（1956），1—13.

何直：《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

[302]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何炳棣：《136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

[303]Ho.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社會流動的幾個方面》

[304]Hobbs，Lisa.I saw Red China.New York：McGraw-Hill，1966.

利莎·霍布斯：《我看見了紅色中國》

[305]Hollister，W.W.China’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social accounts，1950—1957.Glencoe，I 11.：Free Press，1958.

W.W.霍利斯特：《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與社會價值，1950—1957年》

[306]Hou Chi-ming.“Manpower，employment，and unemployment，”in Alexander Eckstein，Walter Galenson，and Ta-chung Liu，eds.，Economic trends inCommunist China，329—296.

侯繼明：《人力、就業和失業》

[307]Hou Chi-ming and Yu Tzong-shian，eds.ModernChinese economic history.Taipei：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1979.

侯繼明、于宗先編：《現代中國經濟史》

[308]Houn，Franklin.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s.Washington，D.C.：Public Af-fairs Press，1965.

富蘭克林·霍恩：《中國的政治傳統》

[309]Howe，Christopher.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1949—1957.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克里斯托弗·豪：《1949—1957年中國城市的就業和經濟增長》

[310]Howe，Christopher，ed.Shanghai：Reuolution and deuelopment in an Asianmetropolis.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克里斯托弗·豪編：《上海：一個亞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發展》

[311]Howe，Christopher.“Industrializ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long-run population stability：Shanghai’s achievement and prospect，”in Christopher Howe，ed.，Shanghai：Reuolution and deu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153—187.

克里斯托弗·豪：《在人口總數長遠穩定的條件下工業化》

[312]Hsiang Ching-ch’üan“Liu-shih nien-tai t’iao-cheng shih-ch’i wen-ting wuchia ching-yen ch’u-t’an”（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experience in commodity price stabil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readjustment in the 1960s）《價格理論與實踐》（Price theory and practice），2（1982），22—25.

項鏡泉：《六十年代調整時期穩定物價經驗初探》

[313]Hsiao，Gene，and Witunski，Michael.Sino-American normalization and itspolicy implications.New York：Praeger，1983.

吉納·蕭、邁克爾·威吞斯基：《中美關系正常化及其政策含義》

[314]Hsiao，Katherine H.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ommunist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凱瑟琳·H.蕭：《共產黨中國的貨幣與貨幣政策》

[315]Hsiao，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ru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蕭公權：《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管理》

[316]Hsiao，Kung-chuanA.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Trans.F.W.Mote.vol.I.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sixth—century A.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

[317]Hsiao，Theodore E.The history of moderneducation in China.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5.

西奧多·E.蕭：《中國近代教育史》

[318]Hsieh，Alice Langley.Communist China’s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era.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2.

愛麗絲·蘭格利·謝：《共產黨中國在核時代的戰略》

[319]Hsieh，Alice Langley.“China’s secret military papers：military doctrine and strategy，”CQ 18（April 1964），79—99.

愛麗絲·蘭格利·謝：《中國的秘密軍事文件：軍事學說與戰略》，見[133]

[320]Hsieh Tu-yang“Hui-ku liu-shih nien-tai ch’u nung-yeh ti t’iao-cheng”（Recalling the readjustment of agricul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60s）in Liu Sui-nien，ed.，Liu-shih nien-tai kuo-min ching-chi t’iao-cheng ti hui-ku，50—69.

謝渡揚：《回顧六十年代初農業的調整》

[321]Hsin-hua hsinw-en-she（New China News Agency）.

新華新聞社（新華社）

[322]Hsin-hua jih-pao（New China daily）.Wuhan，Chungking，et al.，1938—

《新華日報》

[323]Hsin-hua pan-yueh k’an （New China semi-monthly）.Peking：1956—1960.See Hsin-hua yueh-pao.《新華半月刊》

[324]Hsin-hua yueh-pao（New China monthly）.Monthly.（Title varies：1956—1960Hsin-hua pan-yueh-k’an）.Peking：1November 1949—《新華月報》（1956—1960年改名《新華半月刊》）

[325]Hsin-hua yueh-paowen-chai-pan（New China monthly digest）.Monthly.Peking：1979—1980.From 1981，retitled Hsin-hua wen-chai（New China digest）.

《新華月報文摘版》（1981年起恢復《新華文摘》原名）

[326]Hsu Chi-yü.Ying-huan chih-lueh（A brief account of the maritime circuit.）10chüan.Foochow，1850ed.

徐繼畬：《瀛環志略》

[327]Hsu Ti-hua“Ching-chien chih-kung ho ch’eng chen den-k’ou”（Reducing the number of workers and staff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in Liu Sui-nien，ed.Liu-shih nien-tai kuo-min ching-chi t’iao-cheng ti hui-ku，123—137.

徐棣華：《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

[328]Hsueh-hsi（Study）.Peking：September 1949—October 1958.

《學習》

[329]Hsueh-hsi yü yen-chiu（Study and research）.Peking：1981—

《學習與研究》

[330]Hsueh Mu-ch’iao.Tang-ch’ien wok-uo ching-chi jo-kanwen-t’i（Som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s economy）.Peking：Jen-min，1980.

薛暮橋：《當前我國經濟若干問題》

[331]Hsueh Mu-ch’iao，ed.Chung-kuo ching-chi nien-chien 1982（Chinese economic yearbook 1982）.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Hong Kong：Hong Kong China Economic Yearbook Company，1983.

薛暮橋編：《中國經濟年鑒，1982年》

[332]Hsueh Mu-ch’iao.“Kuan-yü i-chiu-wu-pai--chiu-liu-liu-nien kuo-min chingchi chien she ti ch’ing-k’uang ho ching-yen”（China’s experience and situaton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from 1958to 1966），in Ching-chi ts’an-k’ao tzu-li-ao.

薛暮橋：《關于一九五八——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建設的情況和經驗》

[333]“Hu Feng tui wen-i wen-t’i ti i-chien”（Hu Feng’s literary opinons）.Supplement to Wen-i pao，January 1955.

《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

[334]Hu Shi Ming and Seifman，Eli，eds.Toward a new world outlook：Adoeu-mentary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6.New York：AMS Press，1976.

胡實明（音）、伊萊·塞德曼：《展望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資料》

[335][Huang]Ch’iu-yun.“Pu yao tsai jen-min ti chi-k’u mien-ch’ien pi-shang yenching”（We nust not close our eyes to the hardships among the people）.Jen-minwen-hsueh，9（1956），58—59.

黃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

[336][Huang Ch’iu-yun].“Tz’u tsai na-li？”（Where is the thorn？）Wen-i hsueh-hsi，6（1957），8—10.

黃秋耘：《刺在哪里》

[337]Huang，Joseph.Heroes and uillain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ouel as reflection of life.London：C.Hurst，1973.

約瑟夫·黃：《共產黨中國的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作為生活反映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

[338]Huang Pen-chi.Li-tai chih-kuan-piao（Tables of official posts in successive dynasties）.Shanghai，1880：Peking：Chung-hua，1965.

黃本驥：《歷代職官表》

[339]Hucker，Charles O.China’s imperial past，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ford，Cali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賀凱：《中華帝國的過去：中國歷史和文化概論》

[340]Hucker，Charles O.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賀凱：《中華帝國職官詞典》

[341]Hucker，Charles O.“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in John K.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132—162.

賀凱：《明末的東林黨》

[342]Hucker，Charles.“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ensorate and the new Peking regim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uiew，45.4（December，1951）.1041—1057.

賀凱：《傳統的中國審查機關與新的北京政權》

[343]Hudson，G.F.，Lowenthal，Richard，and MacFarquhar，Roderick.The Sino-Souiet dispute.New York：Praeger，1961.

G.F.赫德森、理查德·洛溫撒爾、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中蘇爭論》

[344]Hui-i Wang Chia-hsiang（Recalling Wang Chia-hsiang）.Peking：Jen-min，1985.

《回憶王稼祥》

[345]Hungch’i（Red flag）.Peking：1June 1958—

《紅旗》

[346]Hunt，Michael H.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邁克爾·H.亨特：《1914年以前美國和中國特殊關系的形成》

[347]Hunter，Edward.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New York：Vanguard Press，1953.

愛德華·亨特：《紅色中國的洗腦》

[348]Hunter，Neale.Shanghai journal.New York：Praeger，1969.

尼爾·亨特：《上海日記》

[349]Ichiko，Chūzō.“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in Mary C.Wrigth，China in reuolution，ch.6，297—318.

市古宙三：《試論紳士的作用》

[350]Imahori Seiji.Chūgoku gendaishi kenkyū josetsu（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Tokyo：Kaisō Shob6，1976.

今堀誠二：《當代中國史研究概論》

[351]Index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uice Daily Report：China.Monthly plus annual cum.（New Canaan，Conn.：NewsBank，Inc.，1975—）.From 1975to 1982.the index was published quarterly，but with Volume 9in 1983，the publication became a monthly，with an annual cumulative index as well.Beginning in October 1977，FBIS began to compile an index to the Daily Report，as well as the JPRS translations.With the fifteenth number in this series covering April—June 1981（published August 28，1981），the series acquired the designation“For Official Use Only”and was no longer available to libraries.

《外國廣播新聞處每日報道索引：中國》

[352]Irick，Robert L.Ch’ing policy toward the coolie trade 1847—1878.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82.

羅伯特·L.艾里克：《1847—1878年清朝的苦力貿易政策》

[353]Iriye，Akira.See Nagai Yōnosuke.

[354]Iriye Keishirō，and Andō Masashi，eds.Gendai Chugoku no kokusai-kanke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Tokyo：Nihon Kokusai Mondai Kenkyūjo，1975.

入江啟四郎、安藤正士編：《當代中國的國際關系》

[355]Ishikawa Shigeru.National income and capital formation in MainlandChina：An examination of official statistics.Tokyo：Institute of Asian Affairs，1965.希格魯·伊舍卡瓦：《大陸中國的國民收入與資本積累：對官方統計數字的考察》

[356]Israel，John.“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the ideology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in Chalmers Johnson，ed.，Ideology and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3—46.

約翰·伊斯雷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

[357]Israel，John.“An autonomous academy in a one-party state：The Lienta model.”Paper presented at the New England China Seminar Workshop 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CP：The search for a new relationship，held at Harvard University，5May 1984.

約翰·伊斯雷爾：《一黨統治國家中的一所自治大學：聯大模式》

[358]Issues a Studies.Monthly.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aiwan.1964—

《問題和研究》

[359]Izumi Hajime“Chōsen sensō o meguru Chu-So tairitsu：Soren no Kokuren Anpoei kesseki no haikei”（The 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Korean War：Background of the Soviet boycott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Gunji ken-kyū，10.3（March 1975）.

伊豆貝元：《朝鮮戰爭中的中蘇沖突：蘇聯抵制聯合國安理會的背景》

[360]Jacobs，J.Bruce.“A preliminary model of particularistic ties in Chinese political alliances：Kan-ch’ing and Kuan-hsi in a rural Taiwanese township，”CQ，78（June 1979），237—273.

J.布魯斯·雅各布斯：《中國的政治聯盟中排他主義的一個雛型：一個臺灣鄉區中的“感情”與“關系”》，見[133]

[361]JA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亞洲研究雜志》

[362]Jen-min jih-pao（People’s Daily）Peking：1949—.Cited as JMJP.《人民日報》

[363]Jen-min jih-pao so-yin（Index to People’s Daily）.Peking：1951—《人民日報索引》

[364]Jen-min shou-ts’e（People’s handbook）.Shanghai，Tientsin，Peking：1950—1953，1956—1965，1979.

《人民手冊》

[365]Jen-minwen-hsueh（People’s Literature）.Peking：1940—1966，1976—《人民文學》

[366]Joffe，Ellis.Party and army：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Chinese officer corps，1949—1964.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5.

埃利斯·喬菲：《黨與軍隊：中國軍官的職業化與政治控制，1949—1964年》

[367]Johnson，Chalmers.Communist policies toward the intellectual class.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59.

查默斯·約翰遜：《共產黨對知識分子階層的政策》

[368]Johnson，Chalmers，ed.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3.

查默斯·約翰遜編：《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與政治》

[369]Johnson，Chalmers，ed.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查默斯·約翰遜編：《共產主義制度的變化》

[370]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An economic pro-file of mainland China，2vol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

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大陸中國的一個經濟側面》

[371]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 economic assessment.Washington，D.C.：U.S.Governmetn Printing Office，1972.

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評價》

[372]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China：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nting Office，1975.

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中國：經濟的再評價》

[373]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Chinese economypost-Mao.vol.1.Policy and performance.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

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毛以后的中國經濟》，第1卷《政策與成績》

[374]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uice（JPR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Various series.See Berton and Wu，Contemporary China，409—411.

《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多種叢書

[375]Jones，E.L.The European miracle：Enuironments，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E.L.瓊斯：《歐洲的奇跡：歐洲和亞洲歷史中的環境、經濟和地緣政治學》

[376]Jones，Susan Mann，and Kuhn，Philip A.“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in CHOC 10.107—162.

蘇珊·曼·瓊斯、孔飛力：《清王朝的衰落和叛亂的根源》，見[73]

[37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Quarterly.Wilmington，Del.：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1941—

《經濟史雜志》

[378]Joy，Charles Turner.How Communists negotiate.New York：Macmillan，1955.

查爾斯·特納·喬伊：《共產黨人如何談判》

[379]Kahin，George McTurnin.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Bandung，Indo-nesia，April 1955.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6.

喬治·麥克特寧·卡欣：《亞非會議，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亞，萬隆》

[380]Kahn，Harold L.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Image and reality in theChien-lung reig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哈羅德·L.卡恩：《皇帝眼中的君主制：乾隆朝的觀念和現實》

[381]Kamiya Fuji，ed.“Kim 11-sung’s radio speech on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26June 1950）.”Chōsen mondai sengo shiryō（Documents on the postwar Korean problems），I.Tokyo：Nihon Kokusai Mondai Kenkyūjo，1976.

神谷不二編：《金日成在朝鮮戰爭爆發之日的廣播講話（1950年6月26日）》

[382]“Kao-chi chih-shih fen-tzu tso-t’an Ma-Lieh chu-i li-lun hsueh-hsi”（Higher intellectuals discuss the study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y）.Hsueh-hsi（Study），11（1957），2-11.

《高級知識分子座談馬列主義理論學習》

[383]Karnow，Stanley.Mao and China：From reuolution to reuolution.New York：Viking Press，1972.

斯坦利·卡諾：《毛與中國：不斷革命》

[384]Kau，Michael Y.（Yingmao），ed.The Lin Piao affair：Power，politics，andmilitary coup.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5.

高英茂編：《林彪事件：權力、政治和軍事政變》

[385]Kau，Yi maw（Ying-mao）.“Governmental bureaucracy and cadres in urban China under communist rule，1949—1965.”Ph.D.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1968.

高英茂：《1949—1965年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城市政府官僚機構和干部》

[386]Kau.Ying-mao，ed.，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s nation-building.White plains，N.Y.：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1973.

高英茂編：《人民解放軍與中國的建國》

[387]Kau，Ying-mao.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Providence，R.I.：Brown University，1971.

高英茂：《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政治工作制度》

[388]Kennedy，Thomas.Arms of Kiangnan：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ord-nance industry 1860—1895.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8.

托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武器：1860—1895年中國軍械工業的現代化》

[389]Khrushcheu remembers.Trans.and ed.by Strobe Talbott.Boston：Little，Brown，1970.

《赫魯曉夫回憶錄》（斯特羅貝·塔爾博特編譯）

[390]Khrushcheu remembers：The last testament.Trans.and ed.Strobe Talbott，with detailed commentary and notes by Edward Crankshaw.Boston：Little，Brown，1974；New York：Bantam，1976.

《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后的遺言》（斯特羅貝·塔爾博特編譯，愛德華·克蘭克肖注釋）

[391]Kinkley，Jeffrey C.，ed.After Mao：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78—1981.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5.

杰弗里·C.金克利編：《毛以后：中國的文學和社會，1978—1981年》

[392]Klein，Donald W.，and Clark，Anne B.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communism 1921—1965，2v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唐納德·W.克萊因、安妮·B.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人名詞典，1921—1965年》

[393]Klochko，Mikhail A.Sou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New York：Praeger，1964.

米哈伊爾·A.克洛奇科：《在紅色中國的蘇聯科學家》

[394]“Ko min-chu tang-P’ai lien-ho hsuan-yen”（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ies）.Jeri-min jih-pao，4November 1950.

《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

[395]Ko-ming shih ch’ao（A transcript of revolutionary poems）.2vols.Peking：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1977.

《革命詩抄》

[396]Kojima，Reiitsu“Grain acquisition and supply in China，”Contemporary Chi-na，5（1963），65—88.

小島麗逸：《中國的糧食收購和供應》

[397]Kuang-ming jih-pao（Enlightenment Daily）.Peking：1949—.Cited as KMJP.

《光明日報》

[398]Kuangming jih-pao so-yin（Index to Enlightenment Daily）.Peking：1952—

《光明日報索引》

[399]Kubin，Wolfgang，and Wagner，Rudolf，eds.Essay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Bochum.West Germany：Studienverlag Brockmeyer，1982.

沃爾夫岡·庫賓、魯道夫·瓦格納編：《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學評論文集》

[400]Kuhn，Phlilp A.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aperback edition with new preface，1980.

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和社會結構》

[401]Kuhn，Philip A.“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in 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257—298.

孔飛力：《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動員的問題》

[402]Kuhn，Philip A.，and Jones，Susan Mann.“Introduction.”in Select papers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3（1978—1979），v—xix.孔飛力、蘇珊·曼·瓊斯：《導言》，載《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集》，3（1978—1979）

[403]Kuhn，Philip A.“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In Select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3（1978—1979），100—136.

孔飛力：《民國時期的地方稅收和財政》

[404]Kuhn.Philip A.“L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in Select papers from the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4（1979—1980），1—18.

孔飛力：《晚清的政體觀》

[405]Kuhn.Philip A.“The Taiping Rebellion，”in CHOC，10.264—317.

孔飛力：《太平軍叛亂》，見[73]

[406]Kun，Joseph C.“Higher education：Some problems of selection and enrolment.”CQ，8（October-December 1961），135—148.

約瑟夫·C.孔：《高等教育：選拔和入學的一些問題》，見[133]

[407]Kung-jen jih-pao（Workers’Daily）.Peking：15July 1949（suspended 1April 1967，resumed 6October 1978）—

《工人日報》

[408]Kung-tso t’ung-hsuri（Bulletin of activites[of the PLA]）.Peking：1961—

《工作通訊》

[409]Kuo Mojo”Long live the policy-‘Let diverse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People’s China，17（1September 1956），7—9.

郭沫若：《“百家爭鳴”萬歲》

[410]Kwok，D.W.Y.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New 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郭穎頤：《中國思想中的科學主義，1900—1950年》

[411]Kwong，Julia.Chinese education in transition：Prelude to the Cultural Reuo-lution.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9.

朱莉婭·匡（音）：《轉變中的中國教育：文化革命的序曲》

[412]Kwong，Julia.“The educational experimen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1958—1959：It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Comparatiue Education Reuiew，3（October 1979），443—455.

朱莉婭·匡（音）：《“大躍進”的教育試驗及其內在的矛盾，1958—1959年》

[413]Kyriak，Theodore，ed.Bibliography-index to USJPRS research transla-tions，vols.1—8.Annapolis，Md.：Research and Microfilm Publications，Inc.，1962—

西奧多·基里亞克編：《美國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研究譯叢書目索引》

[414]Labin，Susan.The anthill：The human condition in Communist China.New York：Praeger，1960.

蘇珊·拉賓：《蟻冢：共產黨中國的人的狀況》

[415]Lach，Donald F.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I，The century of dis-couery，in 2books（1965）；vol.Ⅱ，A century of wonder；Book One：The uisu-al arts（1970）；Book Two：The literary-arts （1978）；Book Three：Thescholarly disciplines （1978）.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唐納德·F.拉奇：《歐洲形成時期的亞洲》。第1卷《發現的世紀》，第2卷《奇跡的世紀》

[416]Lall，Arthur.How Communist China negoti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阿瑟·拉爾：《共產黨中國如何談判》

[417]Lampton.David M.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in China ：The policy process.1949—1977.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7.

戴維·M.蘭普頓：《中國的醫藥政治：1949—1977年的政策發展過程》

[418]Lampton，David M.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forthcoming.

戴維·M.蘭普頓：《毛以后中國的政策貫徹》

[419]Lampton，D.Michael.Paths to power：Elite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5.

D.邁克爾·蘭普頓：《通向權力之路：當代中國精英人物的浮沉》

[420]Langer，William L.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2—1902.2vols.2nd ed.New York：Knopf，1950.

威廉·L.蘭格：《1892—1902年的帝國主義外交》

[421]Lardy，Nicholas R.Economic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 China.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尼古拉斯·R.拉迪：《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分配》

[422]Lardy，Nicholas R.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uelopment.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尼古拉斯·R.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

[423]Lardy，Nicholas R.“Regional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in Robert F.Dernberger，ed.，China’s deuelopment experience in comparatiueperspectiue ，153—190.

尼古拉斯·R.拉迪：《中國的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

[424]Lardy，Nicholas.“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s fiscal management，”CQ 61（March 1975），25—60.

尼古拉斯·拉迪：《中國財政管理中的集中與分散》，見[133]

[425]Lardy，Nicholas R.，and Lieberthal，Kenneth，eds.Chen Yun’s strategy forChina s deuelopment ：A non-Maoist alternatiue.Armonk，N.Y.：M.E.Sharpe，1983.

尼古拉斯·R.拉迪、肯尼思·利伯塔爾編：《陳云的發展中國的策略：一種非毛主義的可取辦法》

[426]Latourette，Kenneth Scott.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through3000years of cumulatiue deuelopment and recent radical change.New York：Macmillan，1934，1946，1962；4th ed.，2vols.in one，1964.

賴德烈：《中國人：經過3000年積累性發展和近期激烈變化的歷史和文化》

[427]Lattimore，Owen.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0；2nd ed.，1951.

歐文·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腹地邊境》

[428]League of Natio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Experts.The reorganization ofeducation in China：See Becker，C.H.，et al.

國聯教育專家考察團：《中國教育的改革》

[429]Lee，Chae-jin.Communist China’s policy towurd Laos ：A case study，1954—1967.Lawrence：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Kansas，1970；paperback，New York：Paragon，1970.

李儕今（音）：《共產黨中國對老撾的政策：個案研究，1954—1967年》

[430]Lee.Hong Yung.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uolution：A casestud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李洪勇（音）：《中國文化革命的政治：個案研究》

[431]Lehmann，David，ed.Agrarian reform and agrarian reformism：Studies ofPeru.Chile.China and India，London：Faber &.Faber，1974.

戴維·萊曼編：《土地改革與農業改良主義：對秘魯、智利、中國和印度的研究》

[432]Leonard，Jane Kate.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uery of the maritimeworld.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簡·凱特·倫納德：《魏源和中國重新發現海洋世界》

[433]Levenson，Joseph R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2nd rev.ed.，195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1970.

約瑟夫·R.利文森：《梁啟超和近代中國思想》

[434]Levenson.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1.The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1958）.Vol.2.The problem of monar-chical decay（1964）.Vol.3.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196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約瑟夫·R.利文森：《儒家的中國及其現代的命運》。第1卷《關于思想連續性的問題》，第2卷《關于帝制衰亡的問題》，第3卷《關于歷史意義的問題》

[435]Levy，Howard S.Chinese footbinding：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New York：Walton Rawls，1966.

霍華德·S.列維：《中國人的纏足：一種古怪的性愛風俗的沿革》

[436]Lewis，John Wilson.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3.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共產黨中國的領導》

[437]Lewis，John Wilson.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and the successionto Mao Tse-tung：An appraisal of tensions.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State Policy Research Study，January 1964.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毛澤東以后的接班：緊張形勢的估計》

[438]Lewis，John Wilson，ed.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編：《共產黨中國的城市》

[439]Lewis，John Wilson.Major doctrines of Communist China.New York：Norton，1974.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共產黨中國的主要原則》

[440]Lewis，John Wilson.“China’s secret military papers：‘continuities’and‘revelations’.”CQ，18（April-June 1964），68—78.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中國的保密軍隊報紙：“牽連”與“揭發”》，見[133]

[441]Li Choh-ming.Economic deuelopment of Communist China：An appraisalof the first fiue—years of industrializ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

李卓敏：《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工業化的第一個五年的估計》

[442]Li Choh-ming.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Commun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2.

李卓敏：《共產黨中國的統計制度》

[443]Li Fu-ch’un.“Report on the First Five-Years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uly 5—6，1955），”in Communist China 1955—1959：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42—91.

李富春：《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1955年7月5—6日）》

[444]Li-shih yen-chiu （Historical research）.Peking：February 1966，December 1974—.Cited as LSYC.《歷史研究》

[445]Li，Victor.“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nd political-legal work in Huiyang，1952—1964，”in John Wilson Lewis，ed.，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51—74.

維克多·李：《惠陽的公安局與政法工作，1952—1964年》

[446]Liang Heng，and Shapiro，Judith.Son of the reuolution.New York：Knopf 1983.

梁恒、朱迪思·夏皮羅：《革命之子》

[447]Liao Kai-lung.“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our road of development（October 25，1980），”in Issues & Studies，17.10（October 1981），65—94；17.11（November 1981），81—110.

廖蓋隆：《歷史經驗和我們的發展道路（1980年10月25日）》

[448]Liao Mo-sha，Hsia Yen，Wu Han，T’ang T’ao，and Meng Ch’ao.Ch’ang-tuanlu（The long and the short）.Peking：Jen-min，1980.

廖沫沙、夏衍、吳晗、唐弢、孟超：《長短錄》

[449]Liao-ping ching-chi t’ung-chi nien-chien 1983.（Liaoning economic statistics yearbook 1983）.Shenyang：Jen-min，1983.

《遼寧經濟統計年鑒，1983年》

[450]Liao-wang （Outlook）.Peking：1981—

《隙望》

[451]Lieberthal，Kenneth.A research guide to central Party and gouernmentmeetings in China 1949—1975.White Plains，N.Y.：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1976.

肯尼思·利伯塔爾：《1949—1975年黨中央和政府會議研究指南》

[452]Lieberthal，Kenneth G.Reu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肯尼思·G.利伯塔爾：《天津的革命與傳統，1949—1952年》

[453]Lieberthal，Kenneth，et al.Central documents and Politburo politics in Chi-na.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No.33.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8.

肯尼思·利伯塔爾等：《中國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治》

[454]Lif ton，Robert Jay.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A stud-y of“brainwashing”in China.New York：Norton，1961.

羅伯特·杰伊·利夫頓：《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對中國“洗腦”的研究》

[455]Lifton，Robert Jay.Reuolutionary immortality：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uolution.New York：Vihtage，1968.

羅伯特·杰伊·利夫頓：《革命的不朽：毛澤東和中國文化革命》

[456]Lindbeck，John M H.Understanding China：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New York：Praeger，1971.

約翰·M.H.林德貝克：《了解中國：給福特基金會的報告》

[457]Lindbeck，John M H.，ed.China：Management of a reuolutionary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17.

約翰·M H.林德貝克編：《中國：一個革命社會的管理》

[458]Lindqvist，Sven.China in crisis.New York：Crowell，1963.

斯文·林奎斯特：《緊要關頭的中國》

[459]Lindsay，Michael.Not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u.1941—1947.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0.

林邁可：《共產主義中國的教育問題，1941—1947年》

[460]Lindsay，Michael.Not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a，1941—1947：With supplements on deuelopments in 1948and 1949by Marion Me-nzies，William Paget，and S.B.Thomas.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77.Reprint of the 1950ed.

林邁可：《共產主義中國的教育問題，1941—1947年：馬里恩·孟席思、威廉·佩吉特、S.B.托馬斯增補1948和1949年的發展》

[461]Link，Perry，ed.“People or monsters？”and other stories and reportage fromChina after Mao，by Liu Binya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

佩里·林克編：《<人妖之間>及劉賓雁在毛以后所寫的其他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

[462]Link，Perry，ed.Stubborn weed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

佩里·林克編：《頑強的毒草》

[463]Link，Preey，ed.Roses and thor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佩里·林克編：《玫瑰與刺》

[464]Liu，Alan P.L.Political culture and group conflict in Communist China.Santa Barbara，Calif.：Clio Books，1976.

艾倫·P.L.劉：《共產黨中國的政治文化與集團斗爭》

[465]Liu Chih-ming.Hsiao Chün ssu-hsiang p’-p’ian （Criticism of Hsiao Chün’s thought）.Dairen：東北書店，1949.

劉芝明：《蕭軍思想批判》

[466]Liu Chih-ming.“A criticism of the errors of Hsiao Chün and the CulturalGazette，”in Hualing Nieh，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2.294—306.

劉芝明：《對蕭軍和<文化報>的錯誤的批判》

[467]Liu，James T.C.“The variety of political reforms in Chinese history：A simplified typology，”in Paul A.Cohen and John E.Schrecker，Reform in nine-teeth century China，9—13.

劉子健：《中國歷史中的各種政治改革：簡單的分類》

[468]Liu，Kwang-Ching.“The Ch’ing restoration，”in CHOC.10.409—490.

劉廣京：《清代的中興》，見[73]

[469]Liu，Kwang-Ching，and Smith，Richard J.“The military challenge：The North-west and the coast，”in CHOC，11.202—273.

劉廣京、理查德·J.史密斯：《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見[73]

[470]Liu Shao-ch’i.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1945—1957.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69.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1945—1957年》

[471]Liu Shao-t’ang，and Ts’ung Wei-hsi.“Hsieh chen- shih-she-hui chu-i hsienshih chu-i ti sheng-ming ho-hsin”（Write the truth-the living core of socialist realism）.Wen-i hsueh-hsi，1（1957），17.

劉紹棠、從維熙：《寫真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生命核心》

[472]Liu Sui-nien.“‘T’iao-cheng kung-ku ch’ung-shih t’i-kao’pa-tzu fang-chenti t’i-ch’u chi chih-hsing ch’ing-k’uang”（The proposal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ight-character policy of readjustment，consolidation，filling-out，and raising standards）.Tang-shih yen-chiu （Research on Party history），1980.6，21—33.

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

[473]Liu Sui-nien，ed.Liu-shih nien-tai kuo-min ching-chi t’iao-cheng ti hui-ku（Recalling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1960s）.Peking：Finance and Economics Publishing House，1982.

柳隨年編：《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

[474]Liu Ta-chung and Yeh Kung-chia.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uelopment 1933—1959.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1933—1959年的國民收人和經濟發展》

[475]Lo Feng.“Hai-shih tsa-wen ti shih-tai”（Still a period of tsa-wen）CFJP.March 12，1942.

洛風：《還是雜文的時代》，見[126]

[476]Lo Hui-min，ed.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vol.1（1895—1912）；vol.2（1913—1920）.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羅惠民編：《莫理循通訊集》

[477]Lo Keng-mo.“Kuan-yü wo-kuo chi-hua ching-chi ti hsing-ch’eng chi ch’i fachan ti ch’u-che kuo-ch’eng ti fen-hsi”（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planned economy and its course of development）.Ching-chi yenchiu（Economic research），2（1981）37—45.

駱耕漠：《關于我國計劃經濟的形成及其發展的曲折過程的分析》

[478]Lofstedt，Jan-Ingvar.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y：Changes and contradic-tions，1949—1979.Stockholm：Almqvist and Wiksell International，1980；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80.

簡·英格瓦·洛夫斯特：《中國的教育政策：改革與矛盾，1949—1979年》

[479]Loh，Robert，with Humphrey Evans.Escape from Red China.New York：Coward-McCann，1962.

羅伯特·羅、漢弗萊·埃文斯：《逃出紅色中國》

[480]London，Kurt，ed.Unity and contradiction：Major aspects of Sino-Souietrelations.New York：Praeger，1962.

庫爾特·倫敦編：《一致與矛盾：中蘇關系的主要方面》

[481]Lowenthal，Richard.“Development vs.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in Chalmers Johnson，ed.，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33—116.

理查德·洛溫撒爾：《共產黨政策中發展與空想的對立》

[482]Lu Hsun.Lu Hsun ch’üan-chi（Complete works of Lu Hsun）.10vols.Peking：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Cited as LHCC.

魯迅：《魯迅全集》

[483]Lu Hsun.“Ta Hsu Mao-yung kuan-yü k’ang-Jih t’ung-i chan-hsien wen-t’i”（A rejoinder to Hsu Mao-yung concerning the united front against the Japanese）.Lu Hsun ch’üan-chi.6.428—441.

魯迅：《答徐懋庸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484]Lu K’an-ju.“Hu Shih fan-tung ssu-hsiang kei-yü ku-tien wen-hsueh yenchiu ti tu-hai”（The poisonous harm of Hu Shih’s reactionary thought to the stud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Wen-i pao，21（1954），4—5.

陸侃如：《胡適反動思想給予古典文學研究的毒害》

[485]Lu Ting-i.“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New China.”People’s China，8（16A-pril 1950）.

陸定一：《新中國的教育和文化》

[486]Lubman，Stanley.“Mao and mediaton：Politics and dispute resolutions in Communist China，”Cali fornia Law Review，55.5（November 1967）.1284—1359.

斯坦利·盧布曼：《毛與仲裁：共產黨中國的政治斗爭與爭論的解決》

[487]“Lung Yun tai-piao ti fa-yen”（Remarks by delegate Lung Yun）.Chung-huajen-min kung-ho-kuo ti-i-chieh ch’üan-kuo jen-min tai-piao to-hui ti-ssu-tz’u hui-i hui-k’an（Minutes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Fir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s Republic of China）.Peking：Jen-min，1957.《龍云代表的發言》，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匯刊》

[488]Ma Hung，and Sun Shang-ch’ing，eds.Chung-kuo ching-chi chieh-kou wen-t’i yen-chiu（Research on problems in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Peking：Jen-min，1981.

馬洪、孫尚清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

[489]Ma Nan-ts’un（Teng T’o）.Yen-shan yeh-hua （Evening talks at Yenshan）.Peking：北京出版社，1963and 1979.

馬南邨（鄧拓）：《燕山夜話》

[490]Ma Yin-ch’u.Ma Yin-ch’u ching-chi lun-wen hsuan-chi （Selected economic essays of Ma Yin-ch’u）.2vols.Peking：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馬寅初：《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

[491]Ma Yin-ch’u.“Lien-hsi Chung-kuo ship-chi lai t’an-t’an tsung-ho p’ing-heng li-lun ho an pi-li fa-chan kuei-lü”（A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of comprehensive balance and the law of planned proportionate development as it relates to Chinese reality）.Jeri-min jih-pao，28and 29December 1956.Reprintedin Ma Yin-ch’u ching-chi lun-wenhsuan-chi，2.121—44.

馬寅初：《聯系中國實際來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

[492]Ma Yin-ch’u.“Lien-hsi Chung-kuo shih-chi lai tsai t’an-t’an tsung-ho p’ingheng li-lun ho an pi-li fa-chan kuei-lü”（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of comprehensive balance and the law of planned，proportionate development as it relates to Chinese reality.）Jen-min jih-pao（11and 12May 1957）.Repnnted in Ma Yin-ch’u，Ma Yin-ch’u ching-chi lun-wen hsuan-chi，2.145—69.

馬寅初：《聯系中國實際來再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

[493]MacFarquhar，Roderick.The Hundred FlowersCampaign and the Chineseintellectuals.New York：Praeger，1960；Octagon，1973.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百花運動和中國的知識分子》[494]MacFarquhar，Roderick.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71.New York：Praeger，1972.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中美關系，1949—1971年》

[495]MacFarquhar，Roderick.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uolution，1：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1956—1957年的人民內部矛盾》

[496]MacFarquhar，Roderick.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Reuolution，2：The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1958—1960年的“大躍進”》

[497]MacFarquhar，Roderick.“Aspects of the CCP’s Eighth Congress（first session）.”University Seminar on Modern East Asia：China，Columbia University，February 19，1969.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幾個方面》

[498]Mackerras，Colin.Amateur theatre in China，1949—1966.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3.

科林·麥克拉斯：《中國的業余戲劇，1949—1966年》

[499]Mackerras，Colin.“Chinese oper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0—1972），”CQ，55（J uly-September 1973），478—510.

科林·麥克拉斯：《文化革命后的京劇（1970—1972年）》，見[133]

[500]Mackintosh，J.M.Strategy and tactics of Souiet foreign polic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J.M.麥金托什：《蘇聯對外政策的戰略與策略》

[501]Mainichi shimbun.Tokyo：1872—

《每日新聞》

[502]Mao Tse-tung.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Vols.1—3，1965；4，1961；5，1977.Cited as Mao，SW.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英文版）

[503]Mao Tse-tung.Hsuan-chi （Selected works）.Peking：Jen-min.vols.1-4，1960；vol.5，1977.Cited as MTHC.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504]Mao Tse-tung.Socialist upsurge in China’s countryside.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7.

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505]Mao Tse-tung.Four essays on philosophy.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6.

毛澤東：《四篇哲學論文》

[506]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Long live Mao Tse-tung Thought）.Np.：No pub.，1967.Cited as Wan-sui（1967）.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

[507]Mao Tse-tung ssu-hsiangwan-sui（Long live Mao Tse-tung Thought）.Np.：No pub.，1969，Cited as Wan-sui（1969）.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

[508]Mao Tse-tung.Miscellany of Mao Tse-tung Thought （1949—1968）.2vols.Arlington，Va.：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Nos.61269—1and 2，February 1974.

毛澤東：《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年）》

[509]Mao Tse-tung.“Opening address at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15September 1956）.Eighth National Conress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Vol.I：Documents，5—11.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6.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1956年9月 15日）

[510]Mao Tse-tung.“Sheng-shih-wei shu-chi hui-i tsung-chieh”（Summing up at a meeting of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committee secretaries）（January 1957）.Wan-sui（1969），81—90.

毛澤東：《省市委書記會議總結》（1957年1月），見[507]

[511]Mao Tse-tung.“Tsai Ch’eng-tu hui-i-shang-ti chiang-hua”（Talks at the Chengtu Conference）（March 1958）.Wan-sui（1969），159—180.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見[507]

[512]Mao Tse-tung.“Tsai pa-chieh shih-chung ch’uan-hui-shang-ti chiang-hua”（Address at the Tenth Plenum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24September 1962）.Wan-sui（1969），430—436.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4日），見[507]

[513]Mao Tse-tung.“Chien-li kung-ku ti tung-pei ken-chü-ti”（Build stable base areas in the Northeast）（28December 1945）.MTHC，4.1177—1180.

毛澤東：《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1945年12月28日），見[503]

[514]Mao Tse-tung.“Lun jen-min min-chu chuan-cheng：chi-nien Chung-kuo kung-ch’an-tang erh-shih-pa chou-nien”（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8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MTHC，4.1473—1486.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見[503]

[515]Mao Tse-tung.“Tsai Chung-kuo Kung-ch’an-tang ti-ch’i-chieh chung-yang wei-yuan-hui-ti-erh-tz’u ch’an-t’i hui-i-shang-ti pao-kao”（Report to theü second Plenum o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5March 1949）.MTHC，4.1425—1440.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見[503]

[516]Mao Tse-tung.“Tsai hsin cheng-chih hsieh-shang- hui-i ch’ou-pei-hui-shangti chiang-hua”（Address at the preliminary meeting of the new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15June 1949）.MTHC，4.1467—1471.

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1949年6月15日），見[503]

[517]Mao Tse-tung.“Tsai Chung-kung chung-yang chao-k’ai ti kuan-yü chih-shih fen-tzu wen-t’i hui-i-shang-ti chiang-hua”（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Question of Intellectuals convened by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20January 1956）.Wan-sui（1969），28—34.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20日），見[507]

[518]Mao Tse-tung.“Tsai Shang-hai shih ko-chieh jen-shih hui-i-shang-ti chianghua”（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f All Circles in Shanghai Municipality）（8July 1957）.Wan-sui（1969），109—121.

毛澤東：《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7月8日），見[507]

[519]Martin，R.Montgomery.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2vols.London：James Madden，1847.

R.蒙哥馬利·馬丁：《中國的政治、商業和社會》

[520]Mathews，Jay and Linda.One billion：A China chronicle.New York：Random House，1983.

杰伊和林達·馬修斯：《十億：一部中國的編年史》

[521]May，Ernest R.“Lessons”of the past：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ot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歐內斯特·R.梅：《過去的“教訓”：美國外交政策中對歷史的利用和誤用》

[522]McDougall，Bonnie S.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邦尼·S.麥克杜格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俗文學和表演藝術，1949—1979年》

[523]McLane，Charles B.Sou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

查爾斯·B.麥爾萊恩：《蘇聯的政策和中國共產黨人，1931—1946年》

[524]McMillen，Donald H.Chinese Communist power and policy in Xinjiang，1949—1979.Boulder，Colo.：Westview，1979.

唐納德·H.麥克米倫：《中共在新疆的政權與政策，1949—1977年》

[525]Meadows，Thomas Taylor.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uiew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national philosophy，ethics，legislation，and administra-tion.London：Smith，Elder，1856；Stanford，Calif.：Academic Reprints，1953.

密迪樂：《中國人及其叛亂：聯系他們的國家學說、倫理觀、法規和施政考察》

[526]Meisner，Maurice.Mao’s China：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7.

莫里斯·邁斯納：《毛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

[527]Metzger，Thomas A.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Le-gal，normatiu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托馬斯·A.梅茨格：《清代官僚政治的內部組織：法律、規范和通訊諸方面》

[528]Metzger，Thomas A.“Eisenstadt’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in China.”Li-shih hsueh-Pao.12（June 1984），344—418.

托馬斯·A.梅茨格：《艾森施塔特對中國的現代化和傳統之間的關系的分析》

[529]Michael，Franz.Mao and the perpetual reuolution.Woodbury，N.Y.：Barron’s，1977.

弗朗茲·邁克爾：《毛與不斷革命》

[530]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olicy Research Office Chung-kuo nung-yeh ching-

chi kai-yao （An outlin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in China）.Peking：農業出版社，1982.

農業部政策研究室：《中國農業經濟概要》

[531]Miyazaki Ichisada.China’s examination bell：The ciuil seruice examinationsof imperial China.Trans.Conrad Schirokauer.New York：Weatherhill，1976；paperback，New 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宮崎市定：《中華帝國的文官考試》（康拉德·希羅考爾英譯）

[532]Modern Chin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Quarterly.Beverly Hill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75—

《現代中國：歷史和社會科學國際季刊》

[533]Mosher，Steven.Broken earth：The rural Chines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3.

斯蒂文·莫舍：《破碎的大地：農村的中國人》

[534]Mote，Frederick，“Political structure，”in Gilbert Rozman，ed.，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47—106.

牟復禮：《政治結構》

[535]Mozingo，David.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1949—1967.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

戴維·莫辛戈：《中國對印度尼西亞的政策，1949—1967年》

[536]Murphey，Rhoads.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羅茲·墨菲：《外來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國的經驗》

[537]Nagai Yonosuke and Iriye Akira，eds.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起源》

[538]Nakajima Mineo.Gendai Chūgoku ron：ideorogi to seiji no naiteki kōsatsu（On contemporary China：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its ideology and politics）.Tokyo：Aoki Shoten，1964，expanded edition，1971.

中嵨嶺雄：《論當代中國：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內部動力》

[539]Nakajima Mineo.Chū-So tairitsu to gendai：sengo Aj ia no saik ōsatsu （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and the present age：Reappraisal of postwar A-sia）.Tokyo：Chūō kōron sha，1978.

中嵨嶺雄：《中蘇的對抗和今天的時代：戰后亞洲的再評價》

[540]Nakajima Mineo.Chūgoku：rekishi，shakai，kokusaikankei（China：History，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kyo：Chūō kōron sha，1982.

中嵨嶺雄：《中國：歷史、社會和國際關系》

[541]Nakajima，Mineo.“The Kao Kang affair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Reuiew.Tokyo：Japanes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1977.

中嵨嶺雄：《高崗事件和中蘇關系》

[542]Nakajima，Mineo.“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Affairs，1（January 1979），19—47.

中嵨嶺雄：《朝鮮戰爭國際背景中的中蘇對抗的根源》

[543]Nan-fang jih-pao（Southern daily）Canton：23October 1949—

《南方日報》

[544]Nathan，Andrew J.Chinese democracy.New York：Knopf，1985.

安德魯·J.內森：《中國的民主》

[545]Nathan，Andrew.“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CQ，53（January-March 1973），1—33.

安德魯·內森：《中國共產黨政治的一個宗派主義典型》，見[133]

[546]Nathan，Andrew，and Winckler，Edwin.“Policy oscillations in the PRC：Critique and reply.”CQ，68（December 1976），720—750.

安德魯·內森、埃德溫·溫克勒：《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搖擺：批評與答復》，見[133]

[547]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 Papers.Washington，D.C.：U.S.National Archives.

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集》

[548]Nee，Victor，and Mozingo，David，eds.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維克多·倪、戴維·莫津戈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

[549]Nelsen，Harvey W.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An organizational study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2nd ed.Boulder，Colo.：Westview，1981.

哈維·W.內爾森：《中國的軍事制度：人民解放軍體制的研究》

[550]New China News Agency.Daily News Release.Hong Kong：1948—Cited NCNA.

新華社：《每日新聞發布》

[551]News from Chinese prouincial radio stations.Hong Kong：United Kingdom Regional Information Office，various dates，1960s.《中國省級廣播電臺新聞》

[552]Nieh，Hualing.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2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聶華苓：《百花文學》

[553]Nivison，David S.“Communist ethics and Chinese tradition，”JAS 16.1（Novemer 1956），51—74.

戴維·S.尼維森：《共產黨的倫理學與中國傳統》

[554]Nunn，G.Raymond，comp.Chinese periodicals，international holdings，1949—1960.3vols.Ann Arbor，Mich：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61.

G.雷蒙德·納恩編：《國際收藏的中國定期刊物，1949—1960年》

[555]Oksenberg，Michel C.“Policy formulation in communist China：The case of the mass irrigation campaign，1957—1958.”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69.米歇爾·C.奧克森伯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的明確表述：群眾灌溉運動問題，1957—1958年》

[556]Oksenberg，Michel C.，with Bateman，Nancy，and Anderson，James B.，comps.A bibliography of secondary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East Asian Institute，1969.米歇爾·奧克森伯格、南希·貝特曼、詹姆斯·B.安德森編：《當代中國政治的第二手英文文獻書目》

[557]Oksenberg，Michel.“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bureaucracy，”CQ，57（January-March 1974），1—39.

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國官僚機構內部的聯絡方法》，見[133]

[558]Oldham，Geoffrey.“Science in China：A tourist’s impression，”Science，147.3659（February 1965），706—714.

杰弗里·奧爾德姆：《中國的科學：一個旅游者的印象》

[559]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evelopment Cen-ter，National accounts of less-deueloped countries.1950—1966.Paris：OECD，1968.

發展中心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較不發達國家的國民收入：1950—1966年》

[560]Orleans，Leo A.Professional manpower and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Washington，D.C.：Library of Congress，1960.

利奧·A.奧林斯：《共產黨中國的專業人才與教育》

[561]Pannikar，K.M.In two Chinas.London：Allen &.Unwin，1955.

K.M潘尼卡：《在兩個中國》

[562]Parish，William，ed.Problems in China’s rural deuelopment：Euoluing is-sues.Forthcoming.

威廉·帕里什編：《中國農村發展的難題：發展中的爭論》

[563]Parish，William L.，and Whyte，Martin King.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cage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威廉·L.帕里什、馬丁·金·懷特：《當代中國的農村和家庭》

[564]Pauley，Edwin W.Report on Japanese assets in Manchuria to the President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6.

埃德溫·W.波利：《關于日本在東北的資產對美國總統的報告》

[565]Peck，Graham.Two kinds of tim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0.Second edition，rev.and abridged，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John K.Fairbank.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1967.

格雷厄姆·佩克：《兩種時代》

[566]Pei-ching jih-pao （Peking daily）.Peking：1October 1952（suspended 3September 1966，resumed 20January 1967）—

《北京日報》

[567]Pei-ching t’u-shu-kuan kuan-ts’ang pao-chih mu-lu （Catalogue of newspaper holdings at the Peking Library）.Peking：書目文獻出版社（Catalogue and Document Press），1982.

《北京圖書館館藏報紙目錄》

[568]Peking Reuiew.Peking：1958—.（From January 1979，Beijing Reuiew.）

《北京周報》

[569][P’eng Te-huai].The case of P’eng Te-huai，1959—1968.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68.

《彭德懷事件，1959—1968年》

[570]P’eng Te-huai.P’eng Te-huai tzu-shu （P’eng Te-huai’s own account）.Peking：Jen-min，1981.Translated as Memoirs of a Chinese marshal.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4.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英譯本名《一個中國元帥的回憶錄》）

[571]Pennar，Jaan，et al.Modernization and diuersity in Souiet education.New York：Praeger，1971.

簡·彭納等：《蘇聯教育的現代化和多樣性》

[572]People’s China.Semi-monthly.Peking：1950—1957.Cited as PC.

《人民中國》

[573]People’s Publishing House.Jen-min ch’u-pan-she.

人民出版社

[574]Pepper，Suzanne.Ciu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

[575]Pepper，Suzanne.China’s uniuersities：Post-Mao enrollment policies andtheir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secondary education：a research report.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

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大學：毛澤東以后的入學政策及其對中等教育結構的影響——一份研究報告》

[576]Pepper.Suzanne.“China’s universities：new experiments i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a research report.”Modern China ，8：2（April 1982），147—204.

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大學：社會主義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經驗——一份研究報告》

[577]Perkins，Dwight.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德懷特·珀金斯：《共產黨中國的市場管理與計劃》

[578]Perkins，Dwight H.Agricultural deu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1969.

德懷德·H.珀金斯：《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

[579]Perkins，Dwight.“Growth and changing structure of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y，”in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ue，115—165.

德懷德·珀金斯：《20世紀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結構變化》

[580]Perkins，Dwight H.，ed.China’s modern 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ue.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德懷德·H.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的現代經濟》

[581]Perry，Elizabeth J.“Rural violence in socialist China.”（Q，103（September 1985），414—440.

伊麗莎白·J.佩里：《社會主義中國的農村暴力行為》，見[133]

[582]Po I-po.“Kuan-yü 1958nien-tu kuo-min ching-chi chi-hua ts’ao-an ti paokao”（Report on the draft of the 1958national economic plan），in Jen-minshou-ts’e，1959（People’s handbook，1959）.Peking：Ta-kung pao，1959.

薄一波：《關于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

[583]Po I-po.“Ch’ung-ching ho huai-nien-hsien-kei tang tan-sheng ti liu-shih chou-nien”（Respect and remembrance-marking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Hung ch’i（Red flag），13（1981），60—67.

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的六十周年》[584]Polachek，James.The inner Opium War.Forthcoming.

詹姆斯·波拉切克：《國內的鴉片戰爭》

[585]Pollack，Jonathan.“Perception and proces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Quemoy decis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76.

喬納森·波拉克：《中國外交政策中的觀念和方法：金門決策》

[586]Population and Deuelopment Reuiew.Quarterly.New York：Population Council，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1975—

《人口和發展評論》

[587]Powell，Ralph L.Politico-military relationships in Communist China.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1963.

拉爾夫·L.鮑威爾：《共產黨中國的軍政關系》

[588]Price，Ronald F.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0.2nd ed.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Education in modernChina.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

羅納德·F.普賴斯：《共產黨中國的教育》（第2版改名《現代中國的教育》）

[589]Price，Ronald F.Marx and educ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London：Croom Helm，1977.

羅納德·F.普賴斯：《馬克思與俄國和中國的教育》

[590]Pusey，James R.Wu Han：Attacking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past.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9.

詹姆斯·R.普西：《吳晗：借古非今》

[591]Pusey，James R.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3.

詹姆斯·R.普西：《中國和達爾文》

[592]Pye.Lucian.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crisis in political deuelopment.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68.

盧西恩·派伊：《中國人的政治精神：政治發展中的危機的心理文化研究》

[593]Pye，Lucian W.The dynamics of factions and consensus in Chinese politics：A model and some propositions.Santa Monica，Calif.：Rand，July 1980.

盧西恩·W.派伊：《黨派的動力和中國政治中的一致性：一種模式和幾種主張》

[594]Pye，Lucian.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loitics.Cambridge，Mass.：Oelgeschlager，Gunn & Hain，1981.

盧西恩·派伊：《中國政治的動力》

[595]Pye，Lucian.“China in context，”Foreign Affairs，45.2（January 1967）229—245.

盧西恩·派伊：《一定條件下的中國》

[596]Pye，Lucian W.，with Pye，Mary W.，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盧西恩·W.派伊、瑪麗·W.派伊：《亞洲的力量和政治：權力在文化方面的表現》

[597]Ragvald，Lars.Yao Wen-yuan as a literary critic and theorist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Zhdanouism.Stockholm：University of Stockholm，1978.

拉斯·拉格瓦爾德：《作為文學評論家和理論家的姚文元：中國日丹諾夫主義的出現》

[598]Ragvald，Lars.“The emergence of‘worker-writers’in Shanghai，”in Christopher Howe，ed.，Shanghai：Reuolution and deu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301—325.

拉斯·拉格瓦爾德：《上海“工人作家”的出現》

[599]Rankin，Mary B.，Fairbank，John K.，and Feuerwerker，Albert.“Introduction：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s history，”in CHOC 13.1—73.

瑪麗·B.蘭金、費正清、費維愷：《導言：對現代中國史的看法》，載《劍橋中國史》第13卷

[600]Rawski，Evelyn Sakakida.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8.

伊夫林·薩卡基達·羅斯基：《中國清代的教育和民間識字狀況》

[601]Rawski，Thomas G.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Producer goods andeconomic deu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centur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

托馬斯·G.羅斯基：《中國向工業化的過渡：20世紀的生產資料和經濟發展》

[602]Rawski，Thomas G.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An introduction.Discus-sion Paper No.1.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Joint Centre on Modern East Asia，1978.

托馬斯·G.羅斯基：《中華民國經濟介紹》

[603]Red Guard Publications.20vols.Reprinted by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Washington，D.C.，1975.

《紅衛兵出版物》

[604]Red Guard Publications：Supplement.8vols.Reprinted by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Washington，D.C.，1980.

《紅衛兵出版物：補遺》

[605]Remer，C.F.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1926.

C.F.雷默：《中國的對外貿易》

[606]Remer，C.F.Foreign inuestment in China.Honolulu：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9.

C.F.雷默：《中國的外國投資》

[607]“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7June 1981）.Beijing Reuiew，27（1981）.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608]“Resolution on the Kao Kang-Jao Shu-shih anti-Party alliance”（March 1955）.CB，324（5April 1955），4—6.

《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5年3月），見[735]

[609]Rhoads，Edward J.M.China’s republican reu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愛德華·J.M.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廣東情況，1895—1913年》

[610]Rhode，Grant F.，and Whitlock，Reid E.Treat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of China 1949—1978：An annotated compilatio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

格蘭特·F.羅德、里德·E.惠特洛克：《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匯編，1949—1978年》

[611]Rice，Edward E.Mao’s wa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愛德華·E.賴斯：《毛的道路》

[612]Richardson，S.D.Forestry in Communist China.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5.

S.D.理查森：《共產黨中國的林業》

[613]Richman，Barry.“Capitalists and managers in Communist China，”HaruardBusiness Reuiew，45（January-February 1967），57—78.

巴里·里奇曼：《共產黨中國的資本家和經理》

[614]Rickett，Allyn and Adele.Prisoners of liberation.New York：Cameron Associates，1957.

阿林和阿黛爾·里克特：《釋放的俘虜》

[615]Ridgway，Matthew.The Korean War.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7.

馬修·李奇微：《朝鮮戰爭》

[616]Ridley，Charles，Godwin，Paul，and Doolin，Dennis.The making of a model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Stanford，Calif.：The Hoover Institution，1971.

查爾斯·里德利、保羅·戈德曼、丹尼斯·杜林：《共產黨中國培養模范公民》

[617]Robinson，Thomas W.，ed.The Cultural Reuolution in China.A Rand Corporation Research Study.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托馬斯·W.魯賓遜編：《中國的文化革命》

[618]Roll，Charles，R.“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income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4.

查爾斯·R.羅爾：《中國農村收入的分配》

[619]Rosen，Stanley，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w-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1.

斯坦利·羅森：《下鄉青年在中國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廣州實例》

[620]Rosen，Stanley.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uolution inGuangzhou.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1.

斯坦利·羅森：《紅衛兵的派性與廣州的文化革命》

[621]Rostow，W.W.，et al.The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 and Wiley，1954.

W.W.羅斯托等：《共產黨中國的展望》

[622]Rostow，W.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2nd ed.New York：Norton，1962.

W.W.羅斯托：《經濟發展諸階段》

[623]Rozman，Gibert，ed.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New York：The Free Press；London：Collier-Macmillan，1981.

吉爾伯特·羅茲曼編：《中國的現代化》

[624]Sayeed，Khalid B.“Pakistan and China，”in A.M.Halpern，ed.，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ch.8，229—361.

哈利德·B.賽義德：《巴基斯坦與中國》

[625]Scalapino，Robert A.，ed.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

羅伯特·A.斯卡爾皮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精英人物》

[626]Scalapino，R.A.，and Yu，George.Modern China and its reuolutionaryprocess：Re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 1850—192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R.A.斯卡爾皮諾、于之喬：《現代中國及其革命進程：對傳統社會秩序的反復挑戰，1850—1920年》

[627]Schein，Edgar H.“The Chinese indoctrination program for prisoners of war.”Psychiatry，19.2（May 1956），149—172.

埃德加·H.斯凱恩：《中國人對戰俘的灌輸計劃》

[628]Schein，Edgar，with Schneier，Inge，and Barker，Curtis.Coerciue Persua-sion.New York：Norton，1961.

埃德加·斯凱恩、英奇·施奈爾、柯蒂斯·巴克：《強制的勸說》

[629]Schiffrin，Harold Z.Sun Yat-sen：Reluctant reuolutionary.Boston：Little，Brown，1980.

哈羅德·Z.希夫林：《孫逸仙：頑強的革命家》

[630]Schram，Stuart，Mao Tse-tung.Harmondsworth，Eng.：Penguin Books，1967.

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

[631]Schram，Stuart R.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e.New York：Praeger，1963；rev.and enlarged ed.，New York：Praeger，1969.

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

[632]Schram，Stuart R.，ed.Authority，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中國的權力、參與和文化變化》

[633]Schram，Stuart R“Introductio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Stuart Schram，ed.，Authority.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change in China，1—108.

斯圖爾特·R.施拉姆：《導言：從歷史角度看文化革命》

[634]Schram，Stuart R.，ed Mao Tse-tung unrehearsed：Talks and letters，1956—

1971.Middlesex，Eng.：Penguin Books，1974.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as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s and letters，1956—1971.New York：Pantheon，1975.

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美國版名《毛主席向人民講話：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

[635]Schram，Stuart R，ed.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London：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New York：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nd St.Martin’s Press.1985.

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中國國家權力的范圍》

[636]Schram，Stuart.“‘Economics in command？’Ideology and policy since the Third Plenum，1978—1984，”CQ，99（September 1984），417—461.

斯圖爾特·R.施拉姆：《“經濟掛帥”？三中全會以來的意識形態與政策，1978—1984年》，見[133]

[637]Schurmann，Franz H.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2nd enlarged ed.，1968.

弗朗茲·H.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

[638]Schurmann.H.F.“Organizational contrasts between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oin，”in Kurt London，ed.，Unity and Contradiction，65—99.

H.F.舒爾曼：《共產黨中國和蘇聯之間的體制差異》

[639]Schwartz，Benjanin.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1964.

許華茨：《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

[640]Schwartz，Benjamin I.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West.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許華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

[641]Schwartz，Benjamin I.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許華茨：《共產主義與中國：不斷變動的意識形態》

[642]Schwartz，Benjamin.“On the‘originality’of Mao Tse-tung，”Foreign Af-fairs，34.1（October 1955），67—76.

許華茨：《論毛澤東的“創造性”》

[643]Schwatz，Benjamin.“The legend of the‘Legend of Maoism，’”CQ，2（April 1960），35—42.

許華茨：《“毛主義傳說”的傳說》，見[133]

[644]Schwartz，Benjamin I.“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276—288.

許華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念》

[645]Seagrave，Sterling.The Soong dynasty.New York：Harper & Row，1985.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

[646]Selden，Mark.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馬克·塞爾登：《中國革命的延安道路》

[647]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Vol.1（1975—1976）；Vol.2（1977—1978）；Vol.3（1978—1979）；Vol.4（1979—198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1卷（1975—1976年），第2卷（1977—1978年），第3卷（1978—1979年），第4卷（1979—1980年）

[648]Sen，A.K.Pou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u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A.K.沈：《貧窮與饑荒：一篇關于權利與權利喪失的論文》

[649]Seybolt，Peter J.，ed.Revolutionary education in China：Documents andcommentary.White Plains，N.Y.：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1973.

彼得·J.西博爾德編：《中國的革命教育：文獻和注釋》

[650]Seybolt，Peter J.“The Yenan revolution in mass education.”CQ，48（October—December 1971），641—669.

彼得·J.西博爾德：《群眾教育中的延安革命》，見[133]

[651]Seymour，James.The fifth modernization：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1978—1979，Stanfordville，N.Y.：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1980.

詹姆斯·西摩：《第五個現代化：中國的人權運動，1978—1979年》

[652]Shang-haiwen-hsueh （Shanhai literature）.Monthly.（Superseded Wen-iyueh-k’an）.Shanghai：October 1959-Decenber 1963）.

《上海文學》（后改《文藝月刊》）

[653]Shao Ch’an-lin“.Tou-cheng pi-hsu keng shen-ju”（The struggle must pene-ü trate more deeply）.Wen-i pao，25（1957）.

邵荃麟：《斗爭必須更深人》

[654]Shao Yen-hsiang.”Ch’ü-ping ho k’u-k’ou”（To get rid of the illness and the bitterness of medicine）.Wen-i hsueh-hsi，1（1957），19—20.

邵燕祥：《去病和苦口》

[655]Sheridan，Mary.“The emulation of heroes，”CQ.33（January-March 1968），47—72.

瑪麗·謝里登：《對英雄的仿效》，見[133]

[656]Shih，Bernadette P.N.，and Snyder，Richard L.Communist Chinese serials.Cambridge，Mass.：The MIT Libraties，1963.

伯納黛特·P.N.史、理查德·L.斯尼德：《共產黨中國的期刊》

[657]Shih Ching-t’ang et al.，eds.Chung-kuo nung-yeh ho-tso-hua yun-tung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China’s cooperatization movement）.Peking：三聯書店，1957.

史敬棠等編：《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

[658]Shillinglaw，Geoffrey.“Land reform and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Southern China 1947—1950，”in David Lehmann，ed.，Agrarian reform and agrari-an reformism，121—155.

杰弗里·希林勞：《中國南部的土地改革與農民動員：1947—1950年》

[659]Shinobu Seizaburō.Chōsen sensō no boppatsu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Tokyo：Fukumura shuppan，1969.

信夫清三郎：《朝鮮戰爭的爆發》

[660]Shirk，Susan L.Competitiue comrades：Career incentiu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蘇珊·L.舍克：《競爭的同志：中國的職業性刺激與學生的策略》

[661]Shirk，Susan.“The 1963temporary work regulations for full-time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commentary and translation.”CQ.55，（July-September 1973），511—546.

蘇珊·舍克：《1963年全日制中小學暫行工作條例：注釋及翻譯》，見[133][662]Shue，Vivienn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uelopmenttoward 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維維恩·舒：《過渡中的農民的中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1949—1956年》

[663]Simmons，Robert R The strained alliance：Peking，P’yǒngyang，Moscow，and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Ciuil War.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London：Collier-Macmillan，1975.

羅伯特·R.西蒙斯：《緊張的聯盟：北京、平壤、莫斯科和朝鮮內戰的政策》

[664]Sirr，Henry Charles，M.A.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ir religion.charac-ter，customs and manufactures；the euils arising from the opium trade；witha glance at our religious，moral，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the country.2vols.London：W.S.Orr，1849.

亨利·查爾斯·西爾：《中國和中國人：他們的宗教、性格、風俗和產品；源于鴉片貿易的災禍；略及我們與這個國家的宗教、思想、政治和商業的相互關系》

[665]Skinner，G.William.“Asian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Asian Studies Ne-wsletter，29.4（April 1984）.

施堅雅：《亞洲研究和學科》

[666]Skinner，G.William.“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in G.Williamskinner，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275—351.

施堅雅：《城市和地方制度的等級》

[667]Skinner，G.William.“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AS，Part I，24.1（November 1964），3—43；Part Ⅱ，24.2（February 1965），195—228；Part 111，24.3（May 1965），363—399.

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

[668]Skinner，G.William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669]Skinner，G.William，et al.，eds.Modern Chinese society：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3vol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施堅雅等編：《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

[670]Smith，Richard J.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The Ch’ing dynasty，1644—1912.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3.

理查德·J.史密斯：《清代的文化遺產》

[671]Snow，Edgar.Red star ouer China.New York：Random House，1938；1st rev.and enlarged ed.Grove Press，1968；Bantam，1978.

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

[672]Snow，Edgar.The other side of the riuer：Red China today.New York：Random House，1961.

埃德加·斯諾：《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

[673]Solinger，Dorothy J.Regional gouernment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Southwest China，1949—1954；A case stud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多蘿西·J.索林格：《中國西南的地方政府和政治一體化，1949—1954年：個案研究》

[674]Solomon，Richard.Mao’s reu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理查德·所羅門：《毛澤東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

[675]Soong，James，Red Flag，Hung ch’i，1958—1968.Aresearch guied.Washington，D.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1969.

詹姆斯·宋：《〈紅旗>，1958—1968年：研究指南》

[676]Sorich，Richard，ed.Contemporary China：A bibliography of reports onChina published by the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uice.New York：Readex，1961.

理查德·索里奇編：《當代中國：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處出版的關于中國的報導的書目》

[677]Spence，Jonathan D.The Gate of Heau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reuolution，1895—1980.New York：Viking，1981.

喬納森·D.斯賓士：《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

[678]Spence，Jonathan D.，and Wills，John E.，Jr.，eds.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region，and continuity in seuenteenth-century Chin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喬納森·D.斯賓士、小約翰·E.威爾斯編：《從明到清：17世紀中國的征服、區域和延續性》

[679]Starr，John Bryan.Continuing the reuolutio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Mao.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約翰·布賴恩·斯塔爾：《繼續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680]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Ch’u-pu yen-chiu ti kuan-yu ti-erh-ko wu-nien chi-hua ti jo-kan wen-t’i”（Certain issues in preliminary studies on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計劃經濟》（Economic planning），4（1957），10—12.

國家計劃委員會：《初步研究的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若干問題》

[681]State Statistical Bureau.Ten great year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0.

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

[682]“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Communique.”People’s China，20（16October 1955），supplement，8.

《國家統計局公報》

[683]State Statistical Bureau.“Chung-kuo ching-chi t’ung-chi tzu-liao hsuan-pien”（A compil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statistics），in Hsueh Mu-ch’iao，ed.，Chung-kuo ching-chi men-chien 1982.（Chinese economic yearbook 1982），8.1—8.137.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統計資料選編》

[684]Stavis，Benedict.People’s communes and rural deuelopment in China.Ithaca，N.Y.：Rural Development Committee，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Cornell University.Rev.ed.，1977.

本尼迪克特·斯塔維斯：《中國的人民公社與農村發展》

[685]Stavis，Benedict.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

本尼迪克特·斯塔維斯：《中國的農業機械化政策》

[686]Steiner，H.Arthur.“Current‘mass line’tactics in Communist Chin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uiew，45.2（June 1951），422—436.

H.阿瑟·斯坦納：《共產黨中國當前的“群眾路線”策略》

[687]Stevenson，William.The yellowwind.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9.

威廉·史蒂文森：《黃風》

[688]Strong，Anna Louise.“Chinese strategy in the Taiwan Strait.”NewTimes.46（November 1958），8—1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國在臺灣海峽的戰略》

[689]Suigo，Carlo.In the land of Mao Tse-tung.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53.

卡洛·休戈：《在毛澤東的土地上》

[690]Sun，E-tu Zen.“The rise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in CHOC.13.361—420.

孫任以都：《中國學術團體的興起》，見[73]

[691]Sun Ye-fang.“Chia-ch’iang t’ung-chi kung-tso，kai-ko t’ung-chi t’i-chih”（Strengthen statistical work，reform the statistical system）.《經濟管理》（E-conomic management），1981.1，3—5.

孫冶方：《加強統計工作，改革統計體制》

[692]Suttmeier，Richard P.Research and reuolution：Science policy and societalchange in China.Lexington，Mass.，Toronto，London：Lexington Books 1974.

理查德·P.薩特梅爾：《研究與革命：中國的科學政策與社會變化》

[693]T’an Cheng.“Speech by Comrade T’an Cheng”（18September 1956）.Eighth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Vol.2：Speeches.259—278.

譚政：《譚政同志發言》（1956年9月18日）

[694]Tang，Peter S.H.Communist China today.2vols.Washington，D.C.：Research Institute on the Sino-Soviet Bloc，1961.

彼得·S.H.湯：《今日共產黨中國》

[695]Tang-shih yen-chiu（Research on Party history）.Peking：1980—.Cited as TSYC.

《黨史研究》

[696]T’ang Ching-kao，ed.Ku Yen-um wen （Selected essays by Ku Yen-wu）.Shanghai：Commercial Press（Shang-wu yin-shu-kuan），1928.

唐敬呆編：《顧炎武文》

[697]Tanigawa Michio，ed.Chūgoku shitai fu kaikyū to chiiki shakai to no kankeini tsuite no sōgōteki kenkyū（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i class and local society in China）.Kyoto：Kyoto University Press，1983.

谷川道雄編：《中國士大夫階級與地方社會之間關系的綜合研究》

[698]Taylor，Charles.Reporter in Red China.New York：Random House，1966.

查爾斯·泰勒：《在紅色中國的記者》

[699]Taylor，Robert.Education and uniuersity enrollment policies in China，1949—1971.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3.

羅伯特·泰勒：《中國的教育與大學招生的方針，1949—1978年》

[700]Taylor，Robert.China’s intellectual dilemma ：Politics and uniuersity en-rollment，1949—1978.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1.

羅伯特·泰勒：《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政治與大學招生，1949—1978年》。

[701]Teiwes，Frederick C.Elite discipline in China：Coerciue and persuasiue ap-proaches to rectification 1950—1953.Canberra：Contemporary China Papers，1978.

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中國精英人物的訓練：整風的強迫與說服的方法，1950—1953年》

[702]Teiwes，Frederick C.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Rectification and the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9.

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中國的政治和清洗：1950—1965年的整風和黨的準則的衰敗》

[703]Teiwes，Frederick C.‘Provincial politics in China：Themes and variations，’in John M.H.Lindbeck，ed.，China：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116—189.

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中國各省的政策：主題與變奏》

[704]Teng Hsiao-p’ing wen-hsuan（Selected works of Teng Hsiao-p’ing ）.Peking：Jen-min，1983.

《鄧小平文選》

[705]Teng Hsiao-p’ing.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4.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英文版）

[706]Teng Hsiao-p’ing.“Report on the re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eptember 16，1956）.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Communist Party of China.Vol.1：Documents，169—228.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6.

鄧小平：《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1956年9月16日）

[707]Teng Li-ch’iin.Hsiang Ch’en Yun t’ung-chih hsueh-hsi tso ching-chi kung-tso（Study how to do economic work from Comrade Ch’en Yun）.Peking：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鄧力群：《向陳云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

[708]Teng，Ssu-yü，and Fairbank，John K.，ed al.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documentary suruey，1839—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Atheneum paperback，1963，1965.

鄧嗣禹、費正清等：《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23年文獻概覽》

[709]Teng Tsu-hui.“Tsai ch’an-kuo ti-san-tz’u nung-ts’un kung-tso hui-i-shangü ti k’ai-mu tz’u”（Inaugural speech at the third national rural work conference）.Tang-shih yen-chiu（Research on party history），1981.1，2—9.

鄧子恢：《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開幕詞》

[710]Theory and Society；renewal and critique in social theory.Bi-monthly.Amsterdam：Elsevier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1974—《理論與社會：社會理論的更新與評論》

[711]Thomas，S.B.Gou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3.

S.B.托馬斯：《共產黨中國的政府與管理》

[712]Thornton，Richard C.China：The struggle for power，1917—1972.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3.

理查德·C.桑頓：《中國：為權力而斗爭，1917—1972年》

[713]Thurston，Anne.“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The invisible wounds，”Pacific Affairs，Part I，57.4（Winter 1984—1985），599—620，and Part Ⅱ，58.1（Spring 1985），5—27.

安妮·瑟斯頓：《中國文化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見的創傷》

[714]Thurston，Anne，and Parker，Jason，eds.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80.

安妮·瑟斯頓、賈森·派克編：《中國的人文主義的和社會科學的研究》

[715]Ting Ling.Tao ch’ün-chung-chung ch’ü to-hu（Go into the dwellings of the masses）.Peking：作家出版社，1954.

丁玲：《到群眾中去落戶》

[716]Ting Ling.“San-pa-chieh yu-kan”（Thoughts on March 8）.CFJP，9March 1942.

丁玲：《三八節有感》

[717]Ting，William“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factionalism，”AsianSuruey，19：8（August 1979），789—800.

威廉·丁：《中國軍隊宗派主義的縱向研究》

[718]Tōa Kenkyūjo，eds.Iminzoku no Shina t ōchi gaisetsu （History of the rule of alien peoples over China）.Tokyo：Tōa Kenkyūjo，1943.

東亞研究所編：《異族統治中國史》

[719]Tong，James，ed.“Underground journals in China.”Chinese Law and Gou-ernment ，Part I，13.2—3（Fall-Winter 1980—1981），and Part ll，14.3（Fall 1981）.

詹姆斯·佟（音）編：《中國的地下刊物》

[720]Townsend，James R.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詹姆斯·R.湯森德：《共產黨中國的政治關系》

[721]Treadgold，Donald，ed.Sou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Similarities anddifferenc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

唐納德·特雷德戈爾德編：《蘇聯的共產主義與中國的共產主義：相似點與不同點》

[722]Tseng Chao-lun.“Higher education in new China，”People’s China，12（16June 1953），6—10.

曾昭掄：《新中國的高等教育》

[723]Tsou，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

[724]Tsou，Tang.The Cultural Reu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A historicalperspectiu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鄒讜：《從歷史的角度看文化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

[725]Tsou，Tang.“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CQ，65（March 1967），98—114.

鄒讜：《中國共產黨政治中非正式團體的研究的序言》，見[133]

[726]Ts’ui Chieh.“Chi-pen chien-she ti t’iao-cheng”（Readjustment of capital construction），in Liu Sui-nien，ed.，Liu-shih nien-tai kuo-min ching-chi t’iao-cheng ti hui-ku，70—93.

崔捷：《基本建設的調整》

[727]Tsui-kao jen-min fa-yuan yen-chiu-shih（Research Office，Supreme People’s Court），ed.Chung-hua jen-min kung-ho-kuo tsui-kao jen-min fa-yuan，t’e-pieh fa-t’ing shen-p’an Lin Piao，Chinag Ch’ing fan-ko-ming chi-t’uananchu-fan chi-shih （Record of the trials of the principal criminals of the Lin Piao and Chiang Ch’ing cliques before the Special Tribunal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eking：Fa-lü，1982.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記事》

[728]Tucker，Nancy B.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recognition controuersy，1949—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南希·B.塔克：《屈辱的模式：中美關系和承認的爭論，1949—1950年》

[729]Tung，Chiping，and Evans，Humphrey.The thought reuolution.New York：Coward McCann，1966.

董繼炳（音）、漢弗萊·伊萬斯：《思想革命》

[730]Ulam，Adam B.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The history of Souiet foreignpolicy，1917—1967.New York：Praeger，1968.

亞當·B.尤拉姆：《擴張與共存：蘇聯外交政策史，1917—1967年》

[731]Unger，Jonathan.Education under Mao：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schools，1960—198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喬納森·昂格爾：《毛統治下的教育：廣州學校中的階級與競爭，1960—1980年》

[732]Union Research Institute（URI）.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Cultural Reuolution，1966—1967.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68.

聯合研究所：《中共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1966—1967年》

[733]Union Research Institute（URI）.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71.

聯合研究所：《中共中央文件》

[734]Union Research Seruice.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55—

《聯合研究服務》

[735]U.S.Consulate General Current Background.Hong Kong：U.S.Consulate General，1950—1977.Cited as CB.

美國總領事館：《當代背景材料》（香港，1950—1977年）

[736]U.S.Consulate General.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Hong Kong：U.S.Consulate General，1955—1960.Cited as ECMM.Title changed to Selection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1960—1977.

美國總領事館：《中國大陸雜志選粹》（香港，1955—1960年），1960—1977年更名《中國大陸雜志選錄》

[737]U.S.Consulate General.Selection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Hong Kong：U.S.Consulate General，1960—1977.Cited as SCMM.

美國總領事館：《中國大陸雜志選錄》（香港，1960—1977年）

[738]U.S.Consulate General Suru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Hong Kong：U.S.Consulate General，1950—1977.Cited as SCMP.

美國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香港，1950—1977年）

[739]U.S.Consulate General Suru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Supplements.Hong Kong：U.S.Consulate General，1950—1977.

美國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香港，1950—1977年）

[740]U.S.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D.C.，1949.Reissued with intro.and index by Lyman Van Slyke as China White Paper，2vol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美國國務院：《美國和中國的關系，尤其是關于1944—1949年時期》（改版更名《中國白皮書》）

[741]U.S.Department of State.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1950—1955.2vol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New York：Arno Press，1971.

美國國務院：《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要文件，1950—1955年》

[742]U.S.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the organs of the United Nation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vol.2.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

美國國務院：《美國對于因中國加入聯合國各機構引起的問題的態度》

[743]U.S.Department of State.“Implicatons of the Treaty of Alliance and related agreement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Address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5，1950[excerpt].”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1950—1955.New York：Arno Press，1971.美國國務院：《蘇聯和共產黨中國的同盟條約及有關協定的實質：國務卿的演說，1950年3月15日[摘要]》

[744]U.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United State and Com-munist China in 1949and 1950：The question of rapprochement and recog-nition.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1949和1950年的美國和共產黨中國：恢復邦交和承認的問題》

[745]Usami Shigeru.“Suchuōto taishi no Pekin hōmon keikaku：ushinawareta rekishi no tenkanten”（Ambassador Stuart’s plan to visit Peking：A lost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Kokusai mondai （International affairs），198（September 1976），45—61.

宇佐美滋：《司徒大使訪問北京的計劃：一個失去了機會的歷史轉折點》

[746]Van Ness，Peter.Reu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Peking’s supportfor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彼得·范內斯：《革命與中國的對外政策：北京支持民族解放戰爭》

[747]Van Slyke，Lyman.“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CHOC，13.609—722.

萊曼·范斯萊克：《中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運動，1937—1945年》，見[73]

[748]Van Slyke，Lyman.See U.S.Department of State.

[749]Vogel，Ezra F.Canton under communism.：Programs and policies in a pro-uincial capital，1949—19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伊日拉·F.沃格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州：一個省城的規劃與政策，1949—1968年》

[750]Wagner，Rudolf.“The cog and the scout：Functional concepts of literature in socialist political culture，”in wolfgang Kubin and Rudolf Wagner，eds.，Es-say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334—400.

魯道夫·瓦格納：《詐騙和偵察：社會主義政治文化中文學的職能觀念》

[751]Wakeman，Frederic，Jr.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

魏斐德：《中華帝國的衰落》

[752]Wakeman，Frederic，Jr.，and Grant，Carolyn，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魏斐德、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

[753]Wakemen，Frederic，Jr.，ed.Ming and Q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80.

魏斐德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史研究》

[754]Wakeman，Frederic，Jr.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the imperial order in seuenteenth-century China.2vo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魏斐德：《大事業：17世紀中國滿族重建帝國社會秩序》

[755]Wakeman，Frederic，Jr.“Introduction：The evolution of local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25.

魏斐德：《中華帝國晚期地方管理演變介紹》，載魏斐德、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

[756]Wakeman，Frederic，Jr.“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The tragedy of Chiang-yin，”In 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43—85.

魏斐德：《清征服江南時期的地方主義和忠君思想：江陰慘案》

[757]Walder，Andrew.“Press account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CQ，79（September 1979），568—592.

安德魯·沃爾德：《報刊報道與中國社會的研究》

[758]Walker，kenneth.Planning in Chinese agriculture：Socialization and theprivate sector，1956—1962.Chicago：Aldine，1965.

肯尼思·沃克：《中國農業的計劃：公有化與私人經濟成分，1956—1962年》

[759]Walker，Kenneth.R.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肯尼思·R.沃克：《中國食用糧食的收購和消費》

[760]Walker，Kenneth.R.“Collectivisation in retrospect：the‘Socialist high tide’of autumn 1955-spring 1956.”CQ，26（April-June 1966），1—43.

肯尼思·R.沃克：《回顧集體化：1955年秋至1956年春的“社會主義高潮”》，見[133]

[761]Walker，Richard L.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Hamden，Conn.：Shoe String Press，1953.

理查德·L.沃克：《古代中國的多國體制》

[762]Wang Chia-chien.Wei Yuan nien-p’u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Wei Yuan）.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7.

王家儉：《魏源年譜》

[763]Wang Erh-min.“Ching-shih ssu-hsiang chih i-chieh wen-t’i”（The problem of defining statecraft thought）.近代史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m History），13（June 1984），27—38.

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

[764]Wang Hsueh-wen.“The‘Gang of Four’incident：Official exposé by a CCPCC document.”Issuse &Studies，13.9（September 1977），46—58.

王學文（音）：《“四人幫”事件：中共中央文件的正式揭露》

[765]Wang Ping-nan.Nine years of Sino-U.S.Talks in Retrospect.Published simultaneously in Shijie zhishi （World knowledge）and Guangzhou ribaobetween Sept.1984and Feb.1985.Trans.in JPRS，China report ：Politi-cal.sociolog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CPS-85-079，Aug.7，1985.

王炳南：《回顧九年的中美會談》，譯文見[374]

[766]Wang P’ing.“‘Ta yueh-chin’ho t’iao-cheng shih-ch’i ti jen-min sheng-huo”（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eriod of readjustment），in Liu Sui-nien，ed.，Liu-shih nien-tai kuo-min ching-chit’iao-cheng ti hui-ku，162—178.

王平：《“大躍進”和調整時期的人民生活》

[767]Wang Shih-wei.“Yeh pai-ho-hua”（Wild lily）.CFJP，13March 1942.

王實味：《野百合花》，見[126]

[768]Wang，Y.C.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

汪一駒：《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

[769]Wang Yi-ch’üan.“An outlin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HJAS，12（1949），134—187.

王毓銓：《西漢中央政府概述》，見[293]

[770]Watson.Butron.Ssu-ma Ch’ien：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2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

伯頓.沃森：《偉大的中國史學家司馬遷的記載》

[771]Watson，James L.，ed.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uolutionChina.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詹姆斯·L.沃森編：《革命后中國的階級與社會階層》

[772]Weber，Max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Glencoe，I11.：The Free Press，1951.Trans.Hans Gerth.Paperback，Macmillan，1964，with an introd.by C.K.Yang（Yang Ch’ing-k’un）.

馬克斯·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和道教》（漢斯·格特譯，楊慶堃序）

[773]Wechsler，Howard J.“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CHOC 3.150—187.

霍華德·J.韋克斯勒：《唐朝的建立》，見[73]

[774]Wei，Henry.China and Souiet Russia.Princeton，N.J.：D.Van Nostrand，1956.

亨利·魏：《中國與蘇俄》

[775]Wei，Wen-ch’i.Courts and policy in Communist China to 1952.Lackland，

Tex.：HRRI Project，1955.

魏文啟（音）：《1952年以前的共產黨中國的法院與政策》

[776]Wei Yuan.Hai-kuo t’u-chih （An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maritime kingdoms）.Several editions：1844，50chüan；1847，60chüan；1952，100chüan.

魏源：《海國圖志》

[777]Wen-ihsueh-hsi （Literary Studies）.Peking：1954—

《文藝學習》

[778]Wen-ipao（Literary Gazette）.Peking：1949—

《文藝報》

[779]Whitbeck.Judith.“From k’ao-cheng to ching-shih：Kung Tzu-chen and the redirection of literati commitment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in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theory of statecraft of modernChi-na.323—352.

朱迪思·懷特貝克：《從“考證”到“經世”：龔自珍和19世紀早期中國文人信仰的改變》

[780]Whitbeck，Judith.“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Kung Tzu-chen（1792—184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dissertation，1980.

朱迪思·懷特貝克：《龔自珍（1792—1841年）的歷史觀》

[781]White，D.Gordon.“The politics of Hsia-hsiang youth.”CQ，59（July-September 1974），491—517.

D.戈登·懷特：《下鄉青年的政治》，見[133]

[782]White，Lynn T.，Ⅲ.Careers in Shanghai：The social guidance of personalenergies in a deueloping Chinese city，1949—196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林恩·T.懷特第三：《在上海的經歷：在一個發展中的中國城市里涉及個人能力的社交指南，1949—1966年》

[783]White，Theodore，and Jacoby，Annalee.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Sloane，1946.

西奧多·懷特、安娜莉·雅各比：《來自中國的雷聲》

[784].White，Tyrene.“Implementing the‘one child per couple’population program in rural China：National goals and local politics，”in David M.Lampton，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

蒂倫·懷特：《在中國農村貫徹“一對夫妻生一個孩子”的人口計劃：國家目標與地方政策》

[785]Whiting，Allen S.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War.New York：Macmillan，1960；2nd ed.，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

versity Press，1968.

艾倫·S.惠廷：《中國跨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的決定》

[786]Whiting，Allen S.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

艾倫·S.惠廷：《中國的威懾微積分學：印度和印度支那》

[787]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2vols.Hong Kong：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69，1970.

《共產黨中國人名詞典》

[788]Whyte，Martin King.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馬丁·金·懷特：《中國的小團體與政治儀式》

[789]Whyte，Martin King.“Educational reform：China in the 1970s and Russia in the 1920s，”Comparatiue Education Reuiew 18.1（February 1974），112—128.

馬丁·金·懷特：《教育改革：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和20年代的俄國》

[790]Wiens，Herold J.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Hamden，Conn.：Shoe String Press，1954.

哈羅德·J.威恩斯：《中國向熱帶的推進》

[791]Wilbur，C.Martin.The Nationalist Reuolution in China，1923—1928.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Reprinted from CHOC 12，1983.

韋慕廷：《中國的國民革命，1923—1928年》

[792]Williams，S.Wells.The Middle Kingdom：A suruey of the geography，gou-ernment，education，social life，arts，religion etc.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its inhabitants.2vols.New York and London：Wiley and Putnam，1848.Rev.and enlarged ed.，1883.

衛三畏：《中國總論》

[793]Willoughby，W.W.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na.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20.2nd.ed.，1927，

W.W.威洛比：《在華的外國權利和利益》

[794]Wills，Maurice.Turncoat：An American’s 12years in Communist China.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8.

莫里斯·威爾斯：《叛徒：一個美國人在共產黨中國的12年》

[795]Wilson，Richard W.Learning to be Chinese；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children in Taiwan.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74.

理查德·W.威爾遜：《學做中國人：臺灣兒童的政治社會化》

[796]Winckler，Edwin.See Nathan，Andrew.

[797]Witke，Roxane.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Little，Brown，1977.

羅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

[798]Wittfogel，Karl A.Oriental despotism：Acomparatiu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對極權的比較研究》

[799]Wittfogel.Karl A.“The legend of‘Maoism，’”CQ，1and 2（January and A-pril 1960），72—86and 16—31.

魏特夫：《“毛主義”的傳說》，見[133]

[800]Wittfogel，Karl A.，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

魏特夫、馮家昇：《中國遼代社會史》

[801]Wolf，Margery.The house of Lim：Astudy of a chinese farm family.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68.

瑪杰里·沃爾夫：《林家：一個中國農民家庭的研究》

[802]Wolf，Margery.Reu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瑪杰里·沃爾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當代中國婦女》

[803]Womack，Brantly.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1917—1935.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

布蘭特利·沃馬克：《1917—1935年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

[804]Wong，John.L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bulic of China：Institutionaltransformation in agriculture.New York：Praeger，1973.

約翰·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改革：農業體制的改造》

[805]Wong，Paul.China’s higher leadership in the socialist transit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6.

保羅·汪：《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中國高層領導》

[806]World Bank.China：Socialist economic deuelopment ：Vol.1The economy，statistical system，and basic date.Vol.2.The economic sectors；Agriculture，industry，energy and transport and external trade and finance.Vol.3.Thesocial sectors：Population，health，nutrition and education.A World Bank country study.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83.

世界銀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第1卷《經濟、統計制度和基本數據》，第2卷《經濟部門：農業、工業、能源和運輸、對外貿易和財政》，第3卷《社會部門：人口、衛生、營養、教育》

[807]World Bank.China：Long-term deu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A World Bank country economic report）.Baltimore，Md.，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Six annex volumes to this book have been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1.China：Issues and prospects in education.2.China：Agriculture to the year 2000.3.China ：The energy factor.4.Chi-na：Economic model and projections.5.China：Economic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respectiue.6.China：The transport sector.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85.

世界銀行：《中國：長期發展問題和選擇》。附錄6冊：1.《中國：問題和教育前景》，2.《中國：到2000年的農業》3.《中國：能源》，4.《中國：經濟模式和規劃》，5.《中國：從世界角度看經濟結構》，6.《中國：運輸部門》

[808]Worthy，Edmund Henry，Jr.“The founding of Sung China，950—1000：Integrative changes i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5.

小埃德蒙·亨利·沃西：《宋代的建立，950—1000年：軍事和政治制度的綜合變化》

[809]Wright，Arthur F.The Sui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D 581—617.New York：Knopf，1978.芮沃壽：《隋代史》

[810]Wright，Arthur F.“Struggle vs.harmony：Symbols of competing values in modern China，”World Politics，6.1（October 1953），31—44.

芮沃壽：《斗爭與調和：現代中國競爭準則的表征》

[811]Wright，Mary Clabaugh.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u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芮瑪麗：《中國最后的保守主義：同治中興，1862—1874年》

[812]Wright，Mary Calbaugh，ed.China in reu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芮7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

[813]Wright，Stanley F.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Belfast：Mullan，1950.

斯坦利·F.賴特：《赫德和中國海關》

[814]Wu，Aitchen K China and the Souiet Union.New York：John Day，1950.

艾特肯·K.吳：《中國和蘇聯》

[815]Wu Ch’ün-kan.“Kuan-yü‘to yueh-chin’shih-wu ho t’iao-cheng ti li-shih ching-yen”（Historical experiences concerning failures in and readjustmen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In Liu Sui-nien，ed.，Liu-shih nien-tai kuo-minthing-chi t’iao-cheng ti hui-ku，25—49.

吳群敢：《關于“大躍進”失誤和調整的歷史經驗》

[816]Wu han.See Wu Nan-hsing.

[817]Wu Hsiu-ch’üan（Wu Xiuquan）.“Sino-Soviet relations in the early 1950s.”Beijing Reuiew，47（1983），16—21，30.

伍修權：《50年代初期的中蘇關系》

[818]Wu Hsiu-ch，üan.Tsai Wai-chiao-pu pa nien ti ching-li （Eight years’experience in the Foreign Ministry）.Peking：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Trans.Wu Xiuquan，Eight years i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January 1950-October 1958]Memories of a diplomat.）Peking：New World Press，1985.

伍修權：《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歷》（1950年1月—1958年10月）

[819]Wu Nan-hsing（Wu han，Teng T’o，and Liao Mo-sha）.San-chia ts’un cha-chi （Notes from a three-family village）.Peking：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吳南星（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札記》

[820]Wu Yuan-li.An economic suruey of Communist China.New York：Bookman Associates，1956.

吳源立（音）：《共產黨中國經濟概觀》

[821]Xiao Lan，ed.The Tienanmen poem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9.

蕭蘭編：《天安門詩鈔》

[822]Yang，C.K.（Ch’ing-k’un）.A Chinese u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59.

楊慶堃：《一個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農村》

[823]Yang，C.K.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reuolution.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59.

楊慶堃：《共產主義革命中的中國家庭》

[824]Yang，C.K.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

楊慶堃：《中國社會的宗教》

[825]Yang Chien-pai，and Li Hsueh-tseng.“Nung，ch’ing，chung chieh-kou”（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e，light industry and heavy industry），in Ma Hung and Sun Shang-ch’ing，eds.，Chung-kuo ching-chi chieh-kou wen-t’i yen-chiu（Research on problems in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99—136.

楊堅白、李學曾：《農輕重結構》

[826]Yang，Lien-sheng.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楊聯陞：《中國制度史研究》

[827]Yang，Lien-sheng.Excursions in Sinology.Cambridge，Mass.：Harvead U-niversity Press，1969；French edition，1964.

楊聯陞：《中國學概覽》

[828]Yang Lien-sheng.“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20—33.

楊聯陞：《關于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的歷史筆記》

[829]Yang，Lien-sheng.“Toward a study of dynastic configurations in Chinese history，”in Lien-sheng Yang，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17.Reprinted from HJAS，17.3—4（1954），

楊聯陞：《中國歷史中王朝結構的探索》

[830]Yang Yen-nan.Chung-kung tui Hu Feng ti tou-cheng （The struggle against Hu feng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Kowloon：自由出版社，1956.

楊燕南：《中共對胡風的斗爭》

[831]Yao Hsu.“K’ang-Mei yuan-Ch’ao ti ying-ming chueh-ts’e-chi-nien Chungkuo jen-min chih-yuan-chün ch’u-kuo tso-chan san-shih chou-nien”（A wise decision to resist America，aid Korea：Commemorating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going abroad to fight）.Tang-shih yen-chiu（Research on Party history），5（1980），514.

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作戰三十周年》

[832]Yeh Kung-chia.“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1936，”i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eds.，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葉孔嘉：《1931—1936年的中國國民收入》

[833]Yen，Maria.The umbrella garden：A picture of student life in Red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54.

瑪麗亞·宴（音）：《宏大的園地：紅色中國學生生活寫照》

[834]Young，Arthur N.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阿瑟·N.楊：《1937—1945年中國的戰時財政和通貨膨脹》

[835]Young，C.Walter.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anchuria；a digest andanalysis of treaties，agreements，and negotiations conerning the three east-ern prouinces of China，prepared for the 1929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of Pacific Relations in Kyoto，Jap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9.

楊沃德：《滿洲的國際關系：關于中國東北三省的條約、協定以及交涉的摘要和分析》

[836]Yü Ying-shih ed.，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ort of the Han Dynasty studies delegation.Seattle：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81.

余英時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古代史學，漢代研究代表團的報告》

[837]Zagoria，Donald S.The Sino-Souiet conflict，1956—1961.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唐納德·S.扎戈里亞：《中蘇沖突，1956—1961年》